

1849年以来
孔子在美国报纸上的形象变迁

孔子在美国

Confuciu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张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7-301-16659-8



9 787301 166598 >

定价：45.00元

1849年以来
孔子在美国报纸上的形象变迁

孔子在美国

Confuciu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张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孔子在美国: 1849 年以来孔子在美国报纸上的形象变迁 / 张涛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301-16659-8

I. ①孔… II. ①张… III. ①孔丘 (前 551 ~ 前 479) — 人物评论 — 研究 — 美国 — 1849 ~ IV. ①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0543 号

书 名: 孔子在美国: 1849 年以来孔子在美国报纸上的形象变迁

著作责任者: 张 涛 著

责 任 编 辑: 张善鹏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6659-8/K · 0813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A5 19 印张 546 千字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导 论	1
一、跨文化语境下的孔子研究	1
二、本书的研究动机	32
三、本书的主要发现和框架	36

第一部分 排华酝酿时期的孔子形象, 1849—1882

第一章 孔子: 中国“反文明”特性之源	43
一、孔子: 中国国民习性的基础	43
二、孔子: 中国创造力的“禁锢者”	49
三、去孔子化: 中国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	54
四、几点结论	60
第二章 孔子: 美国舆论中的怪异符号	62
一、孔子: 迂腐与狡黠的代名词	62
二、孔子: 美国异类的符号	70
三、孔子: “贫乏与虚伪”信仰的承载者	73
第三章 孔子思想与美国价值观念的共性:	
负面舆论之下的理性声音	79
一、孔子与基督: 穿越时空的共性	79
二、孔子: 东西方文明同步的标志	84
三、孔子: 美国现实生活的参照标准之一	89

第二部分 排华高峰期的孔子形象，1882—1920

第四章	孔子与美国排华高峰期华人的认同建构·····	97
	一、强化孔子自豪感·····	98
	二、习俗中的尊孔之举·····	105
	三、社会生活中的孔子与华人群体认同·····	108
第五章	孔子与排华高峰期的华人怪癖·····	112
	一、赌博·····	112
	二、彩票·····	115
	三、华人的狡黠举动·····	116
	四、孔子与华人的“好色”心理·····	120
	五、孔子与华人的怪异习俗·····	122
第六章	孔子与近代中国的衰落·····	127
	一、孔子：中国人的迷惑之源·····	127
	二、孔子：中国革新思维的“障碍”·····	132
	三、孔子：中国与世界脱节的“根源”·····	138
	四、抛弃孔子：中国摆脱落后之路·····	144
第七章	孔子：美国世纪之交援华舆论中的主角·····	153
	一、孔子：值得称道的人格力量·····	153
	二、孔子：凸显排华举措的非理性色彩·····	157
	三、孔子：映衬传教逻辑的荒谬·····	161
	四、孔子：凸现美欧对华政策的虚伪·····	164
第八章	孔子对于美国的借鉴意义·····	172
	一、他山攻错的孔子·····	172
	二、孔子语录及其实用价值·····	176
	三、孔子与选举政治·····	180
	四、孔子与日常政治·····	182
	五、以孔子为据的改革措施·····	186
	六、以孔子引导日常生活·····	191

七、孔子与美国的对外交往	195
八、孔子的负面社会角色	197

第三部分 动荡年代的孔子观, 1920—1950

第九章 孔子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政治	205
一、党派政治评论中的孔子	206
二、新政评价中的孔子	210
三、孔子与新政之外的政治评论	216
第十章 “子曰”: 带有种族偏见的美国幽默	223
一、“子曰”的集中流行	224
二、文体娱乐中的“子曰”	228
三、蕴涵生活道理的“子曰”	233
四、社会行为中的“子曰”	237
五、理性反思	241
第十一章 孔子: 美国日常消费的内容	245
一、饮食文化中的孔子	245
三、家居生活其他方面的孔子因素	250
三、生活品质消费中的孔子	254
四、家居休闲中的孔子	258
五、自然与人文景致中的孔子	267
第十二章 孔子与中国的坎坷命运	271
一、短暂的反孔政治	271
二、国民政府的再次尊孔	276
三、孔子: 抗战时期政治势力的交叉点	280
四、一如既往的民众尊孔之举	286
五、尊孔导致的中国社会弊端	288
六、孔子: 继续“禁锢”中国的创造力	294

第十三章 孔子与美国的外交舆论·····	300
一、孔子与中国的外交处境·····	300
二、孔子：中美交往的纽带·····	307
三、孔子：美国报纸评析欧洲事务的切入点之一·····	312
四、孔子：世界走出困局的引导者·····	317
第十四章 孔子在美国社会的积极作用·····	322
一、孔子学说在美国的实用价值·····	322
二、引入孔子的呼声·····	328
三、以孔子为主题的人格培养实践·····	333

第四部分 对华冷战时期的孔子形象，1950—1972

第十五章 美国反共宣传中的孔子·····	343
一、孔子：打开东亚之门的钥匙·····	343
二、孔子映衬之下的中国外交“怪象”·····	348
三、国民党的中国“正统”形象·····	352
四、共产党的“反正统”形象·····	358
五、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两难”处境·····	364
六、以孔子为据的东亚政策建议·····	369
七、美国全球冷战舆论中的孔子·····	374
第十六章 孔子：美国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监督者·····	379
一、抗议运动中的孔子·····	379
二、孔子与人格修养·····	385
三、孔子与素质教育·····	392
四、孔子与政治生活·····	396
第十七章 美国战后日常生活中的孔子·····	405
一、家居消费中的孔子·····	405
二、休闲消费中的孔子·····	412
三、孔子与美国的体育竞技·····	418

第五部分 当代美国的孔子形象

第十八章 中美对话中的孔子·····	425
一、涉及孔子的物质交流·····	426
二、孔子“见证”下的人员流动·····	431
三、彰显中国自信的孔子学院·····	434
第十九章 当代中美力量格局中的孔子·····	440
一、孔子：中美高层接触的桥梁·····	440
二、孔子与中美关系的杂音·····	444
三、亲台舆论中的孔子·····	451
四、余 论·····	460
第二十章 美国舆论与孔子在当代中国的复兴·····	463
一、绝处逢生的孔子·····	464
二、富含政治价值的孔子·····	469
三、尊孔政治“差强人意”的社会反响·····	476
第二十一章 以孔子监督美国政治： 当代美国政治评论的话语策略·····	483
一、孔子与总统·····	484
二、孔子与最高法院·····	492
三、孔子与国内政策·····	498
第二十二章 当代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孔子·····	507
一、孔子与当代美国的价值导向·····	507
二、孔子与美国人的生活细节·····	519
三、娱乐生活中的孔子元素·····	528
四、孔子与体育运动·····	533
五、余 论·····	538
第二十三章 孔子与战后美国华人的文化想象社区·····	540
一、孔子与华人的传统延续·····	541
二、彰显孔子认同的群体对外行为·····	547

三、铭记孔子的实物载体	551
第二十四章 孔子：战后美国华人餐饮的文化标记	557
一、中餐品牌上的孔子	559
二、幸运签饼里的孔子	566
三、试图影响非华裔饮食习惯的孔子	573
结束语	580
参考文献	585
后 记	596

导 论

孔子乃中国及其文化的象征，其思想博大精深，既影响了历代中国人的处事原则和行为模式，亦是世界了解中国的关键所在。人们在理解和利用孔子思想的过程中，根据特定的需要和历史文化背景，形成了林林总总的孔子形象。孔子形象与孔子思想一道，是中华文化和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有机组成部分。自从 20 世纪末期以来，中国政府借用孔子在全球文化中的巨大影响力，已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建立三百多所孔子学院。国际国内以孔子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亦是层出不穷，数量众多。中国社会重振孔子地位的热情与日俱增，讲授孔子思想和礼仪的书籍和课堂形势火爆，人们趋之若鹜。总之，孔子正在经历着又一次历史复兴。而此次复兴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孔子影响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程度。不仅中国政府强力推动和拓展孔子的全球影响，很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也在加深着对于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子的国际影响力呈集中爆发之势，一改过去只是存在于隐性层面的状态。

一、跨文化语境下的孔子研究

学术界应声而动，积极投身于孔子研究之中，成果极为丰硕。综合观之，国内外学界在研究孔子时，有几大侧重点。其一，孔子思想研究。这是研究成果最为集中、数量最巨的领域。第二，孔子及其学说的影响。孔子在国内外的思想、文化、社会诸方面都有明显影响，

很多学者因此注重挖掘孔子留下的遗产。第三,不断建构的孔子形象。三大方面,国内外学者均有涉及,现分述如下。

(一) 孔子思想研究

国内学者占尽天时地利,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似无赘述之必要。相比之下,国外学者无论在资料或是语言方面,都无法企及中国学者。但他们依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值得我们充分关注。国外研究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在研究孔子思想时,重心主要有四:孔子思想的等级意识、孔子思想的宗教属性、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孔子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

首先,国外研究者认为,在孔子建构的社会秩序中,以“礼”为代名词的等级概念是一切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等级观念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以至于取代了西方社会不可或缺的法律原则。恒安石(Arthur W. Hummel)认为,孔子的“正名”之说就体现出严密的等级体系。个人行为必须“符合(社会角色)名称”并被置于相应的关系之中,社会才能正常运转。名物制度实则以礼仪为规范的社会等级,有别于法律制度。^[1]陈汉生(Chad Hansen)也认为,孔子与西方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异之一就在于,前者思想中的“礼”发挥了与西方法律相似的社会规范作用,决定着社会等级体系。^[2]

学者们用孔子的等级意识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交往。诺曼·库彻(Norman Kutcher)关于中国传统中“第五大关系”的分析便是如此。所谓“第五大关系”,即排在父子、君臣、夫妻、兄弟之后的个人友谊。孔子“虽然承认友谊包含着情感成分,但却贬低其重要性”,突出友谊相对于其他社会关系的从属地位。^[3]赫伯特·芬格

[1] Arthur W. Hummel,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 in China,"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0 (April-July 1960): 14, 16.

[2] Chad Hansen, "Freedom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in Confucian Ethic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2 (April 1972): 172—73, 183—84.

[3] Norman Kutcher, "The Fifth Relationship: Dangerous Friendships in the Confucian Contex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 (December 2000): 1616, 1620, 1628.

雷特 (Herbert Fingarette) 研究“仪式行为和咒语”在儒家社会人际交往中的“神奇力量”。在孔子的思想背景下,“仪式行为和咒语”就是“礼”。诸悉“礼”的统治者具有“不令而行”(《论语·子路》)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的神奇力量;百姓则因为遵循“礼”而极其自然地实现“社会形式的和谐与美好”以及“道德上的完美”,赢得“人际交往的内在和最大尊严”。^[1] 乔尔·J. 库珀曼 (Joel J. Kupperman) 从人类行为的自然性入手,论证大致相同的主题。库珀曼的分析由《论语》中的一段文字开始:“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库珀曼沿用西方人对《论语》的翻译,将“和理解”为“自然”(naturalness),视其为“礼”和“仁”在个人思维中的内化和升华。^[2] 而在艾文贺 (Philip J. Ivanhoe) 的分析解读中,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思想(《论语·里仁》)同样蕴涵着丰富的等级信息。^[3]

如果说等级秩序和相应的人际交往是孔子社会模式的根本内涵的话,概念则是这种模式的支撑点。美国学界的孔子思想概念辨析大致围绕“礼”、“仁”、“义”、“忠”、“恕”、“道”、“君子”等展开。这些概念又以“礼”、“仁”为轴心。杜维明 (Wei-ming Tu) 认为,“礼”将“个人、家庭、国家和世界融为一体”,是“涉及个人行为、社会关系、政治组织和宗教行为的各种仪式的总和”,“几乎涵盖了人类文化的所有方面”。^[4]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更为明确地阐述了“礼”、“仁”之间的关系。“仁”是“个人道德概念”,“礼”是“社会关系概念”。两

[1] Herbert Fingarette, "Human Community as Holy Rite: An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us' Analects,"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59 (January 1966): 55, 56, 58, 66.

[2] Joel J. Kupperman, "Confucius and the Problem of Naturalnes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8 (July 1968): 175—78, 180—82, 185.

[3] Philip J. Ivanhoe, "Reweaving the 'One Thread' of the Analect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0 (January 1990): 24, 28—30.

[4] Wei-ming Tu, "Li as Process of Humanizati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2 (April 1972): 198.

者如同“基督教中的法律和福音”，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保持‘仁’、‘礼’之间的平衡极为重要”。^[1]在此问题上，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得出了相同的结论。^[2]信广来（Kwong-loi Shun）认为，礼既能促进仁者理想的实现，自身又可在时机成熟时加以变通。^[3]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试图在两大概念之间分出高低。有学者认为，唯有“仁”才是“孔子思想和教诲的‘核心’和‘脊梁’”，“引领着人际关系中所有其他‘美德’”。^[4]杜维明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也有意修正此前的看法，转而将所有概念置于“‘仁’的‘势力范围’”之内：“相对于‘礼’，‘仁’是第一位的。”^[5]但无论两大概念孰重孰轻的争论如何发展，“仁”主内、“礼”主外的关系格局显然是很多学者的一大共识。他们以此为起点，在论述中纳入其他相关概念。

柯雄文（Antonio S. Cua）将“君子”与前述两大概念相提并论，建立了孔子伦理三位一体的逻辑结构。“仁”为孔子伦理的核心线索，是个人的“内在道德标准”。“礼”决定“仁”的具体表现，是社会的“外在道德标准”。“君子”是个人修养的理想目标，是“‘仁’和‘礼’在个人身上和谐相处……道德的内在和外在标准在个人身上合而为一的体现”。^[6]赖蕴慧（Karyn L. Lai）是另外一个论及“礼”、“仁”与

[1] Wei-ming Tu, "The Creative Tension between Jen and Li,"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8 (January-April 1968): 31, 37.

[2] Hoyt Cleveland Tillman, "The Development of Tension between Virtue and Achievement in Early Confucianism: Attitudes toward Kuan Chung and Hegemon (pa) as Conceptual Symbol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1 (January 1981): 18, 20.

[3] Kwong-loi Shun, "Jen and Li in the 'Analect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3 (July 1993): 460—61, 474.

[4] Hwa Yol Jung, "Jen: An Existential and Phenomenological Problem of Intersubjectivit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6 (July-October 1966): 174, 181.

[5] Wei-ming Tu, "Jen as a Living Metaphor in the Confucian Analect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1 (January 1981): 49, 51.

[6] Antonio S. Cua, "Reflections on the Structure of Confucian Ethic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1 (April 1971): 125—26, 132, 137—38.

其他概念总体关系的学者。“仁”代表着“个人、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终极道德成就”；“礼”则“维系着孔子等级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是衡量社会行为是否得当的标准。两者密不可分，共同构成社会关系的主要框架。“天命”、“孝”、“恕”、“道”都是这种二元关系的体现和补充。^[1] 罗慕士 (Moss Roberts) 在“礼”、“仁”二元框架之下考察了“礼”和“义”。罗慕士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一方面，“义”代表“损益”，“礼”则是“历史形式”，张力状态的出现在所难免。另一方面，“义”不能在“礼”的范围之外“随意主张或付诸实施”，而“礼”则是“一种行动方式”，能够避免两者的分歧达到“水火不容的程度”。“仁”所具有的历史连续性更使“礼”、“义”无法出现真正的矛盾。^[2] 郝大维 (David L. Hall) 和安乐哲 (Roger T. Ames) 从语义符号学的角度出发，认可罗慕士的观点。两人进一步指出，相对于注重行为现时恰当性的“义”，“礼”具有三大额外功能：它能激励人们在行“义”的过程中增强“道德判断力”，是人们“实践和体现‘义’的正式工具”，并能“将人们富有创造性的道德感悟具体化”。^[3] 芬格雷特以“仁”、“礼”框架为背景，研究“己”、“身”、“欲”、“志”分别所指的内容。“己”是相对于他人的自我指代，“身”既表明主观意识，又突出自己的客观存在；“欲”是一种笼统的愿望，“志”则具有强烈的目的性。芬格雷特相信，孔子之所以频繁使用上述四个概念，就是要“激励个人意志”，按照“礼”、“仁”以及“忠”、“恕”的要求，“实现理想生活”。^[4]

等级概念是欧美学者看待中国及其传统时的最主要角度，孔子思

[1] Karyn L. Lai, "Confucian Moral Thinking,"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5 (April 1995): 250—63.

[2] Moss Roberts, "Li, Yi, and Jen in the Lun Yu: Three Philosophical Defini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8 (October-December 1968): 768.

[3] 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Getting It Right: On Saving Confucius from the Confucian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4 (January 1984): 4, 11—12.

[4] Herbert Fingarette, "The Problem of the Self in the Analect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9 (April 1979): 131—34.

想被塑造成了以“仁”、“礼”等概念为支撑、以维护等级体系为目的的道德规范和社会原则。德效騫 (Homer H. Dubs) 提出, 与基督教宣扬普爱众生不同, 孔子强调“仁”, 意在敦促人们施行“有等级的爱” (graded love), 即与自己的亲近程度决定爱的多少。^[1] 赖蕴慧在逐一解读了基本概念之后得出结论: 孔子思想的“总体问题”是, “尽管孔子试图坚持人类生存平等和性情相近的观点, 他却相信社会的等级特性”。^[2]

其次, 在美国学术语境下, 孔子思想拥有了一定程度的宗教色彩。由于孔子思想侧重社会伦理, 且没有与基督教类似的组织机构和神圣经典, 美国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刻意探寻孔子思想中的宗教成分。即使在谈论相关话题时, 学者们也倾向于认为, 这是孔子个人信念的体现。日本学者服部宇之吉 (Unokichi Hattori) 于 1936 年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上发表的论文就是一例。服部虽然视天命观为孔子思想的主线之一, 却并未将天命与宗教联系起来, 而是称之为孔子个人“超常能量”和“超常热情”的“根源”。^[3] 服部论文代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罗德尼·泰勒 (Rodney Taylor) 和加里·阿巴克 (Gary Arbuckle) 在 1995 年回顾美国学界关注孔子思想宗教属性的历程时, 不无遗憾地写道: “孔子及其学说和信徒被归入不可知论者之列, 一旦他们的宗教信仰被界定为无法界定之物, 将其束之高阁便有了充分的理由。”^[4]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学者关注孔子思想宗教属性的成果逐渐增多。

关注增多的根本原因是, 学者们放弃了以基督教的所有要素去衡量孔子思想的努力, 转而从宗教的核心概念入手。泰勒在 1998 年提

[1] Homer H. Dubs, “The Development of Altruism in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 (April 1951): 49—50.

[2] Lai, “Confucian Moral Thinking,” 265.

[3] Unokichi Hattori, “Confucius’ Conviction of His Heavenly Miss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 (April 1936): 108.

[4] Rodney Taylor and Gary Arbuckle, “Confucian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 (May 1995): 347.

出,只要能在孔子思想中找到“绝对”(absolute),孔子思想的宗教属性便不可质疑。在孔子学说中,“天”就是绝对,因为它“在孔子论述中被反复提及,是界定对错和宇宙秩序的核心范式,包含了人性所有领域的最高期望,是人类的目标和终点”。“圣”即通天之人,记载圣人言行的著述就成了儒家传统中的圣经。^[1] 泰勒与阿巴克尔合写的前引论文视“天人合一”为“儒家传统的宗教内核”。^[2] 作为绝对的“天”赋予孔子思想以宗教性。泰勒此说不仅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也点明了美国学界在论述孔子学说宗教属性时所采取的基本思路。以此为切入点,美国学者刻画了孔子思想以“天”为支撑点的宗教特性。

库珀曼称孔子为“宗教思想家”,相信其思想与其他宗教具有“家族相似性”,因为孔子也认为,“与上帝缺乏恰当联系的人”将处于焦虑之中。作为西方上帝的对等概念,“天”决定着人们的现实生活,是“最高价值观”的载体。孔子思想因此是一种“宗教伦理”。^[3] 刘述先(Shu-hsien Liu)坚信,“天”给孔子思想打上了宗教烙印。“对于孔子而言,天象征着……自然和道德秩序的根源。”正因为天命观的存在,“孔子无疑建立了儒家宗教思想的基本模式”。^[4] 白诗朗(John Berthrong)则略带调侃地写道,如果知道自己创立的学说被视为宗教,孔子“也许会感到惊讶”。但事实上,孔子的论述一直在为人们的言行提供导向和新的启迪,从而与西方宗教经典一样,具备“解释学”功能。这种宗教超然性的核心就是“天”。^[5]

美国学者们显然愿意突出某种宗教成分的存在,以显示有神论

-
- [1] Rodney L. Taylor, "The Religious Character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8 (January 1998): 87, 89, 91.
 - [2] Taylor and Arbuckle, "Confucianism," 351.
 - [3] Joel J. Kupperman, "Confucius and the Nature of Religious Ethic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1 (April 1971): 189, 192—93.
 - [4] Shu-hsien Liu, "The Religious Import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Its Traditional Outlook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1 (April 1971): 158, 160, 168.
 - [5] John Berthrong, "Confucian Piety and the Religious Dimensions of Japanese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8 (January 1998): 61—63.

对世界思想体系的涵盖能力。德效骞在一篇文章中开门见山地写道，“在每一个文明中心，哲学都兴起于宗教”。希腊如此，印度亦是如此。既然中国哲学始于孔子，那么孔子思想就必然包含着宗教成分。“天”就是孔子思想中的上帝。首先，孔子“对天顶礼膜拜，视其为仁德至高无上的源泉”。“唯天为大”（《论语·泰伯》）之说便是例证。其次，“孔子个人也依从于天”。例如，当子路因为孔子见南子一事而感到不悦时，孔子发誓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第三，孔子告诫人们，不要“欺天”（《论语·子罕》）。第四，孔子深信，“天主导人们的生活”。德效骞举例说，颜渊已死，孔子叹息道：“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更为重要的是，孔子认为，自己教化民众是在遵循天命，“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有鉴于此，孔子“对上帝的主宰力量深信不疑”，他“接受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天”，是一个典型的一神论者。^[1]

D. 霍华德·史密斯（D. Howard Smith）同样批判了学术界未把孔子及儒家思想视为宗教的观点。史密斯认为，尽管此类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我们将宗教广义地界定为人们对更高精神力量的认可、信奉和态度的话”，那么孔子思想就应该是“一种宗教，而非单纯的伦理政治哲学”。在孔子建立的思想体系中，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人对于上天神灵的依赖以及精神世界与人类世界之间的紧密联系”。孔子的“玄妙教诲植根于宗教”，“天”就是孔子思想中的上帝。不但孔子自己的使命授之于天，整个“宇宙秩序”的和谐运转都依赖于天的调控。孔子强调“礼”和“仁”，两者的存在目的在于彰显“道”。所谓“道”，即“古代圣人因极力遵循天命而采取的生活方式”。因此，不只“道”具有宗教属性，“礼”和“仁”也成了孔子有神论的两个支撑点。按照史密斯的解释，“礼”是“孔子宗教观的外在表达”，“仁”则是“内在动力”。有鉴于此，“人类生活变革和前进的原始推动力便来自于上天的指示和命令”。史密斯最后总结道，“孔子是一个宗教情

[1] Homer H. Dubs, "Theism and Naturalism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9 (October 1959—January 1960): 163, 167—70.

结很深的人，其伦理原则和博爱精神建立于当时最深刻的宗教信仰基础之上”。^[1]

可见，但凡涉及孔子思想宗教性的文章都认可“天”的核心地位。“天”是社会秩序的终极根源和保证，在孔子学说中发挥着上帝的作用。通过“礼”和“仁”，美国学界在孔子思想中找到了西方法律和人际原则的对应之物。而通过“天”，美国学界则将儒家社会的精神世界纳入了西方的宗教体系之中。

第三，学界极为关注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归纳起来，现实意义的探究主要集中在两点：孔子思想对于欧美价值体系的补充以及在解释东亚问题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美国学界认为，孔子建构的人类社会虽然等级严密，但却充满人性与和谐，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欧美社会的相应缺陷。关注美国公司组织效率的钱·K. 哈恩(Chan K. Hahn)和沃伦·C. 沃特豪斯(Warren C. Waterhouse)指出，对于“众多美国管理理论家和实际管理者”而言，孔子有关人的理论颇具借鉴意义：以人为本，以管理者的“美德和道德垂范”说服员工，可“让每个人最为充分地实现自我”。^[2]对于西方“‘个人’与‘社会’的尖锐对立”，杜维明同样感到不安，相信孔子思想中的人性和谐成分不失为有益的补充。^[3]王庆节(Qingjie James Wang)写道，孔子思想中的为人准则尤其具有欧美传统无法比拟的“真正的人本主义”，能够避免“道德主观主义和绝对‘普遍公正’的幻觉”。如此而来，人类社会既不失关爱，个体之间又不致趋同。^[4]另有学者发现，欧美社会中的关爱者往往顾忌被关爱者的“个人自主权”，“不愿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根本就不愿伸出援手”。“恕”就能

[1] D. Howard Smith, "The Significance of Confucius for Religion," *History of Religions* 2 (Winter 1963): 243, 245, 247, 249, 253—55.

[2] Chan K. Hahn and Warren C. Waterhouse, "Confucian Theories of Man and Organ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5 (September 1972): 355—56, 358.

[3] Tu, "Jen as a Living Metaphor," 53.

[4] Qingjie James Wang, "The Golden Rule and Interpersonal Care: From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9 (October 1999): 423—26.

让关爱者敢于站在被关爱者的角度思考问题,采取及时的救助行动。^[1]赞同前述观点的学者还有艾文贺等。^[2]沃尔特·R. 斯托克斯 (Walter R. Stokes) 甚至声称,孔子的人性与和谐思想可以弥补弗洛伊德性伦理缺陷。^[3]

孔子思想对于西方精神世界的启示同样有学者论及,只是数量较少。刘述先得出结论称,孔子思想预示了当代基督教的发展走向。第一,经历存在主义转向的西方神学排斥“客观科学的思维方式”,孔子学说虽然不失理性成分,但也认为,人只有“通过内心启发和对自身更为深刻的认识”方能不断前进。第二,孔子思想没有神话元素,这与当代西方宗教去除神话色彩的趋势如出一辙。第三,两者都擅长使用象征性语言,以阐释信仰。第四,美国人在20世纪才宣称上帝已死,而自从孔子开始,中国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上帝了。第五,孔子天人合一的思想与西方宗教的世俗化不谋而合。第六,孔子思想中人们对“终极目标”的追求类似于西方当代宗教中“上帝在不断变化”的观念。^[4]刘在中国古代的孔子思想中看到了西方宗教的发展趋势。不论事实是否如此,这都代表着某些学者试图在孔子学说的启示下重新认识西方宗教的努力。郝大维和安乐哲是另外一个例子。他们批评受到基督教影响的西方哲学传统,否认人类的创造性源于“对超然(即上帝)创造行为的模仿”。孔子思想强调,“自然和(或)社会环境”可以促进创造能力,因而是西方哲学的有益补充。^[5]

孔子思想还是欧美了解中国和东亚的钥匙。早在1933年,洛杉矶市地方教育委员会就提出,幼儿园教学应“仔细了解某些国家的人

[1] Sin Yee Chan, "Can *Shu* Be the One Word That Serves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aring Action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0 (October 2000): 518—20.

[2] Ivanhoe, "Reweaving the 'One Thread' of the Analects," 29.

[3] Walter R. Stokes, "On Changing Sex Ethics," *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 24 (August 1962): 270.

[4] Liu, "The Religious Import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170—74.

[5] Hall and Ames, "Getting It Right," 14, 18.

民——如中国人”，孔子伦理是主要的切入点。^[1] 黑兹尔·施图尔特·艾伯森 (Hazel Stewart Alberson) 进一步认为，孔子思想是西方了解中国人品性的关键线索。^[2] 数位学者就是沿着这条线索，围绕西方人通常津津乐道的中国传统惰性展开了争论。

既有学者认为，被视为中国惰性与保守性之源的孔子学说蕴涵着力求社会变革的成分，也有学者不以为然。在力主孔子思想支持进步的一方，李佳白 (Gilbert Reid) 大谈孔子同情革命的态度。李佳白写道，因为谈论政治问题和政府统治，孔子“自然提到了革命，并且告诉我们何时革命方为恰当，如何避免革命是出现频率更高的话题”。不仅如此，孔子还率先使用了令现代人不寒而栗的“革命”一词。孔子把爆发革命的责任推给了统治者。“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既表明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亦是孔子对“为政者的警示”。孔子“同情革命运动”的态度在反叛作乱者公山弗扰和佛肸召孔子前往，而孔子欣然应允的事件（《论语·阳货》）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包括《大学》和《中庸》等其他儒家典籍中，李佳白更是发现了孔子推崇“民众权利” (popular rights) 的思想。^[3] 黄秀玑 (Siu-Chi Huang) 以孔子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为切入点，同样塑造了孔子力求社会进步的形象。黄写道，孔子“生活在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都分崩离析的时代”，孔子以音乐为手段促进天下一统的思想因此具有前瞻性，“我们将孔子的艺术哲学归入理想道德主义范畴似乎是恰当的”。^[4] 帕特里克·赖利 (Patrick Riley) 在评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路易斯·哈茨 (Louis Hartz) 鲜为人知的最后一部著作——《整合世

[1] “Some Notes on the Study of China and Japan in American Schools,” *Memorandum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merican Council)* 2 (November 3, 1933): n. p.

[2] Hazel Stewart Alberson, “The Significance of World Literature Today,” *College English* 7 (March 1946): 324.

[3] Gilbert Reid, “Revolution as Taught by Confucia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33 (January 1923): 188—89, 191—93.

[4] Siu-Chi Huang, “Musical Art in Early Confucian Philosoph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3 (April 1963): 50, 52, 55, 59.

界历史》(*A Synthesis of World History*)时认为,哈茨对孔子思想的分析是其“最大的成功之一”。而成功的点睛之处就在于,孔子被塑造成了“‘性格鲜明’的预言家”。显然,赖利支持孔子思想具有变革属性之说。^[1]

而在同时,试图将孔子思想归入保守一类的研究成果也时有出现。汉学家福开森(John C. Ferguson)视孔子思想为保守主义。另外两名学者虽然对此进行了批评,但却相信,福开森失误的症结在于,他因为儒教耽于礼节而称其保守,道教则因为喜欢预测将来而被称为自由主义。但注重礼仪和占卜预测都是儒教的典型特征,而非道教。这实则承认了孔子思想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倾向。^[2]卡尔·T. 杰克逊(Karl T. Jackson)宣称,孔子思想最为明显的缺陷是,它“蕴涵着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精神”。^[3]

就在孔子思想的进步与保守之争远未尘埃落定之时,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迅速崛起,这赋予孔子思想以新的现实意义:揭示东亚发展的思想根源。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欧美学者普遍认为,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源于基督教的个人进取和延迟享受等精神,东方国家在近代的衰落就是没有“新教伦理”的激励所致。东亚经济的繁荣颠覆了这一信念。急于找到问题症结的美国学术界突然之间发现,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潜藏着激励人们进取的因素。但对于奉为圭臬的韦伯理论,学者们却难以舍弃。他们乐于相信,东亚的成功并非单由儒家思想导致,而是儒家思想和韦伯理论相结合的结果。因此,用孔子思想解释东亚经济腾飞依然是在欧美学术语境中进行的。

例如,克里斯托弗·L. 康纳里(Christopher L. Connery)虽然

[1] Patrick Riley, "Louis Hartz: The Final Years, the Unknown Work," *Political Theory* 16 (August 1988): 391—92.

[2] Feng Han-yi and J. K. Shryock, "Chinese Mythology and Dr. Fergus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3 (March 1933): 55.

[3] Carl T. Jackson, "The Orient in Post-Bellum American Thought: Three Pioneer Popularizers," *American Quarterly* 22 (Spring 1970): 71—72.

惊叹于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但却专门为此创造短语：“带有明显（韦伯意义上的）新教特色的儒家思想”（a very Protestant [in the Weberian sense] Confucianism）。新教儒家思想既包含“强烈的工作伦理”，又“尊重等级和教育”。在康纳里看来，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唯有在西方思想的启发下方能重新焕发活力。儒家思想与新教伦理在日本“完美结合”，让一贯居高临下的美国公司掀起一场“向日本学习”的运动。正是因为西方的冲击和震撼以及日本的榜样力量，孔子在中国和新加坡等国“复活了”。^[1]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更加详细地阐述了孔子思想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关系。德里克将儒家思想置于西方现代化理论及资本主义进程的背景之下，认为孔子及其思想之所以在东亚各国重新受到重视，是因为这一思想体系避免了该地区重蹈欧美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纷纷出现衰退的覆辙。儒家思想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难以逾越的障碍”，却“在一夜之间成为其他地区竞相获取的前进动力”。德里克声言，“尽管儒家思想可能无法促使资本主义产生，但如果资本主义从外部引入，儒家思想却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儒家思想与资本主义在亚洲的结合能够催生一种有别于传统资本主义的体系；儒家思想中的等级、家庭和集体观念有助于解决西方资本主义以个人为中心的弊病。^[2]

第四，孔子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首先是孔子与中国其他思想家的比较，其中以孔子与孟子、孔子与庄子的比较居多。孔孟一体似乎不言自明，但学界却出现了一些争论。争论正是在孔孟比较的过程中进行的。1980年，有华裔学者指出，“孟子是孔子（思想）的真正继承者”之说缺乏依据，理由是两者差异明显的人性观，孟子甚至“在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歪曲了孔子（学说）”。^[3]该文引起较大反响。吕

[1] Christopher L. Connery, "Pacific Rim Discourse: The U.S. Global Imaginary in the Late Cold War Years," *boundary 2* 21 (Spring 1994): 46.

[2] Arif Dirlik, "Confucius in the Borderlands: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Reinvention of Confucianism," *boundary 2* 22 (Autumn 1995): 232—34, 236—37, 243—54.

[3] Philip Ho Hwang,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u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0 (January 1980): 47, 49, 52—53.

武吉 (Martin Lu) 反对将孔孟对立的做法, 认为这一论述存在两大问题: 第一, 作者“在判断孔子的立场时, 视《论语》为唯一可信的资料”, 忽略了“《大学》和《中庸》的价值和重要性”; 第二, 孟子作为孔子的“真正传人”“既有坚实的理论根据, 也为孔子研究者所认同”。^[1] 约翰·N. 威廉斯 (John N. Williams) 相信, 吕所代表的观点是“错误的”。首先,《大学》和《中庸》的作者是谁尚无定论。其次, 即使能够确定作者身份, 他们是否是“孔子的真正传人”仍有待商榷。更为重要的是, 孔孟在“仁”的问题上分歧明显: 孔子认为“仁”绝非天生, 孟子的观点则刚好相反。^[2]

至于孔庄比较, 美国学界的看法较为一致。孔庄分歧——尤其是庄子对孔子的嘲讽——令美国学者颇感兴趣。毕德生 (Willard J. Peterson) 解读了《庄子·大宗师》和《论语·述而》反映出的孔庄思想差异。《庄子·大宗师》假借孔子自己之口, 声称“丘, 游方之内者也”, 庄子及其信徒则在游方之外。毕德生解释曰, “方可以比作边界线, 人类建构的日常社会被围在其中”。庄子思想游离于边界之外, “与造物主和天地一体, 坦然面对死亡, 忘却自身存在, 远离日常社会的‘滚滚红尘’”。孔子则反其道而行之。孔子“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论语·述而》) 进一步表明, 孔子是方内之人。^[3] 威廉·A. 卡拉汉 (William A. Callahan) 认为, 在《庄子》中, 孔子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种话语和反语”。《庄子》利用“孔子的文化资本”, “质疑儒家思想”。《庄子·渔父》即为典型例子。在此故事中, 孔子不但训斥弟子过于迂腐, “湛于礼仪有间矣”, 而且还对一个普通渔翁不停“再拜”。庄子此举有一箭双雕之效, 既“在反语空间里塑造了反对儒教的孔子形象”, 又“打乱了(孔子建立的)等级秩序”。孔子“从一个自豪得意的老师, 转

[1] Martin Lu, “Was Mencius a True Successor of Confuciu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3 (January 1983): 79, 81.

[2] John N. Williams, “Confucius, Mencius, and the Notion of True Successi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8 (April 1988): 160, 163.

[3] Willard J. Peterson, “Squares and Circles: Mapp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9 (January-March 1988): 50—55.

变成了卑躬屈膝的学生”。^[1]

孔孟、孔庄是美国学者为孔子与中国其他思想家建立的主要比较框架。而在比较研究孔子与欧美思想家时,涉及的人物主要集中在古代希腊时期。比较的层面自然以思想为主,但也包括生活经历等。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异同是数位学者颇感兴趣的话题。马克斯·汉堡(Max Hamburger)从七个方面对两人进行了细致比较,发现他们在生平经历、伦理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仁爱美德的重要性、重视教育等方面颇为相似,但在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和生活的终极目标方面则观念有别。^[2] W. 斯科特·莫顿(W. Scott Morton)比较了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关于“人”的看法,认为中庸之道是主要的相似之处。但在人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方面,差异较为明显。孔子强调真诚和公正,亚里士多德更加注重勇气、慷慨、高尚。两人都突出的品质包括沉着、节制、适度自豪、羞耻。^[3] 余纪元(Jiyuan Yu)关注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仁德观,得出结论曰,仁对于孔子是“爱人”和“复礼”的结合,对于亚里士多德则是“一种性格状态”和“实用理性”。^[4]

苏格拉底是美国学界用以与孔子比较的另外一位古希腊哲学家。G. H. 马胡德(G. H. Mahood)关注两人共有的道德使命,认为孔子和苏格拉底都“始终不渝地坚持特定的行为标准和性格表述”,身体力行,积极利用“话语”媒介,传播道德。^[5] 莫顿也提及,孔子和苏格拉底都重视青年人的教育。^[6] 另一学者分析了孔子和柏拉图的诗歌观。

[1] William A. Callahan, “Resisting the Norm: Ironic Images of Marx and Confuciu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4 (April 1994): 289—90.

[2] Max Hamburger, “Aristotle and Confucius: A Comparis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0 (April 1959): 237—48.

[3] W. Scott Morton,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Man: The Original Formati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1 (January 1971): 75—76.

[4] Jiyuan Yu, “Virtue: Confucius and Aristotl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8 (April 1998): 341.

[5] G. H. Mahood, “Socrates and Confucius: Moral Agents or Moral Philosopher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1 (January 1971): 179—80, 185.

[6] Morton,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Man,” 74.

他指出，孔子谈论的诗歌专指《诗经》，柏拉图的诗歌内涵更加宽泛，包括所有“有韵律、可以谱曲并以史诗或悲剧形式出现的”作品。但在两人的思想中，诗歌都是“涵盖广泛的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辅助作用”。“内容和形式的简洁”是两人判断诗歌质量的又一共同标准。至于如何实现诗歌的核心目标——和谐，孔子和柏拉图之间的分歧再次明显化。孔子推崇横向模式，即由忠孝推及整个社会。柏拉图设想的则是纵向模式：个人通过不断获取“更加抽象和精练的知识”，最终进入纯粹而和谐的思想境界。^[1]

在古希腊哲学家之外，少数近现代欧美思想家也进入了美国学界的比较视野。德国剧作家和诗人席勒就是一例。乔治·H. 丹顿(George H. Danton)认为，席勒与孔子在诸多方面非常相似。除了类似的生平经历，两人都竭力复古，并在德与色的问题上观点一致。^[2] 华珊嘉(Sandra A. Wawrytko)用来与孔子进行比较的对象是康德。孔子和康德都“尊重伦理”。但尊重的途径却泾渭分明：孔子强调“社会框架”即五大关系的核心作用；康德强调理性的培养。^[3] 约瑟夫·格兰奇(Joseph Grange)比较了孔子与美国哲学家杜威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有关公共利益的论述。孔子和杜威认为，公共利益的维护有赖于公众和私人区域的和谐统一。罗蒂则坚持，文学阅读才是促进公共利益的途径。格兰奇赞同孔子和杜威的观点，宣称“罗蒂的自由主义乌托邦缺乏根基”。^[4]

[1] Zong-qi Cai, "In Quest of Harmony: Plato and Confucius on Poetr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9 (July 1999): 317—45.

[2] George H. Danton, "Schiller and Confucius," *German Quarterly* 16 (November 1943): 175—78, 180.

[3] Sandra A. Wawrytko, "Confucius and Kant: The Ethics of Respect,"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2 (July 1982): 237.

[4] Joseph Grange,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Public Good: Confucius, Dewey, Rort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6 (July 1996): 354, 357, 362.

（二）孔子及其学说的影响研究

孔子学说自创立以来，不但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其论著还通过译介，进入世界诸国的精神世界。孔子的影响远及四海，中外学界自然不能漠视。国内相关研究集中于孔子及其学说影响中国社会的盛况，至于孔子的域外影响，则触及不多。因此，我们仍以美国学界的研究成果，说明孔子及其学说的影响研究重心之所在。大致而言，学界的关注兴趣盖有以下四点：孔子地位在中国的确立、耶稣会士与孔子影响的欧洲之行、孔子与启蒙时期欧洲的中国热潮、西欧之外的孔子足迹。

论及孔子地位在中国的确立，朱莉娅·K. 默里（Julia K. Murray）是我们必须提及的学者。默里没有根据儒家思想的传承线索梳理孔子地位崛起的历史轨迹，而是以艺术史学家的眼光，解读孔子生平画所承载的信息。默里试图证明，孔子主导地位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生平画的滥觞和扩散，生平画的出现和发展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归根结底，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的主宰是一种政治产物。

默里的论述以《圣贤图》和《圣迹图》为支撑。《圣贤图》出现于南宋时期。以孔子及其门徒为主题的画作在此之前已时有所见。早在公元178年，东汉的蔡邕就在鸿都门学的墙壁上，绘制了孔子和七十二门徒的肖像画。自唐代到明代中期，理想化色彩浓厚的孔子画像是各地孔庙祭祀活动的核心内容。南宋高宗皇帝（1127—1162年在位）授旨绘制的《圣贤图》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默里写道，“参照宋朝其他皇帝，高宗发现，推进儒家教育、明确支持孔子崇拜是吸引学者为自己效力的恰当途径”。得益于此，15块绘有孔子及其学生肖像的石碑于1157年1月在首都临安（杭州）的太学里塑立起来。高宗还为每一位先贤撰写颂文。此为《圣贤图》之由来。尔后，为确立“在传统价值观念领域的领导地位”，高宗还亲自抄写儒家经典著作，镌刻于石碑之上，是为《石经》。《石经》拓本发往路、州各级的所有政府学校。高宗差人绘图镌刻之举既“标志着他对儒家传统的控制”，又极大地提升了孔子的“地位和名望”。《圣贤图》后传往日本，

传播了孔子及儒家思想。^[1]

以《圣贤图》为代表的孔子肖像和雕塑是孔庙和其他地方祭祀活动的中心,推动并巩固了孔子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在明朝初年,为进一步确立孔子的正统地位,政府开始拆除各地孔庙中的肖像和塑像,代之以石刻碑记,以便“更加明确地区别于佛教和道教的做法”,“避免佛教(类似)行为的玷污”。唯有曲阜孔庙的孔子像得以保存。正是明朝政府的这一举动导致以孔子为主题的画作在民间流行,让孔子崇拜成为寻常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孔子生平画应运而生。政治仍然是其中的主要动因。就是为了在官宦之争中维护自己所在的“学者官员”群体的利益,时任陕西副御史的张楷在1444年创作了堪称孔子生平画开山之作的《圣迹图》。该图共有29到34幅,从《论语》、《史记·孔子世家》以及《孔子家语》等典籍中选取生平轶事为题。各图均有文字说明和张楷所作的“赞”。《圣迹图》突出“孔子的道德修养和作为政治家和学者的坎坷经历”。此图流传甚广,影响极大。湖南衡阳的何廷瑞曾获得一套。经何增补后的《圣迹图》于1497年出版。何版《圣迹图》增加了“超自然”因素,以示“孔子得到天的造化、支持和认可”。借孔子之名削弱官廷太监的势力被认为也是何廷瑞的出版动机。1587年之前,《圣迹图》经过第三次扩充,数量增至至少70幅,孔子去世以后的事件也包括其中。孔子成为“更加完美的圣人和道德典范”,“国家崇拜制度的合理性得到确认”。《圣迹图》的第三次扩充版不仅被多次重印和转载,而且还进入明朝晚期的南方戏剧中。1592年,《圣迹图》再经增补,数量达到112幅,并被刻于曲阜孔庙的石碑之上,供参观者拜谒。如此而来,《圣迹图》经历了从官员精英到社会民众的影响历程,孔子对于中国思想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默里的论述并未止于此,而是将《圣迹图》与中国历史的总体进程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代表着(中国人)在变革和动荡时期试图维护传统社会等级以及相关价值观的努力”。明朝晚期是如此,19世纪末和20世纪也

[1] Julia K. Murray, "The Hangzhou Portraits of Confucius and Seventy-two Disciples (*Sheng xian tu*): Art in the Service of Politics," *Art Bulletin* 74 (March 1992): 7—11, 15.

不例外。“基督教、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者享乐个人主义”的冲击导致“图画孔子传记”的屡次大量涌现。孔子生平画所传递的信息是，“中国文化本是值得赞美之物，它为（中国）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

默里笔下的《圣贤图》和《圣迹图》虽说只从一个侧面见证并推动了孔子崇拜，但却是鲜有人尝试之举。从肖像画和生平画入手解读孔子崇拜似乎没有引起多少重视。按照默里的解释，原因如下。第一，“专注文本的汉学家……厌恶画作”。第二，大多数孔子画的文字说明取材于“耳熟能详的资料”，新信息极少。第三，多数孔子画包含“超常事件”，“作为传记的可信度或者文字的严肃性大打折扣”。第四，孔子画属于“视觉图画范畴”，不具“艺术性”，且无法与任何知名艺术家联系起来，即使艺术史家也避而远之。^[2]对于潜心研究文字文本的国内外孔学界而言，默里的发现和尝试应当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如果散藏于民间、图书馆、博物馆和艺术馆的孔子画能够得以挖掘并加以利用，孔子研究的资料来源理应更加多元化，所获取的信息也将更加丰富和深入。

对于孔子其人，美国学者还有少许评价。这些研究不以孔子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总体地位为中心，而是聚焦孔子人格魅力的某些侧面，以间接的方式触及孔子崇拜的成因。孔子的主要思想和社会典范角色是在其周游列国期间提出和表现出来的，这一时期便成为某些学者追溯孔子崇拜源头的切入点。例如，德效骞从孔子于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愤然离开鲁国之事入手，论证孔子不愿违背理想和在权势面前委曲求全的人格。据《论语·微子》，“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记·孔子世家》亦有类似记载。众多学者以此为据，认为孔子出走并开始周游列国是因为“女乐”之事。

[1] Julia K. Murray, "Illustrations of the Life of Confucius: Their Evolution, Functions, and Significance in Late Ming China," *Artibus Asiae* 57 (1997): 75—76, 82—116, 123. 默里另外一篇内容大致相同但篇幅较短的论文是：“The Temple of Confucius and Pictorial Biographies of the Sag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 (May 1996): 269—300.

[2] Murray,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270—71.

德效骞不欲苟同，认为这“原本只是用于道德说教的小故事”，“纯属虚构”。孔子出走是因为，他意识到“鲁国的政治事务中不再有自己的用武之地，自己的生命也可能受到威胁”。此事彰显了孔子不愿“在朝廷意志面前委屈自身原则”的品性。^[1] 德效骞仅仅相信孔子出走的原因有待商榷，王安国（Jeffrey K. Riegel）甚至怀疑整个周游经历的确切性。依王安国之见，周游事件乃后世根据《诗经》内容编撰而成，具有“‘历史传奇’的要素”。这是孔子崇拜的需要和体现。王安国着重考察了“匏有苦叶”、“式微”和“旄丘”（《诗经·邶风》）三首诗歌与《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等典籍的对应之处，认为它们不仅在主题上非常相似，即使在语言和结构方面亦多有雷同。王安国写道，“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上述）诗歌视为孔子故事的模型或者主题原型”。《诗经》塑造了孔子传奇的“线索和术语框架”。“传记作者们……让孔子按照诗歌生活，说同样的话，想同样的问题，表现同样的仪态”，他们“从《诗经》中发现了孔子所尊崇的古代理想行为模式，刻画了孔子身体力行的一生”。王安国总结曰，《诗经》“对于孔子传说的编撰者而言，不仅是一种文学模式，更是预示孔子命运的神奇先兆”。^[2]

第二，耶稣会士在孔子影响域外传播中的作用。孔子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得以巩固之际，恰逢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作为中国正统思想的孔子学说不可避免地踏上了西行之路。耶稣会传教士所发挥的引路作用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传教士让欧洲认识了孔子，孔子思想呈现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成为欧洲思想界用以摆脱中世纪愚昧专制阴影的武器之一。

1583年，耶稣会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传教点，孔子的影响也经由传教士之手迈出了走向欧洲的第一步。耶稣会的最大贡献在于译介了主要的儒家经典，在17和18世纪的欧洲掀起一场孔子热潮和中国热潮。关于耶稣会的译介工作，数位学者均着重提及。阿诺德·H.

[1] Homer H. Dubs, "The Political Career of Confuci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6 (October-December 1946): 273, 274, 281, 282.

[2] Jeffrey K. Riegel, "Poetry and the Legend of Confucius's Exi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 (January-March 1986): 13—14, 21—22.

罗博特姆 (Arnold H. Rowbotham) 写道,“正是从耶稣会那里,欧洲知识界认识了孔子哲学”。最早翻译介绍孔子及儒家论著的是著名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此后来中国的耶稣会会士纷纷效仿。1615年,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出版了欧洲第一本有关中国宗教思想的书籍,其中论及孔子之处很多。1641年,曾德昭 (Alvarez Semedo) 神父出版《中华帝国》(*Imperio de la China*),对于孔子的赞赏溢于言表。17世纪中期以后,译介孔子的著作陡然增多。殷铎泽 (Prosper Intorcetta) 神父为首的传教士聚集杭州,着手“向西方介绍孔子的智慧”。他们先后翻译了《大学》、《论语》和《中庸》,于1669年在印度果阿 (Goa) 全部出版。果阿译本经多人润色修订,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再版,共约500页。1711年,卫方济 (Noel) 神父在今捷克首都布拉格不但出版了前述三种论著,还增加了《孟子》、《孝经》和《三字经》。这些译本引起欧洲知识界的广泛兴趣和关注,评论之作时有所见,罗博特姆甚至还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发现一部从未出版的孔子研究手稿。^[1] 保罗·弗雷德里克·克雷西 (Paul Frederick Cressey) 同样回顾了耶稣会传教士的译介贡献,但将起始时间确定为1662年,即殷铎泽等人在杭州从事翻译之时。^[2] 谭卓垣 (Cheuk-Woon Taam) 的发现与罗博特姆大致相同,但补充了若干信息。例如,耶稣会传教士的孔子和儒家论著译本均为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版直到1688和1691年才分别面世。卫方济的译作也被翻译成法文,并在1784年出版,书名为《中华帝国的经典著作》(*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hine*)。^[3]

拉丁语是欧洲当时的通用学术语言,孔子论著拉丁译本的出现欧洲知识界引起极大的反响,直接导致了欧洲17、18世纪的中国热

[1] Arnold H. Rowbotham,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 *Far Eastern Quarterly* 4 (May 1945): 224—29.

[2] Paul Frederick Cressey, "Chinese Traits in European Civilization: A Study in Diffus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 (October 1945): 600.

[3] Cheuk-Woon Taam, "On Studies of Confuciu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 (July 1953): 148.

潮。耶稣会传教士所从事的工作绝非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在翻译和评论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见解。罗博特姆指出，中国本有三教，耶稣会传教士唯尊孔子学说，贬低“隐晦艰涩的佛教教义和神秘玄妙的道教思想”，视儒教为可与希腊、罗马思想媲美的“高尚的哲学体系”，佛教和道教则被斥为“异教崇拜”。^[1]克雷西也发现了耶稣会传教士的“宗教和道德偏见”。他们只赞赏“中国哲学中强调伦理和道德责任的部分”，儒家思想自然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2]唐纳德·F. 拉奇 (Donald F. Lach) 批评耶稣会传教士“未能讨论，有时甚至压制有关道教和佛教的……知识，而两者与儒教一样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3]孔诒烽 (Ho-Fung Hung) 强调，耶稣会传教士推崇孔子的本意在于赢得中国政府的好感，以利传教。^[4]与此同时，他们在翻译和评论中突出儒教与基督教具有诸多共通之处，以期欧洲社会认可和支持他们的中国使命。^[5]

第三，孔子涉足欧洲，引发一场中国崇拜之争。对于中国的崇拜者和批评者，学界都有众多著述。在研究中国崇拜方面，孟德卫 (David E. Mungello) 考察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 (Leibniz)。孟德卫称，莱布尼兹站在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一方，坚持儒家传统与基督教本质相通之说。^[6]沃尔特·W. 戴维斯 (Walter W. Davis) 赞同此类说法，认为孔子思想的引入使莱布尼兹看到了“在世界宗教中发现共同真理的可能性，这些真理可将所有国家的人民连为一体”。莱布尼兹的

[1] Rowbotham,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224.

[2] Cressey, "Chinese Traits in European Civilization," 600.

[3] Donald F. Lach, "China and the Era of the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4 (June 1942): 216.

[4] Ho-Fung Hung, "Orientalist Knowledge and Social Theories: China and the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East-West Differences from 1600 to 1900," *Sociological Theory* 21 (September 2003): 257.

[5] David E. Mungello, "Sinological Torqu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Preoccupations on Seventeenth-Century Missionary Interpretations of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8 (April 1978): 123—41.

[6] Mungello, "Leibniz's Interpret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1 (January 1971): 5—8.

观点影响同时代的其他思想精英，其中最为出名的当数哲学家克里斯琴·沃尔弗（Christian Wolff）。^[1]

理性和人性也是启蒙知识分子的追求目标。孔子宣扬的人本主义和开明政治因此在启蒙时期的欧洲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思想精英竞相研读的范本。伏尔泰因为对孔子和中国的崇拜程度最为引人注目，自然是很多学者研究的重点。1932年，罗博特姆专门撰文，论述伏尔泰的“亲华”情结。就欧洲“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思想的崇拜”而言，莱布尼兹是“无可争议的始作俑者”，伏尔泰则是“最为忠实的支持者”。伏尔泰赞赏中国制度“充满家长温情”，它因此“只是形式上的专制主义”，称其“融合了法国绝对君主制和英国宪政体制的优点”。至于中国的宗教体系，伏尔泰称其为“宽容的自然神论，既无教条，也无教士”。孔子是这一体系的“中心和阐释者”，他“找到了天启教的替代物”。作为天启教典型代表的基督教则集“迷信、教士专制和无知”于一体。正因为崇拜孔子及其思想遗产，“伏尔泰终身都是孔子国度的伟大朋友”，他甚至忽略了耶稣会传教士对于孔子学说仅有的一些批评之词。^[2]在罗博特姆之外，克雷西也提及伏尔泰的中国和孔子情结；孔诰烽认为，在崇拜中国和孔子的自然神论者中，伏尔泰“热情最高，名气最大”。^[3]戴维斯的研究不仅关注伏尔泰的中国崇拜，而且揭示了伏尔泰的保留态度。伏尔泰称自己的剧作《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为“阐述孔子道德的五幕剧”，孔子本人则被刻画为“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原型”。然而，伏尔泰及其所从属的启蒙哲学家群体尽管“认可孔子思想反映出的人本主义和宽容情感”，但却相信，儒家伦理体系可能“危及欧洲的经验论”，忠孝观念“值得赞许，但却怪异且过于简单”。伏尔泰等人在推崇人类理性、传播启蒙思想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自豪感，而非孔子式的精神谦卑”。

[1] Walter W. Davis, "China, the Confucian Ideal, and the European Age of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4 (October-December 1983): 535—36.

[2] Arnold H. Rowbotham, "Voltaire, Sinophile," *PMLA* 47 (December 1932): 1050—65.

[3] Cressey, "Chinese Traits in European Civilization," 601; Hung, "Orientalist Knowledge and Social Theories," 261.

因此，伏尔泰对于孔子思想的吸收具有明确的选择性。^[1]

伏尔泰之言代表着启蒙思想家的孔子观，更是 17、18 世纪法国孔子观的集中体现。受耶稣会传教士的影响，欧洲主要国家均出现了延续时间和程度各异的孔子热潮。论及国别之间的差异，罗博特姆依然是我们无法绕开的学者。罗博特姆写道，在法国，孔子崇拜是 17 世纪“反基督教运动的一部分”。伏尔泰功不可没，其他思想家同样值得一提。弗朗索瓦·伯尔涅 (Francois Bernier) 尤其关注“孔子的施政思想”。拉默特·勒瓦耶 (LaMothe le Vayer) 在 1642 年出版小书《国民的美德》(*La Vertu des Payens*)，传播有关孔子的知识，认为孔子“将哲学从上天带到了地上”。就德国的孔子热潮而言，莱布尼兹的地位不可取代。紧跟莱布尼兹步伐的是沃尔弗。除此两人之外，罗博特姆还列举了数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宣讲孔子哲学的道德价值及其对于理性主义者的可取之处”。威廉·坦普尔爵士 (Sir William Temple) 是第一个受到孔子思想影响的英国思想家。在坦普尔看来，孔子思想“奠定了人类普遍行为规范的基础”，孔子是“最为博学、最有智慧、最具美德的中国人”。坦普尔极其推崇“孔子道德规范与政府机制的结合”。马修·廷德尔 (Matthew Tindal) 代表着英国知识界对孔子思想的宗教解读。他不仅认为孔子学说与基督教体系“同样完善”，中欧应该“互派文化大使”，而且还将孔子思想作为“反对基督教的宣传武器”。罗博特姆总结道，孔子学说从三个方面影响了 17、18 世纪的欧洲思想：一是“助长了针对基督教基本原则的批判精神”，二是“唤醒了人们对于个人与国家相互关系问题的兴趣”，三是确立了“学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2] 罗博特姆的另外一篇文章就勒瓦耶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勒瓦耶中国崇拜的素材来自数位耶稣会神父，他在欧洲“首开先河，将孔子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相提并论”。勒瓦耶因此是“18 世纪中国热潮的主要先驱”。孔子学说的一神论本质、宗教、伦理和政府体制的完美结合以及和平

[1] Davis, "China," 544—48.

[2] Rowbotham,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229—38.

主义等，都给勒瓦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

其他诸多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角度论证了孔子在欧洲的影响，客观上补充了罗博特姆所提供的信息。威廉·W. 洛克伍德 (William W. Lockwood) 提到 18 世纪的法国重农主义者，认为他们与伏尔泰一样，“对（耶稣会）旅行者关于中国辉煌成就的报告印象深刻”。重农主义者包括“儒家理性主义”在内的中国思想和制度欢呼喝彩。^[2] 拉奇着重阐述了德国思想家沃尔弗不畏阻挠、始终不渝地宣扬孔子思想的足迹。沃尔弗深受莱布尼兹的影响，坚信自己已从儒家传统中找到欧洲“基督教哲学体系”的替代之物。遵循孔子思想的中国人“从自然界获悉义务和美德”，“神灵引导”变得无足轻重。沃尔弗之言虽然引来一片斥责之声并被迫离开德国，他对孔子的尊崇从来不曾松懈。围绕沃尔弗的争执还“促使他人认真研究中国哲学”。因此，不论在主观或客观上，沃尔弗都是人们在谈论德国孔子热潮时不能忽视的人物。^[3] 埃德蒙·莱茨 (Edmund Leites) 分析了 17 世纪末、18 世纪初英国绅士阶层的孔子情结。时值绅士阶层的传统主导地位遭受新兴资产阶级愈发强劲的挑战，孔子强调统治者及其智囊应该德才兼备，这种观点引起绅士阶层的极大兴趣。他们将 1691 年出版的《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 一书奉为圭臬，因为该书作者声称，唯有“学者才能成为合格的官员和向皇帝进谏者”。当时的英国商人显然不属于“学者”之列。绅士阶层因此要求英国效仿儒家制度，任用官员时唯德、唯才是举。^[4] 玛格丽特·亨特 (Margaret Hunt) 追溯了英国东方主义的起源，认为“孔子语录在 18 世纪中期的社会上层

[1] Arnold H. Rowbotham, “La Mothe le Vayer’s *Vertu des Payens* and Eighteenth-Century Cosmopolitanism,” *Modern Language Notes* 53 (January 1938): 11—14.

[2] William W. Lockwood, “Adam Smith and As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 (May 1964): 348.

[3] Lach, “The Sinophilism of Christian Wolff,” 563, 567.

[4] Edmund Leites, “Confucian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atural Morality and Social Refor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8 (April 1978): 143—44, 150—51.

风靡一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1]

上述学者描绘了孔子及其思想在启蒙时期的欧洲受到热情推崇的场面。但反对和质疑者仍然大量存在，这同样引起学界的重视。反对美化孔子的声音首先来自于欧洲传教士内部。颂扬孔子的耶稣会属于天主教，该教的其他分支为争夺教会的主导权，极力贬低耶稣会报告的可信度。彼得·杜伊格南 (Peter Duignan) 的研究显示，自从利玛窦等人发回第一批报道开始，方济各会 (Franciscans) 和多米我会 (Dominicans) 的反对和质疑延续 150 年之久。在他们看来，“即使孔子和 (中国) 皇帝也不过是异教徒而已”，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根本没有共通之处。^[2] 孔诰烽也论及耶稣会与其他分支就孔子问题发生的争执。法国詹森主义者 (Jansenists) 的介入使原本由方济各会和多米我会发起的责难愈演愈烈。1700 年，由 160 名成员组成的巴黎神学院委员会投票决定，禁止耶稣会传教士撰写的多部有关中国的书籍，因为书中含有“不实、轻率、误导和错误”的信息，“有损神圣的基督教”。耶稣会的中国和孔子观从此在欧洲教会中一蹶不振，但却因为受到启蒙思想家的青睐而在世俗社会影响深远。^[3]

在欧洲世俗社会，孔子热潮照样面临阻力。孔诰烽从宏观社会史学的角度，论述了欧洲人质疑和反对孔子崇拜的三大阶段。耶稣会与方济各会等其他分支的矛盾为第一阶段。18 世纪后半期的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发起了第二轮大抨击。伏尔泰等人此前塑造的孔子完美形象几乎荡然无存。其他思想家纷纷响应。康德宣称，“中国人的头脑中从来就没有美德和道德概念”。黑格尔称孔子思想为“极度乏味的迷信崇拜和行为举止规范”。受此影响，欧洲孔子热潮的始作俑者——耶稣会，亦在最后一批有关中国的作品 (1776—1814) 中改弦更张，赋予孔子“极其丑陋”的形象。19 世纪，由于东西方势力格局

[1] Margaret Hunt, "Racism, Imperialism, and the Traveler's Gaz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32 (October 1993): 356.

[2] Peter Duignan, "Early Jesuit Missionaries: A Suggestion for Further Stud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0 (August 1958): 727.

[3] Hung, "Orientalist Knowledge and Social Theories," 257—60.

的变化、欧洲民族主义的兴盛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兴起，孔子乃至整个中国的思想制度被推向欧洲的对立面，成为低劣文化的代表。对孔子和中国的浪漫描述被种族主义刻画所取代，这是孔子崇拜面临的第三大冲击。^[1]

拉奇笔下沃尔弗的遭遇是欧洲孔子崇拜遭受质疑的又一例证。沃尔弗宣讲孔子思想，不仅引发大学同事的抗议和抵制，甚至惊动了普鲁士国王。国王限令沃尔弗 48 小时之内离开普鲁士。沃尔弗不得不在俄国圣彼得堡大学暂借栖身之处。^[2] 厄恩斯特·罗斯 (Ernst Rose) 重申了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和黑格尔抵制孔子崇拜的举动。信奉儒家思想的中国被赫尔德比作“正在冬眠的土拨鼠，甚至是经过防腐处理的埃及木乃伊”。德国人关于孔子和中国的美好形象因为赫尔德的出现而丧失殆尽。黑格尔“对于孔子也无多少溢美之词”，因为孔子学说“忽略个人的自由”。^[3] 从黑格尔的哲学讲义中，另一学者殊途同归地发现了“尖刻的”孔子观。黑格尔虽然称孔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但却认为，“孔子无法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也不是与梭伦 (Solon) 相当的立法者”。孔子只是一个道德家，而非道德哲学家，其《论语》“未能体现出清晰的构思或结构”。^[4] 在英国，孔子的影响同样遇到阻力。据莱茨分析，17 世纪的平均派 (Levellers) 就是阻力之一。绅士阶层引用孔子语录，坚持学识是参与政治的前提，这令倡导普选权的平均派极为不满。本无干系的孔子受到牵连。平均派虽然在 17 世纪中期土崩瓦解，新兴阶层对于以学识决定仕途的做法继续口诛笔伐。他们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只能考察候选人识记儒家经典的能力，无法检测道德涵养和执政素质。孔子学说中圣人和

[1] Hung, "Orientalist Knowledge and Social Theories," 261—62, 268—74.

[2] Lach, "The Sinophilism of Christian Wolff," 564—66.

[3] Ernst Rose, "China as a Symbol of Reaction in Germany, 1830—1880," *Comparative Literature* 3 (Winter 1951): 57—60.

[4] Young Kun Kim, "Hegel's Criticism of Chinese Philosoph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8 (April 1978): 173—74. 梭伦是古代雅典政治家和诗人，曾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改写法典，制定新宪法。

普通人泾渭分明的现象也令英国的孔子批评者难以接受。^[1]

第四，西欧之外的孔子足迹。孔子影响西行的脚步没有停留于英、法、德等西欧诸国。随着欧洲人拓殖北美大陆，孔子的足迹越过了大西洋。关于美国人对待孔子的态度，美国学者的研究虽然零星稀少，却仍然时有关注。托马斯·S. 基德(Thomas S. Kidd)撰文指出，殖民时期的新英格兰报纸跟踪报道耶稣会在中国的言行。孔子及其思想屡次出现在相关文章当中，为很多的殖民地民众所了解。^[2]更多学者关注的则是美国文学中的孔子因素。例如，陈文平(Woon-Ping Chin Holaday)展示了美国诗人庞德强烈的孔子情结。早在1907年，庞德就阅读了孔子的论著。1915年，庞德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榜样，美国可以迎来自己的文艺复兴。陈文平写道，“庞德终其一生，始终不渝地崇拜孔子的教诲”。面对20世纪前半期西方世界的战争阴霾，庞德相信，孔子伦理和中国历史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挑战……西方思维的不良习惯”。在其眼中，孔子并非“陈词滥调的宣扬者”，而是“一个坚强活跃的思想家，一个将理想付诸实践的人”。^[3]张其昀(Chang Chi-Yun)回顾了美国散文作家爱默生崇敬孔子之情。爱默生称孔子为“世界的骄傲”和“哲学领域的华盛顿”，认为孔子为“人类思想史”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先于耶稣500年左右提出了为人准则，其谦逊程度堪与苏格拉底媲美。^[4]唐纳德·M. 默里(Donald M. Murray)写道，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爱默生便“经常沐浴在孔子思想的和煦阳光下”。^[5]与爱默生齐名的另一散文作家梭罗同样具有鲜明的孔子情结，这也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威廉·比希·斯坦(William

[1] Leites, "Confucian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144—46, 151—54.

[2] Thomas S. Kidd, "'Let Hell and Rome Do Their Worst': World News, Anti-Catholicism, and International Protestantism in Early-Eighteenth-Century Boston," *New England Quarterly* 76 (June 2003): 279—81.

[3] Woon-Ping Chin Holaday, "From Ezra Pound to Maxine Hong Kingston: Expressions of Chinese Thought in American Literature," *MELUS* 5 (Summer 1978): 15, 17—18.

[4] Chang Chi-Yun, "The Centenary Celebration of Sino-American Intellectual Friendship," *Far Eastern Quarterly* 3 (May 1944): 205—06.

[5] Donald M. Murray, "Emerson's 'Language as Fossil Poetry': An Analogy from Chinese," *New England Quarterly* 29 (June 1956): 209—10.

Bysshe Stein) 提到,梭罗极其崇尚孔子“对现实经历的精练总结”: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1] 莱曼·V. 卡迪 (Lyman V. Cady) 考察了梭罗孔子情结的渊源。他认为,梭罗最早接触孔子论著是在 1841 年。他从爱默生的藏书中发现了孔子,摘抄数十条孔子语录,并将其发表。梭罗名著《沃尔登湖》(Walden) 多次引用的儒家经典多来源于此。^[2] 布赖恩·沃克 (Brian Walker) 所见相同。沃克甚至宣布,在《沃尔登湖》中频繁出现的格言也是在模仿孔子论著的语言风格。^[3] 孔子在美国的影响显然不局限于文学范畴,他在其他领域也为美国人所知晓。梅里贝思·E. 卡梅伦 (Meribeth E. Cameron) 曾经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指出,虽然美国人对亚洲缺乏强烈兴趣,孔子依然是他们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亚洲人之一。^[4]

至于孔子在启蒙运动之后的欧洲有何遭遇,美国学界有如蜻蜓点水。在历史上,俄国与中国有着比较密切的文化交流,但目前似乎仅有勒内·菲勒普-米勒 (Rene Fueleop-Miller) 曾经撰文,简略提及托尔斯泰崇拜孔子之事,称孔子为托尔斯泰的“开明导师之一”。^[5] 有关德国的情形大致相同。雷纳塔·伯格-潘 (Renata Berg-Pan) 分析 20 世纪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创作和语言风格,发现明显的孔子影响。布莱希特的多部剧作引用孔子语录,他甚至试图创作一部反映孔子生平的戏剧,但终未完成。^[6]

[1] William Bysshe Stein, "The Motifs of the Wise Old Man in *Walden*," *Modern Language Notes* 75 (March 1960): 203.

[2] Lyman V. Cady, "Thoreau's Quotations from the Confucian Books in *Walden*," *American Literature* 33 (March 1961): 20—24.

[3] Brian Walker, "Thoreau's Alternative Economics: Work, Liberty, and Democratic Cultiv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December 1998): 850, 851.

[4] Meribeth E. Cameron, "Far Easter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ar Eastern Quarterly* 7 (February 1948): 118.

[5] Rene Fueleop-Miller, "Tolstoy the Apostolic Crusader," *Russian Review* 19 (April 1960): 113—14.

[6] Renata Berg-Pan, "Mixing Old and New Wisdom: The 'Chinese' Sources of Brecht's *Kaukasischer Kreidekreis* and Other Works," *German Quarterly* 48 (March 1975): 210, 211, 214.

（三）孔子形象研究

孔子在影响中外社会文化的同时，亦在经历解读和建构过程，林存光的孔子形象出现在历史长河中。相比孔子思想和孔子影响，国外学界关注孔子形象的情形似不多见。国内学界则在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相关成果，现简述如下。

首先，以史为线，宏观把握中国各个时期的孔子形象。林存光系统解析了从孔子在世到20世纪初的中国孔子形象，将孔子及其思想置于各种社会文化的矛盾冲突中，勾画出孔子形象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变迁主线。林的著作不仅细致阐释了孔子从学者到偶像的历史嬗变过程，而且花费大量篇幅，对孔子和儒学的历史与现代命运进行了理论思考。20世纪中国人对待孔子的几种典型态度也有充分论述。^[1]王钧林的涵盖区间延伸到21世纪，将孔子形象划分为五大历史板块：孔子在世时的各种形象、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孔子形象、两汉时期的孔子形象、魏晋至明清的孔子形象、近代以来的孔子形象。王钧林还指出，历代孔子形象有两大特征：一是以正面居多，二是呈现步步升级，直至最终神化的态势。^[2]另外一种广为流传的看法是，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共有“圣化”、“矮化”、“正统化”、“神化”、“僵化”、“维新化”、“丑化”七种形象，在西方则有“哲人”、“智者”和“完人”三大形象。^[3]通过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孔子造像，王忠林认为，历代政府和民众都在根据现实需要，树立孔子形象。所以，孔子没有一个具体的、独立存在的形象。^[4]论及孔子获得圣人形象，周炽成否认官方力量，而是宣布，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末年，完全是民间力量在发挥作用。^[5]

[1] 林存光：《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孔子和儒学》，济南：齐鲁书社，2004。

[2] 王钧林：“历代孔子形象之嬗变”，《中华文化画报》，2006年第1期。

[3] 如张荣明：“孔子的十种形象”，《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4] 王忠林：“孔子造像溯源”，《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5] 周炽成：“论孔子成为圣人及其他”，《孔子研究》，2010年第4期。

其次,非汉文化语境下的孔子形象。王锬以17、18世纪欧洲的文化运动为背景,认为欧洲的孔子形象经历了三大变化:耶稣会士眼中的“天主教圣徒”、自由思想家所谓的“道德和理性的化身”、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欧洲思想家描绘的无神论者形象。^[1]黄俊杰的研究表明,日本德川时代的儒学研究者相信,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中的“道”实指“先王之道”,从而建构出孔子维护王道的形象。^[2]魏冬和益西群培发现,藏民族也在与汉族的交流中,根据自身的文化需要,对孔子的原有形象进行了认同和改造。在汉藏交界地带,孔子是道德圣贤,而在西藏腹地,则是“圣、神、王”三位一体,进而被刻画为四大护法神之一,乃至被视作文殊菩萨的弟子或化身。^[3]

三是历代文本中的孔子形象。这是目前国内孔子形象研究成果最为集中的领域。《论语》、《庄子》、《墨子》、志怪小说、康有为和林语堂笔下的孔子形象是主要论题。《论语》记录孔子言行,探究其中孔子形象的成果甚多,在此无需举例。至于其他文本中的孔子形象,邵汉明发现,在《庄子》中,孔子被赋予了四种形象:道家的代言人、道家的批判对象、经过点拨而归道家的人、超然于儒、道之外的人。^[4]霍松林、霍建波将《孟子》和《庄子》加以对比之后指出,《孟子》圣化孔子,而《庄子》则寓言化孔子。^[5]李霞、李峰则认为,《庄子》塑造了五大孔子形象:逐名求利的名利者、拘礼循规的伪君子、固守仁义的迂腐者、自薄自卑的求教者、顿悟前非的得道者。^[6]余树苹以《论语注》为研究对象,认为康有为出于现实需要,将孔子建构成了“救亡图存的教主”。^[7]刘超重构出清末民初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孔子形

[1] 王锬:“17、18世纪欧洲文化视野中的孔子”,《孔子研究》,2001年第4期。

[2] 黄俊杰:“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文史哲》,2003年第1期。

[3] 魏冬、益西群培:“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孔子形象”,《西藏研究》,2009年第1期。

[4] 邵汉明:“论《庄子》中的孔子”,《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4期。

[5] 霍松林、霍建波:“论《孟子》、《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6] 李霞、李峰:“从《庄子》中的孔子形象看先秦儒道冲突”,《安徽史学》,1996年第1期。

[7] 余树苹:“救亡图存的教主——康有为论孔子形象”,《现代哲学》,2009年第5期。

象：孔子既是国家急于利用、以建立民族认同的素材，也是思想界批判的对象，介于尊孔与反孔之间。^[1]

颜榴考察了戏剧作家张广天如何在作品中塑造孔子的圣人形象。^[2]李剑锋的研究表明，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刻画出别具一格的孔子形象：孔子同时保持了儒者本色、流露出隐逸的思想情趣、戴有两汉圣人感应天意和先知先觉的神异光环、充当着平凡世人的角色。^[3]古代小说中的孔子形象同样是段庸生的研究主题。他认为，在小说文本中，孔子不再是圣人，而是通俗化的文学形象，表现出民族文化对于孔子的认同和变异。^[4]邢娟妮、赖勤芳等得出结论，经过林语堂的笔触，孔子的圣人形象被消解，进而被还原成集喜怒哀乐于一身的普通人。^[5]罗炯光揭示出鲁迅“否定”的孔子形象和郭沫若“肯定”的孔子形象，以及二者之间的鲜明对照和成因。^[6]得益于诸如此类的研究，我们能够极为方便地了解文学和思想界接受和利用孔子及其思想的情况，知晓其后隐含的政治与文化因素。

二、本书的研究动机

以上三大方面，囊括了当前国内外孔子研究的基本动态，所列举的研究成果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论著因为观点或选题雷同，而被略去不提。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孔子大有裨益，

[1] 刘超：“孔子形象：历史知识与社会意识——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 颜榴：“从张广天作品看当代戏剧中的孔子形象”，《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3期。

[3] 李剑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孔子形象”，《孔子研究》，2008年第1期。

[4] 段庸生：“古代小说中的孔子形象”，《孔子研究》，2006年第1期。

[5] 邢娟妮：“林语堂笔下的孔子形象——索解孔子神圣性的理论视角”，《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9月；赖勤芳：“论林语堂对孔子形象的消解与重建”，《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5期。

[6] 罗炯光：“鲁迅郭沫若的孔子观”，《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夏之卷。

能够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人们对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然而，无须讳言，孔子研究尽管已经极为细致，仍然留有可供拓展的巨大空间。其一，孔子研究的重点停留于孔子思想及其影响，在此两方面的成果所占比例最大。这固然有着不容置疑的可取之处，却有忽略其他相关问题之嫌。研究兴趣集中一处，难免产生跟风与雷同之疾，导致众多论著几无差异，论证过程、参引资料和所作结论大同小异，乃至重复赘述。此种现象不仅无益于拓展和深化孔子研究，还易造成学术资源和研究精力的低效利用，不利于丰富孔子研究的内涵。

其次，正因为人们争先恐后地研究孔子的思想及其影响，孔子研究的其他领域未能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孔子的形象研究就是一例。虽然如前文所述，关注孔子形象者并不乏人，但由于受制于以孔子思想为重的研究潜意识，国外学界几乎未见相关成果，而国内学者多聚集于中国历代社会塑造的孔子形象。即便关注国外，他们也只是关注儒教影响较深的东亚诸国。事实上，自从耶稣会士向西方读者译介孔子论著，孔子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西方人在接纳和应用孔子思想的过程中，必然形成独具特色的孔子形象。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似乎仅仅满足于反复挖掘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

第三，已有成果的研究资料来源单一。经史子集构成了国内外孔子研究者——包括孔子形象研究者——的基本资料库。无论探究孔子思想及其影响，还是揭示孔子形象的建构过程和动机，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目光投向各类孔子论著和他人的解释性著作。数目同样庞大的大众化文献未能引起应有的关注。对于孔子形象研究而言，这类文献尤其重要，因为孔子的形象塑造绝非思想界的特权，社会大众在无时不刻地根据自身需要，建构并改变着孔子信息。因此，思想著作之外的涉孔资料，如报刊杂志、大众读物、信函日记、政府政策等，不可束之高阁。

第四，研究方法似有刻板之虞。众多孔子研究者习惯于文本分析法。所以，不管分析孔子思想，抑或探索其影响、重构其形象，他们都是从涉及孔子的文字文本入手，精细解读字里行间的显明或隐藏的

寓意。此法固然重要，但却难以捕捉到特定文本之外、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各类孔子现象，对于孔子研究实则有害。如果采用目前学界流行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比如引入心理分析、文化交际、对比研究等，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孔子及其思想必然更加生动，更加丰满。

鉴于孔子研究诸如此类的沉痾痼疾，本书拟在孔子形象研究方面作一尝试，将中美文化交流纳入孔子研究的范畴，或曰将孔子的形象问题视作中美文化对话的有机组成部分。诚然，孔子的海外形象问题已有少数学者关注。但是，他们的兴趣点或者在于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或者徘徊于17/18世纪的欧洲。当时的欧洲正值启蒙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孔子学说广受好评，启蒙思想家竞相引用孔子，支撑观点。此时的孔子形象易于重现，因此研究者有之。而随着欧洲人拓殖北美，孔子也远涉重洋，登陆美洲，进入北美殖民者和美国人的社会文化意识。美国人拥有独具特色的孔子形象实属自然。然而，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未将美国的孔子形象纳入考察视野，而研究美国的中国形象者仅以“中国”为对象，没有细化到具体的中国文化人物。^[1] 本书的研究，就孔子的海外形象研究和美国的中国形象研究来看，都是一次有益的尝试。通过细致而系统的考察，我们将展示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孔子，在美国文化的语境中，所经历的认同和变

[1] 如 Harold Robert Isaacs,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M. E. Sharpe, 1980); Steven W. Mosher, *China Misperceived: American Illusions and Chinese Reality* (Harper Collins, 1990); Gary Lee Todd,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China, 1840—1860*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h.D. Diss., 1987); Henry Trubner and W. J. Rathbun, *China's Influence on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84); John Rogers Haddad, *The American Marco Polo: Excursions to a Virtual China in U.S. Popular Culture, 1784—1912*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Ph.D. Diss., 2002); Jonathan D.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8); 孙有中:《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印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何英:《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

异,以及这一符号与美国社会和中美关系的相互融合和影响机制。

如同所有国家文化,美国文化有如万花筒。其折射出的孔子形象丰富多彩,存在于不同侧面和层面,给人眼花缭乱之感。有鉴于此,我们特意选择 19 世纪中期以来的美国报纸文献,解析美国社会塑造的孔子形象和赋予孔子的文化含义。如此选择基于几点考虑。其一,美国现代报纸诞生于 19 世纪中期,如《纽约时报》创办于 1851 年,《芝加哥论坛报》的首发时间在 1860 年,《华盛顿邮报》出现稍晚,但也在 1877 年。自此以后,报纸便是美国社会舆论的主要生成基础和传播媒介,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念在此交汇,历经碰撞和妥协,成为美国社会民意的引导者和风向标。直至今日,虽然不断受到其他传媒形式的冲击,报纸的舆论地位仍然不可替代。所以,报纸塑造的孔子形象代表着美国社会对于孔子的基本态度,呈现出美国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中国文化符号的思考和接受状况。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研究,可跟随美国现代新闻业的发展历程,勾勒出美国孔子形象的宏观图景和变迁轨迹。

其二,19 世纪中期是中国人开始大举移民美国之时,以此为起点研究孔子形象,可以观察中美民众的切身接触和中美文化的现实碰撞影响美国人中国观的途径、程度和范围。1849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消息迅速传到已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尔后波及整个珠江三角洲。经历连年战乱、饥荒和失业之苦的人们奔走相告,成群结队地前往美国西海岸,意在实现淘金致富之梦。中国劳工与日俱增,金矿银矿日渐枯竭,中国人逐步向美国其他地区和其他行业渗透,与美国社会底层竞争就业机会。中国人固守传统,自成一体,不易归化,引发美国人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反感。自此以后,华人地位历经跌宕起伏。孔子形象的变化与此紧密相连。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社会孔子形象的变迁反映出华人处境的荣辱兴衰,是另一形式的现当代美国华人史。

其三,19 世纪中期以来,中美两国的世界地位和相互关系均发生了巨大而曲折的变化。孔子作为中国的文化象征,其在美遭遇见证着中美力量格局的此消彼长。自内战结束,美国发展迅猛,在 19 世纪

末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一地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而达到顶峰。同一时期，中国进入半殖民地状态，国力滑向低谷。1949年以后，中国虽然开始恢复元气，却是以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对手而存在。美国的孔子形象是否受到中美外交关系的拖累，这是本书需要深究的又一问题。此外，伴随美国的迅速崛起和对外吸引力增强，美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优越感和欧美中心主义较为强烈。孔子与这种文化心理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心理给孔子形象投下的阴影，也将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另外，研究美国的孔子形象具有明显的现实价值。21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在海外建立数百所孔子学院，其中美国所占比例最大。政府此举显然意在利用孔子在美的巨大知名度。然而，历史上和当今美国到底如何看待孔子，孔子在美国社会文化中到底占据何种地位、拥有何种形象却没有多少人关注和知晓。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为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以及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象征在美国社会话语体系中的地位提供借鉴。

三、本书的主要发现和框架

为理清近代以来美国的孔子形象，本书选择了能代表美国社会舆论的几大报纸加以研究。这些报纸代言不同地域和不同群体。其中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代表东部的《波士顿环球报》，植根南部的《亚特兰大宪法报》，立足中西部的《芝加哥论坛报》，在西海岸出版的《洛杉矶时报》和《旧金山纪事报》，代表西南部的得克萨斯《达拉斯晨报》，具有宗教背景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针对经贸人士的《华尔街日报》，以及数家存在时间长短不一的黑人报纸，如《匹兹堡信使报》和《芝加哥捍卫者报》等。在美国近现代报业形成之初，报纸种类较少，仅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芝加哥论坛报》等。为弥补这一时期资料不足之疾，本书查阅利用了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大众刊物文献，以图所得结论言之

有据，且具社会普遍性。

经查阅美国相关专门图书馆馆藏文献和搜索各大报刊数据库，本研究共获得与孔子有关的文献 8576 篇。去除只提及孔子、却没有深层附加意义的文献，实际利用文献约 3000 篇，其中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和《洛杉矶时报》等影响较大的报纸居多。数量的历史走向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文献主要围绕几大主题展开：中国评论，约为 400 篇，占总数的 13%；中美关系，约 560 篇，占 19%；美国政治，约 330 篇，比例为 11%；美国华人，约 470 篇，占 17%；美国社会文化，约为 770 篇，占 26%。剩余资料主题较为分散。根据文献分布情况和本书的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身份得到充分体现。在主题分类中，涉及中国和华人的文献占据总数的 49%，就是最为有力的佐证。在美国人看来，孔子规范着中国及其民众的价值观念和处事方式，是中国人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所以，无论解释中国近代的落后和当代的崛起，还是探讨中美关系的运转机制，抑或剖析华人的群体特征和行为动机，美国人始终都以孔子为重要的切入点。

其次，孔子学说具有鲜明的跨文化实用意义。涉及孔子的美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类文献所占比例为 37%，同样蔚为可观。孔子出现在此类文献中，其主要身份是美国政治与社会的观察者和评论者。换言之，某一时代的美国人在评判国家现状时，看重孔子之名及其思想拥有的知名度和言简意赅的效果，从而在各抒己见时，引用孔子原则或其语录，期望能有画龙点睛之效。孔子思想代表着美国政治与社会的理想目标，乃美国人鞭策政府、激励民众、丰富生活的话语工具。

第三，通过美国人的接受与反应，孔子及其学说被赋予了与本来角色迥然有异的寓意。孔子不再是单纯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而是中国与华人言行的代名词和指向标，也是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的参照体系。孔子身份的转变发生于美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社会行为框架之内。美国人根据特定时期的需要解读孔子，将孔子从固有的中国语境中剥离出来，让他与美国的政治、社会与外交环境保持协调。孔子经

历着文化身份异化的过程，有时甚至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总而言之，自近代以来，美国在面对中国圣人孔子时，纳入了中美关系、移民问题、文化优劣论、政治纷争、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构建了批驳中国传统特性、解释中国落后根源、将中美关系出现问题的责任推给中国，同时又是美国政治与社会发展参照体系的孔子形象。在此形象中，孔子总是以批判者的姿态出现，他或者批判中国的所谓痼疾，或者批评美国的政治与社会潮流，鼓励人们朝着理想目标迈进。从这层意义讲，孔子保持着原有的理想化色彩，代表着跨文化旅行中的延续性。

着眼于系统全面地展现近代以来的美国孔子观，本书拟以时间为序，分析每一重要时间段的文献资料，突出时代特点，反映前述主线。在论述过程中，我们将引入中美关系、美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等宏大背景，力求史论结合，纵横相应，点面兼顾，置美国的孔子形象于多层次的话语体系之中，真实客观地呈现美国人中国观的重要侧面。

第一部分始于1849年，止于1882年。1849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吸引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移居美国，中国移民由此肇始。随后兴起的排华浪潮愈演愈烈，美国最终在1882年通过《排斥华人法案》，禁止中国劳工赴美。本部分以此为背景，论述美国人通过嘲讽或支持孔子，所表达的两种针对华人和中国的态度。肯定与否定的孔子观，又以否定为多数，见证了美国日益高涨的反华情绪。

第二部分，1882至1920年，涵盖美国排华措施日渐苛刻之时和美国进步主义思潮波及全国之际。在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美国的孔子观既包含斥责中国落后、贬损华人言行的内容，又有采用孔子思想原则、鞭策美国政治与社会行为的举动，甚至还有同情和声援中国处境的声音。此时的孔子形象同样正反皆有。

第三部分，1920年至1950年。在此三十年间，中国历经剧变，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相互斗争。对此，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孔子形象表现出明显的关注之情。美国人对于动荡年代的中国是否依然坚持孔子信仰兴趣浓厚。同时，经济萧条和战争环境造就的生活百无聊赖之状，凸显幽默娱乐的必要，孔子遂以多种方式进入美国的日常

消遣话语。“子曰”笑话和以孔子为主题的电影随之出现。孔子与美国政治与社会理想目标的紧密关系仍然延续。

第四部分, 1950 至 1972 年。孔子形象因应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华政策和国内变革, 呈现鲜明特色。首先, 本为中国文化象征的孔子被用作美国对华冷战的舆论武器, 发挥攻击中国大陆、支持台湾的重任。其次, 战后二十余年, 也是美国从繁荣与和谐转向萧条与社会矛盾的时期, 孔子因此既是消费文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亦为美国社会问题和个人发展的监督者。

第五部分, 1972 年至今。中美关系几经波折, 先由敌人转为朋友, 又从朋友变成对手。孔子因而被美国人用以衡量中美交流的频繁程度, 映衬两国在国际影响方面的竞争态势, 展示美国舆论对于中国新发展的评价。与此同时, 美国国内的新保守主义重新抬头, 道德与传统价值再受重视。注重如此两方面的孔子自然再次成为美国政治与社会评论的参照体系。

可见, 近代以来的美国孔子形象始终没有离开中美关系和美国国内发展等主要线索, 美国人在构建孔子形象时, 也在兼顾美国的现实状况和需要, 把时代需求纳入孔子形象和中国观。我们因此也目睹了中美文化关系别开生面而又极富生机的一面。

第一部分

排华酝酿时期的孔子形象，

1849—1882

美国对于孔子的了解，并非始于来美华工。然而，因为 1849 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而开始大举移居美国的中国人，却在几个方面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孔子形象。首先，华人日常起居于美国人之中，给有心观察中国习俗者提供了近在咫尺的机会。早在殖民时期，北美殖民者就已经通过欧洲书籍，知晓孔子的盛名。1784 年，“中国皇后”号商船成功抵达广州，期望从对华贸易中获取利益的美国人始有近距离接触中国人的机会。在日记和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他们以亲身经历为基础，向美国民众讲述中国印象，包括孔子其人其事。1830 年，裨治文和雅裨理的到来，又让美国人有机会从宗教文字中，读到有关中国和孔子的信息。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诸如此类的表述仅为间接观念。华人大量入美，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美国人得以亲眼目睹中国人的行为，亲自观察中国人的信仰。因此，1849 年之后的孔子观，其参与塑造者更众，传播面更广，细节更为丰富。

第二，华人劳工体现出与美国价值观念大相径庭，甚至显得怪异

的思想行为模式。美国人早已知晓孔子在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他们极其自然地将华人的“怪异”特性与孔子联系起来，视孔子为中国人不可理喻的性格特征的象征和总根源。华人移居美国之时，正值中国开始遭受西方列强蹂躏，中国的落后与虚弱纤毫毕现。美国人推此及彼，以华人与自己格格不入的行为信仰，解释中国被“文明”世界远远抛开的困局。同样因为孔子的特殊地位，他被建构成中国“反文明”趋势的代言人。

第三，尽管华人来美是美国孔子形象塑造过程的分水岭，1849年以后的孔子仍然保留着此前的某些特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连续性是，从世界思想的角度定位孔子及其学说。在华人与美国民众有大规模接触之前，美国对于孔子的认识停留于理论层面。美国的知识精英乐于探讨孔子与基督、儒教与世界其他宗教之间的异同，将孔子放置在人类多元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这种认知模式自北美殖民时期便已有之，具有很强的历史惯性。所以，即便在华人来美、孔子形象已发生根本转变之后，将孔子与基督相提并论的社会舆论照样存在。

总之，1849年代表着美国孔子形象的新起点。孔子从一个抽象玄虚的异国符号，演变成有着具体表征和内涵的信仰体系，为美国人解释看似难以揣测的中国和华人特性。

第一章

孔子：中国“反文明”特性之源

19 世纪之前，尤其是美国独立之前，受制于信息渠道，美国的中国形象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和浪漫化色彩。直接交流肇始，此类形象几乎荡然无存。作为中国文明的象征符号，孔子形象亦一落千丈。究其原因，中国社会的痼疾与美国社会的偏见皆难脱干系。中国劳工的到来加剧了包括孔子在内的中国形象的恶化。孔子本是中国文明的化身，但在 19 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孔子走向反面，成为中国在欧美帮助下实现文明进步的最大障碍，与代表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体系形成对立之势。

一、孔子：中国国民习性的基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孱弱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拥有数千年不间断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为何在与西方文明的较量中如此不堪一击？依美国人之见，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孔子：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孔子思想造成了中国人的保守和惰性，但却受到中国官员和民众的极力捍卫。

教育传承着一个民族的思想精髓，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性格模式。而在中国的封建时期，孔子和儒家其他经典占据着国民教育的核心位

置。这正是美国人用以破解中国停滞之谜的最为重要的钥匙。孔子虽然记录了中国古代思想的辉煌，但却因为长期禁锢中国人的教育思维，成为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最大因素。1866年1月8日，《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在整个（中华）帝国的大学和小学，就如同在各省和地方庙宇中一样，他（孔子）受到人们的崇拜”。学校的墙上贴着“万世师表”的条幅。农历新年之后的开学之日，“正式的拜敬”仪式在条幅之前举行。每一个学生在上学和放学时都必须对四个大字表明敬意。^[1]其他报刊同样纷纷撰文，大谈孔子控制中国学生的思想。例如，《每周六》（*Every Saturday*）杂志论及中国的家居生活时特意强调，学生平生第一次踏进校门，必须携带“两根小蜡烛、几支香和假钱”，以敬献孔子。^[2]《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转载了相同的评论。^[3]儿童教育中的孔子崇拜并不局限于学校，尚未入学的小孩对于孔子其人其事亦能耳熟能详。《青年伴侣》（*Youth's Companion*）杂志即有如下记载。中国北宋年间，有四岁小孩。某日，当听见家中客人说“孔子无兄”时，他立即反驳道：“孔子收养了其兄之女，后嫁为人妻。”小孩熟悉孔子之言赢得满堂赞誉。^[4]显然，小孩的孔子知识源于家人日积月累的灌输和对孔子的顶礼膜拜，与中国的小学教育如出一辙。这正是美国媒体意欲传递的信息。

孔子典籍对于其他教育阶段的垄断是美国人渲染的又一主题。《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学生如果“希望步入仕途或从事专业工作”，就必须进入官办学校。相比私塾，官办学校在强调孔子思想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学习内容为“中国典籍”，包括“中国历史和孔子及其他圣人的著作”。^[5]该报另一文章更为直接地写道，“时至今日，培养中国佬的教育内容在所有重要方面与一千年以前别无二致”。其中

[1] “Chinese Worship of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Jan. 8, 1866: 2.

[2] “Married Life in China,” *Every Saturday: A Journal of Choice Writing*, Dec. 6, 1873: 628.

[3] “Married Life in China,” *Chicago Daily Tribune*, Jan. 11, 1874: 11.

[4] “Chinese ‘Little Folks,’” *Youth's Companion*, Jul. 19, 1866: 115.

[5] “Government Schools and Colleges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Aug. 4, 1867: 6.

的核心内容便是“几乎包含了孔子生平和教诲的所有权威信息的二十个短小章节”，即《论语》。参加“公共考试”的中国人必须将《论语》和其他“庸俗”的典籍“烂熟于心”。应试者的成败取决于“阐述典籍主题”和引经据典、吟诗作赋的能力。此文稍后亦被《芝加哥论坛报》刊载。^[1] 科举考试的胜出者往往进入封建政治体系中，成为继续维系孔子主导地位的新动力之源。循环往复的应试教育和官员不遗余力的捍卫使孔子语录成为中国的“法典”。^[2]

孔子的权威不仅彰显于中国人的教育，更是渗透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孔子祭祀的盛况便是美国人的兴趣点之一。例如，1866年1月8日的《纽约时报》就此给出了详尽的数据。据称，“在整个（中华）帝国，共有1580座孔庙，每年供奉约62000头各类动物（包括……兔和鹿）以及27000匹丝绸”。^[3] 该报在1867年3月3日刊载文章，以简练的语言描绘孔子备受各界尊崇的场面：“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他毫无理由地受到尊重，就如同他在有生之年被不公平地束之高阁一样。他的名字已在全中国家喻户晓，其个人肖像塑造各异。成千上万的孔子后代构成一个贵族特权阶级……无数的庙宇为他而建，成百上千万的牌匾为他而刻。他受到学生、官员和皇帝本人的极度崇拜。”^[4] 孔子崇拜的持久和热烈跃然纸上。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美国驻中国总领事（驻地不祥）墨菲（Murphy）不但强调孔子学说是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真理”，还特别提及中国的孔子崇拜惠及孔氏后裔之事：他们不需纳税，深得皇室信任，众多庙宇拔地而起等。^[5] 因为“其受人崇拜的祖先”，孔子后代得以厚禄终身。^[6]

即使在介绍中国人的生活细节时，美国媒体也不忘提醒读者注意

[1] “Liberal Education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Nov. 7, 1879: 3; “Education in China,” *Chicago Daily Tribune*, Dec. 10, 1879: 12.

[2] “The Chinese in America,” *New York Times*, Feb. 26, 1878: 5.

[3] “Chinese Worship of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Jan. 8, 1866: 2.

[4]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Mar. 3, 1867: 2.

[5] “The Chinese at Home,” *Washington Post*, Sept. 20, 1878: 2.

[6] “China,” *New York Times*, Feb. 19, 1869: 5.

孔子因素的控制作用。《纽约时报》就此言简意赅地写道,“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忽略上天赋予他(孔子)的使命”,即为中国人确立治世和处事的典范。^[1]《芝加哥论坛报》以中国用餐礼仪为例,刻画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尊孔场景。“根据孔子的教诲,用餐时不得交谈”。所有人必须同时开始,先用完者则须向仍在用餐者说,“慢慢吃”。进餐规矩,凡此种种,均与孔子的影响密不可分。^[2]孔子影响之深,以至于人们在选择扇子颜色时都要受其左右。杭州扇结实耐用,多为黑色,遭致很多人冷落,因为黑色代表道德上的不纯洁。但孔子有“白乎,涅而不缁”(《论语·阳货》)之说,诸多中国人因此敢于购买和使用黑色杭州扇。他们相信,自己“在生活中无懈可击,不可能仅仅因为接触扇子而有不利影响”。^[3]

孔子的影响还被认为强化了中国人的偏执倾向。据称,“忠于传统”的中国人肆意夸大美国舰队在入侵朝鲜时遭受的损失,美国人原本阵亡三人,但在中国的报道中,美国死亡人数达到一千。在另一次事件中,“孔子的小眼睛子孙”不听美国人的解释,执意相信美国人分发了某种有毒药品,“憎恨和指责”美国“红鬼”。^[4]而当一座千年孔庙发生火灾,“一名彻头彻尾的中国佬”却拒不面对现实,因为他相信,“庙宇为纪念圣人而建,上天不会将其付之一炬”。^[5]在华美国人也经常利用孔子的深刻影响力,安抚中国民众的排外情绪。《青年伴侣》杂志刊登的报道可资为证。名叫默里(Murray)的美国人在官兵护送下,骑马穿过一座小镇,遭到当地民众的嘲笑和围攻。默里勒转马头,大声质问围攻者,“难道你们忘记了,你们的圣贤孔子曾经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此言产生的效果“超乎想象”:围攻骤然中止,所有人都在“倾听野蛮人引用孔子的著名语录”;“老年人鞠躬以表赞

[1] “The Rivers of China,” *New York Times*, May 23, 1867: 2.

[2] “Chinese Table Etiquet,” *Chicago Daily Tribune*, Mar. 27, 1881: 9.

[3] “The Black Fan,” *New York Times*, May 18, 1879: 4.

[4] “Chinese ‘Politics,’” *New York Times*, Oct. 2, 1871: 4.

[5] “China—Burning of a Temple,”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Dec. 25, 1851: 410.

许，几名小孩则冲到前面，为我们带路”。孔子的影响力可见一斑。^[1]

美国媒体不厌其烦地描述孔子对于中国社会与思想的控制，其中并无多少赞美之意，而是刻意强调孔子崇拜与中国人惰性保守之间的因果关系。《纽约观察记事报》(*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借用使华传教士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之口，宣称“孔子论著塑造了(中国的)民族性格，创造了恒久不变的习惯和制度”。^[2]其他报刊也毫不隐晦地将中国停滞不前的局面归咎于孔子的巨大影响力。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不但讲授孔子典籍的教师垂垂老矣，教室里的显著位置还摆放着一口“崭新的大棺材”。字里行间的寓意不言自明。文章继续写道，“已经运转千年的制度，不论如何完善，都只能适应产生它的时代，而与当今业已变化的形势格格不入”。作者认为，让人死记硬背孔孟之言“远非最好的教育制度”，因为“除了单纯记忆之外，大脑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功能”。作者甚至鼓动，“人们应该破门进入整座孔子殿堂”。^[3]《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共同刊载的一篇文章也宣称，由于死守孔子学说，中国社会“具有鲜明的静态特征”，它“在特定的时间点之后便不再有任何进步”。中国人唯有“将陈旧之物不断地糅合再糅合”。^[4]《芝加哥论坛报》曾经论及所谓的“中国神学”，认为熟读孔子经书的中国人“怀疑一切新生事物”。为了寻求知识，“西方国家总是向前看，他们(中国人)却往后看”。不仅如此，孔孟之道还“将中国人变成了兔子民族”。^[5]在英语中，“兔子”有着胆怯之意。由此可见该报贬损孔子思想和中国国民性格的程度。

尤其令美国媒体难以认同的是，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为反文明象征的孔子居然还得到中国政府和官员的全力捍卫。孔子家族是中国“唯

[1] "Subduing a Chinese Mob," *Youth's Companion*, Jan. 6, 1870: 6.

[2] "Brevities,"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Dec. 9, 1875: 386.

[3] "Education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Mar. 15, 1873: 9.

[4] "Liberal Education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Nov. 7, 1879: 3; "Education in China," *Chicago Daily Tribune*, Dec. 10, 1879: 12.

[5] "Chinese Theology," *Chicago Daily Tribune*, Dec. 22, 1878: 9.

一的世袭贵族”，即使皇帝也不能质疑其地位。^[1]不但皇室对孔子后代尊崇有加，皇帝本人的日常生活同样受制于孔子设定的礼仪。皇帝的婚姻即是如此。中国皇帝很小就必须“承担婚姻生活的责任”，而相同年龄的英国男孩却“还在伊顿和哈罗公学求学”。孔子礼仪事无巨细，无所不包。“根据孔子认可和最聪明的中国人尊为神圣的古代理论”，皇帝必须在每一次满月之时与皇后单独相处，不论二人的关系如何。月圆月缺，严格的规定周而复始，“除非他（皇帝）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冲破礼仪束缚，他的一生将在枯燥乏味的既定惯例中度过”。美国媒体的不屑之意溢于言表。^[2]如果追根溯源，孔子的著述之所以能够流传百世，中国古代皇帝的捍卫功不可没。《华盛顿邮报》尤其提及秦始皇的作用：他在焚书坑儒中“将所有书籍付之一炬，唯有孔子的几本著述得以幸免”。^[3]

皇帝不遗余力地维护孔子的正统地位，皇帝以下的官员更是如此。1867年，中国皇帝下诏，欲在北京建立大学，“聘请外国教授讲授西方艺术和科学”。此举立即在官场引起轩然大波，“彻底激起了（中国人的）自豪和宗教偏见”。“各省的抗议汹涌而至”，地方官员拒绝给赴京赶考者出具证明，“有如中世纪宫廷笨蛋”的监察官对于此项革新口诛笔伐。问题的根源在于，外国教授势必会危及“周商传统和孔子学说”，“中央帝国的尊严”将不复存在。^[4]《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杂志曾经认为，中国的官员因为信奉孔子，从而不在偶像崇拜者之列。《基督教信使报》（*Zion's Herald*）立即反驳道，中国的孔子肖像和庙宇遍地皆是，各种供品不计其数，此类行为如果不是偶像崇拜的话，“什么才是偶像崇拜呢？”^[5]

[1] “Etiquet in China,” *Chicago Daily Tribune*, Aug. 11, 1880: 5; “Chinese Nobility,” *New York Times*, Jul. 25, 1880: 4.

[2] “China,” *New York Times*, Nov. 22, 1872: 2; “China,” *Chicago Daily Tribune*, Nov. 25, 1872: 7.

[3] “Chin Lan Pin’s Work: His Embassy and What It Proposes to Do,” *Washington Post*, Sept. 16, 1878: 2.

[4] “A University in Peking,” *New York Times*, Sept. 4, 1867: 2.

[5] “Religion of the Embassy,” *Zion's Herald*, Sept. 17, 1868: 447.

按照美国媒体的逻辑，中国官员尊孔崇孔之举不但造就了中国人的保守心态，而且殃及外国人欲使中国文明进步的努力。传教士本来意在向中国民众传授“更加高尚的信念”，却屡遭攻击。中国政府未能主持正义，因为它相信，传教士“既不讲中文，也不读孔子”，他们“必然是野蛮人”。^[1]清政府在1871年致各国驻华公使的一份备忘录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备忘录要求，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不得辱骂孔子，不得伤害孔子信奉者的感情”。^[2]有媒体称，该备忘录“超乎意料，令人不快”，“任何与孔子思想背道而驰的学说”都要严加禁止。^[3]《基督教信使报》则认为，备忘录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愚蠢”。它“直接打击了所有的基督教学校、所有的主日学校、所有的孤儿院，以及基督教会为启迪中国青年所做的一切努力”。对于“一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备忘录同样是巨大打击。中国皇室又被无知所困，中国人的思想又被高墙所围。^[4]

事实上，美国媒体并不否认孔子在中国文明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他们诟病的是孔子对于中国思想长达数千年的控制。举国上下，唯孔独尊。中国文明似乎停留在了孔子时代。在美国媒体看来，这不仅滋生蔓延了中国人的保守与惰性，更与西方社会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使西方人的在华活动举步维艰。正是着眼于此，美国媒体将中国“反文明”之举的根源追溯到了本是中国文明代言人的孔子身上。

二、孔子：中国创造力的“禁锢者”

依美国媒体之见，孔子主导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国民性格，中国文明不进反退。其中的奥妙在于，曾经让中国文明辉煌一时的中国

[1] “Aggressiv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imes*, Oct. 28, 1870: 4.

[2]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Times*, May 22, 1871: 5.

[3] “Notes and Notices,” *Godey's Lady's Book and Magazine*, Jul. 1871: 87.

[4] “China Fighting against Christ,” *Zion's Herald*, May 11, 1871: 223.

创造力在尊崇孔子的过程中遭到了禁锢，中国失去了与西方比肩而进的动力之源。美国人的字里行间虽有惋惜之意，但在更大程度上却意在攻击中国文明体系赖以存在的根基。

1869年，《每周六》杂志就孔子的生平和思想做了长篇介绍。文章毫不掩饰地批判了中国尊孔崇孔之举对于中国人求新思维的阻碍作用。作者写道，北京衙门里的官员反对变革，“并非因为反对者天生就无法意识到拟议中的变革能够带来的种种好处”。“圣人（即孔子）追溯既往的习惯性态度”乃问题的真正症结。有鉴于此，“中央帝国的变革从来都不是向前进，而是回复过去”。文章总结曰，孔子纵然拥有诸多美德，但“完全缺乏想象和信念”，这构成了中国创造力难以逾越的障碍。^[1]《每周六》的评论代表了美国媒体试图解释中国近代落后局面时的一种普遍心态，其他媒体多有类似文字。《马萨诸塞庄稼汉和新英格兰农业杂志》（*Massachusetts Ploughman and New England Journal of Agriculture*）直截了当地宣布，“孔子确定了中国的（行为与思维）模式，中国人对此坚定不移地信奉了七十代人之久”。^[2]《芝加哥日报》（*Chicago Daily*）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刻画了此处所谓的禁锢作用。孔子“成功地在思想溪流上筑起了一道大坝，最初，思想之河在我国人心中流淌甚欢，但他随后却未能促使思想之水汹涌向前，而是将溪流……赶回源头”。结果毫无悬念：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在研读孔子的过程中“耗尽了聪明才智”。^[3]《大陆月刊与西部杂志》（*Overland Monthly and Out West Magazine*）认为，信奉“孔子高尚箴言”的中国人“一经出生便得相信，已经存在的一切必须延续”。^[4]该杂志的另外一篇评论远没有如此客气。文章揶揄道，“我们不禁深表遗憾，中国男人的大脑如同女人的脚一样，已被包裹束缚，严重畸形；他们将大量精力用于细致品读孔孟的幼稚言行和陈

[1] “Confucius,” *Every Saturday: A Journal of Choice Reading*, May 15, 1869: 633, 637.

[2] “Read and Run,” *Massachusetts Ploughman and New England Journal of Agriculture*, May 15, 1869: 2.

[3] “The Old World,” *Chicago Daily*, Sept. 1, 1878: 11.

[4] “Old Lamps for New?,” *Overland Monthly and Out West Magazine*, Dec. 1869: 564.

腐真理”。从年幼时起，中国人就只知道惊叹：“孔子！孔子！多么伟大的孔子！孔子之前没有孔子。孔子之后更无孔子。孔子！孔子！多么伟大的孔子！”^[1]嘲讽之意可谓昭然若揭。《文牍月刊》(*Scribner's Monthly*)的评价亦显尖刻：中国人对孔孟经典的死记硬背使“今日之中国极像一个植物标本室”，“学问已经蜕变为物神崇拜”。^[2]当然，也有少数媒体在批评孔子的“禁锢”作用时较为含蓄。例如，《亚瑟家庭杂志》(*Arthur's Home Magazine*)尽管称赞孔子在基督之前550年便记录了中国文明，但却认为，孔子由此垄断了中国社会的运转模式。这实际上是“禁锢”作用的又一说法。^[3]《拿骚文学杂志》(*Nassau Literary Magazine*)宣称，“自孔子以降，天朝帝国再也没有出现值得我们重视的作家”，孔子对于中国文学创造力的“禁锢”恐怕难脱干系。^[4]

美国人相信，孔子思想在中国文明体系中的主宰地位使中国人在诸多重要领域裹足不前，故步自封。例如，19世纪后半期，美国妇女已在积极寻求社会平等，自我表达的途径日趋多元化，整个社会对于妇女也更加宽容。然而，由于孔子关于妇女的三从之说，中国社会无法意识到男女平等的进步意义。中国女性出生伊始，便“被打上了低人一等的烙印”。她们是“奴隶”，“自由之日永远不会到来”。因此，传教士教化中国人的事业“需要从妇女开始”。^[5]孔子不但“封闭”了中国人在性别平等问题上的想象空间，他还“压抑”了妇女个性的自我表达。女性爱美，“睿智著名的孔子”却要求她们拒绝时尚，抵制诱惑。妇女服饰总以浅色为主，鲜有变化。^[6]即使在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语言方面，中国人依然固守着孔子的风格。一名记者写道，如果

[1] “Chinese Triennial Examinations,” *Overland Monthly and Out West Magazine*, Mar. 1872: 263.

[2] “What Is Your Culture to Me?” *Scribner's Monthly*, Aug. 1872: 474.

[3]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rthur's Home Magazine*, Dec. 1870: 318.

[4] “Ballad History,” *Nassau Literary Magazine*, Mar. 1859: 220.

[5] “China and the Chinese,” *Saturday Evening Post*, Apr. 27, 1861: 6.

[6] “Costumes of All Nations,” *Godey's Lady's Book*, Sept. 1852: 261.

谁有闲情逸致，可以前往中国人聚居区，见识“在粗俗的舞台布景中用孔子语言表演的戏剧”。^[1] 在需要大胆创新的学术领域，中国人更是唯孔子是从，不敢有任何革新之举。曾有美国人准备前往贵州山区考察苗族风土人情，却苦于中文资料无法提供相关信息。《每周六》杂志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种学不是孔子奉为神圣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轻视对苗族先民的研究便在情理之中。^[2]

更让美国媒体沾沾自喜的是，孔子思想主导下的中国与欧美国家在科技领域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反差。《哈珀斯市场》(*Harper's Bazaar*) 杂志评论曰，中国的教育理念导致了中国的科技落后。饱读孔子经书的中国人“学习了很多修身养性的知识，却几乎没有在美国和欧洲教育体系中如此重要的进步精神”。^[3] 正是因为孔子思想的“诱导”，中国屡次与科技进步失之交臂。《每周六》杂志不无嘲讽地写道，“当它（中国）先于其他任何国家数个世纪发明火药时，它隐约看到了通向军事强盛之路；当它在同样遥远的时期发明航海罗盘时，它隐约看到了通向海军强盛之路；当它在 10 世纪发明印刷机时，它隐约看到了通向文学辉煌之路”。但在死守孔子教条的中国人手里，火药变成了“无害”的烟花爆竹，罗盘仅仅催生了“在沿海航行的帆船”，印刷机更是满足于推出不同版本的孔子经书。^[4] 即使移居美国的中国人，也仍然在使用“孔子周游列国传播治国之道时所使用的工具”，与美国的科技文明形成鲜明的对比。^[5]

近代中国科技的衰落强化了美国媒体的优越感和对孔子思想的轻视。《纽约时报》告诉读者，如果他们知道，“近 3000 年以来，（中国人）都把圣人的教诲尊为人类智慧最为重要的产物，其思维模式远

[1] “The City of the Golden Gate,” *Scribner's Monthly*, Jul. 1875: 273.

[2] “Quaint Customs in Kwei-Chow,” *Every Saturday: A Journal of Choice Reading*, Jan. 20, 1872: 79.

[3] “Sayings and Doings,” *Harper's Bazaar*, Dec. 6, 1879: 779.

[4] Untitled Article, *Every Saturday: A Journal of Choice Reading*, Feb. 5, 1870: 94.

[5] “The Old East in the New West,” *Overland Monthly and Out West Magazine*, Oct. 1868: 360.

在基督时代之前就已定型”，他们就不会惊诧于中国人“蔑视现代科学发明”之举了。^[1]一家女性杂志宣称，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力量”面前，曾经创造灿烂文明但受制于孔子思想的中华帝国已经相形见绌。仅仅 250 年之前，北美大陆还是“一片荒无人烟之地”。^[2]《文牍月刊》视孔孟之道为中国人接纳美国先进思想的最大障碍。该刊举例曰，一名在美的华人小孩由于“父亲的疏忽”而对孔孟知之极少，但就是由于“疏忽”，小孩才“融入了美国的儿童群体之中”，接受着美国的“先进”教育。^[3]即使被清政府赐予一品顶戴的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也不相信孔子思想能推动中国的文明进步。他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讲中认为，唯有“基督教国家目前盛行的自由探索精神”才能避免“天才在孔子国度灭迹”的命运。^[4]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和美国处于科学文明的两个极端位置，美国人因此为自己和其他西方人在中国所做的任何有利于科技进步的事情感到欣喜而又神圣。19 世纪 70 年代，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在上海创办《中国科学杂志》（*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立志让中国的教育“超越孔子信仰和古代传统，转而关注世界的现代进步”。他设计了在中国建立“庞大工业”和开采“矿产资源”的宏伟蓝图，获得美国报纸赞赏。^[5]19 世纪后半期，清政府利用美欧投资和技术拓展航运线路，建立电报网络，在重要城市之间修建铁路。有鉴于此，“中国似乎注定要超越孔子所宣扬的文明程度”。^[6]

[1] “Scientific Gossip,” *New York Times*, Jan. 8, 1882: 10.

[2] “Jewelry and Its Lessons,” *Godey's Lady's Book and Magazine*, May 1869: 459.

[3] Bret Harte, “Wan Lee, the Pagan,” *Scribner's Monthly*, Sept. 1874: 555.

[4]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in China,”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May 21, 1868: 166.

[5] “A Chinese Scientific Journal,” *Scientific American*, Apr. 29, 1876: 279.

[6] “Sanctum Chat,” *Saturday Evening Post*, Dec. 24, 1881: 8.

三、去孔子化：中国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

既然孔子造就了中国人的保守和惰性以及中华文明的裹足不前甚至倒退，到底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拯救中国文明，让中国紧跟西方潮流？怀着强烈使命情结和文化优越感的美国媒体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抛弃孔子，以基督教取而代之。媒体在大肆批判孔子的负面作用之际，还以大量篇幅论述美欧基督教文明的先进性及其在中国人和日本人等儒教信奉者当中激起的反响。

中国的落后根源在于孔子思想，美欧的强大得益于基督教，这是美国媒体谈论中西方差别时达成的基本共识。一篇编者按写道，美国仅有 80 年历史和 4 000 万人口，中国拥有“3000 年的智慧和财富”以及 4 亿人口。但中国却在“寻求我们的帮助”，原因何在？答案简单明了：“基督教能够激发一个国家的勃勃生机”。^[1]众多美国报刊认为，基督教能够让人增强信念，摆脱迷信和愚昧困扰，从而催生不断进取的动力。《基督教信使报》指责孔子思想充斥着“偏见、等级、假神、异教祭堂和庙宇”等成分，孔子“必将让位于至高无上的基督”。^[2]该报的另外一篇文章宣称，孔子思想衍生了“低劣而又堕落的风俗习惯”，是一种“祖先崇拜”。这正是儒教“与基督教水火不容之处”。^[3]孔子思想中缺乏对“个人上帝”的信念，这既使民众颇感迷惘，从而难以产生足够的前进动力，又无可辩驳地证明，“基督教是（中国人）必需的”。^[4]

两种思想体系，孰优孰劣，在美国媒体的比较中似乎一目了然。孔子思想因循守旧，基督教积极进取；孔子思想黯然失色，基督教光芒万丈。《纽约观察记事报》认为，尽管孔子的伦理学说“令人赞赏”，

[1] “Editors’ Table,” *Godey’s Lady’s Book and Magazine*, May 1869: 459.

[2] “The Sunday School,” *Zion’s Herald*, Nov. 23, 1876: 374.

[3] “Methodist Quarterly Review for July,” *Zion’s Herald*, Jul. 31, 1879: 244.

[4] “Magazines,” *Zion’s Herald*, Sept. 9, 1869: 425; “The Methodist Quarterly,” *Zion’s Herald*, Nov. 2, 1876: 348.

“但与正义太阳（基督）的光芒相比，不过是一颗遥远的星球”。^[1]甚至单就道德观而言，孔子也“远逊于”圣经，因为后者“始终在推动着世界的智慧和精明”。^[2]《纽约时报》就两者的差异评论道，包括儒教在内的世俗哲学无法超越基督教，“能够照耀每一个人前进之路的光亮”绝非来自孔子，而是耶稣基督。^[3]《大陆月刊》更是视孔子思想为“野蛮落后、无知愚昧”的象征，“一旦云开雾散，其光芒即被众多其他星体所淹没”。^[4]《亚瑟家庭杂志》的观点如出一辙，宣称孔子阴影之下的中国人“极其无知和迷信……坚持（比其他国家）更加粗俗的偶像崇拜”。唯有基督教方可救中国人于泥潭之中。^[5]《华盛顿邮报》宣布，面对基督教的凌厉攻势，孔子思想“终将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6]

鉴于孔子思想的“保守与落后”及其对文明进步的“阻碍”作用，美国媒体呼吁基督教文明在中国积极采取行动之声不绝于耳。将基督教融入国民性格之中的美国人显然已将奉孔子思想为主臬的中国人远远地抛在身后：“如果美国是一个没有过去的帝国，中国则可称为没有未来的国度。”美国因此有义务向中国展示“新鲜事物”。^[7]1853年，《纽约每日时报》自信地宣布，孔子在中国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基督教是能够发挥替代作用的唯一思想体系”。面对中国的情形，“作为美国人，我们是何等的欣喜！”美国的立国之父“勇敢而庄严地选择了伟大的基督教原则——自由宗教、自由思想和自由政府”，“那就让

[1] “Confucius and His Writings,”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November 21, 1867: 374.

[2] Untitled Article, *Zion's Herald*, June 27, 1878: 1.

[3] “An Up-Town Church,”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1875: 3; “Paine’s Belief,”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1879: 3; “The True Light of Asia,” *New York Times*, Feb. 14, 1881: 2.

[4] “Are Our Public Schools a Failure?” *Overland Monthly and Out West Magazine*, Sept. 1869: 237.

[5] “Boys’ and Girls’ Treasury,” *Arthur’s Home Magazine*, Oct. 1880: 614.

[6] “A Company of Christadelphians,” *Washington Post*, Jul. 17, 1882: 4.

[7] “China and the Chinese,” *Eclectic Magazine of Foreign Literature*, Feb. 1850: 278.

我们精神抖擞、豪情满怀地奔赴使命吧！”^[1] 为了增强美国人的信心，媒体还告诉读者，中国素来三教并存，此事说明，“中国人易于接受新鲜思想”。在中国“建立基督教的上层建筑”因此切实可行。^[2] 美国人在中国散布基督教的任何行为都被媒体作为可圈可点的范例。比如，有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新哲学》(*New Philosophy*) 杂志。阅读杂志的“孔子门徒”将发现，“愚蠢的福音比他们经书中的智慧更加英明”。^[3] 基督教在中国难以迅速占领思想阵地又让美国媒体忧心忡忡。《纽约时报》写道，“一个明显而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当旧的信念即将逝去，基督教根本未能取而代之”。^[4]

事实上，引发美国媒体不满的只是基督教取代孔子思想的速度不如预期的迅速，对于基督教文明的强大力量，美国媒体始终坚信不疑。在宣扬基督文明内在优越性的同时，各类媒体从中国和日本等主要儒教国家及其在美移民的日常行为和社会变革中，发现了基督教正在取代孔子思想的蛛丝马迹。在中国，总理衙门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屡次召开会议，商议“翻译和出版国际法体系”。此举表明，中国正在外交领域以“近代国家交往之道”代替存在已久的孔子教条。^[5] 太平天国时期曾经率领“洋枪队”协助清政府镇压起义军的美国人华尔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此人后被部下误伤而亡。其死后待遇被美国媒体引为明证，显示中国政府正在逐渐放弃孔子独尊天下的信念。清政府称华尔为“两千年来最伟大的将军”，他因此得以葬在浙江宁波附近的孔庙庭院之中。皇帝专门下诏，确认华尔为“中国的主神之一”。其地位堪比孔子和中国的主要神灵，“每一个家庭、学校和庙宇都将铭记他的英名”。中国人也将因此“更加信任我们的国家和人民”。^[6] 即使到了 20 世纪初，美国报纸仍然充满自信地认为，宁波的华尔墓

[1] “Chinese Affairs,” *New York Daily Times*, Aug. 20, 1853: 1.

[2] “New Publications,” *New York Times*, May 13, 1878: 3.

[3] “Brevities,”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Sept. 21, 1876: 298.

[4] “The Death of a Religion,” *New York Times*, Jan. 9, 1881: 6.

[5] “Interesting from China,” *New York Times*, Jan. 8, 1864: 4.

[6] “A Deified American,” *Chicago Tribune*, Jul. 3, 1870: 5.

地“对于所有中国人而言都是神圣的”，其一是因为此为孔庙，其二则是华尔安葬于此。撰文者宣称，华尔之墓将“永久证明，中国人依然尊重来自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美国英雄”。^[1]传教士发自中国的消息也称，1867年1月，一座“雄伟的”罗马天主教堂在北京开建，英国领事则于数月之前在福建晋江为英国圣公会教堂奠基。“孔子的门徒”与西方教徒“比邻而居，相互完全理解，相处融洽”。^[2]

不仅中国政府坚守孔子教条的态度开始松动，民众接纳基督文明也表现积极。就在山东曲阜的孔庙附近，基督教已悄然流行，形成冲击孔子思想神圣源流之势。《基督教信使报》报道曰，循道会在山东的数个村庄发展了26名成员，而此地“紧邻（中华）帝国为纪念孔子而建的主要庙宇，是孔子思想的真正堡垒”。报道的言下之意非常明显。^[3]在孔子思想赖以传承的教育体系中，中国学生的反应同样令美国媒体颇感满意。美国女性传教士斐女士（Lydia Mary Fay）长期致力于在中国上海开办学校，关爱那些“备受忽视的身心”。由于中国学校讲授“以死的语言写就的”孔孟之道，它们“根本不能向学生传授任何思想”。传教士开办的学校一经出现，便“大受欢迎”。学生的思想“彻底放开”，他们“蜂拥而至，如同苍蝇追逐甜食一样”。^[4]基督教文明还感染了处于中国社会边缘的群体。太平天国起义者就是一例。起义领袖声称信仰上帝，普通参与者也不遗余力地“清除偶像崇拜和孔子崇拜，到处毁坏菩萨塑像和铭刻国家哲学（即孔子思想）的牌匾”。有鉴于此，中国人的“宗教思想将在数年之内发生急剧变化”，一改过去的“实利主义和极度贪婪”。^[5]甚至中国的帮会组织“天地会”都公开声明支持基督教。虽然此举可能是该会为扩大势力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帮会信奉基督教“并非不可能”。中国人毕竟需要“某

[1] Uncle Dudley, "A Forgotten Hero," *Boston Globe*, Jul. 8, 1900: 30.

[2] "Religious Toleration in China,"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May 16, 1867: 154.

[3] Untitled Article, *Zion's Herald*, Feb. 3, 1876: 1.

[4] "Representative Women of Our Own Land and Other Lands," *Godey's Lady's Book and Magazine*, Dec. 1879: 530, 531.

[5] "Chinese Insurgents,"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May 27, 1858: 164.

种信念”，以取代“孔子和中国早期哲学家所提出的粗鄙信仰”。^[1]诚然，诸如此类的事例绝非普遍现象，却仍然能够激励在华美国人——尤其是传教士——暂将中国基督教化的巨大信心，也让美国媒体欣喜无比。《基督教信使报》武断地宣布，“中国已经不再遵从孔子的教诲”。^[2]

以基督教为支撑的美利坚文明正在“感化”着越来越多的“孔子门徒”，既削弱了孔子在中国的地位，同时也召唤着中国人远涉重洋，身临其境地感受“优越”的美国价值观念。19世纪中期适逢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兴起，由此产生的华人赴美浪潮被美国媒体及时地赋予了文化优劣之意。有媒体指出，“在我国制度的影响之下”，信奉儒家思想的中国和日本改弦更张，“与我们和睦相处”。“(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发现金矿的消息一经宣布”，中国人的目光便“越过了浩瀚的蓝色太平洋，注视着那片将赐予他们诸多收获而非孔子哲学的土地”。^[3]《纽约每日时报》不失时机地写道，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国，改变了中国“远离文明”的状况，因为“同一大洋的波涛拍打着中国和加利福尼亚的海岸”。这对于中国人而言有着“极其巨大的吸引力”，对于正在“经受其他信念冲击”的孔子思想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中国的“古老法律、风俗和偏见被新时代的兴奋所淹没”，美利坚文明似乎注定要取代孔子学说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4]及至踏上美国海岸，华人立即感受到了基督教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一名记者在旧金山街头发现，二三十名中国人聚集在另外一位“衣着整洁、看起来充满智慧”的中国人周围，聆听后者用汉语宣讲福音。记者感叹道，基督教显然比孔子的道德说教更具优势，更加进步。^[5]八名“中国佬”更是试图加入旧金山第三公理教会。《芝加哥论坛报》称赞此举为“明显

[1] “The Rebellion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Secret Associations,” *New York Daily Times*, Jul. 12, 1853: 2.

[2] “Miscellaneous,” *Zion's Herald*, Feb. 27, 1879: 66.

[3] “Editors' Table,” *Godey's Lady's Book and Magazine*, Feb. 1855: 174.

[4] “Chinamen in America,” *New York Daily Times*, Jun. 9, 1852: 2.

[5] “San Francisco,” *Chicago Tribune*, Dec. 27, 1870: 1.

合理的要求”，因为中国人“愿意以基督代替孔子”。^[1]因此，在美国媒体的字里行间，中国人不论身居何处，孔子思想的影响力均在让位于基督教文明。

然而，与另一个儒教国家日本及其民众相比，中国人接受西方文明的速度仍显迟缓。强调日本人的积极态度成为美国媒体用以证明其孔子思想过时论的又一手段。《纽约时报》就此写道，日本人“在理解和接纳新思想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的中国邻居”，“孔子国度”的人们“死守着自己的传统习惯”。^[2]《纽约观察记事报》表达了类似观点。日本人能够“迅速认识到各种外国进步所带来的好处……急于以我们的各类知识完善自己，急于极其细致地学习我们的制度”。中国人则以“孔子原则”和世代传承的“习惯和风俗”为准绳，处理社会和私人事务。^[3]日本人以西方思想替代孔子学说的积极态度见诸于众多社会生活的细节之中。19世纪中期，在美国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日本国门洞开，异常迅速地在思想和制度方面改弦更张，适应西方潮流。日本上层社会“怀疑孔子学说”的趋势日渐强烈。他们认为，“目前正是努力在本国建立基督教的大好时机”。^[4]以孔子著作为主要内容的古典教育遭到排挤，因为日本人看到了“另外一个更加先进的文明”。政府极为迅速地建立了多所面向全民、旨在教授外语和科学的学校，加快日本人接纳西方文明的进度。^[5]在江户（现日本首都东京）的师范学校，美国人充当校长，推广美式教育。学生的加减乘除都以英语进行，只有在傍晚才能见到他们阅读中国典籍。“如果孔子幽灵身临其境……他必定极度惊诧”。^[6]一旦到了美国，日本人的西化程度更令美国媒体满意。1869年，全美共有13名日本学生，其中7名

[1] Untitled Article, *Chicago Tribune*, Aug. 1, 1872: 4.

[2] "Minor Topics," *New York Times*, Jun. 20, 1867: 4.

[3] "Chinese and Japanese Labor,"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Aug. 8, 1867: 255.

[4] "The Value of Tracts," *New York Times*, May 15, 1876: 8.

[5] "The Progress of Education," *New York Times*, Jul. 13, 1876: 8; "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Jul. 20, 1876: 230.

[6] Untitled Article,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Apr. 22, 1875: 125.

公开宣布信仰基督教，另有 5 人已接受洗礼。但他们在日本“都是作为孔子门徒加以培养的”。转变速度不可谓不快。^[1]

中国和日本是孔子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国家。但在美国媒体的刻画中，不论是中国人或是日本人，都经不住“先进”基督教文明的吸引，纷纷倒戈。孔子奠定基石的儒家文明大厦似乎呈现出即将倾覆之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欧基督教文明势不可挡，不断侵蚀着孔子思想体系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针对这种差别，美国媒体给出的解释是，孔子思想属于早已逝去的时代，基督教体系则引领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如此逻辑显然是美国媒体积极推行美欧文明中心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四、几点结论

19 世纪是中西力量对比最为悬殊的时期之一，西方社会蔑视中国文明之举极为普遍。美国媒体的孔子观具有强烈的代表性。孔子本为中国的文明圣人，但在美国的媒体话语中却走向了文明进步的对立面，成为中国融入近代世界的巨大障碍。孔子控制着中国人的思维，造就了极其保守、极具惰性的中国国民性格，导致了中美社会发展程度之间的鸿沟。美国媒体沾沾自喜于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美欧文明的“先进性”，某些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以及日本人抛弃孔子思想的积极态度被毫不犹豫地用作了支撑证据。综观美国媒体对于孔子的贬损，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美国媒体诋毁孔子之举，与美国社会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对华人移民的恐惧和排斥形成相互呼应之势。媒体将中国人“低劣”、“怪异”的本性归咎于孔子，实际上为美国社会日渐汹涌的排华浪潮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然推动中美文化并存的声音时有所闻，媒体的主

[1] “Japanese Youth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Feb. 11, 1869: 42.

流中国观却为负面的孔子形象所占据。美国人依赖于报刊杂志以获取信息，这一传统自革命以来就极为盛行，19世纪后半期尤盛。媒体的贬损加剧了美国社会关于中国移民不可同化的成见，为将排华运动推向全美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美国媒体的孔子形象是美欧文明中心论的延伸和具体化。作为“天定命运”观念的始作俑者和积极鼓吹者，美国媒体极其自然地将拓展以美国价值观念为核心内容的西方基督教文明视为己任。孔子在中国社会和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无疑是美国文明向东方扩张的最大绊脚石。诋毁孔子既可证明中国传统思想已经不合时宜，更能显示美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在华推销美国制度观念和基督教的正当性。可以说，美国媒体上的孔子与基督之争实乃文明冲突论在19世纪的载体之一。

第三，美国媒体的孔子观不以细致解读孔子思想和中国传统为前提，难以看到孔子对于中国文明进步的积极意义。19世纪后半期，美国媒体论及孔子的真正目的在于证明美欧文明的优越。他们将中国的落后、孔子的地位、美欧的强大和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放置于同一考察视野之下，得出了孰优孰劣以及根源在于何处的结论。此举有将现象与历史背景割裂之嫌，也忽略了导致先进与落后的众多其他因素。但无论如何，考察19世纪后半期美国媒体的孔子观让我们见识了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美国媒体挥之不去的文化偏见，也从一个细微的角度解读了愈演愈烈的排华运动。

第二章

孔子：美国舆论中的怪异符号

孔子及其思想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在中国看似自然的言谈举止一旦置于美国媒体的视野之中，就立即被打上了文化低劣的烙印。孔子被界定为中国低劣文化的根源，他因此经常出现在美国媒体嘲讽中国人的各种场合。不仅如此，美国媒体还借孔子之名攻击讽刺不受自己喜好的美国人物或事件。可以说，就 19 世纪后半期美国媒体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贬损而言，孔子是最大的靶子之一。时已逝去两千年的孔子承受着美国媒体极尽讽刺的攻击，既证明了孔子所具有的世界知名度，更反映出美国媒体在近代世界的文化碰撞中不可避免的文化偏见和欧美中心论。

一、孔子：迂腐与狡黠的代名词

19 世纪中期，华人大举移居美国。众多美国人得以直观面对迥然不同的中国文化。美国媒体因应这一事件及其在美国社会引起的反响，纷纷撰文，描述华人的生活百态，转陈华人的各类消息。在报刊杂志的字里行间，已在白人社会流传开来的华人负面形象被进一步强化，进而通过媒体不断扩散。尽管正面刻画偶有所见，报刊杂志却重在渲染华人日常行为和性格特征中不可理喻之处。迂腐与狡黠便

是美国媒体极力突出的华人特点之一。在此两大方面，美国媒体极尽讽刺嘲讽之能事。所谓迂腐，即指华人坚守中国传统习俗、不习美国思维与生活方式之举。而“狡黠”一词则用以形容华人规避美国社会规则、贪图小利的各类行为。在美国思维模式、生活方式、社会规则面前，原本相互对立的“迂腐”和“狡黠”概念不但并存不悖，而且共同刻画出华人不能也不愿同化的群体特征，客观上为日益高涨的排华浪潮提供了额外的理论支撑。作为华人文化与习俗的象征符号，孔子是美国媒体讽刺华人迂腐与狡黠时的焦点。

华人移民时常将孔子及其教诲挂在嘴边、记在心上，这让美国媒体觉得不可理喻，尽显迂腐荒诞之态。中国人初来乍到，文化迥异，无法融入周围社会。闲暇无聊，他们便以背诵孔子语录打发时光。即使躺在床上，华人也在“整篇整章地重复孔孟之言”。更让美国媒体感到惊奇的是，中国人以音乐的旋律“唱出”了孔子的教诲。^[1] 我们不难想象中国人摇头晃脑吟诵孔子语录时给美国人留下了何种印象。为加强记忆和领悟，华人还在住处的墙壁上悬挂“写有孔子聪明语录的狭长条幅”。^[2] 即使路遇一个无所事事的中国人，美国人同样会认为，在看似空洞的眼神之下，此人必定在潜心默记孔子的教诲。《芝加哥每日论坛报》曾有如下报道。一名中国人“仅穿着一条裤管肥大的裤子”，倚在临街的门柱上，“双眼失神，回味着孔子的聪明语录，或者正在盘算着如何骗取别人五美分”。^[3] 孔子语录与中国人所谓的懒惰和骗术相提并论，足以显示该报对于孔子的不敬和讽刺。有加利福尼亚白人购买了一匹马，他很快推断出，此马曾经华人之手。理由是，马的“左后蹄侧写有孔子的数条道德语录，在我购买时仍然清晰可辨”。^[4] 在美国媒体的刻画中，华人似乎除了“不合时宜”地尊崇孔子及其教诲就别无他能。对于华人的嘲讽和贬损在很大程度上被转

[1] "What Our Chinamen Read," *Overland Monthly and Out West Magazine*, Dec. 1868: 525.

[2] "California," *New York Times*, Mar. 7, 1861: 2.

[3] "Street Scenes," *Chicago Daily Tribune*, May 27, 1876: 2.

[4] "Through the Lower Coast Counties," *Overland Monthly and Out West Magazine*, Jul. 1870: 46—47.

移到了孔子身上。

华人生时如此，死后亦不能摆脱“束缚”。多数华人无意在美国永久居住，每一个人都想挣钱以后，返回故土，度过余生。即使他们不能活着回去，“其遗体最终也必须运回孔子帝国的高墙之内，入土为安”。^[1] 美国人的安身之所向来变更频繁，华人如此眷念故土让他们颇感惊诧。一篇媒体文章直言，普通美国人无法理解“孔子门徒”这一“宗教习俗”。文章称该习俗为“愚蠢的迷信”，但“我们的异教中国佬却乐此不疲……”。作者举例说，几天以前，一艘轮船装载了“一批怪异的货物”：一吨多的中国人骨灰，他们“在俄勒冈升入了极乐世界”。每人所需费用“相当于一名……最节俭的中国人（在美国）整整一年的积蓄”。中国人愿意花费如此多的钱财魂归故里，可见“习俗的强大影响力”。^[2] 一名美国人声称，他曾在旧金山港看见装有四百名华人骨灰的轮船。亦有少数华人就地埋葬，但其坟头的纸幡上必然“写有孔子语录，诉说着万事皆空的道理……长眠在此的人对此已有切身体会”。^[3] 不论美国媒体是将孔子思想界定为宗教或者迷信，字里行间的不屑是显而易见的。

在美国媒体的语境下，孔子对于中国人思想的控制还让华人移民在美国社会中无所适从，尽显笨拙滑稽之态。华人劳工居于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却通常逆来顺受。有媒体认为，这是孔子学说的长期主宰导致的思维迟钝使然。华人从事着美国人眼中极为低贱的职业：洗衣、种菜、捕鱼、掏沟等。美国人不但没有感激之情，反而充满敌意，不断敲诈。本为公平与正义维护者的警察亦是如此。他们经常给被称为“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的华人劳工制造麻烦，趁机索要钱财。比如，他们会问：“约翰，是你发出的噪声吧！”“没有，我没有发出噪声。”“那你在干吗，就这样——嗯——不动！一美元，不然我再把你关进去。”在警察的默许下，主日学校的小孩都可以用石头打破华

[1] “The New Home of the Chinamen,” *Chicago Tribune*, Jun. 19, 1870: 2.

[2] “A Ton of Dead Chinamen,” *Chicago Daily Tribune*, May 1, 1874: 8.

[3] “The Chinese from Home,” *Every Saturday: A Journal of Choice Reading*, Apr. 10, 1869: 462.

人的头，不但没有任何后果，还会得到“父母赞许的微笑”。中国人全然不顾，继续挣着每天一美元的微薄工资。就警察与劳工天壤之别的处事方式，评论者给出最终答案：警察不受孔子约束，而中国人则是“孔子的子孙”。^[1]如果说华人在警察面前忍气吞声有客观原因的话，“学识渊博的孔子门徒”居然无法识别美国人手中的汉字书法赝品，让美国媒体更觉不可理喻。这给予他们再次嘲讽孔子和华人的绝佳机会。据报道，这位“学识渊博的孔子门徒”，在美国以开设“使用廉价劳动的洗衣店”为生。有美国人将一幅字卖给此人，声称这是“中国皇帝的信函”手迹。中国人深信不疑，以高价购之。^[2]学识渊博与开办洗衣店和受人欺骗放置一处，显示了媒体的讽刺用心。

频遭美国人愚弄的华人无时不刻地在争取享有平等权利，这在美国媒体看来不是“迂腐”二字可以形容的，而是带有异想天开的成分。《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封名叫“阿新”（音）的人以华人的口气、用洋泾浜英语写就的读者来信。阿新“不识时务”地要求自己不要卖烟卷，因为他信奉孔子，而“孔子是好人”。他“想上学……不想洗衣。不想卖烟卷”。^[3]此信意在突出华人的“天真”和“无知”。华人无法在社会上获得的公正，在法庭上同样难以实现。名叫“李华”（音）的华人洗衣店老板状告另一华人，因为后者偷窃了他的一块银表和78美元现金。此案证据确凿，但法官却判穿着行为极力模仿美国人的被告胜诉。“孔子的追随者”李华只得“极度厌恶地离开法庭”，不解“‘美国佬制定的法律’为何如此玄妙”。^[4]媒体自然知晓案件的玄机所在，而“孔子的追随者”却“迂腐”到了追求法律公正的地步。一旦美国人给予丁点重视，深受孔子熏陶的华人便立刻“得意忘形”。对于此

[1] “Pacific Slope Opinions,” *New York Times*, Sept. 28, 1874: 2.

[2] “Humor,” *Chicago Daily Tribune*, Apr. 23, 1876: 3.

[3] “Letters to the Editor,” *New York Times*, Mar. 23, 1875: 2. 阿新是一名美国白人的化名，此人经常向美国和加拿大报纸的“读者来信”栏目写稿，贬损和诋毁华人（David Goutor, “Constructing the ‘Great Menace’: Canadian Labor’s Opposition to Asian Immigration, 1880—1914,”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88 [December 2007]: 555.）。

[4] “The Mysteries of ‘Melican Law,’” *New York Times*, Dec. 2, 1879: 8.

类情形，美国媒体更会不吝讽刺之词。已采用美国名字的一名华人前往法院，索要用于申请美国国籍的正式申请书，法官经过“必须的程序”之后予以应允。此事在美国媒体看来实属平常，却令“中国佬”欣喜若狂：他“笑得呲牙咧嘴，拉一把裤子，帽子斜戴，罩住了右眼，字斟句酌地用汉语感谢保佑自己的圣人孔子以及美国的总体制度”。他甚至在走廊里将一支香烟塞到了一个美国小男孩手里，“立即让这名少年显出极度惊恐之状”。^[1]在前述几例中，孔子俨然已是天真与轻率的代名词。

媒体力图表明，受到孔子影响的中国人不但对于自己的“迂腐”之态浑然不觉，有时还自得其乐。《国家警察报》(*National Police Gazette*)报道，中国公使团的两名随员某日来到纽约著名的休闲地科尼岛(Coney Island)。“孔子的门徒”虽然身着华丽的丝绸服装，却带着“本市(即纽约)风流社会的数名艳丽但弱不禁风的女子”作陪，让岛上的游人“大开眼界”。报道揶揄地写道，这些“中国佬”没有学到美国的先进之处，却把声色犬马发挥到了极致。^[2]连外交人员都不顾孔子思想所谓的落后，依然沉迷享乐。这是美国媒体借以讽刺孔子和华人的又一契机。基于美国媒体已有的文化偏见，某些中国人提议让美国人皈依孔子思想之举在让美国媒体震惊之余，加剧了他们的嘲讽程度。旅居美国的中国人黄清福多次演讲，“呼吁他的听众抛弃基督教，转投孔子的怀抱”。^[3]然而，尽管孔子思想以礼仪为重，黄却被刻画为不懂礼仪之人：“发表自己的见解之后，孔子门徒突然抽身而去”。^[4]黄的观点代表着中国文化以孔子之名针对基督教发起的反击。《华盛顿邮报》1878年报道，中国官方报纸宣布，中国政府“拟向处于黑暗之中的欧洲和美国派遣儒教传教士”。中国驻美和驻英公

[1] “John Chinaman as a Citizen,” *New York Times*, Oct. 24, 1877: 8.

[2] “John Chinaman on a ‘Hurrah,’” *National Police Gazette*, Aug. 6, 1881: 6.

[3] “Personal,” *Chicago Daily Tribune*, Feb. 6, 1876: 2; “Personalities,” *Saturday Evening Post*, Feb. 19, 1876: 8.

[4] “Chinning the Chinamen,” *Washington Post*, Apr. 10, 1882: 1.

使将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传播孔子教条”。^[1]然而，美国媒体却对此类反击付之一笑，视为自不量力之举。曾有宗教杂志要求，“政府的强硬手腕立即制止”中国在美欧培养“异教徒”的行为。《华盛顿邮报》却认为，政府干预纯属多余。“美国人民的智慧和美德”将是抗击异教思想的“唯一保证”。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老朋友孔子”无法在美国立足。^[2]

美国媒体认为，华人对于孔子有着极显迂腐的虔诚，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往往为了眼前利益而显露出“狡黠”的性格特征。这同样被归咎于孔子的教化。孔子既让中国人对自己顶礼膜拜，又驱使中国人“狡猾奸诈”地对待他人——尤其是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异族。一方面，孔子崇拜没能阻止华人贪图蝇头小利，反而成为他们聚敛钱财的面具。《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报道称，尽管“孔子的门徒”对于圣诞节“熟视无睹”，但却在意教堂提供的免费节日晚餐。芝加哥一家华人洗衣店的工人曾向该报记者炫耀，自己获得了循道圣公会教堂的晚餐入场券：“很多火鸡和鸡。”他指着一名华人工友说，“他……没有好东西吃。哈哈哈！”这名工友无地自容，“躲进一间带有门帘的屋子”。有票的华人因为工友的窘态“笑得更欢”。报道最后评论曰，教会如果要想让华人改变信仰，“他们就必须要在宗教说教中加入火鸡和鸡”。^[3]即便是作为街头乞丐，华人也“如孔子一样泰然自若，极具耐心”。他们面前摆着一张小桌、一包香烟和一束火柴，静等顾客光临。此举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乞丐截然不同，从而独享“乞讨的荣耀”。^[4]“欺诈”他人钱财之事在华人内部同样屡见不鲜。他们惯用赌博游戏，程度之深、花样之多，“孔子本人都会感到震惊”。^[5]孔子俨然已被刻画为中国人赌博之风的始作俑者。

更有甚者，孔子还成了华人权势阶层聚敛钱财的帮凶和偷窃行为

[1] Editorial, *Washington Post*, Aug. 13, 1878: 2.

[2] Editorial, *Washington Post*, Aug. 14, 1878: 2.

[3] “The Chinese,” *Chicago Daily Tribune*, Dec. 26, 1879: 2.

[4] “City Intelligence,” *New York Times*, Feb. 20, 1860: 5.

[5] “Chinese Gambling,” *Chicago Daily Tribune*, Jan. 5, 1873: 2.

的怂恿者。《芝加哥论坛报》以充满嘲讽的笔触写道，孔子“化身毒蛇”，回到了中国人中间。他“盘绕在（中国人）最为神圣的庙宇里，并通过他的祭祀者，收受大量珍贵稀有的供品”。祭祀人员“借机大发横财”。^[1]《纽约时报》的记者暗访似乎印证了上述情形。记者进入华人祭祀孔子的场所，却发现，在人们磕头表达虔诚之际，仪式的主持者却将作为祭品的钱财席卷而去。在一间极为隐秘的房间，华人祭祀者和绅士则在“心平气和地分享财物”。^[2]旧金山的华人锣鼓喧天、鼓号齐鸣地庆祝“孔子节”。一位“能力出众的”华人开始“以孔老夫子的教条为基础”发表演讲。他规劝信徒们，“不要在月圆之时偷鸡，因为这将惹恼神灵，并且很容易让鸡的主人抓住”。而一旦在其他时候偷窃得手，偷窃者“应该与（孔庙的）祭祀人员分享”所得。^[3]

另一方面，孔子似乎还教会了华人回避于己不利的美国规定，甚至危害美国人的安全。19世纪70年代，加利福尼亚的银币贬值。如果交易金额超过10美元，收款方通常会要求对方以黄金支付。但“看似无精打采的孔子子孙”却自有应对之策。一名华人在码头欲购买三张船票，3.5美元一张，总共10.50美元。按照惯例，这名华人应该付黄金。但他每次只买一张，三次购完。他因此得以用银币支付所有金额，最后“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去。^[4]如果说此人所用策略还属雕虫小技的话，另外一名“孔子子孙”的行为则带有“明火执仗”的意味了。“加利福尼亚狡诈的中国佬”不仅在旧金山诈骗了18000美元巨款，而且登上开往中国的轮船，试图逃避美国法律的制裁。但美国人通过越洋电报，向此人可能抵达的目的地进行通报。《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预测，一旦他在香港或上海走下舷梯，他就会“带着对大量鸦片和杏眼女人的幻想”被挡获。^[5]华人的“狡黠”

[1] Untitled Article, *Chicago Tribune*, Mar. 20, 1872: 4.

[2] “Joss,” *New York Times*, Sept. 22, 1872: 4.

[3] “Table Gossip,” *Boston Daily Globe*, Sept. 15, 1877: 4.

[4] “Too Muchee Smartee,” *Chicago Daily Tribune*, Feb. 24, 1877: 3; “How a Chinaman Caught a Ticket Agent,” *Scientific American*, May 5, 1877: 274.

[5] “Telegraphs versus Rogues,” *Scientific American*, Mar. 20, 1869: 184.

使美国人大受损失，即使随身财物也未能幸免。《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记者宣称，他多次将衬衣和其他衣物送到中国人的洗衣店清洗。但“承蒙孔子的恩惠”，这些衣物“数周之内便到处出现褪色和磨损情况”。记者曾经质问店主是否使用了漂白粉，店主矢口否认。然而，一天清晨，该名记者却偶遇四名“中国佬”走进一家大型批发杂货店，“购买了他们能够扛走的所有漂白粉”。一两天之后，他在邮局看见这四名“中国佬”，每人寄走一千美元的银币。记者讽刺道，在孔子的思想中，漂白粉才是“我们真正而且唯一能够理解的内容”。^[1]《基督教信使报》更是信口雌黄，诬称孔子教会了中国人吸食鸦片，中国人将此恶习带到美国。美国人的奢侈社交圈沾染者颇多，“中国佬应该受到指责，而不是我们”。通过鸦片，“狡黠”的中国人把对美国的危害深入到了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领域。^[2]名叫阿巴(音)(Ah Bak)的“前孔子门徒”不但终生吸食鸦片，还让周围的美国人染上烟瘾。他被称为“美国最伟大的瘾君子”。^[3]

美国人的生命也在“狡诈的”华人危害之列。加利福尼亚的“一名中国佬”“极其聪明，是孔子的忠实信徒”，但却犯下了谋杀罪。面对即将到来的死刑，此人“出奇地平静”，没有忏悔之意。^[4]美国媒体列出的最为耸人听闻的例子是，中国人利用某种神秘之术，轻取美国人性命。比如，有美国年轻无赖要求华人街头表演者脱掉马甲。“孔子门徒毫不惊惶”，而是说道，“我没穿这种衣服，但我愿意表演剑术，让你大开眼界”。他随即抽出双刃剑，在此人面前熟练地一挥而过。中国人收剑入鞘，“礼貌地呈上自己的鼻烟盒”。美国人“一声喷嚏，已被斩断的头便与毫无防备的双肩分离了”。媒体随即得出结论：“打倒中国佬。”^[5]

[1] “Confucius and Chloride of Lime,” *Chicago Daily Tribune*, Oct. 6, 1879: 3.

[2] “From Our Exchanges,” *Zion's Herald*, Nov. 29, 1877: 1.

[3] “Ah Bak, the Christian,” *Boston Daily Globe*, Sept. 25, 1882: 1.

[4] Editorial, *Boston Daily Globe*, Apr. 17, 1877: 4.

[5] “The Hoodlum,” *Scribner's Monthly*, May 1878: 160; “The Hoodlum,” *Chicago Daily Tribune*, May 5, 1878: 7; “The Age of Fable,” *Puck*, May 8, 1878: 10.

华人崇拜孔子时的“迂腐”和对待他人时的“狡黠”是否真有其事，或者程度如何，皆非美国媒体严肃考虑之事。他们如此渲染的目的，在于强调中国人落后的思维模式以及不能融入美国社会而又狭隘自私的性格缺陷。这实际上是愈演愈烈的排华浪潮在美国报纸上的反映。

二、孔子：美国异类的符号

因为是“迂腐”和“狡黠”的代名词，孔子变成了美国媒体用以形容和讽刺异类的简便符号。华人当然首当其冲，不受美国主流欢迎的人和事同样被贴上“孔子”标签。

孔子本人是美国人眼中最大的异类之一。他不仅如上文分析所显示的一样，招致大张旗鼓的直接攻击，间接迂回的讽刺也是处可寻。例如，为讽刺孔子思想专注于日常事务从而缺乏“深度”，《纽约时报》在介绍人工呼吸器时杜撰孔子语录。文章写道，溺水从来都令人胆战心惊，因为“孔子曾经充满智慧地说过，人在溺水时，‘他的头呛水，呛水’”。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圣人的论断”。孔子所言以华人洋泾浜英语的形式出现。^[1]讽刺意味可谓尽在其中。《芝加哥日报》假借他人之口，将孔子思想比作女人喜欢但却毫无价值的小物件。有雕塑家带回一个中国小箱子。妻子问其用途，雕塑家答曰，这是中国女人“收藏针头线脑”之处。他进一步说道，“我们可以轻易地为它假设一段历史……它最初的用途难道不是盛装孔子的金科玉律吗？”如此“珍贵”之物却是英国商人以“玻璃珠和两便士的小刀”换来的。^[2]美国人当中亦有少数崇拜孔子者，但此类人等均有某种缺陷。“55岁的快乐活泼少女”苏珊·金(Susan King)就是一例。金不顾千山万水，执意前往中国，寻找“纯正的茶叶”。她首先“虔诚地拜谒了自己极

[1] "The Spirophore," *New York Times*, Dec. 9, 1876: 4.

[2] "Decorative Art," *Chicago Daily*, Nov. 24, 1878: 16.

其尊崇的孔子之墓，沿途经过每一座庙宇，都会燃放鞭炮”。她后来虽然寻得“真茶”，但“美国消费者却不喜欢茶叶的口味”。报纸进而评论道，金崇尚孔子以获取茶叶之举表明，“一个丑陋的女人……只要不危及异教徒的宗教，就可以在其土地上来去自由”。^[1]真正的茶叶不受美国人喜欢，崇拜孔子的美国人以丑陋但假扮天真的金为代表。不论是尊重孔子的金或是其带回的茶叶，都被界定无法为美国人所接受的异类。

19世纪后半期崇尚孔子的美国人所占比例极小，能够引起媒体注意者就更加稀有了。相比之下，媒体以孔子之名喻指不受欢迎的人或事的情形比较多见。1870年，美国国会准备对花生和多种水果征收进口关税。此事引发不绝于耳的抗议。但抗议者在最后关头偃旗息鼓，关税法案得以通过。《芝加哥论坛报》质问道：这些人到那儿去了？其虎头蛇尾、习惯空谈之风难道一如“孔子的福音一样令人费解”？^[2]政治观点稍显激进的密苏里人布兰德（Bland）获得了“孔子门徒”的称号，因为他是一个“小共产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3]在美国人的词汇中，共产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皆是理应受到排斥的异类。孔子思想与两者等同，既将孔子打入另类之列，又意在强调布兰德不合美国常理的行为举止。对于孔子哲学所谓的偏执，《芝加哥论坛报》亦是津津乐道。19世纪70年代正值美国铁路劳资纠纷肇始之时。铁路工人的偏激心理据称与孔子思想有着基本的共通之处，两个毫无关系的概念被等同起来。该报认为，“毫无疑问的是，研究孔子哲学可以让我们认识一场三美分的战争所具有的蛊惑价值”。加薪三美分并不能给工人带来多少实际好处，报纸只是以此突出工人“小题大做”，“鼓励人们抢劫铁路管理者”。^[4]就任总统不久即遇刺身亡的詹姆斯·艾布拉姆·加菲尔德（James Abram Garfield）将军逆美国的反华主流而动，反对限禁“最为廉价”的华人劳工。他“自此以

[1] “The Women’s Tea Company,” *Chicago Tribune*, Apr. 21, 1872: 4.

[2] “Pea-Nut Protection,” *Chicago Tribune*, May 21, 1870: 2.

[3] Editorial, *Washington Post*, Dec. 8, 1877: 2.

[4] Untitled Article, *Chicago Daily Tribune*, Feb. 24, 1873: 4.

后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将仅次于孔子”，“每一家华人洗衣店将把他作为神加以供奉”。“聪明、自尊的美国工人”可能因为加菲尔德的提议遭受排挤。^[1]

从媒体反映的情况来看，孔子与美国异类相互等同的既定模式甚至渗入了政治宗教辩论以及其他社会领域。伊利诺伊州参议院有关州议会文件是否应该以多种文字发表的争论就是一例。斯坎伦(Scanlan)参议员持反对意见。其理由是，如果法文、德文等成为政府文件的语言载体，“中国佬”势必也会要求，“孔子的语言”应该占有一席之地。^[2]《纽约时报》更是危言耸听，宣称“孔子宗教正在太平洋沿岸扩散”，这将“危害美国制度”。^[3]摩门教徒因为一夫多妻制而成为19世纪美国宗教领域的异类。在刻画该派教徒的戏剧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丑化孔子的痕迹。戈希-霍珀公司(Gosche-Hopper Company)曾将摩门教徒的经历搬上舞台，取名“百名妻妾”(One Hundred Wives)。作为剧中的主人公，孔子·麦金利(Confucius McGinley)“身着绒布衬衫，举止粗鲁”。^[4]一篇小说的主人公也叫孔子。他离群索居、言语怪诞。当人问他长期藏身的阁楼是否会漏雨，“孔子”却回答：“理发师会照料鲜花。”连女主人公都禁不住惊呼：“你太荒谬了！”^[5]比较而言，媒体称呼驯马高手为孔子已经是相对客气之举了。^[6]

美国人不但以孔子之名称呼不能认同的人和概念，前往中国的武装帆船亦被命名为“孔子”号。对于该船的行踪，媒体进行了连续报道。1853年下半年，“孔子”号蒸汽船到达吴淞口。1854年，该船仍然停留在上海。同年5、6月，“孔子”号搭载美国驻华公使，造访福州，

[1] “The New Chinese Joss,” *Washington Post*, Oct. 30, 1880: 2.

[2] “The State Capital,” *Chicago Tribune*, Jan. 31, 1873: 5.

[3] “General Notes,” *New York Times*, Jul. 18, 1877: 4.

[4] “Amusements,” *Washington Post*, March 14, 1882: 2.

[5] Untitled Article, *Scribner's Monthly*, Nov. 1874: 117; Estelle Thomson, “A Story of the Sea,” *Godey's Lady's Book*, May 1881: 422.

[6] “The Horse,” *Massachusetts Ploughman and New England Journal of Agriculture*, May 3, 1879: 1.

随后返回上海。待公使下船之后，“孔子”号逆江而上，到了南京，将来还可能扬帆黄河。^[1]以中国人名称呼美国舰船已是甚为稀少，何况这还是一艘搭载美国公使巡游中国领海和内河的武装船。此事的寓意耐人寻味。“孔子”号不但是美国势力向孔子故土不断延伸的触角，而且被赋予了打击中国海盗的功能。1855年6月30日，美军小分队乘坐“孔子”号“开始搜索海盗”。^[2]十年之后，“孔子”号已经卖给清政府，但依然在美国人的督导下“追逐中国海盗”。^[3]孔子本是中国身份的根基，亦是中国道德礼仪的集大成者。孔子之名却被用作了美国势力向中国渗透的工具名称。中国人不顾孔子的道德思想，铤而走险，充当海盗，最终还得由“孔子”参与追剿。如此媒体报道不能不说是在讽刺孔子以及尊崇他的中国人。这也是孔子被视为另类符号的又一实例。

三、孔子：“贫乏与虚伪”信仰的承载者

在美国媒体的讽刺语境下，孔子崇拜造就了华人性格的迂腐和对待他人的狡黠，让他们无法融入美国社会并且和谐地与他人相处。尊崇孔子的华人和少数美国人因此成为美国社会中的另类。至于为何会有如此印象，美国媒体自然不会承认自己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孔子思想自身所谓的缺陷再次备受指责。媒体对于孔子思想“贫乏而虚伪”特性的讽刺为此作了明确的注解。

美国媒体极尽戏谑地写道，孔子虽然关注现世，其学说却在解决人们的日常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现世的孔子哲学无法解决现实问

[1] “India and China,” *New York Daily Times*, Nov. 30, 1853: 3; “From China,” *New York Daily Times*, Feb. 8, 1854: 2; “Interesting from China,” *New York Daily Times*, Sept. 14, 1854: 1.

[2] “Another Rencontre between Americans and Chinese Pirates—Interesting Official News,” *New York Daily Times*, Oct. 23, 1855: 2.

[3] “Obituary,” *New York Times*, Dec. 5, 1880: 7.

题，这正是孔子信仰体系的“贫瘠”之处。一方面，孔子似乎只能讲述和体现一些路人皆知的道理，而对真正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例如，《科学美国人》写道，“孔子告诉我们”，人类在知道纺织布之前，“穿的是兽皮羽毛”。^[1]又比如，某人在杂志上撰写了以下格言：“面包被吃掉就没有了”、“你除非有面包，否则就没有面包吃”、“如果想要面包，你只有去烤、要或者偷”。作者随后写道，自己“无疑假装是这些睿智语录的始作俑者”，“孔子的读者”一定在其字里行间“发现了似曾相识的现象”。^[2]另有报纸嘲讽说，“孔子在走路时，通常是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休息时，他通常两脚着地”。如果走路碰到石头，“他会一脚踢开；如果石头很重，他会停下来或者绕开”。孔子“从不将鞋子穿在头上，也从不把帽子戴在脚上”。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让衬裤有伤大体地暴露在外”。该报诬称，孔子在“身体力行地”展示上述“礼仪”的同时，放任社会恶习大行其道。报纸杜撰道，孔子曾说，“在一坛放了大量生姜的酱菜里，即使一只死老鼠也是美味佳肴”。此文甚至编造了孔子在中国人吸食鸦片问题上的态度：孔子告诉弟子，吸食鸦片体现了“孝”，因为吸食者“爱他的 poppy”。^[3]“Poppy”意为罂粟，读音和拼写与美国口语中的“pappy”（爸爸）相近，故被美国报纸做此贬损幽默之用。

孔子学说于解决现实问题无益的偏见在其他媒体文章中同样表现明显。比如，威尼斯博览会的蜡像馆塑有孔子和其后人用筷子食用米饭之像。某名美国人在参观之后作了如下绘声绘色的描述：“孔子翘着手指，举止严肃，似乎正在思考妙不可言的中庸之道……嘴里发出（如果蜡像可以说话）‘噜、鸣、呼’之声，试图驱散思想迷雾”，但给人的最终印象却是“幼稚愚蠢”。^[4]作者突出“噜鸣呼”等词，既有取笑汉语发音之意，更有凸现孔子支吾含混、不能解决问题的诋毁

[1] “Chinese Plumagery,” *Scientific American*, May 18, 1872: 325.

[2] “How Many Do Two and Two Make?” *Overland Monthly and Out West Magazine*, Jun. 1875: 526.

[3] “Bret Harte on Confucius,” *Chicago Daily Tribune*, Oct. 31, 1874: 9.

[4] Untitled Article, *Scribner's Monthly*, Mar. 1871: 563.

目的。孔子不但没能驱散思想迷雾，还促使自己的信奉者“不愿承认罪是日常行为的一部分”。^[1] 宗教意义上的罪实乃西方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否认罪的存在因此是孔子思想回避实际问题的又一“证据”。媒体甚至将对孔子学说“贫瘠”特性的讽刺延伸到了育儿领域。按照《星期六晚间邮报》的杜撰，孔子曾说，“虚伪的慈善家给婴儿喂食面包皮”。报纸声称，“显然，孔子对婴儿知之甚少”。评论进而臆测，这“或许因为……孔子没有子嗣”。“面包皮恰恰是细心的母亲才会喂给婴儿的食物”，因为更为柔软的部分容易让婴儿进食太多，从而增加窒息的危险。^[2] 该报另外一则杜撰的轶事将孔子描绘成为掩饰知识贫乏的窘态而避实就虚之人。有人问孔子，“天上有多少星星？”孔子答曰，他“只关心身边之物”。诘难者再问，“那你的眉间有多少根眉毛？”孔子的回答是，他“既不知道，也不关心”。^[3]

正因为认定孔子思想难以为现实生活提供指导，媒体竭力揶揄孔子思想的实际意义。比如，在美国人极其看重的财富积累方面，孔子思想似乎缺乏可借鉴性。“可怜的”福里船长 (Captain Folley) 一生都在漂洋过海，但“积攒的财富极少”。在听过一场有关中国宗教的讲座之后，福里“幡然省悟”：“我现在才知道，我一直都在过着孔子式的生活”。^[4] 其言下之意是，孔子思想无力教导人们过上富足的生活。孔子曾说，“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论语·阳货》）《哈珀市场》杂志以美国青年杰克·古德哈特 (Jake Goodheart) 为例，力证事实并非如此。古德哈特“性情善良、非常富有，但有些许恶习”，年届三十而婚。依孔子之见，此人恶习将终生无改，且会吞噬家财。其妻没有苟同，而是力排众议，对古德哈特关爱有加，“让家变得更加温馨”。每当古德哈特因为恶习难改而深陷绝望之中时，妻子总是鼓励，“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经过数年“痛苦而又极为有趣的挣扎”，古德哈特终于可以宣布，自己“已经改过自新”。化名“老单身汉”的作者

[1] “No Sense of Sin,”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Mar. 31, 1859: 100.

[2] Untitled Article, *Saturday Evening Post*, Nov. 7, 1857: 2.

[3] Untitled Article, *Saturday Evening Post*, Sept. 13, 1856: 5.

[4] “Notes,” *Zion's Herald*, Feb. 16, 1871: 80.

嘲讽道，结局“不论对于圣人孔子意味着什么”，它对于古德哈特夫妇而言，却是“令人满意的”。^[1]

媒体指责孔子务虚之举还以寓言的形式出现。两家刊物相隔十年刊登了同一则有关孔子的寓言。某人“掉入深邃漆黑的坑中，躺在尽是烂泥的坑底，不断呻吟，完全不能动弹”。孔子走到坑边，说道，“可怜的人，我为你感到难过。你为什么这样蠢，居然掉进去了？我给你一条建议吧：如果能出来，别再掉下去了”。尔后来了一个佛教徒。此人说道，“可怜的人，我看到你在下面，感到很痛苦。我想，如果你能爬上三分之二的距离，甚至二分之一，我就够得着你，把你拉上来”。最后，救世主来了，“直接走到坑边，俯下身子，抓住可怜的人，把他拉了上来，然后说道，‘走吧，别再犯下罪孽’”。^[2]孔子与佛教徒一样，其言于事无补。似乎唯有耶稣基督才能救人于苦难，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这则寓言此后数度出现，主题相同，唯有情景稍有变化。其中一个版本出自在美华人之口，受困于坑中者变为一个中国人。首先经过的孔子不仅拒绝施救，反而指责掉入坑中者没有听从自己的教诲。随后出现的菩萨虽然表达怜悯之情，却要下面的人自己上来。最后到来的耶稣基督眼含泪水，直接跳入坑中，中国人终于得救。^[3]而在另一场景，容颜渐老、风光不再的美国女人为求内心安宁而入教堂。牧师为证明唯有基督才能救赎生灵，讲述了同样的寓言。微有不同的是，孔子、菩萨和耶稣仅通过信徒现身，坑中人的身份再次变得模糊。佛教徒劝他停止挣扎，思考来世。孔子的弟子认为坑中人对于父母和国家的不敬导致了目前的处境，并且信誓旦旦曰，如果他能出来，自己愿意教他如何克尽义务。基督徒来了，他不仅给予坑中人以勇气，还叫来其他人，找来绳索、食物和水。众人齐心协力，被困者终得脱险。听闻至此，女人双膝跪地，虔诚地向往基督。^[4]

-
- [1] An Old Bachelor, "Manners upon the Road," *Harper's Bazaar*, Jan. 16, 1869: 34—35.
 [2] "A Chinese Fable,"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Mar. 15, 1860: 84; "A Chinese Sermon," *Youth's Companion*, Oct. 27, 1870: 342.
 [3] "The Saunterer," *Los Angeles Times*, Jun. 21, 1891: 10.
 [4] "A Lost Opportunity," *Youth's Companion*, Dec. 3, 1903: 612.

美国媒体在指责孔子学说空洞无物的同时，不忘攻击孔子及其崇拜者所谓言行不一的虚伪特性。潜藏于媒体报道之下的逻辑是，孔子和崇拜孔子的中国人需要以虚伪来掩饰孔子思想缺乏实际效用的状态。例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食不语，寝不言”、“席不正，不坐”、“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等本是表明孔子遵循礼仪之句，却被媒体视作孔子信奉迷信的证据。“多数读者乐意从中看到（孔子）心中萦绕的迷信观念”，所有中国人以礼仪之虚实践迷信之实因此“不会令人感到惊奇”。^[1]与此同时，媒体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痼疾也归咎于孔子的所谓“表里不一”。有刊物指出，孔子曾经提及一夫多妻和换妻陋习，但却“没有加以谴责”。他因此是“一个虚伪的人，至少在其论述中前后矛盾”。^[2]至于美国人普遍关心的人性，孔子同样难逃招致攻击的命运。媒体宣称，虽然孔子相信人性本善，其信奉者依然“在外界邪恶力量的诱惑下犯下罪恶”。^[3]另一家媒体的报道似乎为此作了注解：“孔子的门徒”在法国巴黎“涉嫌诱奸”。作为“P先生”家中的仆人，“中国佬约翰”有众多机会接触主人“年方十三、如蜡人般美丽”的女儿。他终究难敌诱惑，诱奸了主人的女儿，并致其怀孕。由于女儿的阻挠，主人未能让中国仆人锒铛入狱，但尚未出世的“孩子却急需正名”。^[4]

有鉴于孔子崇尚空谈的偏见，我们不难理解媒体别有用心地突出某些人对于孔子及其思想避之不及的情形。《每周六》杂志报道，一名法国人将房屋出租给他人，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墙壁被孔子语录所污损”。房东通过法律途径要求，租房者“必须支付一个季度的租

[1] "Occult Science in the Chinese Quarter," *Overland Monthly and Out West Magazine*, Aug. 1869: 160—61.

[2] "Letter from a Japanese Schoolmaster,"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Sept. 5, 1872: 285.

[3] "The Northern California Indians," *Overland Monthly and Out West Magazine*, Aug. 1872: 164.

[4] "Ah Sin's Sin," *National Police Gazette*, Apr. 12, 1879: 3.

金”，以便“清除刻在墙壁上的中国字”。^[1]一名“睿智诙谐”的神职人员谈及自己的中国经历时说，“我所认识的最有魅力的绅士是当地的理发师。我肯定，我对他的尊敬绝对超过对孔子的崇拜”。^[2]此人暗中指责的仍然是孔子思想的实际效用。媒体有时也故意突出中国人的某些行为所具有的嘲讽效果。据一家杂志刊载，一位中国女士被美国人问及“孔子之谜”，她却自顾自地弹奏着“妈妈，摇着我入睡”。她不但回避有关孔子的问题，还反问提问者谁是这首曲子的作者。^[3]在加利福尼亚深受歧视的中国劳工初到波士顿之时，白人社会尚无强烈的排斥情绪存在。“中国佬约翰喜欢上了波士顿”，颇有乐不思蜀之意。报纸借机讽刺孔子对于这部分华人缺乏感召力；即使在他们面前展示“伟大的黑龙黄旗（清朝时期的中国国旗）和先知孔子的胡须”，他们同样安之若素。^[4]

孔子是19世纪后半期美国人所知晓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名字之一。时值排华浪潮兴起，针对中国的文化偏见泛滥，孔子必然承受着日渐猛烈的嘲讽攻击。美国报刊杂志讽刺孔子之举是这一运动的反映和延伸，同时也为美国完全禁止华人移民法案的通过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社会的排华行为从媒体的讽刺中找到了理论依据。中国人尊崇孔子，但孔子思想却被刻画为贫乏空洞、华而不实的体系。宣称孔子思想没有实际效用的美国媒体认为，正是对于孔子的崇拜，造就了华人迂腐而又狡黠的群体特征。他们不愿抛弃被美国人视为一无是处的孔子学说，接受美国的“优越”文明。华人因而与美国社会的其他群体格格不入，成为文化异类。美国排斥华人的举动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美国对于孔子及其信奉者的讽刺实乃美国排华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为该运动走向极端营造了必要而适宜的舆论氛围。

[1] “Foreign Notes,” *Every Saturday: A Journal of Choice Reading*, Mar. 1, 1873: 250.

[2] “Pidgin English,” *Scribner's Monthly*, Jan. 1878: 373.

[3] “About Dresses and Things,” *Harper's Bazaar*, Feb. 15, 1868: 250.

[4] “The Heathen Chinese: Almond-Eyed Celestials at Work in the Hub,” *Boston Daily Globe*, Dec. 23, 1877: 2.

第三章

孔子思想与美国价值观念的共性： 负面舆论之下的理性声音

总体而言，19 世纪后半期美国媒体上的孔子形象带有浓厚的负面色彩，否定、批判和讽刺之声不绝于耳。1849 年华人大举移民开始到 1882 年排华法案获得通过，是美国反华情绪急剧聚集的时期，孔子在媒体上的总体形象可想而知。但在此来势凶猛的排华狂潮之下，涌动着探寻中美价值共性的暗流。虽然鲜为人知，这一现象却说明，即使在极为不利的情形下，某些美国人和移居美国的中国人也敢于主张中华文明的存在和优点。由此表现出的勇气为中美两种文明的深入交往奠定了基础。置于正面刻画框架之中的孔子思想既与基督教和美国价值观念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亦可为美国人规范社会乃至政府行为提供有益的借鉴。孔子思想及其信奉者得以在一定场合受到美国人的接纳和欢迎。

一、孔子与基督：穿越时空的共性

美国虽然政教分离，其宗教氛围和宗教情结依然明显。基督教被奉为主臬，耶稣基督拥有至高无上的精神地位。孔子及其思想在中国

文明体系中角色类似。有鉴于此，媒体常将孔子与基督、孔子思想与基督教相提并论。纵然贬损居多，强调相似之处的评论亦有不时见诸报端者。

在世界思想体系中，孔子学说与基督教同等重要，影响相似，此为第一大共通之处。《芝加哥论坛报》指出，人类社会拥有八大“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犹太社会产生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三大宗教，印欧社会亦有三大教派，中国则有儒教和道教。八大体系勾画出“世界宗教地图的总体轮廓”。^[1]孔子与耶稣同属曾经庇佑世界民族成长壮大、免遭毁灭厄运的“少数几个思想家”之列，“有恩于整个人类”。^[2]公元前6世纪，孔子“被迅速席卷全国的无知和沉沦深深触动”，决定“重修典籍，推行道德改革”。孔子学说于是出现，其诞生轨迹“如同基督教在某些近代哲学家的阐述中重获新生”。^[3]类似的历史作用和形成背景造就了两大体系时有重合的内涵。因为如此，《纽约时报》在评论一本词典时认为，编撰者“应该以更长的篇幅”描述孔子和耶稣的生平，突出两人思想的“共通之处”。^[4]1870年，《论语》、《大学》和《中庸》作为“中国经典”被译成英文。有书评认为，英语世界“颂扬孔子、将其与基督相提并论甚至置于基督之上者甚众”，但却苦于没有孔子论著可供阅读。此次翻译，弥补缺憾。^[5]针对中国全国上下的孔子崇拜，《激进》杂志宣称，孔子发挥着基督在西方社会的作用。^[6]不仅如此，孔子与基督似乎还共同记载了人类社会的凤凰涅槃。史前大洪水即为一例。大洪水不仅在《创世记》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孔子也有类似说法。孔子与基督再次站在了相同的高度。^[7]

[1] “Religions,” *Chicago Tribune*, Feb. 15, 1874: 10.

[2] Duncan G. Ingraham, “Great Men,” *The Radical*, Jul. 1868: 38.

[3] James C. Moffat, “Chinesic Classics,” *Nassau Literary Magazine*, Oct. 1869: 100.

[4] “An English Book Written by a Chinaman,” *New York Times*, Aug. 8, 1881: 3.

[5] “Our Book Table,” *Zion's Herald*, May 5, 1870: 209.

[6] “Anti-Missionary Zeal,” *The Radical*, Oct. 1868: 296.

[7] “Essays on the Earth and Its Structure,” *Massachusetts Ploughman and New England Journal of Agriculture*, Jul. 26, 1873: 1.

本着如此信念，很多基督教牧师的布道文在主要引用圣经语录之余，“也不藐视孟子和孔子的善良情感”。^[1] 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也在致清政府官员的信函中问道，既然基督教和儒教存在共性，“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孔孟的道德准则，而你们也对基督教的崇高教义敞开胸怀？”^[2] M. E. 加勒特 (M. E. Garrett) 夫人在布道中宣扬基督与孔子同等，结果被人以信奉异教罪告上法庭。但即便如此，她也不改初衷，可见其信念之坚定。^[3] 一名日本人的举动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两种思想本质相同。此人自美国返回不久即去世。他在死前央求母亲，将圣经和孔子论著放入坟墓，因为“我相信，两者讲述了同样的真理”。^[4] 19 世纪后半期的日本社会黑帮泛滥，专事欺骗讹诈。与其有过接触的美国人声言，黑帮组织“不仅绝对违背圣经的教诲，也同样有悖于孔子的教诲”。^[5] 此乃孔子与耶稣精神相通的另一表述。

更有甚者，媒体在某些时候不惧美国排华的社会氛围，将孔子思想置于基督教之上。有媒体宣布，作为道德家，耶稣的水准不会高于孔子等人。^[6] 一位美国人在公开场合宣称，在制定道德规范方面，孔子“即使不比耶稣……高明，也是处于同一水平”。^[7] 鉴于儒教与基督教多有重叠，孔子的诞生又早于耶稣几百年，基督教从儒教那里得到启发之说也有一定市场。美国著名散文家爱默生认为，“基督教就是孔子的翻版”。^[8] 某些宗教人士颇有同感：“孔子本性善良，创立了有益的学说。某些最优秀、最纯正的基督教教义便源于他的论著”。^[9]

在影响之外，孔子学说与基督教还有着近乎一致的内涵。此为第

[1] “Letter from New York,” *Zion's Herald*, May 15, 1879: 156.

[2] “Mr. Burlingame's Address,” *New York Times*, Mar. 29, 1868: 10.

[3] “On Trial for Heresy,” *New York Times*, Sept. 9, 1881: 5.

[4] “The World in a Nut Shell,” *Ohio Farmer*, Jul. 19, 1873: 39.

[5] “The Japanese Idea of a ‘Ring,’” *New York Times*, Jul. 15, 1877: 4; “The Japanese Idea of a ‘Ring,’” *Chicago Tribune*, Jul. 29, 1877: 6.

[6] “Religions,” *Chicago Tribune*, Sept. 21, 1879: 9.

[7] “Socialism,” *Chicago Tribune*, Apr. 12, 1879: 12.

[8] “The Assyrian Chapter of the Deluge,” *New York Times*, Feb. 17, 1873: 3.

[9] “Our Social Meeting,” *Zion's Herald*, Jan. 25, 1872: 46.

二大相通之处。共同的上帝信仰支撑着各自的思想体系。《波士顿环球报》宣称，“孔子和中国最古老的典籍证实了上帝的存在”。该报进而断定，“存在一个万能而又永恒的上帝是世界历史上不争的事实”。^[1]仁慈的上帝因而并非基督教所独有，孔子表现出了“同样的（信仰）趋势”。^[2]例如，不仅基督教徒，“中国的孔子追随者”也要履行祈祷仪式。这“等于承认上帝的天启作用”。^[3]更有人相信，中国之所以出现孔子，是因为得到了上帝的恩惠。上帝让孔子来到中国，“以便显示自己的启示和不朽”。^[4]鉴于此类认识，孔子在一些美国人心中的宗教形象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笼罩在孔子身上的“无神论”阴霾逐渐稀释飘散。^[5]

平等相待的行为规范是另一共有内涵。“孔子与基督以同样清晰的文字，阐述了以仁爱为内容的真正道德观念”。^[6]仁爱平等的共性以“黄金准则”为体现。虽为基督教的“著名道德规范”，黄金准则却早在基督纪元之前5个世纪就已被孔子提出。子贡曾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7]《华盛顿邮报》认为，耶稣“最为经典的语录”莫过于“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但孔子“在数个世纪以前就已经用更加精辟的语言讲述了同样的道理”。^[8]《波士顿环球报》写道，耶稣在山丘上宣布“公正原则”，但比孔子的“精妙语言”

[1] “Ingersollism Discussed,” *Boston Daily Globe*, Nov. 19, 1879: 4.

[2] “Reformed Judaism,” *New York Times*, Oct. 31, 1881: 8.

[3] “A Dean Criticizing a Bishop’s Prayer,” *New York Times*, Jul. 25, 1857: 3.

[4] “Christmas Pulpit Talks,” *New York Times*, Dec. 26, 1881: 8.

[5] “Buddha and His Doctrines,” *Washington Post*, Oct. 25, 1880: 4.

[6] W. J. Linton, “The Religion of Organization,” *The Radical*, Apr. 1869: 6.

[7] Samuel Longfellow, “The Unity and Universality of the Religious Ideas,” *The Radical*, Mar. 1868: 10—11; “A Chinese Joss House,” *New York Times*, Jul. 15, 1877: 5; “Chinese Religions,” *New York Times*, Feb. 23, 1881: 6.

[8] “Unexpected Sermons,” *Washington Post*, Jan. 17, 1881: 1. 黄金准则指代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以及《圣经·新约》的“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的为人原则。

晚了几个世纪。^[1]爱默生在演讲中指出，东西方文化交叉影响，难以判断孰先孰后。单就黄金准则而言，孔子的表述“在时间上（较耶稣）提前了500年”。^[2]因为孔子早于耶稣提出“最完美、最权威的”道德规范，他“似乎是亚洲人在道德启示方面唯一的天才”。^[3]《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直称孔子为“黄金准则的创立者，耶稣传播的很多真理都来源于他”。严格地讲，基督还有“剽窃”之嫌。^[4]孔子与耶稣惊人一致的黄金准则，得到媒体几乎异口同声的认可。因此，信仰上帝既须信奉基督教义，也应“高度尊崇孔子和耶稣都曾经阐述的黄金准则”。^[5]即使偶有质疑者，其异议也只关乎某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例如，某读者来信提出，“勿施于人”的“施”英译有误，从而误导爱默生等人。但读者此举的本意并不在于否认孔子与耶稣之间存在的共性，而是借选择用词之机，将创立黄金准则的殊荣献给摩西。摩西是古犹太人领袖，生活年代先于耶稣1200年，早于孔子700年。^[6]而在另外一处，孔子的黄金准则被界定为“消极的公正”，它只要求人们“不要伤害他人”。耶稣主张“积极的公正”，“鼓励人们乐善好施……以解他人之需和之苦”。如此划分仍然没有危及两者的基本共性。^[7]

既然黄金准则为孔子学说和基督教所共有，其现实价值得以在美国歧视华人的生活氛围中逐渐显露。利用黄金准则为华人伸张平等权利的声音时有所闻。早在1855年，加利福尼亚华人便在致美国人的公开信中作了此类尝试。美国推行歧视政策的借口之一即为华人不信奉基督教。公开信引用黄金准则反驳道，“如果我们没有被欺骗的话，基督要求其门徒视所有人为兄弟，并以兄弟之情相待”。然而，

[1] “The Orthodox Plan of Salvation,” *Boston Daily Globe*, Jan. 29, 1878: 8.

[2] “The Rival Golden Rules,”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Mar. 28, 1872: 98.

[3] “What Is the Use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Feb. 1, 1872: 34.

[4] “The Buddhist Religion,” *New York Times*, Apr. 30, 1877: 8.

[5] “Notes,” *The Radical*, Jan. 1872: 77.

[6] “Emerson and Confucius,”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Feb. 29, 1872: 66.

[7] “China and the Chinese,” *Saturday Evening Post*, Apr. 20, 1861: 3.

与基督思想背道而驰的是，“整个（华人）种族”被美国人归入“低劣、不值得怜悯之列”。华人断然不会如此，因为“我们尊敬而又奉行其道的伟大哲学家孔子要求我们，做人必须善良、仁爱、有礼”。^[1]指责美国在华人问题上违背黄金准则之举亦有美国人参与。塔尔梅奇先生（Mr. Talmage）针对美国排华浪潮，着重提及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说，认为美国的“华人恐慌是有史以来最荒谬、最彻底的诡计”。对于在华美国人遭受的损失，中国政府“乐意”赔偿。而同样声称信奉黄金准则的“我们却拒绝为中国人承受的暴行支付一分钱”。塔尔梅奇因此“以万能的上帝之名”，“控诉美国政府在华人问题上背信弃义的行为”。^[2]另有美国人以孔子先于基督宣布黄金准则之故，呼吁“停止炫耀我们相对于其他民族的优越性”。其他民族自然包括了来自孔子国度的华人。^[3]

孔子与基督、孔子思想与基督教拥有相同的历史地位，并在某些内涵上一脉相承。这虽然无法代表 19 世纪后半期美国媒体孔子观念的主流，却依然让我们看到，即使在美国排华狂飙突进的时期，孔子及其思想还是引起了美国人一定程度的重视和尊重。有些美国人甚至将孔子置于耶稣之上，以两者皆有的黄金准则伸张华人的平等权利，足见孔子思想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强大生命力。

二、孔子：东西方文明同步的标志

孔子与耶稣，本质相通，意义相似。各自衍生的文明虽然发展道路有异，却也比肩前进，交相辉映。依据美国媒体，孔子就是中国文明与西方同步演化、同等重要的标志。他们将孔子与美欧社会文化圣

[1] “Address of the Chinese to the Americans,”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Oct. 25, 1855: 342.

[2] “Talmage on the Chinese,” *New York Times*, Sept. 20, 1880: 2.

[3] Lewis G. Janes, “Comparison,” *The Radical*, Feb. 1872: 124.

人相提并论、借孔子之名赞扬中国的文明成就、以孔子所为所思为标准判断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诸如此类的举动表明，在孔子与中国遭受蔑视的总体背景之下，孔子所代表的文明进步水准仍难被彻底颠覆。

孔子在上文受到了与基督齐名的礼遇。与此同时，孔子与已成美国文化圣人的立国之父也偶有相伴出现在报端的情形。立国之父建立美利坚民族国家，开创了人类民族独立的先例，亦为美国繁荣与强大奠定了基础。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人视其开国先辈为文明进步的保证和动力。孔子得以与他们并提，显示部分媒体正视中国文明的理性心态。《基督教信使报》就孔子的经典著作评论曰，“它们拥有本·富兰克林式的精神实质和实用性，因此完全适用于它们发挥了深远影响塑造而成的国家”。^[1]另一杂志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国家实则“少数几个能工巧匠利用劣质材料尽其所能创造出来的”。富兰克林、华盛顿、杰斐逊和美国的宪法之父们就是临危受命，“在抗议声中，挽救国家于瓦解的危险之中”。更为古老的国家概莫能外。孔子与摩西、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共同见证了上述定律的历史存在。他们如同美国的立国之父，“以所处的时代为工具”，绘出了各自国家的雏形，决定了国家性格的精髓，尔后悄然离去。^[2]身为美国的立国领袖，华盛顿受到美国人的顶礼膜拜。《纽约时报》相信，这与中国的孔子崇拜一样，均是国家与民族自豪感的体现。^[3]孔子在著述方面的造诣只有富兰克林能与之匹敌。有文章问道：“就著述而论，我们有何人能孔子相比，其作品历经2400多年的考验？”作者的回答是，唯有“本杰明·富兰克林与其最为接近”，“我们希望，人们对于他（富兰克林）的记忆能够同样悠久”。^[4]而在讨论学校教育是否有必要包含非基督教内容时，孔子与美国的另一革命领袖托马斯·潘恩联系在了一起。

[1] “Our Book Table,” *Zion's Herald*, May 5, 1870: 209.

[2] Samuel Johnson, “Natural Democracy,” *The Radical*, May 1868: 1.

[3] “A Glimpse at the Past—Washington's Genius and Character,” *New York Times*, Feb. 23, 1873: 8.

[4] David D. Porter, “The Chinese in America—Present and Future, Etc.,” *United Service; A Quarterly Review of Military and Naval Affairs*, Apr. 1879: 318.

相关文章认为，如果不让接受教育的儿童阅读潘恩和孔子的作品，这对于非基督教徒而言“有失公允”。原因在于，“对于犹太人、无宗教信仰者和孔子的门徒，基督教仅仅是一个教派而已”。^[1]富兰克林、华盛顿、杰斐逊和潘恩等人缔造了美利坚国家，从而受到美国人的极度尊崇。孔子与他们相提并论，证明美国某些媒体在反华背景下尚能保持一定的客观性和文化包容性。

除此之外，孔子还常与西方文明的其他标志性人物同时见诸报刊杂志。《每周六》杂志提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垄断天才”的论断，认为东西方社会的天才已然冲破地理限制，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孔子与英国哲学家培根在人性问题上的默契被视为强有力的证据。杂志写道，“因为孔子和培根，（东西方）人性被更加牢不可破地结为一体，时间的鸿沟得以跨越”。^[2]化名“正义”的读者给《纽约时报》去信，呼吁人们重视孔子的语言和希伯来语，因为它们与培根和莎士比亚的语言一样“优雅”和“流畅”。此举有望减少人们“粗鲁的嘲笑和无聊的讽刺”。^[3]在另一篇文章里，《纽约时报》论及人类创作杰出著作时面临的“逆境”。孔子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薄伽丘等人同属此列^[4]。同享“智者”美誉的孔子和爱默生鼓励人们勤劳，因为“勤劳是一种极其美好的品德”。^[5]

而在其他时候，虽然孔子没有与具体的西方姓名相并出现，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媒体视孔子为人类文明动力之一的意图。《激进》杂志认为，就“完善人类生活原则，指导正确的人际交往”而言，“孔子宗教”无与伦比。孔子在人类历史上“首先宣布，人人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政府的目标在于民众的福祉，而非统治者（自己）牟利”。

[1] “The Bible in the Schools,” *New York Times*, Apr. 3, 1870: 3.

[2] “The Brontes,” *Every Saturday: A Journal of Choice Reading*, Jul. 26, 1873: 97.

[3] “Spiritual Music,” *New York Times*, Jan. 17, 1881: 8.

[4] “Strange Italian Poetry,” *New York Times*, Nov. 13, 1881: 3.

[5] “Intermeddling with Husband and Wife,” *Massachusetts Ploughman and New England Journal of Agriculture*, Nov. 4, 1876: 4.

杂志甚至据此得出结论，“中国的王位从来都不是世袭的”。^[1]《基督教信使报》持有类似看法，坚信“孔子著作确立的道德规范”主要针对统治者而言，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古代）独裁政府的专制程度，并让其延续了二十四个世纪之久”。世界应该感激孔子，因为他，“人类大家庭的三分之一……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沐浴在了完美道德体系的光辉之下”。^[2]孔子还被称为中国人的“伟大导师”，“凝聚了（中国）最伟大的思想”，是“在黑暗中”给予中国人以“引导和希望的耀眼明星”。^[3]孔子谦逊的自我评价与其弟子的溢美之词更让孔子具备了“任何一位受人尊敬的圣人、救星或者人类恩人”都拥有的品质。他“超越了人类的普遍才能”，达到了“智慧与美德的顶峰”，但依然求索不断。^[4]《费城医学时报》相信，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道出了人类知识的精髓，既概括了人类知识的全部内容，又将人类知识归于无形”。^[5]由于孔子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某些媒体甚至将其重要性摆在西方历史名人之上。《纽约时报》在一篇书评中写道，“人类仅有一名成员获得了世界声誉，他是中国人”，此人即是孔子。原因在于，“西方哲学家和英雄并不为东亚人民所普遍知晓，而孔子已经成为两大半球家喻户晓的名字”。^[6]《星期六晚间邮报》则提出，“以成就论人方为公平”。孔子思想“统治三亿人达两千年之久”，远非“法国、英国、德国或者任何欧洲王国同一时期的加冕蠢驴、笨蛋或者强横霸道者”所能比拟。^[7]

尽管孔子主要是以思想家或者哲学家的形象出现在美国媒体上，但媒体对于孔子的赞扬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延伸到了艺术与科学领

[1] “Notes,” *The Radical*, Mar. 1872: 239.

[2] “The Methodist Quarterly,” *Zion's Herald*, May 3, 1877: 140.

[3] “The Life of Jesus,” *Christian Inquirer*, Jan. 19, 1850: 2.

[4]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Radical*, Nov. 1871: 298.

[5] “Reviews and Book Notices,” *Philadelphia Medical Times*, Sept. 20, 1873: 809.

[6] “New Publications,” *New York Times*, Feb. 20, 1869: 2.

[7] “Progress,” *Saturday Evening Post*, Oct. 18, 1856: 2.

域。此举亦在客观上将孔子塑造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者。《纽约时报》撰文认为，“最高境界的古代音乐”不在埃及，而在中国。作者有此结论，是因为孔子有关音乐的记述。不仅如此，孔子先于柏拉图一千年提出，国家治理的好坏和民众礼节的优劣可以通过音乐进行观察。如此敏锐的思想说明，孔子对于音乐艺术有着非同寻常的了解。^[1]“孔子的门徒”还拥有“自己的民族舞蹈”，中国人因此得以享受这一“普遍的娱乐形式”。^[2]印刷术是媒体注意的又一细节。《纽约观察记事报》认为，“孔子的门徒在公元前就已在长城以内成功地应用该项技术”，此举可与富兰克林发明避雷针相媲美。^[3]《纽约时报》发现，人类的古代社会曾经播下众多“独到见解的种子”，这些种子可能成为“后世伟大发明的胚胎”。比如，蒸汽机是古希腊哲学家漫不经间提出的设想。孔子“据说熟悉印刷之术”，而印刷术正是古代中国对于人类文明作出的主要贡献之一。^[4]《芝加哥论坛报》更是把蒸汽机雏形的出现归因于“孔子的同胞”。如同富兰克林的发明得益于他人的启发一样，瓦特等人的蒸汽机亦非原创。早在数个世纪之前，“孔子的同胞”便“制造了神奇的机械装置，让桀骜不驯的风听从人类的意志”。这与近代蒸汽机的原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5]即使在欧美自认为有着明显优势的天文学领域，孔子之名仍然有所提及。《星期六晚间邮报》引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出版物称，“中国人在远古时期便拥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支持此说最为重要的证据源于公元前6世纪经由孔子修订的《书经》。该书记载，在黄帝之孙统治中国时，曾有五大行星同耀夜空之象。19世纪的欧洲天文学家证明，公元前2449年9月29日，确有此事发生，与《书经》所述相吻合。因为中国人不可能在远古与欧洲人接触，上述事件印证了“中国早期典籍

[1] “Mr. Fry’s Lecture on Music,” *New York Times*, Dec. 8, 1852: 5.

[2] “The Nautch Dancers,” *National Police Gazette*, Aug. 6, 1881: 6.

[3] “A Printer among the Patriarchs,”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Sept. 7, 1854: 286.

[4] “Lost Inventions,” *New York Times*, Jul. 1, 1870: 4.

[5] “Originality in Literature,” *Chicago Tribune*, Mar. 2, 1873: 8B.

的权威性”。^[1]

虽然在涉及中国的艺术与科学进步时，媒体多在借用孔子之名喻指整个中国，这却更进一步地显示，孔子实乃中国跻身文明进步国家的象征。堪与欧美思想并驾齐驱的孔子学说与孔子国度的艺术和科学成就交相辉映，让美国部分媒体在 19 世纪后半期排华反华的大背景下能够较为客观冷静地看待中国的文明状态。这无疑是孔子留给中华文明的又一遗产。

三、孔子：美国现实生活的参照标准之一

正面评价或者尊崇孔子的文章在媒体上的比例的确不高，却表明了媒体好感的存在。与此相应，媒体在报道或评论美国的现实生活时间或引用孔子，以资参照。《芝加哥论坛报》曾说，“《论语》中整页整页的道德语录值得引证”。^[2]此言具有明显的代表性。19 世纪后半期，美国媒体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实践了上述认识：美国人的个人修养和美国的社与政治争论等。

孔子的很多言论涉及个人的言谈举止和其中的基本原则，故美国媒体在谈论个人修养时引证孔子之处颇多。以孔子之言引导个人的人生轨迹是此类文章的核心线索。与最终胜利失之交臂是很多人经历过的无奈。《纽约观察记事报》写道，“有多少人几乎成功了，但却因为‘哦，只差一点’而未能如愿！”该报特地引用孔子“譬如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论语·子罕》），说明一鼓作气、不可半途而废之理。孔子的语录形象地刻画了“几乎”和“完全”之间的差别。^[3]另外一篇讨论如何致富的文章同样规劝人们，“选择一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不能环顾左右而心生动摇”。作者亦是从“一本极为古老、

[1] “Antiquity of the Chinese Empire,”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r. 23, 1872: 3.

[2] “Confucius: Teachings of the Chinese ‘Master,’” *Chicago Tribune*, Aug. 24, 1873: 10.

[3] “Only Trifles,”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May 23, 1878: 165.

记载着……孔子语录的书”中获得的启发。^[1]与此同时，人们不能因为惧怕错误而裹足不前。“一个人的命运并不取决于他是否犯过错误，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关键是看他在犯错之后的态度。这里还是有孔子语录为证：“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只要敢于改正错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将邪恶变成美好品质的神奇力量”，从而“将过去的错误转化为道德升华的源泉”。^[2]

孔子语录不仅可为个人励志所用，还能用于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有人因为无所事事而百无聊赖：“天色太晚，无法野炊，天气太热，无法外出。”他们突然之间发现，“读几行孔子语录……将非常适合我们的口味”。孔子言论因此具有了充实生活的功能。^[3]对于美国人的婚姻生活，孔子语录似乎也有用武之地。“幸福婚姻的秘诀在于，性情相左，目标相同”：这可以让双方从不同的途径“同心同德地”向同一目标迈进，另可增加“相互的吸引力和愉悦感”。婚姻双方由此焕发出“优异的品性”，“生活和婚姻幸福”乃水到渠成之事。作为此说的佐证，作者引用孔子“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的语录，并得出结论：“品行高尚的男人和品性高尚的女人……在婚姻关系中显得尤其弥足珍贵。”^[4]19世纪后半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除了关注生活质量以外，还开始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有人对此感到忧虑，因为这可能让品行不端者混迹于讲求道德操守者之列。媒体再次从孔子的言论中找到了“无需此虑”的证据。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论述显示，个人修养不以称谓为转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及“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之言说明：“品德高尚者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头衔”，对于品德低劣者，“我们即使称呼其头衔，也无受到亵渎的

[1] “How to Get Rich,” *Saturday Evening Post*, Jan. 27, 1866: 2.

[2] “The Evil That Men Do: How It May Be Transmuted into Good,” *New York Times*, Jul. 6, 1879: 2.

[3] “The Spirits,” *Boston Globe*, Jul. 26, 1873: 8.

[4] “What Is Fitness in Marriage,” *Saturday Evening Post*, Apr. 3, 1869: 8.

危险”。因此，人们大可不必忧心忡忡，“使用头衔是安全的”。^[1]甚至有媒体从中国人遵循孔子教海的日常举止得到启发，进而思考美国某些相似现象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国人的外衣有五颗扣子，据信是为了时刻铭记“孔子推荐的五大道德准则”。美国人的礼服大衣后面则有两颗扣子，蕴涵着何种意义，颇值得思考。^[2]

孔子言论的参照意义在美国的社会争论中同样频频出现。孔子通常是媒体为某些问题进行辩护时的有力佐证。如在国内问题方面，《波士顿环球报》刊登的一封公开信引用中国人铭记孔子的模式，抨击马萨诸塞州老南部协会（Old South Society）出售礼拜堂之举。老南部“为纪念上帝和人类自由而建”，“虔诚的人们”曾在此布道，“革命时期的爱国者在此为共和国奠定基础”。礼拜堂因此“对于美国人民而言极其珍贵”，但却即将被改变用途或被拆除。此举令作者深感愤怒：“孔子的门徒以宗教的虔诚保护着祖传的建筑”，老南部协会的常务委员会“居然在国家独立一百年之际，着手毁坏他们信奉上帝以及他们的父辈曾为共和国奠定基础的建筑”。孔子建筑的保护力度折射出老南部协会所作决定的严重不妥。^[3]中国的学校教授孔子言论的举动也引起媒体少有的正面评价。一封致《芝加哥论坛报》的读者来信触及公立学校教育内容的宗教色彩问题。围绕此事的争论和取舍“对于我国年轻一代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作者支持在公立学校的日常教育中，加入“基督寓言和各种箴言”。作者的支撑证据之一就是，“中国人要求（学生）熟记孔子的著述”。^[4]

社会争论不单涉及非政府层面，政治与政策更是引起媒体的巨大兴趣。与所有争论一样，政治与政策辩论不可避免地需要引经据典。孔子之名频繁出现，为争论者提供有益的参照。虽然 19 世纪末、20

[1] “A Plea for ‘Handles,’” *Scribner’s Monthly*, Jan. 1875: 383.

[2] “Table Gossip,” *Boston Globe*, Mar. 2, 1879: 4.

[3] “An Open Letter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Old South,” *Boston Globe*, Jul. 22, 1876: 4.

[4] B. A. Ulrich, “Christ’s Parables in the Public Schools,” *Chicago Tribune*, Jan. 30, 1879: 12.

世纪初风起云涌的改革运动尚在酝酿，改革话题已开始不时地见诸于报刊杂志。论及美国势在必行的行政改革，《华盛顿邮报》特别提及孔子唯才是举的思想：“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论语·为政》）；“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等。撰文作者感叹道：“诸如此类的行政改革将让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本国人民欢呼雀跃”。^[1] 纽约州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Roscoe Conkling）也是政府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康克林从孔子那里得到启发，试图揭示真假改革者的本质区别。康克林宣称：“世界上有几类改革者，并且历来如此。在基督纪元之前 500 年，孔子发现了当时的几类改革者，他告诫国民，警惕藏身于喧嚣表象之下的改革者。”那些“真诚、高效、不事张扬的改革者”才值得“每一个人积极协助和同情”。^[2]

19 世纪中后期，另一个颇有争议的改革话题是弱势群体的权利。妇女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日渐高涨，增强自身体质、改变手无缚鸡之力的孱弱形象成为女性的议事日程之一。射箭被一女性杂志作为重点健身项目加以推荐。除了此项运动的强身效果之外，孔子关于射箭术的论述以及中国历来重视射箭的传统亦被用来增加观点的说服力。^[3]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为黑人的解放大声疾呼，这引起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极大不满。南部各州纷纷组织“警戒委员会”，监视萨姆纳等人所导致的连锁反应。然而，《纽约时报》认为，既然孔子说过“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警戒会不论如何阻挠和掩饰，“思想坚定、道德高尚”的萨姆纳都会“受到众人的追随和关注”。他“无法隐藏自己，无法躲在阴暗之处”。报纸借孔子之口凸现了种族主义者的徒劳之举，表达对于

[1] “How China Is Ruled,” *Washington Post*, Sept. 23, 1878: 2.

[2] “The New-York Canvass,” *New York Times*, Oct. 19, 1875: 1.

[3] “Archery,” *Godey's Lady's Book*, Sept. 1852: 254. 原文没有引用具体的孔子语录，但孔子的相关言论散见于其主要论著中，如“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等。

黑人解放的支持。^[1] 1874年在巴尔的摩成立的“自由德裔居民教会”，代表着美国少数群体欲藉孔子之名革除社会不公的愿望：“孔子和基督同为伟大的改革者”。^[2] 孔子思想的人性关怀同样增加了美国人反抗工业剥削的信心。他们批判将工人“仅仅当作血肉‘机器’”的工业制度，斥责其既违背孔子学说，也与基督的信念相去甚远。^[3]

美国人试图改变政府决策的辩论之中亦有不断出现的孔子身影。华盛顿纪念碑已是美国首都的一道特殊风景和美国人缅怀过去的重要场所。然而，纪念碑的修建曾一度遭到反对，反对立场就与孔子有关。1880年，众议院需要再拨款15万美元，纪念碑方能继续建造。沃纳（Warner）众议员表示反对，因为塔状纪念碑属于“愚昧、野蛮和迷信的时代”。值得纪念的人们“将在自己的论著中永存”。沃纳以孔子等人为例，力证“我们不是通过用黄铜和花岗岩建造的纪念碑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沃纳的提议最终被拒绝。^[4] 在美华人劳工的去留是19世纪后半期更具争议的美国政治话题。加利福尼亚联邦参议员科尼利厄斯·科尔（Cornelius Cole）建议将中国劳工引向墨西哥。科尔认为，“以各种检验来看”，“孔子创建的文明远胜于”墨西哥文明，华人的进入“可以让墨西哥获得新生”。此举不但有望提升拉丁美洲的“文明”程度，而且通过引导而不是禁止华人劳工，美国可以名正言顺地维护“全世界受压迫者的庇护所”的自诩形象。^[5] 然而，由于美国强烈的排华情绪，科尔的建议未被采纳。

正因为1849—1882年期间美国风起云涌的排华运动，媒体对于孔子的正面评价和引用才尤具研究意义。华人劳工的到来迅速引起美国人的巨大恐慌和文化偏见，进而在媒体上引发一片针对中国移民

[1] “Charles Sumner,” *New York Times*, Sept. 1856: 3.

[2] “Congregation of Unbelievers,” *New York Times*, Mar. 16, 1874: 2.

[3] J. Ives Pease, “A New Song of the Shirt,” *Herald of Health*, Apr. 1870: 161—63.

[4] “An Oratorical Arraignment of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Washington Post*, May 27, 1880: 2.

[5] “The Chinese Question: Letter from United States Senator Cole, of California,” *New York Times*, Jul. 17, 1869: 4.

和中国传统的讨伐和贬损之声。但报刊杂志在某些场合和情形下，毫不避讳地赞扬孔子及其学说、将孔子思想作为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有益的参照体系。此类举动无疑是理性的，对于中美文化关系的延续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孔子学说在总体不利的文化背景中依然获得部分美国媒体和民众的认可，从美国人的思想到日常生活再到社会与政治辩论，孔子的身影总能闪现。这足以证明，孔子象征在异域文化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生存力和影响力。与此同时，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渗透力，近代中美文化关系具有双向而非单向本质，有别于中美地缘政治力量的角逐。再者，撰文者和其观点的潜在接受者代表着美国社会中文化偏见和种族主义思想的反向力量，他们于美国华人权利的维护和华人社会的延续功不可没。诚然，报刊杂志并非学术刊物，因而无意深入剖析孔子及其学说。但作为不可或缺的民意载体和导向工具，本章考察的文字媒体向我们展现了文化交流与交融的无时不在。正是由于孔子思想自身的强大生命力、部分美国人的积极评价和应用以及本章难以涉及的华人社会的努力，孔子乃至中国文化传统才不致湮没在美国尘嚣日上的排华氛围中。

第二部分

排华高峰期的孔子形象，

1882—1920

1882年，经过三十余年的聚集，美国的排华情绪终于集中爆发，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排斥华人法案》。到1920年左右，排华运动达到巅峰。此间三十年，影响美国孔子形象的因素盖有几种。

随着排华法律步步升级，日渐苛刻，华人群体不断恶化的生存和工作环境当为第一大因素。1882年的排华法仅仅限禁华人劳工来美，期限十年。但其后通过的数项法令将禁止进入的中国人范围扩大到所有工人和商贩，更在1902年决定无限期禁止华人入境。如此一来，本在美国的华人危机四起，遭受的歧视和暴力有增无减。为伸张权利和赢得同情，华人采取多种策略，予以反击。利用孔子促进群体认同，就是策略之一。与此同时，华人的陋习也令孔子难脱干系。孔子与华人身份之间的联系因此更加紧密。

另一方面，中国的处境愈发糟糕，陷于内忧外患而不能自拔。美国人的不屑和同情之声皆有所闻。两大阵营不约而同地利用孔子，以

显言之有据。对于斥责中国落后于世界文明步伐的人而言，孔子乃中国裹足不前的总根源，是中国迂腐乏味的代名词，系中国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此类人等积极鼓吹，中国应该抛弃孔子，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指引下，成为令世人尊重的国家。同情者则以孔子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以及广受尊崇的孔子思想为依据，证明中国并非缺乏内在的前进动力，而是受到西方侵略的制约。西方在华的所作所为缺乏道德水准，有悖常理。在美国人的话语建构之下，孔子既阻碍了中国进步，又为中国赢得同情，其形象具有矛盾特性。

第三，世纪之交的美国正是改革运动风起云涌之时。相比以往，美国社会更需崇高的处事与言行准则。孔子长于道德说教，其思想因而获得美国改良主义者的青睐。在政治领域，人们以孔子言行为参照，对官员及其行为大肆嘲讽，呼吁美国各级政府净化为政作风，提高施政素养。诸如唯利主义和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其解决同样离不开孔子思想的引导。对于个人修养，孔子也有明显的参照意义。但在妇女权利方面，孔子却以反面形象出现。无论如何，孔子都是社会改良者的理论依据。

排华情绪、中国处境和美国的改革运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决定美国孔子形象的三大重点因素。或褒或贬的孔子观，取决于美国人的现实需求及其价值取向。

第四章

孔子与美国排华高峰期华人的 认同建构

从 1882 年排华法案颁布到 1920 年左右,在华人经历了最为严峻的生存考验。为排斥华人,白人社会频繁采取恐吓、暴力、驱逐等歧视手段。华人更加难以融入美国社会,其数量亦在急剧下降:1880 年,美国共有华人 105 465 名,到 1920 年,只剩下 61 639 名。^[1] 华人群体的境况危机四伏。面对严酷的现实,华人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内部团结和凝聚力,延续群体的存在,对抗挑战。诉讼、抗议、暴力甚至伪造文件等策略为华人经常采用,引起学术界的较多关注。^[2] 华人

[1] Ronald Takaki,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rev. ed.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8), 111—12.

[2] Iris Cha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2004), 130—72; Roger Daniels, *Coming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 2nd ed. (New York: Perennial, 2002), 239—50; 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New York: Back Bay, 1998), 230—69; Lucy E. Salyer, *Laws Harsh as Tigers: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Immigration Law*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Sucheng Chan, ed., *Entry Denied: Exclus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America, 1882—1943*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Adam McKeown, “Ritualization of Regulation: The Enforcement of Chinese Exclu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8 (April 2003): 377—403.

的种种努力不仅意在确保在美的居住和工作权利，更显示出整个群体的强劲生命力，是一种强化群体认同、突出对外身份之举。在无法获得公民身份的背景下，文化身份成为华人群体追求的主要目标。强化群体内部的文化认同从而变得尤其重要。有鉴于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坚持孔子信仰是华人构建群体认同的有效手段之一。

本章谈论的华人涵盖所有在美的中国人，其中既有以合法身份进入美国并作停留的外交官和学生，也有人数更众并屡遭排斥的中国移民和劳工。外交官、学生以及定居美国的华人精英受过良好教育，能够敏锐觉察文化传统对于群体生存的意义，因此是孔子信仰的积极倡导者。大多数中国移民和劳工则是出于维护自身存在的本能意识，在各种仪式和行为中实践着对于孔子的尊崇。倡导与实践并不一定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却相互呼应，互为补充，见证着华人在美国排华最剧时期的群体认同感。

一、强化孔子自豪感

在排华的总体背景下，与中国有关的一切事物均被打上低劣的烙印，在美华人的群体自信遭受严重冲击。欲延续华人群体的存在，必先强化自己不输于人的信心。孔子思想不仅凝聚着中华文明的精髓，它同时也与西方的精神信仰难分伯仲。因此，强化华人的孔子自豪感不失为凝聚华人、驳斥排华谬论的有效手段。

积极宣扬孔子首当其冲者，当数曾为晚清驻美公使的伍廷芳（1842—1922）。清末民初的中国积弱成疾，国力衰败，外交上自然难得他国尊重。但晚清八位驻美公使却无一怯场，皆为中国和华人权利据理力争。他们积极与美方交涉，捍卫中国和华人利益。^[1]但就报纸的关注程度而言，伍廷芳无疑远在他人之上。《华盛顿邮报》甚至认为，

[1] 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120—370页。

伍廷芳被报纸谈论的频率超过东方国家出使美国的任何外交官，即使来自欧洲的外交官也没有几人能望其项背。^[1]这应主要归功于伍廷芳在晚清驻美公使中卓尔不群的英文驾驭能力以及香港律师生涯所练就的雄辩口才，“即使最刁钻的记者也不是他的对手”。^[2]

伍廷芳，字文爵，祖籍广东新会，于1896—1902年和1907—1909年两度出使美国。为捍卫中国和华工的正当权利，伍廷芳四处演讲，大力颂扬孔子思想，以图增强华人信心，提升美国的中国形象。伍廷芳直言不讳地宣布，“这个国家（美国）的人们对于孔子思想的理解支离破碎，我的任务就是要用尽量简洁的方式加以阐释”。^[3]因为如此，《波士顿环球报》视伍廷芳为美国“国内牧师的一大丑闻”，“他正在引诱（美国）儿童阅读孔子著作”。^[4]多数美国人视孔子思想为宗教。伍的演讲因其巨大感染力，似有侵蚀美国宗教领域之势，美国牧师对此却无能为力，故有环球报的上述哀叹。也因为“儒教=宗教”的思维定式，美国媒体称，宣扬孔子的伍廷芳是“中国迄今派往国外的最优秀的传教士（missionary）”，敢于提出质疑者遭到伍廷芳的“公开羞辱”。^[5]某些美国人在媒体上的激烈反应恰恰说明，伍廷芳赞美孔子之举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给美国人的文化优越心理造成了震撼。

美国主要报纸就伍廷芳的几次主要演讲进行了跟踪报道，使我们有机会目睹伍廷芳颂扬孔子的热情。1899年10月，国际商贸大会在费城举行。伍廷芳应邀发言，开门见山地引用孔子“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语录，引起与会代表的共鸣，

[1] “Wu Ting-fang’s Biting Repartee Has Gained Him Many Enemies,” *Washington Post*, Oct. 6, 1907: SM3.

[2] Linda Pomerantz-Zhang, *Wu Tingfang (1842–1922):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103.

[3] “Wu Replies to Criticism,” *New York Times*, Dec. 12, 1900: 2; “‘The Chinese View,’ According to Wu,” *Los Angeles Times*, Dec. 13, 1900: 12.

[4] “Townsend’s Say,” *Boston Globe*, Dec. 30, 1900: 29.

[5] “Minister Wu’s Ethics,” *Washington Post*, Jul. 26, 1901: 6.

欢呼声长达几分钟。^[1]在1900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伍廷芳盛赞孔子首倡的“黄金准则”，称其适用于现代人际和国际关系。^[2]1900年11月，卡内基学院在第五个创建者日举行盛大招待会，伍廷芳前往出席。其演讲认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之说让中国道德体系的完美程度堪比世界任何地区。^[3]在伍廷芳眼里，孔子学说不仅代表着人类精神领域的最高境界，而且还与美国人奉为主臬的华盛顿告别演说本质相通。^[4]

引起媒体更大关注的则是伍廷芳于1900年12月10日在纽约所作的演讲。此次演讲为伦理修养协会（Society for Ethical Culture）举办，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伍廷芳以“孔子的教诲”为题，阐述了孔子思想相对于西方精神体系的优势，并且表示相信，“世界正逐渐向孔子靠拢”。^[5]主要报纸对伍廷芳的此次演讲加以全文或大部分转载。^[6]时隔一个月之后，伍廷芳在费城园艺厅发表演讲，回应上述演讲引发的争论，矛头直指那些不愿正视基督教的缺陷、却肆意攻击孔子学说的美国人。如果儒家思想果真一无是处，“它在2400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拥有成百上千万的信奉者就是一件令人感到惊奇的事情

-
- [1] “Ex-Speaker in Chair,” *Washington Post*, Oct. 14, 1899: 3; “Ex-Speaker Reed Presides,” *New York Times*, Oct. 14, 1899: 2.
- [2] “China: A Dozen Interesting Articles Dealing with Problems in That Country,” *New York Times*, Oct. 27, 1900: BR3.
- [3] “Founder’s Day at Carnegie Institute,” *New York Times*, Nov. 2, 1900: 1.
- [4] Wu Ting Fa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pen Door,” *Chicago Tribune*, Apr. 15, 1900: 41.
- [5] “Wu Picks Flaws in Gospel: Confucius and Christ Compared to the Glory of the Former,” *Washington Post*, Dec. 10, 1900: 4. 伦理修养运动为美国教育家费利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于1876年在纽约发起，主张人生应置伦理目标于神学等考虑之上。
- [6] “World Gradually Coming to Confucius,” *Boston Globe*, Dec. 10, 1900: 7; “Wu Sees Flaw in Christianity,” *Chicago Tribune*, Dec. 10, 1900: 2; “A Defense of Confucius,” *Boston Globe*, Dec. 11, 1900: 6; “Christ and Confucius Compared by Wu,” *Los Angeles Times*, Dec. 11, 1900: I5.

了”。^[1]至于华人自身,伍廷芳有意在纽约建立学校,“教授宗教内容”,避免当地华人“偏离孔子信仰”。^[2]与此同时,伍廷芳积极倡议在纽约修建孔庙,以让在美华人精神有所依托。孔庙将耗资 10 万美元,为纽约华人社交聚会、宣讲和聆听孔子教诲的场所。伍廷芳坦言,孔庙兴建望能促进华人团结,改变美国人眼中一盘散沙、缺乏文明迹象的不良形象。^[3]

另一名致力于强化孔子优越性的华人是黄清福。1868 年,17 岁的黄清福作为学生,被传教士带到美国。黄完成学业后回到中国,但因政治原因遭清政府通缉,被迫于 1873 年借道日本,再次赴美。其后二十年间,黄清福投身于传播中国文化、争取华人权利的活动之中。他在 1883 年创办纽约第一份中文报纸《华美新报》(*Chinese American*),翌年成立第一个美国华人投票协会,1892 年组建“华人平等权利联合会”(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要求美国政府废除排华法案。^[4]《华美新报》仅存在 9 个月。^[5]虽然如此,黄却从中看到了报刊杂志的强大舆论力量。尔后,他在芝加哥《华人新闻》(*Chinese News*)任编辑,并在众多影响甚广的杂志上撰文,“为他的人民工作”。黄清福“在所有方面都已美国化,但却坚守着自己的宗教”,即孔子信仰。^[6]

黄清福赞美孔子及其学说可谓不遗余力。其中引起舆论广泛关

[1] “Wu Replies to Critics,” *New York Times*, Jan. 28, 1901: 2; “Wu Answers Critics,” *Washington Post*, Jan. 28, 1901: 1; “Chinaman to Christians,” *Los Angeles Times*, Jan. 28, 1901: 4.

[2] “A Mohammedan Mosque for New York Backsliding Celestials,” *Atlanta Constitution*, Jun. 21, 1895: 10.

[3] “\$100 000 Temple for Chinatown,” *New York Times*, May 6, 1908: 1; “Minister Wu Takes Trip to Chinatown,” *New York Times*, May 7, 1908: 6; “Chinese Given Advice by Minister Wu,” *Chicago Tribune*, May 7, 1908: 7.

[4] Judy Yung et al., eds., *Chinese American Voices: From the Gold Rush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70.

[5] Arthur Bonner, *Alas! What Brought Thee Hither?: The Chinese in New York, 1800—1950* (Madison,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53.

[6] “To Open a Temple,” *Chicago Tribune*, Dec. 13, 1896: 45.

注之事主要有二。1887年，身在纽约的黄清福在《北美评论》杂志上发表“我为什么是异教徒”一文，此为其一。文章面世之后引发各大报纸竞相摘登和评论，足见影响之大。黄在文中赞扬孔子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让中国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优于基督教世界。基督教徒则夸夸其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文章末尾，黄声称，自己乐于始终是异教徒，并且“真诚邀请美国的基督徒皈依孔子”。^[1]黄的文章引起各方关注和评论，宣扬孔子思想的目的显然已经达到。比如，《纽约时报》评论曰，黄文与其他文章一道，极大地扭转了《北美评论》近来在保持优良传统方面出现的“倒退趋势”。黄文值得“拿起该杂志的每一个人阅读”。^[2]《洛杉矶时报》也认为，黄清福的文章“值得反复咀嚼”。撰文作者称赞黄是“极其聪明的人”，代表着教会之外一个“十分庞大而又极具智慧和影响的阶层”。美国人应该反思：黄在美国很久，但为何未被基督教感化，反而呼吁人们皈依孔子；谁又能反驳黄对基督教的批判？^[3]

在芝加哥建立孔庙是黄清福传播孔子思想、培养华人孔子自豪感的另外一大举措。黄清福称建庙之举为“传教运动”。孔庙一旦建成，“芝加哥能够，而且必须，皈依儒教”。^[4]《芝加哥论坛报》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1896年12月1日，论坛报宣布，一个月之内，“为孔子而建的庙宇”将在市中心落成，黄清福将成为“主要神职人员”。^[5]12日的论坛报报道，黄清福将在第二天“隆重宣告美国孔子思想新时代的到来”。除了建立孔庙，黄还计划创办月刊，作为“孔子思想的舆论工具”。^[6]13日的论坛报赫然印着“黄清福开讲圣道孔夫子”几个

[1] “Why Am I a Heathen?: A Chinaman’s View of the Religions of the World,” *Los Angeles Times*, Aug. 17, 1887: 12.

[2] “The August ‘North American,’” *New York Times*, Jul. 28, 1887: 4.

[3] “‘The Heathen’: Observations on the Ideas of Wong Chin Foo,” *Los Angeles Times*, Sept. 4, 1887: 11.

[4] “Confucianism in Chicago,” *Boston Globe*, Dec. 2, 1896: 6.

[5] “For a Temple in Chicago: Wong Chin Foo Is the Local Chief Priest of Confucius,” *Chicago Tribune*, Dec. 1, 1896: 1.

[6] “Plants Confucian Ideas Tomorrow,” *Chicago Tribune*, Dec. 12, 1896: 6.

中文大字。当晚，孔庙终于“在黄清福主持下举行落成仪式”，有望成为“芝加哥居民皈依儒教信仰”的场所。^[1]19日，黄清福暂时关闭芝加哥孔庙，前往其他城市“宣传孔子的道德教诲”，并在数家杂志撰文，阐释孔子思想。^[2]《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评论称黄清福建庙之举为“美国历史上最为奇怪的征讨行动”，其目的在于“让我国公民皈依儒教”。^[3]

积极为孔子及其思想争取一席之地的在美华人不限于上述两位声名显赫者，其他华人，不论精英或是地位普通者，亦有不时撰文赞扬孔子之事。20世纪初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就是如此一人。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中，顾盛赞孔子开创了“民众主权”的先例。^[4]晚清驻美公使梁诚认为，孔子思想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招摇品性”对照鲜明。^[5]中国驻纽约副领事称赞孔子率先阐述了黄金准则，基督教仅仅“促进和发展了中国伟大导师的学说”。^[6]虽然不通英文，中国公使团一等秘书仍然在一次国际思想大会上让人代为宣读发言，赞扬孔子的人类行为学说。^[7]中国公使馆的另一职员则在参加一次宗教活动时表示，孔子实际上相信善恶报应，他因此早于圣经宣布了上帝惩罚罪恶的观念。^[8]

普通华人捍卫孔子的热情丝毫不亚于地位较高者。例如，名叫阿布·李·亨特 (Ab Li Hunt) 的中国人于1888年在华盛顿成立克利夫兰中国俱乐部 (Cleveland Celestial Club)，宣扬孔子思想。他因此被

[1] "To Open a Temple," *Chicago Tribune*, Dec. 13, 1896: 45.

[2] "Will Close the Confucian Temple," *Chicago Tribune*, Dec. 19, 1896: 6.

[3] "Now the Chinese Will Endeavor to Convert Us to Confucius," *Atlanta Constitution*, Dec. 20, 1896: 29.

[4] "China's 'Vox Populi,'" *New York Times*, Feb. 18, 1912: 12.

[5] "China's Policy of Peace,"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04: 4; "China Aims for Peace," *Washington Post*, Dec. 18, 1904: A5.

[6] "Chinese View of America," *New York Times*, Mar. 10, 1902: 8.

[7] "Doctrines of Human Brotherhood," *Chicago Tribune*, Sept. 14, 1893: 9.

[8] "Hell as It Is Preached," *Chicago Tribune*, Jan. 18, 1891: 31.

称作“追随孔子的先锋”。^[1] 谢姓华人在《波士顿环球报》撰文声称，孔子学说比任何其他思想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2] 中国第一位留美女大学生金雅梅（1864—1934）也是孔子的赞扬者。金雅梅在1904年10月举行的纽约和平大会上发表演讲，称赞孔子教诲之下的华商“正直、诚实、公正”。美国劳工“在某些方面可以向我们学习”。^[3] 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生波林·张（Polling Chang）极力维护孔子创立的教育体系，认为其完备程度堪与现代西方教育媲美。^[4] 哥伦比亚大学的另一中国学生 C. H. 朱（C. H. Chu）就“泰坦尼克”号悲剧发表评论称，男人率先逃生的情形不可能发生在中国人身上，“孔子的所有教诲都强调自我牺牲，帮助他人”。苟且偷生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5] 张姓作者“全面攻击我们整个社会、政治和工业体系”，要求西方人先“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学习孔子”。^[6]

可以看出，虽然华人在世纪之交的美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弱势群体，但他们并未就此沉沦，而是积极利用孔子的巨大影响力，驳斥贬损华人的谬论，强化华人的群体自豪感。驻美公使、华人精英和中国留学生，他们是中国接触西方文明的先驱。很多人回国之后，成为中国求新图变、摆脱传统桎梏的主力军。国家的兴旺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但在美国，强烈的文化碰撞和排斥华人的种族环境却让他们最为深切地领悟到，文化根源与群体形象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裂的关系。种族歧视和群体生存是在美华人面临的最大挑战。于是，他们以溢美之词称颂孔子，彰显华人的独特群体认同，试图改变美国人的文化偏见，为更好地争取华人权利营造舆论氛围。

[1] “General Capital Gossip,” *Chicago Tribune*, Oct. 8, 1888: 2.

[2] E. L. Hsieh, “Mistakes of the West,” *Boston Globe*, Nov. 28, 1909: 46.

[3] “Little Oriental Lady Who Won Peace Congress,” *New York Times*, Oct. 16, 1904: 9. 金雅梅，原名金阿美，又名金韵梅，浙江宁波人，幼年随传教士赴美，毕业于纽约女子医科大学，后回国，在天津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开近代中国公立护理教育之先河，是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导师。

[4] “China as Field for Education Work,”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 18, 1918: 16.

[5] “Says Chinese Are Heroic,” *Chicago Defender*, Aug. 31, 1912: 8.

[6] “A Chinese View of England,” *New York Times*, Nov. 7, 1897: 4.

二、习俗中的尊孔之举

在尊崇孔子方面，普通华人固然没有上文论及的激昂情绪。他们同样浓厚的孔子情结融入了周而复始的生活习俗之中。这种融合与精英阶层的宣传鼓动遥相呼应，共同体现着华人独有的认同模式。事实上，报纸报道的某些华人习俗与孔子并无直接关系，只是由于华人在这些仪式行为中流露出的强烈的尊孔意识，以及受过良好教育者竭力捍卫孔子之举，报纸极其自然地将华人的生活习俗与孔子联系在一起。华人的孔子信仰在循环往复的习俗中得到强化，成为华人群体认同的核心标志，引导着美国报纸解读华人特性。

对于海内外的华人而言，农历新年是最为重要的节日和最为庄重的仪式。身在美国的华人尽管地位低贱，传统习俗却不马虎。此时的孔子尽显庄严与神圣，媒体常以孔子为切入点，解释华人一丝不苟的新年习俗。新年除夕，中国城“忠实地”进行着据称源自孔子时代的仪式：张灯结彩、门贴对联、开门迎客、偿清债务等。报纸从中看到了“辫子居民……让种族传统永恒的明显愿望”。^[1]在觥筹交错之际，华人绝对不会忘记在“所有商店最为显眼之处”贴上奥布里·比尔兹利（Aubrey Beardsley）风格的孔子招贴画。孔子威严尽显，胡须浓密，手摇花扇。有些画作甚至还出现了孔子夫人的身影。^[2]比尔兹利是19世纪后半期英国著名的插图画家。美国印制、西方风格的孔子画很难忠实于孔子的本来面目。但正是由于华人在新年来临之际对于此类画作的大量需求，印刷商才会加以生产。华人注重的是孔子作为精神载体的意义，而非孔子的面貌本身。由此便有了上述形象的孔子画。这也恰恰证明，孔子与华人群体认同密不可分。巨幅孔子画像还是华人庙中神龛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华人在新年期间必定进庙上香，既朝拜诸神，更祭拜孔子。首都华盛顿就有如此神庙，“为众

[1] “Music and Incense,” *Boston Globe*, Feb. 5, 1894: 4.

[2] “Joy among Chinamen,” *Washington Post*, Jan. 23, 1898: 2.

多华盛顿居民所熟知”。我们可以设想孔子与华人群体特性在华盛顿人心中的联系是何等紧密。^[1]

1899年春节，“恭贺发财”四个汉字赫然出现在《亚特兰大宪法报》上。这正是“善良而孝顺的孔子子孙”贴在大门之上的祝福。华人衣着面貌一新，门不上锁，欢迎任何人进屋，共享快乐和美食。他们还遵照孔子教诲，在神灵面前上香许愿，极尽虔诚，祈祷来年“心情愉快，财源广进”。^[2]早期移居美国的华人以广东人居多，诸如“恭贺发财”等广东方言祝福逐渐成为整个华人社会的新年道贺用语。美国报纸本有将华人所有特征归因于孔子的一贯做法，“恭贺发财”被视为孔子的发明就不足为奇了。华人相互“恭贺发财”成为他们“孝顺”孔子的体现。《芝加哥论坛报》更是认为，虽然“恭贺发财”是华人在春节期间百说不厌之语，但“唯有在还清债务并因此获得孔子恩惠”的前提下，华人才能如此这般地逢人道贺。^[3]除此之外，欢度农历新年的华人还必须完成“真正的孔子追随者无法回避”的其他义务，如相互表达好客之意，进庙烧香许愿，晚辈给长辈磕头等。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的天气会让华人更感喜庆，因为按照“孔子信念”，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4]尽管诸多习俗并非与孔子直接相关，媒体仍然习惯于将根深蒂固的华人新年仪式归因于孔子。华人恰恰又对孔子顶礼膜拜，孔子与华人群体认同的关系便在新年的节庆气氛中得到了强化。

在一年当中的其他节日习俗中，孔子均是灵魂和规则制订者。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周而复始的节日就是华人以孔子为核心建构和强化群体认同的过程。元宵之夜，遵循“孔子原则”的华人点燃檀香，燃放鞭炮，在烟熏火燎中驱逐大小鬼神。华人庙宇决不允许“讥笑孔子崇拜的……基督‘猪’”入内捣乱，以免神灵犯怒，“吞噬孔子门徒”。^[5]

[1] “New Year of Chinese,” *Washington Post*, Feb. 2, 1903: 2.

[2] “The Department of the Gulf,” *Atlanta Constitution*, Feb. 11, 1899: 10.

[3] “Chinese New Year Tomorrow,” *Chicago Tribune*, Feb. 14, 1904: 8.

[4] “Chinatown’s Feast Day,” *Washington Post*, Feb. 14, 1907: 3.

[5] “Propitiation of the Great Dragon,” *Los Angeles Times*, Feb. 21, 1901: 7.

中秋节是华人用以强化认同与孔子联系的另一契机。据《纽约时报》，中秋节正是为“纪念孔子的荣耀”而设。相传数个世纪之前，某个月圆之夜，中国人想吃点心。善解人意的月亮即刻送来很多饼子。“聪明的孔子”便要求其追随者每年都要纪念“卫星的恩惠”。因此，庆祝中秋既是感恩，亦是尊崇孔子，以显华人特性。^[1]

婚丧嫁娶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生活程序。每当诸如此类的仪式降临华人群体，他们多以美国人理解的孔子要求为纲，应对着循环往复的代谢与繁衍。1896年6月29日，芝加哥中国城一片欢腾，庆祝李恭（音）和芳龄二十四的德裔小姐安妮·史密斯（Annie Smith）新婚之喜。虽然身在美国，两人的婚礼却是按照“孔子礼仪”举行的。^[2]即使撒手人寰，华人依然与孔子紧密相连。大凡有华人葬礼在美国公墓举行，送葬者都会沿途撒下中有小孔的纸钱。《华盛顿邮报》解释曰，此举为孔子教诲使然。为了让正在远去的灵魂免于恶鬼骚扰，孔子特做“明智规定”如下：死者的朋友可撒上述纸钱，待恶鬼从钱中小孔爬过，死者魂灵已经远去。^[3]在华人葬礼上，送葬者还会在死者坟头摆上供品，点燃蜡烛和檀香，“大量写着孔子箴言的红纸白纸化作一堆火焰”，以图吓走恶鬼。^[4]某些葬礼除了常见的供品之外，还有蓝色的丝质经幡，上书死者生前善事，佐之以孔子语录。^[5]更有一定数量的华人不愿安葬他乡，期望遵循孔子教导，叶落归根。旧金山一位华人医生惨遭抢劫者毒手，临死之前关照身边人，切记将其送回“孔子国度”。他随后头枕将用于送其返乡的钱财而卒。^[6]

从新年到葬礼，华人没有因为身在美国而减弱尊崇孔子的程度。不仅如此，愈演愈烈的排华浪潮使华人群体陷入空前孤立，他们别无选择，唯有突出自己的文化特性，群体身份才不至于湮灭在美国社会

[1] “Mott Street’s Moon Feast,” *New York Times*, Sept. 28, 1890: 9.

[2] “United to a Chinaman,” *Chicago Tribune*, Jun. 30, 1896: 1.

[3] “A Chinese Funeral,” *Washington Post*, Nov. 26, 1893: 13.

[4] “The Burial of Ah Mon,” *New York Times*, Jun. 10, 1885: 8.

[5] “Chinese Mason’s Burial,” *New York Times*, Apr. 10, 1900: 9.

[6] “All for Love,” *Los Angeles Times*, Apr. 14, 1898: 9.

的口诛笔伐之中。孔子崇拜得到强化，成为华人加强群体认同的核心举措之一。华人遵循孔子之举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媒体解析华人特性便通常以此为突破口。正因为坚定的孔子情结，华人对于哥伦布到达美洲 400 周年的庆祝活动“兴趣寡然”。他们“似乎”认为，哥伦布的伟大程度“不及孔子的一半”。^[1]

三、社会生活中的孔子与华人群体认同

从报纸反映的情况来看，华人以孔子为核心的群体认同意识并不局限于摇旗呐喊和重大仪式等让人即刻关注的领域。即使在不易觉察的社会生活方面，尊崇孔子同样是界定华人认同特征的关键依据。上文提及的伍廷芳和黄清福在纽约和芝加哥募集资金、修建孔庙之事，其目的就在将华人的尊孔行为固定化和日常化。华人生活中的原则与禁忌、教育与习俗，无不显示着孔子的绝对权威。

自 1851 年始，会馆一直在华人社会行使着与政府类似的角色。后以六大会馆（Six Companies）为基础成立的中华会馆更是华人社会内部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华会馆以孔子的名义约束和惩戒华人，加深着外人眼中孔子与华人身份的联系。加利福尼亚地区的美国国内税务官约翰·C. 奎因（John C. Quinn）便将中华会馆的权力归结为孔子巨大而无形的影响力。奎因解释道，如果华人拒不服从中华会馆，会馆的应对措施有四。首先，不服从者会遭到群体排斥。其次，如果此人经商，其生意将毁于一旦；如果务工，他将无人雇用。第三，他无权在生病期间或者经济困难时获得帮助。第四，此人死后只能安葬异乡，遗骨不能运回中国。四大措施条条严厉，步步升级。最后一条尤其具威慑力，因为这标志着，此人“被永远排斥在孔子的天堂之外”。^[2]

[1] “Republican Protection vs. Democratic Free Trade,” *Chicago Tribune*, Oct. 12, 1892: 4.

[2] Frank G. Carpenter, “The Organized Celestials on the Pacific Coast,” *Los Angeles Times*, May 28, 1893: 17; “Celestials Organized into Six Companies on the Coast,” *Chicago Tribune*, Jun. 14, 1893: 13.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华人选择在美国安葬。但那是出于自愿,并有孔子语录相伴通往天堂之路。不服从中华会馆者被强行剥夺了选择权,去世后也不会有孔子语录伴其左右。最为严厉的惩罚措施表明,会馆将孔子的恩惠当作了区分群体异己的标准,以奎因为代表的旁观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

与中华会馆的强制措施相应,华人自发形成的群体规范也多以孔子为据。例如,孔子要求人们尊重死者,但洛杉矶华人阿林(音)却不以为然,结果遭到该市整个华人群体的排斥。事情的缘由是,阿林的叔叔刚刚去世且尚未入殓,阿林便设法弄到一纸财产扣押令,将叔叔的财物据为己有。由于触犯孔子制定的神圣戒律,阿林遭到整个唐人街的不屑,其生意也被抵制,“中国城愤怒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怒火被点燃,对阿林的诅咒劈头盖脸”。^[1] 又一个例子是,“孔子的所有教诲”都反对自杀行为,但西方人却视自杀为“逃避困难的简便途径”,因此可以接受。随着自杀丧生的华人逐渐增多,华人社会意识到,强化孔子针对此类行为的约束力势在必行。西海岸的华人将因此开展抵制自杀行为的运动。^[2] 深受孔子学说熏陶的华人甚至对于曾经见证自杀行为的房屋都唯恐避之不及。洛杉矶北大街418号的旅馆因此不再受到华人的青睐。据报道,获知有华人在此旅馆上吊身亡之后,所有的华人房客以最快的速度离开,“永不回来”。因为孔子的教诲,中国人相信,此地将“永遭诅咒”。^[3] 中国茶叶闻名遐迩,以茶待客的方式随之成为美国人眼中的华人群体特征之一,而这同样据称与孔子有关。《华盛顿邮报》记者阿伦·福曼(Allan Forman)认为,只要茶水免费,那必定是中国人之所在。福曼转述孔子的话说:“无论是谁,只要向需要者提供一杯茶,他就是在行善,将在逆境中获得他人帮助”。所以,你随便走进一家华人餐馆、理发店、杂货店、赌场和烟馆,“总有一壶热茶恭候着需要饮茶之人”。^[4]

[1] “A Chinese Boycott against Ah Lam,” *Los Angeles Times*, Mar. 25, 1901: 10.

[2] “Suicides Arouse Chinese,” *Los Angeles Times*, Dec. 10, 1915: II5.

[3] “Chinese Flee Suicide House,” *Los Angeles Times*, Nov. 2, 1915: II3.

[4] “New York’s China-town,” *Washington Post*, Jul. 25, 1886: 5.

孔子在群体认同中保持核心位置还有赖于教育等文化传承手段。19 世纪后半期来到美国的第一代华人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其孔子情结是自发的，无需再次经历学校教育的洗礼。谋生困难也让他们无暇他顾。然而，随着在美出生的华人后代逐渐增加，外加随外交官和商人来美的华人子女，第二代华人在 20 世纪初渐露雏形。第二代更愿接受美式教育，以便迅速融入美国社会。孔子信念有被削弱乃至中断的危险，华人子女的传统文化教育始受广泛重视。^[1] 其实，早在 1874 年，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就 在其美国驻地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 (Hartford) 建立了中文学习班，以免留美儿童忘记祖训。这是最早的华人学校之一。随着 1881 年幼童留美项目的终止，学习班自然解散。该校仅针对留美幼童，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的教学模式却被其他学校保存下来，得以不断巩固。^[2] 教育因为突出孔子而密切了与华人认同的关系。到华人第二代的规模不断增大的世纪之交，全美各大华人聚居区均已建有中文学校，且有中国政府背景。芝加哥的中文学校着力“培养学生热爱中国政府，热爱中国的伟人，热爱孔子宗教”。学校教师如果因为身处美国而皈依基督是“不明智的”。^[3] 纽约的中文学校同样由中国政府和在美华人富商联合建立，旨在增强华人下一代的文化根源意识。入校学习的儿童习文练字，“诵读孔子语录”。^[4]

教育的效果如何尚无资料加以说明，但尊孔教育并不局限于华人儿童和少年却是肯定的。据报道，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生在 1907 年成立了传播孔子思想的协会，他们因此被称作“中国圣人的追随者”。该组织结构合理，目标明确，计划定期举行宣传孔子

[1] Takaki,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257—58.

[2] H. Mark Lai, *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 A History of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 (Walnut Creek, CA: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272. 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推动下，从 1872 年开始，共有 120 名中国幼童赴美留学，学习中国急需的近代科技，1881 年终止。詹天佑和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均在赴美幼童之列。

[3] “Chinese Government School in Chicago,” *Chicago Tribune*, Nov. 28, 1909: 15.

[4] “Chinese School Graduation,” *New York Times*, Jul. 16, 1910: 6.

的活动。^[1]对于那些无缘学校教育和专业协会熏陶的华人，唐人街的中国戏院则是“定期教授孔子哲学”的学校。每周两次，戏院上演讲述中国古老道德和辉煌历史的戏曲。这是华人社会活动的真正中心。如果华人在唐人街寻找朋友，他首先应该去的地方就是戏院。可见传授孔子伦理的戏剧在华人当中的影响力之巨。^[2]

报纸反映出的华人加强群体认同的努力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文化传承融入了琐碎的生活细节之中。作为上个世纪之交的最主要传媒，报纸报道的根本意义在于，它见证着华人群体特性给白人社会留下的深刻印象。旁观者的解读也许更能说明认同建构的实际效果和认同的本质。因为孔子在中国内外的深远影响，美国媒体习惯于称呼华人为孔子的门徒或子孙。此种现象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排华高峰期尤盛。无处不在的排斥与歧视既让华人群体陷入空前的孤立状态，也使很多试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心灰意冷。在此背景下，华人强化内部认同以彰显自己的存在更显迫切。延续和强化孔子的文化核心地位成为极为关键的内部凝聚手段和群体外部特征。华人精英和知识分子与孔子的诋毁者唇枪舌剑，极力证明华人信仰的优越，改变美国白人社会对于华人文化传统的蔑视。普通民众则在各种仪式活动中遵循所谓的孔子礼仪，在禁忌、习俗、行为规范和教育等社会生活领域以孔子为据。凡此种种，意在增强华人群体的凝聚力和生存能力。报纸的关注和以孔子为突破口解析华人行为的举动显示，美国人眼中的华人就是一个围绕孔子建构而成的族裔群体。这印证了华人构建独特群体认同的成功，由此产生的向心力是他们能够在排华高峰的逆境中生存下来的根本保证之一。

[1] "Pagan Worship in the States," *Los Angeles Times*, Aug. 14, 1910: 17.

[2] "Chinatown's Strange People and Their Strange Ways," *Washington Post*, May 14, 1905: G10.

第五章

孔子与排华高峰期的华人怪癖

在排华高峰期，华人的任何言行都可能成为美国人嘲笑的对象。华人的某些嗜好被夸张放大，演变为美国人竞相鄙夷的华人群体特征。但凡有讽刺华人嗜好的文字在报纸出现，孔子必定相影随行，或者是华人“怪异”行为的根源，或者是此类行为的借口，折射出华人及其文化象征在美国的低劣处境。

一、赌 博^[1]

赌博实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绝非华人群体的独有爱好。但在排华高峰期的美国报纸上，华人赌博并因赌博被警察抓捕之事频繁出现。不断曝光的华人聚众赌博与在华美国人的中国印象遥相呼应，共同塑造着“华人低劣”的种族偏见。孔子在此类报道中充当着赌博袒护者或教唆者的角色，报纸借机贬损中国的文化根源。

报纸披露的华人赌博方式中西通融，既有中国传统模式，亦有对于欧美形式的借鉴，客观上为白人社会有关华人品性堕落的成见营造

[1] 有关美国早期华人赌博的总体情况，参阅潮龙起：“危险的愉悦：早期美国华侨赌博问题研究（1850—1943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41—52页。

了声势。中国象棋本为娱乐之用，但在美国报纸上，却变成了华人的赌博工具。19世纪80年代，波士顿中国城的规模较小，无法支撑专业赌场的运转。无需较大场地和众多参与者的象棋顺应时宜，被当地华人用作赌博途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取得堪称象棋“专家”的一位“孔子杏眼后代”的信任，进入其“名副其实的地下住所”，见识中国象棋的庐山真面目。记者描述中国象棋的特点之后，笔锋一转，点明其赌博用途。李姓“专家”颇为得意地告诉记者，自己从未碰到过不带赌博性质的象棋比赛。记者由此推断，“所有中国人都是顽梗不化的赌徒，如果没有输赢目标，他们不会轻易显露身手”。^[1]中国纸牌是另外一种常见的华人赌博工具。在接到居民频繁投诉之后，纽约布鲁克林的警察突袭了当地一家华人赌博场所。藏匿于地下室的“孔子门徒……低劣的中国人”聚集在屋子中央的桌子周围，手握“书写着奇异象形文字的条形卡片”，赌博正酣。参与者悉数被抓。^[2]

华人似乎在掌握西洋赌博工具方面也有很高悟性，能够做到得心应手。1900年的一次警察行动表明，首都华盛顿的华人已经“开始喜欢”美国扑克，因为在扑克赌博中，“钱的转手速度更快”。此次捣毁的赌博场所位于一家华人卷烟作坊内，八名“孔子的杏眼子孙”被捕。^[3]华人在赌博技艺方面触类旁通，创造了中西合璧的赌博方式。在1907年的一次搜查行动中，华盛顿警察抓住了40名正在进行“番摊、西洋骨牌和纸牌”赌博的中国人。番摊是中国传统赌博方式，骨牌和纸牌则肇始于欧美。在报纸的描述中，华人被捕后神态怪异，行为滑稽：手舞足蹈、上窜下跳、夺路而逃、以头撞墙、厉声哀嚎，各种反应，不一而足。更有甚者，华人赌博者呼天抢地，“以东方人怪诞的齐声说唱方式，呼唤孔子前来相救”。^[4]在此事件中，报道者其实并不知道华人口中所喊为何物，而是先入为主地认定，孔子就是华人赌徒期望的救星。孔子因此被刻画为赌博的赞同者。

[1] “Celestial Chess,” *Boston Globe*, Aug. 25, 1889: 18.

[2] “A Chinese Gambling Hell,” *New York Times*, Oct. 2, 1883: 8.

[3] “Chinamen Caught at Poker,” *Washington Post*, Aug. 20, 1900: 2.

[4] “Chinamen Are Raided,” *Washington Post*, Oct. 7, 1907: 2.

突出华人赌博嗜好的报纸文章有两个共同特点。其一，孔子与赌博如影随形，赌博者或者被称作孔子的子孙或门徒，或者被视作孔子的袒护对象。虽然撰文者未能提供可以证明孔子与赌博存在联系的丝毫证据，报道的引导功能足以让读者相信，事实即是如此。孔庙之内赌博盛行，更让孔子与赌博难脱干系。19世纪80年代的波士顿华人社区规模极小，但到20世纪初，规模不仅扩大，还拥有孔庙。然而，据《波士顿环球报》，本应见证虔诚信仰的孔庙却聚集着华人赌徒，掩盖着与道德生活背道而驰的不端行为：“孔庙没有用于崇拜古老而睿智的哲学家（孔子）所推荐的任何神灵，而是用于赌博。”当警察冲入孔庙最为隐蔽的房间，赌博者正试图在锅中融化骨牌。报纸充满讥讽地写道，平时一脸悲戚的中国人看来已经改弦更张，不再信奉孔子思想，转而“崇拜幸运之神”。他们得去法庭说明，“以凝固的液体骨牌进行赌博与孔子原则之间存在何种联系”。^[1]

第二，赌博未被刻画为华人的个体行为，似乎是华人的群体特性使然。只要有利可图，无论是否精通，华人都会跃跃欲试。曾有几个白人小孩玩投球游戏，两名“孔子的忠诚子孙”碰巧路过。出于戏谑，小孩让中国人一试身手。中国人首先便问给多少钱。听说“投中一次得一支雪茄，两次十支，三次二十五美分”，中国人的眼睛即刻焕发出异样的光芒。^[2] 报纸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凡是华人足迹所至之处，赌博皆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报纸偶尔选登美国之外的华人嗜好赌博的文章，更是强化了这一信息。《华盛顿邮报》曾转载《伦敦邮报》的一篇文章，描述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华人沉溺于赌博之事。作者甚至声称，华人带自中国的番摊赌博是“其爱国主义的外在而明确的表现”。^[3] 居住在墨西哥尤卡坦地区的中国人则是另外一例。他们同样热衷于番摊，但一旦尝到美国赌博方式的甜头，便一发不可再收。当地开餐馆的阿泰（Ah Toy）在一名美国游客的游说之下，参与

[1] “Hammer Way to Confucius,” *Boston Globe*, Aug. 17, 1915: 10.

[2] “Here and There,” *Washington Post*, Jul. 22, 1894: 3.

[3] “Johannesburg Slums,” *Washington Post*, Oct. 27, 1903: 9.

棒球赌注，获利 600 美元。当初“向孔子牌位发誓”下不为例的阿泰，此时开始埋怨美国人没有劝他买下更大赌注。^[1]

二、彩票

发行彩票本是一种常见的融资渠道。但在美国历史上，政府对于彩票的监管非常严格，更有众多道德主义者激烈反对。^[2]加之在法律上的尴尬处境，华人几乎无法在获得许可的前提下以彩票募集资金。有此背景，不论出于真正的募捐目的或是意在聚敛钱财，卷入彩票之中的华人难逃被警察抓捕的命运。报纸也乐于报道，从而让彩票成为华人在钱财方面有嗜痂之癖的又一证据。孔子照样难脱干系。

孔子实乃令人尊敬的道德家，但在美国报纸的讽刺语境下，受其影响的华人却“阳奉阴违”，屡屡以彩票获取钱财。例如，两名被称作“孔子直系后代”的华人便因私发彩票遭警方拘捕。尽管两人声称是在为埋葬同伴筹措资金，并且法官最终采信了他们的辩解，但反对释放者依然甚众。这表明，更多的美国人认定，两人偷发彩票，实为获取不义之财。^[3]另外一名华人似乎还是学术中人，正在进行莎士比亚和孔子著作的比较研究，其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可谓深矣。但同样因为违反彩票法律而“身陷铁窗之内”。^[4]华人彩票的抽奖程序笼罩着一层神秘莫测的面纱。虔诚的孔子信仰往往是面纱的核心材料。抽奖不仅只有彩票经营者“极为熟悉”的中国人才能目睹，其地点也通常选择建筑物的楼上或里屋。楼下或者外屋聚集着“满脸无辜并且正在从他们的圣经中阅读孔子教义的中国人”。每天一次或两次的彩票

[1] “Yucatan Went Baseball Mad,” *Washington Post*, Aug. 6, 1911: M4.

[2] Lawrence M.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3rd e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7), 79, 261, 446.

[3] “Lottery Charge Fixed on Chinks,” *Atlanta Constitution*, Jan. 20, 1910: 9.

[4] “Grist of Police News,” *Los Angeles Times*, Mar. 9, 1913: II2.

抽奖就在孔子信仰的掩护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 某位“孔子的长辫子后代”在为白人之间的自行车相撞事件作证时答非所问，因为他仍然惦记着如何偷买彩票。^[2] 王姓华人因违反彩票法被判入县监狱 60 天。他以自己不懂英语而被误判有罪提起上诉，终被驳回。站在法院铁门之外观望的华人代表满脸悲戚，“如同刚刚得知孔子的死讯一样”。^[3]

更有甚者，“敛财心切”的华人居然向执法人员兜售彩票。一名“举止懦弱的孔子追随者”就因为向某位副治安官出售彩票，而“领教了法律的威严”。此人认罪，并被罚款 20 美元。^[4] 另一名“眼神温和的孔子门徒”由于同样缘由被拘捕，面临罚款 15 美元或拘留 15 天的处罚。^[5] 不论违法程度，美国的执法者均乐意惩罚出售彩票的华人，从而让本不严重的行为变得猥琐可憎。有时，执法者出于相互攀比心理，还会人为地加重处罚力度。阿王（Ah Wong Quan Shee Bin）就是这样一位不幸落入虎口者。他的主审法官为了与同行进行“得体而有尊严的竞争”，坚持“对卑劣的孔子后代处以大笔罚款”。^[6]

华人私发彩票之事自然存在，但绝非华人独有。报纸不断刊登相关报道，客观上恶化了华人的群体形象。并且，报道刻意突出孔子莫须有的作用，实则对毕生倡导道德和礼法的中国圣人的讽刺。

三、华人的狡黠举动

华人“敛财”，在赌博和私自发行彩票之余，还在各种场合施展“狡黠”本领，试图谋取利益，哪怕是蝇头小利。欺诈的对象既有华人，

[1] “Chinese Gambling,” *Los Angeles Times*, May 25, 1890: 9.

[2] “Telling a Story,” *Los Angeles Times*, Sept. 24, 1901: 4.

[3] “Wong Wing Held,” *Los Angeles Times*, Dec. 19, 1909: II6.

[4] “Ten Little Brownies Up,” *Los Angeles Times*, May 27, 1900: IV2.

[5] “Justice Austin’s Court,” *Los Angeles Times*, Mar. 30, 1899: 9.

[6] “Women Serve on Jury,” *Los Angeles Times*, Sept. 2, 1909: II13.

亦有美国人。不分对象的“狡黠”行为似乎印证着华人贪婪和缺乏理性的“群体”特征。同样，以“狡黠”手段获取钱财者非孔子的门徒或子孙莫属。

相互欺诈是每一个群体都无法避免的现象。但一旦发生在遭受歧视和诋毁的华人中间，其寓意便不可能保持中性，而是演变为备受嘲弄的话柄。此类事件时常出现在报端。芝加哥华人李尚（音）因其同胞查利·辛（Charley Sing）的狡黠，不仅损失钱财，而且被卷入一桩纠纷之中。辛开有一片小洗衣店，生意兴隆，本想攒够一笔钱财后返回中国，颐养天年。但天有不测风云，已经洗净晾干的衣物被偷盗一空。在求助警察和向顾客解释无效之后，辛心生金蝉脱壳之计。他找到新近认识的李，将洗衣店卖给他。不懂英语的李在实地查看洗衣店时，正值顾客向辛索要衣物，辛居然将顾客的威胁言辞解释为对其为人的赞扬。蒙在鼓里的李欣然盘下洗衣店，不料麻烦接踵而至。面对恶语相向的顾客，李只能“不断重复孔子教条，力求少安毋躁”，结果却于事无补。^[1]梅钟（Moy Jung）则是公然招摇撞骗的典型。报纸极尽讽刺之能事，既嘲讽梅钟，更贬损孔子。梅钟假扮美国官员，在北卡罗来纳等地华人中间大肆宣称，如果不向自己缴纳数目可观的钱财，他们就会被送回中国，遭遇不测之灾。听闻此言的华人无不“放下熨斗，冲向最近的神庙”，祈求神灵相助。但紧接着，梅钟“以孔子第29房姨太的第6双鞋发誓”，促使人们就范。而他自己则幻想，在聚敛足够钱财之后返回中国，过着妻妾成群的生活。梅钟最终罪行暴露，成为“联邦监狱中与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混合收押的第一名中国人”。关押之后的梅钟被带至理发店，用钝三把剃刀。“高高的颧骨、小小的杏眼、光光的脑袋”，让梅钟介于“接近于人类的某种东西与某种其他东西”之间，即使身在黄河岸边的高堂老母和最为宠幸的第17房姨太也永远无法将他认出了。报纸指责道，梅钟之所以敢于铤而走险，是因为他来自“孔子思想主导一切、欺骗被视为美德而非

[1] “Clamor for Their Wash,” *Chicago Tribune*, Jun. 14, 1897: 3.

犯罪的天朝帝国”。^[1]好逸恶劳的王吉 (Wong Jick) 作为“孔子的子孙”，终日遐想如何逃避劳作，最终因为“玩弄把戏而被捕”。法官的讯问发现，王居然还在盘算以何种方式骗取远在中国的家庭遗产。^[2]

以上诸条骗术似乎较为平和与文雅，而以下事件却是从欺骗入手、实施暴力抢劫的范例。据称“刷新此前所有记录”的歹徒阿强 (Ah Quong) 居住在洛杉矶。他于中午时分进入阿云 (Ah Yum) 的房子，与房主天南地北地侃了一个小时。阿强警惕地观察着屋内形势，时机一到，便从“神秘的衬衫”内掏出手枪，命令阿云举起双手。他用手枪砸向厉声尖叫的阿云，直至她“如孔子的坟墓一样安静”。阿强随后搜走 87 美元现金、价值 250 美元的耳环以及一副质地上乘的金手镯。阿云苏醒之后立即报警，警察正全力追捕阿强。^[3]

在美国报纸上，华人还对美国人频施欺骗之术。按照《洛杉矶时报》的说法，在美华人掌握了“足够多的诡计，以便在与美国人的交往中，每次都能实施欺骗”。^[4]“善于见风使舵的孔子子孙”经常将自己最明显的标志——辫子——盘在头顶，戴上一顶美国帽子，以便在“野蛮狗”（美国人模仿华人语气的自称）当中生存。^[5]孔子本人被刻画为欺骗他人的率先垂范者。根据杜撰的一则轶事，孔子在成名之前周游列国，曾下榻某高级宾馆。在前台登记姓名时，孔子要求入住带洗澡间的房间。服务员却谨慎地看着他说道：“你看起来像中国人，但名字不像。”孔子“泰然自若”地回答道，如果使用中国名字，“你们就会态度冷漠，并且告诉我，你们不为洗衣工服务”。最终，孔子如愿以偿地得到一间雅致客房。^[6]在一则虚拟的故事中，骗子的秘密

[1] “First Chinese Prisoner Reaches Federal Prison,” *Atlanta Constitution*, Apr. 29, 1904: 6.

[2] “Suffers from Hot Air,” *Los Angeles Times*, Jul. 22, 1904: A2.

[3] “Ah Quong: A Highbinder Beats All Previous Records,” *Los Angeles Times*, Jun. 9, 1887: 1.

[4] J. Torrey Connor, “The Los Angeles of Yesterday and Today,” *Los Angeles Times*, Aug. 8, 1897: 19.

[5] “Quong Gee Lung’s Wrong,” *New York Times*, May 29, 1887: 2.

[6] “In a Minor Key,” *Chicago Tribune*, Nov. 15, 1908: G4.

组织鼓动某中国人加入。起初犹豫的中国人在面壁祷告之后欣然同意，因为“孔子应允了”。^[1]就连中国驻美公使也尽显狡黠。他极为反感美国人谈论中国人吸食鸦片的陋习，更是坚决否认中国驻美使团有此恶习。然而，既熟知孔子又谙悉美国社交礼仪的公使还是在不经意间露出真实面目。在一次招待会上，他看见一位女士耳戴号角状饰物，以为是“通过耳朵使用的新的烟筒种类”。有鉴于此，他“礼貌地要求吸上一两口”。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整个晚上都把号角状饰物抵住耳朵，郑重其事地享受着想象中的鸦片”。^[2]惯于欺骗的美国人不乏其数，但在中国人面前，似乎技逊一筹。芝加哥某珠宝商用自己在“孔子国度”的亲耳所闻，“证实”此条论断。某日，穿戴时髦的美国骗子走进上海一家珠宝店，声称愿以自己的上等珍珠典当一万美元。店主查看以后，付钱收下珍珠。店主聘请的鉴定专家发现，这是一件极为高明的赝品。店主随即召集上海的珠宝商代表，宣布受骗之事，并公开砸烂珍珠。上海诸报纷纷报道，称赞店主的“泰然若定”。一周之后，美国人前来取回珍珠，店主带着“孩子般的微笑”，从保险箱取出珍珠，钱物两清。美国人并没意识到，此珍珠仅是质量更次的赝品，他已经“一败涂地”。^[3]

与“孔子追随者的精明”相比，采取各种措施限禁华人劳工的美国移民官员相形见绌。华人蒙混入境的手段之高明，让移民官员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直至1903年1月法国贝蒂荣人身测定法（Bertillon System）的引进，情形方有改观。^[4]一名从加拿大入境的中国苦力几乎欺骗成功，却因小的疏忽而功亏一篑。此人自称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居民。移民官员将其带至他“以孔子发誓”曾经居住数年的房子。所有描述都合乎情理，美国官员正准备放行，突然想起，就在中国人到达前数天，这栋房子刚刚通电。但中国人却声称，在他数年前离开之

[1] “Che Foo Liar Is Taken into the Liars’ Order,”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 4, 1904: D6.

[2] “Men in Washington,” *Atlanta Constitution*, Jan. 24, 1884: 1.

[3] “Shrewd Celestial Two Wily for Old Confidence Trick,” *Atlanta Constitution*, May 8, 1919: 17.

[4] “Plan to Bar out Chinese Adopted,” *Chicago Tribune*, Dec. 26, 1902: 1.

时就有电灯。官员于是要求他关掉开着的灯泡。苦力爬上桌子，使出浑身力气，试图吹熄电灯，最终无济于事。他只能被继续羁押，等着遣送回国。^[1]终被揭穿的“诡计”只能加深美国人的偏见。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引发大火，烧毁当地出生记录。华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声称自己出生于美国。报纸讽刺道，以此为借口通过欺骗留在美国的华人数量超过“生活在孔子时代的黄种人口”。^[2]

不仅如此，华人还公然“讹诈”。一名颇有年纪的“孔子门徒”被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火车轧断一条腿和另外一只脚上的三个脚趾。陪审团判令铁路公司赔偿 16 500 美元。但中国人贪心不足，竟然试图讹诈铁路公司，要求对没有受伤的两个脚趾按“499 美元的折扣单价”加以赔偿。被激怒的铁路公司完全拒绝赔偿，并要求重新审理。报纸揶揄道，此举不仅可能令独腿受害者颗粒无收，而且随着更加严厉的移民法案出台，他甚至会被遣送回中国。^[3]即使人之将死，“孔子门徒”也不会放过最后“讹诈”美国的机会。虽说依据常理，客死他乡的中国人遗骨都要运回家乡安葬，“但是，一旦可能将责任转嫁他人，中国人便不愿为贫困潦倒的同胞支付丧葬费用”。中国城让县政府为贫穷华人的遗体埋单，“手段极其高明”。他们会在同胞去世前几个小时将其交到县当局手上。“一副薄棺、几尺黄土”是县当局无论如何推托不掉的。^[4]

四、孔子与华人的“好色”心理

实际上，美国报纸着意讥讽的华人嗜好不止于赌博、彩票和欺骗。由于美国政府限制中国女性移民，在美华人构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单身汉社会”。华人男性对于女性的渴望成为报纸津津乐道的笑料和贬

[1] “Electric Light Proves Deception of Immigrant,” *Chicago Tribune*, Apr. 22, 1901: 7.

[2] “For Yellow Shipment,” *Los Angeles Times*, Jun. 4, 1911: II10.

[3] “Five-Hundred-Dollar Toes,” *Los Angeles Times*, Jun. 26, 1916: II4.

[4] “Dumping Place for Chinese Corpses,” *Los Angeles Times*, Apr. 27, 1901: 12.

损华人的工具。孔子照样时常受到牵连。因女性稀少导致华人争风吃醋之事较为多见,有些甚至闹上法庭。“长着黑眉毛的孔子门徒”居然挤满审判厅,“神情庄重”,让美国人更加鄙夷“中国异教徒过分讲究的伦理”。一名从加州首府逃至洛杉矶的貌美华人妓女归属如何,是两派中国人法庭争执的焦点。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双方立场的依据还是已经废除多年的逃亡奴隶法案。^[1]也有报纸拿某些“孔子门徒”不知孔子、只知女子的现象大发议论,贬损华人的精神追求。美国人与洗衣工攀谈,讨论华人的宗教信仰。但洗衣工对孔子之名似乎毫不知晓。焦急的美国人于是问道,“你们根本没有宗教吗?没有教堂?没有主日学校?”听闻主日学校,洗衣工的脸“突放光彩”：“美女老师。主日学校,漂亮女孩,我要来!”美国人在文章中讥讽曰:“我最终发现,中国人的宗教……肯定有很多漂亮女孩。”洗衣工甚至把“孔夫子”当成了漂亮女孩的代名词,以至于每次碰到美国人,都会指着自已的前额,念叨“孔夫子”。^[2]

少数华人试图与美国女性建立婚姻,结果成功者寥寥,报纸趁势老调重弹,突出华人对于白人女性的威胁。“胆小而又卑微的孔子追随者”、卖菜小贩阿南为收取五美分的欠帐,来到一户白人门前。白人拒绝让其入内,担心他“调戏女孩子”。结果阿南“恼羞成怒”,口出恶言,被告上法庭。^[3]威利·鲁·钟(音)是为数不多的成功者之一,但其成功却引发一场较大的排华暴力活动。19世纪末,“整洁聪明”的钟来到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Augusta),经营有中国特色的商品。钟的生意稳步发展,商店成为附近年轻人的聚集场所之一。这其中就包括伯克县(Burke County)农民富尔彻(Fulcher)芳龄十五的漂亮女儿。钟不断以“糖果礼物”赢取富尔彻小姐的芳心,并以“用洋泾浜英语表述的孔子语录”和其他关于中国的轶闻趣事获得富尔彻先生的好感。钟最终修成正果,与富尔彻小姐喜结连理。钟以前的伙

[1] “In the Temple of Justice,” *Los Angeles Times*, Sept. 3, 1891: 4.

[2] “Curate and Chinaman,” *Washington Post*, Sept. 3, 1905: E2.

[3] “The Chinese and the Boy,” *Los Angeles Times*, Apr. 14, 1900: 114.

伴见伯克县能够娶到“美国老婆”，便纷至沓来。当地居民开始惧怕“某些思维简单的女孩”落入中国人的圈套，打砸中国人商店的暴力行为终于出现。损失总计达5万美元。但中国人会“证明，他会在其他地方故伎重演”。^[1]名叫梁林 (Leong Ling) 的华人则因为追求白人女孩不成而犯下凶案，成为通缉对象。梁居住在纽约，经常参加埃尔西·西格尔 (Elsie Sigel) 及其母亲组织的教会活动。据报纸描述，梁与其他华人一样，对“漂亮的白人年轻女性”怀有特别的嗜好。埃尔西便是他的追求目标。为表忠诚，梁不仅将名字改成“威廉·L. 梁”，而且假装抛弃孔子，皈依基督。梁的行为始终遭到埃尔西父亲的强烈反对，他因此对埃尔西狠下毒手。梁将已被肢解的埃尔西尸体装入一只箱子后，落荒而逃，亡命天涯。^[2]

前述所有不良和恶劣行径，如果真有其事，绝非华人社会所独有。但报纸大肆报道和夸张描述的意义却非同寻常。其一，这是在排华高峰期出现的舆论，实则排华情绪的表现和延伸。研究报纸上华人嗜好的扭曲和丑化，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排斥华人运动的无孔不入。其二，嗜好优劣本属个人修养，美国报纸却将华人嗜好与中国文化的象征孔子联系在一起，既意在证明这些与白人正统信仰格格不入的价值取向是华人群体特性，也在于凸现所谓华人文化劣根性。孔子成为华人低劣嗜好的教唆者和袒护者，暴露出排华高峰期美国部分媒体的文化与种族偏见。总之，报纸关注、夸张和诋毁华人嗜好之举不是简单的媒体报道行为，而是排华运动的微观体现。

五、孔子与华人的怪异习俗

美国报纸对于孔子，并无深入研究。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将无法理解的华人特征归咎于孔子。华人的习惯和乃至语言都沦为媒体的笑

[1] “The Chinese in Georgia,” *New York Times*, Jun. 11, 1883: 5.

[2] “Suspects in West,” *Washington Post*, Jun. 21, 1909: 2.

柄，成为华人难以融入美国社会的依据之一，亦是美国排华逻辑链条的组成部分。

自成一体的“孔子语言”让美国人如坠云山雾海，在排华氛围中招致不敬实难避免。凡有中国人争论，他们必定在讨论“最为高深的孔子原则”，其“单音节”语言即使“在受过教育者听来，也不过是几只麻雀在谷仓屋檐下的唧唧喳喳”。^[1]中国餐馆总是华人聚集之处，“所有人都在用晦涩难懂但表情丰富的孔子语言高谈阔论，似乎他们就是以此为生”。^[2]华人洗衣店收取待洗衣物以后，均会出具顾客取货凭条。凭条上书写的汉字被美国人称为“鸡爪划拉留下的痕迹”。^[3]诸如此类的“孔子符号”多达4000多个。如果要“破解”这些字符，那将是“漫长而又几乎无用的举动”。^[4]即使中国人书写的英语，有时也让美国人啼笑皆非。国内税收官约翰·T. 贾里基(John T. Jarecki)负责搜集收入所得税申报单。收到的一个信封内装着日占时期的菲律宾货币，却没有申报单。类似于华人洗衣店开具取件单常用的绿纸上，有人用毛笔写着如下英文：“我的申报单。洗衣店今年生意不好。”哭笑不得的贾里基将此事称作“孔子的迷惑”。^[5]

不仅孔子语言本身让美国人不知所云，受其影响的华人姓名同样难以区分，徒增辨别难度。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市政官员就发现，华人尽管“举止温和”，却“让人难以分辨”。Wash Lee 和 Lee Wash、Ling Sing 和 Sing Ling 之类令人迷惑，他们又“时刻准备起用新的名字”，加之长相和个头相差无几，官员们“很难判断是否找到了需要找的人”。黑人奴隶曾经青睐此道，以逃避主人抓捕，但因为不如华人“聪明”，故屡屡失手。“在墙壁小洞和背街深巷快速出没的孔子子孙”精于此术，“乐此不疲”，常能摆脱税收官的追寻。^[6]报纸甚至规

[1] “Animal Language Not Impossible,” *Chicago Tribune*, Apr. 22, 1906: B2.

[2] “Chinese Restaurants,” *Boston Globe*, Jun. 23, 1889: 23.

[3] “Cop Has No ‘Checkee’; Chink No ‘Laundly,’” *Washington Post*, Aug. 28, 1906: 12.

[4] “No Checkee, No Washee,” *Boston Globe*, Jun. 2, 1889: 17.

[5] “Tower Ticker,” *Chicago Tribune*, Feb. 22, 1949: 17.

[6] “Pursuing the Chinaman,” *Atlanta Constitution*, Jun. 21, 1899: 4.

劝中国驻美公使，尽快公布其姓名的“官方版本”，因为已经出现的各种拼写“会让孔子也感到困惑”。^[1]一则寓言较好地总结了美国人的迷惑心态。被称为“智者”的神秘主义者、通灵者和怀疑论者能够从西方圣人的姓名中获得“勇气”，却被孔子“抛在空中”，对中国姓名无所适从。^[2]

孔子及中国人的某些日常习惯似乎也让美国人颇为费解。《论语·阳货》记载，“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美国报纸大肆发挥，用以证明孔子和中国人行为怪异。《亚特兰大宪法报》、《波士顿环球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同一天刊登了曾数次角逐总统宝座并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撰写的文章，展现中国人的“奇特风俗”。孔子不见来访者之事赫然在列。布赖恩写道，此事说明，中国人并不看重待人接物的真诚，孔子在《论语》中“树立了影响恶劣的榜样”。^[3]报纸认为，虽然西方人会在门上悬挂“不在家”的牌子，但像孔子一样公然如此宣称者却未有所闻。^[4]中国与欧美社会格格不入的“怪诞”习惯远不止于此。比如，中国人在困惑时抓脚而不是头，女人穿短裤，男人穿长衫，蔬菜、鸡蛋、木材都按重量卖，等等。而中国人的所有奇怪行为从他们初入学堂、在孔子像前下跪时就已注定。^[5]“孔子子孙”还对变质鸡蛋情有独钟，而美国人唯恐避之不及。^[6]更有报纸撰文者秉承美国社会污蔑华人食用老鼠的伎俩，告诫同情华人的布莱尔（Blair）参议员：“除非你完全了解你的中国佬，否则没有圣洁的‘老鼠’。”此言被杜撰为孔子语录，在贬损华人饮食习惯的同时，意在突

[1] Editorial, *Atlanta Constitution*, Apr. 1, 1903: 4.

[2] Robert Loveman, “Three Wise Men,” *Chicago Tribune*, May 10, 1914: I8.

[3] “Around the World,” *Atlanta Constitution*, Mar. 18, 1906: 3; “Girl Babies No Good in China,” *Boston Globe*, Mar. 18, 1906: SM4; “Bryan Tells about the Strange Customs of the People of the Flowery Kingdom,” *Washington Post*, Mar. 18, 1906: M8.

[4] “Chinese Street Etiquett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 30, 1916: 10.

[5] “Querc Customs in China,” *Washington Post*, Nov. 13, 1910: M2.

[6] “The Most Delicious Eggs,” *Washington Post*, Apr. 19, 1908: M7.

出华人性格的神秘莫测。^[1]与此同时,华人被刻画为漠视生命的群体,与美国的“文明”观念背道而驰。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六名中国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应邀见证何姓华人洗衣店老板自杀身亡的过程,却泰然自若,未加任何阻止。相关报道渲染道,这是“孔子在其著述中定下的体面习俗”。自杀者“体面地”射中头部,“体面地”死去。^[2]

中国与美国一样注重社会规则,但孔子影响之下的华人一旦脱离母体,其实施规则的方式便在美国的制度下显得“荒诞”,从而成为报纸讥讽的又一对象。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仪相似,美国的法律精神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华人卷入官司在所难免。大多不信基督教的华人如何在法庭宣誓确为一大难题。圣经没有约束力,五花八门的宣誓对象随之出现。曾有华人草药医生涉嫌无证行医,被警察抓捕,即日移交法庭受审。庭审时的宣誓仪式令法官大伤脑筋。法官认为,对于中国人,“向孔子发誓最具约束力”。这需要一名祭司颂读誓言,并宰下一只公鸡的头,受审者手指浸入血中,严肃宣誓。尽管这与美国法庭程序相去甚远,法官仍然表示,孔子誓言在考虑之列。^[3]最后结果我们不得而知。朱利安·约翰逊(Julian Johnson)在报纸上写道,庭审本应对圣经起誓,但却出现了“一些奇妙而怪异的替代仪式”。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名法官甚至在找不到孔子语录的情形下,“让中国人指着茶叶箱发誓”。^[4]这也是“孔子门徒”在另一次庭审时“奇妙而又怪异地替代圣经”之举。^[5]

“孔子的子孙”亦有双膝下跪、摔打碗碟发誓者。^[6]显然,圣经对于华人而言“毫无意义”。而在其他时候,唯有“在十二根点着的线香面前,对着滴血的鸡头,以孔子的名义发誓,法官才可能从其嘴里

[1] “Postscripts,” *Washington Post*, Apr. 30, 1891: 4.

[2] “Gay at Suicide Party,” *Washington Post*, Jun. 18, 1913: 3.

[3] “Chinese Grin in Sleeves,” *Los Angeles Times*, Jul. 18, 1907: II3.

[4] Julian Johnson, “From the Mason to the Majestic,” *Los Angeles Times*, Oct. 18, 1912: III4.

[5] “In Lieu of a Bible,” *Washington Post*, Oct. 3, 1909: M1.

[6] “Swearing a Chinaman,” *New York Times*, Feb. 27, 1882: 2.

得知真相”。^[1]华盛顿第二刑事法庭在审理一起华人纵火案时，地区助理监察官提议，嫌疑人应该对着孔子经书和砍掉的鸡头宣誓。但由于无人愿意提供所需家禽，法官因此宣布，华人的宣誓方式“不符合程序”。^[2]类似的情形也在纽约出现过。研究华人的“专家”认为，孔子要求，发誓必须用活鸡，否则“誓言的效力会丧失殆尽”。献祭之后的鸡成为汤团烩鸡的材料。但售鸡商贩却不愿出售活鸡给身陷官司的华人，中国式的宣誓程序只得作罢。^[3]不单宣誓，法庭索赔也是孔子教诲无法提供启迪的领域。孔子虽有涉及婚姻礼仪和幸福的仁爱哲学，但“至于如何用金钱衡量(婚姻)，他未给后代留下只言片语”。华人埃迪·帕克(Eddie Park)在因妻子红杏出墙而起诉离婚时，只得自己计算婚姻的价值。他最终决定索取11万美元。^[4]1912年初，六名华人富商涉嫌组织中国劳工偷渡入境，遭到联邦大陪审团指控。但由于中国新年临近，主审法官韦尔伯恩(Wellborn)表示，审判可能推迟，以便被告有机会表达“对孔子信念的尊重”。^[5]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拥有相互迥异的语言和习惯本来极其自然。报纸罗列的华人奇异特性确有存在的可能。然而，由于排华的氛围背景，“孔子子孙”的言谈举止不仅显得荒诞，更被推而广之，上升到群体特征的高度，显示出华人与美国社会截然不同的传统和行为模式，证明华人从根本上而言无法成为美国熔炉的一部分。

[1] “Prevention of Perjury,” *Washington Post*, Jun. 30, 1902: 6.

[2] “Chinaman Charges Arson,” *Washington Post*, Jan. 26, 1900: 2.

[3] “Game Cocks and Affidavits,” *New York Times*, May 15, 1904: 6.

[4] “Chinese Files Love Balm Suit,” *Los Angeles Times*, Sept. 1, 1937: A3.

[5] “Confucius Bars Way of Justice,” *Los Angeles Times*, Jan. 5, 1912: III.

第六章

孔子与近代中国的衰落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是美国排华情绪最为剧烈之际，同时也是中国力量最为孱弱、处境最为被动之时。至于中国未能跟上世界步伐的根本原因，报纸继续将矛头指向孔子。根据美国报纸的描述，孔子束缚着中国人的思维，阻碍着革新求变的趋势，让中国在与列强的斗争中不堪一击。着眼于此，报纸认为，中国唯有突破孔子之囿，方能前行。报纸无意系统深究中国停滞不前的诸多原因，而是选择最具知名度的文化象征加以发挥。这既说明孔子的巨大影响力，也起因于媒体期望迅速吸引读者注意力的特点。报纸立场自然受排华氛围影响极深，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社会的排华情绪。所以，从孔子入手解读中国的落后不单是报纸对于孔子之名的话语运用，更是美国排华手段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孔子：中国人的迷惑之源

孔子代表的语言和文化在美国人眼里犹如天书，如果还能情有可原的话，饱读孔子经书的中国人也在现实生活中时常迷惑，无计可施，似乎进一步印证了孔子让人迷糊的成见。孔子与其他中国人之间当然不存在语言和习俗障碍问题，美国报纸着力强调的便是孔子思想本

身的玄妙及其所传信息的含混。

孔子的英文名为“Confucius”，与“confuse”（混淆、迷糊）拼写和读音类似。美国媒体常以此为笑料，讽刺孔子思想的“晦涩难懂”。《华盛顿邮报》刊登的一则事例寓意便在于此。在导游的陪同下，游客正在参观最高法院的上诉厅。建筑门口立着中国哲学家和圣人孔子的雕像。游客中的一位漂亮女士指着雕塑问道，“这是谁？”导游答道，“女士，那是所有法律的老爸，让人迷糊先生（Mr. Confuse-Us）”。^[1]《亚特兰大宪法报》也讥讽道，“孔子曾是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精神力量”，现在却演变成了“Confusion”（混乱）。^[2]近现代使用广泛的时刻表据说源于孔子，接受岗前培训的铁路售票员才会感觉如此“迷惑”。^[3]孔子据信只是“唠叨着各种迂腐而又自以为聪明的诡辩，却浑然不知自己所言为何物”，更不用说指导现实生活。^[4]

孔子虽然思想深邃，却难以为很多普通美国人所理解，孔子之名因此经常被用作隐晦艰涩的代名词。某天晚上，一位纽约居民回家，发现妻子正在“学习中国字母”。妻子“神情忧伤”地解释道，她能听懂意大利卖冰人、爱尔兰屠夫、荷兰杂货商以及黑人门房的话，却不知道操“孔子语言”的洗衣工是在赞扬她或是咒骂她。她于是开始用功学习。^[5]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美国农民纷纷进入城市。这令《亚特兰大宪法报》忧心忡忡。如此一来，美国乡村的富饶土地将拱手让给外国移民。撰文作者尤其不能容忍在佐治亚州的田间地头看见中国移民的身影，因为他们将带来“令人头晕目眩的孔子思想，并与美国已有的各种‘主义’相互混杂”——“我们将栖身何处？”^[6]

[1] “The Father of All Laws,” *Washington Post*, Apr. 5, 1903: D8.

[2] Untitled Article, *Atlanta Constitution*, May 1, 1912: 22.

[3] “Time Tables Will Form Text Books for Girls’ School,”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 18, 1918: 9.

[4] “Boys and Girls,” *Boston Globe*, May 30, 1904: 10.

[5] “Life in New York,” *Boston Globe*, Dec. 24, 1905: SM15.

[6] Sarge Plunkett, “The Decay in Rural Pursuits Grows Alarming,” *Atlanta Constitution*, Jun. 29, 1902: 22.

依某些报纸之见，孔子首先无意让后世中国人明白其思想。有作者信誓旦旦地宣称，孔子为创立“新的宗教”，曾在西藏边境研究星象。被中国人奉为神明的中国经书正是在此写就，但最初却是为紧随孔子左右的猎犬而写。孔子此举意在避免天机泄露，因为“狗可以保守秘密”。^[1] 狗在美国文化中虽然不具贬义，但孔子将其思想之门的钥匙交给不能言语的狗，等于封堵了后世真正了解其思想之路。无独有偶，一名美国妇女视其爱犬聪明之至，特以“孔子”呼之。^[2] 《洛杉矶时报》刊登的一则对话寓意类似。针对孔子以简要的语言表达了高深智慧的说法，有人颇为不敬地回答道，“我认为，如果他学过丁点方言，他就可能是东方的乔希·比林斯（Josh Billings）”。^[3] 比林斯是名气仅次于马克·吐温的美国 19 世纪幽默作家，但作品中充斥着各地的方言俚语，晦涩难懂。以比林斯比喻孔子，旨在强调孔子徒有深邃的智慧却以“刁专”的表达方式拒人千里。即使事关日常习俗，孔子同样让中国人在无尽的揣摩中耗费时光。例如，一年之中至少有 11 个月，“孔子的后代”必须信守发过的誓言。其中的奥妙在于，孔子为中国人设定了无数个恶魔。谁若失言，“成百上千万个恶魔之一必定将他生吞活剥”。另外，中国人的每一个魔鬼都须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对待。他们必须殚精竭虑、绞尽脑汁，防备无处不在而又无法确认的恶魔。撰文者总结道，“中国人的大脑充满迷信，他把所有的闲暇时光都用来对付恶魔的邪恶力量”。^[4]

另一方面，孔子经常让其信奉者在面临问题时黔驴技穷，甚至惊惶失措。西方采用的阿拉伯标写法可以书写无穷大的数字，但“孔子的门徒”却无法书写 99 以上的数字。他们只能用文字表达。孔子体

[1] Col. James H. Lewis, "Is the Dog Man's Best Friend?" *Chicago Tribune*, Feb. 23, 1913: G6.

[2] "Women Here and There—Their Frills and Fancies," *New York Times*, Dec. 31, 1899: 17.

[3] "Daily Fashion Hints," *Los Angeles Times*, Jun. 5, 1901: 14.

[4] "'John's' Holiday," *Los Angeles Times*, Feb. 4, 1889: 1.

系“不仅笨拙,而且费力”。^[1]连几何图形都可能“让孔子晕头转向”。^[2]在另外一个例子中,亚特兰大中国城沉浸在一片悲戚和惶然之中。来自香港、历经太平洋风浪的五箱鸭蛋完好无损地运到亚特兰大,却因为卸货疏忽而致其中两箱摔烂。整个中国城顿时如同灾难降临,出现在劫难逃之象。华人相信,“孔子本人对于其在亚特兰大的子孙们极为愤怒,子孙们满脸悲戚,不停地眨着杏眼”。强烈的孔子信念没能让华人意识到这只是一次普通事故,反而让他们遭受着“(中国)巨龙最为恐怖的折磨”。^[3]英国蒸汽船“希尔格伦”号(Hillglen)停靠罗德岛的纽波特港(Newport)加煤。运煤的驳船突然吃水并开始下沉。四名中国船员不知如何应对,只能“静静地坐着,纳闷于为何淹死需要如此长的时间”。倒是“不信奉孔子的”英国船长跳上驳船,在中国人身上拴上绳子,把他们拖上轮船甲板。^[4]而在另一艘远洋轮船上,身为水手长的中国人看到刚刚长脚的鳄鱼,极为惊恐,唯有“向孔子祈祷”。^[5]

因信奉孔子而无计可施者不限于普通华人,中国驻芝加哥领事亦概莫能外。领事因其租住和办公之处而被卷入一桩民事官司。房东及其侄子都声称有权收取租金。领事尽管“祈祷孔子的智慧以帮其定夺”,他仍然左右为难,不知应该采取何种对策。^[6]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发起的纯净食品运动中充当干将的哈维·华盛顿·威利(Harvey Washington Wiley)与孔子类似。威利主事之前,美国人能够吃上火腿和鸡蛋。他大权在握之后,鼠尾草、豌豆汤、玉米粥和炖李子干成为人们的日常主食。在改变一个国家的食物结构方面,历史

[1] “Chinese Laundry Checks,” *Los Angeles Times*, Sept. 6, 1892: 10.

[2] “Boys and Girls,” *Boston Globe*, May 26, 1904: 10.

[3] “Chinatown Sorrowful over Broken Duck Eggs,” *Atlanta Constitution*, Jun. 14, 1903: A3.

[4] “Chinamen Wanted to Drown,” *New York Times*, Dec. 13, 1902: 5.

[5] “A Yarn of a Crocodile,” *New York Times*, Mar. 22, 1906: 9.

[6] “Chinese Consul’s Amusing Predicament,” *Chicago Tribune*, Jul. 14, 1900: 2.

上仅有孔子可以一比。^[1]

第三，孔子熏陶之下的中国人还以自我为中心，惘然不知世界的多样性。有轶闻称，某遵循孔子教诲的中国人曾在河边看着月亮升起，四周一片亮堂。此人赶紧叫呆在其他地方的朋友前来，目睹“他自己发出的壮美光线”，浑然不知任何人都可拥有如此奇妙的景象，因为“美丽之光来自同一个月球”。^[2]普通百姓固然如此，皇室贵族也不例外。拥有“圣公”世袭头衔的孔子直系后代，曾被问及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评价。“圣公”犹豫再三，终于说道，“麻烦你告诉我，谁是威尔逊总统？”^[3]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已经因为十四点和平建议而名扬世界，孔圣公居然毫不知晓。这在美国报纸看来绝对不可思议，是孔子让中国人在历史进程面前频繁迷失的又一“证据”。事实上，孔子本人的“孤陋寡闻”也是报纸不断嘲笑的对象。相隔数月，《华盛顿邮报》和《亚特兰大宪法报》刊登同一则寓言，讽刺孔子在谈论外部世界时张冠李戴。孔子与费城的创建者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在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Cleopatra）的一次下午茶会上巧遇。孔子不知佩恩建立费城的壮举，而是称其为“发明睡眠的人”。^[4]

孔子以其毕生精力解析社会真谛，但到了美国媒体那里，却禁锢了中国人的思维。他们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去解读原本就很玄妙的孔子思想，并且因为难以揣摩其意而使简单的生活复杂混乱。笃信孔子思想造就的文化优越感也让中国人在现实世界无所适从。媒体在“孔子”与“迷糊”之间画上等号，将贬损的触角延伸到了孔子思想的存在意义，否认孔子学说的实用价值，从根本上证明中国的思想源流难以企及西方的价值体系。

[1] David Rankin Barbee, "The Hoosier Hangs On!" *Washington Post*, Apr. 21, 1929: SM3.

[2] "Men Met in Hotel Lobbies," *Washington Post*, Oct. 27, 1900: 6.

[3] "Where Wilson Is Unknown," *New York Times*, Sept. 16, 1919: 7.

[4] "Origin of a Miserable Joke," *Washington Post*, Sept. 27, 1908: M3; "The Origin of a Miserable Joke," *Atlanta Constitution*, Nov. 30, 1908: 10.

二、孔子：中国革新思维的“障碍”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美国不仅国力剧增，而且改革与进步思潮盛极一时，成为美国人评判制度优劣的核心标准。时刻关注世界发展的报纸目睹中国处处被动的局面，自然将中国归入改革与进步的对立面。据称晦涩而且没有多少现实意义的孔子思想，被视作中国停滞不前的总根源，是革新运动的最大“障碍”。孔子导致了中国人的静态甚至倒退思维。这不仅体现于中国人的各种行为模式，更因为历朝政府的强化而难以更改。

孔子造就的中国思维唯祖训是从，将孔子学说视为亘古不变之物，窒息着孔子学说的更新发展和其他思想的出现壮大。在“孔子的四亿国民”眼里，愈是远古的智慧和美德就愈是值得尊崇。他们“不仅面向过去，而且崇拜过去”。^[1]有时被称作蒙古人的中国人信奉着耶稣出生之前 500 年就已存在的思想。这就是“孔子制定的法则”。^[2]东方人普遍好古，孔子的影响将中国人崇尚先圣的“特性发展到了极致”。中国人因此是“最具东方特性的东方人”。孔子“最全面地表述了”中国的保守特性。中国的国民精神因他而停滞。^[3]在某些时候，孔子学说甚至被直接等同于祖先崇拜。^[4]祖先崇拜的起源遭到戏说。据称，孔子刚被父亲痛打一顿，于是自言自语道：“崇拜你的祖先，不然你的祖先就会拿马鞭抽你。”孔子哲学由此诞生。^[5]一首诗歌以“优雅的中国老绅士”为题，讽刺孔子影响之下的中国人只知从祖先那里寻求慰藉的思维定式。穿着丝质长袍、留着长辫的绅士“严格按照孔子的教诲”，崇拜并模仿逝去的祖先，用自己的精神之门锁住整个世界。^[6]

[1] “Facing Backward,” *Washington Post*, Aug. 20, 1900: 6.

[2] “The Old, Old Chinese,” *Washington Post*, Sept. 27, 1914: M7.

[3] “Ideas Taught by Confucius,” *Chicago Tribune*, Aug. 12, 1900: 30.

[4]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imes*, Jun. 24, 1900: 2.

[5] “Confucius,” *Los Angeles Times*, Oct. 26, 1902: A1.

[6] “Nuggets,” *New York Times*, Apr. 4, 1898: 6.

换言之，中国人眼中的所有智慧都囊括在孔子的经典之中，并且“原封不动地保存了3000年”。中国因此每况愈下。^[1]也有人认为，中国因为迷信孔子而停滞不前的时间为2000年。^[2]时间长短姑且不论，孔子“阻碍”中国进步似乎不容置疑。正因为孔子让其国民“向后看”，4000年的中国历史“几乎没有为世界的精神财富作出任何贡献”，其意义反不如美国的一个世纪或者欧洲的500年。^[3]另有文章写道，对于中国人而言，从孔子去世到儿皇帝溥仪出生之间的历史还不如从华盛顿到塔夫脱的时间漫长。中国人相信，世界已经并将一直按照古老的方式运转下去。^[4]

因为一味尊崇孔子，中国人缺乏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只是专注于眼前的物质利益，中国的进步难以获得必须的精神动力。“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为孔子赢得一顶“不可知论者”的帽子。孔子藐视来生，导致实利主义在中国蔓延，中华文明始终裹足不前。^[5]《芝加哥论坛报》称呼孔子为“彻头彻尾的不可知论者”。受其影响，中国弥漫着“强烈的唯利思想和普遍的肉欲”，缺乏向未知领域前进的动力。^[6]美国人从而自信地宣布，当人们谈论孔子思想时，他们论及的是一个“顽固守旧、单调乏味、功利熏心、讲求实利、停滞不前、固执迂腐”的文明。“沉迷并崇拜过去”的中国文明“最为出色地诠释了”被人为扼杀的发展历史。如果将中国形容为“仍然躺在摇篮里的老人”，那是最恰当不过的。^[7]中国人被定义为“卑贱的模仿者，没有丝毫的独创天分”，这是“孔子某些教诲”导致的后果。^[8]宗教人士

[1] “China and the Chinese,” *Chicago Tribune*, Dec. 6, 1890: 3.

[2] “Bryan Ignores Sullivan, But Belabors Confucius,” *Chicago Tribune*, Feb. 20, 1907: 3.

[3] “The Churches,” *Chicago Tribune*, May 4, 1885: 3.

[4] “Chinese Religion Fails in Results,” *Chicago Tribune*, Nov. 19, 1911: A2. 乔治·华盛顿1789—1797年任美国首任总统，威廉·塔夫脱1909—1913年任美国第27任总统。

[5] “Yang-Tse Missionaries,” *New York Times*, Jul. 1, 1900: 8.

[6] “Agnosticism in China,” *Chicago Tribune*, Jun. 4, 1883: 2.

[7] “Dr. Barrows Talks of Confucius,” *Chicago Tribune*, Jan. 20, 1896: 5.

[8] “‘John’: Matured Views on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Los Angeles Times*, Aug. 1, 1888: 5.

因为孔子牢牢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而恼怒。他们指责“孔子思想明目张胆的实利主义”，中国人的“贪婪、狡诈、自我放纵”皆由此而生。^[1]追求现实功利的“国民特性”让中国人不思进取，他们因此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败下阵来。中国人关注私利，引发社会同情心的缺失。中国在社会道德方面似乎又大为落后。美国人自诩“富有而慷慨”，极为关心社会弱者。这一切“将我们与……孔子的追随者区别开来，并在他们之上”。^[2]

除却因循守旧、专注眼前之外，孔子思想主导之下的中国还对时刻变化的外部世界熟视无睹。故步自封的习性成为中国前进道路上的又一绊脚石。画地为牢的中国人以孔子为核心，筑起一道城墙，自称天朝帝国。他们从不瞭望高墙之外，“墙外之人皆为贱民和狗”。^[3]在欧美文明阔步向前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怀抱孔子经典沉沉睡去。长城与黄海之外，无论何种巨变，“对于中国而言都不值一提”。中国犹如万年不变的磐石，世界的发展只是在其四周偶尔拍打的细小浪花。^[4]“在陈腐乏味的孔子教条发出的微弱光线中摸索前行”的中国人自我陶醉，毫不需要白种人的任何物品和思想，僵化地固守着自己的“神秘模式”。^[5]“谙悉孔子智慧并推行祖先崇拜”的中国人蔑视西方文明，视其为“中国早在遥远的过去就已抛弃的权宜之计”。他们不需要现代发明，不需要铁路，因为他们墨守的成规会因此而打破。^[6]同样深受孔子影响的近代日本毅然西化，令美国报纸颇感欣喜。日本的经历似乎更加鲜明地折射出中国循规蹈矩的痼疾及其严重后果。接受西方教化的日本已是“东方国家的明珠”，因孔子教诲而拒绝外部思想的中国却仍然沉浸在“千年美梦”之中。孰优孰劣即刻

[1] “China Now Reaffirms Confucianis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6, 1914: 22.

[2] “A Psychopathic Ward,” *Los Angeles Times*, Jun. 2, 1911: II4.

[3] “Views of the Conference,” *New York Times*, Apr. 30, 1900: 7.

[4] “The Mongolian Bismarck,” *Washington Post*, Aug. 30, 1896: 6.

[5] “China and Chinese Railway Concessions,” *New York Times*, Jan. 23, 1898: 23.

[6] “The Chinese Puzzle,” *Boston Globe*, Jul. 2, 1900: 6.

显现。^[1]

在美国报纸的诠释下，中国人因循守旧、只顾眼前、画地为牢的秉性因孔子而生，亦因历代政府大力倡导孔子崇拜而深入骨髓。论及政府行为，报纸大致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以孔子为核心的教育；其二是政府直接的尊孔令。有此二者，中国似乎永远也走不出尊孔与落后之间循环往复的怪圈。

唯孔子独尊的中国教育“没有西方理解的学习概念”，数学、化学、地质学和临近学科、世界史、地理学等鲜有涉及。课堂所言必然围绕孔子的教诲。2000多年前制定的教育标准几乎毫无变化。^[2]华夏之内，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人能游离此一模式之外。在一组漫画中，年幼的宣统皇帝一边对手表、枕头和奶瓶爱不释手，一边不停地念叨，“孔子制定的原则，虽然保守老套，却必须得到尊重”。^[3]幼年登基的溥仪堪称另一典型个案。他必须每天六个小时不间断地习读孔子教诲。孔子的“幼稚语录”将溥仪变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4]皇帝况且如此，普通百姓更是无以反抗。自开始学习时起，中国人就必须对孔子顶礼膜拜。政府将孔子塑造为神，所有学生均须跪拜磕头。^[5]封建制度下的中国人总把功名利禄置于人生追求之首，但获取名利须以谙悉孔子经典为前提。既如此，“历代（中国人）自然受制于过去的束缚，进步之门紧闭”。^[6]让至少一个儿子步入仕途是每一个家庭的夙愿，熟知孔子学说更是众望所归。^[7]及至20世纪初，每次科举考试的应试者仍然成千上万。人们饱读经书，趋之若鹜，既为功名，亦

[1] “The X-Ray in the Orient,” *New York Times*, Jan. 4, 1903: 8.

[2] “Chinese Education,” *Los Angeles Times*, Aug. 9, 1896: 10.

[3] “An Unsuppressed Interview with the Emperor of China,” *New York Times*, Dec. 13, 1908: SM12.

[4] “Heirs of Mighty Empire,” *Chicago Tribune*, Mar. 15, 1914: B9; “Little Pu Yi,” *Boston Globe*, Apr. 12, 1914: SM15.

[5] “M. Clam Visits the University of Rockefeller,” *Washington Post*, Feb. 3, 1907: A1.

[6] “China’s Boast of Great Learning Not Borne Out by Mr. Bryan’s Observations in That Country,” *Washington Post*, Mar. 25, 1906: SM9.

[7] “Finds Chinese Indifferent to Graft in Office,” *Chicago Tribune*, Aug. 16, 1915: 4.

延续了3000年来孔子对于中国思想的控制。^[1]正因为孔孟根深蒂固的影响,社会底层才会不时“野蛮抗议现代思想、西方方法以及开明的思维和教育”。^[2]面对西式教育的挑战,中国的“保守文人”不会袖手旁观。这些“过时老朽的儒家知识分子已经极为震惊”。^[3]他们的强烈反应令《纽约时报》惊叹,中国的“教育改革明显倒退”,所有教育机构“都在保守或者反动分子的影响之下”。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希望”岌岌可危。^[4]

讲授孔孟之道的教育体制由来已久,从制度上延续并深化着中国保守落后的国民特性。中国政府的行为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遭到美国报纸的口诛笔伐。李鸿章是清末较为开明的政治家。但即便是他,也不赞成革新之举,因为他相信,“最伟大的哲学家孔子的教诲反对突然而激进的变革”,他必须尊重中国的“伟大经典”。^[5]孔子是李鸿章不愿变革的原因。对于其他大权在握者而言,孔子是拒绝变革的手段。不论哪种选择,孔子都被置于革新的对立面。慈禧历来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在美国报纸上同样如此。1899年,慈禧下令,提升儒教为中国国教,以对抗日渐升温的西学。慈禧因此成为“极端保守派的捍卫者”。^[6]翌年,慈禧再度下令,学校教育必须回归孔子,“新奇、堕落、错误”的西式教育即刻废止,违者严惩。报纸评论道,“看来慈禧已经打定注意,回复到古代的保守主义之中”。^[7]1907年,在慈禧的操纵下,孔子擢升为与天地齐肩的神,但孔子本人“从未自称具有神灵品质”。迫使学生重回传统轨迹是新政策显而易见的目的。^[8]

[1] “The Window of the Worl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1, 1919: 3.

[2] “Due to Lack of Education,” *Chicago Tribune*, Jun. 17, 1900: 3.

[3] “Chinese Finding Homes in Japan,” *Chicago Tribune*, Jun. 19, 1904: 1.

[4] “Chinese Oppose All Plans for Educational Reform,” *New York Times*, May 17, 1903: 31.

[5] “Ended China’s Peace,” *Washington Post*, May 22, 1904: E1.

[6] “Stat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Times*, Nov. 6, 1899: 1.

[7] “Retrograde Edict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Feb. 9, 1900: 6; “Goes Back to Old Customs,” *Atlanta Constitution*, Feb. 9, 1900: 1; “Calls Old Ideas the Best,” *Chicago Tribune*, Feb. 9, 1900: 3; “Back to Confucius’ Time,” *Boston Globe*, Feb. 9, 1900: 14.

[8] “Confucius Promoted,” *Washington Post*, Jan. 1, 1907: 4.

以孔子为手段拒绝变革者自然包括袁世凯。出于黄袍加身的目的，袁从上台伊始，便开始假借尊孔，为复辟帝制作准备。美国报纸毫不吝啬笔墨，对此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和评论。但关注之意不在揭示袁世凯的复辟野心，而在暴露孔子思想和仪式的落后和不合时宜。袁世凯的就职典礼大肆采用儒教仪式，已令美国传教士“深感担忧”。^[1]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晚清进士陈焕章，利用与袁世凯的私人关系，鼓动袁定孔教为国教，更让美国人无地自容。既然是“中国最具学识的年轻人之一”，陈的举动表明，孔子对于中国发展的滞缓作用极其深远，“极端保守趋势”正在中国蔓延。^[2]1914年1月，袁世凯关于拜天拜孔子的提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美国报纸一片哗然，纷纷以“极度失望”和“反动”等词加以报道和评价，认为中国社会的钟摆又回复到了辛亥革命之前。^[3]仿照美国独立宣言提出的“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三原则，《洛杉矶时报》将袁世凯治下的中国宪法精神概括为“生命、自由和对孔子的崇拜”。^[4]事实上，报纸并不关心袁世凯就职以来的举动是否真正推动或滞缓了中国的发展。孔子思想成为事实上的国教，基督教面临遭受排挤的厄运，这才是美国报纸反应如此激烈的根本原因。报纸哀叹，

[1] “The Religion of China,” *Boston Globe*, Oct. 11, 1913: 12.

[2] “Turns to Confucius,” *Washington Post*, Oct. 10, 1913: 4; “Old Creed for China,” *Boston Globe*, Nov. 28, 1913: 16; “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Boston Globe*, Dec. 1, 1913: 10; “Chen Urged Confucianism,” *New York Times*, Dec. 7, 1913: 21.

[3] Untitled Article, *New York Times*, Jan. 30, 1914: 4; “Bow to Heaven and Confucius,” *Atlanta Constitution*, Jan. 30, 1914: 7; “Yuan Sets Chinese Religion,” *Chicago Tribune*, Jan. 30, 1914: 13; “Ordains Confucius and Heaven Creed,” *New York Times*, Jan. 30, 1914: 4; “The State Religion of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Feb. 16, 1914: 114; “Confucianism Reestablished,” *Los Angeles Times*, Mar. 16, 1914: 12; “No State Religion, Says Yuan Shih-Kai,” *New York Times*, Apr. 26, 1914: 7; “Yuan Leads Worship,” *Washington Post*, Sept. 28, 1914: 4; “Yuan Revives Old Rite,” *Washington Post*, Dec. 24, 1914: 7.

[4] “Constitutional,” *Los Angeles Times*, Feb. 1, 1914: 116.

“儒教已成官方正统，宗教自由将荡然无存”。^[1]孔子重回中国的信仰核心促使《华盛顿邮报》断言，中国推翻封建王朝的“伟大进步……徒有其名，没有实质内容”。袁世凯实乃“精明的政治家”，他把握住了中国“实则极其保守”的主流民意。因为孔子之故，中国要真正跻身现代共和国之流“依然路途漫漫”。^[2]

慈禧和袁世凯只是政治支撑孔子崇拜的近代缩影。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皆以孔子学说为纲，通过教育和政治命令加以确保，既将民众的孔子情结深化到了极点，也固定和强化了中国人保守自负、目光短浅的性格缺陷。这就是美国报纸话语中中国落后的根源。至于统治者为何钟情于孔子，报纸认为，这主要因为孔子思想具有维护统治阶级的功效。根据孔子学说，“皇帝就是一切”，百姓无足轻重。虽然孔子也为统治者规定了某些义务，但却否认人民具有管理自己的权利和能力，并且拒绝不在其位者关心国事。如此一来，中国的政府体制“全无进步成分”，反而“阻碍进步，滋生自私和对公共福祉的麻木”。^[3]孔子思想与统治阶级结为一体，举国上下唯孔子是从便极其自然了。

三、孔子：中国与世界脱节的“根源”

中国近代的衰落恰逢西方世界的迅速崛起。按照美国报纸的逻辑，已被孔子束缚千年、革新思维荡然无存的中国，顺理成章地无法抓住发展进步的契机，造成与世界潮流完全脱节之状。技术革命引领

[1] “La Marquise de Fontenoy,” *Chicago Tribune*, Jul. 14, 1913: 6; “China’s Blow at Religious Freedom,” *Washington Post*, Jul. 14, 1913: 4; “Reaction in China Follows Reform,” *Chicago Tribune*, Mar. 29, 1914: A3; “Chinese State Religion,” *Chicago Tribune*, Sept. 28, 1914: 2.

[2] “Chinese Politics,” *Washington Post*, Jan. 31, 1914: 6.

[3] “Christianity in China,” *Boston Globe*, May 27, 1901: 4; “China,” *New York Times*, Mar. 6, 1892: 18; “Around the World,” *Atlanta Constitution*, Mar. 25, 1906: 5; “Bryan Saw No Man Read a Newspaper,” *Boston Globe*, Mar. 25, 1906: SM4.

着欧美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却受制于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国民性格”，沿用着早已过时的用具与手段。这不仅导致中国的贫穷落后，而且威胁着中国在现代世界的生存。孔子毫无悬念地充当着脱节根源的角色：“孔子就是扼杀中国的人。”^[1]

美国报纸并不否认中国人具备制造和使用现代机械的潜力，罗盘、火药、印刷术等诞生于中国便是明证。然而，孔子的独特地位却让中国人将聪明才智花费在了吟诗作文、阐述孔子思想的过程中，加之孔子轻视实用技术，中国人“不愿耗费精力，进行发明创造”。如果出生在中国，爱迪生的地位还不如一个诗人。^[2]中国人“在老朽的孔子先生统治时期……似乎发现了一切”，但从此以后再无进展。如果英国是狮，美国是鹰，中国就是“正在冬眠的熊”。^[3]

既然有着如此特别的传统，中国科技发展便波澜不惊了。中国人尤其强调以食为天，但种植粮食的肥料自“孔子时代”以来，毫无改变。19世纪末的中国仍无化肥概念，挑着粪桶的“苦力”穿城而过是一道随处可见的风景。^[4]洞庭湖畔，麦浪翻滚，中国人只能用“孔子使用过的袖珍折刀”加以收割。^[5]而在穿衣方面，中国人不仅延续着手工织布的传统，织布需要的所有苧麻纤维也以孔子时代的方式生产。中国人“平静、专心而又艰难”地劳作，“每周生产一磅左右的（苧麻）纤维”。^[6]作为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进程的支柱之一，采矿业在西方世界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国的矿产资源尽管极为丰富，孔子仅仅允许人们耕种土地的教诲却让人望而却步，不敢涉足潜力如此巨大的领域，更别说发展相应的技术。美国报纸希望，“现代机械”能够随着中国的门户开放进入孔子国度。^[7]因为“唯一的畅销书就是孔子著作”，

[1] “Our Trade Is in Imminent Danger,” *Chicago Tribune*, Apr. 28, 1895: 43.

[2] “Big Chinese Guns,” *Los Angeles Times*, May 6, 1894: 13.

[3] Untitled Article, *Los Angeles Times*, Apr. 13, 1897: 6.

[4] “On the Siphon Plan,” *Chicago Tribune*, Mar. 11, 1894: 36.

[5] “Yangtse Floods Terror to China,” *Chicago Tribune*, Oct. 11, 1911: 7.

[6] “Ramie,” *New York Times*, Nov. 6, 1892: 4.

[7] “French Conce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Aug. 7, 1899: 7.

中国人没有快速交通，没有屠宰生猪的最新手段。报纸为中国人的境遇“感到难过”。^[1]中国的技术水平停留在3000年前的孔子时期。中国人没有也不喜欢蒸汽船，蒸汽船会让他们钟爱的帆船和小船毫无用处。这是一个“没有机械的国家，国民的创造才能处于休眠状态，几乎不模仿什么，也不改进什么”。报纸甚至轻蔑地写道，如果所有中国人突然离开，“除了几堆（制作砖瓦和陶瓷的）黏土之外”，中国不会留下任何人类生活的痕迹。^[2]

即使在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用品领域，中国人同样没有改进与创造的激情。中国人吟诗作文、阐释孔子学说的用具——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孔子以毛笔书写。但时至20世纪初，笔在西方已经经历芦苇竿、鹅毛笔、金属笔等数个发展阶段。中国人依然如故，全然不理睬正在成吨生产并广泛使用的钢笔。^[3]毛笔是“第一种类型”的笔，中国人却抓住不放。在他们看来，毛笔“既然完全符合孔子的需要，也必然符合自己的需要”。任何改进书写工具的动力湮灭在了孔子崇拜之中。^[4]因崇拜孔子而滋生的惰性渗入了其他生活技艺。比如，孔子时代的中国人已经拥有极其娴熟的投球和其他手技杂耍技艺。然而，近2000年之后，中国人在此领域“没有任何进步，未作任何完善”。应变能力更强的日本人反而后来居上。^[5]中国的音乐亦是如此。孔子还是懵懂孩童时的音乐演奏模式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6]总之，近代中国一切从孔子思想出发，一切以远古模式为准，造就了

[1] “China Compelled to Bow to West,” *Chicago Tribune*, Nov. 10, 1911: 6.

[2] “Bishop Potter and Machinery,” *Chicago Tribune*, May 9, 1897: 32.

[3] “Chinese Hair Brush First Form of Pen, Still in Use,” *Chicago Tribune*, Jan. 15, 1911: E3; “First Form of the Pen,” *Los Angeles Times*, Jun. 11, 1911: 110; “Pens of Olden Times,” *Chicago Defender*, Aug. 5, 1911: 4; “First Form of the Pen,” *Boston Globe*, Oct. 26, 1913: SM15.

[4] “Making Pens by the Ton,” *Washington Post*, Sept. 11, 1910: M3; “Reed, Quill, and Steel Pen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29, 1910: 20; “Pen Points,” *Boston Globe*, Feb. 9, 1919: SM15.

[5] “Juggling,” *Boston Globe*, May 3, 1903: 54.

[6] “Music and Musicians,” *Boston Globe*, May 5, 1918: 48.

中国沉溺于昔日辉煌的民族惰性。在美国报纸上，孔子思想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对立如此尖锐，以至于每日耳濡目染西方社会“进步”的在美华人也在变革面前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他们与千年以前的祖辈在生活方式、服装、饮食和娱乐等方面别无二致，“就跟孔子一样，与美国特征泾渭分明”。^[1] 19世纪后期，电话在美国逐步普及。但旧金山的华人因为孔子从未提及如此崭新的技术，不敢贸然采用。只是在多次会议商讨之后，他们才决定安装。^[2]

因为尊崇孔子而产生的惰性不仅让中国在技术上落后于人，更因为思维模式的僵化而在国家生存方面岌岌可危。欧美和日本对于孱弱的近代中国虎视眈眈，动辄武力相加。中国则由于长期忽略军事思想和技术的进步，无力应对。军事上与列强之间的鲜明对照被归咎于孔子根深蒂固的影响。“伟大的孔子宣扬战争的无耻”，中国的士兵历来被归入最为卑贱者之列，“只配与最下等的家仆和被社会遗弃者为伍”。^[3] 孔子教育人们“憎恨战争，鄙视士兵”。中国因此受到西方的鄙视，“这多少是个悲剧”。^[4] 因为孔子宣扬的“极度谦卑”，中国“有被儒家文明的武器摧毁的危险”。^[5] 有了孔子深入骨髓的影响，中国人即使祈求神灵也无助于他们在战争和外交中取得成功。^[6] 轻视武力、将士兵归入屠夫一类，这既是“整个孔子思想体系的弱点”，也是中国国民性格的硬伤。依《洛杉矶时报》之见，一个国家如不徒有虚名，必须能够组织有效的国防，但孔子思想主导的近代中国却不堪一击。^[7] 中国如果希望让人敬畏，就必须改变孔子宣扬的“和为贵”思维，培养国民的“战斗精神”、尊重士兵的氛围以及举国上下的爱国主义。

[1] “Chinese Immigration,” *Washington Post*, Nov. 6, 1901: 5.

[2] “Chinese Cooks and Telephones,” *Los Angeles Times*, Jul. 2, 1899: 21.

[3] “China for the Chinese,” *Boston Globe*, Oct. 1, 1907: 10.

[4] “China Turning to Art of War,” *Boston Globe*, Nov. 11, 1911: 4.

[5]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Dec. 24, 1894: 4.

[6] Editorial, *New York Times*, Feb. 14, 1895: 4.

[7] “China and Nationality,” *Los Angeles Times*, Aug. 19, 1919: II4.

在此类变革之前，所谓的黄祸只能是“鬼魅魔影”。^[1]

面对外部入侵时，“孔子的后代”被称为“地球上最能沉住气”的民族，其“处变不惊之态堪称典范”。^[2]这与“西方文明国家与生俱来的思想”迥然有异。对于邻省发生的外敌入侵，中国人“不会表现出丝毫忧虑或兴趣”。^[3]甲午一役，“不得要领的孔子箴言”让四亿之众的中国人败于人口仅十分之一的日本。中国“没有表现出任何耻辱感，几乎未作任何抵抗”。^[4]列强在中国来去自由。中国人的抵抗和团结意识如此淡薄，以至于“你可以不要自己的军队，在当地雇用一支中国人组成的军队即可”。中国人不为侵略所动，“继续思考着孔子格言，等待着另外一群该死而愚蠢的炸药专家拿定‘征服’中国的主意”。^[5]即便是美国媒体视为开明的李鸿章也对战争避而远之，因为“和为贵”是孔子的教诲。^[6]唯有犯上作乱的反叛者才能稍有偏离孔子制定的鄙视武力的轨迹。^[7]

作茧自缚而又古旧过时的军事观导致近代中国在主动御敌意识方面严重落后西方，与世界同步的军事技术更是无从谈起。论及19世纪80年代的中法战争，有报纸以轻蔑的语气断言，“欧美的普遍观点是，与任何一流国家的武力冲突都将暴露中国的弱点”。中国既缺乏爱国主义和尚武精神，亦无“武器使用技能”。^[8]近代武器的核心是火药的广泛应用。但发明火药的中国始终未能制造出威力强大的武器。发明火药是“孔子的错误之一”，中国人“极度后悔”。^[9]自火药出现之后，中国便将其束之高阁，缺乏“积极兴趣”。“孔子在其体系中忽略水雷，这是一个严重失误”，盲从的中国人在武器上自然落

[1] “The Yellow Peril,” *Chicago Tribune*, Jun. 13, 1904: 6.

[2] “British Police Organize Trade Union,” *Atlanta Constitution*, May 25, 1919: 26.

[3] “The Peace-Loving Chinaman,” *Atlanta Constitution*, Jul. 4, 1904: 6.

[4] “Present and Future of China,” *Chicago Tribune*, Jan. 19, 1898: 6.

[5] “Plain Talk for Plain People,” *Boston Globe*, Apr. 23, 1916: 50.

[6] “Li Hung Chang Opposed to War,” *Chicago Tribune*, Aug. 2, 1896: 6.

[7] Untitled Article, *Chicago Defender*, Nov. 11, 1911: 4.

[8] “France and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Jun. 9, 1883: 0_2.

[9] “Help Us Laugh,” *Boston Globe*, Nov. 6, 1894: 10.

后于人。^[1] 中国军队只得沿用弓箭，“孔子不知道武装步兵还有其他方式，如果（中国）不幸需要步兵并且步兵需要武装的话”。晚清政府虽然聘有外国教官，但弓箭手依然是中国军队的主力，可见传统影响的顽固。^[2] 爆竹和铜锣据称也是中国的主要武器，当然无助于以孔子为圭臬的国家熟悉“铁甲舰和连发步枪”。^[3] 观念落后的中国无法理解和应对西方日新月异、种类繁多的武器。比如，光炸弹就有黄的、绿的、蓝的、黑的、带条纹的、蛋形的、筒状的、圆锥形的、凹形的等，更不用说各种手榴弹和炮弹。诸如此类的武器“能够将仍处于孔子时代的中国武士……送回老家”。^[4] 落后不止于技术层面，军事谋略同样因为守旧而差强人意。中国军队采用的“孔子战术”认为，雪是和平的征兆。只要野禽南飞，战事便停，军队安营扎寨，刀枪入库，放马南山。被中国皇帝斥为“蠢贼”的日本人却灵活吸取欧洲经验，在中国军队偃旗息鼓之时发起攻击。虽然日本“野蛮地违反了战争规则”，中国却丢掉了旅顺。^[5]

中国人事无巨细，皆以孔子为纲，到了僵化的地步。他们以尊古为荣，却与近代技术失之交臂。军事领域的止步不前后果尤为严重，国家生存危在旦夕。甚至已成世界强国的美国也时刻不忘中国的前车之鉴。20世纪初，美国为其驻扎在热带地区的军队提供的给养极其丰富，六周时间便让50%的士兵因患肠道疾病而疲惫不堪。此事引起有识之士的警惕，他们告诫美国政府，勿学“孔子门徒”，在军事医疗组织和卫生方面落后于日本。^[6] 曾参加美西战争的外科医生路易斯·利文斯通·西曼 (Louis Livingstone Seaman) 认为，美国必须

[1] “If China Wakes Up,” *Boston Globe*, Apr. 24, 1904: 36.

[2] “Modernizing China,” *New York Times*, Sept. 17, 1905: 8.

[3] “Ups and Downs of China’s War God,” *New York Times*, Nov. 16, 1895: 6.

[4] “Bomb School Up to Date,” *Los Angeles Times*, Aug. 6, 1915: 15; “Britons at Front Become Expert in Making and Throwing of Bombs, Now as Respectable as Are Rifles,” *Washington Post*, Aug. 8, 1915: 8; “Bombing School for the Soldiers,” *Atlanta Constitution*, Aug. 13, 1915: 5.

[5] “The Japanese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Feb. 5, 1895: 4.

[6] “Shame to Army System,” *Chicago Tribune*, Mar. 31, 1905: 2.

时刻做好战争准备，“孔子追随者在 2500 年前奉行的道德说服理论在 20 世纪已经不再适用”。^[1]1917 年初，威尔逊决定与德国断交，此举令不介入政策的批评者欣喜若狂。欢呼者认为，“威尔逊总统没有辜负人们的希望；他让美国重新屹立于国家之林”。孔子以德服人的逻辑主导了中国的外交。即使外国军队“进犯北京，也未能让中国从国家和平主义和政治无助中警醒”。通过威尔逊采取的措施，“美国已经证明，她与中国截然相反”。^[2]

四、抛弃孔子：中国摆脱落后之路

既然孔子束缚着中国的思想，窒息着其创造力，孔子似乎理应被抛弃。但国家不能须臾没有精神支撑。何以代替孔子？秉承一贯的欧美中心论和文化优越感，美国报纸鼓吹，让基督教及其造就的文明成果引导中国人走出周而复始的落后怪圈。他们竭力强调基督相对于孔子的高人一筹，突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国家“责无旁贷”的拯救义务，渲染中国采纳基督教文明成果所表现出的“进步开化”。按照如此逻辑，中国唯有从精神到现实全盘西化，方能满足文明进步的标准。

孔子与基督，是美国媒体长久以来兴趣不衰的比较对象。但凡涉及中国落后状态者，皆以孔子为次，以便证明中国的现状绝非偶然。孔子的信念“没有触及基督教世界所信奉的宗教”，缺乏相应的“热情和灵性”，是“进步的对立面”。^[3]孔子思想充斥着“陈词滥调”，对于中国国民精神的影响“令人悲哀”。它仅仅优于“赤裸裸的迷信”，与基督教相去甚远。因此，“除了百科全书，今天的任何地方尊崇孔

[1] “Argue for Peace, But Back Wilson,” *New York Times*, May 17, 1915: 2.

[2] “Former Critic Praises Action,” *New York Times*, Feb. 4, 1917: 3.

[3] “Antiforeign Coup in China,” *Washington Post*, Nov. 29, 1913: 6.

子都纯属浪费时间”。^[1]“中国最有智慧的人”孔子应该为中国“停滞不前的思想”负责，因为本是顺应一时之需的学说演化成了永恒的真理。相比之下，基督的智慧永不过时，“基督的教诲在所有国家都实际而且适用”。^[2]有着诸如此类的思维定式，美国报纸才会自信地宣称，他们反对儒教，是“为中国自身的利益”，绝非出于推动传教工作之需。^[3]孔子经久不衰的影响力不仅保守，更“让乌云聚积，可能在东方的基督教地平线上投下阴影”，而基督教则是“照亮世界通往真正自由之路的火炬”。^[4]

为了彻底否定儒教与基督教在中国共存的可能，力证中国落后的报纸文章极力抹煞两者存在的任何共性。孔子制定的礼仪体系“通常与西方风俗截然相反”。^[5]就连本质上殊途同归的黄金准则，报纸也要区分高下。孔子准则“消极”，基督准则“积极”，“两者大相径庭”。依照孔子教诲，生活便“充满痛苦和忧伤”。基督教义“定能让你忧虑渐消”。^[6]孔子的黄金准则是“没有恶意的无为哲学”，而基督教则倡导“积极助人”。如果遵循孔子，“你就不应该将落水者拉上湖岸，除非是你亲自把他推下去的”。^[7]孔子影响之下的人们挣扎在“堕落潦倒的深渊”，基督教“真正而又全面地宽恕有罪者”。^[8]孔子还鄙视女性，而基督教国家的法律和风俗“颂扬女性的权利和利益”。^[9]高低立辨的态势让孔子“渐归湮没和沉寂”。^[10]

深信孔子—基督二元对立的报纸文章为美国人在中国的任何“善举”欢呼雀跃。凡是来到中国，美国人都在“为孔子的儿女送去爱的

[1] “Confucianism Is a Bit Antiquated,” *New York Times*, May 7, 1908: 6.

[2] “Of Christ and Confucius,” *Washington Post*, Jan. 14, 1901: 12.

[3] “Restoration of Confucius,” *Los Angeles Times*, Jan. 30, 1914: 15.

[4] “China and Confucius,” *Los Angeles Times*, Mar. 15, 1914: V22.

[5] “Chinese Politeness,” *Los Angeles Times*, Nov. 9, 1914: 18.

[6] “Supreme Court Justice in a New York Pulpit,” *New York Times*, May 30, 1904: 5.

[7] “Bryan Talks on Limiting Fortunes,” *New York Times*, Dec. 2, 1907: 16.

[8] “First Farewell,” *Boston Globe*, Oct. 8, 1900: 6.

[9] “Would Bar Wordobey,” *Washington Post*, Mar. 1, 1909: 4.

[10] “Sounds Warning,” *Boston Globe*, Jan. 17, 1898: 3.

启迪”。^[1] 由于传教士的“无私”举动，中国人“爱戴美利坚之名远胜于热爱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孔子正在让位于华盛顿。^[2] 传教士的“义举”送去福音，开启了中国人的心智，“孔子国度将朝着彻底新生迈出一大步”。^[3] 报纸大肆吹捧传教士的敬业精神。佐治亚州的盖瑟（Gaither）牧师临终之前的最后要求，是要妻子去中国传教。盖瑟夫人没有辜负希望，“正在孔子的追随者中间从事着高尚的工作”。^[4] 已在中国传教近40年的林乐知（Young Allen）带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情，再次离开家乡亚特兰大，前往中国。报纸认为，自孔子以降，中国还无人如此深远地影响民众。孔子的哲学已被民众盲从多个世纪，林乐知却让中国人“目睹并感受着基督教文明”。作为中国“新启蒙运动的灵感源泉”，林乐知理应被中国未来的历史学家视为“该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5]

在科技实业方面，美国人似乎也有用武之地，值得圈点。匹兹堡技师沃尔特·肯尼迪（Walter Kennedy）执掌中国汉阳的钢轨工厂，产品质量不亚于美国或者欧洲原产。自孔子时代以来，此事“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最为重大的意义”。^[6] 汉阳另有数个炼铁厂在建。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国技术队伍已经组成。中国的铁路、船舶和武器有望使用国产钢铁。报纸自信地宣布，“西方文明已经植入（中华）帝国”，欧美的帽子盖住了“孔子的辫子”。^[7] 伊利诺伊州的乔舒亚·K. 斯拉克斯比（Joshua K. Slukesby）在芝加哥采购大型工厂的全套装备，准备在中国建厂，“推翻（中国）数个世纪的传统，消除伟大的孔子至今仍在其追随者心中发挥的巨大影响”。^[8]

美国报纸颇为惊喜地发现，西方文明的先进之处不仅促使美国人

[1] “Cupid, Dean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Chicago Tribune*, Apr. 28, 1907: F6.

[2] “America the Chinese Ideal,” *Chicago Tribune*, Jun. 17, 1912: 10.

[3] “China and the Missions,” *New York Times*, Oct. 2, 1900: 6.

[4] “Talk of the Town,”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 14, 1894: 14.

[5] “Dr. Young Allen Tells of His Work in China,” *Atlanta Constitution*, Dec. 13, 1898: 8.

[6] “Railmaking in China,” *Chicago Tribune*, May 31, 1897: 10.

[7] “The Chinese to Make Iron,” *Chicago Tribune*, May 31, 1891: 6.

[8] “To Make Millions in Chinese Cues,” *Chicago Tribune*, Jun. 2, 1901: 28.

竞相前往和改造中国，“开明”的中国人也在着手改弦更张，弃孔子而纳基督及其缔造的技术和文化。基督教文明首先“感化”着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们或者宣扬基督教的优越，或者以实际行动，去除孔子影响，或者信誓旦旦，希望为中国抛弃孔子尽己所能。旧金山华人报纸《中西日报》执行编辑是宣扬基督的华人之一。此人表示，孔子虽是伟大的学者，但不是圣人，不能让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唯有基督教培养的人才方能“支撑中国”。^[1]一名留美学医的中国女性深信，中国有着过多的孔子伦理规范，现在需要的正是基督教。^[2]在抛弃孔子方面躬行实践者也不乏其人。在美华人从来都试图融入美国社会，淡化与强化孔子信仰的现象如影随形，深得报纸赞赏。约50名居住在亚特兰大的中国人剪掉辫子，忘记神灵，不再崇拜孔子，而是皈依基督。这表明，该地的中国人“将继续遵循新近采纳的美国方式和共和主义生活理念”。^[3]首都华盛顿的中国人同样显示出“屈从于现代思想和方法压力”的迹象。比如，自孔子以来就未变化的“原始”拔牙方法正被华人抛弃。华人“与其白人兄弟一样”，接受着专业牙科医生的治疗。^[4]在夏威夷就读的“孔子子孙”甚至组织棒球队，与南加州大学队展开比赛。这是华人组成的运动队首次进入南加州地区，因尊崇孔子而成的华人刻板思维正在减弱。^[5]与此同时，报纸时有提及欲以在美所学改变中国的华人，证明基督教文明的感化作用。纽约经销茶叶的冯姓富商因其儿子的选择大伤脑筋。儿子来美以后，“抛弃孔子信仰”，改信基督教，并且声称，将在适当时机，返回中国，做一名传教士。父亲以不准继承遗产相威胁，儿子也不为所动。^[6]在《纽约时报》组织的城市史竞赛中获得现金奖励的华人男孩莫华（音），居住在纽约的中国城。莫华的父亲将基督教置于儒教之上。受其影响，

[1] “A Chinese Editor in the Pulpit,” *New York Times*, Dec. 30, 1901: 7.

[2] “Chinese Woman an MD,” *Boston Globe*, Jun. 9, 1912: 32.

[3] “Chinamen of Atlanta Not Worried by Change in Their Old Country,” *Atlanta Constitution*, Dec. 14, 1915: 4.

[4] “Chinamen Are Dental Stoics,” *Washington Post*, Dec. 15, 1907: M3.

[5] “Chinese Baseball Team to Invade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imes*, Jan. 10, 1914: III1.

[6] “Forsook the Faith of Confucius,” *Chicago Tribune*, Jun. 7, 1891: 5.

儿子也认为，“儒教是愚蠢的”。莫华阅读美国书籍，而且“深切地希望，他能利用自己接受的美国教育和对美国制度的了解，在同胞中出人头地”，改变中国。他因此被描述为“聪明且具有雄心壮志”。^[1]

中国国内似乎同样不乏“喜人”变化，美国报纸自然不吝纸墨，绘声绘色加以描述，以证基督教文明的典范效应。报纸首先突出的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因为频败于外国列强，已经明确领悟孔子与基督文明体系的优劣对比。中国的各大报纸业已达成共识：“拥有孔子箴言和古老制度的中国已经落后于时代。”^[2]《纽约时报》称赞中国人是“极有见识的民族”，认为他们“必定看到并且赞赏”那些抛弃孔子哲学的中国人所取得的成就。^[3]很多中国人发现，孔子既没坐过火车，也没使用过电话和电报，他对科学一无所知，“只是一个守旧老朽而已！”^[4]有鉴于孔子造就的所谓劣势，众多中国人“正在抛弃孔子信仰，转而信奉更加新颖的基督教原则”。^[5]中国“最深刻的思想家”得出结论，中国欲自强，必须将孔子宗教如同废旧家具一样抛进垃圾堆。^[6]康有为当为如此一人。他在中国“无所畏惧、不知疲倦地积极宣传孔子国度西化的必要”，誓将中国变成另一个日本，甚至另一个美国。^[7]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伟大而又寂静的革命”。^[8]“在袅袅的香烛烟雾中”，中国人“已经听到来自自由的呼唤”。小脚女人颤巍巍地前去投票，男人剪掉指甲，话里夹带着萧伯纳和易卜生的名言。“老朽孔子的子孙已经敢于与自由的后代并肩站立”。^[9]

[1] “Chinese Boy Who Won Prize in City History Competition,” *New York Times*, Jun. 28, 1903: 34.

[2] “Why Japan Conquers China,” *Chicago Tribune*, Jan. 31, 1895: 11.

[3] “Topics of the Times,” *New York Times*, Mar. 5, 1906: 8.

[4] “The Chinaman’s Destiny Is That of the White Man,” *New York Times*, Oct. 29, 1911: SM2.

[5] “General Notes,” *Chicago Tribune*, Feb. 26, 1882: 18.

[6] “Two Revolutions,” *Los Angeles Times*, Dec. 1, 1911: II4; “China Needs More Police,” *Los Angeles Times*, Feb. 15, 1914: III27.

[7] “Chinese Reformer Visits America,” *Atlanta Constitution*, May 29, 1905: 6.

[8] “In Modern China,” *Washington Post*, Aug. 22, 1909: 13.

[9] “The Game of the Free,” *Atlanta Constitution*, Jul. 7, 1912: G7.

在美国报纸的刻画之下,震撼于基督教文明发达程度的中国人不仅在思想上产生了微妙变化,他们还在采取实际行动,革除孔子强大影响力所设置的“障碍”。因其塑造国民性格的核心作用,教育受到报纸的极大关注。《华盛顿邮报》宣称,中国如欲挖掘发展潜力,“整个教育体制都必须变革”。^[1]19世纪末,美国报纸就“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即将重视西学的迹象。1897年,皇帝下诏,要求科举试题应与现实相联系,从而首次超越孔子以来的中国经典之限。圣经中的大洪水事件出现在考试问题中。西方宗教、西方科学、西方政治经济学、西方哲学等都引起中国学生的兴趣。^[2]当然,最令美国报纸兴趣盎然的,还是1905年9月中国废除科举制。西学终于能够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教育体制。要求熟读孔子经书的传统考试“纯属某种文学魔术”,“阻碍人们关注其他新颖和更加有用的知识”。废除科举“为中国人熟悉西学提供了最为强大的动力”,是“中国获救的最有效方式”。^[3]孔子让位于现代教育,西方惧怕已久的“黄祸”终有迅速成为现实的可能。^[4]受此变革带动,“西方文明中一切优秀和进步的东西”逐步在中国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孔孟著作相形见绌。西方科学、英语、英美风俗、巴拿马运河、美国关税、英国海军等成为中国学生热烈讨论的话题。^[5]

顶住“保守”压力、积极推进西学的地方人士亦有时常见诸报端者。比如,辽宁海城市长改佛教庙宇和孔庙为“现代教育和现代监狱改造方法之庙”,便引起美国一驻华领事的注意。^[6]广东省的教育主

[1] “People Met in Hotel Lobbies,” *Washington Post*, Oct. 9, 1907: 6.

[2] “Up-to-date Questions,” *Boston Globe*, Dec. 2, 1897: 6.

[3] “Modern Ideas to Be Adopted,”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 8, 1905: 7; “China Concludes to Become Practical,” *Los Angeles Times*, Sept. 8, 1905: 12.

[4] “Editorial Points,” *Boston Globe*, Sept. 11, 1905: 6.

[5] “Booker T. Washington’s Logical Successor,” *New York Times*, Feb. 19, 1911: SM12; “China’s Mind Drifts West,” *Los Angeles Times*, Nov. 4, 1910: III; “China’s Great Awakening,” *Boston Globe*, Apr. 3, 1906: 5.

[6] “Turn Temples into Schoolhouses,” *Washington Post*, Feb. 19, 1906: 9; “School in Chinese Temples,” *New York Times*, Feb. 19, 1906: 5.

管是“雷厉风行的基督教徒”，他与当地的保守势力就学校的孔子崇拜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据称，即使他的敌人也承认，这是一个“全心为了本省青年利益而不辞辛劳的人”。他所树立的典范为其他各省所效仿。^[1]相比之下，孔子直系后代“孔圣公”的举动似乎更具轰动效应。1907年，晚清政府拟在孔子出生地兴建孔子纪念学院，集中讲授孔子经典。孔圣公亲赴北京，表示反对。圣公认为，即使修建，纪念学院也应该经典与现代西学并重。孔子后代居然“站到进步主义者一边”，这是对中国保守势力的“沉重打击”。^[2]为使中国教育彻底西化，报纸极为赞赏某些中国人提出的汉字罗马化的倡议。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采用公历。《洛杉矶时报》确信，中国的下一步就是采用罗马字母。^[3]英文名为玛丽·斯通（Mary Stone）的中国人于1919年甚至明确提出了由39个字母组成的汉语新书写体系。她因此获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杰出英明”的赞许。^[4]

在实业领域，中国的发展也在“印证”着基督教文明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上海《万国公报》的创刊被视为中国建立西式出版业的开端。美国报纸大喜过望，称赞此举为中国“迄今为止最值得肯定的进步迹象”。一道微弱的亮光终于冲破黑暗，照耀着世界上“最陈腐”的专制国家。报纸兴奋的原因有二。其一，《万国公报》主编康有为曾师从翰林学士吴郁生，而翰林院被误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执掌的同文馆，公报的问世由此可以归因于美国的教化作用。其二，公报主编是孔子经典的积极批判者，“言辞激烈的评论”颇多。反孔与效美相结合，美国人自然为公报喝彩。^[5]19世纪末已在欧美

[1] “New China Lets Light in on Superstiti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2, 1913: 16; “Chinese Educator Here,” *New York Times*, May 17, 1914: C6.

[2] “Confucius a Reformer,” *New York Times*, Jun. 10, 1907: 2.

[3] “John Chinaman,” *Los Angeles Times*, Dec. 9, 1911: 114.

[4] “New Phonetic System in Chin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2, 1919: 6.

[5] “Japan and China,” *Washington Post*, Jan. 1, 1896: 6; “Good Stories for All,” *Boston Globe*, Jan. 22, 1896: 8. 康有为主办的《万国公报》创刊于1895年8月17日，同年11月，经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提议，为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同名报纸相区别，更名为《中外纪闻》，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1896年1月6日遭清廷查封。

成为主要运输工具的铁路同样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在重重阻力之下，“大型公司已经组建，路基正在建设，钢轨正在铺设，铁路网即将覆盖孔子国度”。报纸禁不住畅想，“中国铁路地图”很快就会出现。^[1]即使孔圣公也爽快同意津浦铁路穿越自己的领地。这是“中国改革精神最引人注目的事件”。^[2]19世纪90年代初，湖南曾因架设电报线引发民众骚乱。数年之后的1896年，从武昌到长沙的电报线却在民众的配合下进展顺利。报纸感叹曰，“伟大的孔子帝国正开始苏醒”。^[3]李鸿章聘用美国人经营中国一家现代农场，这被认为是“中国需要美国思想”的又一力证。报纸引申道，“古老的孔子帝国正在逐渐摆脱已经束缚其精神达两千多年的昏睡状态”。^[4]即使在孔子极度鄙视的商业领域，中国也迅速学会了西方的经营理念。证据之一是，1913年，山东省计划从兖州府修建一条公路至曲阜，以在春秋两季开行观光汽车。孔子故地成为商业化景点。^[5]而在1901年，总理衙门还对美国公使有关中国参与芝加哥博览会的提议不以为然，熟读孔子著作的中国官员“对于商业一窍不通，如同他们不了解没有出生的婴儿一样”。^[6]

基督教“优于”孔子思想，基督教衍生的文明恰好在近代将中国抛在了身后。美国报纸据此大肆宣扬以基督教替代儒教、以基督教所创造的文明引导中国发展的必要性。对于积极致力于按照美欧模式改造中国的美国人和采纳美国思想的中国人，报纸决不吝啬溢美之词。中国国内的变革迹象总能引起美国报纸的热情赞许。诸如此类的举措旨在传递如下信息：中国欲摆脱落后，须抛弃孔子，走向西化。

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内忧外困，积弱成疾。美国报纸给予大量关注，从特有的文化角度，向美国读者解释中国落后局面的成因和出路。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让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中国的思想基础——

[1] “Railroad Outlook in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Apr. 24, 1898: 7.

[2] “Chinese Regent’s Popular Reform,” *Washington Post*, Dec. 27, 1908: ES4.

[3] “China’s Telegraph System,”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 25, 1896: 22.

[4] “China Wants American Ideas,” *Atlanta Constitution*, Aug. 2, 1897: 4.

[5] “The Grave of Confucius,” *Los Angeles Times*, Mar. 13, 1913: II5.

[6]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rade,” *New York Times*, May 19, 1901: 25.

孔子学说。带着既定的认知模式，报纸发现，中国尊崇 2000 多年的孔子非但没有促进中国的发展，反而禁锢着中国人的创新思维，从而让中国与西方世界如火如荼的思想与技术变革失之交臂。中国落后被动的起因似乎已在孔子健在时就已注定。有鉴于此，美国报纸积极鼓动人们否定和抛弃孔子，转而接纳基督及其影响之下的文明体系。美国人，中国人，凡是作出如此选择者，均在报纸大加鼓励之列。

美国报纸的分析在深度和广度上当然难以比拟专业的学术研究，但却是美国社会中国观的重要塑造者和传播者，其民意影响不可小视。报纸聚焦孔子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并提出以基督相替代，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作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孔子为很多美国人所知晓。报纸选择孔子为切入点，既因为孔子在中国的地位，也能让读者轻易了解报道与评论的真实意图。这符合媒体文字言简意赅的一贯原则。第二，报纸的分析导向与美国国内的社会氛围密不可分。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正是美国改革运动风起云涌之时，针砭时弊、革新社会的使命意识成为思想主流。有此思想的美国人并不满足于在国内小施拳脚，他们更希望在国外大显身手。中国的落后引起美国人的诸多同情，也强化了他们改造中国的“责任感”。媒体通常是民意的风向标和载体，反映和推动美国人变革中国的蓝图便可理解了。第三，改革运动，尤其是进步主义运动，视教育、思想、科学为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报纸涉及中国落后局面的报道多以前述三个方面为重心，实属自然。第四，媒体报道有着为美国拓展在华利益的目的。传教士和商人是美国在华存在的两大支柱，“拯救”中国文章多以两大群体为主角和支持对象便是最好的说明。

总之，美国报纸对于中国落后原因的探寻带有显而易见的文化偏见和现实目的，是美国排华运动的折射。尽管如此，这种探索却为人们解释中国的衰落提供了较为新颖的角度，也是美国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美国媒体上的中国形象。

第七章

孔子：美国世纪之交援华舆论中的主角

与日欧一样，美国同为帝国主义列强，时刻觊觎并参与瓜分中国巨大的商业机会，且出台了严厉程度远在他国之上的排华法案。美国主要报纸无疑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美国媒体上不乏同情乃至支持中国和华工的文章，体现着某些有识之士的文化宽容和正义感。大凡为中国和华工权利呼吁者，多引用孔子其人其言为据。这既是因为孔子相对于中国和华人的象征意义，更是着眼于孔子自启蒙运动以来在欧美社会形成的巨大影响力。孔子当仁不让地成为某些媒体文章捍卫中国和华工权利的舆论武器。

一、孔子：值得称道的人格力量

孔子在美国人当中亦不乏赞扬者。相比华人的称赞之词，美国人的肯定不仅意在赋予孔子较高的地位，而且希望借此改变孔子以及他所代表的华人在美国的负面印象，为进一步声援中国和华人营造氛围。

美国推崇者主张，孔子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生活中，都应该享有与西方伟大思想家同等的地位。针对美国当时以人种特征区分优劣的流行模式，菲利普·肯特（Philip Kent）愤然写道：“孔子其人中等身材。我们可能希望他更矮。但我们不能为了迎合某种理论，

而剥夺他几英寸的身高”。^[1]显然，肯特反对矮化孔子及其思想的普遍做法。波士顿的 S. L. 鲍德温 (S. L. Baldwin) 牧师也呼吁人们“高度评价”孔子这位中国圣人。^[2]反对矮化并积极评价的美国人确有不少。他们多将孔子与基督放在同一高度。曾在中国和日本生活多年的一名牧师认为，“孔子的道德准则几乎不比基督教差”。^[3]在中国传教 40 余年的亚特兰大牧师林乐知毫不掩饰对于孔子思想的赞许：“孔子学说乃伟大的道德体系。它战胜了竞争对手。在我看来，儒教是基督教之外最优秀的宗教”。^[4]伦理修养协会创始人阿德勒教授宣布，就他极为欣赏的戒律和黄金准则而言，孔子与耶稣“处于同一水平”。^[5]《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评论视仁爱为“遵守戒律”之举。在此方面，基督教和孔子学说是相通的。^[6]美国科学研究院准备出版一套丛书，分卷论述“伟大思想家的生平”。孔子与苏格拉底、耶稣一道名列其中。《芝加哥论坛报》认为，这证明，美国正在经历着一场“道德和精神觉醒”运动。^[7]《波士顿环球报》相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说是中国整个司法体系的“基本概念”，这与美国的法律体系“实际上是一样的”。^[8]洛杉矶地方监察官伍尔瓦恩 (Woolwine) 认同此说，并且宣布，自己时刻不忘在日常工作中加以实践。他希望陪审团和巡逻警察亦能以此标准要求自己。^[9]除了与耶稣相提并论之外，孔子还与美国的立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享有同等殊荣。在 1906 年的富

[1] “Short Men: Small Stature But Large of Brain and Prominent Actors,” *Chicago Tribune*, Jul. 10, 1892: 29.

[2] “Chinese Religions,” *Boston Globe*, Oct. 3, 1887: 8.

[3] “The Teachers,” *Los Angeles Times*, Apr. 14, 1883: 4.

[4] “Eloquent Sermons Heard from the Atlanta Pulpits,” *Atlanta Constitution*, Jun. 24, 1901: 11.

[5] “Felix Adler and Minister Wu Ting-Fang,” *New York Times*, Feb. 4, 1901: 7.

[6] Dean Farrar, “Religion and the Citizen,” *Atlanta Constitution*, Mar. 9, 1902: A2.

[7] “Gossip of Books of the Day,” *Chicago Tribune*, Jul. 8, 1916: 7.

[8] “Chinese Golden Rule,” *Boston Globe*, Jan. 28, 1917: SM15.

[9] “Woolwine Speaks on Golden Rule Locally Applied,” *Los Angeles Times*, Oct. 16, 1916: II8.

兰克林诞辰纪念宴会上，主题演讲者称赞曰，富兰克林在美国的地位与孔子在中国的地位相当，因为他们确立的原则都“受到了普遍遵循和尊重”。^[1]

在让孔子与耶稣齐名的同时，更有少数美国人将孔子置于基督之上。《波士顿环球报》的一则评论写道，没有任何宗教的创立者所取得的成果能够超越孔子。孔子不但先于基督 500 年提出黄金准则，“他在教诲的实用性方面也是无人能够企及的”。^[2]另有美国人针对中国 20 世纪初出现的西化趋势提醒道，如果中国真的放弃孔子学说，转而采用基督教，“我会为中国感到惋惜”。撰文者认为，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作者进而告诉美国人，如果他们了解孔子思想并且知道四分之三的中国人都信奉孔子的话，他们应该“喜欢和崇拜中国人”。^[3]经常在《波士顿环球报》上以浅显易懂的文字阐述深奥哲理的弗兰克·克兰(Frank Crane)博士深有同感。他指出，虽然对于西方人而言，孔子之名显得模糊而陌生，但两千多年以来，信奉孔子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他思想家。因此，所有明智者都应对孔子及其思想有所了解。^[4]即使美国儿童在圣诞节敲打的鼓也早在基督之前就出现了，产生于中国的孔子祭祀活动。^[5]

孔子的生平轶事是美国人发现的又一亮点，同样印证孔子的伟大。伦道夫·巴特利特(Randolph Bartlett)的说法具有较大的概括性。首先，孔子从不自视清高，更无推动自我崇拜之念。其次，孔子所言逻辑连贯，绝无疏漏，对不同听众均有强烈的感召力。第三，孔子甚至已有以教育促进民主的思想。^[6]其他多位撰稿作者从不同角度补充细化了上述几大发现。有人认为，孔子教导深刻的真理，但不是为己，

[1] "All Honor Poor Richard: Observe Benjamin Franklin's Birthday Anniversary," *Chicago Tribune*, Jan. 18, 1906: 4.

[2] "A Daily Lesson in History," *Boston Globe*, Jun. 19, 1901: 10.

[3] "The Eagle," *Los Angeles Times*, Oct. 15, 1911: II.4.

[4] Frank Crane, "Plain Talk for Plain People," *Boston Globe*, Apr. 9, 1916: 50.

[5] "James Lane Allen on 'The Future Christmas,'" *New York Times*, Dec. 25, 1910: SM5.

[6] Randolph Bartlett, "Truth about Confucianism," *Los Angeles Times*, Feb. 3, 1914: II.4.

而是着眼于“他的人民和种族”。孔子“以自己的道德和伦理智慧，呈现出伟大的人格力量”。^[1]孔子从不要求人们尊其为圣人，他所谈论的“祖先崇拜”仅仅为了寄托对于逝者的哀思，与西方诘难者附加的僵化特性相去甚远。与此同时，孔子与种类繁多的中国迷信“几乎或者完全没有任何关系”。^[2]《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文章也认为，虽然中国人对孔子奉若神明，并且每年都有祭祀活动，孔子本人却“从未声称拥有神的特征，也从不允许他人将自己神化”。^[3]孔子处事公正。因为如此，在其作为鲁国大司寇期间，“犯罪现象据说已然消失”。^[4]

此外，孔子据信并非整天板着脸孔、只知谈天论道之人，而是“最具人情味的圣哲之一”。孔子热爱音乐，编选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曲调”。甚至一位年轻人因为时常哼唱孔子钟爱的某首乐曲，而有幸被孔子选中，成为女婿。^[5]“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的典故也被引为孔子爱好音乐的证据，见证着中国远古音乐的“完美和谐”。^[6]《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评论称赞孔子贴近生活的说理方式。作者写道，“孔老夫子是个天才”，他如同教师对待学生一样循循善诱。其教诲琅琅上口，极易背诵，轻松程度有如学唱儿歌“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7]也许孔子人情味的最大体现在于其富民思想。冉有曾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富之。”（《论语·子路》）《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仅此二字，孔子表达了99%的中国人的最大愿望”。历朝统治者都不敢对此有所怠慢，中国人对于财富的渴望“绝对成功地得到了满足”。^[8]

孔子与耶稣，是任何中美文化比较者难以绕开的话题。带有文化

[1] “Midnight Talks at the Club,” *New York Times*, Jul. 7, 1889: 13.

[2] “Topics of the Times,” *New York Times*, Jan. 31, 1914: 10.

[3] “Sir Robert Hart Gives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Concerning China to the London Authors’ Club,”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24, 1909: 2.

[4] “Greatest of Teachers,” *Boston Globe*, Feb. 7, 1902: 3.

[5] “Confucius Selects a Son-in-Law,” *New York Times*, Jun. 9, 1901: SM22.

[6] “Celestial Harmonies,” *Washington Post*, Feb. 16, 1909: 6.

[7] “What Would Jesus Think of Atlanta? Asks Billy,” *Atlanta Constitution*, Dec. 6, 1917: 12.

[8] “The Wealth of Cathay,” *New York Times*, Mar. 29, 1891: 18.

偏见者往往会在二者之间分出高低，这就是伍廷芳等在美华人极力反对的现象。很多美国人出于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和尊重，仗义执言，称颂孔子。此举虽然无法根本改变美国文化贬损华人的总体氛围，却有助于普通美国人多角度了解中国文化及其象征，并为直接声援中国和华人的声音作了舆论铺垫。

二、孔子：凸显排华举措的非理性色彩

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歧视华人，主要原因在于，不断延期和日渐苛刻的排华法案为排华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据排华法案，中国劳工“危及某些地方的良好秩序”，故被拒之门外。^[1]虽然故意忽略了工作机会方面的现实竞争，法案的确道出了美国社会对于华工的成见：品行“低下”，不足以让他们融入美国社会。针对如此偏见，诸多媒体文章纷纷表示，深受孔子影响的华人道德高尚，排斥华人实乃不明智之举。

身处排华核心地带的《洛杉矶时报》撰文指出，“孔子的追随者”表现出自称基督教徒的人们所欠缺或忽略的道德水准。他们不事张扬，任劳任怨，为美国家庭带来“舒适、方便和享受”，为白人创造着更多机会。担心美洲大陆会被中国人占据实属“可笑”。^[2]《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信奉孔子教海的中国人“并不缺乏西方国家的文雅和教养”，称呼他们为异教徒是“用词不当”。^[3]一位曾经积极反对中国劳工的美国人在阅读孔子语录节选之后毅然改弦更张，因为他发现了“中国道德体系的高尚之处”。华人劳工具有“节制、节俭、谦逊的

[1] “Chinese Exclusion Act,” in Henry Steele Commager and Milton Cantor, eds.,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1, 10th ed.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88), 560.

[2] “Ingalls: He Sharply Analyzes Immigration's Terrors,” *Los Angeles Times*, May 21, 1893: 17.

[3] “The Heathen,” *New York Times*, Nov. 3, 1910: 8.

美德”，限禁华人劳工之举从而显得“狭隘、偏执并违背所有宗教信仰”。^[1] 中国人在农历新年到来之际将旧账一笔勾销的大度和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促使另外一名美国人反思道，美国针对华人的所作所为，也许并不符合“人类普遍情感的要求”。^[2]

华人的诚实守信给排华法案的反对者们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排华举措更显其缺乏理性的本质。《洛杉矶时报》由某位华人上法庭索赔损失而引伸道，中国人看重诚信，不守信用的现象“极为少见”。孔子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仁爱诚实的民族”。^[3] 《亚特兰大宪法报》甚至认为，华人的良好品质曾经让美国最为严厉的排华后续法案严重受挫。1902年，以十年为期的排华法案面临又一次延续和升级，但附加更苛刻条件的版本未能在参议院的最初辩论中获得通过。乔奎因·米勒（Joaquin Miller）发表在《北美评论》上、以声援华人劳工为主旨的文章据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文力证华人的诚信品德，驳斥众多美国人的排华依据。中国人熟读孔子，是“世界上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他们严守诚信，每一家在华的英国银行都雇用中国人经手资金流动。日本银行亦是如此。中国人还是“世界上最讲卫生的人”。米勒与中国人共同开采砂矿达数年之久。据他观察，华人必定在每天工作之后更衣洗澡，绝无例外。米勒宣布，华人没有酗酒、乞讨和懒惰的现象。总之，华人对美国的社会秩序不构成威胁，他们反而能促进美国的发展和繁荣。^[4] 米勒的文章是否真如该报所言具有如此神奇的效果，似应另当别论。此文颇能引发人们对于华人良好品质的关注则确有其事。除《亚特兰大宪法报》之外，选登这一文章的主流媒体还包括《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等。^[5]

在同情和支持华人权利的文章中，孔子不仅造就了值得美国人尊

[1] Jerome K. Jerome, “An Invasion by the Heathen Chinee,” *Washington Post*, Aug. 20, 1905: G7.

[2] “Some Glances Backward,” *New York Times*, Oct. 14, 1888: 11.

[3] “Kind and Honest,” *Los Angeles Times*, Jul. 12, 1915: II4.

[4] “Joaquin Miller’s Strong Plea for the Chinese,” *Atlanta Constitution*, Apr. 27, 1902: 9.

[5] “Chinese Honesty,” *New York Times*, Dec. 29, 1901: SM18; “Chinese Honesty,” *Los Angeles Times*, Jan. 21, 1902: 3.

重的道德品质，也给予了中国人宽容的胸怀。媒体希望以此促使美国人反思其排华举措。就在距离孔子故里两英里之处，建有一座天主教教堂。孔子的第77代后人居住于此，“与天主教邻居保持着最为友好的关系”。^[1]在美华人活动家虽然强烈声讨华人遭受的歧视，但同时向美国人表明，由于孔子率先提出的黄金准则，在美华人将“继续在每年7月4日公开朗读独立宣言”。此举意在“让我们言行一致”，突出排华政策的虚伪特性。^[2]更有甚者，中国广东的三名年轻人“遵从孔子的教诲”，不顾美国针对华人的禁令，毅然在一战期间来到墨西哥，并从此处进入美国，希望加入美国军队，前往欧洲与德国人作战。三人遭美国海关官员逮捕，被控非法入境。此事既表现出中国人的宽容，更暴露出排华政策的不合时宜。办案警官“面对如此特殊的情形，深感为难”。^[3]戴维·格雷厄姆·阿德(David Graham Ader)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诗歌以极为形象的语言，刻画了一位加州华人矿工不计前嫌、帮助白人的事迹。此人名叫凌阿新(Sam Ah Ling)，他不但收入微薄，而且备受白人矿工的捉弄，被称为“旧金山海岸的怪物”。就在某天，白人矿工一拥而上，抓住阿新，剪掉其辫子，再将衣服浇上煤油，喝令其十分钟之内消失。阿新刚刚离开，突如其来的地震将白人矿工掩埋在废墟石块之下，他们“唯有昏厥等死”。因祸得福的阿新立即折返，“以善良的孔子之名”，救白人矿工于险境。因为这一“勇敢的营救行为”，“注定要遭受我们野蛮法律折磨”的阿新成为“我愿意赞扬的圣人”。^[4]在波士顿电车上为白人女性让座的中国人亦能证明，孔子道德丝毫不逊于美国信仰。据报道，这名中国人乘坐的电车非常拥挤，白人女性上车时已没有座位。中国人赶紧起身，女士却充满蔑视地看了他一眼，尔后方坐下，没有任何感激之意。^[5]与中国人的宽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排华阴影笼罩之下的美国尽显狭隘与偏

[1] “Shows Spirit of New China,” *Chicago Tribune*, Jun. 7, 1908: 5.

[2] “Not Criminals: Chinese Demand Repeal of Geary Act,” *Boston Globe*, Nov. 19, 1892: 5.

[3] “Chinese Cross Ocean to Fight the Kaiser,” *Los Angeles Times*, Jul. 7, 1918: 19.

[4] David Graham Ader, “Sam Ah Ling,” *Washington Post*, Oct. 21, 1889: 4.

[5] “Under the Rose,” *Boston Globe*, Apr. 19, 1893: 12.

执。1892年，芝加哥哥伦比亚博览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召开世界宗教大会。然而，日渐苛刻的排华法案却让“尊贵的孔子门徒”无法前往与会。^[1]

有鉴于孔子完善的道德体系和宽容美德，很多美国人难以认同针对华人的排斥政策，甚至视其为无法理喻之物。《纽约时报》的评论表示，美国可以向中国派遣传教士，而华人来到美国，不以改变美国人信仰为目的，并且具有诸多美德，反而遭遇百般阻挠。此事难以让人理解。^[2]《洛杉矶时报》刊文认为，移民美国者甚众，独禁华人绝非明智。每天都在涌入美国的外国人对于美国社会的危害程度远胜于来自“孔子国度”的中国人。正是华人之外的外国移民导致“工资降低，并损害美国劳工的尊严”。^[3]爱尔兰移民是排华运动的始作俑者和最为积极的鼓吹者。即便如此，“血管中流淌着爱尔兰血液”的弗兰克·布里斯托尔（Frank Bristol）牧师也因为孔子的完美形象和中国人的聪明而反对排斥华人。布里斯托尔质问道，“为什么排斥华人，而不是爱尔兰人？……爱尔兰人没有一部伦理和文学著作能与孔子《论语》相媲美……为什么排斥发明了火药、罗盘和印刷机的中国人，而不是只会制造麻烦的波兰犹太人？”布里斯托尔坚信，排斥政策与美国和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背道而驰，理应抛弃。^[4]

诚然，正如我们从美国近现代历史中所看到的，排华政策没有因为来自媒体的正义呼声而有丝毫减缓。其变本加厉的趋势反而有增无减。这说明，同情和支持华人的声音不是美国舆论的主流。但无论如何，此类声音的出现见证着美国社会理性思考力量的存在。孔子成为印证排华政策非理性色彩的参照体系，是同情和支持者文化宽容心态的体现，更是孔子的世界影响力使然。

[1] “No Chinamen Will Come,” *Washington Post*, May 12, 1892: 2.

[2] “What Will China Do about It?,” *New York Times*, May 9, 1892: 4.

[3] “An American Movement Demanded,” *Los Angeles Times*, Dec. 20, 1890: 4.

[4] “Labor Chiefs Scored: Dr. Bristol Attacks Mongolian Exclusion Policy,” *Washington Post*, Sept. 25, 1905: 2.

三、孔子：映衬传教逻辑的荒谬

欧美在华的传教活动是世纪之交的部分美国舆论声讨的又一对象。欧美传教士雄心勃勃，志在改变数亿中国人的信仰，但却收效甚微。中国人的反抗更是集腋成裘，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打击传教士的运动。这一运动随着义和团的出现而达到顶峰。中国人的不屈意志让很多美国人猛然警醒，开始反思传教活动得不偿失的局面，并呼吁传教士迅速撤离中国。孔子地位的牢固及其信仰体系的完善乃美国舆论反对传教士在华继续活动的根本原因，中国人的巨大敌意则被视为孔子信仰的外在表现。因此，孔子成为某些美国人试图说服传教士改变既定路线的依据和武器。

传教士不断提升传教要求之举基于如下认识：中国人的信仰体系鲜有可取之处，并且尽显愚昧和落后。同情中国遭遇者以此为重要突破口，呈现孔子学说的优势和进步，证明传教活动实为徒劳无益，而且有悖于基督教义。《洛杉矶时报》的文章开宗明义地写道，在华传教士屡遭不幸，传教活动是否值得已成媒体关注焦点。“孔子宗教”早于基督教数百年，已深入中国人心，基督教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立足机会”。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此事件上付出很大的财产和生命代价实属不值。^[1] 中国驻英公使指出，中国民众反感传教士，实因传教士试图动摇中国信仰基础所致。他反问西方人，“如果我竭力让你皈依孔子信念，你会做何感想？如果我告诉你，你从小秉承的信仰……一无是处，漏洞百出，你难道不会愤怒吗？”^[2] 悉尼·布鲁克斯 (Sydney Brooks) 撰文直截了当地宣布，那些宣称“孔子已下地狱”的传教士“在道义上根本无权留在中国”。深受孔子影响的中国人并不抵触基督教所代表的原则，但却警惕传教士的“破坏性趋势”。^[3] 《华盛顿邮

[1] “Is the Game Worth the Candle?,” *Los Angeles Times*, Oct. 6, 1895: 16.

[2] “Missionary Must Go Say the Chincse,”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 11, 1900: 8.

[3] Sydney Brooks, “The Regulation of Missionaries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Aug. 5, 1900: 7.

报》的读者来信认为，在华的西方传教士正在试图“将一堆自相矛盾的思想强加于一个并不情愿的民族”。“孔子及其追随者”至少言行一致，思想统一。所以，“全世界的人们应该要求，让中国人在所谓的愚昧中生活吧”。^[1]

事实上，千百年来引导着中国发展的孔子学说还有着基督教难以比拟的优势。《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视孔子学说为世界上最完美的道德规范：“如果‘中国异教徒’的孔子宗教被付诸实践，它优于任何信仰的任何教义理论，并且涵盖了基督教的基本真理。”因为如此，“美国 and 英国真正信奉基督教的人们”应该意识到，继续保护在华传教活动是“愚蠢和浪费”之策。来信总结曰，“撤出不受欢迎的传教士，我们能够更早更好地实现世界和平”。^[2]《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指责基督教国家针对中国发动了一场“血腥和报复的战争”。中国人被称为异教徒，仅仅因为他们信仰孔子哲学。但孔子传授的却是“高尚而辉煌的道德体系”，传播着“仁爱福音”。当欧美民族的祖先藏身山洞，像动物一样以野果充饥时，信奉孔子思想的中国人和埃及人、波斯人、印度人一道，“创造了全世界所有的文化、科学和文明”。^[3]参议员奎伊(Quay)深有同感。他在一次宴会上宣布，当美国人的祖先还穿着兽皮、在欧洲森林里以捕猎为生时，中国就有了孔子和星盘，并开始计算日月食周期。自此以后，中国形成自成一体的文明体系，具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抗衰老能力”。美国应该“因为中国的过去尊重中国，因为其目前的遭遇同情中国，满怀希望地展望其未来”。^[4]1903年的康奈尔大学年度校友聚餐会成为又一抨击对华战争、重申孔子学说优点的场所。路易斯·L·西曼(Louis L. Seaman)博士批评基督教国家将战争强加于中国。西曼提醒为了传教士利益而怂恿发动战争的人，不论西方如何为胜利欢呼，受孔子学说影响的中国具有极大的弹性和自愈能力，“孔子的子孙依然行进在伟大的文明进程中，并将

[1] J. H. L. Eager, "Leave the Chinese Alone," *Washington Post*, Dec. 10, 1900: 10.

[2] Edwin Hayward, "Foreign Missionary Work," *New York Times*, Mar. 31, 1901: 23.

[3] "His Anniversary," *Washington Post*, Dec. 25, 1900: 6.

[4] "Quay, the Philosopher," *Atlanta Constitution*, May 18, 1901: 6.

继续如此，这就如同河流照样流淌、玫瑰花照样怒放一样”。^[1]《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也呼吁尊重中国，因为孔子家族的历史可以溯至圣经中的诺亚时期。这说明，中国“不应被作为突然出现的国家”而受到轻视。^[2]

传教士历来认为，中国不仅信仰落后，科技和制度进步也远不如西方。传教士因此断言，他们必须在西方政府的保护下长期停留中国。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封建制度与西方存在明显差距的背景下，中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依然对传教士之说进行了反驳。《纽约时报》的一则简短评论极力反对“通过武力或威胁，强迫中国接受我们的进步”。如果让中国人按照孔子所定的思维模式前景，他们的科技可能“有时进展缓慢”，但却“更加踏实稳妥，更加令人满意”。^[3]所以，孔子学说与科技进步并非势不两立。托马斯·E. 格林(Thomas E. Green)赞同此说，认为中国吸收现代科技的动力来自“孔子的智慧”，而不是传教士的上帝福音。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偏见“令人沮丧地嘲弄着中国思想的基本尊严和博大精深”。^[4]20世纪初，孔子的直系后代“孔圣公”热情鼓励儒家教育应与现代西学相结合，既要坚守儒家经典和孔子崇拜，又要涉及社会科学、各种语言、体育、军事操练和政治学。报纸认为，圣公的表态标志着，“中国在现代教育方面迈出了一大步”。^[5]身为“中国幼儿皇帝未来岳父”的“孔圣公”，还同意津浦铁路穿越自己的领地。《芝加哥论坛报》称赞此事为“改革精神在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体现”。孔子后代非但“毫不保守”，而且“充分意识到改革所带来的便利”。^[6]针对中国的封建专制，同情者仍然从孔子那里找到了证据，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西方式的民主传统。《芝加哥论坛报》曾经写道，根本而言，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民主的。这应归功

[1] “Cornell Alumni Dine, Cheer Views of Alma Mater,” *New York Times*, Feb. 12, 1903: 8.

[2] “Chinese Nobility,” *Los Angeles Times*, Aug. 22, 1887: 7.

[3] “Scientific Gossip,” *New York Times*, Jan. 8, 1882: 10.

[4] Thomas E. Green, “China—The Enigma,” *Chicago Tribune*, Apr. 18, 1915: A5.

[5] “The Progressive Far East,” *Los Angeles Times*, Jul. 8, 1907: I6.

[6] “Marquis de Fontenoy,” *Chicago Tribune*, Dec. 27, 1908: G4.

于“孔子的教诲”。但文章作者没有详细罗列中国在封建制度下的民主特征。^[1]名叫西蒙·沃尔夫 (Simon Wolf) 的读者给《华盛顿邮报》去信,以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告诉美国人,孔子门徒拥有“无论如何赞扬都不为过的公正精神”。^[2]

四、孔子：凸现美欧对华政策的虚伪

由于崇敬孔子及其代表的价值观念,诸多舆论文章直截了当地猛烈抨击欧美国家以传教士遭受迫害和中国制度落后为由发动的一系列战争。署名“达德利大叔”(Uncle Dudley)的美国人在《波士顿环球报》撰文,细数欧洲列强在华暴行和美国的阻止不力甚至狼狈为奸。达德利愤懑地写道,“基督的追随者如此对待孔子的追随者,是历史的讽刺之一”。达德利进一步指出,西方并不关心中国的政治制度,他们的真正目的在于确保“中国乐意被剥削”。^[3]《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孔子学说的平和与大度折射出战争发动者的虚伪。他们以基督教之名进行“惩罚性征讨”,但绝非“基督教的权威阐释者”。“孔子门徒”每伤害或恐吓一个外国人,就会有至少一百个中国人死于“自称基督教徒者”之手。^[4]伊顿 (Eaton) 牧师也在布道中指出,列强在华战争表明,孔子是“公平与正义的坚定信奉者”,而基督教则堕落成“商业和残酷贪婪的同义词”。^[5]《洛杉矶时报》的一则评论更加尖锐,认为列强肢解“伟大的孔子帝国”,“充分而绝对地证明,地球上自称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其实无异于公路响马、扒手和敲诈勒索者”。^[6]

[1] “Fear Stability of China under Present Leaders,” *Chicago Tribune*, Feb. 24, 1913: 1.

[2] Simon Wolf, “Our Missionaries Abroad,” *Washington Post*, Aug. 14, 1895: 4.

[3] Uncle Dudley, “A Chinese Coup d’Etat,” *Boston Globe*, Jan. 28, 1915: 10.

[4]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 *New York Times*, Dec. 16, 1900: 20.

[5] “Christianity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Mar. 11, 1901: 7.

[6] Untitled article, *Los Angeles Times*, Dec. 23, 1897: 7A.

以武力赢得信徒的基督教，因此不比遭其贬损的孔子宗教高尚。^[1]

借基督教之虚，行侵华之实的急先锋——欧洲国家，因此遭到口诛笔伐。《波士顿环球报》来自天津大沽的报道称，“中国最神圣的庙宇和宫殿遭到文明世界的军队玷污，他们无情地践踏（中华）帝国的传统，以便报复北京的暴行”。践踏传统的方式之一就是“以胜利者的姿态”经过当地的孔子树。^[2]19世纪末，德国即将出兵孔子故里山东。柏林一家报纸引用孔子语录，告诫德国皇帝切勿鲁莽行事。《芝加哥论坛报》极其欣慰地转引此事，并且写道：如果孔子地下有知，他“一定会因为自己的道德原则被用以规劝一个准备入侵中国的基督教君主而感到高兴”。^[3]《芝加哥论坛报》提醒读者，“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人民会默许德国占领胶州湾及其邻近地区，我们就犯下了最严重的错误”。孔子在此安息，他所创立的哲学乃“整个中华文明、科学、文学和生活方式体系”的基础。^[4]1907年，有小道消息称，德国有意将胶州湾归还中国。《华盛顿邮报》和《芝加哥论坛报》均予以报道，视其为“极其明智之举”。此言的根据是，只要德国占据中国最为神圣之地，“梦想赢得中国人的信任或者好感毫无希望”。^[5]中国在因义和团运动而起的战争中落败，德国趁机提出让中国邀请德皇访华，规格以祭祀孔子为准。《华盛顿邮报》的一则评论对此深表愤怒，并且警告道，如果中国应允将德国皇帝和孔子相提并论，必将“失去获得同情的机会，也将丧失维护国家尊严和荣誉的最后借口”。^[6]

美国虽然不是1900年战争的始作俑者，但亦是八国联军的积极参与者。美国悍然出兵以保护传教士利益之举同样颇受诟病。针砭

[1] “Say Cranston Is Wrong,” *Los Angeles Times*, Jun. 19, 1900: 2.

[2] “China’s Temples Profaned,” *Boston Globe*, Sept. 10, 1900: 14.

[3] “Ripe for a Change,” *Chicago Tribune*, Jan. 2, 1898: 6.

[4] “Make It a Shrine: Temple of Confucius Stands near Kiao-Chou Bay,” *Chicago Tribune*, Dec. 24, 1897: 3.

[5] “Kaiser May Restore Kiaochow,” *Washington Post*, Jun. 22, 1907: 6; “Marquise de Fontenoy,” *Chicago Tribune*, Jun. 22, 1907: 8.

[6] “To Solve the Chinese Problem,” *Washington Post*, Nov. 14, 1900: 5.

者皆认为，美国加入侵略者行列绝非明智，这是孔子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使然。前国会议员詹姆斯·汉密尔顿·刘易斯（James Hamilton Lewis）直指共和党政府挑起了中国的敌意，后者因而默许中国民众攻击美国和其他外国人。即便如此，1900 之前的 15 年内，仅有 23 名传教士死于中国人之手。这些人皆因触犯中国神圣信仰而死，并非中国人滥杀无辜。刘易斯相信，美国政府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或者带着美国传教士的尸体撤离中国，或者派兵报复。报复显然并非上策：孔孟教诲之下的中国人视死如归，军事冒险显效的可能性极为渺茫。^[1]

美国政府没有听从刘易斯的建议，而是积极参与侵略中国的“阴谋”，“摧毁中国的政治主权，并且认同先入为主而又可耻的说法，即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必须得到保护，破坏一个国家、奴役一个民族因此是正当的”。美国政府所不愿承认的事实是，如果传教士具有孔子思想中的宽容美德，也许“迫害”不至于发生。传教士因为触犯中国信仰而受到惩罚，但在美华人却仅仅因为“愿意工作”惨遭杀戮。因此，最不应该由于外国人的安全问题侵略中国的国家就是美国。^[2]《华盛顿邮报》有些夸张地说，中国本可以将 500 万战士送到旧金山，报复美国的反华政策。但中国却寄希望于“道德观念的说服力量”。报纸问道，传教士对于由此表现出的孔子哲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差异有何感想？^[3]《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直言不讳地写道，美国“在法律上无权向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派遣传教士并试图让他们皈依我们的思维方式……孔子教诲是中国人民的唯一伦理”。希望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实属“荒唐”。美国应将传教经费用于改善国内民生。^[4]甚至造访美国的爱尔兰某城市市长，也对美国与其他列强串通一气、“以刺刀威逼孔子的追随者接受基督教”感到悲哀。^[5]

另一个侵华急先锋是日本。虽然不是基督教国家并且不以基督

[1] “Our Course in China,” *Washington Post*, Jul. 16, 1900: 7.

[2] “Are We in a Conspiracy?,” *Washington Post*, Jul. 9, 1900: 6.

[3] Untitled Article, *Washington Post*, Sept. 22, 1889: 4.

[4] W. H. R., “Mission Work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Dec. 23, 1900: 19.

[5] “Hope of Ireland,” *Boston Globe*, Mar. 11, 1901: 9.

教之名达到侵略目的，日本因其迅速西化而赢得欧美的好感。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势头，欧美多以默许乃至鼓励相应，美国媒体也时有为日本呐喊助威的文章出现。所以，从欧美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在华行径同样是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体现。极其自然地，日本成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舆论文章批驳美欧对华虚伪政策的又一突破口。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著名学术机构史密森学会的人种学家 W. J. 麦吉 (W. J. McGee)，从大脑的体积和重量角度，宣称日本人与美国人一样优秀，是“全面发展”的民族，“没有大脑”的中国人“注定灭亡”。麦吉用此逻辑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开脱，但却遭到艾伯特·S. 阿什米德 (Albert S. Ashmead) 的极力反驳。阿什米德认为，中国人的大脑优于日本人，日本接受了包括孔子道德在内的中国文明成果：“中国是原创者，日本只是模仿者。”日本侵略中国的正当性无法成立。^[1]

以更让人不易觉察的方式为日本侵略正名的撰文作者当数波特尼·比奇洛 (Poultney Bigelow)。此人大肆抨击德国，借此大力吹捧德国在华利益的继承者日本。德国与美国同为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但在一次大战中成为敌人。比奇洛此举在体现爱国主义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文化优越论思想。1897 年，德国因为两名传教士被杀，出兵山东，亵渎“孔子故土”。水井填满中国女孩的尸体，她们“宁愿死，也不愿落入信奉基督教的普鲁士人之手”。^[2] 看似同情中国的比奇洛实则日本的坚定支持者。日俄战争时，比奇洛声称，“日本在为美国贸易而战”，美国“理应感到羞耻”。^[3] 此人的亲日心态在巴黎和约之后更加暴露无遗，他此前攻击德国和俄国的真实目的是：支持已经西化的日本取而代之。比奇洛一厢情愿地声称，日本将是能够“在孔子国度赢得尊重”的唯一国家。中国急需交通和通讯设施，“唯有”

[1] “Prefers the Chinese,” *Washington Post*, Jul. 8, 1900: 18.

[2] Poultney Bigelow, “German Aggression,” *New York Times*, Nov. 13, 1914: 10; “Has Cruel Genseric the Vandal Returned in Kaiser?,” *Washington Post*, Sept. 22, 1918: SM1.

[3] “Bigelow Talks for Japan,” *New York Times*, Mar. 25, 1904: 2.

日本能解燃眉之急。中国应该“感激”日本。^[1]比奇洛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引来众多反对之声。针对比奇洛以美国的门罗主义类比日本接管德国的势力范围，王姓在美华人驳斥道，日本占领孔子故地，“与美国理想中的任何原则和传统背道而驰”。^[2]虽然没有明确指责美国的默许作用，此言亦有着明显的暗示信息。弗雷德里克·麦考密克(Frederick McCormick)赞同王的立场，指责比奇洛盗用美国原则，为日本占据孔子故里开脱。麦考密克甚至建议，王继续在美居住，比奇洛则应打点行装，离开美国，因为他的观点和支持的政策与美国理想格格不入。^[3]反驳者均着重提及美国理想，目的不言自明：美国政府并未按照理想阻止日本的冒险行为。

大张旗鼓地批判欧美对日绥靖政策的文章时有出现。《洛杉矶时报》的一篇评论将日本比喻为“响马大盗”，中国是其受害者。欧美绥靖希望达到目的是：在强盗保留掠夺财物的前提下，让受害者与其握手言和。然而，此举不仅“歪曲了基督教义”，而且“损害了孔子订立的行为准则”。绥靖政策的虚伪特性暴露无遗。^[4]《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斥责道，来自美、英、法的绅士们在巴黎的圆桌旁，决定了远在地球另一面的山东省及其3600万人民的命运，这绝对是“有史以来最诡异的(民族)自决范例”。因为孔子，山东是中国的圣地，日本占据山东违背公理。这比允许日本在加利福尼亚开采矿藏、经营铁路而同时大谈美国主权还要荒谬。^[5]生于加拿大、后移居美国并在中国生活达57年之久的著名教育家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撰写长篇评论，暴露日本的贪婪和欧美的虚伪。福开森将山东比喻为钱包，日本人只会在掏尽其中的钱财之后，才会将空空如也的钱包还

[1] “Mr. Bigelow Replies: He Believes That China Will Yet Bless the Name of Japan,” *New York Times*, May 23, 1919: 10.

[2] K. P. Wang, “Japan’s Course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May 20, 1919: 16.

[3] Frederick McCormick, “Japan and China,” *New York Times*, Jun. 1, 1919: 34.

[4] “China Boycotts Japan,” *Los Angeles Times*, Aug. 31, 1915: II4.

[5]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5, 1919: 16; “The Window of the Worl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22, 1919: 3.

给中国。虽然山东向一战中欧洲西部战线的英法军队派出 17 万 5 千名劳工，日本未有一兵一卒帮助他国作战，欧美却为了国联而牺牲中国利益。福开森敦促美国，不要从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倒退，希望参议院拒绝批准巴黎和约涉及山东的条款，“捍卫美国荣誉，伸张正义事业”。^[1] 山东承载着中国的“国家孔子崇拜”，威尔逊总统居然同意将孔子故地移交日本，中国人对于此事将“永远耿耿于怀”。^[2]

政治和公众人物亦有直抒己见、抨击对日绥靖者。1919 年 7 月，正值美国参议院讨论是否批准巴黎和约之时，共和党参议员和来自太平洋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着眼于孔子故地在中国的特殊意义，反对和约附加将山东移交日本的条款。洛奇 (Lodge) 参议员甚至扬言提出动议，去除山东条款。诺里斯 (Norris) 参议员则威胁道，如果条约保留山东条款，自己将投票反对。威尔逊却极力捍卫自己偏袒日本的决定。^[3] 尽管从最终结果看，美国参议员的反对并未改变日本占领山东的既成事实，读者却能据此看到美国政府的双重外交标准。美国参议员詹姆斯·A. 里德 (James A. Reed) 反对国联的讲话则是另外一个例子。依里德之见，国联实乃“世界上财大气粗者制定的阴谋”。不仅如此，国联无法主持公正。日本抢占孔子出生地的“偷窃行为，就是因为得到装腔作势的巴黎国联允许才显得神圣了”。^[4] 芝加哥市检察官哈里·B. 米勒 (Harry B. Miller) 称山东问题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拦路抢劫案”，美国总统威尔逊是“该案共犯”。孔子故里是“每一个中国人仰慕之地”，却在 20 世纪被“所谓的民主信徒”交给日本。端坐在凡尔赛宫的同盟国绅士们犯下了这一“滔天劫案”，并得到威

[1] John Calvin Ferguson, "Why Shantung Is Stumbling Block in Treaty Signing," *Boston Globe*, Jul. 20, 1919: E4.

[2] Marquise de Fontenoy, "Query by China's Holy Duke: A bit of Oriental Satire," *Washington Post*, Sept. 20, 1919: 6.

[3] Charles S. Groves, "Plan to Strike out Cession of Shantung," *Boston Globe*, Jul. 23, 1919: 1.

[4] "League Assailed by Senator Reed," *Atlanta Constitution*, Jul. 11, 1919: 9.

尔逊首肯。视威尔逊为共犯因此并不为过。^[1]在美华人组织亦毫不讳言地批驳威尔逊政府的绥靖政策。美国华人协会敦促“中国的所有朋友”，给代表自己的参议员写信，支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将山东归还中国的建议。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发表了面向全体美国人的公开信。公开信指出，美国要求中国对德宣战，现在却助纣为虐，为了挽救国联，居然同意这一“完全非法、毫无公道、纯属冒犯的条款”。信件责问美国政府，将“中华文明的摇篮和孔子的出生地”交给日本，“难道这就是（民族）自决？”^[2]

欧美日关于山东的企图一经出笼，即刻引起中国代表团的愤慨，抗议和斥责之声不绝于耳。孔子的特殊地位始终是中国代表国权话语体系的支撑点。美国各大报纸竞相刊载中国代表团的备忘录和中国代表的谈话，加深了读者对于山东问题的了解，声援了中国代表团的正义举动。^[3]山东省派出孔氏后裔，前往和会陈述胶州归还中国的理由，更是引起美国媒体广泛报道，陡增大量同情和支持。^[4]然而，由于仍对美国抱有幻想并需要美国支持，中国政府代表没有公开抨击威尔逊政府的虚伪和绥靖政策。

列强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针对中国的侵略，或者旨在帮助传教士击败孔子学说，或者与孔子的诞生地密切相关。孔子在中国和世

[1] “Calls Shantung Grab a Crime; Chinese Cheer,” *Chicago Tribune*, Oct. 11, 1919: 6.

[2] “Appeal Made to Friends of Chin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13, 1919: 13.

[3] “Say China Loses to Save the League,” *New York Times*, May 4, 1919: 2; “China Bound and Delivered to Japan as War Spoils by Peace Council, Delegation States,” *Los Angeles Times*, May 4, 1919: 12; “Attitude of China Remains Firm on Shantung Affai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5, 1919: 1; “Demands Shantung as Matter of Right,” *New York Times*, Jul. 27, 1919: 25; “Minister Koo Tells Why China Is in War,” *New York Times*, Oct. 2, 1919: 17.

[4] “Japan’s Right in China Repudiated; Publicly Sough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4, 1919: 1; “Worse than the Germans: Confucius’ Descendant Demands Shantung for China,” *Boston Globe*, Jul. 6, 1919: E6; “Shantung Dear to Chinese,” *Washington Post*, Jul. 7, 1919: 6; “Boycott against Japan a Success, Avers Delegat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 23, 1919: 1.

界的巨大影响力与孔子思想及其国度的遭遇形成极大反差，映衬着欧美对华政策的表里不一。中国在美国媒体上的同情和支持者正是从此处入手，既抨击欧美和在其默许甚至鼓励下的日本，更为中国的平等权利大声疾呼。孔子既是他们的舆论武器，亦是他们捍卫的对象。

因其内忧外患，近代中国在世界上不乏同情者和支持者。1882—1920年间的美国舆论支持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此时正值美国排华高峰期，与中国有关的几乎所有事物均被视为异类而遭到歧视和排斥。难能可贵的是，部分有识之士本着同情和宽容精神，积极声援中国和在美华人。孔子对于中国人的思维发挥着深远影响，并在世界上广为人知。孔子之名及其思想因此成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舆论文章用以说服读者、促使他们产生共鸣的工具。

在中国较为友好的媒体文章中，孔子主要发挥了三大作用。第一，孔子完善的道德体系确保了中国人良好的精神品质，在美华人亦不例外。美国排斥华人的托词和依据不攻自破，排斥政策既是对孔子学说的漠视，也对美国社会毫无裨益。第二，孔子思想已经俨然成为中国人的宗教，并能推动中国历史上持续不断的进步，传教士全面改造中国的宏伟计划缺乏社会基础和可行性。传教士因为屡屡受挫而图谋报复之举更显其非理性特征。第三，孔子学说与基督教一样，宣扬公平和公正，欧美动辄武力入侵中国的行为因此违背世界常理，尽显虚伪本性。纵容日本占据孔子故地实乃对世界文化圣人的亵渎。总之，通过突出孔子，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舆论力图促使美国政府和社会在确保中国和华人的平等地位方面作出更大努力。虽然实际效果差强人意，舆论所发挥的长远作用却是值得肯定的。

第八章

孔子对于美国的借鉴意义

《排斥华人法案》之后的 50 年，除少数人员之外，大多数中国人被美国拒之门外，美国社会针对华人和中国传统的歧视和偏见有增无减。在此时期内，1920 年之前的 30 年不但见证了排华期限的不断延长，而且是美国历史上反华情绪最为强烈之时，大大超过排华法案的酝酿时期。^[1]美国媒体几乎演变为美国排华运动的积极鼓吹者。然而，对于中国文化的象征——孔子，媒体却时有正面评价。除了以孔子为由同情和支持中国及华人处境之外，媒体还不时赋予孔子及其思想各种实用意义。孔子思想为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提供借鉴和启发，成为美国社会行为的参照体系。这无疑是美国排华背景下又一个少有的亮点。

一、他山攻错的孔子

产生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孔子学说，自有其独到过人之处。其与西方思想相互映衬，互为借鉴，本是文化交融的自然结果，却被排华时期的多数美国人所否认或拒绝。但愿意正视文化差异和他国文化

[1] Sucheng Chan, "Asia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5 (August 1996): 363—64.

优点的美国人依然存在。他们提出，孔子能够弥补西方精神和社会的诸多不足，革除种种弊端。他山攻错的孔子形象随之而出，成为排华高峰期孔子正面媒体形象的又一组成部分。

基督教是欧美社会精神世界的核心支柱。即便如此，孔子学说照样被某些舆论文章视为基督教可以参照和借鉴的思想体系。美国天主教的一位神父指责现实生活中的基督教，称其为“对基督所创教会的讽刺”。神父建议，基督徒应该学习儒教的“坦率”和“高尚”。^[1]对于基督教内部相互攻击、相互陷害的现象，新教牧师 R. 希伯·牛顿(R. Heber Newton)亦深恶痛绝。他建议引入孔子的美德观，根本改变教派关系。^[2]《纽约时报》读者克林顿·史蒂文斯(Clinton Stevens)在来信中写道，孔子的某些教诲“比我们的更可取”。孔子制定了所有社会伦理都必须涵盖的黄金准则，但没有许诺“我们并不知晓或概念模糊的”来生。^[3]通过表达不满，史蒂文斯意在说明，基督教的核心概念之一“天堂”需要借鉴孔子学说，以便更加实用。B. 费伊·米尔斯(B. Fay Mills)牧师对此坚信不疑。他认为，乐土不再存在于九天之外，而是如同孔子的定义，是一种原则和现世社会现象。^[4]《亚特兰大宪法报》的一篇文章更是宣布，“无论如何，孔子箴言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处事准则）”。尽管很多人不愿承认，孔子的确是基督伦理的重要灵感源泉之一。反对暴力和宗教宽容实乃基督徒需要学习之处。^[5]《洛杉矶时报》相信，“文明之光”始于远东：孔子已经开始传道授业了，“我们的萨克逊祖先还在从敌人的头颅中吸血”。加利福尼亚与孔子代表的古老文明隔海相望，理应成为“宝贵思想产品”的受益者。^[6]

[1] "Father Hyacinthe Is Converted," *New York Times*, Sept. 16, 1894: 24.

[2] "The Golden Mean," *New York Times*, Jan. 20, 1890: 3.

[3] "Missionaries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Aug. 20, 1900: 6.

[4] "Heaven and Hell: Rev B. Fay Mills Gives His Views on Them," *Boston Globe*, Nov. 21, 1898: 3.

[5] "Major Pangborn Writes of the Chinese Religion and Our Missionaries," *Atlanta Constitution*, Jul. 29, 1900: A2.

[6] "California's Future," *Los Angeles Times*, Oct. 27, 1917: II4.

刚从中国归来的波士顿神父奥莱理 (Patrick O'Reilly) 称赞中国哲学是“基督教的坚实基础”。孔子教诲中的诚实、纯洁、节俭、尊敬祖先等品德尤其值得基督教徒借鉴。^[1]

基督教需要借用孔子思想中的一些原则加以完善,西方现世社会同样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弥补缺陷的途径。20 世纪初,世界日益动荡不安,深感忧虑者希望人类能够和谐相处,孔子便是某些场合的灵感源泉。《波士顿环球报》希望,人类信守孔子率先确立的黄金准则,确保世界所有民族的“和平、幸福和繁荣”。^[2] 查尔斯·萨姆纳 (Charles Sumner) 赞同此说,哀叹人类已经严重偏离黄金准则的要求:世界各国相互猜疑之剧,以至于“在和平时期,似乎都须枕戈待旦”。^[3] 正是出于缔造和平的初衷,经过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倡议,国际社会在第一次大战之后成立了国际联盟。但《洛杉矶时报》却引用一位中国作者的话说,“国联的最初倡导者”实乃生活在 2400 年以前的中国伟大哲学家孔子。^[4] 观点是否准确,另当别论,某些媒体试图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治现代社会弊病的意愿却显而易见。

孔子的治世原则不乏具体应用之例。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中国驻英国公使的秘书曾在《伦敦每日邮报》撰文,引用黄金准则,抨击英国强行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举动,称英国应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将意志强加于英国,英国将有何反应。文章指责英国违背了孔子学说和基督教皆视为神圣的基本原则。^[5] 20 世纪初,中国与荷兰纷争又起,两国最终同意由一联合委员会进行仲裁,美国总统可以任命一名成员。《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大喜过望,认为此事表明,“格劳秀斯 (Grotius) 和孔子仍然对自己的国人有着明显的影响”。^[6] 格劳秀斯是荷兰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的法学家,国际法标准的确立者。孔

[1] “Reports Success of Missions in China,” *Boston Globe*, Dec. 1, 1919: 9.

[2] Untitled Article, *Boston Globe*, Mar. 17, 1907: 36.

[3] “A Golden Rule for Nation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22, 1918: 21.

[4] “Extraordinary,” *Los Angeles Times*, Aug. 31, 1919: III17.

[5] “Defends Chinese Religions,” *Chicago Tribune*, Oct. 3, 1900: 2.

[6] “Holland and China to Arbitrat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6, 1915: 20.

子与其相提并论，显示出孔子思想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现实意义。孔子平和务实的心态还是媒体借以攻击激进革命的武器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引发美国人的红色恐慌，列宁被媒体刻画为“比孔子更沉迷空想、比拿破仑更冷酷无情、比穆罕默德更崇尚武力的人物”。^[1]美国报纸甚至用孔子厌恶和推崇的两种社会状态比喻美欧的巨大反差，突出美国的优越性和引领世界发展的角色。“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是现代欧洲的形象，“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则是美国自豪之所在。^[2]由此看来，孔子不仅对于国家处理相互关系大有裨益，他还为人类社会确立了理想存在状态。

孔子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超越了思想和社会领域，孔子及其时代给自然科学亦留下了令美国媒体颇感惊诧的遗产。《华盛顿邮报》不无伤感地写道，“古人偷走了我们大多数奇思妙想”。发明家费尽周折，终于可以宣称自己发现了某件新鲜事物时，他却得知，这早已存在于孔子时代的中国。^[3]数学和天文领域便此类事例。数学方面，《华盛顿邮报》转载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消息称，广为西方数学界所熟知的费马（Fermat）方程式其实早在孔子时代就已被中国人知晓。不仅如此，孔子时期的中国人还发现，该方程式不适用于某些数字。剑桥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证明，中国人的结论是正确的。在证实中国人的数学天赋方面，剑桥大学提供了“重要证据”。^[4]20世纪初，数学界成功实现了角度的三等分，引起轰动。但这只是延续了孔子和柏拉图等人的尝试。^[5]哈雷慧星在1910年回归，不但引发新一轮观星热潮，亦让某些媒体追根溯源，提及孔子与天文学的紧密联系。孔子时代的中国人率先观察到哈雷慧星，人类从此进行了连续的跟踪和

[1] Fanny Butcher, "Tabloid Book Review," *Chicago Tribune*, Aug. 17, 1919: D7.

[2] Mme. X., "Some Wise Saws from Confucius for Modern Days," *Chicago Tribune*, Jun. 2, 1918: C4.

[3] "World's Greatest Inventions," *Washington Post*, Feb. 12, 1911: 47.

[4] "Chinese as Mathematicians," *Washington Post*, Apr. 13, 1898: 6. 费马（1601—1665），法国数学家，微分学的创始人。

[5] "A Study in Angles," *Washington Post*, Jun. 20, 1913: 6.

研究。^[1] 美国亚洲协会 (Asiatic Institute) 秘书长弗雷德里克·麦考密克 (Frederick McCormick) 在《纽约时报》撰文,盛赞中国的天文成就,认为西方大量天文数据和研究源自中国。“孔子记录的日食”对于西方天文学家有着“巨大的用途”。伽利略从荷兰人那里获得的望远镜制造技术也有可能来自中国。^[2]

二、孔子语录及其实用价值

孔子论著早已通过欧洲人的翻译传到了美国,为很多人所熟悉。虽然处在排华狂潮的巅峰时期,媒体依然将孔子思想视为现世社会道德伦理的主要规范之一,呼吁人们重视孔子思想的实用意义。媒体为此做了一定程度的引导。

刊登孔子语录是媒体最为直接的引导手段,各大报纸均有此举。语录尽管没有附加过多评论,其在版面上的出现却宣告了相关媒体的认可和宣传。媒体的用意也显然在于促使人们将语录用于日常生活之中。

《芝加哥捍卫者报》以“需要记住的九件事情”为题,刊登了孔子有关君子九思的论述“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勉励人们加强道德修养,举止得体。^[3] 出现在该报另一天版面上的孔子语录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报纸在附加的简短评论中写道,尽管孔子生活在将近 2500 年前,他的“很多观点今天仍然是真理”。^[4]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是另外一则见诸该报报端的孔子语录。^[5] 《亚特兰大宪法报》不仅选登了

[1] “Plethora of Comets,” *Washington Post*, Feb. 28, 1910: 1.

[2] Frederick McCormick, “Vandals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Jul. 7, 1914: 8.

[3] “Nine Things to Remember,” *Chicago Defender*, May 20, 1911: 2.

[4] “Really beyond Help,” *Chicago Defender*, Jul. 18, 1914: 6.

[5] “Learning and Thought,” *Chicago Defender*, Nov. 27, 1915: 7.

“学而不思则罔”，其他诸多名句亦被登载其上。例如，“毋友不如己者”（《论语·子罕》）、“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便是其中几例。^[1]《生活》杂志上也可见孔子语录的身影，如“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论语·阳货》）、“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等。^[2]《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有“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和“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论语·颜渊》）等语录。^[3]

影响力更大的报纸同样无法忽略孔子语录在规范社会行为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芝加哥论坛报》将孔子“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子张》）与歌德和伏尔泰等西方文化圣人的名言相提并论，足见其重视程度。^[4]《华盛顿邮报》劝导人们“主忠信”（《论语·子罕》）。^[5]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上的其他孔子语录涵盖从政和为人等方面，包括“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去兵”（《论语·颜渊》）、“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等。^[6]《波士顿环球报》以回复读者来信的方式重申了孔子的“黄金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7]另一天的《波士顿环球报》将孔子所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作为“每一位家庭主妇必备的每日箴言”加以刊登。^[8]该报给家庭主妇的另外一则每日箴言模仿孔子

[1] “Epigrams of Confucius,”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 2, 1910: E4.

[2] “Sayings of Confucius,” *Life*, Oct. 6, 1910: 572.

[3] Untitle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16, 1910: 13.

[4] “Chicago’s New Public Library, Its Architectural Beauties and Common Sense Facilities,” *Chicago Tribune*, Sept. 11, 1897: 9.

[5] “Aphorisms,” *Washington Post*, Dec. 2, 1899: 6.

[6] “Maxims from the Sages of China,” *Washington Post*, Jul. 14, 1901: 19.

[7] “Confucius’ [sic] Golden Rule,” *Boston Globe*, Apr. 21, 1903: 12.

[8] “Household Department,” *Boston Globe*, Jan. 8, 1907: 10.

的语气写道,“如果思想邪恶,你的行为就会呈现污点的阴影;如果思想完美,你的行为就会同样完美、真实和纯洁”。^[1]

《纽约时报》一次性选登孔子语录的数量多达九条,其中包括“虎豹之鞶犹犬羊之鞶”(《论语·颜渊》)、“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等名句。^[2]然而,《纽约时报》并非单次刊登孔子语录最多的报纸。《洛杉矶时报》曾经创下一次刊登45条孔子语录的记录。略举几例如下:“《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论语·公冶长》)。^[3]孔子语录亦有散见于该报的情形。1908年2月20日的《洛杉矶时报》将孔子“主忠信”之说与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的一句名言相提并论。该报在1910年9月10日则将孔子所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等人的言论并列,作为至理名言奉献给读者。^[4]孔子语录“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是见诸《洛杉矶时报》的另一组“伟大思想”之一。^[5]

当然,孔子语录不是作为系列刊登于这一时期的美国报纸的,它们只是报纸名言栏目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孔子言论的不断出现却在客观上向读者传递了如下信息:虽然现实生活中的华人劳工不受欢迎,中国圣人孔子的思想仍然具有极大的参照价值。媒体在时常选登孔子至理名言同时,也直接呼吁人们重视孔子思想,将其作为道德规范之一。

《华盛顿邮报》认为,孔子有关“健康理性生活”的思想值得现

[1] “Household Department,” *Boston Globe*, Jun. 17, 1905: 10.

[2]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Feb. 10, 1901: 21.

[3] “Confucius: Precepts and Aphorisms from His Works,” *Los Angeles Times*, May 8, 1900: 112.

[4] Untitled, *Los Angeles Times*, Feb. 20, 1908: 114; “Seven Sentence Sermons,” *Los Angeles Times*, Sept. 10, 1910: 1112.

[5] “Great Thoughts,” *Los Angeles Times*, Jan. 29, 1913: 116.

代人反复思考。^[1]《芝加哥论坛报》谈及美国教育现状时指出,“今日美国教育的弱点在于缺乏道德力量……而道德是人生的光彩之处”。评论者建议,学生应该熟悉孔子和耶稣等圣人的为人典范,学习“他们完美的人格、崇高的生活以及高尚的思想和言论”。时至今日,孔子等人仍然“受到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欢迎”。公立学校不妨一试。^[2]在《波士顿环球报》上,署名“南方人”的读者来信得以刊登。“南方人”以自己的“经验和对他人的观察”敦促年轻人,“学习柏拉图和孔子著作或者其他类似作品,但不要尝试与此背道而驰的思想”。^[3]《洛杉矶时报》就美国的道德教育写道,斯巴达父亲会要求孩子“言行正直,陈述真理”;中国教室的墙壁上写着孔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报纸以此延伸,认为“每一间教室和每一个家庭”都有必要向年轻人灌输上述思想。只有从小“接受正确教育,人在成年之后才不致误入歧途”。^[4]该报的另一篇文章提醒青少年,孔子的很多语录“极有智慧”,“如果我们始终遵循,我们的人格都将更加完善”。^[5]

孔子思想的道德规范意义不仅体现在媒体呼吁的字里行间,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其例。《波士顿环球报》写道,孔子据信说过“救人一命胜过攻城一座”之语,波士顿居民威廉·H. 戴利(William H. Daily)就是绝佳的现实载体。身为“美国,甚至是全世界的一流救生员”,戴利曾经营救了85条即将溺水而亡的生命。^[6]戴利的救人事迹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孔子思想以人为本的特性,《纽约时报》则将孔子对高尚人格的要求具体到了阿德尔伯特·H. 斯蒂尔(Adelbert H. Steele)身上。根据描述,刚刚去世的斯蒂尔拥有“崇高的精神、高尚

[1] “The World Standing Still,” *Washington Post*, Jan. 7, 1913: 6.

[2] “Moral Influence of Schools,” *Chicago Tribune*, Feb. 20, 1893: 7.

[3] “Boys and Girls: Department for Young People Alone—Outdoor Sports, Entertainments, Games and Correspondence,” *Boston Globe*, Jan. 17, 1906: 10.

[4] “Moral Instruction,” *Los Angeles Times*, May 31, 1912: II4.

[5] “Boys and Girls,” *Los Angeles Times*, Jan. 24, 1886: 3.

[6] “Daily, the Life Saver: How to Rescue Persons from Death by Drowning,” *Boston Globe*, Jul. 22, 1984: 30.

的人格、仁慈的心灵和迷人的魅力”，是所在社区“正义和善良的巨大力量”。他因此完美地阐释了孔子所谓的“大仁”。^[1]在各种规定极其严厉的西点军校，每一名新生都有一名“前辈”。接受“前辈”的指导是新生生活“极其重要的内容”，“前辈”因此经常被称作“孔子”。^[2]

上述几例从细微之处入手，显示出孔子道德规范在美国社会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现实事例与数量众多的孔子语录和直接呼吁交相呼应，引导人们在排华背景下认识孔子思想的参考价值。正是沿着这一逻辑，《波士頓环球报》向读者提出了“孔子的真名是什么”之问，试图促使读者对孔子其人其语做进一步了解。^[3]

三、孔子与选举政治

孔子的现实价值还体现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政治史上的多事之秋。改革美国政治及其体制的呼声空前高涨，各类政治势力异常活跃。美国现行政治及其政策成为众矢之的。在如此众多的力求变革之声中，孔子被频频提及，担负着印证美国政府与政治缺陷之职。

总统选举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自政党体制产生以来，四年一度的大选总是充斥着相互攻讦的现象，某些事件和人物在党派及其候选人攻击对手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们目前考察的时间段内，孔子就是与美国选举政治紧密相连的人物。1892年，曾于1884年担任过美国总统的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卷土重来，即将再次获得民主党提名。此事遭到对手的大肆抨击。共和党控制的《太阳报》要求，以前担任过公职者不能继续

[1] Charles Whelp, "Tribute to A. H. Steele," *New York Times*, Nov. 16, 1902: 29.

[2] "The Slang of the West Point Cadet Out—Choctaws Choctaw," *Washington Post*, May 5, 1912: M5.

[3] "Editorial Points," *Boston Globe*, Jun. 30, 1913: 12.

卷入政治，以期打击克利夫兰的强劲势头。《纽约时报》的政治评论认为，该提议“尤其滑稽”，因为如孔子等改革者“都从未有过如此不可思议的梦想”。^[1]1900年，新一轮大选拉开帷幕。民主党人对已执政四年的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发起挑战。一封读者来信宣称，孔子说过“水轮使用过于频繁就会损坏”的话。根据相同的道理，“我们伟大的共和国”如果被共和党把持太久，就将衰落。“国家在麦金利四年任期内面临的危险”要求美国人作出新的选择。^[2]1904年，威廉·R. 赫斯特（William R. Hearst）角逐民主党候选人提名。芝加哥商人俱乐部主席助其一臂之力，攻击赫斯特的党内竞争对手威廉·J. 布赖恩（William J. Bryan）与劳工组织过从甚密。而劳工组织缺乏“真诚”，导致错误的“基本原则”。此说的立论依据是孔子关于“忠信”的诸多论述：孔子之言虽然“极其久远，但今天仍然是真理，今后也将如此”。^[3]

1912年，进步党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试图再次入主白宫，遭到对手反击。现任总统塔夫脱的支持者认为，罗斯福代表的“非法劳工联盟”与“非法资本联盟”一道，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两大极端。但从孔子以来的法典制定者，都认可“庞大的中产阶级”作为国家稳定基础的角色，罗斯福走向极端，违背今古常识。塔夫脱才是壮大中产阶级的最佳人选。^[4]1912年大选的胜者既非罗斯福，也不是塔夫脱，而是民主党人威尔逊。四年之后，威尔逊谋求连任。其支持者大肆宣扬，威尔逊政府和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为美国带来了繁荣。但反对者相信，此说“欺骗不了不满足于被欺骗的人”。东部的工业繁荣是“表面而暂时的”，绝对不是因为民主党的政策和统治，就如同“柑橘的收成与孔子的教诲没有关联”一样。^[5]

地方选举政治亦经常牵涉孔子，将孔子用作攻击对方的武器。在

[1] "The Rational Basis of Barking," *New York Times*, Jun. 15, 1892: 4.

[2] George Knight Randall, "Way to Save the Republic," *Boston Globe*, Oct. 2, 1900: 6.

[3] "Let Hearst Be Nominated," *Los Angeles Times*, Mar. 15, 1904: A7.

[4] "Playing the Ends against the Middle," *Los Angeles Times*, Oct. 13, 1912: II4.

[5] "Our War Prosperity," *Los Angeles Times*, Sept. 3, 1916: II4.

1890年加利福尼亚的一次地方选举中，民主党为了获胜，刻意利用该州持续泛滥的反华情绪，指责共和党候选人偏袒华人劳工。此政治家据称给其采矿合伙人写信，“同意解雇某些桀骜不驯的爱尔兰裔工人，替之以长着杏眼的孔子门徒”。指控如此严重，以至于两党都在竭力获取处于风口浪尖的信件。加州共和党中央委员会甚至悬赏1000美元。^[1]1904年，纽约的国会议员选举进行得如火如荼，候选人使出分身解数，赢取选票。民主党候选人不仅尽力确保希腊裔居民的选票，即使数量极少的“孔子子孙”的选票也在争取之列。^[2]纽约的另外一场地方选举将代表民众和托拉斯利益的两大阵营对立起来。《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引用孔子“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之说，称代表民众者为虎，托拉斯的代言人则猛于虎。民众应该把选票投给谁一目了然。^[3]

四、孔子与日常政治

在日常政治中，大者如笼统的政策和导向，小者如具体政治人物或行为，均有以孔子为参照标准者。与改革年代的时代背景相应，孔子发挥的主要作用是折射某些政治人物和行为的不受欢迎或考虑不周之处。就笼统的政策导向而言，我们略举几例。缺乏政治道德、忽略社会不公是世纪之交美国政治被广为抨击的原因之一。有人虚拟一段孔子与摩西在阿勒山（Mount of Ararat）巧遇后的对话，影射政治痼疾。孔子告诫摩西，如果有意步入仕途，必须“占领道德高地”。令作者感到欣慰的改革者“正在竭力将建议付诸实践”。^[4]背离民主、忽视民众呼声则是政治现状面临的又一指责。遵循孔子教诲的中国

[1] “They Were Nineteen,” *Los Angeles Times*, Oct. 11, 1890: 4.

[2] “The Campaign’s Fun,” *New York Times*, Oct. 23, 1904: 3.

[3] “The Tiger and the Trusts,” *New York Times*, Oct. 29, 1906: 6.

[4] “More Gruber Witticisms,” *New York Times*, Mar. 14, 1906: 9.

似乎代表着美国改革者所期望的理想状态。“中国人实行自我管理”：城市拥有“议会”，代表由家庭选举。政府还保证政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商业自由。^[1]作者显然对中国的封建制度缺乏了解，但对孔子政治理念的崇拜却跃然纸上。

19世纪末，美国农民对于政府的抱怨已经司空见惯。伊格内修斯·唐纳利 (Ignatius Donnelly) 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此人正在角逐明尼苏达州农场主联盟主席职位，并意图以此为跳板，进军美国参议院。不论共和党或是民主党政府，都无法赢得唐纳利的好感。唐纳利以一则过于夸张的传闻，比喻两大政党偏袒垄断体制的通病。根据唐纳利的陈述，旧金山某富人极其肥胖，患有胃下垂之疾。他向一名华人医生求治，“孔子门徒剃光他的脑袋，贴上膏药，让他站在角落里，直到膏药将胃提起”。唐纳利引申道，70年来，两大政党让人民面壁而站，“用美好诺言制成的膏药提起他们的胃”。人民一旦抱怨，充当医生的政客便“揭下共和党的膏药，换上民主党的膏药”。然而，两种膏药“成分相同，购于同一家商店——垄断老字号”。^[2]在改革浪潮影响之下，纽约市政府欲施行舞台改革。有报纸评论颇有微词，认为是弃本逐末之举。纽约藏污纳垢之处多矣，警察却视而不见，甚至保护有加。评论者宣布，孔子说过，恪尽职守者应该从身边事情做起。但纽约的官员却“对自己住处附近的犯罪场所熟视无睹，转而将目标对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3]《洛杉矶时报》的一名读者则哀叹，世纪之交的民主党徒有民主之名，已不再坚守民主原则。这如同“中国人占据基督教堂，却将孔子的教诲当作福音”一样。^[4]

具体的政治人物或行为也会因为孔子的映衬而显出缺陷。西奥多·罗斯福一方面倡导环境保护，同时又沉溺于打猎。《纽约时报》的读者质问道，孔子和耶稣等人的哪一条信仰原则允许“罗斯福先

[1] “The Marvels of China,” *Atlanta Constitution*, Jan. 18, 1886: 5.

[2] “The Best Blood of the World,” *Atlanta Constitution*, Jan. 2, 1891: 2.

[3] “‘Sapho’ and Vice,” *Atlanta Constitution*, Mar. 2, 1900: 4.

[4] “Will Mr. Cleveland Not Speak Too?” *Los Angeles Times*, Oct. 4, 1900: 19.

生和克利夫兰先生恣意杀伤不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动物？”^[1]《洛杉矶时报》以孔子“君子有九思”之说，衡量罗斯福的人格特征，认为罗斯福远非君子，而是集“偏执、狭隘、好斗和卑鄙”于一身。^[2]来自俄亥俄州托莱多市（Toledo）的市长琼斯（Jones），同样是因为孔子而映衬出缺陷的政治人物。在美国城市联盟（League of American Municipalities）于1899年召开的第三届年会上，琼斯模仿孔子，提出新的“黄金准则”——“废除党派，以根治所有社会和政治顽疾”。然而，此言被认为有东施效颦之嫌：孔子的黄金准则凝聚着“所有时代所有文明的精髓”，琼斯的提议只能显示其“虚弱而不着边际”的性格。^[3]在另一事例中，特拉华州格林伍德（Greenwood）邮政局长赫尔达·B. 托德（Huldah B. Todd）夫人因为冒犯阿利（Allee）参议员而遭撤职。有人对阿利“向女人开战”的行径大加谴责，认为其名字虽然“极像中国人，但即使孔子也会出于尊严，不至于让个人情感主导宗教信念”。^[4]国会某专门委员会接到的一份提案建议“所有商店在星期天闭门歇业”。提案者居然在首页用红色墨水写上孔子和耶稣的语录，使该提议更显荒谬，因为两人并未要求商店关门。^[5]

1912年12月，在纽约新州长即将上任之际，《纽约时报》却怀疑他的“智慧和远见”。该报评论建议，新州长“从一开始就应遵循某些指导原则”。孔子不失为这些原则的重要源泉，“他有一些好的思想”。评论者特别推荐孔子关于治理国政的精妙论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迫不得已时，为政者可以“去兵”、“去食”，但不能失去民信，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新州长的

[1] Lusana W. Sheldon, "Killing Game for Sport," *New York Times*, Jun. 6, 1905: 8.

[2] "The Superior Man," *Los Angeles Times*, Aug. 7, 1912: II4.

[3] "Jones, of Toledo," *Washington Post*, Sept. 21, 1899: 6.

[4] Norman D. Sampson, "Postmistress Todd and Senator Allee," *New York Times*, Sept. 6, 1903: 6.

[5] "Thomas J. Henry Makes Vigorous Demand for Sunday Closing," *Washington Post*, Apr. 19, 1904: 10.

首要任务因此是赢得民众信任。^[1] 报纸反驳某种政治观点时亦有提及孔子者。例如,《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Indianapolis Journal*)撰文宣称,托马斯·杰斐逊是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当选总统的。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信使报》(*Evansville Courier*)不仅认为此说“太过分”,而且讽刺道,按照如此“复杂而又特别的逻辑”,孔子都可能被证明是共和党人。^[2]

然而,在以孔子之名批判某些政治人物及其行为缺陷的大背景下,亦有个别政治人物因为某种优点而与孔子联系在一起。来自亚拉巴马州的联邦参议员佩特斯(Pettus)就是美国政界路人皆知的“孔子”。佩特斯有此名声,得益于其从政资历带来的政治智慧和喜怒自威的表情。佩特斯生于1821年,是20世纪初美国最年长的参议员。如果连任成功,他将在88岁高龄结束政治生涯。^[3] 媒体最早称呼佩特斯为“参议院的孔子”应该是在1898年,即他成为联邦参议员的第二年。^[4]《芝加哥论坛报》评论曰,佩特斯“看起来确实像(孔子)”。^[5] 此类认识的根据之一,就是佩特斯在参议院得到公认的“智慧”。《华盛顿邮报》认为,佩特斯成为“孔子”,原因在于“他看起来如此聪明”。^[6] 另外一家报纸写道,这个“人缘极好的南方人拥有巨大的智慧”,故得“孔子”之名。^[7] 戴着眼镜的佩特斯更像孔子,眼镜“赋予这位受人尊敬的参议员以睿智的神态”。^[8] 甚至有评论开玩笑曰,“很多参议员相信,他比叫这名字的中国哲学家更加聪明”。^[9]

[1] “Sulzer and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Dec. 21, 1912: 12.

[2] “Political Notes,” *New York Times*, May 31, 1891: 4.

[3] “In the Field of Politics,” *Washington Post*, Jul. 28, 1902: 12; “Confucius Up for Reelection,” *Chicago Tribune*, Aug. 1, 1902: 12.

[4] “A Humorous Debate in the Senate over the Lady,” *Washington Post*, Feb. 10, 1898: 4.

[5] “Three Hours on the Roll Call,” *Chicago Tribune*, Mar. 18, 1902: 1.

[6] “Capitol Chat,” *Washington Post*, Dec. 13, 1899: 6; “Buzz Annoys Senate,” *Washington Post*, Jan. 11, 1907: 4.

[7] “New Basis for Cut in War Tax,” *Chicago Tribune*, Feb. 23, 1901: 1.

[8] “Capitol Chat,” *Washington Post*, Mar. 13, 1902: 6.

[9] “About Statesmen,” *Washington Post*, Feb. 11, 1907: 4.

不苟言笑的表情则是佩特斯孔子形象的另一支撑。佩特斯的威严神态是一些参议员的谈论话题。其中一名来自西部的参议员说道，“他看起来就像我上次看到的孔子一样”。^[1]《波士顿环球报》直接把佩特斯的严肃表情作为其孔子之名的根据。^[2]《华盛顿邮报》以“生硬、严肃、庄重”形容这位参议院的“孔子”，宣称在他演讲时，“狗都不敢叫”。^[3]该报另一篇文章认为，佩特斯“像猫头鹰一样严肃”，“大家普遍相信，他跟孔子玩过弹子游戏”。^[4]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佩特斯之所以成为“孔子”，主要因为他的智慧和严肃。两种品质的融合体现了美国人关于中国文化圣人的既定认识模式之一。除此之外，也有少数政治人物的名字中含有“孔子”一词，但没有特定含义。例如，1887年，参加马萨诸塞州达特茅斯（Dartmouth）校友晚餐会的政治家当中，就有一位爱德华·孔子·卡里根（Edward Confucius Carrigan）。迈克尔·孔子·墨菲（Michael Confucius Murphy）是纽约州参议员。^[5]

五、以孔子为据的改革措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见证着如火如荼的社会改革运动。报刊不顾美国政府和社会对于中国的极度排斥，不断介绍以孔子学说为依据的社会改革措施，或者从孔子思想的角度解释改革者推崇的举措。美国政治虽然对于中国人的“异端”信仰唯恐避之不及，孔子却通过媒体再次参与了美国的政治进程。

希望人们和谐相处、实现社会均等，是当时各类改革运动的理想

[1] “Western Senator’s Friend Confucius,” *Boston Globe*, Mar. 16, 1898: 8.

[2] “Senate’s Day,” *Boston Globe*, Apr. 17, 1898: 9.

[3] “Real Fun in Senate,” *Washington Post*, Mar. 31, 1900: 1.

[4] “Capitol Chat,” *Washington Post*, Feb. 20, 1901: 6.

[5] “A Tale of Two Houses,” *Boston Globe*, Jan. 30, 1887: 4; “The State Legislature,” *New York Times*, Jan. 5, 1887: 4.

目标。除去欧美社会秩序理论之外,孔子之见是改良理想的有力佐证。《芝加哥论坛报》认为,社会和谐“唯一途径是……避免涉及必然令我们意见相左的话题”。孔子和耶稣从不同角度阐述过“黄金准则”。如果“黄金准则”得以推行,人们将“志同道合”,“这正是自由、信仰、纯洁及和平的敌人不愿看到的”。^[1]孔子确立的原则有助于消除社会猜忌,缓解社会矛盾。改革运动还在民众中极力营造相互默契和同情的氛围,对抗上层利益集团及其导致的社会不公。媒体在与孔子有关的言论中找到了依据。《亚特兰大宪法报》写道,互助同情绝非美国改革者的发明,即使在孔子时代的中国,这也不失为一种社会风气。此说有“孔氏之遗书”《大学》第十章为证:“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2]《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认同此理,认为孔子虽然被不时地赐予显赫的政治地位,却四处周游,告诫国人,“如果没有尊严和友爱,生活毫无价值”。^[3]一则评论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改革者振振有词的理想:因为他人的幸福而幸福,因为他人的窘境而忧虑。孔子再次成为重要依据:“孔子曾说,即使有一人处境不如自己,他也不会停顿,无法享受上天赐予的快乐。”^[4]孔子之言不仅激励着人们变革社会,也讽刺着美国社会较为泛滥的损人利己现象。《纽约时报》讥讽曰,孔子教导世人每次跌倒都要站立起来,“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大多数人似乎以绊倒他人为最大荣耀”。^[5]

对于改革者的具体举动,媒体也有以孔子言行加以诠释乃至鼓励之举。1887年11月,农场主联盟在佐治亚州召开月度会议。据《亚特兰大宪法报》报道,与会者“对商人进行强烈谴责”。他们提出的原则如此激进,以至于会“引起孔子的忌妒,因为实现整个人类的幸

[1] “On Relation of Music to Morals,” *Chicago Tribune*, Sept. 20, 1893: 10.

[2] “Editorial Comment,” *Atlanta Constitution*, Feb. 22, 1896: 4.

[3] “Holske of Boston,” *Boston Globe*, Dec. 18, 1904: 55.

[4] “Your Corner... Fadette,” *Chicago Tribune*, Apr. 12, 1908: E9.

[5] “Light and Agreeable,” *New York Times*, Jul. 8, 1889: 4.

福正是他的梦想”。^[1]此处的言下之意是，农场主联盟的改革计划与孔子的设想一脉相承。水土流失、耕地减少是改革者急于解决的又一问题。土壤保护是最为有效的解决办法之一，这能确保农作物增收和“国家未来的繁荣”。改革者坦承，此项举措仍然源于孔子：“我们正开始学习中国人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拥有的知识。”^[2]及至20世纪初，禁酒之风席卷全美。有人质疑滴酒不沾的改革者是否有资格大谈酗酒的危害。《洛杉矶时报》引用孔子的生活态度，反对挑战禁酒令的权威性。以“榜样的力量”为题的评论指出，“孔子生活简朴节制……是其追随者沿着道德小径前行的最大动力”。的确，酗酒者可以现身说法，揭示酒精的危害。但如果没有道德榜样的启发和示范，此类举动将无果而终。^[3]普林斯顿大学的阿德勒（Adler）教授从“人类生活科学”的角度，反对关闭酒馆。《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认为，阿德勒忽略了“孔子笔下的善”，他应该身临其境地观察贫民窟家庭主妇的生活状况，了解酗酒带来的巨大危害。^[4]更为重要的是，“孔子本人生活节制”。^[5]改革运动也使很多人不加区分地强调生存权利，导致很多州反对死刑。反对死刑者的重要依据就是孔子的人性思想。^[6]

作为弱势群体，青少年和妇女是改革运动关注的对象。改革者试图避免两大弱势群体在各种诱惑和社会变革面前误入歧途。帮扶机构纷纷建立，其中不乏从孔子那里获得灵感者。陷阱密布的社会对于涉世未深的女性处处充满危险。如何有效应对，《华盛顿邮报》引用孔子防患于未然的思想给出了答案。撰文作者 M. A. 福克斯（M. A. Fox）希望，政府能够资助如“青年妇女基督教之家”之类的慈善机

-
- [1] “A New Scheme by Which the Farmers Are to Become Rich,” *Atlanta Constitution*, Nov. 18, 1887: 2.
- [2] “Land Show Opens Riches of Nature to City’s People,” *Chicago Tribune*, Nov. 24, 1912: J1.
- [3] “The Force of Good Example,” *Los Angeles Times*, Mar. 9, 1914: II4.
- [4] “Suggestions for Prof. Adler,” *New York Times*, Dec. 22, 1901: 5.
- [5] “Chinese Not Drunkards,” *Washington Post*, Apr. 12, 1908: 9.
- [6] “A Woman in the Electric Chair,” *Chicago Tribune*, Mar. 21, 1899: 6.

构。此举既可挽救失足女性，更能为初出家门的年轻女性营造家的氛围，抵御诱惑，培养基本的工作技能。作者现身说法，以自己17岁进城打工便得到帮助的经历，力证帮扶措施的必要：“我只要想到（如果没有正确引导）我会与何人为伍，就经常浑身战栗。”^[1]妇女不仅严防自己受到伤害，也极力引导儿童的价值取向。比如，“庄重的星期五早间俱乐部”会在万圣节向儿童宣讲道德规范，宣讲者常自称“孔子”。^[2]《洛杉矶时报》告诫年轻人，他们应该向“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学习。世界不乏勇敢的士兵、多才的发明家、科学天才或者玄妙的理论家，但他们根本无法比拟包括孔子在内的人类优秀代表。^[3]《亚特兰大宪法报》呼吁人们正确引导青少年。策略之一是建立教养院，以便收留“少年犯和其他没有正确家庭引导并有犯罪倾向的儿童”，阻止他们成为真正的罪犯。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是，“儿童的早期训练和环境”必须引起重视，因为这对其一生都会产生影响。孔子曾经“睿智”地说过，“里仁为美”（《论语·里仁》），对于邪恶现象的耳濡目染就是邪恶的开端。所以，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促使青少年避免接触社会不良习气势在必行。书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4]

以各种方式提高民众素质是改革者着力推进的另一项措施。美国钢铁企业家和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是改革年代民众教育的大力倡导者，实乃改革运动的代表人物。卡内基是处捐资助学，建立图书馆。引人注目的是，卡内基多次将自己支持教育的动机归功于孔子。1902年12月14日，卡内基出资修建的纽约商业中学举行奠基仪式。他在致词中热情洋溢地引用了孔子有关教育的论述：“孔子理应是最早、最具智慧的民主主义者之一，正是他先于基督500年宣布，‘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教育因此能够而

[1] M. A. Fox, "Young Women's Home: A Plea for the Continuance of the Appropriation by Congress," *Washington Post*, Jan. 27, 1902: 10.

[2] Sydney Ford, "Women's Work, Women's Clubs," *Los Angeles Times*, Nov. 2, 1913: III.5.

[3] "A Word to Young Men," *Los Angeles Times*, Dec. 21, 1916: II.4.

[4] "The Place for Boys: How to Avoid the Necessity of a Reformatory,"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 2, 1894: 7.

且应该提高所有人的素质。新建成的商业中学“再次证明公民的平等，工人的儿子将和百万富翁的儿子在完全同等的条件下入学”。卡内基保证，“贫穷不是障碍”。孔子的教育理论与美国的“民主”和“美国理想”殊途同归。^[1]有感于孔子赋予音乐以体现和培养民众素养的功能，卡内基极其重视音乐的教育作用。1902年4月5日，卡内基在受其资助的纽约爱乐协会发表演讲，引用孔子和莎士比亚等东西方文化圣人的音乐思想，大谈“音乐对于人类的崇高而永恒的影响”。^[2]1914年，在音乐家专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卡内基再次以孔子的音乐育人思想为据，强调音乐与社会文明的紧密关系。^[3]1913年，卡内基向某基金会捐赠一千万美元，以便修建图书馆和购买风琴。孔子的启发作用又一次得到确认。^[4]

然而，亦有美国人在报纸上撰文，从孔子那里引申出大相径庭的结论，淡化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和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例如，美国现实的批判者被称为悲观主义者，“他们永远都在谈论共和国更早更好的时期”。如同“孔子的门徒”，批判者不断追忆着并不存在的辉煌过去。^[5]《洛杉矶时报》评论曰，美国离完美社会与“中国在孔子时代一样遥远”。既然制定和谐社会规则的孔子都无法让中国趋于完美，美国存在社会问题无可厚非，也不需要试图变革者大动干戈。^[6]有媒体甚至呼吁人们，不要对美国劳工联盟蓄意组织全美钢铁工人大罢工大惊小怪，因为这是“人类社会恒久存在”的一种思维模式。如此思考问题的人甚至“跟在孔子和其他所有伟大导师的身后”。^[7]《亚特兰大宪法报》的一封读者来信视孔子为贵族的象征，从而与美国改革年代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风气格格不入。受到来信者青睐的密西西

[1] “Commerce High School Cornerstone Laid,” *New York Times*, Dec. 15, 1901: 6.

[2] “The Philharmonic’s 60th Season’s Finale,” *New York Times*, Apr. 6, 1902: 8.

[3] “Andrew Carnegie on Music,” *New York Times*, May 24, 1904: 8.

[4] “Why He Gives Libraries,” *New York Times*, Oct. 11, 1913: 2.

[5] “Outside of the Constitution,” *Washington Post*, Oct. 16, 1902: 6.

[6] “The World Moves Slowly,” *Los Angeles Times*, Jan. 8, 1914: II4.

[7] “A Type of Mind,” *Los Angeles Times*, Oct. 5, 1919: II4.

比州前州长，就“不是孔子信念的追随者，没有家族渊源”，无法长期跻身于看重家族传统的美国政界。^[1]

六、以孔子引导日常生活

美国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的迅猛发展既导致社会不公，引发改革浪潮，同时也使个人心理倍感压抑。引导人们建立健全的人格从而引起媒体重视，对策随之而出。但凡鼓励人们排遣郁闷、完善自我的策略常有以孔子言行为基础者。《波士顿环球报》建议人们步入舞厅，“疏解现代文明造成的精神不安”。尽管非议颇多，该报却力证跳舞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艺术。《圣经》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即使“在遥远的东方，生活年代早于基督近 600 年的孔子，也提及武士的舞蹈和被逐妇女的舞蹈”。艺术是“个性的最佳表述”。因此，跳舞可以释放遭到文明压抑的个性。^[2]作为博大精深的思想家，孔子的睿智给很多美国人留下过深刻印象。从孔子的生平轶事中找到智力发展的根源，从而更好地实现自我完善，是美国媒体的另一兴趣点。《波士顿环球报》认为，只有逆境才能磨炼人的意志，成就美德和天才。中国圣人孔子早年贫穷，只是一个“小店主”。^[3]但这一说法似乎过于平淡，芝加哥工程师卡斯珀·L. 雷德菲尔德 (Casper L. Redfield) 提出的理论更具吸引力。雷德菲尔德宣称，但凡世界伟人，都是在其父母年事已高时出生。他们可以遗传父母丰富的阅历和智慧。孔子在出生时，其父已 71 岁高龄。^[4]雷德菲尔德自认证据确凿，拿出 1000 美元作赌，让全世界的优生学家提供相反的证据。孔子能够载入史册因为其出生之晚，但孔子之子“从未获得任何功名”，原因在于他出生时，孔子年

[1] H. F. Sanderson, "Mississippi and Her Governor," *Atlanta Constitution*, Jun. 19, 1903: 6.

[2] "Why We Dance: Mania for the Art Is Really Rational," *Boston Globe*, Feb. 8, 1914: SM15; "The Mania for Dancing," *Washington Post*, Feb. 15, 1914: MS4.

[3] "Came up from the Ranks," *Boston Globe*, Jul. 21, 1907: SM7.

[4] "Don't Wed Too Early," *Washington Post*, Jul. 20, 1915: 4.

仅 19 岁。^[1] 各大报纸纷纷转载或者评论雷德菲尔德的“惊人”发现。高龄父亲能够将“非同寻常的学识或智慧”遗传给儿子之说一时波澜俱兴。^[2] 《芝加哥论坛报》还郑重其事地回答读者由此产生的疑问，建议人们的判断应该建立在对普通人而非出类拔萃者的考察基础之上。而优生学家的普遍观点是，25 到 30 年龄段的父母生育的孩子最为优秀。^[3] 虽然上述答复明显不赞同雷德菲尔德之言，但回答本身就证明，人们对于通过孔子生平引申出自我完善的新理论充满兴趣。至于该理论的实践情况，尚无资料显示。1912 年母亲节，《芝加哥论坛报》从孔子的睿智引申出母亲的伟大。父亲的聪明才智通常遗传给女儿，儿子的智慧则来自于母亲。孔子正是得益于其母亲的智商才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母爱因此是上帝最伟大的行为”。^[4]

与此同时，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滋生出唯利主义，很多人将财富等同于社会地位。诸多媒体文章认为，这是现代文明造成的心理变异，并依据孔子言论，提出改进策略。例如，《波士顿环球报》直斥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崇拜百万富翁，相信他们忘记了“绅士不等于职业”，财富不是成为绅士的必备条件。品德才是绅士身份必不可少的要素。孔子曾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所以，真正的绅士应该注重财富以外的品质，应该性情温和、不事张扬、容易相处、知错即改、处事谨慎、与正直者交往等。^[5] 风烛残年的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是上述绅士观的真实写照。他居住在新泽西州的卡姆登（Camden），特拉华河隔离了费城喧嚣的商业气息。惠特曼是一个“贫穷的农夫”，但却生活平静，为人随和，好与普通人交往，“自在甚至优雅”，忠实

[1] “To Be Famous, Choose an Old Father,” *Boston Globe*, Mar. 5, 1916: 88.

[2] “Now Comes Another New Theory,” *Boston Globe*, Aug. 3, 1919: SM7; “Startling New Theory Explains Mystery of Heredity,” *Atlanta Constitution*, Oct. 31, 1915: B16.

[3] “As to Superior Children,” *Chicago Tribune*, Mar. 22, 1912: 10.

[4] “‘My Mother’ — Mothers’ Day Tributes by Prominent Chicago Men,” *Chicago Tribune*, May 12, 1912: A1.

[5] “Not an Occupation,” *Boston Globe*, Apr. 28, 1903: 6.

实践着孔子所谓的“仁”。^[1] 商业文明中的美国人不仅需要淡泊明志，也需要摒弃其他陋习。做事拖沓、效率低下便是其一。有意革新者应该时刻铭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语，并且必须信守诺言。^[2] 在帮助人们应对现代文明负面影响的过程中，媒体自认责无旁贷。《波士顿环球报》自比孔子笔下的“君子”和“圣人”，是民众的“教育者”。报纸向民众传授的知识将促进美国的进步，“民众的普遍智慧是国家和世界的最后希望”。报纸教育具有“巨大的意义”。^[3]

引证孔子之举不只见于完善自我等较为抽象的日常领域，具体事件中亦不乏其例。律师詹姆斯·哈特尼特 (James Hartnett) 为了让法庭释放当事人，引述了“圣经、大宪章、孔子和远至 12 世纪的习惯法”。^[4] 更有甚者，孔子重视生命的名言“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出现在数则药品广告中，发挥着鼓励消费者踊跃购买之效。其中一则保证，所推销的药品能够“立即缓解”神经痛和“所有类似病痛”。^[5] 另一广告中的药品据称能够“在 30 日内根治”生殖器官疾病、阳痿和泌尿系统疾病。^[6] “安全、确切地治愈支气管炎、咳嗽和其他咽喉和肺部疾病”是又一广告的主要内容。^[7] 这些广告使用孔子语录的寓意在于，消费者唯有购买所列药品，方可知晓生命的意义。当时有人通过实验，论证细胞死亡、器官死亡以及躯体死亡之间的关系。其他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依据也是孔子的这句名言。^[8] 一家印刷公司在广告中借用孔子之名，吸引读者注意。广告写道，切忌墨守成规，要在每天都能做出最佳选择。即使孔子没有发表类似见解，他“至少如此考虑过”。而最佳选择就是“将印刷业务交给富特－戴

[1] “Mr. Haweis Meets Whitman,” *New York Times*, Feb. 26, 1886: 6.

[2] “Procrastination,” *Los Angeles Times*, Jun. 10, 1912: 114.

[3] “Reaches All and Lifts All,” *Boston Globe*, May 15, 1898: 25.

[4] “Quotes Bible, Magna Charta, and Confucius to Landis,” *Chicago Tribune*, Oct. 13, 1911: 2.

[5] “Immediate Relief,” *Atlanta Constitution*, Jan. 23, 1885: 3.

[6] “Classified Ad,” *Atlanta Constitution*, Aug. 1, 1885: 3.

[7] “Valuable and Convenient,” *Atlanta Constitution*, Nov. 1, 1885: 16.

[8] “New Definition of Life,” *Washington Post*, Sept. 7, 1913: ES4.

维斯公司 (Foote & Davis Company)”。^[1]

我们在美国社会的某些日常规则里面照样能看到孔子的影子。波士顿的两名妇女互不搭理已有两年，最近终于重归于好。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她们摒弃前嫌，再现融洽关系，其中一人诙谐地回答曰：“即使孔子也会把原形动词拆开。”意即圣人都会犯错，因为英语里的原形动词是不能拆分的，何况凡人乎？真乃一笑泯恩仇！^[2] 火车大盗阿尔·詹宁斯 (Al Jennings) 现身说法，规劝人们遵循孔子教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减少社会问题。^[3] 孔子与人为善的思想对于人际关系的奇妙作用，甚至出现在了公司的广告中。旧金山一家公司为突出自己善待顾客的态度，特意模仿孔子的语气写道：“对所有人都要和善有礼，即使对于来自异国他乡的陌生人也应如此。如果他告诉你渴了，给他一杯免费热茶。”^[4] 19 世纪末，纽约准备提高地铁的利用效率，加大发车密度，保证从午夜到早上六点每 10 ~ 15 分钟一班。至于具体操作细节，纽约快速交通委员会表示，既然孔子都说过，在交易中，“有时让对方做点什么也许更好”，那么就让营运公司本着“开明的自私精神”，全权负责。^[5] 西点军校，纪律之严，可想而知，“几乎每种可能性”都被考虑进去了。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制订者“一定查阅过……孔子的著作”。即使北京的礼部官员也无法挑剔如此众多的细枝末节。^[6]

[1] “Two Don’ts and a Do,” *Atlanta Constitution*, Jun. 24, 1908: 16.

[2] “The Dove of Peace,” *Chicago Tribune*, Sept. 12, 1903: 4.

[3] “Living down Black Past Is Hard Job Says Al Jennings,” *Atlanta Constitution*, Jan. 16, 1916: 7.

[4] “Eagleson & Co., the Big Furnishing Goods Store,” *Los Angeles Times*, May 5, 1897: 3.

[5] “The Rapid Transit Situation in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Oct. 22, 1899: 20.

[6] “Wst [sic] Point Academy,” *Washington Post*, Mar. 11, 1883: 7.

七、孔子与美国的对外交往

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不仅是美国人在人际关系中极力推崇的原则，它也是美国的某些有识之士用以批评美国强权外交的有力武器。例如，《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则评论对于美国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贸易保护主义强烈不满。据评论者引用的数据，1896 年，美国的贸易顺差是六千万美元。尽管如此，美国仍然以防止黄金外流为由，设置对英贸易壁垒。自称“已 80 多岁高龄的终生共和党人”要求美国奉行对等原则，用孔子笔下的“恕”规范自己的对外行为。^[1]《波士顿环球报》观点相同，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语理应成为美国对外交往的指导原则，“对等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贸易问题”。但美国的高关税鼓吹者却津津乐道于美国为外国产品设置的壁垒，而一旦别国试图以牙还牙，他们又“表现出道义上的愤怒”。这是对等原则缺失之果。^[2]美国的贸易政策没有因为上述言论而改变，孔子数千年前精辟总结的原则却让某些美国人加深了对于美国外交缺陷的认识。

世纪之交，美国排斥华人的政策及其泛滥程度路人皆知。然而，少数美国人仍然在特定场合表露出对于现行政策的不满和对于中国人的同情乃至赞许之意。孔子宣扬的相互体谅精神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排华法案自 1882 年通过以来，步步升级。到 1893 年，更加苛刻的《吉尔里法案》(Geary Act) 出台。在法案即将付诸表决之际，数名美国人要求各自选区的众议员，“应用自己的影响力”，去除过于严厉的部分，重申“公正的必要性”。同情立场的依据亦是孔子的“恕”。同情者相信，唯有如此，基督教才能在道德水准方面证明，自己“至少与孔子哲学是平等的”。令人遗憾的是，法案最终获得通过，仅有一票反对。^[3]被华人媒体称作“阿林”的约翰·梅纳德·哈兰 (John

[1] Mark Holroid, "Balance of Trade—Senator Berry Criticised," *Chicago Tribune*, May 4, 1896: 10.

[2] "Reciprocity," *Boston Globe*, Nov. 4, 1905: 10.

[3] "Geary Act Resolution Adopted," *Boston Globe*, Jun. 1, 1893: 9.

Maynard Harlan) 是另外一名同情华人的政治人物。1897 年, 哈兰角逐芝加哥市长一职, 他因为对华人的友好态度而赢得了芝加哥华人社区的支持。华人报纸《中国新闻》特刊出标语: “本馆帮阿林做总管。”哈兰获此殊荣, 根本原因在于, 其言行体现了孔子的“恕”。《中国新闻》编辑谈到, 哈兰的“情感和竞选纲领符合我们和孔子的要求……他显然一直在研读孔子经典……他不会奴役我们”。^[1] 同样出于相互尊重, 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联邦众议员贾奇·金凯德 (Judge Kincaid) 不仅赞赏“恕”, 还在与中国公使一同进餐时宣布,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组建农业部受到了孔子的启发”。^[2] 此言虽然触犯众怒, 却也表明金凯德在对华交往时的孔子情结。

孔子以德服人的处世哲学是媒体外交报道的另外一个兴趣点。正在欧洲大陆弥漫的一战硝烟检验着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合理性。自华盛顿告别演说以来, 美国一直拒绝卷入欧洲冲突, 这种立场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媒体评论纷纷涌现。某些文章以孔子以德服人的处世哲学及其在中国的所谓后果为鉴, 支持美国介入战争。此类文章认为, 单有道义武器不足以抗击来自邪恶势力的威胁。面对德国愈演愈烈的非常规战争手段及其导致的前所未有的伤亡人数, 曾参加美西战争的外科医生路易斯·利文斯通·西曼 (Louis Livingstone Seaman) 给威尔逊总统去电, 抗议美国对此无动于衷。西曼宣称, 这场战争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均无处可逃, 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孔子追随者在 2500 年前奉行的道德说服理论在 20 世纪已经不再适用”。缺乏战争准备贻害无穷。^[3] 同样着眼于反对威尔逊的中立政策, 《纽约时报》的一封读者来信却从孔子那里得到了正面启发。作者从一本中国史书上获悉, 孔子曾说,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威尔逊要求美国人即使在私下交谈时也必须严守中立, 显然违背了这一忠告。作者引申道, 中立不仅愚蠢, 而且是懦弱的表

[1] “Chinese Go to Harlan,” *Chicago Tribune*, Feb. 20, 1897: 5.

[2] “Gave Credit to Confucius,” *Washington Post*, Apr. 3, 1904: E7.

[3] “Argue for Peace, But Back Wilson,” *New York Times*, May 17, 1915: 2.

现。美国应该尽快介入欧洲战争。^[1]1917年初,威尔逊决定与德国断交,此举令不介入政策的批评者欣喜若狂。欢呼者认为,“威尔逊总统没有辜负人们的希望;他让美国重新屹立于国家之林”。孔子据称说过,“如果人家朝你吐唾沫,你要让唾沫自己干掉”,以德服人的逻辑主导了中国的外交。即使外国军队“进犯北京,也未能让中国从国家和平主义和政治无助中警醒”。通过威尔逊采取的措施,“美国已经证明,她与中国截然相反”。^[2]

与在国内政治语境中一样,美国媒体文章在论及对外交往时,树立的孔子形象褒贬皆有。对等原则有助于塑造美国讲求公正的国际印象,并与当时流行的进步主义思潮不谋而合,故能获得溢美之词。而强调道德说服力的和平主义,虽然同为孔子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却因为迫在眉睫的战争而遭到诟病,成为威尔逊中立主义政策不合时宜的印证者。

八、孔子的负面社会角色

毫无疑问,美国媒体赋予孔子的社会角色并不都是正面和积极的,更何况是在美国人反华情绪最为高涨的时期。孔子以负面身份出现在所难免,但就整个时期媒体上的社会生活领域而言,孔子被否定的频率远远低于受到赞扬的次数。孔子的负面角色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媒体认为,孔子可能危及美国青少年接受的正统价值观念,即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盎格鲁-萨克逊价值体系。1902年,哥伦比亚大学或者纽约大学据信将获赠10万美元,供设立中国语言、文学和宗教教授职位之用。《波士顿环球报》推测,这是为了迎合那些“最

[1] J. E. Harris, “Neutral or Impartial: Confucius Consulted on Our International Problems,” *New York Times*, May 4, 1916: 10.

[2] “Former Critic Praises Action,” *New York Times*, Feb. 4, 1917: 3.

终将全部用筷子吃饭、留中国辫子”的美国传教士。纽约市长也被怀疑与此事有关联，因为他“从中国茶叶贸易中获益，父辈或祖辈曾经经营前往中国的商船”。撰文者危言耸听道，如果教授职位顺利建立，整个教育体系势必会受到影响：“五年之内，我的曾孙将夹着孔子经典就读主日学校并在神像面前与人抛掷硬币打赌。”^[1]芝加哥地区某些学校选用包含孔子语录的阅读教材，“很多芝加哥人对此感到愤怒”。^[2]《洛杉矶时报》刊登的一篇布道文要求人们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人类”。人的“精神福祉”无法寄托他处。“孔子吗？看看今日的中国城，满目凄凉，贫困潦倒。”作者显然怀疑孔子的道德引导作用。^[3]甚至某些广告也刻意强调，孔子思想与美国价值观念“水火不容”。譬如，六缸发动机汽车在 20 世纪初是极为时髦的概念。某公司率先提出之后，遭遇同行竞相效仿。肇始者于是刊登广告，抨击模仿者，认为他们“从来没有彻底转变理念”。就其投机行为而言，模仿者“如同中国人，中国人皈依我们的宗教只是为了钱财——一旦回到中国，立刻改信孔子了”。^[4]

其次，在美国女权意识日渐强烈的背景下，孔子关于女性角色的态度遭到某些媒体的诟病。“孔子宗教”体系之中的女性，“只是没有灵魂的动物”，其存在价值仅限于延续种族。^[5]孔子要求女性顺从，对女性“态度冷漠”。^[6]孔子及其典籍“谈及妇女，即充满着不屑和藐视”。中国妇女不能接受任何教育，直到年老才会在家庭中拥有发言权。^[7]孔子无意改善女性的处境，反而“剥夺了婚姻关系的甜蜜、神圣和纯

[1] “Townsend’s Say,” *Boston Globe*, Jan. 5, 1902: 45.

[2] “Urges Bible Readings in Schools,” *Chicago Tribune*, Dec. 16, 1905: 20.

[3] “Deep Solemnity: Boyle Heights Meeting,” *Los Angeles Times*, Feb. 13, 1905: 115.

[4] “Facts, versus Near-Facts about Six Cylinder Cars,” *Chicago Tribune*, Jun. 8, 1913: A2; *New York Times*, Jun. 15, 1913: XX12.

[5]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Animal and Spiritual Nature,” *Atlanta Constitution*, Jul. 23, 1911: E4.

[6] “At the Churches Yesterday,” *Los Angeles Times*, Jan. 17, 1898: 5.

[7] “Women in the Far East,” *Chicago Tribune*, Apr. 13, 1889: 16.

洁”。^[1]有报道谈及日本高于美国的离婚率,相信在受孔子影响的日本,丈夫可以“因为妻子唠叨而休妻”,离婚率固然高居榜首。^[2]阿尔玛·惠特克(Alma Whitaker)撰文表达了同样的见解。惠特克写道,孔子思想纵有无数可取之处,他“永远不会支持我们的女权运动……孔子坚决反对性别平等”。文章举例说,在孔子看来,男女不能互传杯子,不能共用毛巾或梳子,不能穿相同的衣服;女人一生都必须服从男性的支配地位。因此,“我们在接受孔子学说时,最好有一点保留”。^[3]甚至到访美国的中国特使也认为,女性说话只为“取悦男人”。美国妇女惊骇不已,表示要研读孔子,找出如此言论的背后玄机。^[4]芝加哥西北大学校长在1894年该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崇拜“孔子的伟大、智慧和真诚及其生活的高尚无瑕”,但批评孔子哲学“让女人成为男人的奴隶,允许一夫多妻制,轻视夫妻忠诚”。^[5]

一对夫妻关于女权的争论让孔子站到了女性的对立面。丈夫反对女性选举权,其主要理由是,“妇女无法理解当今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妻子反唇相讥,称丈夫为“孔子”。^[6]从中国归来的女性传教士绘声绘色地描绘着中国妇女在一夫多妻制度下的不幸生活。因为“孔子宗教”,她们不论在现世或是来生都地位低劣,变形的裹脚和修长的指甲则宣告着身体上的低人一等。^[7]接受西洋教育的亚洲女性,同样难以认同孔子给予女性的角色定位。已在佐治亚州韦斯利恩(Wesleyan)女子学院学习五年的中国女生在论文中写道,无人能够怀疑孔子的伟大,但孔子思想也有缺陷。其“最大的失误在于,未能给予女性足够的尊重”,而性别平等是任何国家走向兴盛的前提之

[1] “Teachings of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Jan. 14, 1901: 2.

[2] “The Divorce Problem,” *Boston Globe*, Jan. 28, 1914: 10.

[3] Alma Whitaker, “Conduct and Propriety,” *Los Angeles Times*, Jan. 2, 1917: II4.

[4] “Letters of a Social Secretary,” *Boston Globe*, Mar. 14, 1909: SM5.

[5] “Ready for the Fray: Parting Advice Given to Graduating Classes,” *Chicago Tribune*, Jun. 11, 1894: 12.

[6] “Complex Problems,” *Boston Globe*, May 21, 1911: SM16.

[7] “Remarkable Diary of Mrs. Livingston Mims,” *Atlanta Constitution*, Mar. 15, 1914: C2.

一。^[1]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的林姓女生在一次演讲中，大肆抨击孔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2]日本女诗人和散文作家与谢野晶子(Akiko Yosano)批判孔子给予妇女以低劣的社会地位，不允许妇女活跃多言。^[3]

由于孔子的性别思想，他甚至出现在了以女性主义为主题的戏剧中。1896年，马萨诸塞州塞耶学院(Thayer Academy)的中高年级学生上演了一出新编历史剧。该剧“讨论妇女的进步”，凡属进步的女性人物悉数登场。罗马神话中集智慧、艺术、发明、武艺于一身的女神密涅瓦(Minerva)因故不能前来，便故意委派对女性地位不以为然的苏格拉底和孔子作为代表。^[4]相距十一年之后，波士顿学生俱乐部再次将该剧搬上舞台，孔子与苏格拉底同样以密涅瓦的代表现身。评论者写道，“这些传统男人在这样一个新女性俱乐部的冒险经历，足以引起人们的遐想”。^[5]孔子制定的“男女有别、重男轻女”的性别格局为美国女权主义者无法接受，自然得到女性权利反对者的赞成和拥护。有媒体文章称，孔子的见解恰好证明，女性应该以“家庭义务”为重。家庭空间绝非狭小，而是“与整个人类社会同等宏大”。^[6]但此举对于反对孔子女性观的女权主义者而言，无异于火上加油。

我们必须承认，媒体的质疑和否定是排华时期美国孔子形象的主流。然而，在涉及美国人的社会生活时，负面印象不但比例较小，程度也相对缓和。这给我们几点启示。第一，孔子制定的道德原则具有较强的跨国现实意义。主导中国数千年的此类原则一经传入美国，其实用性也显露出来。即便是孔子成为中国混乱与落后代名词的排华高峰时期，美国社会也无法忽视孔子道德体系的强大生命力。个人修养和人际关系不但可以因此受益，社会改革亦能获得启发。在中国外

[1] “Chinese Woman Talks on Chinese Conditions,” *Atlanta Constitution*, Nov. 23, 1908: 3.

[2] “Widowhood in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Nov. 22, 1914: IV13.

[3] “Mrs. Yosano,” *Boston Globe*, Jan. 2, 1916: SM15.

[4] “Founder’s Day at Thayer,” *Boston Globe*, Jun. 6, 1896: 4.

[5] “Have Some Adventures,” *Boston Globe*, May 1, 1907: 6.

[6] “Archdeacon Farrar on Woman,” *Chicago Tribune*, Jun. 30, 1895: 38.

部环境已大为改善的今天，突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儒家社会伦理更应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点。第二，美国媒体刻画的孔子正面形象主要以完善自我、社会和谐和社会变革为支撑。这种倾向性既显示出美国人未能了解孔子思想的全貌，也为我们再度重视孔子学说提出了可供思考的问题：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融合。某些观点——如女性地位，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我们需要系统挖掘孔子思想的巨大现实意义，同时要摒弃其中不合时宜的成分。第三，孔子在美国排华情绪盛极一时的几十年依然拥有正面形象，这表明，美国始终存在重视文化融合和文化借鉴的力量。这使中美文化价值观念的交流得以延续，并逐渐演变成两种文化间相互关系的主流。我们今天弘扬中华文明应积极寻找和利用这种力量。

第三部分

动荡年代的孔子观，

1920—1950

对于中美两国，1920—1950 年都堪称动荡年代。在美国，经济大萧条将 20 世纪 20 年代的短暂繁荣一扫而空，众多民众失业下岗，居无定所，政府则手忙脚乱。经济刚有起色，二战接踵而至。美国从和平时期过渡到战争状态，打破传统的生活节奏。同一时期的中国外忧更为深重。日本侵略步步加剧，很快演变成全面战争。本已混乱不堪的中国社会危机四伏，各种力量竞相角逐，百姓颠沛流离。时代背景映衬在美国舆论上，孔子形象由此进入新一阶段。

因为经济危及而被暴露的美国政治弊端，频遭美国人诟病。美国舆论利用孔子点评政治的热情依然不减。孔子的施政理念继续作为反映美国政治利弊得失的明镜。凭借众人皆知的孔子及其思想，舆论成功地向人们展示出经济危机的根源、罗斯福政府及其新政的长处与不足、美国人走出困境的途径等。孔子延续着美国政治监督者、评判者和启发者的角色。

在经济凋敝和战争阴霾之下的美国，生活枯燥乏味，美国人急需

消遣娱乐，冲淡挥之不去的紧张氛围。当代美国的主要消遣方式因此而诞生：电影、旅游、体育、居家休闲、音乐戏剧等，从此与美国生活形影不离。惯于调侃非主流文化的美国人，把孔子作为诙谐幽默的主题之一。所以，这一时期的孔子又是美国轻松生活的增味剂，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美国社会的种族偏见。

中国社会的动荡局面也给美国的孔子形象打上了深刻烙印。一方面，在此三十年间的中国，政治势力此起彼伏，政策导向各有所依，孔子处境起落变化。孔子以中国变革亲历者和见证者的形象出现在美国舆论之中。另一方面，即便政权更迭不断，中国民众的孔子信念却岿然不动。孔子因此又是中国社会延续的链条和保障。两相结合，在动荡中国背景之下的孔子，就是美国人观察中国变革的窗口。

就在这一时期，美国出于战争需要，明显缓解了排华情绪，最终在1943年废除《排斥华人法案》。美国与中国的战时同盟关系进一步改善了美国人的中国观。孔子形象从中受益。要求以孔子美德规范美国人日常行为的呼声没有因为战时困难而消匿，从孔子及其思想入手表达同情中国处境、支持美国对华交流者大有人在。孔子被塑造为值得美国信赖和支持的中国文化符号。

可见，此时的孔子形象延续着一贯的多样化色彩。他既是美国人消遣娱乐的对象，也是美国社会与政治的监督者和引导者，还是维系中美交流的纽带。具体形象的出现，取决于所涉及的主题和主题涵盖的利益关系。

第九章

孔子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美国政治

孔子毕其一生精力，为社会的和谐制订了众多规范，确保了中国数千年的平稳发展。孔子关于为政和施政的论述不仅启发着历朝历代的中国统治者，更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式之一。有鉴于此，孔子的言论通常是人们评价政府政绩的重要标准。这在中国极其自然，但在美国亦是如此，则说明孔子思想的确拥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孔子与美国政治的相关性在联邦最高法院得到了最为明确的体现。最高法院的室内墙壁上饰有古今立法者的雕像，孔子赫然位列其中。^[1] 联邦法院是美国最高权力所在地，孔子出现的意义不言自明。即使在地方法院，孔子也有现身其中的情形。比如，纽约县最高法院的上诉庭在其屋顶边缘竖立着 10 大古代立法者的塑像，包括“中国圣人孔子”。^[2] 孔子得到美国权力机构的礼遇，在美国的日常政治生活中也是时常提

-
- [1] R. L. Duffus, "Old Symbols in New Washington," *New York Times*, Aug. 4, 1935: SM10; Cousin Eve, "Social Whirl Vortex of Life in Washington," *Chicago Tribune*, May 9, 1937: E2; Robert R. Brunn, "High Noon on Decision Da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20, 1949: 16.
- [2] John W. Barrington, "Statues on the City's Skyline," *New York Times*, Mar. 31, 1935: SM14.

及的参照对象。1920—1950年间美国主要报纸的政治评论就是证明。作为政治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政治评论行使着舆论监督和制造氛围之责。政治评论中的孔子映衬着美国政治中相互攻讦、偏见盛行、考虑不周等痼疾，不失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面独特的镜子。

一、党派政治评论中的孔子

两党争风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相互攻讦之事发生极为频繁。1920—1950年间，富兰克林·D. 罗斯福执政长达13年，是尤为引人注意的事件。罗斯福虽然为复苏美国经济、在战争中确立美国的大国地位作出不小贡献，他仍然频遭政治对手和不满者的攻击。孔子“印证”着批判之声的正当性。为让美国走出大萧条的阴影，罗斯福大行政府干预经济之策，成为鼓吹自由者的诤难对象。在《礼记·檀弓下》，孔子感叹道：“苛政猛于虎。”《华盛顿邮报》的读者来信敬佩引发孔子评论的妇女，因为她宁愿时刻遭受老虎威胁，也不愿生活在苛政之下。这是“基于经验之上的观点，值得今天的美国聆听”。执政以来，罗斯福政府极力“‘控制’我们的生活，造成既不尊重自由也不尊重隐私的状况”。来信者宣布，美国人宁要“虎患（即失败的风险）”，因为那是个人自由的延伸，也不会做“极权政府‘控制者’的工具”。^[1]占据白宫的罗斯福第一家庭被指生活奢华，“恐惧他人的钱财”，一心想据为己有。罗斯福家人如同“孔子的后代”一样“优雅而又漫不经心地”接受着人们供奉的财物。如有不懂规矩者，“一条慈父式的小忠告”即可让其就范。^[2]烤架俱乐部（Gridiron Club）的第55届年度聚餐会则上演了一幕讽刺剧，为罗斯福的第9个任期感到担忧。到那时，罗斯福将面临没有先例可供打破、没有钱财可供挥霍、没有对手可供竞争的局面。剧中人物带着罗斯福的面具，振振有词地齐声

[1] “Letters to the Editor,” *Washington Post*, Apr. 1, 1940: 10.

[2] “Roosevelts Fear the Money of Others,” *Los Angeles Times*, Dec. 22, 1946: A4.

唱道：“……政治就是滑稽……让人想唱想笑 / 孔子说，今天有一点是肯定的 / 每一个民主党人 / 都是这个样”。^[1]不但罗斯福受到嘲笑，他所在的民主党也深受牵连。即便是曾经的支持者，也会因为后来的困境转而抨击罗斯福。有很多失业工人参与的工人联盟 (Workers Alliance)，一度坚决支持罗斯福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的努力。但时隔不久，眼看罗斯福的承诺无法兑现，联盟在其年度代表大会上公开讽刺罗斯福。伴随着著名爵士乐《棕色小陶罐》(The Little Brown Jug) 的强劲韵律，与会代表齐声高唱自编的讽刺歌曲。其中的一段歌词是，“孔子是睿智的古代圣人 / 他说我们需要维持生计的工资 / 和平，而非战争，人人都有工作 / 吃炮弹长不胖”，刻画罗斯福政府忙于应对已在欧洲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忽略国内民生之举。^[2]

鉴于民主党在 1930 年以后连续执政几十年，民主党总统和民主党本身时常处于舆论批判的漩涡之中。在各种场合，民主党窘态尽显，其面临的不利局面通过引证孔子而被形象地映衬出来。新泽西州州长 A. 哈里·穆尔 (A. Harry Moore) 广受民众支持，有望在 1934 年的选举中战胜共和党对手，入选联邦参议院。民主党欲借穆尔的强劲势头，让民主党人填补州长空缺，但遭到共和党候选人的强烈挑战。此人风头正足，以至于共和党的宣传手册引用“孔子”语录向选民宣布，“一个天才诞生了”。民主党主席不敢掉以轻心，被迫亲自出马，是处演说，为本党候选人争取选票。^[3]而在另外一次选举中，民主党被指铺张浪费，对于近一亿美国人无法接受中小学教育的现状熟视无睹，“民主将变得滑稽”。批评者声称，不论是基督教、犹太教或是孔子哲学，都要求统治者“均贫富”。民主党的所作所为恰恰证明，

[1] “President Taken for a Ride,” *Washington Post*, Apr. 14, 1940: 1, 8; “1940 Baffles Owls of Gridiron Club,” *New York Times*, Apr. 14, 1940: 4. 烤架俱乐部成立于 1885 年，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最为悠久、最富盛名的记者俱乐部。

[2] “Alliance Derides Roosevelt in New Song,” *New York Times*, Jan. 14, 1940: 19.

[3] Arthur Sears Henning, “G.O.P. Expected to Win Vote in Delaware Polls,” *Chicago Tribune*, Nov. 1, 1934: 4.

该党缺乏信仰。^[1] 民主党内部似乎也麻烦不断。按照批判者所言,“深陷内耗之中是民主党人的正常处境;其他任何情形都会令他感到别扭和痛苦”。虽然孔子“可能说过”,“对于大象而言,驴的麻烦根本不足为虑”,但共和党却不能因此高枕无忧,它必须时刻关注事态变化,谋取最大政治利益。^[2] 19世纪70年代,有美国漫画家用驴和象指代民主与共和两党。两党随后以驴和象作为各自的党徽图案。引文杜撰的孔子语录就是美国政治中驴象之争的翻版。

坦穆尼协会(Tammany Society)是民主党在纽约的强大助选组织。因此,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政治评论中,它与罗斯福和民主党同病相怜。政治对手时有借用孔子之名发起抨击之举。贿选是坦穆尼协会争取选票的惯用策略。有鉴于此,协会领袖“有意或者无意地成了‘第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孔子的追随者”。为赢得选举,协会抓住人性的弱点,向选民“大施小恩小惠”。^[3] 另一文章更是明确揶揄道,坦穆尼协会有诸如此类的贿选举动,是因为遵循了孔子要求统治者爱民并惠及九族的教诲。^[4] 除了贿选之外,坦穆尼协会还擅长进行政治上的突然袭击。例如,在纽约市的一次市长换届选举中,为让民主党候选人稳操胜券,协会通过运作,让选举提前举行。然而,评论者却认为,这并非明智。如果假以时日,现任共和党市长可能会犯下错误,从而失去民心,民主党将处于更为有利的境地。评论者调侃曰,类似道理在孔子那里已经得到充分阐述,坦穆尼协会却浑然不知,足见其耳目之闭塞。^[5]

罗斯福、民主党及其助选组织遭受报纸的轮番抨击,反映出美国政治评论中的惯常现象,即执政党派始终处于舆论关注的风口浪尖上。孔子在此类场合出现的意义在于,他以一个置身事外而又善于

[1] “Letter to the Editor,” *Washington Post*, Jun. 30, 1936: X8.

[2] “Ickes the Peacemaker,” *Los Angeles Times*, Mar. 15, 1940: A4.

[3] “Potter Explains Election,” *New York Times*, Nov. 9, 1931: 23. 坦穆尼协会成立于1789年,后发展成为民主党在纽约市的助选机构,20世纪60年代中期解散。

[4] “Book Notes,” *New York Times*, Sept. 2, 1931: 12.

[5] “Topics of the Times,” *New York Times*, Sept. 25, 1932: E1.

捕捉事物本质的形象，突出了民主党施政不力且弊病横生的状态，成为反对者政治攻讦的武器。诚然，假借孔子之名加以批判的做法不只针对执政党派，在野党亦有可能受到讽刺。比如，1920 年正值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大选硝烟四起。报纸上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却极为混乱：会场内人声鼎沸，代表们语言粗俗。有人翻阅报纸，有人交头接耳，更有人正在计算自己的账目。一名代表甚至向记者承诺，下一场会议一定为他带一本孔子语录，以打发无聊的时光。^[1] 名不见经传的共和党人阿瑟·W. 利特尔 (Arthur W. Little) 在争夺 1936 年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指责共和党只重视已经成名的政治家。但利特尔毫不气馁，反而以孔子“不患莫己知”（《论语·里仁》）之言自勉。^[2]

与此同时，孔子还衬托出两党均有忽视弱势群体的通病。移民是党派政治重视不够的群体之一。1936 年，又一场大选在费城拉开帷幕。两党均使出浑身解数，争取费城日渐增多的移民选票。但不管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他们都习惯于关注主流选民，对于移民群体却知之甚少，因此有无从下手之感。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虽然费城的华人数量已达几千，两党似乎都不清楚孔子原则是否仍被华人所遵循。针对华人的竞选方案也就无从谈起。^[3] 黑人是另外一个根深蒂固但两党都无意认真解决的政治问题。大多数白人质疑黑人群体的参政能力。黑人反击道，有任何污点的人都不能成为黑人领袖，而黑人领袖的“理想必须向基督、菩萨和孔子看齐”。^[4] 面对黑人权利曲高和寡的僵局，黑人报纸假借孔子之口告诫道：“我们最好点燃一支小蜡烛，而不是诅咒黑暗”。在两党都不重视的情况下，黑人需要耐心，“不是每件事情都可以一蹴而就”。^[5] 有黑人作者甚至提出，黑人应该记取孔子“己

[1] Dorothy Dix, "Lens Hounds Omnipresent," *Los Angeles Times*, Jun. 10, 1920: 12.

[2] Col. Arthur W. Little, "How to Manage Our Political Lives," *Atlanta Daily World*, Aug. 28, 1936: 2; *Chicago Defender*, Sept. 26, 1936: 18.

[3] Eugene Pharo, "The Foreign Note," *Washington Post*, Oct. 27, 1936: X9.

[4] John L. Clark, "Wylie Avenue," *Pittsburgh Courier*, Mar. 17, 1934: 4.

[5] Ruth Taylor, "Dispel the Darkness," *Atlanta Daily World*, Dec. 23, 1947: 6.

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不要从白人手里抢夺工作机会，引发白人报复。如若不然，按照黑白人口的比例，黑人必将处于下风。^[1]虽然有着前述现象，抨击在野党的频率和严厉程度都远逊于针对执政的诘难。这是美国的党派政治惯例使然。

二、新政评价中的孔子

除了一以贯之的两党政治，为应对经济危机而实施的罗斯福新政是两次大战之间的另一重大政治事件。新政始于罗斯福上台之初的1933年，学术界一般认可的终止时间是1939年。在此期间，罗斯福政府大力实施政府干预经济的各项政策。深感情形紧迫者从强调统治者应该主动施政的孔子那里，发现了新政的历史依据，而感觉新政充满漏洞的人则引证孔子，凸显新政的败笔。因为孔子而称赞新政的评论者，意在强调新政拥有可圈可点的初始目标，批评者则因为新政结果与初衷相去甚远而颇感失望。因此，对于赞扬者和批评者而言，孔子都是评判新政得失的重要参照体系。

支持者从孔子的言论中看到了新政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大萧条伊始，人们便开始感受到巨大的生存压力。希望政府正视民众吃饭问题的呼声逐渐高涨，为新政的最终出台营造出适宜的民意氛围。“千家万户都存在着严峻的面包与黄油问题”。鉴于孔子早就说过，“足食”是“文明社会的首要职责”，政府应当机立断，摆脱传统政策的窠臼，以新的策略，驱赶“在民众门前嚎叫的饥饿之狼”。^[2]新政的出现恰恰满足了发出此类呼声者的要求。及至新政措施全面铺开，善于观察者惊讶地发现，孔子的“大同”之说（《礼记·礼运》）与当时的社会福利思想何其相似。^[3]一本华人学者撰写的著作《东方人眼中的美国

[1] Theophilus Lewis, "Harlem Sketchbook,"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Jun. 30, 1934: 8.

[2] William T. Ellis, "Sunday-School Lesson," *Los Angeles Times*, Jun. 24, 1932: B7.

[3] "The Newness of Confucianism in This Modern Worl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5, 1934: WM12.

文明》(*An Oriental View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认为,罗斯福新政与孔子的“中庸之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新政不走极端,罗斯福关注着多数人的利益。他介于“落后时代 200 年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与先于时代大约 200 年的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之间。^[1]经济萧条开始于胡佛的总统任期内,但他坚持奉行自由放任主义,不愿采取政府干预政策。生于 1884 年的托马斯曾经六次参选美国总统,是主张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者。罗斯福在自由放任与公有制之间寻求经济危机的应对之策,与中庸之道有着些许相似之处。该著作相信,如果孔子亲临美国,“目睹罗斯福总统如此彻底地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他会感到高兴的”。^[2]作者还认为,罗斯福的所作所为“与孔子的妥协思想更为相似,而不是与斯大林或墨索里尼的极端主义殊途同归”。^[3]波多尼各大学董事会主席赞同孔子思想与新政本质相通的说法,称呼孔子为“新政第一人”。^[4]

新政的某些具体措施则因为孔子的映衬而受到称赞。拉布利斯玛教堂(La Purisima Mission)见证着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国之前的历史,但却毁于一旦。罗斯福新政成为教堂重获新生的契机。为创造就业机会和保护历史遗迹,加州公园管理人员、联邦农业部和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 Conservation Corps)联合发起抢救教堂的行动。通过一砖一瓦的拼凑,教堂原貌得以恢复。评论者称赞此事为善意之举,它显示出施政者的美好初衷。孔子曾说,“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5]得益于新政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继续兴建的华盛顿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因为“孔子栌树”而增色不少。由公共工

[1] Willis J. Abbot, "Watching the World Go B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 2, 1934: 14.

[2] "Books in Brief Review," *New York Times*, Mar. 4, 1934: BR18.

[3] Theodore Hall, "No End of Books," *Washington Post*, Mar. 6, 1934: 9.

[4] "Confucius Is Described as the First New Dealer," *New York Times*, Sept. 12, 1934: 1; "Educator Traces First 'New Deal' Back to Confucius," *Chicago Tribune*, Sept. 12, 1934: 1.

[5] Chapin Hall, "What Goes On?," *Los Angeles Times*, Jul. 1, 1939: A1.

程管理局 (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 主导的广场建设项目之一就是栽种装饰性林木。种子源于中国孔子墓的“孔子栌树”具有特别意义,被作为“历史性树木”移栽到国家广场,成为华盛顿标志性景区的组成部分。^[1]

然而,新政奉行国家调控经济,这毕竟与美国传统的自由竞争经济观格格不入。批判之声故而此起彼伏。即便在罗斯福尚未上台但政府干预似乎在所难免的 30 年代最初一两年,习惯于放任经济模式的政治声音已经未雨绸缪,告诫政府无需更改美国的传统发展道路。经济危机肇始,美国的某些“伪经济学家”就在鼓吹,美国资本家应该前往苏俄取经,学习五年计划模式。对于此说,反对者嗤之以鼻。批评文章特地引用《论语·先进》中的如下对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说明过头与不足都不可取。文章认为,美国的工商业在规划与组织方面的确大有改进之处,但不可贸然走向极端,“由于商之不及而学师之过绝非改进之路”。^[2] 因为萧条,工人工资下降成为必然趋势。有人及时撰文,提醒政府,切勿模仿苏联强行取消红利和工资的做法。但可参照孔子的中庸之策,以相同比例削减红利和工资,体现劳资公平。^[3] “调控一切的激情”在全美各地都有体现,令传统模式的固守者倍感惶然。加州议会接到的一份提案要求,电影放映员不能离开放映机或在放映时与人交谈,违者罚款 25 美元。这与禁止有轨电车乘客与司机交谈的洛杉矶法律如出一辙。批评者讥讽道,虽然此类规定的细致程度有如孔子原则,但“孔子原则广受遵从,这些规定却无人理会”。^[4]

及至新政实施,人们发现,广受世人尊重的孔子哲学虽然强调国家仓廩充实的必要,以让人民饮食无忧,但从未忽略公平与公正原则。新政不仅未能确保公平与公正,更是将孔子推崇的理想引入了歧

[1] “New Capital Mall near Completion,” *New York Times*, Oct. 4, 1936: 24.

[2] “Letters to the Editor,” *Washington Post*, May 17, 1931: M23.

[3] “Workers and Dividends,” *New York Times*, May 22, 1931: 23.

[4] “Futile Legislation,” *Los Angeles Times*, Mar. 5, 1931: A4.

途。有读者给《纽约时报》去信直言，新政改革是在通过“强制、独裁和各种形式的劝诱……缓解人们的社会疾病”，乃治标之策。如欲治本，则须遵循孔子和耶稣等人的教诲，引导人们改变自私自利的本性。^[1]《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读者指责新政偏袒某些阶层，导致社会不公。政府忘记了“最睿智的哲学家孔子”曾言，“哪里有公正，哪里就没有贫穷”。因此，经济不兴实乃政府施政有失公允所致。^[2]新政时期的犯罪率居高不下，据信也是政府没有采纳上述孔子思想所致。由于社会不公，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工作无门，从而增加犯罪的可能性。^[3]

以行业补贴和商品限价为重点的经济调控让批评者深感不满，因为在自由竞争的信奉者看来，这些措施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滋生效率低下和行业垄断之疾。前陆军上校阿尔瓦·李(Alva Lee)所著《美国向左荡》(*America Swings to the Left*)被称作抨击新政的开山之作。李认为，作为新政的典型载体，国家复兴法案(National Recovery Act)有如“孔子的法则”一样无所不包，事无巨细，均能触及。然而，支撑复兴法案等新政政策的经济计划理论，却潜藏着“谬论、诡辩和歪曲推理”。这是“一次治标不治本的尝试”，并将导致产品成本上升。增加的成本必将转嫁给普通消费者。因此，过度延伸的政府触角无法真正造福于美国百姓。^[4]来自艾奥瓦州的联邦参议员莱斯特·迪金森(Lester Dickinson)是新政的又一批判者。他在共和党妇女联盟的集会上宣布，孔子试图调控中国的产业，结果是中国落后于世界。新政与孔子的方案如出一辙，长此以往，“国家将会衰败”。迪金森忠告政府，“不要介入商业行为”。^[5]迪金森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孔子是否调控过中国的产业，他只是根据中国近代的落后揣测，根源在孔子那里。以中国的现状警示罗斯福政府才是莱斯特意欲达到的目的。航运补贴是政府加强商业控制的一个细小步骤，引起的批评之声却具有代表

[1] "Letters to the Editor," *New York Times*, Jul. 21, 1934: 10.

[2] "Letters to the Editor," *Washington Post*, May 25, 1936: X6.

[3] "Letters to the Editor," *New York Times*, May 25, 1936: 18.

[4] "Roosevelt Policy Assailed in Book," *New York Times*, Nov. 3, 1933: 17.

[5] "G.O.P. Women Hear Senator Hit New Deal," *Washington Post*, May 11, 1934: 12.

意义。参议院组织专门委员会，就航运业接受的政府补贴进行调查并出具报告。虽然指责现行补贴体制存在管理不善、欺诈和腐败等弊端，报告给出的“符合逻辑的解决办法”，却是“收归政府所有并由政府运作”。反对政府介入者批驳曰，除非孔子等秉持公正的人类精神导师组成政府即将成立的航运补贴管理委员会，新措施无法根治痼疾。^[1]

限价措施也因为新政与孔子思想的所谓类似以及近现代中国的贫弱而备受指责。孔子据称要求中国统治者限定物价，中国却没有因此长久繁荣。新政诘难者便在限价与国家混乱和衰微之间画上了等号。罗斯福尚未上台，自由竞争的支持者就警告政府，不要采取政府调控价格的措施。“孔子促使（中国）政府通过限价法律”，此法最终不了了之。这说明，“在经济力量面前，政府力量虚弱不堪”。^[2]在美国参议院即将最后辩论《农业调整法》修正案之际，新政反对者强烈要求参议院改弦更张，不予通过。法案将对农产品买卖设定最低价格，但“自孔子时代以来，无论何地作此尝试，都悲哀地失败了”。^[3]

作为美国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自然是限价反对者抨击的焦点。为平抑粮食价格，华莱士借鉴据称为孔子首创的“常平仓”论。根据此说，政府在粮食丰产、粮价低廉时大量收购；粮价升高时，政府便出售囤积的粮食，控制物价。此举初衷甚好，但依据批评者之言，华莱士不到粮价高于正常价格时，绝不会抛售存粮。而在此时，“存粮对于市场已无影响”。^[4]在华莱士授意下、据说依照孔子“常平仓”论为蓝本制定的《农业调整法》被称为“一派胡言”，因为华莱士“拒绝在美国农民需要最为急迫之时……救助他们”。^[5]此外，华莱士还开始了一场“宰杀生猪的狂欢活动”。出于抑制肉价的目的，农业部不仅宰杀生猪，而且给予没有饲养生猪的农民一定补

[1] “Ship Subsidies,” *Chicago Tribune*, Jul. 1, 1935: 14.

[2] “A Window in Wall Stree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2, 1930: 15.

[3] “Senate against Price Fixing,” *Wall Street Journal*, Jul. 20, 1935: 4.

[4] Raymond Clapper, “AAA Planning Reserve Stock of Feed Grains,” *Washington Post*, Jun. 25, 1934: 2.

[5] “Between You and Me,” *Washington Post*, May 18, 1935: 2.

贴。认为此策有失公允的批评者，直接称呼华莱士为孔子，因为在他们根深蒂固的意识中，只有孔子思想主导之下的中国，才会不计后果地利用政府行为干预物价。^[1]批评者对于华莱士及其所代表的新政政策成见如此之深，以至于时隔多年之后，他仍是政治批判的对象之一。1948 年，华莱士作为进步党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这为过去的不满者再添抨击机会。反对者杜撰道，孔子曾说过，无话找话说的人每年在交谈时浪费的风，能够加快地球自转，我们的天和年即可缩短一半。如果变废为宝，新政就会更短，“华莱士先生的演讲也会更短”。^[2]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Jr.) 也因为其拯救股市的庞大计划而受到嘲讽。某人撰文揶揄，摩根索虽然斥资 20 亿美元救市，却苦于无人能够胜任管理如此巨资之责。摩根索真正需要的是兼具孔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巴尼·巴鲁克 (Barney Baruch) 品质的人。撰文者调侃道，他正在为摩根索物色合适人选，“如果你看见我冲入(华人)洗衣店和炒杂碎店，你就知道我正在为政府工作”。^[3]巴鲁克是罗斯福的经济顾问，被认为与孔子和汉密尔顿一样，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三者相提并论，既是对摩根索能力的质疑，亦是对新政措施的反対。

善于观察的美国人甚至从华人据称受到孔子影响的行为模式中，看到了另外一条能引导美国走出困境的途径。这一途径不同于新政，因为其成功依赖于人们改变自己的经济行为，而不是政府的强制性干预。根据传说，在经济危机和股市崩溃闻所未闻之时，孔子就给弟子留下了“人不欠我，我不欠人”的古老智慧。华人因此保留着必须在新年来临之前偿还一切债务的传统，中国城从而能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有条不紊，秩序井然。比较夸张的说法是，“中国城还不知道这场经济萧条”。^[4]孔子定下的怜悯互助原则是华人能够安度危机的又一保证。根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解释，华人顺着孔子的思维，建

[1] “Pigs to Pork,” *Washington Post*, Apr. 12, 1935: 8.

[2] Delos Avery, “Bookman’s Holiday,” *Chicago Tribune*, May 23, 1948: C8.

[3] “Will Rogers Remarks,” *Los Angeles Times*, Feb. 7, 1934: 1.

[4] “Chinese Celebrate Oriental New Year,” *Washington Post*, Feb. 15, 1931: M17.

立起“血缘资金帝国”，即每一位成年华人必须将收入的一部分交给群体机构，形成群体财政，以便帮助孤儿寡母、老弱病残以及失业者渡过难关。所以，华人没有失业现象，能够对新政救济无动于衷。^[1]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国会议员萨姆·马辛盖尔（Sam Massingale）某次经过华盛顿的一家华人洗衣店，发现店主正在专心致志地吸烟，尔后又使劲工作。马辛盖尔告诉同行者，店主遵循着孔子的教诲，即一心不可二用。美国人一心几用，急于求成，因此导致经济危机。^[2]

1929年经济大萧条给美国造成的冲击之巨前所未有，政府为振兴美国而干预经济的程度之深亦是前所未有的。围绕新政的是非曲直，美国人莫衷一是。不约而同地引证中国的圣人孔子是支持与反对者少有的共同点之一。孔子的人性关怀思想让支持者坚信新政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却因为历代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而扼杀了发展的活力，在美国成为落后迂腐的代名词。新政的诤难者将新政与中国进行类比，得出政府干预和调控绝非良策的结论。孔子的理想与中国实际发展的落差，既体现着新政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立场差距，也是反对者最主要的立论依据。

三、孔子与新政之外的政治评论

新政是1920—1950年间延续时间最长的美国政治事件，引发不同阵营之间的持续辩论。除了新政，其他事件也时常激起人们对于政治的思考。全面铺开的禁酒运动、二战时期的政府作为、地方政治事务以及不一而足的各种政治话题，均能让人们一抒胸臆。此类场合难免引经据典，孔子因此总被提及，印证着政治评论的精当。

[1] “John Foo Smiles at Blue Eagle and Asserts NRA Is ‘Old Stuff,’”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3, 1934: 7.

[2] John Steven McGroarty, “Seen from the Capitol’s Dome,” *Los Angeles Times*, Feb. 9, 1936: H2.

随着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社会改革的深入，酗酒日渐被改革者视作秩序混乱、道德低下的罪魁祸首之一。各州纷纷出台禁酒法令，国会于 1920 年初通过的《沃尔斯特德法案》(Volstead Act) 将禁酒运动推向全国。然而，禁酒初衷虽好，结果却差强人意。酒类走私极其猖獗，地下酒庄异常活跃，腐败横行，酗酒引起的犯罪和死亡不降反升。这令反对禁酒者底气更加充足。针对禁酒派因为自己的“创举”而沾沾自喜的情形，反对者搬出孔子，证明禁酒派仅仅在步人后尘。有评论写道，“很多人倾向于认为，禁酒与否只是近来才出现的问题”。但 3000 年前，中国就面临着类似情形，并有相应立法。此说源于孔子修订的《书经》。根据此书，周文王在公元前 12 世纪下令，烈酒只能在祭祀场合并在严格监管下才能使用。文王深信，酗酒可让社稷倾覆。^[1]有趣的是，禁酒的支持者也利用这一与孔子有关的轶事，证明禁酒并非异想天开之举，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1936 年 5 月，为纪念当地公立学校实施禁酒禁烟法令 50 周年，首都华盛顿在一所中学举行集会。到会的数位参议员表示，无意改变支持禁酒的态度。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埃尔伯特·D. 托马斯 (Elbert D. Thomas) 借用孔子的盛名，突出禁酒的正当性。托马斯声称，在孔子出生之前 250 年，世界上第一步禁酒法令就已实施，针对的对象是官员。^[2]《沃尔斯特德法案》早在 1933 年便已废除。三年之后仍有纪念禁酒的集会，可见禁酒势力的强大和持久。与孔子有关的一则轶事同时为争辩双方提供了佐证。

另外一种观点似乎对禁酒与酗酒都感到失望，因为两者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利益动机。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禁酒者和非法运输贩卖酒类者都是“小人”，他们都关心“利”。禁酒是“投资十亿美元的产业”，非法运输贩卖酒类则可以让入“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好的回报”。所以，持这种观点者既不赞成禁酒，

[1] "A Chinese Volstead," *Wall Street Journal*, Mar. 17, 1924: 2; "Let's Hear from the Wets," *Chicago Defender*, Apr. 12, 1924: 12.

[2] "Copper Visions 36 Dry States within 10 Years," *Washington Post*, May 23, 1936: 15.

亦厌恶酗酒。^[1]新泽西州的克拉克 (Clark) 法官怀疑禁酒者是在借机获取政治权力。他相信孔子说过, 人们在没有权力时会一门心思地获取权力, 而一旦权力在手, 则会不择手段地维护权力。禁酒者别无二致。克拉克因此在一次断案时作出了反对禁酒的判决。^[2]

卷入二战是 20 世纪前半期的美国人经历的又一重大事件。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 美国政府开始举全国之力, 积极备战和参战。报纸经常利用孔子的知名度, 点评政府的战时行为以及民众的反应。例如, 1942 年 4 月, 美国财政部宣布, 将面向南加州的业余摄影家举办一次盛大的摄影比赛。为鼓舞民众士气, 比赛规则要求, 参赛作品必须“生动体现各个阶段的民众备战情形”, 突出保护战略物质、民众防御、空袭警报哨、妇女后备队、购买战争储蓄券等主题。财政部有此举动, 据信是因为听从了孔子“百闻不如一见”之说。^[3]然而, 与全民备战的总体背景步调不一的是, 某些政治家只顾夸夸其谈, 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 丝毫不考虑国家的战争需要。《华尔街日报》的读者来信指责此类人等违背孔子的正名学说。来信完整引用了孔子论述“正名”之言: “名不正, 则言不顺; 言不顺, 则事不成; 事不成, 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 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 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来信者解释道, 孔子是在要求人们言辞达意, “明辨真伪”。国会议员们的言论与此标准相去甚远。他们不是考虑如何为战争贡献力量, 而是不遗余力地发表“模棱两可的言论”, “欺骗”民众, 以获取选票。^[4]对于政府的战时经济管制, 报纸上的抱怨之声亦时有所见。为平抑战时物价而于 1941 年成立的价格管理办公室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可谓是与民众日常生活最为紧密的政府部门之一。它所制定的政策规定了绝大多数零售商品的最高价格, 并对

[1] “Letters to the Editor,” *Washington Post*, Jul. 8, 1929: 6.

[2] “Pro and Con,” *Washington Post*, Jan. 5, 1931: 6.

[3] “Photo Contest Will Depict Civilian Role in War Effort,” *Los Angeles Times*, Apr. 29, 1942: B2. “百闻不如一见”出自《汉书·赵充国传》, 但美国人习惯将其视为孔子语录。

[4] “Letters to the Editor,”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3, 1942: 6.

多种物品实行配额制，中小商人自然怨声载道。有人讽刺燃油配给规定细致得让人不知所云，凡夫俗子不得要领，“可能孔子能够解决这一燃油难题”。^[1]另有人声称，从 1941 到 1943 年，50 万小商铺和小工厂因为限价和配给制度而销声匿迹，代价高昂。这是政府黔驴技穷、没有良策所致。批判者把中国谚语“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当作孔子语录，显示美国政府在平稳战时物价方面面临的困境。^[2]

孔子的身影不仅活跃在国家层面的政治评论中，地方政治同样显示着孔子盛名及其思想的参照意义。首先，将自己与孔子紧密相连的地方政治家大有人在。佐治亚州杰斐逊县官员、“圣人”约翰·R. 菲利普斯 (John R. Phillips) 就是一例。在佐治亚县行政专员联合会的例会上，菲利普斯的发言挥洒自如，孔子语录信手拈来，“如同冷饮销售员在炎炎夏日拿取冷饮一样”自然流畅。由此可见菲利普斯对于孔子的关注与熟悉程度。^[3]路易斯维尔 (所在州不详) 市长查尔斯·R. P. 法恩斯利 (Charles R. P. Farnsley) 是崇拜孔子的另一地方政治家。他视孔子为“最具智慧者之一”，立志效仿孔子的教诲，“让人民告诉我怎样施政”。^[4]当选为纽约中国城地方市长 (locality mayor) 的斯蒂奇·麦卡锡 (Stitch McCarthy) 熟悉中国文化，热心华人事业，从而在华人中赢得“孔子”的尊称。^[5]

其次，在孔子思想的映衬下，地方政府在很多时候暴露出效率不高、有失公允的弊病。南部内战老兵的养老金问题悬而未决，成为地方政府效率低下的证据之一。佐治亚州的一名内战老兵抱怨称，早在 1920 年，该州议会就已通过老兵养老金案。但五年之后，政府仍然没有任何支付养老金的举动。老兵悲愤地写道，孔子有“未知生，焉知死”

[1] “Perhaps Confucius Would Have Solved This Fuel Oil Poser,” *Chicago Tribune*, Dec. 12, 1942: 2.

[2] “Mortality of Small Business under OPA,” *Chicago Tribune*, Jul. 12, 1945: 12.

[3] Paul Stevenson, “Every Good Roads Enthusiast in State Gathers in Augusta,” *Atlanta Constitution*, Apr. 19, 1929: 6.

[4] Charles E. Davis, Jr., “The Magazine Rack,” *Washington Post*, May 15, 1949: B6.

[5] “Locality Mayors Hold Chinese Fete,” *New York Times*, Feb. 5, 1934: 18.

(《论语·先进》)之言,说明生命的重要,但州议会却在无休止地拖延。每拖延一年,就会有1000名南部邦联老兵去世,从而无法享受养老金。议会立即采取行动极其必要。^[1]在某些人眼中,加州政府的低效率则表现在不知为政的重心所在。他们应该铭记孔子的箴言“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以及“足食,足兵,民信”(《论语·颜渊》)。认真工作、言而有信、节约用度、关爱百姓、取信于民等才是加州政府应该效仿的模式。^[2]政府在使用公共资金方面缺乏公平性是为人所诟病的另一缺陷。1928年,首都华盛顿通过的一项提案赋予该市美术委员会(Fine Arts Commission)巨大权力。委员会可以决定华盛顿任何广场和纪念碑方圆200英尺内的一切建筑物的用材和外观。由于华盛顿到处都有广场和纪念碑,华盛顿大多数建筑物都处于美术委员会的监管之下。不仅如此,增加职能的美术委员会必然增加开支,“无所事事的官员阶层”靠“生产阶层”的劳动成果养活。杜撰的孔子语录为此作了注解:“你要找到一个无所事事者,我就可以给你找到一个过度操劳者”。^[3]1931年,44个州议会将制定新的征税法案。现有工商业面临更重的纳税负担,必将导致“资金流向他处”。这与孔子“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的为政理想背道而驰,不足可取。^[4]纽约州哈德逊河上的游轮去留,是引发税收利用争论的又一话题。依反对保留游轮者之见,纽约州偏远地区的人们,几乎没有机会享受州政府挪用税收维持的内河旅游。游轮因此是用公共资金“为我们当中一小部分人谋利”的典范。纽约州必须如孔子所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名正言顺地使用税收方为上策。^[5]

禁酒、二战、地方政治都是孔子思想展现其现代政治意义的场所。

[1] “Col. Massengale Writes of the Pension Status,” *Atlanta Constitution*, Feb. 2, 1926: 6.

[2] Chapin Hall, “What Goes On?,” *Los Angeles Times*, Feb. 14, 1940: A1.

[3] “Bill to Increase Power of Fine Arts Group Is Opposed,” *Washington Post*, Jan. 29, 1928: M6.

[4] “Legislation vs. Pay Rolls,” *Washington Post*, Jan. 31, 1931: 6.

[5] “Continuing the Day Line,” *New York Times*, Nov. 30, 1948: 26.

关于其他政治话题的零星评论也有以孔子为支撑的现象,说明孔子与现代美国政治的关联并不局限于某些特定领域,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价值。1926年是美国宣布独立150周年之际。但纽约市的一场独立日纪念活动中,人们不会听到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代替歌曲是“扬基歌”(Yankee Doodle)以及英国国歌“上帝拯救国王”(God Save the King)等,目的在于避免伤害英国感情。主办者解释曰,既然孔子都认为,“如果一件坏事产生了有利结果,坏事的主使者就应该受到尊重”,将殖民者逼上独立之路的英国国王因此可以成为独立日的纪念对象。^[1]鼓吹在美国废除死刑的人,不仅声称死刑比私刑更为冷血,而且言之凿凿地宣布,包括孔子在内的“所有最伟大、最高尚的人”都反对极刑。^[2]孔子还让美国的种族政策显得荒谬。例如,“超级文明的密西西比州英明的最高法院”顽固坚持白人至上论,拒绝让华人小孩入读白人学校,而是要他们“与同父异母的黑人兄弟姐妹和黑人远房表亲一同就读”。黄色变成了黑色,“孔子的后代与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的后代被归为同类了”。此举既不符常识,也无逻辑可言。^[3]

一战与冷战之间的美国政治生活,既有传统的两党争锋,更有罗斯福新政、禁酒运动和战时动员等打上时代烙印的事件。与每一次争议性政治话题相影随行的的是人们在报纸上的激烈辩论。硝烟四起的政治争论已然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辩论者引经据典,针砭时弊。鉴于孔子的盛名及其思想的巨大影响,孔子成为政治评论中重要的参照对象乃至立论依据,以特殊的方式进入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如此语境下的孔子形象褒贬兼有。褒扬者视孔子思想为美国政治行为应该力争达到的目标,试图走出困境的美国也可以从孔子那里得到些许灵感。贬低者以近代中国的停滞不前为例,提醒政府切勿重

[1] “National Anthem Barred at Meeting,” *New York Times*, Jun. 30, 1926: 3.

[2] “Asks End of Executions,” *New York Times*, Mar. 12, 1928: 19.

[3] “Yellow Is Black,” *Pittsburgh Courier*, Oct. 22, 1927: A8. 示巴女王是犹太圣经、《新约》和《古兰经》里面的人物,其治下的王国地域涵盖今天的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也门,常被美国黑人作为自己的种族象征。

蹈孔子思想主导之下的中国覆辙。褒贬共存，虽是人们各抒己见的结果，但也映射出美国人认识孔子时的一般模式。一方面，他们崇尚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和人性关怀及其为人类社会确立的高远目标。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中国历朝政府僵化遵循儒家思想而致国力衰弱深感惋惜甚至蔑视。一战之后 30 年间，美国报纸上的政治评论明白无误地展现出美国孔子形象一以贯之的双重性。

第十章

“子曰”：带有种族偏见的美国幽默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逐渐放弃置身欧亚战争之外的立场，转而直接卷入其中。美国社会及民众心理随即被战争带来的紧张氛围所笼罩。但在 40 年代初，即 1940—1941 年左右，因为经济萧条而变得愈发生机勃勃的幽默感继续渗透着人们的生活领域，感染着成千上万的美国人。^[1]美国人口构成复杂，来源各异。美国人的幽默元素从而呈现出特色鲜明的多样性，从总统到边疆居民，再到印第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几乎无人能游离于美国人的冷嘲热讽之外。^[2]此类人等体现的礼仪、宗教、风俗以及行为，都可能成为人们讽刺的对象。但综合而言，争议颇大的人物或事件往往是美国幽默的核心所在。^[3]鉴于美国历史上的种族关系格局，讥讽少数民族实乃美国幽默者的家常便饭。处于排华法案阴霾之下的华人更是无处遁身，构成了美国幽默经

[1] William H. Young, *The 1930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2002).

[2] Joseph Boskin, "American Political Humor: Touchables and Taboo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 (October 1990): 473—82; Gene Bluestein, "'The Arkansas Traveler' and the Strategy of American Humor," *Western Folklore* 21 (June 1962): 153—60; Naomi Katz and Eli Katz, "Tradition and Adaptation in American Jewish Humor,"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84 (April-June 1971): 215—220; Mark Keller, "'The Big Bear of—Maine??':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Humor," *New England Quarterly* 51 (December 1978): 565—74.

[3] Arthur Power Dudden, "American Humor," *American Quarterly* 37 (Spring 1985): 8—9.

久不衰的戏谑对象。“子曰”就是华人地位和美国幽默相互结合的产物。从1940到1941年，“子曰”笑话达到顶峰，调剂着经济衰败之下的枯燥生活。杜撰一个弱势群体的文化象征人物喋喋不休的话语，借此活跃明显沉闷的社会氛围。“子曰”见证着华人备受争议的社会地位和美国人溢于言表的轻视之情。

一、“子曰”的集中流行

编造孔子语录以博读者一笑，此种现象虽在美国报纸上历来有之，但以“子曰”开头的结构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末之前虽有出现，其汹涌而至、泛滥成灾之势却发生在1940—1941年。“子曰”俨然成为当时美国的一大文化现象。

“子曰”的流行具体肇始于何月何日，无从查证。但从1940年初，报纸便开始惊叹于这一口头禅的流行速度和强大生命力。早在当年2月，就有人整理出华盛顿“全城最为完整的孔子笑话集”，这些笑话无一不以“子曰”为重要内容。^[1] 邮购公司推出了“子曰”T恤衫。^[2] 另有撰文者感叹，1939—1940年，一切都来势凶猛，并且继续如此。比如，岁末年初的数月演变成了“‘子曰’占据的冬天”。^[3] “‘子曰’狂热”之说也应运而生。^[4] 曾有电台主持让听众提供“子曰”笑话，结果在短时间内便接到115个电话，因而新增115条“子曰”。^[5] 人们绞尽脑汁，编撰着各种孔子语录，第20条“子曰”笑话必然与前面19条“截然不同”。^[6] 很多人为此通宵达旦。^[7] 铺天盖地的“子曰”

[1] Mary Harris, “Activities This Week in Capital Clubs,” *Washington Post*, Feb. 9, 1940: 8.

[2] Marcia Winn, “Front Views and Profiles,” *Chicago Tribune*, Mar. 24, 1942: 19.

[3] Katharine Brush, “What a Winter!,” *Washington Post*, Mar. 24, 1940: S6.

[4] Frank Colby, “Don’t Take My Word for It,” *Los Angeles Times*, May 6, 1940: 12.

[5] “Listen!,” *Washington Post*, Feb. 11, 1940: A6.

[6] “Swing Sessions with Bill Gottlieb,” *Washington Post*, Feb. 18, 1940: E6.

[7] “Pieces of Haight,” *Washington Post*, Apr. 6, 1943: 12.

甚至能让某些人忘记人间烟火。例如，有人为“带有色情双关语的歌曲”（double-entendre songs）辩解道，如果此类歌曲对于创作者而言意味着黄油和面包，“带着厌恶之情转身而去的人可能就是最新‘子曰’的念叨者”。^[1]

“子曰”似乎无孔不入。洛杉矶市政委员们在紧张讨论重要议题的间隙，也会“在粗嘎的笑声中传播最新版本的‘子曰’”。^[2]广受爱戴的华盛顿同样未能逃过“子曰”的戏谑。砍樱桃树的故事本来意在赞美华盛顿的诚实品质，好事者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版本：“子曰：乔治·华盛顿把树砍倒，是为了摘到樱桃。”^[3]“子曰”还有横扫全美校园之势。^[4]有人诙谐地写道：“老师问，‘今天谁是谈论最多的人？’我却没有说：‘孔子’。”^[5]如果某一天，“子曰”碰巧没有出现，报纸会有诸如此类的话：“今天孔子可能是唯一的沉默者”，或者“孔子怎么了？”、“孔子不是什么都讲吗？”^[6]有人大发感叹，“如果人们更多地关注‘良心说’，而不是‘子曰’，世界将会更加美好”。^[7]更有人夸张道，“你要是兴高采烈地从嘴里蹦出‘子曰’，我无法想象在失去自我克制的情况下，会作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8]1940年底，《华盛顿邮报》怀疑，“是否还有人能够面对‘子曰’笑话发出笑声”。^[9]1942年5月15日的《芝加哥论坛报》询问读者，“是否还记得人人引用孔

[1] “Writers Propose to Clean Up Songs,” *New York Times*, Mar. 27, 1940: 20.

[2] “The Political Bandwagon,” *Los Angeles Times*, Feb. 12, 1940: A4.

[3] Carl Dunbar Lawrence, “Lace Up Your Boots and Dig This Jive!,”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Mar. 2, 1940: 21.

[4] Herr Mann, “Quaker City Daze,” *Pittsburg Courier*, Feb. 3, 1940: 19.

[5] “In the Wake of the News,” *Chicago Tribune*, Feb. 5, 1940: 21.

[6] “An Inquiring Golfer,” *Chicago Tribune*, Sept. 1, 1940: 6; “In the Wake of the News,” *Chicago Tribune*, Sept. 14, 1940: 19; “In the Wake of the News,” *Chicago Tribune*, Feb. 22, 1940: 27.

[7] “Mail-Bag Excerpts,” *New York Times*, Apr. 7, 1940: 77.

[8] June Provines, “Front Views and Profiles,” *Chicago Tribune*, Feb. 20, 1940: 15.

[9] Weare Holbrook, “Second-Childhood Ambitions,” *Washington Post*, Dec. 15, 1940: A4.

子的年代？”可见“子曰”当初的流行盛况。^[1]孔子本人因为早已去世，免去了遭受“子曰”骚扰的烦恼。^[2]

“子曰”被美国人交口相传，孔子因此被刻画为絮絮不休之人。报纸杜撰了孔子家人的言行，突出“子曰”数量之巨，已到令人生厌的地步。“孔子夫人说”，“我丈夫说过”，除他之外的任何人所说的话，“自此以后都属禁忌之列”。^[3]有撰文者揶揄道，“世界上最安静（也是最具耐心）的女人非孔子夫人莫属”。作者甚至认为，孔子夫人“有最为充分的依据，要求离婚”。^[4]孔子夫人淹没在了铺天盖地的“子曰”之中，成为“历史上最容易让人淡忘的女性”。^[5]在报纸虚拟的情景中，孔子夫人似乎不甘寂寞。她告诉热衷于“子曰”的美国人，“你们根本就没有听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等着，我要开始讲了”。^[6]或者孔子压根就没结婚，“否则他哪有这么多要说的”。^[7]孔子的其他家人同样不满于孔子的“唠叨”。孔子的儿子说，“爸爸，你说得太多了”。^[8]孔子的弟弟也直言不讳，“子曰太多了”。^[9]拼写与孔子相近的罗马教皇卢西乌斯（Lucius）被称为孔子的兄弟。孔子的言论泛滥，致使卢西乌斯的“哲学”难见天日。^[10]报纸为孔子杜撰了一个“诚实正直的叔叔”。“叔叔”说，如果孔子双眼紧盯枪管，手指扣动扳机，“他就会永远闭嘴”。^[11]即使名义上毫不相关的人，亦有被用以证明孔子所言极多的情形。比如，有人宣称，如果孔子与小妇人聊天，“我敢打赌，

[1] “In the Wake of the News,” *Chicago Tribune*, May 15, 1942: 25.

[2] “In the Wake of the News,” *Chicago Tribune*, Sept. 21, 1940: 17.

[3] Bill Henry, “By the Way,” *Los Angeles Times*, Mar. 7, 1940: A1.

[4] Alvin Hamburg, “Long Suffering,” *Chicago Tribune*, Feb. 15, 1940: 14.

[5] “In the Wake of the News,” *Chicago Tribune*, Mar. 30, 1940: 17.

[6] “In the Wake of the News,” *Chicago Tribune*, Mar. 15, 1940: 29.

[7] “In the Wake of the News,” *Chicago Tribune*, Jul. 2, 1945: 19.

[8] Harrison Carroll, “Behind the Scenes in Hollywood,” *Atlanta Daily World*, Mar. 7, 1940: 2.

[9] “A Line o’ Type or Two,” *Chicago Tribune*, Feb. 9, 1940: 12.

[10] Herr Mann, “Quaker City Daze,” *Pittsburg Courier*, Mar. 2, 1940: 2.

[11] “In the Wake of the News,” *Chicago Tribune*, Mar. 7, 1940: 21.

他停不下来”。^[1]另有打赌者声称，身为诗人和短篇小说家的多萝西·帕克 (Dorothy Parker) “对于孔子一定火冒三丈”。帕克曾经是“从缅因州到墨西哥的几乎每一句时髦俏皮话的原创者”，现在却被孔子取代。^[2]

报纸虚拟如此众多的各类人物，根本目的在于突出“子曰”的泛滥程度。正是因为“子曰”盛极一时，小贩们才走街串巷，兜售孔子语录，从而加重了垃圾清洁工的负担。^[3]印第安纳州的奥尔多·克里维斯顿 (Auldo Creviston) 夫妇特意给刚刚出生的女儿取名为“孔子·休” (Confucius Sue)，以纪念被称作“子曰之年”的1940年。^[4]以“子曰”为题的打油诗形象地描述了这一口头禅的流行状况。日夜听闻“子曰”的作者不禁思忖，孔子本是“安静沉思之人”，他如何拥有了“如此众多的诙谐幽默的生活道理”。即使梦中继续说话，孔子的言语也不可能达到现在的一半。^[5]“子曰”让孔子语录鱼目混杂，如若真要引用孔子之言，引用者必须特别说明，“孔子真的说过……”。^[6]

“子曰”如此流行，备受歧视的华人也“情不自禁”地入乡随俗了。在一幅漫画中，经营炒杂碎的中餐馆老板以“子曰”为荣。发现两位白人食客对“子曰”茫然无知，老板露出一脸不屑：“什么？你们居然不知道任何‘子曰’？”^[7]另一漫画中的华人洗衣店，上演着相似的一幕。面露愚钝的黑人居然说，“好了，先生，我们没有听过什么‘子曰’——孔子说什么？”此言一出，即刻引来老板和伙计惊讶而愤怒的目光。^[8]再一漫画中的华人洗衣店热衷于普及“子曰”，故特设新规如下：“凡是每包衣物洗涤费用在一美元以上者，本店赠送‘子

[1] “In the Wake of the News,” *Chicago Tribune*, Feb. 24, 1940: 17.

[2] “In the Wake of the News,” *Chicago Tribune*, Feb. 29, 1940: 25.

[3] Lewis Bergman, “‘Sanitation Men’ Not ‘White Wings,’” *New York Times*, Jan. 2, 1940: 103(?).

[4] June Provines, “Front Views and Profiles,” *Chicago Tribune*, Mar. 23, 1940: 13.

[5] “Confucius Say,” *Chicago Tribune*, Feb. 13, 1940: 21.

[6] “A Line o’ Type or Two,” *Chicago Tribune*, Jan. 30, 1940: 10.

[7] Jay Jackson, “So What?,” *Chicago Defender*, Feb. 24, 1940: 15.

[8] “Sunshine in Shadows,” *Pittsburgh Courier*, Feb. 17, 1940: 7.

曰’。”^[1]而在加利福尼亚,某洗衣店失火、店内衣物化为灰烬之际,报道依然不忘调侃:“子曰,衣物全完蛋了。”送洗衣物的附近工人只得实施“共用衬衫计划”。^[2]

虽然“子曰”最终被其他更为新潮的词汇取代,它却牢牢控制着美国人的幽默语言达数年之久,并持续至今。“子曰”的使用频率如此之高,以至于被称作“过头的孔子乱象”(overdone Confucius mess)。^[3]40年代初甚至被称作“子曰”时代。^[4]即使到了1947年,“子曰”还在某些讲述华人故事的电影中出现。^[5]《华盛顿邮报》评论曰,“这的确令人感到欣慰,毕竟有一种娱乐方式明显摆脱了因为浅薄乏味而昙花一现的窠臼”。^[6]

二、文体娱乐中的“子曰”

作为口头禅,“子曰”无意表达高深的思想,而是作为话语调剂,增加幽默成分之用。所以,就应用领域而言,文体娱乐是“子曰”出现频率较高之处。在多数情况下,文体娱乐中的“子曰”引导着为求戏剧效果而故作深沉的评论,有时本身也成为娱乐的对象。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恰值美国大众文化兴旺之时,音乐和舞台艺术、各类聚会消耗着人们的空闲时光。“子曰”因为假借遗留众多处世箴言的孔子之口,一时间为报纸新闻广泛应用,激励着人们积极参与各种娱乐活动。节奏强劲的爵士音乐在当时极为流行。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酷男靓女,以前只能窝在家里,等着收音机

[1] “Grin and Bear It,” *Los Angeles Times*, Mar. 4, 1940: 21.

[2] “Quan Lee Laundry Washed Up; Shirtee Burn, Tickee No Good,” *Los Angeles Times*, Jan. 9, 1943: A1.

[3] “Washington D. C. Street,” *Pittsburgh Courier*, Mar. 16, 1940: 10.

[4] “Pieces of Haight,” *Washington Post*, Dec. 29, 1942: 11.

[5] “New Charlie Chan in Bow,” *Los Angeles Times*, Dec. 11, 1947: A11.

[6] “Information Thanks,” *Washington Post*, Apr. 5, 1940: 10.

播放“红得发紫”的爵士乐。而现在，“子曰”，刚刚开张的天穹爵士乐俱乐部(Sky Top Jitterbug Club)将让乐迷们兴奋不断。人们只有身临其境，才会知晓孔子为什么会这样说。^[1]酷爱巴锡(Basie)爵士乐的乐评人热情鼓动人们，追捧“巴锡爵士的动感节奏”，因为“子曰，‘巴锡爵士今天独占鳌头’”。^[2]附会的“子曰”语录还被纳入音乐创作，成为爵士乐的唱词。定于1940年2月中旬首发的雷蒙德·斯科特(Raymond Scott)爵士乐唱片，不仅收录众多脍炙人口的流行金曲，更是吸纳了“子曰”语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因为如此，该唱片预计会在乐迷中引起“轰动”。^[3]“子曰”在其他爵士乐创作中亦多有应用。^[4]孔子虽有涉及音乐的言论，但他所谈论者显然不是爵士乐。爵士乐的推动者和创作者，正是借用孔子的知名度以及孔子与现代音乐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增加爵士乐的吸引力和社会渗透力。

与音乐相影随行的舞蹈也可见杜撰的“子曰”语录。比如，“子曰”，女性如果想要跟上潮流，必须学习舞蹈。^[5]而男性则大可不必，“孔子会说，这不适合金发美男”。^[6]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一次演出中，被称作“舞蹈宝贝”的格洛丽亚·马隆(Gloria Malone)甚至表演了以“子曰”为主题的舞蹈。^[7]与此同时，“子曰”出现在戏剧报道之中，增添戏剧和相关评论的感染力。加州伯班克(Burbank)的中学校长、教师、学校秘书和运动教练计划在1940年2月29日举行滑稽剧义演。《洛杉矶时报》称，这是因为，“子曰：‘当闰日来临，迂腐的学究应该走开’”。师生员工因此应该开怀大笑。“子曰”显然是又一种形式

[1] “Did Confucius Say?,” *Pittsburgh Courier*, Feb. 10, 1940: 21.

[2] Frank E. Bolden, “Orchestra Whirl,” *Pittsburgh Courier*, Jan. 24, 1942: 21. 威廉·巴锡(William Basie)是美国爵士乐钢琴家和作曲家，爵士乐的代表人物之一。

[3] “Listen!,” *Washington Post*, Jan. 19, 1940: 28.

[4] “Swing Sessions,” *Washington Post*, Feb. 11, 1940: E4.

[5] “Tennessee,” *Chicago Defender*, Mar. 1940: 11.

[6] Betty Beale, “Top Hats and Tiaras,” *Washington Post*, Feb. 11, 1940: S1.

[7] “She’s a Dancing Doll,” *Chicago Defender*, Jun. 29, 1940: 3.

的噱头。^[1]在演出中,经常造访好莱坞劳军联合组织(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的冷面滑稽演员哈里·兰登(Harry Langdon),同样不失时机地加入了“子曰”元素。他有台词如下:“海军的孔子说,‘当女人看上去苍老,她实际上很年轻。当女人看上去年轻,她实际上很苍老。当女人回头——望——跟上她。’”^[2]“子曰”甚至引起环球电影公司的关注。名叫《子曰》的剧本业已创作完毕,该公司正寻找合适的演员出演。至于最终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3]

与音乐和舞台艺术的情形类似,40年代初的社交活动离不开“子曰”的点缀。哈佛大学的班级日是校友云集的场所,校友们穿着光鲜漂亮,手举标语牌,行进在哈佛校园。1930级学生身穿淡绿色外套,头戴中式帽子,标语牌主题“紧随最近的‘子曰’潮流”。^[4]1940年的母亲节来临之际,伊利诺伊州妇女俱乐部联合会第三区的年轻妇女俱乐部紧锣密鼓地筹划节目,准备向老年妇女俱乐部献上节日的祝福。尽管演出异彩纷呈,最具吸引力的节目当数莉莲·科思(Lillian Kothe)小姐编排的“子曰”。^[5]当年6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随着总统候选人党内提名角逐者的造势,费城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之中。传统的元旦化装游行特地再次上演,观众估计在50万人以上。来自郊区的弦乐队演奏了“子曰”。^[6]而在纽约的华人大斋节音乐茶会上,“子曰”所引导的警句藏于中国甜饼内,来宾享用美食时便可欣赏各不相同的“子

[1] “Burbank Faculty Will Stage ‘Leap Year Follies’ Tonight,” *Los Angeles Times*, Feb. 29, 1940: 8.

[2] “Women’s Activities,” *Los Angeles Times*, Jun. 30, 1943: A5.

[3] Edwin Schallert, “Wilcox Seeks ‘Sally’ to Star Anna Neagle,” *Los Angeles Times*, Mar. 15, 1940: A13.

[4] “Good Fellowship at Harvard Class Da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19, 1940: 11.

[5] “Calumet City Juniors to Fete Senior Group,” *Chicago Tribune*, May 12, 1940: SW3.

[6] Hedley Donovan, “Dewey Most Wide Awake Candidate, Sleeps Only 4 Hours,” *Washington Post*, Jun. 26, 1940: 5.

曰”。^[1] 荷兰驻美使团的商务专员在住处举行鸡尾酒会。参与者一看到室内的巨幅中国刺绣壁毯，就情不自禁想到，“以‘子曰’开始交谈最为恰当”。^[2] 为了增添异域色彩，芝加哥南城青年兄弟会举办的绿龙聚会让某人装扮成孔子，作为“特邀嘉宾”。报纸解释此举曰，“子曰，他会参加星期日的聚会”。^[3] 纽约“十五人快乐委员会”正在组织每年一次的月光下的哈得逊河逆流旅行。出于招揽生意之需，“子曰”有了新的变体：“‘凝视水晶球预测未来的女士，看到了本季节最为快乐的航行’。不。孔子没有这样说。”^[4] 此次广告显然意在借用风靡一时的“子曰”所具有的影响力和诙谐效果。

涉及美国人热衷的体育运动，报纸运用“子曰”的频率不亚于其他场合。赛马吸引着众多美国人的目光，赛马报道或评论以善于洞察世事的孔子，衬托自己的“真知灼见”。例如，评论员雪莉·波维奇（Shirley Povich）看好名叫“黑狐狸”的赛马。他因此假借孔子之口写道，“子曰：黑狐狸将赢得 1940 年的肯塔基马赛”。^[5] “子曰，‘本想从赛马中获得乐趣的人有时也会乐极生悲’，马里兰州的托马斯·T. 莫特（Thomas T. Mott）以其亲身经历，印证着这一结论。莫特偶然获得一匹赛马，便想用其参加比赛。然而，该马此前登记的名字并非唯一，莫特有冒名顶替的嫌疑。四处参赛被拒的莫特只得将赛马用于打猎。^[6] 而在另外一次赛马过程中，“子曰”却未中要害。两匹马同时到达终点，难分胜负。评论者写道，“虽然孔子有很多话要说，裁判却

[1] “Chinese Tea to Be Given by Les Douze Armies,”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Mar. 14, 1942: 8.

[2] “Counselor and Mme. Molekamp Entertain to Honor Henrik Bos,” *Washington Post*, Feb. 17, 1940: 14.

[3] “Confucius Say He Will Attend Frolic Sunday,” *Chicago Tribune*, Feb. 25, 1940: SW5.

[4] “Joy Committee Giving Annual Moonlight Sail,”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Aug. 3, 1940: 24.

[5] “This Morning with Shirley Povich,” *Washington Post*, Jan. 23, 1940: 18.

[6] Walter Haight, “Confucius Say...,” *Washington Post*, Feb. 2, 1940: 23.

拥有赛场上的最终决定权”。^[1]论及被比作赛马的总统选举,“子曰”似乎也比评论者略逊一筹。子曰,“中途换马危险”。评论者揶揄道,“如果马匹健康,没有飞节内肿之疾,并且能够负重前行,这是好建议”。但如果马匹不听主人使唤,不换才是危险的。^[2]此处的马喻指已经执政七年有余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其实,单就赛马评论而言,使用“子曰”最为频繁者非《华盛顿邮报》的专栏评论家比尔·本宁斯(Bill Bennings)莫属。从1940年1月22日到3月7日的一个半月时间内,本宁斯的每日赛马赌注评论提及“子曰”达28天,可见“子曰”的流行程度和本宁斯的娴熟应用。但凡预测第二天的赌注走向,本宁斯都会以“子曰”为引导,发表自己的高见。此举之意,一方面在于吸引读者注意,一方面旨在增加赌注分析的震撼力。^[3]

赛马之外,更多种类的体育运动占据着美国人的空闲时间,评论者总能为“子曰”找到用武之地。通过附会的言论,孔子营造着轻松氛围,突出评论者的观察能力。酷爱滑雪的美国人经常扭断脚踝。为提醒滑雪者多加注意,“子曰:‘穿着滑雪裤的人经常难以保持平衡’”。^[4]拳击运动员约翰尼·佩切克(Johnny Paycheck)被击倒32次以后,无意继续拳击生涯。“孔子可能会说”,他正在退出赛事。^[5]拳击运动员亨利·阿姆斯特朗(Henry Armstrong)即将在洛杉矶为中量级世界冠军而战。报纸特意回顾阿姆斯特朗过去的辉煌战绩,以加深人们的印象,因为“子曰,‘人们很健忘’”。^[6]而在桥牌进行到胶着状态时,双方有时会试图用“子曰”来调节紧张气氛。^[7]世界职业棒球联赛的击球英雄查利·凯勒(Charley Keller)训练正酣,但却未能击

[1] Walter Haight, “\$5 000 Bowie Race Won in Dead Race,” *Washington Post*, Apr. 7, 1940: 6.

[2] “A Line o’ Type or Two,” *Chicago Tribune*, Sept. 23, 1940: 10; “Confucius vs. Confusionist,” *Los Angeles Times*, Nov. 4, 1940: A4.

[3] “Bill Bennings at the Post,” *Washington Post*, Jan. 22—Mar. 7, 1940.

[4] “A Line o’ Type or Two,” *Chicago Tribune*, Mar. 4, 1940: 10.

[5] Jack Munhall, “Postgrad,” *Washington Post*, Jan. 22, 1940: 15.

[6] Fay Young, “The Stuff Is Here,” *Chicago Defender*, Mar. 2, 1940: 24.

[7] “Contract According to Culbertson,” *Chicago Tribune*, Apr. 7, 1940: 15.

中投球手迅速投来的球。凯勒辩解道，自己根本没有击球，仅仅挥了一下棒。旁观者调侃道，“子曰：要给凯勒投快球，就得站在一垒之外”。其用意显然在于推翻凯勒的辩白。^[1]保龄球是美国人钟爱的另外一项运动，取得骄人成绩者甚众。为了强调此说，孔子再次被派上用场。“子曰，‘获得 300 分的保龄球手没有补中的机会’。”保龄球一局的满分即为 300，获此分数者极为稀少，且须百发百中。但评论者认为，“孔子”此言差矣，因为美国保龄球协会记录的满分球手不乏其人。^[2]正当亚特兰大人为自己城市的棒球队自行解散而苦恼时，芝加哥的美国巨人队来到此地安家落户。“孔子没有说”，意外同样降临亚特兰大。在接下来的 60 天里，亚特兰大将拥有一支专业的棒球队。巨人队将与亚特兰大融为一体，就如同在芝加哥一样。^[3]

与出现的场合相一致，文体娱乐语境下的“子曰”意在制造诙谐轻松的气氛。传授严肃生活哲理和治国理念的孔子摇身一变，成为喋喋不休、关注琐碎小事之人。“孔子”所言虽多，却几乎不中要害，或与常理相悖。正是孔子的本来身份和杜撰的角色之间、传颂千年的箴言和肤浅无聊的“语录”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烘托着“子曰”的喜剧效果。

三、蕴涵生活道理的“子曰”

美国报纸的撰文者显然明白，真正的孔子语录与文体娱乐关联甚少，体育和消遣场合的“子曰”因此显得荒诞。但在生活起居领域，孔子却是细节的敏锐观察者和规范的积极倡导者。即使在美国，孔子的相关言论也有着众多的推崇者。基于这种认识，生活起居语境下“子

[1] James P. Dawson, "Southpaw Hurler in First Workout," *New York Times*, Feb. 28, 1940: 24.

[2] Don Snyder, "Down the Alley," *Los Angeles Times*, Sept. 15, 1946: A7.

[3] Lucius "Melancholy" Jones, "Slants on Sports," *Atlanta Daily World*, Mar. 17, 1940: 8.

曰”的运用者，尽管仍然以编撰孔子言论为乐事，孔子的负面角色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事事皆通、充满睿智的形象。“子曰”假借孔子之口，承载着报纸对于人们生活起居的期望。如果说消遣娱乐中的“子曰”以孔子的历史和杜撰身份之间的巨大反差为噱头，事关生活起居的“子曰”则充分挖掘了作为规范制订者的孔子所具有的感召力。

“子曰”利用孔子长于提炼生活道理的特点，传授生活“真谛”。一方面，“子曰”为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建言献策，订立规范。人际交往是生活的必修课，但个人性格却扑朔迷离，徒增交往难度。“子曰”试图指点迷津。性格对路，交往则顺。自我封闭的华人与白人之间交流甚少，隔阂颇深。“子曰，如果找对人，你就能受到中国人最热烈的欢迎。”就因为认识一名热心华人，人口普查统计员约翰·E. 普鲁奇诺(John E. Pluchino)在华盛顿唐人街的调查极为顺利。^[1]《华尔街日报》模仿孔子的口吻称，“摩登女孩可能于事无益，但肯定能让人分心”。^[2]另外一则“子曰”断定，“使用软百叶窗帘遮挡自己的男人靠不住”。^[3]“孔子”还说，“女人单独工作尚可，与他人合作较难，女人在一起工作最为棘手”。^[4]注重形象似乎是人之共性。在一组漫画中，世界顶尖科学家齐聚一堂，研究黑色兰花之谜。依据主持人的说法，之所以如此大动干戈，是因为“子曰，‘要保全面子’”。^[5]

男婚女嫁是人生旅途必不可少的步骤，演绎出一幕幕生活情节。“子曰”照样恪守着点化职责。针对涉足爱河的女性，“子曰：亲吻你的男人不一定爱你”。^[6]男性不应轻视女性的辨别能力：“子曰：学会使用自己眼睛的女孩能力非凡，她不一定就是你的”。^[7]然而，对女性知之甚少的男人不在少数。“子曰：有三种男人不了解女人——老年

[1] “Knowing Right People Makes Census Easy,” *Washington Post*, Apr. 11, 1940: 17.

[2] “Pepper and Salt,” *Wall Street Journal*, Jul. 6, 1940: 4.

[3] Larry Wolters, “Radio Gag Bag,” *Chicago Tribune*, Nov. 16, 1940: C20.

[4] Ruth Mackay, “White Collar Girl,” *Chicago Tribune*, Dec. 2, 1942: 23.

[5] “Brenda Starr,” *Chicago Tribune*, Apr. 28, 1949: W-A10.

[6] Ida Foy, “Jitterbugs,” *Pittsburgh Courier*, Mar. 9, 1940: 3.

[7] June Provines, “Front Views and Profiles,” *Chicago Tribune*, Jan. 31, 1940: 13.

男人、年轻男人、中年男人”。^[1] 名叫伦尼·兰德尔 (Lenny Randall) 的花花公子便是如此一人。兰德尔的父亲认为，所有歌舞女演员都会色诱男人，骗取钱财。父亲与兰德尔打赌，如果兰德尔能够证明存在例外，他将获得前往南美的往返机票。兰德尔于是对俏佳人俱乐部 (Quail Club) 据称曲线之美“能让人血压升高”的当家花旦佩吉·哈蒙 (Peggy Harmon) 小姐发起猛烈攻势，致其坠入爱河。哈蒙拒绝了兰德尔父亲开出的巨额支票，兰德尔从而赢得父亲允诺的机票。兰德尔决定终止与哈蒙的关系，并全盘托出其中内情。怒火中烧的哈蒙取出左轮手枪，指着兰德尔，斥责其荒诞行为，并且告诫道：“子曰：‘如果富有的花花公子通过邮件向姑娘表达炙热的爱情，姑娘要是不把烫得咝咝作响的情书带上法庭、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的话，那她就太愚蠢了。’”对簿公堂看来在所难免。^[2] 卡尔·德克尔 (Karl Decker) 先生则迥然不同。在中美洲尤卡坦半岛度假时，德克尔救下因爱情绝望而试图跳海轻生的漂亮女士，两人终成眷属。“子曰，当一个人救下溺水者，获救者余生的责任便寄托在了施救者的肩上。”^[3] “孔子”还催促着新郎步入婚礼教堂的脚步，因为“子曰，‘他们最好快点，不然就来不及了’”。^[4] 至于家庭矛盾，报纸亦有建议。“子曰，‘与配偶带着隔阂回家的哈莱姆人，解决办法就在你家壁橱里’”，有夫妻无隔夜之仇的意味。^[5] 充当第三者的女性也有“箴言”可循：“孔子曾说，‘母狼从不在别人的后院嗥叫’”。^[6]

“孔子”教导人们，理性生活，理智做事。不论身处顺境或是逆境，待人都须谦和。“孔子”说，“当你上坡时，要对路人友好，因为

[1] Bill Henry, "By the Way," *Los Angeles Times*, Apr. 30, 1940: A1.

[2] Brucel Reynolds, "Girl Meets Playboy," *Chicago Defender*, May 4, 1940: 15.

[3] Mae Tinee, "Spencer Tracy Buys Up This Ho Hum Movie," *Chicago Tribune*, Apr. 1, 1940: 17.

[4] "Jitterbugs," *Pittsburgh Courier*, Feb. 24, 1940: 18.

[5] "Harlem after Dark,"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Mar. 9, 1940: 24. 哈莱姆是美国纽约市的一个黑人聚居区。

[6] Comics, *Los Angeles Times*, Apr. 29, 1947: A7.

你可能在下坡时还会碰到他们”。^[1]对于那些想要好处占尽之人，“孔子”则说，“大多数将蜡烛两 endpoint 点燃并自认非常暖和的人，最终将引火烧身”。^[2]与此同时，人们需要关注现实利益，切勿忽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馅饼才能吃馅饼——子曰”。^[3]“孔子”告诫人们，遇事切勿慌乱。比如，“子曰：让马摆脱疲倦之法绝对不是点燃火堆”。废品收购者乔治·马丁（George Martin）就是在马匹疲倦罢工、别无他法之际，试图用火驱赶马匹前行。结果马受热而逃，废品到处散落。受惊之马从此杳如黄鹤。^[4]与此同时，处事方式切不可迂腐僵化。如果保险丝烧断但又暂无备用，你就应该记住以下“子曰”：“点燃一支小蜡烛总比抱怨黑暗好。”^[5]若遇股市低迷，“子曰……‘聪明的中国人会在接到飓风警报时采取躲避措施，一直呆在防风掩体里，直到警报完全解除’”。^[6]中国沿海当然没有飓风之说，“子曰”只是想告诉人们，遭遇不顺不可鲁莽行事。

另一方面，“子曰”从某些侧面关注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健康是其中之一。美国人对于中医中药不以为然，但间或也有正视其价值者。加利福尼亚前州长因接触气根毒藤引发皮疹，痛苦不堪。一位中国草药医生最终让其病痛得以解除。相关报道总结称，“子曰：‘当德高望重的先辈受气根毒藤之苦时，这比跳蚤叮咬更加难受，但名不虚传的草药让痒痛一扫而光’”。^[7]能在中医里入药的蟾蜍皮粉曾被西医付之一笑。然而，美国人后来的研究却发现，蟾蜍皮实乃强劲的心脏兴奋剂。所以，“子曰，每日蟾蜍一只，便可远离医生”。^[8]此外，“子曰”不忘告诉人们，适当劳作于身心有益。为了营造诙谐气氛，鼓励人们

[1] “This Morning with Shirley Povich,” *Washington Post*, Mar. 31, 1942: 20.

[2] Chester L. Washington, “Up and Down the Avenue,” *Pittsburgh Courier*, Mar. 2, 1940: 7.

[3] Untitled Article, *Washington Post*, Feb. 10, 1940: 8.

[4] David H. Orro, “Confucius Say,” *Chicago Defender*, Feb. 24, 1940: 4.

[5] “This Spinning Spher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18, 1947: 17.

[6] “Along the Highways and Byways of Finance,” *New York Times*, Aug. 1, 1948: F3.

[7] “Along El Camino Real,” *Los Angeles Times*, Jan. 29, 1940: A15.

[8] “A Line o’ Type or Two,” *Chicago Tribune*, Jun. 7, 1940: 14.

快乐生活的建议故意写道，“孔子没有说，但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老建议：如果希望快乐一个小时，你就喝醉。如果希望快乐三天，你就结婚。如果希望快乐八天，你就杀一头猪，把它吃掉。如果希望永远快乐，你就成为一个园丁”。^[1] 因为“子曰”而名声大振的孔子终将来去匆匆，但“农夫的女儿却将永远与我们同在”。田间花园的劳作始终是健康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2] “孔子”甚至给出了粮食蔬菜的具体种植方法。比如，“子曰，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默斯特（Amherst）分校的后园艺专家今天同样认为”，玉米和西红柿如果相间种植，长势将比单独种植好 25%~30%。^[3] 孔子据称喜食黄瓜，因此格外关注黄瓜的生长。“子曰，今年必须给它们（黄瓜）搭棚，以便它们能够抵御天气侵害”。^[4]

四、社会行为中的“子曰”

此处所谓的社会行为，是与上文的个人生活相对而言，是一种群体或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如果说上文的“孔子”意在宣讲生活道理的话，现身广告和某些权利诉求中的“孔子”更加看重其说教产生的效果。“子曰”因此还具备营造声势的功能。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就已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时至 40 年代，消费购物更是人们生活起居不可或缺的一环，报纸广告铺天盖地。借用孔子盛名激发消费欲望的情形时有所见，构成一道独特的广告风景。“子曰”从而与美国人的日常消费紧密相连。“子曰”毫无悬念地出现在某些与中国有关的广告之中。为了推销店内商品，卡森宝塔睡衣店（Carson Pagoda Togas）的广告称，其设计师模仿中国古代织锦

[1] “Four Ways of Being Happy,” *Chicago Tribune*, May 28, 1940: 14.

[2] Arch Ward, “In the Wake of the News,” *Chicago Tribune*, Feb. 27, 1941: 19.

[3] “Every Auto Jounce an Air Coole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27, 1940: 13.

[4] L. H. Robbins, “Joe and Jane Novice Are Sophomores Now,” *New York Times*, Mar. 21, 1943: SG14.

的花样，从广东人那里获得灵感，以绒面呢和绉呢为料制作成衣，色调优雅，尤其适合在欣赏清畅的琴声时穿着。清爽利落的棉质睡衣还有清脆作响的坠饰。广告鼓动顾客像中国人一样，“雇一辆黄包车，前往选购”。广告以“子曰”结尾：“正如孔子所说，‘几件宝塔睡衣在手，价值翻倍，圣诞将至尤其如此’。”^[1]另一商家的广告称，“子曰，本店带有时髦盘花镶边的两件套中式连衣裙独特式样最为靓丽”。黑色、棕色、紫色尽可选择。^[2]鼓动人们“穿着本店的短袖棉质衣裤凉爽而眠”的芝加哥史蒂文斯(Stevens)商店，同样让孔子现身说法：“子曰，中国风格的睡衣非常平滑。”广告接着声称，为了夏日睡梦的温馨舒适，“我们应用了东方智慧”。可供选择的色调有玉米黄、拷边为孔雀蓝的中国红或者拷边为红色的孔雀蓝。^[3]

其实，广告中的“子曰”并非专事推销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纯粹美国商品或服务的广告使用“子曰”的频率更高。这从一个侧面印证着“子曰”的流行程度。例如，名叫萨沃伊(Savoy)的舞厅为招揽顾客，在复活节来临之际刊登如下广告：“子曰：少男少女相约萨沃伊舞厅。复活节后的星期一晚上——业余滑稽说唱团静候俊男靓女的光临——在老友之家领取节目单——人人尽兴。”^[4]销售帽子的广告写道，“子曰：女人的帽子戴在头上比放在商店橱窗更加漂亮”。^[5]芝加哥的A&P超市吹嘘说，每周有上百万厉行节约的家庭主妇蜂拥而至。超市到底具有何种吸引力，顾客不妨亲往一看，因为“子曰：‘大家都去的地方，你也值得去’”。^[6]创办于1886年的美国零售业巨头西尔斯公司(Sears)亦不例外。公司的一次促销广告开篇即是：“子曰，‘缺席西尔斯促销日的人，将失去节省大笔开支的机会’”。“是的——中国古代圣人孔子没错”，芝加哥市民能够在此次促销活动中大赚一

[1] “Carson Pagoda Togas,” *Chicago Tribune*, Dec. 2, 1947: 28.

[2] “The Maternity Shop,” *Washington Post*, Sept. 12, 1948: S15.

[3] “Stevens,” *Chicago Tribune*, Apr. 18, 1949: 18.

[4] “Confucius Say,” *Chicago Defender*, Mar. 23, 1940: 2.

[5] Helen F. Chappell, “Chatter and Some News,” *Chicago Defender*, Mar. 2, 1940: 6.

[6] Display Ad, *Chicago Tribune*, Mar. 15, 1940: 11.

笔。^[1] 罗宾斯 (Robins) 酒类商店标榜自己的诚信, 承诺提供“最低廉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广告认为, 话语虽然质朴, 理念却清晰明了: “子曰: 真挚的语言比花哨的句子更加重要。”^[2] 春夏之交是感冒多发季节, 及时服药至关重要。“子曰: 与感冒赌博的人其免疫系统将受损。”排除体内毒素是践行“孔子”教诲的关键一步。咀嚼名叫“Feen-a-Mint”的通便药片可达此效。^[3] 一家社区个人金融公司为招揽客户写道, “子曰, 你可以立即借到 300 美元, 可在 20 月内任何时间偿还”。^[4] 报纸还用“子曰”为自己的分类广告版面做起了广告。以下便是一例: “子曰, 聪明的男人邂逅漂亮的女孩……给妈妈买糖果……很快就娶漂亮女孩……然后通过《阿姆斯特丹新闻》的分类广告为漂亮女孩找到漂亮的家。”^[5] 一场全明星阵容的橄榄球赛开战在即, 负责门票销售的慈善公司变相利用“子曰”, 力劝人们前往购票。门票广告称: 孔子“忙于制造时髦的俏皮话, 忘记及早预订全明星橄榄球赛门票。此举并非明智, 今后无人会引用他说的话”。广告鼓励人们, 趁此机会, “成为左邻右舍的话题中心! 现在就预订!”^[6]

“子曰”不仅用以促销, 还用以促变, 为某些社会成员的权利诉求营造氛围。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 黑人权利一直是美国主流社会讳莫如深的问题。黑人自己则从未放弃争取平等权利的努力。因为流行一时, “子曰”偶有渗入黑人运动的情形, 强化着黑人的斗争决心。1940 年, 代表纽约哈莱姆地区的国会议员席位面临改选。为打消黑人代表的参选念头, 当地白人在黑人选举游行队伍两边大肆起哄, 高声叫嚷着旨在阻挠黑人参政的“子曰”。其中一则如下: “子曰: ‘决不能让黑人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代表哈莱姆。’”白人编撰者假借孔子之名, 试图逼迫黑人改变初衷, 反而激起黑人更大的决心。化名“神

[1] “Sears Day Sales,” *Chicago Tribune*, Feb. 25, 1940: A4.

[2] “Robins Inc.,” *Chicago Tribune*, Jan. 4, 1942: N5.

[3] “Confucius Say,” *Chicago Tribune*, May 12, 1940: C5.

[4] “Confucius Say,”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Feb. 24, 1940: 2.

[5] “Confucius Say,”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Jan. 27, 1940: 1.

[6] “Remember Confucius?,” *Chicago Tribune*, Jun. 19, 1941: 21.

秘人物”的黑人宣称，“我们应该着手推选一名优秀的候选人”，让他代表全国黑人的利益，“孔子有什么话说？”^[1]而在另外一处，“子曰”却对黑人具有了正面意义。哈莱姆的黑人并非不满于孔子，而是对此处的“子曰”深感厌恶。“子曰”因而从反面激励着哈莱姆黑人的斗志。哈莱姆的劳工领袖正与一家工厂谈判雇用黑人的问题。然而，由于劳工领袖内部分歧，谈判差点功亏一篑。有鉴于此，“子曰：‘联合抵制者应该集体谈判，而不是相互争个你死我活，引起混乱，坐失希望……’”。^[2]

白人社会，“子曰”也与权利相连。面对权力日趋集中的富兰克林·D. 罗斯福政府，不满意者多有抱怨。时值罗斯福总体大幅削弱劳工部长范妮·珀金斯 (Fannie Perkins) 的权力，有人代表罗斯福的众多批评者指责罗斯福夫妇大权独揽。寻求“古老智慧”的诘难者发现，“孔子的妻子说：‘等着我倾吐出来，我会把什么都告诉他们’”。诘难者于是建议珀金斯，撰写回忆录，揭露罗斯福的独断专横，为所有有着类似经历者争取权利。^[3]遭受诟病的还有负责社会救济的各类政府部门。他们效率低下，致使很多年轻人无钱结婚。“子曰：‘爱情如身体，必需食物才能存活’。”钱就是爱情的食物。因此，相关部门必须提高工作效率，方能维护民众权利。^[4]即使中学生也在利用“子曰”主张权利。英国哲学家罗素即将受聘纽约城市学院，琼·凯 (Jean Kay) 小姐却以纳税人的身份提起诉讼，要求法院撤销学校的聘请决定。此举遭到包括中学生在内的众多当地学生反对。音乐与艺术中学的两名学生，在凯的家门前举着标语牌抗议。标语牌上写着，“子曰：学生反对凯小姐。30 万学生不会错。”^[5]

[1] “What Does Confucius Say?,”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Apr. 20, 1940: 14.

[2] Abe Hill, “Gum Beating ‘Big Names’ Gave Frank’s a Hard Day,”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Sept. 1, 1945: 2—A.

[3] “Fannie Just a Figurehead,” *Chicago Tribune*, Jul. 17, 1940: 12.

[4] Stan Cunningham, “Circling the Town,” *Pittsburgh Courier*, Mar. 16, 1940: 19.

[5] “Foe of Russell Picketed,” *New York Times*, Mar. 23, 1940: 11.

五、理性反思

“子曰”风靡一时，无数美国人编撰与传播，报纸上的“孔子”语录目不暇接。时髦的口头禅为尚未完全走出经济萧条阴影的美国带来欢声笑语。然而，孔子毕竟不同于其他取乐对象。随意杜撰言辞以取笑一个广为人知的思想家，这是否合适，又反映出何种心态，此乃很多理性思考者不断反思的问题。总体而言，反思者对“子曰”的流行持批判态度，认为其追随者根本不了解孔子其人，制造着不良的社会风气。“子曰”因此应该休矣。

孔子本人与“子曰”刻画的形象大相径庭。“孔子”油嘴滑舌，絮絮叨叨，真实的孔子却聪明睿智，提炼了经久适用的人类真理。“子曰”属于“以讹传讹”(spread)的范畴，成千上万的盲从者从未思考过孔子的真正身份。很多人对圣经顶礼膜拜，却不知道孔子是圣经“伦理准则和伦理模式的第一个真正创建者”。可以说，孔子是“基督教导师的伟大先驱之一”。编撰和散布“子曰”就是“无礼不敬”，是“愚蠢之举”。^[1]喧嚣之下，“子曰”难掩其“空洞浅薄”。谁只要把孔子与本杰明·富兰克林放在一起就会发现，“所有睿智者秉性相近”。孔子有此遭遇，“有人为中国圣人感到难过吗？”^[2]“子曰”将孔子描绘为“粗鄙的万事通”。沉溺其中的人可能浑然不知，孔子实乃“讲述生活常识的伟大导师”。^[3]某些评论断定，在“胡言乱语”前加上“子曰”的人，“在面对这位古代圣人所拥有的大量处事智慧时，一定会感到惊讶的”。^[4]与“子曰”呈现的啰嗦形象迥然有异的是，真实的孔子“能够将整套哲学思想浓缩成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每个字都恰如其分”。^[5]有撰文者提醒道，“当我们拿孔子开涮时，不要忘了他在基督诞生之

[1] “‘Confucius Say’ — Sacreligion Glorified,” *Atlanta Daily World*, Feb. 26, 1940: 6.

[2] “What Would ‘Confucius Sa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 29, 1940: 22.

[3] “Voice of the People,” *Chicago Tribune*, Feb. 27, 1940: 10.

[4] “Confucius Sa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 29, 1948: 11.

[5] Josephine Lowman, “Why Grow Old?,” *Los Angeles Times*, Apr. 8, 1940: A9.

前 500 年就创立了黄金准则”。^[1] 热衷于“子曰”的美国人无法意识到，孔子哲学“的确焕发着种族智慧”。因为孔子的存在，列强的枪炮可以改变中国的地貌，但“绝对无法清除其辉煌的哲学”。^[2] “子曰”实乃孔子“聪明语录的粗鄙拙劣的模仿”。^[3] 有些人虽然矢口否认孔子与基督地位平等，却也承认，“子曰”无一为孔子亲口所言。^[4]

“子曰”随意杜撰孔子语录，体现着散布者对孔子思想的茫然无知，显露出某些美国人并不健康的文化心理。名叫爱德华·汤普森 (Edward Thompson) 的作者直斥“子曰”是“一株极速蔓延的精神疯草” (a pestilential crop of mental locoweed)。编撰者“给深邃思想的庄重面孔戴上了小丑面具”。时已去世近 2500 年的孔子却“无法捍卫自己的尊严”。“子曰”是一种“群氓心理” (mob psychology) 作祟的结果。^[5] “子曰”传播着“污秽下流的……俏皮话”。^[6] 去除污渍、让孔子笑话“保持干净”因此势在必行。^[7] 更有人担忧，“子曰”开创了“危险的先例”，人类历史上的其他名人可能难逃被拙劣模仿的命运。“人类赖以生活的真理”将会被人遗忘。^[8]

报纸上不光有理性思考，亦有采取实际措施、以阻止“子曰”不断蔓延之举。某人希望远离尘嚣，以便避开“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杜撰出来的‘子曰’”。^[9] 正值“子曰”大行其道之际，《幽默类属词典》出版，收录 5640 个笑话。令评论者最感欣慰的是，词

[1] Wendell P. Dabney, "Gossip and Reflections,"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Feb. 24, 1940: 14.

[2] Caleb, "Confucius Say," *Chicago Tribune*, Mar. 6, 1940: 6.

[3] "Leonard Lyons," *Washington Post*, Jan. 25, 1940: 9.

[4] W. H. Bonds, "From a Layman's Viewpoint," *Atlanta Daily World*, Mar. 2, 1940: 2; Gamewell Valentine, "Themes & Variations," *Atlanta Daily World*, Mar. 3, 1940: 4.

[5] Edward Thompson, "Confucius Say—," *Los Angeles Times*, Apr. 21, 1940: 17.

[6] Bill Henry, "By the Way," *Los Angeles Times*, Feb. 5, 1940: A1.

[7] "In the Wake of the News," *Chicago Tribune*, Mar. 28, 1940: 25.

[8] "Editorial of the Day," *Chicago Tribune*, Dec. 7, 1941: 18.

[9] Wendell P. Dabney, "Gossip and Reflections,"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Mar. 30, 1940: 12.

典洋洋洒洒 600 页，没有一条以“子曰”开头。“仅此一点，就让词典物有所值”。^[1]除了报纸之外，电台节目是“子曰”得以传播的另一主要媒介。于是便有听众去信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当前的广播节目禁止诋毁中国的圣人”。委员会表示，自己无权干预电台节目的播出。有关报道因此建议，“子曰”的反对者不妨尝试“更加民主的程序方式”，如在“子曰”开始播出之时调换电台，因为收听率低下的节目注定没有多少生命力。^[2]有别于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漠然态度，纽约地方法官莫里斯·罗滕伯格 (Morris Rothenberg) 决定让“子曰”的散布者接受某种惩罚。在地铁站台上兜售“子曰”小册子的迈克尔·迪普 (Michael Diep) 和弗兰克·凯恩 (Frank Kane) 被带至罗滕伯格的夜间法庭。罗滕伯格指出，“我认为应该树立先例，以便结束对一个伟大名人的侮辱”。迪普和凯恩最终为其不敬行为支付罚款五美元。^[3]

虽然代表着理性和文化包容，反对之声毕竟微弱。“子曰”逐渐淡出美国人的日常语言，主要应归因于口头禅的自然存在周期。当新鲜感和出乎意料感不复存在，“子曰”的娱乐价值便已耗尽。“子曰”的出现和结束并无确切的时间，但在 1941 年显然最为流行。“子曰”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1941 年正是美国人的中国形象因为珍珠港事件发生重大改变的前夕，身为中国文化象征的孔子仍然不时地遭受各种形式的讥讽和贬损。“子曰”仅是形式之一，它从美国人日常用语的角度折射出美国排华的总体背景。诚然，在某些场合如涉及个人和社会生活时，“子曰”亵渎孔子的痕迹并不十分明显。但“子曰”的杜撰者和津津乐道者对于孔子之于人类社会的贡献无疑是心知肚明的，因为幽默的喜剧效果就依赖于“正常期望”与笑料之间出乎预料的反差。^[4]按照“正常期望”，孔子应该庄重严肃、字斟句酌地道出社会与为人准则。但“子曰”却让孔子随兴而言，用洋泾浜英语分析着

[1] Weare Holbrook, "The Old Jokes at Home," *Washington Post*, Apr. 28, 1940: A4.

[2] "Confucius Said It," *Washington Post*, Mar. 10, 1940: B8.

[3] "Confucius Say: '\$5 Fine,'" *New York Times*, Feb. 10, 1940: 4.

[4] David L. Alden and Wayne D. Hoyer, "An Examination of Cognitive Factors Related to Humorousness in Television Advertising,"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2 (June 1993): 30.

自己毫不熟悉的美国现代社会。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子曰”，说明读者有此迫切需求，并且完全了解“子曰”的包袱所在。我们视“子曰”为美国排华歧视的载体因此毫不为过。“子曰”以小见大，暴露出美国幽默传统中非常明显的种族偏见。为了增加喜剧效果，美国幽默通常以少数族裔群体的人物或事件为题材，无礼或侮辱司空见惯。从美国幽默的尖酸刻薄中，人们可以“感受这个国家的真实历史”。^[1]

[1] Arthur Power Dudden, “American Humor,” *American Quarterly* 37 (Spring 1985): 8—9, 11.

第十一章

孔子：美国日常消费的内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人历经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生活在较为紧张的社会氛围中。然而，由于美国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冲击，加上已在“喧嚣的 20 年代”弥漫全国的消费文化，美国人并未因为时运的不济而放弃享受生活。电影、音乐、棋牌、旅游照常一派兴旺景象。针对此一时段大众消费的研究成果众多，但却无人注意消费文化中的中国元素。因为对消费娱乐的宣传造势，报纸成为美国人休闲链条上至关重要的一环。正是通过 1920—1950 年间美国主要报纸的娱乐版，我们得以发现已然融入美国闲暇文化的孔子。身在美国闲暇时光中的孔子或者是轻松诙谐气氛的制造者，或者是娱乐点评连珠妙语的出处，或者是休闲活动的主题，启发着参与者关于文化差异的深层思考。总之，原本毫不相干的孔子与现代美国的休闲娱乐融为一体，既说明美国社会文化的多元色彩，更证明孔子有着异于寻常的异域文化渗透力。

一、饮食文化中的孔子

民以食为天，美国人也不例外。美国的饮食文化虽无鲜明而独到的特征可言，但却呈现出浓郁的文化交融模式。消费者乐于尝试带有

异域文化信息的食物，推销者自然不会忘记突出食品及其用具与异域文化之间的联系。孔子融入美国的饮食文化便在情理之中，他赋予美国人的推杯换盏之举以跨文化交际之意。

首先，在历史短暂的美国，孔子让日常食物别具历史厚重感。1934年6月，加利福尼亚小城瓦伦西亚(Valencia)举办第二届橘子节。组办者极力营造悠久的历史氛围。他们甚至探究孔子对于自己院子里的橘子发表了何种评论。^[1]1949年，美国东北部的桃子喜获丰收，水果公司在纽约曼哈顿地区进行大甩卖，每磅仅六美分。为吸引城市家庭主妇前来购买，销售者宣称，孔子都曾提及“甘美多汁的桃子”，把桃树视作“长生不老的象征”。^[2]香肠是美国人钟爱的一种食物。有文章写道，美洲大陆的发现就是因为欧洲人需要东方的香料，以便让餐桌上的香肠更加美味可口。而在盛产馥郁香料的东方，对于香肠的历史记录可以追溯到孔子时期，可见香肠具有的浓厚文化沉淀。^[3]为将香肠以及从其演化而来的热狗弘扬光大，好事者特意编撰《香肠零售手册》。手册“大胆宣布”，美国人百食不厌的香肠有着5000多年不间断的发展历史，“据我们所知，在伟大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生活的时代，食用香肠就已经蔚然成风”。^[4]着力推销佐治亚州猪肉的《亚特兰大宪法报》，讲述了一则据称源自孔子著作的轶事：某猪馆的儿子在房屋失火之后，偶然品尝了烤猪的美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数次纵火，每次都会有一窝猪仔。其他人竞相效仿，“可以想见，保险公司陷入惶恐之中”。为制止烧房行为，有位“天才”最终发明烤架，烤猪正式面世。以花生饲养的佐治亚猪肉如经烧烤，必是上好的美味佳肴。^[5]色拉是美国人百吃不厌的食物。但据考证，制作色拉的材料中，仅有西红柿才是现代人新加进去的。其他原料早在此前就已被人们

[1] “Along El Camino Real with Ed Ainsworth,” *Los Angeles Times*, Jun. 7, 1934: 4.

[2] Jane Nickerson, “News of Food,” *New York Times*, Aug. 22, 1949: 15.

[3] Mary Meade, “Dry Sausages Find Way into Varied Dishes,” *Chicago Tribune*, Aug. 1, 1937: D5.

[4] Meyer Berger, “The Hot Dog: A Success Story,” *New York Times*, Jul. 9, 1939: 8.

[5] Ralph McGill, “One Word More,” *Atlanta Constitution*, Jan. 23, 1939: 4.

广泛用于调制类似于色拉的食品。古埃及的法老在色拉中加入大量洋葱、大蒜和其他味重之物。而在中国，孔子食用色拉中屡见不鲜的黄瓜，古代中国人还在色拉中参入芥末、水田芥叶和旱金莲花等，甚至有水煮鸡蛋。^[1]

曾经只能与猪蹄、猪腿等“下等菜”为伍的泡菜被发现有着悠久的历史，孔子的著作里就有提及。有人因此提议，泡菜应该与鸭、鹅、鹌鸡等同登“最为奢华的餐桌”。^[2] 杜松子酒在美国广为饮用。英国伦敦的一家酿酒公司为了在美国市场推销自己生产的干杜松子酒，特意在广告中大肆强调酿造方法的独具匠心和风味的别具一格。作为质量的根本保证，原材料不仅精挑细选，而且来自五湖四海：“孔子国度和四大洲。”广告中的几个中文字尤其醒目：“果子生草药由中国办来”，向顾客展示着原料的纯正。^[3] 随着大萧条的来临，由在美华工首创的炒杂碎因其经济适用，逐步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联邦家政局（Bureau of Home Economics）、农业部和总统紧急就业委员会专门制定炒杂碎配料比例和烹饪方法，向全国推广。家政局表示，颇具中国特色的炒杂碎制作程序，遵循了孔子“肉类比例不应超过蔬菜”的古训，但具体的肉类和蔬菜可以随季节而改变。炒杂碎因此是一道灵活而又不错的食品。如果以炒杂碎为主食，芝加哥的七口之家一周的伙食费仅为 10.36 美元。^[4]

美国人的日常饮食既依赖于居家烹饪，也时常在餐厅进行。餐厅饮食文化同样不乏孔子元素。芝加哥名曰“金海岸”的中餐馆特地设置“孔子”雅间，供人们在就餐时领略中国文化。^[5] 好莱坞的“海滨流浪汉”餐馆专营中国菜。来此就餐的食客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吟诵孔

[1] “Cleopatra Ate Onions,” *New York Times*, Aug. 8, 1926: E2.

[2] Morrison Wood, “For Men Only!,” *Chicago Tribune*, May 15, 1948: 14.

[3] “Bottle Number 1 and No. 1 000 001 Taste Exactly the Same,” *Washington Post*, Jun. 22, 1936: X2.

[4] “Family of Seven Can Feed Here for \$10.36 Week,” *Chicago Tribune*, Jul. 17, 1931: 20; “Summer Diet Finds Variety in Chop Suey,” *Washington Post*, Sept. 5, 1934: 15.

[5] “Gold Coast,” *Chicago Tribune*, Mar. 27, 1943: 19.

子语录，可见孔子元素在此餐馆的深刻影响。^[1]餐与饮从来都是相影随行。饮茶之风虽然源于中国，却也跟中餐一样在美国颇为流行。洛杉矶的海伦夫人茶楼（Madame Helene's Tea Room）专为具有哲学思维的人们创造了“孔子茶”。高雅的品味配以“神秘的沙拉和开胃点心”，此地的四点钟茶俨然“已成为成千上万洛杉矶人的生活习惯”。^[2]因二战致残的华裔海军老兵霍勒斯·冯（Horace Fong）在加州奥克兰经营着名为“孔子”的中餐馆。秉承孔子教诲的冯即使在邻居试图将他赶离所在社区的情形下，也绝不刁难前来就餐的左邻右舍。^[3]《亚特兰大先法报》特地配发照片一张，展示食品展销会和烹饪学校开学典礼上人山人海的盛况。报纸宣称，孔子曾说，“百闻不如一见”（实出《汉书·赵充国传》），这张照片可让读者见证人们热衷烹饪的程度。^[4]在一场家庭宴会上，中国厨师“受到孔子精神的启发”，为来宾准备着美味佳肴。至于启发的具体表现，报道语焉不详。^[5]名叫范隆（Van Loon）的人据称能够为每位客人准备最适合其口味的菜谱，并伴之以相应的音乐。即使学识渊博的孔子对于此举也会侧目相看。^[6]

单就报纸反映的情况来看，利用孔子元素最为充分的餐馆莫过于芝加哥的杨府饭店（House of Eng）。饭店自成立时的1944年起，不断地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广告。孔子之名成为该饭店的一大卖点。开张伊始，饭店便布置有孔子包间。包间墙壁贴上“孔子很多最具智慧的语录”，广告鼓励人们在这一“新奇”的房间内用餐。^[7]随着生意的扩大和经营理念的提升，杨府饭店对于孔子的利用不再停留于设置

[1] Ed Sullivan, "Looking at Hollywood," *Chicago Tribune*, Aug. 4, 1938: 9.

[2] "Peg o'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Times*, Mar. 24, 1929: C16; May 26, 1929: 30.

[3] "Mrs. Fong Is a Bit Upset by Neighbors," *Chicago Tribune*, Apr. 12, 1946: 1.

[4] "'Twas Confucius Who Said—," *Atlanta Constitution*, Jun. 18, 1933: 4C.

[5] "Beauty Contest Holding Sway at Dude Ranch," *Washington Post*, Aug. 14, 1936: X11.

[6] "What They're Reading," *Los Angeles Times*, Sept. 27, 1942: D9.

[7] "Facts about the Original House of Eng," *Chicago Tribune*, Jun. 5, 1944: 14; "The Original House of Eng," *Chicago Tribune*, Jun. 25, 1944: E9.

包间的层面，而是突出孔子哲学与餐饮的相互融合。1945年6月的一则广告中，孔子包间依然存在，但却被比喻为“吸取高雅哲学精华和提炼利口酒”之所在了。^[1]另一广告写道，孔子《论语》提及中国的很多美味佳肴，顾客在杨府饭店可以尽情品尝这些稀世菜品。加之贴满孔子语录的墙壁，饭店体现着“美食与高雅哲学的美好融合”。^[2]杨氏菜谱业已流传三代之久，“孔子的智慧与古老的中国菜造就了（杨府饭店）芳醇愉悦的氛围”。^[3]广告鼓励人们，如果“看见孔子招牌”，并且“喜爱哲学，浅饮轻酌，钟情美食”，就请“迈入中国珍馐美味的殿堂吧”！^[4]1948年的广告词强调，杨府饭店的所有香料、水果和菜品的原材料都从中国运来，以烹制“稀有而又能满足高尚情操的美食”。杨府饭店因此而成为“所有真正而优秀的孔子门徒和追随者神往之地”。^[5]

无论是餐馆还是家庭，厨具和就餐举止都是饮食文化必不可少的部分。相比食品与餐馆类文字，论及厨具和席间举止时，报纸提及孔子之处明显偏少，但仍然时有所见。例如，美国的家庭主妇总是抱怨厨具容易生锈和磨损。报纸提醒她们，应该知足常乐，因为在古代罗马和中国，人们即使只有制作粗糙的厨具，他们照样生活幸福。孔子的后代每天都用直径和深度均为三英尺的铸铁锅煮米饭，他们仍然颇感自豪。^[6]20世纪初，日益关注自身健康的美国人兴起膳食疗法之风，人们对于水果、蔬菜和全麦食品趋之若鹜，而对于糖则唯恐避之不及。针对汹涌而至的节食浪潮，谨慎者提醒道，此类方法纵然大有裨益，但却忽略了席间举止的作用。很多人在用餐时或者神情焦虑，或者

[1] “Gay Long Beef,” *Chicago Tribune*, Jun. 3, 1945: E5.

[2] “House of Eng,” *Chicago Tribune*, Jun. 17, 1945: E5.

[3] “The Eng Family,” *Chicago Tribune*, Jun. 24, 1945: G5.

[4] “At the Sign of Confucius,” *Chicago Tribune*, Sept. 17, 1947: 33.

[5] “A Taste of Old China,” *Chicago Tribune*, Jan. 11, 1948: E13; Feb. 11, 1948: A4; Jul. 20, 1948: B22.

[6] Katherine Kelley, “Good Old Days Not So Bad for Food Utensils,” *Chicago Tribune*, Oct. 10, 1930: 21.

亢奋交谈，或者处理生意，在最关键的时候浪费能量，导致消化不良成为美国人的常见病。人们因此应该尝试安静疗法，“如同孔子一样，在就餐时既不高谈阔论，也不殚精竭虑”。久而久之，安静疗法的效果就会显现。^[1]孔子与厨具和就餐举止相互联系尽管实例寥寥，却也让饮食文化中的孔子因素表现完整。食品、餐馆与烹饪构成完整的饮食链条，孔子既赋予特定的食品和饮食行为以正当性和文化深度，亦能增加食品和饮食行为的异域色彩，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

三、家居生活其他方面的孔子因素

衣食住行是日常生活中几个主要的消费领域。饮食消费方面，孔子因素的作用已经明了。家居消费的衣、住、行假借孔子之名的现象同样俯拾即是，承载着潮流引导者对于家居消费选择的期望，加深着相关商品的文化底蕴。

服装是人们生活品位的重要标志。能与中国圣人孔子牵上关系是提升服装档次的诸多手段之一，因此在服装广告中时有所见。比如，一款海军蓝“孔子”外套出现在1921年2月27日的《波士顿环球报》上。浅蓝色的条状刺绣图案几乎遍布整件外套，“给人以中国官家女子服装之感”。^[2]1941年8月，《洛杉矶时报》推出一款风格简约、融入秋季色彩的羊毛外套，相信这一定能成为秋季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外套有米色和金色两种。金色尤其值得期待，它不仅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是“孔子最喜欢的颜色之一，因为他认为，此色有助于开发智力”。^[3]名叫“霍华德·格里尔”(Howard Greer)的服装店在1942年推出的秋季服装展上，最受欢迎的女式外套也被称作“孔子”。“孔

[1] Bailey Millard, "The Serenity Cure," *Los Angeles Times*, Jan. 19, 1929: A4.

[2] "What's New in Coats?," *Boston Globe*, Feb. 27, 1921: 41.

[3] Sylva Weaver, "Trim Wool Dress Rallies Collegiates to Fall Colors," *Los Angeles Times*, Aug. 20, 1941: A7.

子”质地为羊毛，带有黑黄相间的条纹和如运动衫一样的帽子。^[1]波士顿的谢泼德（Shepard）商店经营女式丝袜，其中的“孔子”丝袜“色彩迷人，熠熠生辉”。^[2]帽子是服装的重要部分，往往东西方的风格差异很大。但在1941年春季，两者却实现了有机的融合。“孔子的密友说”，融合之后的风格“外观简单悦目”。^[3]

个人装饰物件的消费背后也有孔子施加的推力。眼镜既是出于保护视力之需，也发挥着装饰个人外表的功能。某眼镜广告宣称，“最聪明的哲学家”孔子告诫他的追随者，“等到被疾病击倒（而不采取预防措施）是愚蠢的”。因此，视力问题应该及早发现，配戴眼镜是有效的矫正办法。^[4]芝加哥的阿尔默·科（Almer Coe）眼镜公司为推销自己“质量最好，价格不高”的眼镜，特地引用一则所谓的孔子轶事。据称，孔子曾将鞋子送去修补。但鞋匠却未能在约定的时间内将鞋补好，因为他的眼睛被发怒的妻子撒入了辣椒面，看不见东西。孔子给他一副眼镜，鞋匠不仅修好鞋子，令他妻子一直耿耿于怀的斜视也从此根除。可见眼镜的意义巨大。^[5]翡翠吸引着众多美国人的目光。在中国，官员出入深巷、只为寻找与官服相配的翡翠纽扣是极其平常的场景。自从孔子时代以来，中国的达官显贵就以佩戴翡翠为等级的象征。翡翠工匠更是不断提升技艺，力求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美国的一家翡翠商店吹嘘曰，该店商品均为上等货色，部分来自那位中国官员曾经选购翡翠纽扣之处。^[6]旧金山中国城的李姓商人开有一家店铺，经营玉石、灯笼、香台等。店中供奉着孔子的陶瓷塑像，借孔子曾就翡翠大发评论之事招揽顾客。^[7]而在另外一则翡翠广告中，“孔子的

[1] “Howard Greer Brings Buttons out of Hiding,”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23, 1942: B24.

[2] “Puritan Brand Silk Hosiery,” *Boston Globe*, Feb. 21, 1924: 11A.

[3] “East Meets West in Spring Hats,” *Washington Post*, Mar. 15, 1941: 11.

[4] “Two-Minute Chats on ‘Conservation of Vision Week,’” *Los Angeles Times*, Jun. 8, 1921: 117.

[5] “Confucius and the Cobbler,” *Chicago Tribune*, Feb. 15, 1925: 5.

[6] “The Buttons of the Mandarin,” *Boston Globe*, Apr. 20, 1920: 8.

[7] “Talking of Jad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 14, 1945: 8.

智慧”映衬着翡翠项链的高雅与尊贵。^[1]

日常生活离不开住房。在报纸上，孔子与美国人的居所联系紧密。斜屋顶因其美观耐用而受到美国人的普遍青睐。房屋建造商将主要精力用于研制屋顶覆盖材料。多种材料引起了研究者的主意，其中之一就是瓦片。瓦片历史悠久，不易腐损，“在中国，据说孔子曾在其内传道授业的瓦顶庙宇仍然屹立”。^[2]有人因为相信孔子说过要珍惜他人赠送的礼物之类的话，而对获赠的一栋房屋经常修葺，倍加爱护。^[3]房屋的装修装饰是住宅消费的另一内容。波士顿装修设计师大罗德·F. 林德格林 (Harold F. Lindergreen) 提出室内墙壁的“平面处理”方法，即在多种材质上作蛋彩画，然后将画作贴于护墙板或者屏风上，让画与房间浑然一体。他的灵感源泉之一，便是孔子以前的中国人在丝绸上的作画艺术。^[4]

1935 年的纽约国际贸易展有一件“独一无二的展品”：绣有包括孔子和华盛顿在内的 52 位名人肖像的地毯，据称已有百年历史。^[5]如果地毯真正源于中国，销售商更是不会放过与孔子攀上关系的机会。1928 年 1 月，亚特兰大举行半年一度的地毯展销，展示的中国地毯从孔子图案到现代风格应有尽有。^[6]芝加哥的普什曼兄弟公司 (Pushman Bros.) 和亚特兰大的钱伯林-约翰逊-杜波斯公司 (Chamberlin-Johnson-DuBose Company) 以相同的广告词为自己销售的中国地毯促销。广告声称，本公司经营美国有史以来进口的最佳质量的中国地毯。地毯有着如丝般的柔软光泽、丰富的植物色彩以及代表中国最高艺术水准的图案。广告竭力让人们相信，不但孔子《论语》

[1]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Chicago Tribune*, Aug. 22, 1928: 3.

[2] “Varied Materials Used for Roofs,” *New York Times*, May 9, 1937: RE9.

[3] Pete Richardson, “Clocking the Bronx,”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Sept. 15, 1945: 18.

[4] “Artistry Applied to Utility Is Keynote of Modern Hom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6, 1940: 15.

[5] “Trade Fair Opened by a Bald Apollo,” *New York Times*, Feb. 5, 1935: 23.

[6] “Feature of Semi-Annual Rug Sale,” *Atlanta Constitution*, Jan. 25, 1928: 11.

描述过相同颜色、质地和图案的地毯，中国孔庙铺设的地毯也与公司销售的地毯一模一样。芝加哥公司在广告末尾宣称，其中国地毯在芝加哥和整个中西部质量最好。亚特兰大公司用“整个南部”替换了芝加哥和整个中西部。无论如何，“仅仅观赏一下都是爱美之人不可错过的机会”。^[1]

1930年圣诞节，芝加哥的中国商品市场专门组织了中国商品展销，时间长达三周。展出的商品包括玉器、家具、陶器、竹器、丝绸和刺绣等室内装饰材料。^[2]二战让中美结盟，中国商品更是深受美国人喜爱。芝加哥家具商场审时度势，特意推出取名“孔子”的红木家具系列，以满足市场需求。^[3]家具之外，金鱼也被美国人广泛用于装点家居环境。20世纪30年代的金鱼价格在5美分至150美元不等。旨在推广金鱼饲养的文章表示，金鱼饲养简单，生存能力强，自然寿命可达500年。文章甚至信誓旦旦曰，中国现存的一条金鱼“尾部还留有孔子的印记”。^[4]

广告撰写者巧妙利用孔子的知名度和善于说教的特点，为拓宽家居用品的销路而努力。某种颜色因为孔子的青睐而别具价值，某种图案因为含有孔子肖像而呈现厚重的文化感，某种风格和物品因为与孔子有关而更显重要。服装、个人装饰和住房消费都有孔子留下的痕迹。即使美国人的长眠之地——陵墓，也能与孔子扯上关系。芝加哥的罗斯希尔陵园（Rosehill Mausoleum）为推销墓地，引用孔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的语录，告诫人们欲购从速，以防某位亲人突然离去而无安息之所造成双重打击。^[5]

[1] "A Remarkable Showing of Mandarin Quality Chinese Rugs," *Chicago Tribune*, Sept. 15, 1924: 2; *Atlanta Constitution*, Feb. 4, 1925: 14.

[2] "Chinese Merchandise Mart," *Chicago Tribune*, Dec. 15, 1930: 20.

[3] Phyrne Squier, "War Fosters Interest in Chinese Art," *Washington Post*, Feb. 22, 1942: R6.

[4] Esther Lee, "Goldfish Live 500 Years!," *Los Angeles Times*, Apr. 26, 1936: 20.

[5] "Rosehill Mausoleum," *Chicago Tribune*, Mar. 30, 1926: 34.

三、生活品质消费中的孔子

个人消费，除了添置日常必需品之外，提高生活品质是另外一项重要内容。涉及孔子的生活品质消费主要分布于以下几个方面：兴趣与爱好、修身养性、投资理财等。报纸鼓励人们，以这些领域为切入点，让生活更加充实，更有意义。孔子一如既往地发挥着旁证和激励的作用。

兴趣爱好可以使人心情愉悦，情趣高雅。美国人乐于追求的兴趣爱好之一便是阅读。以孔子为吸引力的书籍虽然不多，也并非寥若晨星。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以孔子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英文对译为书名，引起《纽约时报》关注。该报特地刊发消息，告知读者《水浒传》英译本的具体出版日期。^[1]1935年5月，纽约的青年女子联盟（Junior League）举办“禁书”展，也以孔子作为宣传亮点之一。相关报道曰，展出的“禁书”涵盖自孔子时代以来的各个时期，以便突出“禁书”搜罗的全面。其中一本是曾被中国某位省长禁止出版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2]名叫《荔枝》（*Lichee Nuts*）的诗歌集形象地刻画出在美华人的日常生活。书评在推介时不忘提醒读者，虽然诗歌集的作者没有孔子的智慧，但其诗作仍然值得一读。^[3]华人作者谢德怡所著《孔子早就说过》（*Confucius Said It First*）引起诸多媒体的关注。如《波士顿信使报》（*Boston Herald*）的评价是：“所有读者都会喜欢这本书并从中受益”。《基督教信使报》（*Zion's Herald*）认为，此书“在理解孔子教诲方面极具启发意义”。远在英国的《伦敦时报》（*London Times*）赞扬道，人们的问题不论涉及私人生活，还是商业往来，抑或是政治和国

[1] “Book Notes,” *New York Times*, Sept. 19, 1933: 19.

[2] “‘Banned Book’ Exhibit Is Extended a Week,” *New York Times*, May 12, 1935: 19.《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是19世纪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创作的一部童话作品。

[3] “New Books of Poetry,” *New York Times*, Nov. 2, 1930: BR9.

际事务，这本著作均有对应良策。^[1] 饲养动物是众多美国人的另一爱好。猫狗颇为常见，而以绵羊为宠物者则不是很多。洛林·贝尔(Lorin Bell)就属于少数者之列。他饲养的绵羊“聪明而友善”，因此得名“孔子”。因为有孔子之名，贝尔更是对绵羊宠爱有加，带着它遍游美国。“孔子”长有四只角，是贝尔从亚利桑那州纳瓦霍(Navajo)印第安保留地购得。除了干草和谷物以外，“孔子”还喜食爆米花、矮松果和曲奇饼等。^[2]

作为兴趣爱好，理财投资是日常消费的另一途径。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告诉人们谨慎为妙。得克萨斯凯勒镇(Keller)州立银行的出纳主任深受启发，对银行进行加固，以防劫匪。顾客必须自报身份，才能入内。如果劫匪破门而入，则会遭到电线缠身甚至致命枪弹，晚上还会拉响警报。^[3] 前往凯勒银行存取款项因此是有安全保障的。某保险公司的广告认为，孔子所言不假，但人们不可过于谨慎，“敢于冒险的人通常能够成就大事”，保险公司将提供充分保护。^[4] 1940年7月，华尔街的股票市场创造着“自孔子时代以来的新纪录”，因为一支并不引人注意的股票超出所有人的预期，表现最为活跃。^[5] 出售赛马信息的人告诉众人，孔子曾说，“你知道越多，运气越好”。购买赛马赌博内情通报因此势在必行。^[6]

从事与欣赏艺术有助于提升生活品位乃人所共知。引证孔子证明某种艺术行为具有意义的例子非常常见。摄影是人们热衷参与的艺术形式之一。误作孔子语录的“百闻不如一见”（《汉书·赵充国传》）精练地概括出摄影的价值所在。据称，名叫W. J. 爱德华兹(W. J. Edwards)的英国人率先把这句话用于新闻业，奠定了现代报纸插图

[1] “Ideal Gifts, Lasting Keepsak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4, 1948: 15.

[2] “Four-Horned Navajo Sheep Dines on Popcorn and Paper,” *Los Angeles Times*, Dec. 20, 1939: 7.

[3] “A Bandit-Proof Bank,” *Washington Post*, Sept. 17, 1933: 6.

[4] “Caution!,” *Atlanta Constitution*, Apr. 23, 1929: 10.

[5] C. Norman Stabler, “The Market,” *Washington Post*, Jul. 23, 1940: 20.

[6] “On the Side with E. V. Durling,” *Los Angeles Times*, Dec. 19, 1937: A1.

模式的基础。^[1]《华盛顿邮报》自我评价道，由于实践着这条“孔子”箴言，邮报的摄影师们每天早晨都会以图片的形式将当日要闻呈现在读者面前。《华盛顿邮报》的图片有“千闻不如一见”之效。^[2]一家照相馆干脆在广告的醒目之处写上“百闻不如一见”的汉字，鼓动人们遵照“孔子”教诲，享受照相之乐。“选好姿势和表情”，你便拥有一张“精彩而又自然的照片”。^[3]甚至漫画都因为这句话而意义倍增。吉恩·埃尔德曼 (Gene Elderman) 是美国最优秀的漫画家之一，其作品是“《华盛顿邮报》社论版的一大亮点”。他的漫画，“相比整段整段的铅字，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真相或者戳穿谬论，证明了孔子语录的智慧”。^[4]

孔子还为人们衡量艺术品的质量发挥着参照作用。在1926年的亚特兰大艺术展上，各类作品围绕奖项展开激烈角逐。为此大伤脑筋的评委相信孔子说过，“用心思考的人比用脑思考的人更加聪明”。他们因此把参展作品分为两类：心里喜欢的和大脑喜欢的。外加艺术技巧方面的判断，所有艺术品高下立辩。^[5]受雇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乔治·亨肖·蔡尔兹 (George Henshaw Childs) 博士雕刻的人与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就连看着他工作的猫也“摆动着奇妙的胡须，赞许地眨着眼睛”。猫长着“与孔子一样睿智的脸”，更是衬托出蔡尔兹雕刻作品的高雅品质。^[6]

很多艺术作品以孔子为主题试图，激发欣赏者的兴趣。纽约市一家博物馆展出的“宗教领袖系列”绘画中，就有一幅“中国圣人孔子乘车图”。孔子乘坐马车，在崇山峻岭中穿梭，传道于民众。^[7]某古

[1] “New Uses Seen for Pictur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5, 1927: 6.

[2] Display Ad, *Washington Post*, Dec. 10, 1934: 11; May 3, 1935: 18.

[3] “Mandel Brothers,” *Chicago Tribune*, Dec. 1, 1936: 7.

[4] “Study Art? Not Mr. Elderman; He Just Kept at His Cartoons,” *Washington Post*, Jun. 13, 1934: FA13.

[5] E. Farnsworth Drew, “Atlanta Art Exhibition Attracts Many Art Lovers,” *Atlanta Constitution*, Apr. 5, 1926: 10.

[6] “Museum in Miniatur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18, 1937: WM12.

[7] “Art and Artists in Washington,” *Washington Post*, Sept. 7, 1930: M8.

玩商店拥有堪称世界最小的雕刻，是雕有孔子和耶稣等人肖像的米粒。^[1] 亚拉巴马州伯明翰（Birmingham）公共图书馆的16幅壁画以世界文化杰出人物为主题，“为美国壁画艺术作出了显著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孔子。^[2] 芝加哥公共图书馆配送室和楼道的玻璃马赛克墙壁窗户上，用汉字印着孔子语录：“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子张》）这既是艺术装饰，也能让读者在畅游书海时感受到孔子的存在。^[3] 南加州大学哲学厅图书馆旁，有一条花砖人物肖像长廊。二十二位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家位列其中，肖像旁边刻有相应的语录。孔子身旁以中英文书写的语录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4] 匹兹堡大学有一系列“纪念教室”。虽然称之为教室，这些房间同时也具有艺术性。每一间都以艺术的形式体现着特定国家的文化。“中国教室”的屋顶以龙为中心，划分成四大板块，代表学者生活中的琴棋书画。教授座椅后面是刻有孔子彩色肖像的花砖墙壁，左右各有两幅孔子语录。^[5] 芝加哥的超现实绘画展上，“孔子”是蓝黄相间的创作风格，尽管“人们难以在此风格中找到孔子的影子”。^[6] 远在英国伦敦的博物馆街也引起美国报纸的注意。街道虽短，却横跨四千年的人类历史。不同国家的代表人物和景致交相辉映，“手拿‘玉笛’的孔子”是中国部分的标志。^[7]

与此同时，生活品质的提高有赖于个人思想的调剂。知晓孔子对此大有裨益。《亚特兰大宪法报》特搜罗2000条孔子与本杰明·富兰

[1] “World’s Smallest Carvings,” *Washington Post*, Apr. 21, 1935: B10.

[2] E. C. Sherburne, “Ezra Winter’s Birmingham Mural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30, 1929: 14.

[3] “A Line o’ Type or Two,” *Chicago Tribune*, Oct. 19, 1943: 10.

[4] “Philosophers of All Time Perpetuated in Plaques,” *Los Angeles Times*, Dec. 7, 1930: H12.

[5] “Pittsburgh’s Memorial Classrooms Reflect Cultures of Many Nation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4, 1930: 12.

[6] Eleanor Jewett, “2 Art Exhibits: One Surrealist, Other Fantasy,” *Chicago Tribune*, May 23, 1942: 17.

[7] “So Short a Stree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11, 1930: 11.

克林等“不朽人物”的名言警句，编辑成册，“为你的健康、生意、幸福和其他极端重要之事”建言献策。只需两美分邮票，便可一册在手，百事可解。^[1] 20 世纪 20 年代的“摇摆女郎”（flapper）也会在转瞬即逝的各类兴趣中，阅读些许“孔子的智慧”，让自己更像知识女性。^[2] 有修养之人应该出言谨慎。孔子（实为其弟子子贡）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论语·子张》）^[3] 孔子对于个人思维的启发可以改变工作思路。文件管理极为繁琐，但某位熟读孔子的管理员发现，文件放置的方式正如人的穿着。根据孔子之见，胡乱搭配的穿着表明穿衣者“品味怪异或缺乏修养”。由此深感羞愧的管理员决心提升自己在文件处理方面的品味和修养，添置文件柜，分门别类地保管文件。每当他人询问经验时，管理员总会引述“孔子”的观点。^[4]

阅读、艺术、理财和提高思想修养虽不是生活品质消费的全部，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孔子的出现既是生活品位的见证，其言论也是对人们提高生活层次的鼓励。

四、家居休闲中的孔子

随着一战之后短暂的经济繁荣，美国人的家居娱乐日渐多元而活跃。这种现象在经济危机中稍受冲击，但所受影响并不明显。在冷战开始之前的 30 年间，美国人的家居休闲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中国化色彩。这 30 年刚好处在美国排华情绪趋于平息、中国尚未成为美国的意识形态敌人之际，故美国人在家居娱乐中积极引入中国元素。大凡有中国元素出现，孔子总是如影随形，增添着休闲活动的异域色彩

[1] “Free—The World’s Wisdom,”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 21, 1931: 6.

[2] W. E. Hill, “The Perennial Flapper,” *Chicago Tribune*, Nov. 15, 1925: C5.

[3] Editorial Not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22, 1926: 20.

[4] “Files on Parad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 4, 1932: 7.

和文化内涵。

可能会令很多人颇感意外的是，美国“喧嚣的 20 年代”最为流行的家居娱乐居然是中国的麻将。在报道麻将娱乐的盛况时，报纸通常借用孔子之名，突出这种方式的久远和承载着的异国情调。麻将如此流行，以至于被称作“新的黄祸，侵入了美国人宁静的起居室”。也许孔子本人曾在麻将桌上消磨过时光。正因为年代的久远，麻将才“具有更大的吸引力”。^[1]早在 1921 年的夏秋之际，麻将之风如同“一场暴风雨”，席卷整个美国。在华美国人痴迷于自孔子时代以来长盛不衰的麻将娱乐。他们回国时一般会随身携带若干副麻将。由此，美国的家庭、宾馆、俱乐部甚至轮船上都可以听闻喧闹的麻将之声。^[2]自孔子以来无数人沉迷其中的麻将“已经吞噬了众多美国家庭的睡眠时间……让桥牌溃不成军”。麻将附带着强烈的异域文化信息，“将人们从日常事务中带入陌生的东方”，故而流行之极。^[3]兴趣盎然的美国人甚至还对与孔子一样古老的麻将进行变革。为方便西方人辨认，上海租界的某位美国人特地在麻将图案和汉字旁加上阿拉伯数字。^[4]鉴于麻将的流行程度，麻将技巧成为美国人的迫切之需。技巧普及应运而生。疑为华人所开的平洲公司在广告中声称，如果不学会打麻将，“你就可能‘不走运’”。公司承诺，在其麻将销售处，“最具知名度的麻将权威”将向顾客传授“所有基本技巧”。^[5]《华盛顿邮报》自 1920 年 5 月 20 日起，连续刊登九篇文章，“以叙述的方式，开设饶有趣味的（麻将）教授课程”。^[6]有感于美国人难以理解麻将的复杂规则，刚从东方归来的约翰·D. 弗雷德里克斯（John D. Fredericks）

[1] “New-Old Games,” *New York Times*, Jun. 15, 1924: E4.

[2] “Mah Jongg,”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20, 1922: 7.

[3] E. Ellicott, esq., “Ancient Game of Confucius Now Confuses Us,” *Washington Post*, Jul. 29, 1923: 63.

[4] Emanie N. Sachs, “China’s Fascinating Super Game,” *New York Times*, Sept. 3, 1922: XX2.

[5] Display Ad, *Boston Globe*, May 6, 1923: 9.

[6] “Learn Secrets of Pung-Chow Most Fascinating of Games,” *Washington Post*, May 20, 1923: 33.

船长特别准备了一本简明麻将手册。^[1]

麻将娱乐在美国的普及也让人们对麻将的起源产生了兴趣。报纸特意刊登文章，予以介绍。多数文章认为，麻将兴起于孔子时代，甚至是由孔子本人发明的。例如，麻将出现于孔子时期的广州或者宁波。^[2]更有人将见证麻将兴起的所谓孔子时期具体到公元前551年。^[3]至于麻将的发明者和历史场景，报纸亦有所提及。孔子亲手发明或者亲自玩过麻将是两种较为流行的说法。^[4]另一类观点宣称，麻将的确出现在孔子时期，但却是某位宫廷美女为打发寂寞时光而首创。^[5]孔子时代的皇帝及其侍臣是麻将娱乐的最早参与者。后来，为了笼络人心，皇帝允许中产阶级和商人以麻将消遣。19世纪，麻将终于走进中国的寻常百姓家。^[6]然而，也有人怀疑麻将的出现与孔子有关。怀疑态度的证据之一是，如果的确关乎孔子，中国历史自有记载。但中国的文学和文献从未提及麻将。^[7]针对孔子在“哲学思考的间隙”曾玩过麻将之说，报纸表示，“他（孔子）和他的弟子在有生之年是否听说过这种娱乐，都极其值得怀疑”。^[8]孔子时代麻将已经流行的故事，“只存在于某些人联想丰富的大脑里，他们更精于麻将销售之道，而不是

[1] “Here’s Light at Last on Pressing Problem,” *Los Angeles Times*, Dec. 31, 1922: II8.

[2] Myra Nye, “Women’s Work, Women’s Clubs,” *Los Angeles Times*, Nov. 5, 1922: III35.

[3] Elizabeth M. Boykin, “War Makes Many Games Popular on Both Home and Service Fronts,” *Washington Post*, Jan. 2, 1944: S5.

[4] “Current Magazine,” *New York Times*, Feb. 24, 1924: BR20; “Society,” *Washington Post*, Dec. 3, 1922: 32; Will Rogers, “Slipping the Lariat Over,” *New York Times*, Nov. 18, 1923: XX2; Will Rogers, “The World Tomorrow,” *Washington Post*, Nov. 18, 1923: 68; Will Rogers, “The World Tomorrow,” *Boston Globe*, Nov. 18, 1923: A2.

[5] “Mah Jongg Taking Place of Bridge,” *New York Times*, Jan. 28, 1923: XX1.

[6] Anne Rittenhouse, “What Every Woman Wants to Know,” *Atlanta Constitution*, Mar. 18, 1923: E28.

[7] “Mah-Jongg, Chinese Game, Too Modern for Confucius,” *Boston Globe*, Dec. 24, 1922: E3.

[8] “Mah Jong a Modern Game Quest in China Indicates,” *Washington Post*, Mar. 23, 1924: ES19.

严格地遵循历史事实”。^[1]另有报纸直截了当地认为，早在孔子之前，麻将就已出现。^[2]反驳者针锋相对地指出，麻将使人玩物丧志。如果真的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注重道德修养的孔子绝对不会让麻将流传至今。^[3]

养狗之风与麻将和其他娱乐方式一道，消磨着美国人的闲暇时光。以孔子为狗命名的现象时有所见。虽然在中国人看来，此举有辱孔子身份，但在西方文化里，狗并非低贱动物。因此，以孔子为名的狗仅仅是美国家居娱乐的一部分，没有明显的贬义之嫌。在报纸上出现频率较高的当属两只北京犬：公犬孔子王子 (Prince Confucius)、母犬孔子公主 (Princess Confucius)。两犬分属不同主人，经常参加各种犬只比赛，获得冠军或亚军。^[4]迈克·罗曼诺夫 (Mike Romanoff) 饲养了一只取名孔子·罗曼诺夫 (Confucius Romanoff) 的斗牛犬。^[5]这条狗同样不同凡响。它曾在一部英国战争募捐电影中出演角色，为很多人所知晓。^[6]此外，它还是电话簿唯一收录的犬名。^[7]伊利诺伊州居民威廉·R. 克劳福德 (William R. Crawford) 饲养着一只名叫“孔

[1] “Chinese Ban on Mah Jong,” *New York Times*, May 13, 1923: 15.

[2] “Chinese Mah-Jongg Supplants Bridge,” *Washington Post*, Feb. 19, 1922: 27; Myrtle Gebhart, “The Whispering Shadows of Chinatown’s Alleys,” *Los Angeles Times*, Nov. 5, 1922: III33.

[3] “Mah Jong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Apr. 27, 1924: E6.

[4] Henry R. Ilsley, “Crème de la Crème Best in Dog Show,” *New York Times*, Apr. 8, 1928: S6; Henry R. Ilsley, “Lowther Dog Best in Pekingese Show,” *New York Times*, Apr. 17, 1928: 24; “Best Setter Award to Shawsheen Buddy,” *New York Times*, Sept. 6, 1928: 27; Henry R. Ilsley, “Talavera Margaret, Fox Terrier, Captures Best Award at Port Chester Dog Show,” *New York Times*, Sept. 22, 1929: S3; “Oronoke Diana Gets Best Pointer Award,” *New York Times*, Oct. 10, 1929: 36; “Some of the Leading Pekingese Owned by Mrs. F. Y. Mathis of Greenwich,” *New York Times*, Aug. 2, 1931: S8.

[5] Leonard Lyons, “Old Army-Navy Game,” *Washington Post*, Nov. 10, 1941: 16; Hedda Hopper, “Looking at Hollywood,” *Chicago Tribune*, Jun. 21, 1947: 15; Hedda Hopper, “Mike Romanoff Wed to Former ‘Girl Friday,’” *Los Angeles Times*, Jul. 6, 1948: 2.

[6] John Chapman, “Looking at Hollywood,” *Chicago Tribune*, May 26, 1941: 15.

[7] Hedda Hopper, “Looking at Hollywood,” *Chicago Tribune*, Feb. 19, 1943: 21.

子”的中国家犬，该犬也赢得过奖项。^[1]现实生活中以孔子为狗命名的现象蔓延到了虚拟的小说情景之中。《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短篇小说便有如下描述：“北京犬孔子正在花园椅子上酣睡”。^[2]

电影是20世纪初美国的新兴娱乐产业，到“喧嚣的20年代”，美国人开始趋之若鹜。诸多电影从孔子的言论中得到启发，观众通过欣赏电影再次让孔子走进自己的闲暇时光。比如，《影子》(*Shadows*)试图阐释中国人的性格，其中男主角便根据孔子形象加以塑造：“仁慈、善良、乐于助人”。^[3]《粗心大意的女人》(*Unguarded Women*)改编自小说《脸面》，创作灵感源于孔子要人们重视脸面的劝诫。^[4]另外一部电影剧本的撰写者相信，孔子说过，“给坏人一次机会，他就会变得正直”。因此，他创作了一个“谦卑慈善的中国老人”形象。^[5]“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则让迪斯尼电影公司的音乐创作者倍感电影配乐任务的艰巨。^[6]

孔子本人的轶闻与言论成为电影主题的现象不在少数。“孔子的十二枚硬币”传说就是悬念片《神秘的黄先生》(*The Mysterious Mr. Wong*)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据说，在去世之前，孔子曾将12枚硬币分给众人。谁能将所有金币据为己有，谁就能威力无比。于是，旧金山唐人街的黄先生让其斧头帮成员四处追寻金币下落。11人死在斧头之下，11枚金币被黄先生收入囊中。但最后一枚身在何处却成为无法解开的悬念。^[7]讲述超自然灵异事件的电影，则在片首特地提及孔子要人们敬重鬼神、远离鬼神的劝告。^[8]无声电影《中国之歌》

[1] Photo Standalone, *Chicago Tribune*, Dec. 30, 1934: F7.

[2] James J. Montague, "The Show Cat Sees Life," *Washington Post*, May 18, 1924: SM4.

[3] "Shadows," *Atlanta Constitution*, Feb. 21, 1923: 22.

[4] "The Screen," *New York Times*, Jun. 24, 1924: 18.

[5] "Of Saints, Sinners, Confucius, and Mr. Chaney's Legs," *Chicago Tribune*, Mar. 1, 1921: 22.

[6] Lee Shippey, "Lee Side o' L.A.," *Los Angeles Times*, Jan. 28, 1941: A4.

[7] "The Screen," *New York Times*, Mar. 7, 1935: 26; "Baron Lee at Roosevelt Theatre Next Week," *Pittsburgh Courier*, May 25, 1935: 23.

[8] "The Screen," *New York Times*, Apr. 22, 1933: 16.

(*Song of China*) 聚焦一个华人家庭三代人的冲突，字幕中出现了很多孔子语录。^[1] 1921 年在洛杉矶成立的中华电影公司 (Chung Wah Motion Picture Company) 拍摄的数部电影，展示“孔子教导的某些中国美德”，因此“具有教育价值”。^[2] 《结婚容易》(*Easy to Wed*) 的女主角家财万贯，容貌出众，自认不受孔子以来形成的文明行为准则的约束，却最终落入一名花花公子的爱情陷阱。^[3] 甚至杜撰的“子曰”语录也成了电影对白。陈查理 (Charlie Chan) 系列电影中的主人公就是满口“子曰”。^[4] 比如，“愚蠢的老鼠在猫的耳朵里安窝”。^[5] 凯瑟琳·赫本 (Katharine Hepburn) 主演的《龙种》(*Dragon Seed*) 描写十数名日本高级军官被美貌女谍下毒的故事，里面的“子曰”也是俯拾即是。^[6]

支撑美国电影娱乐的是迅猛发展的电影产业。然而，比照孔子的说法，美国电影业却存在很多不容乐观之处。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这是比喻逆境能够磨炼人的意志。但好莱坞制片商似乎无法利用二战带来的逆境，推出更好的电影。^[7] 好莱坞的名人录收录的世界知名影星极少，其选择标准不重艺术成就，而重家族渊源。孔子对此显然不会苟同，因为据称他说过：“出生好是幸运的，但荣耀属于祖先。”^[8] 真正拥有成就的演员有时却不被

[1] "The Screen," *New York Times*, Nov. 10, 1936: 31.

[2] Grace Kingsley, "A Celestial Enterprise," *Los Angeles Times*, Nov. 27, 1921: III34.

[3] Edward Barry, "'Easy to Wed' Is Amusing and Expertly Done," *Chicago Tribune*, Sept. 16, 1946: 24.

[4] "The Screen in Review," *New York Times*, Feb. 23, 1940: 21. 陈查理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 (Earl Derr Biggers) 系列小说中的一名华人探长，这些小说被改成电影、电视剧和卡通片。

[5] "Wax Museum Proves Weird Film Locale," *Los Angeles Times*, Jul. 26, 1940: A11.

[6] Edwin Schallert, "Story of China Hits Epic Class," *Los Angeles Times*, Aug. 18, 1944: 11.

[7] "Hedda Hopper," *Washington Post*, Feb. 18, 1940: L2; "Hedda Hopper's Hollywood," *Los Angeles Times*, Feb. 18, 1940: C3.

[8] "On the Side with E. V. Durling," *Los Angeles Times*, Nov. 28, 1938: A1.

人们所认识。影星葛丽泰·嘉宝 (Greta Garbo) 某次出席舞会, 打扮平常, 无人注意。当舞会主持悄悄告诉一位名人“嘉宝来了”, 名人不以为然, 反而指着一位模仿中国官员穿着的客人, 戏谑地说道, “是的, 孔子也来了”。^[1]

与电影的情形类似, 舞台戏剧不乏以孔子为主题或从其身上找到灵感者。1927年3月18日, 纽约滨江大道500号的国际公寓内, 中国学生正在上演着一部别开生面的两幕剧《孔子驾临美国》。^[2] 洛杉矶一家音乐俱乐部的中国晚会上演了一幕剧《孔子的孙女》。^[3] 受到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启发, 美国著名喜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为纽约戏剧协会创作了《百万马可》(Marco Millions)。在被戏剧协会搬上舞台的该景观剧中, “孔子的子孙”因为马可的无礼和狡诈而晕头转向。^[4] 美国人翘首以待的普契尼歌剧《图兰朵》则加入了“孔子颂歌”(Hymn of Confucius)。^[5] 孔子据称说过“时间并不存在”的话, 这成为舞台剧《距离之桥》(The Bridge of Distances) 的创作灵感。该剧描写一个永恒的爱情传奇。^[6] 《蜘蛛》是一部将观众纳入剧情的谋杀剧。剧中侦探会不时地蹦出几句孔子语录。^[7] 《上帝之子》(Son of the Gods) 包含着“中国哲学圣人孔子的大量古老智慧”。中国父亲每当难以和美国养子交流时, 他便会求助于孔子。^[8] 《华人小屋》(A Chinese Bungalow) 的男主角“字斟句酌地说着孔子语录”, “批判野蛮的欧洲

[1] “Garbo Disguises Herself as Garbo,” *Los Angeles Times*, Apr. 1, 1940: 16.

[2] “Chinese Night at International House,” *New York Times*, Mar. 19, 1927: 21.

[3] “Group to Stage Chinese Play,” *Los Angeles Times*, May 16, 1940: A6.

[4] Burns Mantle, “O’Neill’s Marco Polo Is King of Rotarians,” *Chicago Tribune*, Jan. 15, 1928: F1.

[5] F. L. Minnigerode, “Puccini, His New Opera and His Singing Birds,” *New York Times*, Jul. 29, 1923: BR21.

[6] “Arms and the Man,” *New York Times*, Oct. 4, 1925: X1.

[7] Richard L. Coe, “‘Reserve Two for Murder’ Sets Cross Roads Fans Guessing,” *Washington Post*, Jul. 2, 1941: 19.

[8] “Ancient Wisdom Comes to Light in ‘Son of Gods,’” *Los Angeles Times*, Feb. 12, 1930: A11.

文化”。^[1]为庆祝圣诞节，芝加哥一所男童学校的学生根据圣经、古兰经和孔子语录中的某些段落，编排了一出神秘剧，讲述不同信仰的学生最终汇集一处、迎接基督降临的心路历程。^[2]美国的戏剧舞台上甚至还出现过孔子和海明威语录同时现身对白之中的现象。^[3]“孔子国度”的传统婚俗也被改编成剧，让美国人在休闲中认识中国。^[4]

美国人还喜欢音乐，在音乐中接触孔子。孔子认为，通过聆听音乐，便可知道国家治理的好坏。一战之后，音乐已经深深植根于美国土壤，音乐活动在全国各地蔚然成风，足以说明美国的“文化品位和文化程度”。^[5]爵士乐是最为流行的音乐形式之一。但据考证，爵士乐与孔子时代的中国音乐曲调相似。不仅喜爱爵士乐的美国人可以由此一睹中国古乐的风采，孔子的“追随者”也会因为这一发现而“异常兴奋”。^[6]1920年，深受观众喜爱的音乐喜剧演员乔治亚·凯恩（Georgia Caine）在消失10年之后重返舞台。观众照样报以热烈掌声。对孔子兴趣浓厚的凯恩则会偶尔在唱词中插入“短小精悍的孔子名言”。这说明，“熟悉中国文学比大多数人认为的要更加及时有用”。^[7]首都华盛顿每年一度的丹尼斯·麦克斯威尼（Denis McSweeney）音乐会上，东方氛围总能得到体现。“孔墓进行曲”是音乐会的保留节目。^[8]孔子关于通过音乐可以洞察风俗民情的古训，让亚特兰大市民万分期待即将开幕的第十八届大歌剧节。歌剧节的举办标志着亚特

[1] “The Stage,” *Chicago Tribune*, Oct. 13, 1930: 25.

[2] “Lake Villa Boys’ School to Give Yule Play Today,” *Chicago Tribune*, Dec. 16, 1934: S1.

[3] “The Theatr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 29, 1946: 6.

[4] “Chinese Play Will Be Given,” *Los Angeles Times*, Sept. 5, 1929: A13.

[5] Olga Samaroff, “Keynote to Advancement of City Is Called Music,” *Washington Post*, Oct. 25, 1931: M12.

[6] “Finds There Was Jazz in Time of Confucius,” *Chicago Tribune*, Mar. 6, 1926: 13.

[7] “Her Cradle a Trunk on the Stage,” *Boston Globe*, May 16, 1920: 68.

[8] John J. Daly, “Footlights and Shadows,” *Washington Post*, Dec. 12, 1926: F2; “M’Cormack Sings Here Tomorrow,” *Washington Post*, Jan. 22, 1928: F1.

兰大民风淳朴，素养高雅。^[1]收听音乐广播是美国人陶冶性情的另一途径。广播音乐也时常掺杂着孔子元素。例如，马克斯韦尔(Maxwell)管弦乐队在电台推出的系列音乐节目以“孔子国度”为背景，中国的节庆气氛和中国乐器演奏穿插其间，烘托出浓郁的异域气氛。^[2]

电影、戏剧、音乐是美国人走出家门、享受闲暇的主要形式。为了增加吸引力，大众娱乐的制造者们不断尝试着从异域文化中挖掘主题。孔子现象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孔子的传世箴言还能事半功倍地表达娱乐创造者的意图。故有孔子语录或思想时而出现在大众娱乐中的情形。不论如何，孔子与电影、戏剧、音乐的融合，在客观上增进了美国人对于孔子的了解，强化着“孔子=中国奇异思想与习俗”的认知模式。其实，在前述三大娱乐形式之外，孔子还进入了其他大众消遣活动。魔术就是一例。有人曾经多次表演孔子施粥的魔术。大碗大碗的米饭从小盘子里不断冒出，施舍给众多穷人。^[3]参观博物馆既可消磨时光，又可增长见识。1928年开始付诸实施的芝加哥天文博物馆规划一经出台，便引发人们的无限遐想。馆里的天空影院能够让人们领略上下几千年的星空景象。例如，参观者将有幸目睹孔子或者伽利略所见到的茫茫夜空。^[4]也有人喜欢预测自己的未来。占星术便有了用武之地。某位“国际知名”的占星家刊登广告，鼓励人们前去咨询将来的健康、财富和幸福，“孔子曾经占星，你为什么不？”^[5]

[1] “Song Birds Arrive Today to Launch 18th Season,” *Atlanta Constitution*, Apr. 22, 1928: 3K.

[2] “Radio Activities,” *Los Angeles Times*, Jun. 12, 1928: 10.

[3] “Dr. Tarbell Gives Magic Show at Philharmonic,” *Los Angeles Times*, Mar. 6, 1946: A3.

[4] Waldemar Kaempffert, “Now America Will Have a Planetarium,” *New York Times*, Jun. 24, 1928: SM3.

[5] “The Palais Royal,” *Washington Post*, Feb. 24, 1935: B12.

五、自然与人文景致中的孔子

经济危机和战争阴霾未能阻止美国人欣赏美景、探寻历史的脚步。相反，自然与人文景致与其他娱乐方式一样，吸引着休闲者的注意力。报纸的适时引导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孔子之名通常能增加景致文化内涵，因而是报纸宣传攻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作为修身养性的闲暇活动，赏菊在中国经久不衰。20 世纪上半期的美国，赏菊之举也已开始蔚然成风。但凡鼓动人们赏菊的文字，多有引证孔子者，以显示此举实属高雅，值得跟从。在孔子笔下，菊花乃“金花”(flowers of gold, “鞠有黄华”(《礼记·月令》)中“黄华”的英文直译)，因此倍显高尚和富贵。^[1]菊花与唐菖蒲、大丽花一道，被称作“花园里的三大快乐火枪手”。菊花来自中国，“孔子在公元前 500 年就已有描述”。漂洋过海的菊花“将我们从春天带入秋季”。^[2]在所有的秋季花卉中，菊花“可能最为壮观”。其品种达数十个之多，花色则在一百以上。虽然新鲜品种不断涌现，菊花家族却历史悠久，“曾在 2 500 年前得到孔子的极大推崇”。^[3]随着户外休闲成为时尚，菊花受到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凡在秋天举行的朋友聚会、橄榄球比赛和其他节庆活动，均有菊花绽放。中国人最早在高山上发现菊花，尔后不断改良品种。孔子“对其美丽大加评论”。^[4]

赏菊因为孔子而独具文化韵味，美国各地竞相举办菊展，供民众一睹为快。例如，自 1902 年起，首都华盛顿每年都有菊展喜迎市民。1937 年的菊展更是由联邦农业部主办，观赏者蜂拥而至。孔子的盛

[1] “Queries and Answers,” *New York Times*, Nov. 20, 1938: 25.

[2] L. H. Robbins, “Three Gay Musketeers of the Garden,” *New York Times*, Apr. 26, 1931: SM6.

[3] Justin Scharff, “This Is Chrysanthemum Time,” *Los Angeles Times*, Oct. 7, 1945: F9.

[4] Katherine Barrett Pozer, “Festive ‘Mums’ Are Long-Blooming,” *Washington Post*, Jun. 26, 1949: R10.

名和“鞠有黄华”的评论赋予菊展以厚重的文化底蕴。^[1]从1913年开始举办的芝加哥菊展，号称“世界最大规模的花卉展览”。1940年，共计40万朵菊花和花蕾在该市公园区争奇斗艳。撰写报道者同样不忘提及孔子在《礼记》中给予菊花的溢美之词。^[2]在1941年的芝加哥菊展上，鲜花和花蕾数增加到了75万。孔子依然是报纸追溯菊花历史时念念不忘的名字。^[3]

菊花之外，更有其他景致在随时恭候着人们的光临。华盛顿植物园便是这样一个去处。植物园内广种名木，其中的中国栎树尤具意义。此树的种子来自中国的孔子墓，尔后几经周折，终于在植物园安家落户。^[4]因为与孔子的渊源，中国栎树在很多时候直接被称作“孔子栎树”。它与其他40株“壮观老树”一道，构成华盛顿植物园最具特色的景观。^[5]事实上，栽种于1886年的孔子栎树“总能引发人们的兴趣”，让人驻足良久、浮想联翩。^[6]如果愿意不辞辛劳，人们还可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亚利桑那州的科罗拉多河大峡谷便具有神奇魔力，“激发想象，让你的思绪飞扬”。众多游客看见了悬崖峭壁上的孔子庙或者金字塔，从而终生难忘如此奇景。^[7]对于希望在闲暇时缅怀人类辉煌过去的人，纽约休闲胜地科尼岛（Coney Island）不失为一个绝佳的去处。孔子是科尼岛巨大吸引力的构成要素。以展览著名财阀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儿时故居为契机，科尼岛计划大量修建人类文化名人的故居景观。这其中就包括“未见多少岁月侵蚀的佛塔，年少的孔子在此开始习文断字”。美国人将因此节约大笔开销，

-
- [1] Margaret Davis,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rysanthemum Reaches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Washington Post*, Nov. 14, 1937: T6.
 - [2] "Our Town," *Chicago Tribune*, Nov. 3, 1940: N2.
 - [3] "Mums to Show Their Beauties in Park Exhibits," *Chicago Tribune*, Oct. 26, 1941: N2.
 - [4] "Washington's Revered Trees," *Boston Globe*, May 28, 1922: 33.
 - [5] "What 46 Years of Progress Did for the Mall!," *Washington Post*, Oct. 4, 1936: M15.
 - [6] Victoria Faber Stevenson, "Our Arboreal Aids to Health," *Washington Post*, Sept. 23, 1928: M8.
 - [7] Walter W. Cunningham, "A Tourist's Look,"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12, 1941: 13.

免去车船劳顿，在科尼岛上参观名人的出生之地。^[1]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否付诸实施，我们不得而知，但科尼岛因为孔子等名人的效应而让游客纷至沓来应该不在话下。美国政府主办的全国民俗节（National Folk Festival）为民众奉上了一场视觉盛宴。人们直观地感受着全美各地的风土人情，徜徉在音乐与习俗的海洋之中。这一节日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未有中断，据说与孔子要求尊崇过去的教诲有关。^[2]

孔子如此深入广泛地介入美国的休闲文化，这在 1920 年以前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其一，美国家居休闲文化的多元化直到 20 世纪初才渐露雏形。此前，美国人也有社交聚会、看戏听音乐等娱乐活动，但在活动形式上却鲜有变化，多沿用历史上的固有模式，如喝茶跳舞、舞台吟唱等。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繁荣一时，人们的消费能力和空闲时间空前增多，各种新颖娱乐应运而生，新颖消费形式不断涌现。电影成为大众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音乐与歌剧从高雅走向民间，户外游玩成为时尚，衣食住行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切不仅仅是名目的增加，更需要新鲜主题加以充实。孔子及其代表的中国元素就是此类主题之一，从而极其自然地被纳入美国家居休闲文化的框架之内。

其二，孔子进入美国的消费文化也是美国人文化猎奇心理的体现。欧美风格的消费品是美国消费市场的主角。但由于司空见惯，此类商品与服务很难在突然之间激发人们的强烈兴趣。将异域文化的象征作为卖点便可因为附带着别具一格的文化信息，营造出与惯常情形迥然有异的消费氛围。消费者的文化好奇心理可以迸发而出，有助于刺激消费。因此，消费文化中的孔子还代表着美国文化中的他者，是主流文化的吸收对象。

其三，身处美国闲暇时光中的孔子没有遭遇丑化的既定命运，这是美国排华氛围有所缓解的风向标。自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排

[1] "The Times in Rhymes," *New York Times*, Aug. 5, 1928: 12.

[2] Helen Fetter Cook, "America—Past and Present—to Be Mirrored in Ninth National Folk Festival This Week," *Washington Post*, May 3, 1942: E5.

斥华人、诋毁华人文化之势愈演愈烈，到 1920 年左右达到顶峰。在此以后，由于华人群体的不懈斗争和努力以及美国更加同情中国的艰难处境，排华气氛开始缓和。家居休闲文化没有特意贬损孔子、反而大兴麻将之风，此事体现和见证着这一微妙变化。

其四，孔子对于社会与生活独具慧眼的洞察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很强的适用性。有鉴于此，美国大众娱乐的制造者常能从孔子的只言片语中获得灵感，评论者亦可引用孔子佐证自己的“真知灼见”。总之，美国闲暇时光中的孔子不只是单纯的娱乐现象，而是折射出美国社会的变革和华人处境的变化，是颇值得我们关注的研究主题。

第十二章

孔子与中国的坎坷命运

五四运动到 1950 年，中国的政治版图历经剧烈变化，各种势力相互较量。学术界在涉及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时，通常以国共争端和抗日战争为主要线索。但在当时出版的美国主要报纸上，我们却发现另外一条中国政治轨迹：各种力量赋予孔子的实用价值。鉴于孔子在中国国民心理中的核心位置，多种势力围绕孔子大做文章。拥护与推翻相伴而生，揭示着尊孔与反孔表象之下的利益动机。但凡孔子的处境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稍有变化，美国报纸总有报道。我们把这些文字放在一起，便可发现一个别开生面的中国政治变革版本：经历了五四之后短暂的反孔高潮，国民政府、各路军阀和日伪政府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又将中国拉回了尊孔崇孔的传统轨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民众的尊孔热情一如既往，是促进中国政治重新尊孔的一大力量。

一、短暂的反孔政治

五四运动让中国的政治空气焕然一新，各种反对传统、力求变革的运动接踵而至。“打倒孔家店”、让中国摆脱传统与专制的束缚成为名噪一时的精神运动，汇聚着各种求变图新的政治力量。孔子及其开

创的儒家思想被历代统治者用作钳制百姓的工具，受到口诛笔伐。反孔在拥有文化运动的特征之外，更成为新的政治力量大造声势的武器。在某种程度上，反孔与尊孔浓缩了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初的中国政治，构成美国报纸上孔子映衬之下的中国政治经历的一部分。

中国历代政府僵化遵循孔子思想，是近代中国迅速衰落的重要原因。时至 20 世纪初，中国思想领域的变革已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五四运动最终让蓄积已久的变革力量喷发而出。将孔子拉下神坛是这一历史性变化的集中体现，促成了现代与传统、反孔与尊孔之间的激烈交锋。

反孔一方极力渲染孔子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已经不合时宜。美国报纸观察曰，20 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动荡的革命之中”，旧秩序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孔子原则已经不能满足中国人的需求”，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和自由思想“已在开花结果”。^[1] 随着“溯及孔子的传统分崩离析”，中国人开始反对一切传统制度。^[2] 在美国报纸上的反孔进程中，最易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青年学生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从结束一战的巴黎和约所引发的五四运动中，报纸看到了学生身上正被唤醒的爱国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下，爱国主义的兴起必然以牺牲保守主义和“对孔子的忠奉”为代价。^[3] 同济大学的学生公开宣布，他们“已经罢黜孔子”，因为曾经束缚中国两千多年的孔子忠孝思想与时代不再合拍。^[4] 海外归来的中国学生更是不遗余力。他们唯尊科学，推翻一切曾被视为神圣的东西，并且“讥笑孔子”。^[5] 尚在海外时，他们“平生第一次”不再讨论自己“毫无兴趣”的孔子哲学，而是思考着中国百姓的日常问题。^[6] 学生反对孔子、反对旧文化的情緒

[1] “Revolution in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Feb. 13, 1927: B4.

[2] Upton Close, “What’s Happening in the Orient?,” *Los Angeles Times*, May 1, 1927: L21.

[3] “Yale-in-Chin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30, 1920: 14.

[4] “Japanese Flee as Sailors Fire on Hankow Mob,” *Chicago Tribune*, Apr. 4, 1927: 1.

[5] “Asiatic Revolt Laid to Whites,” *Los Angeles Times*, Sept. 4, 1927: 5.

[6] Jules Sauerwein, “Surveys Influence of Russia on China,” *New York Times*, Mar. 8, 1927: 4.

如此激昂，以至与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频繁展开论战。章士钊力图恢复儒学和中国其他典籍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青年学生却指责孔子禁锢中国人的思想、维系皇权、推崇祖先崇拜。甚至识记困难的繁体字也被视作孔子阻挠中国民智开发的一大证据。^[1]成千上万的教师满腔热情，简化“曾经繁琐的孔子语言”，每四个月让 500 万文盲学会读写。^[2]留美归来的年轻工程师舒伯特·M·齐 (Shubert M. Chee) 计划在北京、天津和沈阳建立三座巨型广播电台，教育广大民众。报纸称赞道，此举“必将超越孔子智慧业已取得的成就”。^[3]甚至一战中在欧洲战场从事苦役的中国劳工在归国之后，也加入了反孔教育的行列之中。他们参与发起声势浩大而又以反孔为宗旨的“群众教育运动”。运动兴起于“孔子的故乡和安息之地”山东，却萌芽于劳工“在那里（欧洲）获得的政治思想”。^[4]诸多美国人将变革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学生和学者阶层”，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孔子智慧本身不足以应对现代竞争机制”。^[5]

反孔举动并不局限于学校的高墙深院之内，而是渗入众多的社会层面。如火如荼的群众暴动见证着中国民众对于孔子“和为贵”思想的反思。^[6]愈演愈烈的匪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为反孔作出注解。震惊中外的 1923 年山东临城火车大劫案在美国报纸的大肆渲染下，俨然是中国人摒弃孔子的生动写照。依据报道，是年 5 月 6 日，包括六名美国人在内的数十名乘坐京沪特快列车的外国人，在临城附近被土匪劫掠。报纸在报道事件进展时，孔子是必然提及的名字。绑架发生之后的数周之内，“孔子家乡的山道上”，土匪与政府之间的联络信使往来

[1] “New, Simple Language as Basis of Education May Aid Chin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18, 1926: 9.

[2] “The Dragon That Slept Is Now Awake,” *Los Angeles Times*, May 5, 1929: 13.

[3] “A Radio Confucius,” *Los Angeles Times*, Jul. 22, 1927: A4.

[4] Thomas Millard, “Toilers of China Gain Class Feeling,” *New York Times*, Dec. 20, 1925: E4.

[5] “Foreign Trade Session Opens,” *Los Angeles Times*, Mar. 5, 1926: 3.

[6] John J. Daly, “Europe May Find Solace as Orient Sets Its Stage,” *Washington Post*, Aug. 1, 1931: 2.

穿梭，试图促成人质早日获释。^[1]土匪已经抛弃孔子的和平教诲，劫持事件甚至还有“孔子的子孙参与”，因为孔子就出生在绑架地点以北不足 70 英里之处。^[2]及至 20 年代末，在“孔子思忖世界（和平）”之地及其附近，匪患仍然严重。^[3]孔子毕生宣扬和平，其“子孙”却在家乡打家劫舍，可见中国背离孔子已有多远。在反孔方面，城市女性似乎也不甘落后。她们冲破礼制束缚，模仿美国电影中的女性潮流，穿着超短裙。面对说三道四者，女性会呵斥他们，“滚回孔子那里去”。^[4]

汹涌澎湃的反孔运动让个别报道难掩担忧之色。随着“孔子的传统主义和理想主义”遭到批判，中国的“秩序与繁荣、诚实与勤勉工作的古老支柱”坍塌了。反孔者缺乏“传统统治阶级的现实敏锐性和常识”，中国人也将因此丧失孔子思想的道德约束力。^[5]美国人同时担心，中国的反孔运动会让苏联的意识形态乘虚而入。有评论者不禁问道，动荡而又无助的中国，“是否会以孔子的高雅哲学与布尔什维克乌合之众的粗鄙无神论进行交易呢？”倘若果真如此，“我们更希望她（中国）继续处于亘古不变的沉睡状态”。^[6]

民间的反孔运动如火如荼，国民革命者从中悟出了反孔情绪蕴藏的巨大政治价值。他们在 20 年代的最后几年大刀阔斧地革除中国的孔子崇拜，以示与中国陈旧制度的决裂。反孔从而成为中国主流政治经历的一部分。根据国民政府的立场，“儒教……已经最终丧失成为中国国教的可能性”。虽然人们依然可以纪念孔子并遵循其教诲，“孔

[1] “Troops Begin Drive on Chinese Bandits,” *New York Times*, May 27, 1923: 3; “Chinese Storm Bandit Fort,” *Chicago Tribune*, May 27, 1923: 1; “Airplanes Lead Rescuing Army,” *Boston Globe*, May 27, 1923: 13. 山东临城火车大劫案发生于 1923 年 5 月 6 日凌晨，后经多方斡旋谈判，于当年 6 月 12 日终获解决。人质全部获释，绑架人质的“山东建国自治军”被政府收编。

[2] “Lincheng, Scene of Bandit Raid,” *Boston Globe*, May 20, 1923: 50; “Scene of Chinese Bandit Raid,” *Atlanta Constitution*, Jun. 3, 1923: D4.

[3] Charles Dailey, “Troops Loot China,” *Chicago Tribune*, Aug. 14, 1927: 9.

[4] “China Battles over Modern Women’s Dress,” *Chicago Tribune*, Aug. 13, 1933: D6.

[5] “China in Chaos,” *Los Angeles Times*, Jan. 3, 1921: II4.

[6] Eva G. Taylor, “By the Way,” *Los Angeles Times*, Apr. 3, 1927: 39.

子的古老影响已在现代民族主义的重压之下瓦解崩溃”。^[1]从今往后，儒教将只是一种哲学和道德体系，人们则视自己的意愿选择信仰。^[2]中原大战期间，为制造混乱，南京政府特地选定1930年的孔子诞辰日，向故宫发动空袭。时值大量北京民众在故宫参加纪念孔子诞辰的升旗仪式。虽然北京的确为对手所控制，但时间和场合的选择显示出国民政府对于孔子的漠然态度。^[3]在此背景之下，国民政府试图在学校教育中以西学替代孔子经典。^[4]经历无数次反复，孔子思想与中国学校教育的割裂终于在国民政府组建初期尘埃落定。^[5]除却思想领域的清除行动，国民政府还着手取消孔子家族享有的某些特权。1929年，国民政府开始没收孔子家族世袭的领地，引发孔子后裔的不满和抗议。^[6]孔庙及其藏书也在充公之列，但孔子家族却认为，这属于祖上传下来的私有财产，理应排除在外。^[7]因与共和政体不符，孔子直系后裔自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沿袭而来的“衍圣公”称号，亦在1934年成为历史。^[8]翌年，按照南京政府之令，“衍圣公”被“大成至先师奉祀官”取代，以安抚孔氏后人。^[9]

当时代表中国旧势力的各路军阀则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出虔诚尊孔的举动，与建立初期的国民政府对照鲜明。例如，国民政府指责

-
- [1] “China Nationalists Cold to Confucius,” *Washington Post*, Oct. 28, 1928: M2; “Confucius Loses Power,” *Los Angeles Times*, Oct. 28, 1928: 5.
- [2] “The New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Oct. 30, 1928: A4.
- [3] Hallett Abend, “Peking Is Bombed by Nanking Planes,” *New York Times*, Aug. 28, 1930: 8.
- [4] Russell B. Porter, “Rational Politics by Experts Urged,” *New York Times*, Aug. 5, 1928: 18.
- [5] P. W. Wilson, “Confucius Topples from His Pedestal,” *New York Times*, Oct. 7, 1928: SM8.
- [6] “Nanking Plans to Seize Estate of Descendant of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Nov. 11, 1929: 22; “Covet Confucius Riches,” *New York Times*, Dec. 1, 1929: 57; “\$200 000 000 Silver Idle in Shanghai,” *New York Times*, Feb. 9, 1930: E8; “From Chufou and Ogden to Jutland and the Meander,” *New York Times*, Feb. 23, 1930: 13.
- [7] “Notes from Peiping,”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6, 1929: 26.
- [8] “China Abolishes Oldest Title of Nobility,” *Los Angeles Times*, Dec. 31, 1934: 21.
- [9] “Head of Confucius Clan Gets New Sonorous Title,” *New York Times*, Apr. 14, 1935: E12.

盘踞北京的张作霖图谋重建满清王朝，因为张不仅在紫禁城遵循着历代皇帝的繁文缛节，而且必在秋季亲临孔庙，主持孔子的祭祀活动。^[1]1928年元旦，张作霖穿着明朝礼服，参加北京的孔子祭奠仪式。^[2]山西军阀阎锡山同样以天子自居，要求官员必有效忠之心。与此同时，阎锡山“遵照孔子的建议”，频繁更迭任命，以免下属一旦势力强大而生谋反之意。^[3]阎锡山利用“孔子可能认可的施政原则”，维护着自己的权力和实力。^[4]吴佩孚是将孔子时常挂在嘴边的另一军阀。^[5]冯玉祥似乎是唯一的例外。这位“基督教将军”开展了“数项有反中国传统的变革”，如抛弃以孔子诞辰为元年的纪年体例，采用西方的公元纪年。^[6]

中国社会的反孔之风在五四运动的引导之下变得愈发猛烈，成为试图改变中国的革命者不可忽略的政治力量。建立之初的国民政府为了显示与中国陈旧制度的决裂，利用民众普遍的反孔情绪，大力破除对于孔子的尊崇。与此相应，处于国民革命对立面的各路军阀则固守着孔子崇拜。反孔与尊孔从而上升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在美国报纸上留下的一条明显线索。

二、国民政府的再次尊孔

一旦政权稍显巩固，与旧制度的决裂不再是迫切需要，国民政府的反孔热情随之降温。美国报纸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国民党改革者在

[1] “Imperial Ambitions Credited to Chang,”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27: E6.

[2] “China—Land of Storm and Calm,” *Los Angeles Times*, Jan. 1, 1928: G6.

[3] Walter Duranty, “Shan-si Autocracy a Lesson to China,” *New York Times*, May 19, 1927: 4.

[4]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Chinese War Lord Leads Reform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12, 1935: 4.

[5] “Gen. Pao May Succeed Premier Liang in China,” *Washington Post*, Mar. 17, 1922: 1.

[6] “New Chinese Calendar,” *Los Angeles Times*, Apr. 3, 1928: A4.

1928 和 1929 两年大力推行的反孔运动“暂时平息下来”。不仅如此，国民政府还开始重新尊重孔子，如利用政府资金修缮孔庙等。^[1] 此类举动开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并一直作为国民党的主要施政策略而存在。因为疾风骤雨式的反孔运动无法消除孔子影响力，国民政府努力通过重塑孔子在中国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达到一统全国的目的。以此为线索，美国报纸为读者展现了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中国政治的重要侧面。

其实，早在反孔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国民政府就已为日后恢复尊孔埋下伏笔。政府虽然大肆渲染历史决裂的重要性，却没有禁止儒教，孔庙亦在保护之列。道教和佛教就没有如此幸运。^[2] 孔子地位的回归从 30 年代开始成为国民政府统领全国的精神武器之一。蒋介石躬行尊孔，为各级政府树立榜样。1930 年，蒋加入基督教，却无意抛弃儒教，仍然是“著名的儒教学者”。^[3] 在多次演讲中，蒋介石强调，在看待中国政治时，人们必须考虑中国的古老哲学和历史，尤其是作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基础的“孔子教诲”。^[4] 蒋介石如果经历政治危机，必然归隐家乡浙江溪口。美国报纸解释曰，此举同样是孔子影响使然。溪口山清水秀，归隐乡野的蒋介石实践着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的古训。^[5] 二战以后，蒋宣布，准备以孔子哲学为基础，重振中国经济。其言辞之强烈，连一贯支持他的美国人也颇感震惊，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在与时代同步的努力中最令人沮丧的失败”。^[6]

在蒋介石的影响之下，国民政府采取措施，重塑孔子地位。孔子

[1] “Anti-Confucian Move in China Quiets Dow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7, 1931: 3.

[2] “China Classifies Gods,” *New York Times*, Jan. 14, 1929: 6.

[3] Fred Hogue, “Christ and Confucius,” *Los Angeles Times*, Dec. 23, 1930: A4.

[4] Guenther Stein, “Peace for China Based upon Wisdom of Sag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28, 1942: 13.

[5] “All China in a Microcos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15, 1945: 10.

[6] “China’s Generalissimo,” *Pittsburgh Courier*, Apr. 26, 1947: 20.

的诞辰日一跃而为被隆重庆祝的国家节日。每年的8月28日，“中国全国的政府机关和纪念庙宇（即孔庙）”都会举行活动，纪念孔子诞辰。^[1]1932年，广州举行了自辛亥革命以来最隆重的孔子诞辰庆典。到场的政界精英和社会名流盛赞孔子思想，提议在所有学校恢复设置孔子道德伦理必修课，“重振孔子影响”。^[2]即使在日本全面侵略爆发之后，中国的全国性纪念活动也未停顿。蒋介石更是在1940年将孔子诞辰日定为全国教师节，“赋予其现代意义”。^[3]1942年的孔子诞辰日，“自由中国”举国庆祝，“在重庆和其他重要城市，国旗招展，各种献祭仪式纷纷举行”。^[4]1946年10月，尚不知自己即将败走台湾的国民政府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50年孔子诞辰2500年之际，前来中国举行会议。^[5]形势的急转直下未能给予国民政府实现这一愿望的机会，但以纪念孔子诞辰凝聚民心的目的却非常明显。对于孔庙，国民政府也慷慨拨款，予以修缮。曲阜孔庙曾因中原大战而损毁严重。南京政府乃于1931年拨款10万元，以作维修之用。收缴孔子后裔田产的做法也“似乎已经终止”。^[6]国民政府一改建立初期积极反孔的偏激，封孔子直系后代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获得官方头衔的还有孔子四位弟子的后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计划在曲阜专为孔子及其弟子的后代建立学校，并且资助他们完成大学学业。^[7]

-
- [1] “Hong Kong Need Not Fear Attack, Japanese Advise,” *Chicago Tribune*, Aug. 28, 1939: 4.
- [2] “Move in Canton for Return to Confucianis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22, 1932: 5.
- [3] “Confucius Birthday Marked by Chinese,” *Los Angeles Times*, Aug. 28, 1940: 20; “In the Far East: Church Union in Japa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27, 1940: 1.
- [4] “China Marks Confucius Day,” *New York Times*, Aug. 29, 1942: 2.
- [5] “Would Honor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Oct. 27, 1946: 41.
- [6] “To Repair Temple of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May 17, 1931: 60.
- [7] “Kuomintang Executive Committee Plans to Honor the Descendan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Dec. 23, 1934: E8; “Nanking Elevates Confucian Family to Publicize Sag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9, 1935: 5.

国民政府旨在重振孔子地位的举动也依赖于一些积极的文化普及手段。1934年开始的新生活运动就是一例。运动发端于蒋介石本人，意在振作国民精神，提高国民修养。其根本要义来源于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1]生活艺术化是新生活的标准之一。音乐因此“在现代中国具有了新的重要性和新的意义”。孔子为音乐走进“新生活”提供了依据。美国报纸评论道，孔子不但高度评价音乐在生活中的作用，其本人也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报纸转述孔子的说法，“音乐是社会成员和洽邻里的媒介”。^[2]为纪念新生活运动及其承载的孔子精神，国民政府特发行纪念邮票，试图以现代方式让儒家学说重新融入百姓生活。^[3]可见，新生活运动的确被用作重振孔子地位的重要手段。国民政府于1947年发行的纪念邮票图案包括孔子头像、孔子传道授业解惑的学校、孔墓和孔庙。^[4]

蒋介石倡导的尊孔举动轰轰烈烈，政府官员上行下效，是处可闻尊孔之声。身为孔子后代的孔祥熙盛赞道，孔子与老子学说奠定了中国复兴的基础，因为他们强调的家庭、勤劳和民主观念恰恰是国家发展的必备条件。^[5]汪精卫在成为日本傀儡之前，也曾为尊孔运动推波助澜。他认为，鉴于孔子是“见证中国文明诞生的丰碑”，中国人民“理应铭记孔子”。^[6]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募集资金，准备修葺孔墓，重建孔林。^[7]1934年，广东省政府下令，要求小学必须开设两年以上的中国典籍课程，涵盖“大量的孔孟教诲”，旨在改变此前传统教育被几乎忽略的状况。同时，该省政府划拨两万元资金，维修广州的孔庙，

[1] Randall Gould, "New Life for Chin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 10, 1935: WM1; Tony Beacon, "'New Life' Slogans Take Hold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Aug. 18, 1935: E5.

[2] "The Chinese Change Their Music," *Los Angeles Times*, Jul. 21, 1935: E11.

[3] Richard McP. Cabeen, "The Stamp Collector," *Chicago Tribune*, Mar. 1, 1936: C6.

[4] Kent B. Stiles, "News of the World of Stamps," *New York Times*, Aug. 24, 1947: X9; Kent B. Stiles, "The World of Stamps," *New York Times*, Sept. 14, 1947: X10.

[5] "China's Bid for Capital," *Wall Street Journal*, Aug. 13, 1943: 4.

[6] "Chinese Leader Avows Equality for All Faiths," *Washington Post*, Jan. 17, 1934: R10.

[7] "Repairs Confucius's Tomb," *New York Times*, Oct. 16, 1932: E8.

并为其添置古代乐器。^[1]

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带动下，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重塑孔子地位的运动。其核心目的在于统一全国思想，巩固自身统治。但由于连年战乱和尊孔初衷的缺陷，效果似乎远不明显。蒋介石本人的表里不一频遭曝光，为尊孔运动流于形式作了注解。孔子要求执法适度，蒋却奉行铁腕政策。所以，蒋并未遵循“那位古代哲学家的箴言”。^[2]1948年，国民党因发行金圆券而致剧烈通货膨胀。就在孔子诞辰日的前夕和当天，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连续颁布命令，征收5%~30%不等的所得税。此举意在利用孔子要求人们顺从的教诲。然而，“到目前为止，南京政府发现，所得税几乎无法征收，尽管孔子教导人们要心态平和、秩序优良、生活道德”。^[3]蒋介石缺乏行动支撑的尊孔言辞甚至引起儿子蒋经国的猛烈抨击。1936年2月，正在苏联的蒋经国在《真理报》发表公开信，揭露其父言行不一。根据美国报纸的转载内容，蒋经国指责道，满嘴礼义廉耻的蒋介石实则不孝。他“宣扬孔子的道德原则……不过是愚弄民众的新方式而已”。^[4]

三、孔子：抗战时期政治势力的交叉点

日本入侵是一战与冷战期间中国政治的又一变革因素。它让中国的政治格局更趋复杂，危机四伏。在共产党根据地之外，存在着三大政治势力：日本侵略势力、中国傀儡政府和国民政府。为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国民政府自然将孔子视作凝聚民心的源泉之一，日本侵略势力及其傀儡政府也大力效仿。如此而来，尊孔成为三大政治势

[1] “Temple to Be Restored,” *New York Times*, Sept. 23, 1934: E2.

[2] “Chiang Relents,” *Los Angeles Times*, Feb. 19, 1937: A4.

[3] Waldo Drake, “China Sets Export Ban, Surtax to Guard Yuan,” *Los Angeles Times*, Aug. 28, 1948: 5.

[4] Harold Denny, “Son Repudiates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Times*, Feb. 12, 1936: 12; “Russia: Chin-ko a Good Red,” *Washington Post*, Feb. 16, 1936: B4.

力的交叉点，建构着特殊时期的中国政治框架。

日本和中国都是深受孔子影响的国家。因此，一旦侵入中国，出于安抚民众和巩固侵略之需，日本势力便迫不及待地表现其“尊崇”孔子的“善意”。日本的大规模入侵自东北开始。日本士兵一踏上东北土地，便喊叫道，“孔子，我们来了！”^[1]由此可见，即使普通日本人也极为了解孔子对于中国的意义。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计划着力强调“赢得华北和蒙古所有保守势力的忠诚”，重塑孔子崇拜是极其关键的环节。^[2]为达此目的，日本任命东京帝国大学校长为关东驻屯总督。此人“对孔子颇有研究”，常为自己掌握的中国知识而自鸣得意。^[3]及至在中国北方站稳脚跟，日本的奴化教育全面铺开。教授“正统的”孔子哲学成为博取中国民众信任的主要精神武器。日本势力“强化某些方面的孔子教诲，将其作为日本主宰之下顺从的中国人应该遵循的模式”。尊重权力是其中的重点。^[4]学校教材重新编订，凡是涉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容一律删除，唯独保留孔孟典籍。^[5]有美国人甚至在北平看到，三名日本军官向一群中国教师训话，大谈“真正的孔子哲学”。此事被称作“最为拙劣的景象”之一。^[6]美国报纸清醒地意识到，复兴孔子信仰不过是日本强化占领的伎俩而已。^[7]

为迷惑国际舆论和中国民众，日军即使在军事行动中也不忘利用孔子，缓解来自四面八方的道义谴责。日本声称，日军进攻的根本目

[1] Editorial, *Washington Post*, Nov. 17, 1931: 6.

[2] “Kang Teh Begins 5th Year of Reign as Emperor of Manchoukuo State,” *Atlanta Constitution*, Mar. 11, 1936: 9.

[3] “Chinese Annihilate Japanese at Sinmin,” *New York Times*, Jan. 12, 1932: 6.

[4] “Confucius and Dr. Sun Yat-sen Quoted in New Japanese Hoax,”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4, 1940: 6.

[5]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Japan ‘Purges’ Chinese Textbook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5, 1938: 4.

[6] “U.S. Boycott Would Bring War with Japan, Brookings Aide Says on Return from China,” *Washington Post*, Dec. 19, 1937: 17.

[7] Randall Gould, “Christianity in Far East: Japan Moves to Crush I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31, 1942: 8.

的在于打击中国的政府和军事机器，并不针对中国的道德、传统和精神信仰。日本占领军反而会大修孔庙。^[1]似乎为了印证上述说法，日军在逼近山东曲阜时，特意公开“保证”，他们不会损坏孔墓或孔庙。^[2]日军指挥官甚至承诺，居住在曲阜及其附近的四五万名孔子后裔都将受到保护。^[3]还有报道称，日本有意将孔子的第77代嫡长孙孔德成扶上皇位。^[4]

甘愿充当日本傀儡的溥仪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孔子，试图让世界舆论承认自己在中国东北的统治地位。借称颂孔子，溥仪极力塑造自己的正统形象，贬低国民政府。1933年11月，溥仪在伪满洲国登基在即。他对媒体宣称，20年来的共和统治证明，君主制才最符合中国的需求。他欲将孔子的“王道”思想作为自己的施政原则。溥仪表示，将以孔子的道德、仁爱、勤劳、诚实及和平原则为指导，“做人民的父亲和教父”。^[5]溥仪为傀儡政权选定的年号“康德”，就是依据孔子思想而来。按照孔子的要求，统治者必须平和仁慈。“康德”便取此义。^[6]在“登基”前夕，溥仪特向美国合众社发表声明，指责共和制让中国内乱频发、民不聊生、贪污腐化。而成立仅仅两年的伪满政权，却因为依据“孔子的睿智自由原则”施行仁爱统治，“已经给这个国家（满洲）的三千万人民带来幸福、和平、安全、福祉和新的生活”。^[7]“登基”之时，溥仪更是言必称孔子，发誓要遵循孔子教诲，将人民的利益放

[1] Fred Hogue,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Los Angeles Times*, Jan. 9, 1932: A4.

[2] "Raid China's New Air Fleet," *Chicago Tribune*, Jan. 5, 1938: 1; "Chiang Maps Protracted Guerilla War on Japanese," *Washington Post*, Jan. 5, 1938: X1; "Japanese Threaten Shanghai Control of Foreign Zones," *Atlanta Constitution*, Jan. 5, 1938: 2.

[3] "Japanese Seize City and Tomb of Confucius," *Washington Post*, Jan. 5, 1938: X3.

[4] "Tokio Offers Peace Bid; Army Defies Powers," *Los Angeles Times*, Jan. 10, 1938: 1.

[5] "Pu-Yi Ready to Accept Crown Ruling by Confucian Precept," *Atlanta Constitution*, Nov. 19, 1933: 10.

[6] "Pu-Yi to Reign over His Empire as Kang Teh," *Chicago Tribune*, Feb. 27, 1934: 2; "Name from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Feb. 27, 1934: 5.

[7] "Pu-Yi Points to Progress in New Bid for Recognition," *Los Angeles Times*, Mar. 1, 1934: 8.

在第一位。与此同时，他朝拜的祭坛特设三个同心圆，喻指孔子天、地、人三位一体的思想。所谓的孔子“王道”再次成为溥仪言谈的重中之重。^[1]溥仪假借孔子而瞒天过海的做法得到了日本人的首肯。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对美国记者表示，“溥仪皇帝在其臣民中间传播孔子思想”令他感到高兴。^[2]秉承溥仪的旨意，伪满洲国教育部长声称，其治下的学校教育将“沿着孔子指明的方向”发展。^[3]

就在同时，孔子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提供着道义武器和民族凝聚的源泉。早在一战之后的巴黎和约将山东割让日本时，中国就已深感愤怒。“与孔子有关的历史遗迹”聚集山东却被置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这让中国的愤怒达到极点。^[4]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政府试图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想法虽然不切实际，但在事关孔子故地的问题上据理力争。华北是古老中华帝国的核心，是孔子的出生地，“即使最温和的中国政治家都不敢有须臾想法，把其中的任何部分割让外国”。^[5]日本飞机轰炸曲阜自然激起全国上下的愤怒。^[6]孔子的直系后裔孔德成称赞抗日为“圣战”，“鼓励全世界的儒学信奉者为日本的失败而祈祷”。^[7]孔德成深信，如果孔子仍然在世，他肯定会支持中国武装抗日的政策。^[8]本着相同的信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无法认同张学良放弃东北的理由。张日读孔子，并以孔子的和平精神为自己

[1] “Kang Teh for Aid to Forgotten Man,” *New York Times*, Mar. 1, 1934: 2.

[2] Bailey Millard, “Japan Disclaims Back-Door Policy,” *Los Angeles Times*, Nov. 14, 1934: A4.

[3] “Editorial Not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10, 1934: 14.

[4] “Is Japan Planning a World-Wide Empire?,” *Los Angeles Times*, Jan. 2, 1921: VIII4.

[5]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North China ‘Tinder Box’ of Conflicting National Aim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3, 1937: 3.

[6] “500 Dead and Hundreds Injured in ‘3 Cities,’” *Washington Post*, Sept. 25, 1937: 1; “Japanese Planes Again Stage Raid on China Capital,” *Atlanta Constitution*, Sept. 25, 1937: 1.

[7] “Chinese Boy Saint Calls War ‘Crusade,’” *Atlanta Constitution*, Jan. 13, 1938: 17; “Boy Saint Raps China Invasion,” *Los Angeles Times*, Jan. 13, 1938: 9.

[8] “Around the World in News,” *Washington Post*, Feb. 27, 1938: PY4.

的不抵抗辩解。该报评论道，张是在“机械照搬”孔子思想，没有考虑时代背景。^[1]一位华人在给《芝加哥论坛报》的来信中也指出，“满洲事变”的对错一目了然，但以孔子为托词而放弃抵抗绝无道理可言。孔子的确宣扬“普遍的互信”，但“没有任何敏锐的世界事务观察者会否认”，有备无患才是建立互信的根本保证。^[2]

最为重要的是，孔子从精神上支撑着中国的抗战决心。目睹日本的疯狂进攻，美国报纸不禁思忖，日本统治者是否考虑过中国人的精神。孔子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报纸诘问道，“你能征服深受孔子教诲影响的民族吗？”^[3]抗战数年，中国遭受打击，但中国人民却没有。“残暴的日本人并不聪明”，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个有着“伟大灵魂的民族”是无法被征服的。孔子就是中国伟大灵魂的核心。所以，在卢沟桥事变五周年来临之际，“孔子说，‘呬，裕仁’”，以表心中的不屑。^[4]另一方面，美国报纸认为，中国因为发展滞缓而保存着孔子时代的交通状况，成为日本扩大侵略的自然障碍。这是孔子支撑中国抗战的另类体现。按照美国成见，遵循孔子禁锢了中国人的思维，中国因此停滞不前。尽管如此，中国“可能正在感谢”孔子。缺乏进步气息的中国“没有修建任何进入其富饶内陆的陆上交通线”。出南京往西，便没有日本可以用来运输大批部队和给养的良好道路。^[5]传统的交通手段不仅能够延缓日本的侵略进程，还能被国民政府作抗战之用。据《纽约时报》，中国交通部将孔子时代以来一直沿用的运输网络加以修复完善，应对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导致的战略物质紧张局面。成百上千个站点之间，马、驴、骆驼、

[1] Demaree Bess, "Chang Lost Favor and Office as War-Lord Who Didn't Figh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7, 1932: 2.

[2] "A Chinese View," *Chicago Tribune*, Dec. 23, 1931: 10.

[3] Ralph T. Jones, "Silhouettes," *Atlanta Constitution*, Mar. 14, 1938: 4.

[4] Ed Ainsworth, "As You Might Say—," *Los Angeles Times*, Jul. 7, 1942: A4. 裕仁是二战时期的日本天皇。

[5] Birger Johnsen, "War Birds of the Far East," *Atlanta Constitution*, Mar. 6, 1932: SM11.

人、手推车往来穿梭，经久不息。^[1]

中国抗战的胜利当然不是全部依靠孔子的感召力和严重滞后的交通网络。这不过是美国报纸解读中国抗战经历的一个独特视角。中日双方同为深受儒学影响的国家，因此都知晓孔子影响力蕴含的利用价值。于是，在日本及其傀儡占领之处，孔子得到大肆宣扬，以图中国民众潜移默化地认可日本侵略。而在国民政府统治区，30年代的尊孔之策显然仍在实施，中国军民的不屈不挠从而被归因于以孔子为核心内容的精神支撑。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孔子让敌对双方的所作所为从属于同一条叙述线索。

20世纪20年代至抗战结束，中国政局跌宕起伏，变化多端。各种变革层出不穷。当时的美国报纸选择孔子作为变革力量的交叉点，呈现出别具一格的中国政治变革图景。五四运动因为列强向日本转让孔子故地而起，却以“打倒孔家店”为后续口号之一。国民革命利用激烈的反孔情绪，划清与中国陈旧制度的界线，为成功建立政权打下民意基础。然而，一旦反孔风头一过，国民政府立即意识到孔子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开始重塑孔子权威。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势力为赢取中国民众信任，协同中国傀儡，加入到强化孔子的行列当中。国民政府则以孔子为凝聚力之源加以反击。在美国报纸上，围绕孔子的争执与事端构成了一战与二战结束之间中国政局的主要脉络之一。但是，此一时段另一关键力量——中国共产党，却没有在以孔子为线索的叙述中出现。这无疑与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虽然如此，美国报纸构建的中国政治变革仍然为我们了解美国的中国形象和孔子形象提供了较为新颖的素材和视角。

[1] F. Tillman Durdin, "U.S. Export Curbs Hailed by Chinese," *New York Times*, Jul. 28, 1940: 17.

四、一如既往的民众尊孔之举

各派政治力量之所以对孔子尊崇有加，根本原因在于，孔子已经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尊重和利用孔子能够引起中国社会的精神共鸣。美国报纸不仅在解读中国的尊孔政治时遵循这一线索，而且不吝笔墨，着力渲染中国社会唯孔子是尊的现象，营造出中国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固守传统的保守氛围，与尊孔政治形成相互呼应之势。

颇让美国报纸感觉惊诧的是，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在尊孔方面居然没有丁点松懈。孔子的论著就是中国的圣经。^[1] 尽管秦始皇有着焚书坑儒的举动，孔子著作还是得以幸存。这依靠的便是民众“令人惊奇的记忆力”。即便此次“文学悲剧”重现于 20 世纪，依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能够根据记忆”，写出孔子经典的原文及其评论。^[2] 中国人一如既往地信奉着孔子制定的五大基本美德：仁爱、正义、秩序、知识和诚信。^[3] 正是因为思想“被统一于孔子传统的力量之下”，中国尽管内忧外患不断，却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完整单一的民族”。^[4]

虽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孔子在中国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并无根本性削弱，这成为民众继续以孔子学说为行为规范的保证之一。据称，中国儿童从能够记事开始，就必须知晓孔孟经典。^[5] 及至上学第一天拿起毛笔之时，学童还须在心中祈祷：“伟大的孔子，让我很快学会挥毫泼墨吧，因为我喜欢这支笔。”^[6] 自孔子流传下来的二十四孝是学龄儿童的启蒙读物，其作用相当于“美国儿童熟知的童谣”。孝是孔

[1] Untitled Article, *Atlanta Constitution*, Nov. 1, 1922: 11.

[2] “Chinese Memory,” *Los Angeles Times*, Aug. 24, 1927: 13.

[3] A. L. Warnshuts, “China Eager for Knowledge of Us,” *New York Times*, Feb. 28, 1926: X15.

[4] Sir John T. Pratt, “What Ancient China Can Teach Us,” *New York Times*, Jan. 27, 1946: SM5.

[5] “Study of a Chinese Bo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17, 1930: 11.

[6] “A Chinese Boy,” *New York Times*, Nov. 26, 1939: 2.

子社会哲学的重要基石，因此受到民众和政府的特别重视。^[1] 报纸甚至刊登了中国启蒙教材为二十四孝配的插图，儿童有望在通俗易懂的背景下尽快理解孝的要义，成为孔子传统的延续者。^[2] 在美国人看来，从小耳濡目染孔子教诲而又身体力行的任何中国人都颇具孔子的风范。乘坐越洋轮船到达中国港口的美国人往往会碰到“一位年长的圣贤”。他“就像孔子本人，讲述着他的民族辉煌而又传奇的故事”。^[3] 即使在英国殖民地香港，舢板上的老人也会让美国游客有孔子再世之感。^[4] 真正饱读孔子经书的中国学者，则散发出更加厚重的历史气息，似乎“生活在 400 年一个周期的轮回之中”。^[5]

在美国的报纸上，中国社会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尊孔意识并不停留于言辞和教育层面，而是融汇于日常行为之中。每个中国城镇都建有孔庙供人们日常祭祀和拜谒，这就是最为有力的证据之一。^[6] 孔子故地的人们倍加爱护与孔子有关的一切遗迹。故里附近的泰山因此受益。泰山曾经林木繁茂，苍翠欲滴，但后来却森林被伐，成为荒凉的石山。20 世纪 30 年代，出于尊孔之需，孔子故地“虔诚并且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开始在泰山上植树造林。^[7] 生活细节方面，孔子教会了中国人忍耐和克制。即使在拥挤的街道上无法动弹，中国人也绝对不会显露出愤怒之情。开始经受现代交通拥堵之苦的美国人可以从中获得启发。^[8] 中国人对玉情有独钟，根源也在于孔子。孔子将玉

[1] Pauline Benton, "The '24 Stories of Filial Piety' Are Chinese Nursery Tal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31, 1943: 13.

[2] Guenther Stein, "New China Seen in Children's Schoolbook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31, 1943: 13.

[3] "Around Pacific Cruise," *Chicago Tribune*, Jun. 16, 1929: G14.

[4] Henry McLemore, "The Lighter Side," *Los Angeles Times*, Sept. 24, 1948: 21.

[5] "Our Cycles and the Chinese," *Chicago Tribune*, Oct. 10, 1937: 16.

[6]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Jan. 26, 1927: A4.

[7] "Pious Citizens Reforesting Shantung's Sacred Mountain," *New York Times*, May 7, 1933: E2.

[8] "Modern Traffic Might Learn Lesson from Chinese Crowds," *Boston Globe*, Mar. 18, 1923: SM6.

与君子相比，从而奠定了玉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诶然，乐也。”（《礼记·聘义》）^[1] 中国人还喜爱音乐，各种生活仪式均有音乐相伴。孔子是中国人热爱音乐的典范。据称，他能吟唱《诗经》所有 305 首歌曲。^[2] 孔子明确规定了各种乐器的用途和演奏方法，让音乐成为中国生活的组成部分：儿童在歌谣中学习语言和拨弄算盘，乞丐唱着歌曲祈求施舍，工人在歌声中挥汗如雨。^[3] 千百年来，身居边陲的云南蒙自上层妇女一直使用蒙有面纱的雨伞。《波士顿环球报》解释曰，面纱雨伞设计于孔子时代，因此意义非同寻常。物换星移，面纱雨伞“将永远存在”。^[4] 在美国报纸的刻画之下，北京城的送水工都在顽强地固守着孔子时代遗留下来的送水方式。^[5] 卖艺者居无定所，地位低下，据信与孔子轻视艺术的思想密不可分。^[6] 商人则是因为孔子的社会阶层划分而地位低贱的另一群体。^[7]

五、尊孔导致的中国社会弊端

根深蒂固的孔子信仰不但延续了中国传统，也延续了与尊孔相关的中国社会弊病。这在动乱不堪的年代表现尤为明显。

在影响社会进步的思想层面，孔子造就了中国人“因循守旧、裹

[1] Pearl Strachan, "Their Linchpins of Jad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16, 1944: WM5.

[2] Younghill Kang, "In Chinese Drama, Music's the Thing, Not the Play," *New York Times*, Aug. 30, 1931: BR6.

[3] Albert Goldberg, "The Sounding Board," *Los Angeles Times*, Aug. 15, 1948: D6.

[4] "Veiled Umbrella in China Dates Back to Confucius," *Boston Globe*, Dec. 12, 1924: 15A.

[5] "Peking Day by Da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15, 1927: 18; Marc T. Greene, "Wandering in Old Peking,"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19, 1936: WM10.

[6] "The Theater in Chin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22, 1920: 14.

[7] "Chang—An Artist in Bargaining,"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28, 1930: 16.

足不前”的习性，制约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孔子影响之下的中国缺乏精神追求，“一个停滞不前的文明出现了，并且仍然存在于今日中国人的性格之中”。^[1] 中国人因为孔子而迷信名言警句，养成“完全肤浅而又无用的自大自负习惯”。任何一个宣传植树造林的人“都比孔子聪明许多”。^[2] 正因为深受自大习惯的影响，一名“长期钻研孔子著作”的中国人在游历欧洲时，“居然”来到阿姆斯特丹的某家书店，询问是否出售他认为世人皆知的中国古代诗作。在得到否定答复之后，中国人甚为惊诧地叫喊道：“什么！你们居然从未听说过这位不朽的诗人？”^[3] 一篇书评写道，“中国的根本弱点——消极苟安和让人无法忍受的道德克制，只是孔子和平与美德原则的放大而已”。^[4] 孔子强调“垂直的（社会）关系”，基督的视野中还有“横向关系”之说。因此，西方人的社会地位总是动态的和相对的，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却总是静止的。^[5] 有着孔子思想的约束，即便是中央政府群龙无首，中国民众依然处变不惊地忙着自己的事情，因为那与自己的关系过于遥远。^[6] 据说，孔子鄙夷地称呼长江流域的居民为“人虫”（human insects）。“人虫”居然接受这一称谓，在两千多年里不敢对皇位有丝毫据为己有的幻想：“他们倾听着，顺从着；他们仍在倾听和顺从。”^[7]

中国人“不愿”变革社会，一个不言自明的例子就是几千年来妇女的从属地位。孔子被视为问题的根源。人类进入 20 世纪以后，性别平等已成美欧社会的主流思想。中国妇女地位的低下折射出孔子思想在具体社会问题上的“不合时宜”。美国女性可以拒绝跟从夫姓，但“孔子的家庭格言”却让妇女“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1] Walter Littlefield, "Anti-Christians Stir China," *New York Times*, Jun, 11, 1922: 9.

[2] John Steven McGroarty, "Seen from the Green Verdugo Hills," *Los Angeles Times*, Feb. 5, 1928: K3.

[3] "On Little Great Me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2, 1920: 15.

[4] Gardner L. Harding, "A French Enthusiast's Japan," *New York Times*, Aug. 14, 1921: 43.

[5] William Jennings Bryan, "Weekly Bible Talks," *Atlanta Constitution*, Nov. 23, 1924: E3.

[6] Charles Dailey, "Chinese Remain Calm as Nation Heads for Rocks," *Chicago Tribune*, Sept. 30, 1923: 17.

[7] Fred Hogue, "Human Insects," *Los Angeles Times*, Aug. 4, 1929: A4.

对照何其鲜明！^[1]为突出孔子贬低女性，《纽约时报》特地杜撰一句孔子语录：“聪明的女人是一只不吉祥的鸟”。旁边配以孔子肖像的拓片。^[2]中国女性总是“坐在后排，中国的摩西——圣人孔子，无情地把她们扔在那里”。西方人为“中国妇女的从属地位感到震惊”。^[3]甚至中国城的华人妇女也可以对美国妇女斗争而来的“所有新‘自由’”视而不见，固守着孔子哲学赋予她们的传统地位。^[4]因为孔子，中国女性端庄贤惠，但却没有权利可言。^[5]

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深有同感：“（中国）女性成为二等公民，孔子应该承担责任似乎是合乎常理的。”^[6]曾经到过中国的女性传教士感触同样深刻。她们发现，被剥夺平等权利的中国妇女形成了蔑视女婴权利的陋习，在大路上公开出售女婴的现象极其普遍。传教士解释道，中国妇女受孔子影响极深，而孔子“长于哲学和学问之道，短于人文关怀”。这种“古老的愚昧特性”与“现代民主的伦理道德”大相径庭。^[7]孔子编选的《诗经》有如下段落：“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意思是，女人是乱象之源，而且不可教化。汉纳·斯坦（Hannah Stein）撰文，批评《诗经》中的上述文字对待女性评价不公。其实，男性同样不可教化，“最令女人失望的是，她必然会发现，她希望通过婚姻加以调教的那个男人对她的努力无动

-
- [1] John Hubert Creusel, "Time and Tide," *Atlanta Constitution*, Apr. 12, 1927: 8. 三从之说并非孔子原话，而是朱熹根据孔子言论引申而来。
- [2] Caroline Singer, "China's 'New Women' Few and Unhappy," *New York Times*, Oct. 25, 1925: SM6.
- [3] Caroline Singer, "In the Crisis, Chinese Women Carry on Valiantly," *New York Times*, Feb. 28, 1932: SM12.
- [4] Helen Bullitt Lowry, "More Old World in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Apr. 17, 1921: 45.
- [5] "Miss Evelyn Derry Guest Speaker for Girl Reserve Meet," *Atlanta Daily World*, Feb. 6, 1941: 3.
- [6] "Mrs. Buck Pillories the 'Superior' Male," *Washington Post*, Apr. 24, 1949: B6.
- [7] "Selling Girl Babies Still Practiced in China," *Boston Globe*, Apr. 26, 1923: 23.

于衷”。^[1]

孔子的影响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挑战女性从属地位者实属凤毛麟角。晚唐女诗人鱼玄机是少有的反叛者之一，被《华盛顿邮报》称作“现代女性的原型”。一千多年前，鱼玄机为男女平等而斗争，“驳斥”孔子要求女性顺从的说教。她甚至与丈夫对簿公堂，要求离婚。^[2] 20世纪前半期，在美欧女权运动的启发之下，中国女性中尝试摆脱孔子性别思想羁绊的人明显增多。她们表现出的不满情绪愈发明显。某位曾性小姐据称为儒学大师之后。她在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宣布，孔子让中国妇女甚至在家中都没有地位，基督却“赐予女性充满活力的精神和通向上帝之路”。^[3] 国际商务与职业女性俱乐部联合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omen's Clubs) 的中国代表也宣称，中国女性的过去不堪回首，但孔子造就的局面可以用孔子建议的方式加以改变。“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指明了女性对待男性压迫者的态度，而“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显示，教育对于女性改变处境至关重要。^[4] 年轻一代更是无暇顾及孔子设定的性别界线。比如，宋子文的三个女儿一起跳着踢踏舞，全然不见传统的约束。刊登她们跳舞图片的《洛杉矶时报》戏谑地问道，目睹此景，“孔子会说什么呢？”^[5] 然而，虽然中国有着上述现代女性代表，孔子的影响仍然巨大，新女性运动在较长时间内依然举步维艰。所谓的运动不过“聚集了少数几位中国妇女，她们或者是外国教育的产物，或者居住在国外租界及其附

[1] Hannah Stein, Untitled Article, *Washington Post*, Jul. 9, 1933: SM2.

[2] “Chinese Poet Led Women Rights Move 1 000 Years Ago,” *Washington Post*, Dec. 15, 1936: X15; Malvina Lindsay, “The Woman’s Angle,” *Washington Post*, Apr. 11, 1937: S11. 鱼玄机，晚唐诗人，长安人，始嫁人为妾，被弃，后出家，最终因打死婢女而被处死。诗作见于《全唐诗》，有 50 首之多。

[3] Evelyn Riley Nicholson, “Woman and the Church,” *Chicago Tribune*, Jan. 27, 1929: 12; “Tell of Missions in Many Countries,” *New York Times*, Mar. 29, 1928: 18.

[4] Bess M. Wilson, “Global Survey Reveals Universal Peace Aims,” *Los Angeles Times*, Apr. 19, 1943: A6.

[5] Edwin Cox, “Private Lives,” *Los Angeles Times*, May 15, 1941: 18.

近”。中国新女性“人少且不愉快”。^[1]

即使在道德思想领域，美国报纸也发现了些许瑕疵，进一步映衬出孔子思想已与时代需求“脱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笔下社会道德体系的基本框架。美国报纸却语出惊人，认为这助长了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淡之风。相比之下，基督要求人们“你想要人家怎样对你，你就要怎样对人”，显示出更多的温情和同情心。孔子言论维护社会公正，但如果仅有公正，“我们居住的世界将是一个冰冷之处”。假设一个人站在河岸目睹他人落水，他不会认为自己有义务帮他上岸，因为孔子“不要求人们通过冒险去救助他人”。这种思想与“极端自私”很难区别开来。^[2]按照某些撰文者的理解，孔子只是要求人们不去作恶，与基督教主动从善的要求有着“巨大鸿沟”。基督的原则才是“行动的原则”。^[3]那些质疑基督教实际用途的人应该思忖以下问题：“孔子激励过中国人开办孤儿院和救济院吗？”^[4]以孔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从来都无助于培养人们积极主动的性格”。如果街上发上车祸，西方人会问，“我能做些什么？”中国人的问题则是，“怎么搞的？”^[5]即使受西方文明“开化”较早的上海街头，也在时刻上演着拒绝救助他人之事，“没有任何事情比某人痛苦地倒在地上、成百上千的其他人目不斜视地从旁边经过更加触目惊心了”。当孔子告诉中国人切勿关心于己无关的事，人际关系的冷漠基调就抹之不去。^[6]

鉴于孔子思想的“不合时宜”，美国报纸极其自然地提出基督教优越论，将基督教作为孔子原则的理想替代体系。《华尔街日报》直

[1] Caroline Singer, "China's 'New Women' Few and Unhappy," *New York Times*, Oct. 25, 1925: SM6.

[2] William Jennings Bryan, "A Bible Talk," *Atlanta Constitution*, Jun. 25, 1922: 23.

[3] William Jennings Bryan, "A Bible Talk," *Atlanta Constitution*, Nov. 5, 1922: 20.

[4] "Why Celebrate Christmas?," *Los Angeles Times*, Dec. 25, 1922: II4.

[5] "Modern Youth of China Harassed by Contradiction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19, 1935: 4.

[6] "In China You Don't Be Good Samaritan," *Chicago Tribune*, Jan. 2, 1948: 6.

言不讳地宣布，孔子“尽管有着永恒的智慧，他已成为中国的主要障碍”。^[1]《芝加哥论坛报》附和道，“中国人显然需要一个新的孔子，带领他们走出困惑的荒漠”。^[2]“新的孔子”就是耶稣基督。孔子学说中的确有着“某些美好的东西”，“但在基督的耀眼光辉面前，那不过是几支蜡烛”。^[3]在赛珍珠看来，孔子和基督不可同日而语。孔子哲学缺乏深度，注重实利，未能驱散人们的无知和迷信。基督教则在多个方面都具优越性。^[4]她因此赞扬那些“对孔子毫无兴趣”的中国人。^[5]

已经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更是不失时机地大造声势。他们向世人宣布，“今日中国最为迫切的需求就是基督教”。^[6]美国报纸不愿忽略任何证明中国社会正在背离孔子的蛛丝马迹。例如，一首讽刺孔子已经落伍的诗歌写道，夜幕下的北京或者上海，夜总会人满为患，吃饭时，人们丢掉筷子，改用刀叉，体会着“美妙而又古老的美国方式”。毕竟，“世界已经远离孔子时代”！^[7]上海的棺材铺老板毛先生以行动“背离”孔子。杜撰的孔子语录说，“聪明人只打一次官司，只有笨蛋才上两次法庭”。但毛先生却数次与人对簿公堂，并聘请白人律师，“置这一箴言于不顾”。^[8]身居美国的华人少年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人的脸庞上显露着美国佬的表情”。假设孔子看见少年的外表，必定“发出一声长长的尖叫”。^[9]“西方流行的个人主义新概念”给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孔子思想形成巨大冲击。中国人争先恐后地体验“新的自由”，

[1] “It's All Done with Mergers,” *Wall Street Journal*, Mar. 25, 1947: 7.

[2] Arch Ward, “In the Wake of the News,” *Chicago Tribune*, Feb. 1, 1949: B1.

[3] “Dr. Goodell Likens Christ to the Sun,” *New York Times*, Aug. 11, 1930: 16.

[4] “Mirror of the World's Opini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3, 1933: 14.

[5] John M. Brewer, “A Missionary to the Occiden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31, 1933: S12.

[6] “Christianity Held China's Chief Need,” *New York Times*, Jun. 2, 1947: 23.

[7] James J. Montague, “China Becomes Modern,” *Los Angeles Times*, Jul. 18, 1928: A4.

[8] Major St. P. Rudinger, “Showing Up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Sept. 12, 1920: BRM3.

[9] H. I. Phillips, “The Once Over,” *Washington Post*, Jul. 6, 1942: 7.

暴力冲突接踵而至。^[1]正是因为美欧基督教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中国与西方接触,导致的最大危害就是孔子影响遭到削弱”。^[2]报刊杂志不断创办,传播着西方文化,中国初现让孔子走下神坛的迹象。^[3]

六、孔子：继续“禁锢”中国的创造力

不仅社会价值观念的发展“超越”了孔子的预期,秉承孔子教诲的中国人在日新月异的世界技术进步面前更是显得捉襟见肘、难以应对。

技术进步必须以创造性思维为前提。然而,中国人由于视孔子言论为金科玉律,而孔子又推崇远古制度,他们的创造力便被窒息。中国以遥远的过去为标准,“必然缺乏现在(西方)生机勃勃的品质”,“谦逊地孝敬父母否定了自立个人主义所蕴含的自发性和自由”。^[4]来自爱达荷州的联邦参议员弗雷德·T. 杜波依斯(Fred T. DuBois)撰文称,中国就是一头沉睡的怪兽,“被扼杀斗志和雄心的孔孟哲学所麻醉”。^[5]中国的落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是一种哲学和宗教”,即孔教。孔子是“好古主义者”。他告诉民众,“任何变革都是有害的”。这显然“不会带来进步”。^[6]如果当初登上北美大陆的清教徒信奉孔子思想,“美国可能仍在用牛角火药筒和明火枪”。但美国的先辈们选择了“充满活力的个人主义”,美国因而取得“难以想象的进步”。^[7]文学艺术是反映民族创造力的晴雨表,中国在此领域的表现差强人

[1] James W. Bennett, “The Five-Thousand-Year Plan—In China,” *New York Times*, Apr. 26, 1931: SM6.

[2] Charles Johnston, “Threading through the Maze of Oriental Philosophy,” *New York Times*, Oct. 7, 1928: BR4.

[3] “Press Comment,” *Washington Post*, Aug. 15, 1927: 4.

[4] Henry W. Steiger, “Influence of Confuciu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24, 1948: 15.

[5] Fred T. DuBois, “Changing China,” *Washington Post*, Apr. 29, 1927: 6.

[6] Harry Carr, “Yellow Dragon to Turn New Page of History,” *Los Angeles Times*, Mar. 27, 1927: 1-2.

[7] Arthur Hunt Chute, “Wall Street Sermons,”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6, 1920: 1.

意。在对比中英小说之后，赛珍珠认为，中国小说尽管缘起更早，孔子却对小说颇有微词，中国人于是并不重视原创性。^[1] 孔子编辑了众多古籍，编选与重印之风由此在中国盛行。中国的文学艺术停滞不前便不难理解。以孔子学说为根本的中国制度“将中国的史前艺术延续到了二十世纪”。^[2] 所以，有报纸武断地宣布，“孔子的追随者不是艺术家”。^[3]

中国的技术落后被视作孔子禁锢力更为明显的表现。在事关日常生活的技术条件方面，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与孔子时代没有显著差别。比如，孔子故地曲阜，人们使用独轮车的热情丝毫不亚于“伟大圣人的同代人”。^[4] 孔子据称曾经告诫人们“不要喝生水”，虔诚的中国人自然言听计从，但却满足于将水烧开。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进行过净化饮用水的任何重大尝试。孔子成了无法逾越的障碍。^[5] 中国的家畜也无选种培育，其饲养水平停留在“孔子丢掉官职”之时。但“在当今的世界竞争时代，这种由于无知和懒惰所导致的培育方式是不可原谅的”。^[6] 畜牧业和农业技术比“能够引用孔子语录”更加有用。^[7] 在商船云集的新加坡海峡，豪华班轮与中国的“突眼帆船”折射出进步与落后之间的巨大落差。突眼帆船还是“孔子时代的人们，在中国海上冒着台风破浪前进”的工具。^[8]

近现代科技领域，美国报纸的不屑同样溢于言表。“任何新思想都必须突破惯例织就的蜘蛛网”，麦哲伦的探险船不是以蜘蛛网为帆，

[1] “Traces Chinese Novel,” *New York Times*, Jan. 26, 1933: 15.

[2] “Chinese Arts and the Republic,”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28, 1920: 3.

[3] “Poets of Early Chinese Days,” *Boston Globe*, Mar. 18, 1923: 55.

[4] Foster Rhea Dulles, “Peking Traffic Jam Baffles Regulation,” *New York Times*, Feb. 6, 1927: SM23; “Few Good Roads in China,” *Washington Post*, Jun. 3, 1928: SM3.

[5] Mason Warner, “Sanitation? Chinese Can’t Be Bothered,” *Chicago Tribune*, Jul. 21, 1935: E8.

[6] Fred Hogue, “Social Eugenics,” *Los Angeles Times*, Nov. 10, 1935: I31.

[7] Donald O. J. Messenger, “Congregationalists Told World Trade Boom Fad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23, 1949: 2.

[8] M. T. G., “The Straits at Singapor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9, 1930: 16.

华盛顿到巴尔的摩的电线“不是用来捕捉苍蝇的小发明”，收音机天线绝非昆虫的触角。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她已被传统之网所束缚。“孔子认为可取之物对于他的所有后代都是大有裨益的。”电话和铁路从而因为“过去的记忆”遭到中国人反对。^[1]1922年，上海计划建立一座巨型无线电台。有感于此举遭受的重重阻力，《华尔街日报》惊叹道，“孔子国度即将被纳入巨大的全球同线电话网络”。^[2]20世纪已经步入原子时代，但原子既无担忧，也无恐惧，既没重量，也没大小，“孔子从未关注”。所以，当“我们已然追溯到其起源，了解其特性”，中国人却仍然懵懂无知。^[3]就连中国的文字也似乎对疾风骤雨般的科技变革毫无准备。记录着孔子语录的汉字“在科学进步面前已经崩溃”。汉字无法表述原子弹以及相关的科技术语，中国人绞尽脑汁，新造汉字，以便跟上科学发展的节拍。^[4]二战时期中美结盟，美国派遣飞行教官，帮助中国组建空军。但面对教官的一连串专业术语，中国翻译一筹莫展，即使查阅英汉字典也无济于事。因为汉字没有对应的表达，“孔子都会如坠云山雾里”。^[5]如果在科技飞速进步的20世纪开展伟人竞选，“孔子无疑会发现数名竞争者”。^[6]

《论语·微子》有“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的记载，讲述孔子因为鲁国执政者沉溺于齐国送来的歌伎舞女而愤然离开之事。报纸抓住这一典故，编造女乐事件迫使孔子中断科技发明的故事，从另一角度将中国的技术落后归咎于孔子。在此讽刺寓言中，孔子是足迹遍及世界的科学家，搜集的明信片既有美国的白宫和自由女神像，亦有意大利的城堡。孔子致力于改进和普及无线电装置，鲁国人购买收音机的热情犹如“购买热饼”一样。齐国太子对此心生嫉妒，便招募三万佳丽，用一千辆卡车送至鲁国。鲁国统治者从此荒废

[1] “Cobwebs,” *Los Angeles Times*, Oct. 3, 1927: A4.

[2] “To China by Wireless,”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20, 1922: 8.

[3] James J. Montague, “In the Limelight,” *Los Angeles Times*, May 23, 1932: A4.

[4] Bill Henry, “By the Way,” *Los Angeles Times*, Feb. 12, 1948: A1.

[5] “Terry and the Pirates,” *Chicago Tribune*, Sept. 22, 1942: 9.

[6] “Great Men Extinct,” *Los Angeles Times*, Apr. 7, 1922: II4.

朝政。时值孔子讲授“马克思理论与爱因斯坦学说”。孔子一气之下，“找来战斧，将价值连城的广播设备砸得粉碎”，踏上周游列国之路。中国的科学研究戛然而止。^[1]

中国因为孔子而与时代“脱节”，中国人的某些行为就显得有些怪诞。例如，孔子要求的祖先崇拜据说缚住了中国人开拓进取的手脚，但20世纪的中国人在祭奠先人时，却加入了西方科技进步的元素，将美国报纸上相互对立的孔子与进步糅合在一起。自孔子以来，中国人都会在逝者的坟头留下食物。然而，现代的中国人开始给死者捎去纸做的汽车，牌照和商标一应俱全，先辈们可在灵魂世界里来去自由。^[2]同样与汽车有关，某华人在美国考驾照的经历被刻画的啼笑皆非。此人新买一辆红色汽车，正在进行路考。车开出没多久就拐向路边。“孔子门徒”不认为是自己的驾驶技术出现问题，而是某个魔鬼在道路中间放了一棵树，从而导致驾驶失误。^[3]“孔子从未告诉”中国人应该怎样面对汽车。因此，“孔子的子孙”上街闲逛时，“似乎一门心思地想着自己的祖先”。如果被汽车撞上，算他们无路可逃；如果没有，则是他们的运气。^[4]不知世界已经斗转星移的中国人，有着无端的自负情结。英法两国为谁是谁棒球发源地争得不可开交。此事本与中国和孔子毫无关系，但为揶揄中国人的自负，《华盛顿邮报》评论曰，幸好中国人不打棒球，不然“某些聪明的中国体育报道者肯定会发现，棒球已在孔子时代开始流行”。^[5]“自负”的中国人青睐看似高明的小伎俩。“来自孔子国度的商业代表团”告诉美国商务部长，他们想采购铁路设备，二手设备也行。代表团试图让美国提供贷款，以

[1] “The Prince of Ts’i Confuses Confucius,” *Washington Post*, May 6, 1922: 11.

[2] “Take Flivvers to Heaven,” *Los Angeles Times*, Jul. 3, 1921: A7; “Chinese Leave Autos on Graves for Spirits to Use,” *Boston Globe*, Jul. 19, 1921: 13.

[3] Gorman M. Hendricks, “How Road Test Cops Live ‘The Life of Riley,’” *Washington Post*, Aug. 5, 1923: 58.

[4] James O. Spearing, “At the Wheel,” *New York Times*, Sept. 24, 1933: XX10.

[5] “American Players Draw Only 20 Spectators in Dublin,” *Washington Post*, Nov. 9, 1924: EF3.

铁路收益进行偿还。但中国的铁路收益显然差强人意，报道感叹道，“这些中国人，真是聪明！”^[1]

比怪诞行为更加危险的是，孔子的平和思想及其“造就”的中国落后，让中国人不愿或者无法以强力手段捍卫国家。中国人以孔子教诲为纲，“完全没有民族精神”。^[2]孔子让“民族主义与这个有着4000年不间断历史的民族之精神背道而驰”。^[3]从1928年2月开始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主管的斯坦利·K. 霍恩贝克(Stanley K. Hornbeck)也言之凿凿地认为，孔子界定了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却“没有考虑人们对于整个民族或国家的忠诚问题”。中国人因此习惯于将个人责任置于“爱国或公共义务”之上。^[4]利用中国的羸弱，基督教国家将屈辱性条件强加于中国，“温和的孔子被击倒在地”。^[5]孔子“可能已被中国可怜而悲惨的命运惊得目瞪口呆”。^[6]囿于孔子的影响，中国人没有背水一战的心理准备，中国也不会出现能够带领国家走向强大的拿破仑式的人物。^[7]笃信孔子与人为善思想的中国士兵甚至不愿杀人，中国的战斗力可想而知。^[8]美国人逆孔子思想而动，向中国提供飞机，而且帮助训练飞行员，“下一个中国人可能更懂飞行技巧，而非走路姿势”。如果孔子再世，他一定“极度惊诧”。^[9]孔子关于谦逊有礼、诚实守信、睿智平和的教诲都是“很好的思想”，但“严酷的战争和无能已让中国的精神几近崩溃”。毕竟，当身处逆境，

[1] Robert C. Albright, "Gallery Glimpses," *Washington Post*, Sept. 23, 1934: B2.

[2] "Ninety-five Soldiers Killed," *New York Times*, May 26, 1923: 3.

[3] "Nationalism via Invasi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18, 1933: 14.

[4] "Estimate of Events in China Based on Study of Tradition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26, 1928: 3.

[5] "Mr. Lloyd George Delivers Great Speech to Free Church,"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13, 1925: 12.

[6] D. A., "Rhymes and Remnants," *Chicago Tribune*, Mar. 31, 1948: 18.

[7] Upton Close, "As the Chinese View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Apr. 17, 1927: SM1.

[8] Lee Shippey, "The Lee Side o' L. A.," *Los Angeles Times*, Dec. 18, 1937: A4.

[9] "China in the Air," *Los Angeles Times*, Dec. 20, 1928: A4.

“人们不能以空谈为生”。^[1] 面对着已被鲜血浸染的土地，中国人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翘着修长的指甲吟诵孔子语录了。^[2]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虽然历经动荡，并短暂反孔，但出于历史惯性和政治需要，尊孔很快重回政治生活的核心。民众的孔子情结却从未因为时局混乱而中断。因此，此时的中国依然存在于孔子的巨大影响之下。但这种影响却被认为延续了众多中国痼疾，让孔子与时代的脱节愈发明显。

综合观之，美国报纸上的孔子思想与 20 世纪前半期的人类社会脱节之处胜过适用性。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在美欧的固定认知模式里，孔子是带有宗教色彩的伦理道德家，长于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而非激发人的个性和自由。因此，报纸对于孔子的肯定集中在社会道德方面，与个人创造力密切相关的科技进步则难以见到对于孔子的正面评价。

第二，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内忧外困，积弱成疾。美国报纸力图向读者解释中国落后局面的成因。报纸发现，中国尊崇 2000 多年的孔子非但没有促进中国的发展，反而禁锢着中国人的创新思维，从而让中国与西方世界如火如荼的思想与技术变革失之交臂。中国落后被动的起因似乎已在孔子健在时就已注定。

第三，美国的世界垄断地位在一战以后成为不争的事实，强化着美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而中国却愈发衰落，据信与此紧密相连的孔子思想从而映衬着基督教文明的“可取与先进”。孔子似乎仅仅在道德领域尚有可圈可点之处。即便如此，中国妇女地位的低下也让孔子道德体系的完美大打折扣。孔子思想及其影响之下的中国社会，如果需要立于世界国家之林，就必须转而接纳美欧的基督教文明体系。美国报纸大力否定孔子思想的现代适用性，虽然不乏见解正确之处，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此。

[1] D. A., "Rhymes and Remnants," *Chicago Tribune*, Feb. 12, 1949: 10.

[2] "When the Liner Speaks," *New York Times*, May 16, 1938: 16.

第十三章

孔子与美国的外交舆论

1920—1950年，世界局势急剧变幻，世界和平濒临得而复失的境地。列强在一战后利益瓜分不均导致新的矛盾迅速积聚，美国大萧条造成的世界经济危机让世界秩序更加混乱，二战的爆发将人类社会拖入一场空前劫难，冷战的开始又浇灭了很多人的和平希望。众多的有识之士在思考着世界摆脱纷乱阴霾的良策。美国报纸上就涌动着这样一股潮流。通过时事报道和分析，他们希望各国密切交流，远离战争困扰。令我们颇感意外和惊喜的是，中国的孔子是大量此类呼声的立论依据。孔子的处事与治世思想启发着人们关于国家相互交流的思考，推动着世界秩序的变革进程。

一、孔子与中国的外交处境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其国际生存状况极为艰难。欧美夺取在华利益，日本大举进犯，实为中国外交史上的多事之秋。面对严峻局势，中国急于应对。应对之策是否有据得当，美国报纸不吝报道和评论。孔子屡次出现在此类场合，或者作为中国困境的根源，或者成为中国抵御外侮的动力。或贬或褒，看似矛盾，却折射出孔子与现代中国命运的休戚相关。视孔子为中国尴尬处境之源的人秉承了美国报

纸看待中国落后状态时的一贯立场，而以孔子振作中国精神者多为华人或中国人。两种观点在报纸上并行不悖，见证着孔子影响的多重性。

中国国力孱弱，屡遭侵犯。这在诸多美国评论者看来，与孔子的影响难脱干系。谙悉孔孟之道、视礼仪为文明标志的中国人，无法平等看待一心关注现实利益的在华西方人，从而轻视西方科技进步的重要性。不愿吸纳西方先进科技的中国自然难敌列强的轮番进犯。^[1]中国人习惯于“与严酷的生活现实达成妥协”，这是孔子一再强调的原则。虽然中华文明因此得以稳步发展，受到影响的中国政府却在主权问题上缺乏坚定，导致与列强的屡次妥协。^[2]英国租界山东威海卫的民众立场甚为类似：“由排外主义滋生而出的民族主义变体从未渗入威海卫。”深知孔子影响力的英国统治者施行“仁政”，当地民众恍如置身乌托邦之中。而邻近地区的人民仍“在接二连三的督军或曰中国军阀的暴政之下痛苦呻吟”。在中英移交管辖权限之时，威海卫居然“请求大英帝国继续统治”。报道意味深长地总结曰：“善良的威海卫人居住在孔子故地，并非一无所获。”^[3]有评论甚至借用苏联报纸之口，将中国人的“软弱”归咎于孔子。一家苏联报纸宣布，“埃塞俄比亚人民反抗意大利法西斯的英勇斗争，无疑会极大地启发中国民众”，因为华北的中国人正在日本统治下，“以孔子原则为基础，建设王道乐土”。^[4]

孔子思想的平和色彩似乎让中国人缺乏斗志和反抗的力量，欧美列强和日本得以任意瓜分中国利益。不但中国的大片国土沦为列强的势力范围，就连最为神圣的孔子故土也未能幸免。山东几易其手，成为各国争相获取之处。一战之后，日本从德国手中获得山东半岛，

[1] Pierre van Paassen, "The World's Window," *Atlanta Constitution*, Aug. 8, 1925: 4.

[2] James T. Shotwell, "The League at a Mile Post: Its Future Course at Stake," *New York Times*, Feb. 5, 1933: XX3.

[3] "Weihaiwei,"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24, 1930: 16.

[4] "Soviet Press Keeps Orient Issue Astir," *New York Times*, Dec. 15, 1935: E6.

英国又在1920年的条约中宣称获得“在山东的决定性话语权”。^[1]为报复在中国排外运动中遭受的损失,以“华盛顿—伦敦—东京阴谋”为基础的五国列强于1927年向汉口的国民政府发出相同照会,不仅要求巨额赔偿和处决反抗分子,更是要求“将五国国旗插上孔子墓”。这是“最为背信弃义的白人帝国主义”,目的在于瘫痪中国政府。^[2]北平的孔庙也因为日本人的到来,在血红色之外涂上了粉红的装饰色彩。^[3]伪满洲国的成立将满洲宣言提升到了与孔子著作同等的地位。^[4]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日本军队在孔子故地山东横冲直撞,肆无忌惮,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5]苏维埃俄国借中国革命情绪日趋高涨之机,向中国青年学生展开宣传攻势,试图让契切林(Tchitcherin)替代孔子。^[6]内忧外患的中国一片混乱,即使造访中国、有意伸出援手的美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似乎也胸无良策。他无非是从政客们各持已见的华盛顿“混乱特区”(District of Confusion)到了更加杂乱不堪的“孔子特区”(District of Confucius)而已。^[7]美国首都全称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哥伦比亚、混乱、孔子在拼写上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故被撰文者挪用他用。

鉴于孔子“导致”的中国被动局面,某些激进的报纸评论鼓吹,以欧美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代替儒家文明,“帮助”中国走出困境。孔子强调传统,西方的进步在中国人眼里无异于“颓废堕落”。保守落后的中国“对于太平洋其他地区不构成威胁,从来都不是”,黄祸之说不过是“西方无耻政治家的杜撰”。中国如欲强大,必先振兴实业。实业振兴与精神救赎一样,必须源于基督教。美国的工业、宗教、思

[1] “A Corner in Gods,” *Los Angeles Times*, Dec. 4, 1920: II4.

[2] “By-Products,” *New York Times*, Apr. 17, 1927: E19.

[3] “Finds Glamor Is Keynote of Haggis Feast,” *Chicago Tribune*, Dec. 10, 1939: G2.

[4] “Along El Camino Real with Ed Ainsworth,” *Los Angeles Times*, May 5, 1934: 4.

[5] “Shantung Prize of Conquest by Aliens in 1898,” *Chicago Tribune*, Dec. 30, 1937: 6.

[6] “Tchitcherin to Replace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Sept. 26, 1925: 16. 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1872—1936),苏联国务活动家,曾任苏联外交部长。

[7] “Voice of the People,” *Chicago Tribune*, Jun. 8, 1944: 16.

想和科技将在门户保持开放的中国大有作为。^[1] 中国需要批量生产，满足人民需求，壮大国家力量。“只要美国拖拉机开始耕耘土地”，饥荒将在中国销声匿迹，“孔子国度也将在拥有过去的同时拥有未来”。^[2] 大胆西化的日本深得某些美国人的赏识，其占据中国土地的举动居时常被赋予帮助中国进步的角色。有报纸宣称，沉溺于孔子的中国“没有机会统一国家目标、巩固国民团结”。日本人却兴建了中国 70% 的铁路和 60% 的制造业，“其完备程度和效率在孔子国度前所未有”。^[3] 评论者的言下之意是，中国应该不顾日本的肆意侵略，让西化的日本治理中国，中国方有振作的可能。《华盛顿邮报》的一封读者来信则对中国驻美大使力促美国援华抗日、以拓展美国商业利益的说法嗤之以鼻，认为“正是这种思维才让今天的世界痛苦而悲惨”。日本的征服之于中国是“塞翁失马”，满洲因而“一举成为人民享受和平与幸福的进步国家”。相比之下，“在科学文明领域拒绝接纳日本为其老师的中国（其他部分）仍然落后”，民众的生活方式与“孔子时代”别无二致。^[4]

孔子思想原本就博大精深，应用者往往可以从中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用于各不相同的目的。指责中国落后封闭者从孔子那里似乎找到了根源，力图为中国博取世界同情和支持的人同样从孔子的言论中发现了依据。日本的侵略是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面临的最大生存危机，中国寻求外界支持之声也最迫切。为中国奔走呼号者极力强调孔子的民主与和平思想，及其与日本独裁好战性格的鲜明对照，以期唤起西方世界的同情。1937 年 11 月，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将中国的抗日战争定义为“民主之战”。孔子的弟子推崇“民人”和“社稷”（《论语·先进》），实乃“民主口号”。作为“民主国家”的中国爱好和平，“战争是独裁者的语言”。中国抗战因此意在反对独裁，捍卫民主与和平。^[5]

[1] “What of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Nov. 30, 1925: A4.

[2] “Cracked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Dec. 28, 1930: A6.

[3] Mme. X, “News of Chicago Society,” *Chicago Tribune*, Jul. 31, 1921: G2.

[4] “Japan Defended,” *Washington Post*, Oct. 10, 1937: B9.

[5] “3 Democracies in Peace Front against Fascists,” *Washington Post*, Nov. 5, 1937: 34.

王正廷之后接任驻美大使的胡适直言，中日战争的表象之下，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受孔子影响（“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中国的理想是“通过人的无限可塑性，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倡导普世和平。日本不仅政治上独裁，而且极具侵略性。中国抗战与欧洲反抗纳粹的战争一样，都是为了“自由和永久和平”。^[1]宋美龄1943年访美，多次引用孔子，突出中国的抗战信念，力促美国伸出援助之手。例如，在芝加哥体育场的演讲中，宋美龄特别提及孔子的顽强信念，呼吁中美并肩战斗，坚信“我们的理想值得捍卫，也能够捍卫”。^[2]宋美龄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讲也提及孔子。《纽约时报》感叹道，通过宋美龄之口，不同思想之间的距离已经缩短，“区区数言真诚的话语能够迅速跨越鸿沟”。^[3]

依据孔子的正名之说，中国政府要求西方，不要使用“满洲国”指代中国的东北三省。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日本扶持的“满洲国”乃不正之名，理应遭到摒弃。^[4]1942年，中国青年基督教联合会秘书借在俄亥俄州出席宗教会议之机，痛陈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危害：600万最优秀的青年战死沙场，200万儿童沦为孤儿。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反法西斯阵营“缺乏团结”，没有践行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古训。^[5]刘姓华人也在文章中引用上述孔子名言，证明中国人从来都从世界角度思考问题，正在为世界而战。^[6]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小查尔斯·里查森（Charles Richardson, Jr.）盛赞中国愈战愈

[1] Irene Steyskal, "Women Voters Told China Also Fights for Life," *Chicago Tribune*, Apr. 30, 1942: 21.

[2] "15 000 Hear Mme. Chiang Plead for Unity," *Chicago Tribune*, Mar. 23, 1943: 1, 4.

[3] "Our Neighbor China," *New York Times*, Mar. 3, 1943: 22.

[4] "Confucius Bars Semantics,"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 25, 1942: 6; Chapin Hall, "What Goes On?," *Los Angeles Times*, Oct. 2, 1942: 7.

[5] "Protestant Churches Urged as Bridge to World Democrac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9, 1942: 10.

[6] Liu Liang-Mo, "China Speaks," *Pittsburgh Courier*, Sept. 19, 1942: 7.

勇,愈战愈强,真正实践着孔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说,因此值得同情和支持。^[1]“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出自《孟子》。尽管有此误用,里查森依据孔子为中国抗战呐喊的愿望却是显而易见的。自由撰稿人亨利·彼得森(Henry Peterson)没有苟同孔子让中国人一盘散沙的说法,而是认为,恰恰因为中国人遵循孔子,各尽其责,中国才顶住了日本的侵略。所以,孔子能够带领中国走出困境。^[2]

引用孔子声援中国的人往往将孔子思想视为人类社会走向秩序与和平的途径和保障。清末民初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陈焕章(1880—1933)宣布,早在公元前221年,孔子确定的原则就在中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国家”,即秦朝。陈焕章以此推断,“如果广泛采用这些原则,(当今)世界同样能够实现和平”。^[3]在林语堂的笔下,孔子与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相隔千年,却所见略同。他们深信,维护道德秩序对于国际和平至关重要。^[4]林语堂借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访谈节目,大谈孔子理想与罗斯福政策一脉相承的特性。孔子推崇仁政,强调任人唯贤,人尽其才,以及社会和谐。“贵国伟大的总统”正在把孔子的理想“变成现实”。“为了这一共同的民主”,中美更应并肩战斗。^[5]珍珠港事件之前,罗斯福政府无意支持中国,而是与日本暗中谈判,大作交易。林语堂致信《纽约时报》,提醒美国政府不要误读中国的反应。中国没有大声抗议,是因为孔子“谦恭有礼”的古训,绝非默许美日之间投桃报李。^[6]蒋介石在1942年的国民大会闭幕式上引述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1] Tom Treanor, "The Home Front," *Los Angeles Times*, Mar. 22, 1942: 2.

[2] Harriett Pribble, "Women Learn War Is Job of Every Chinese," *Chicago Tribune*, Mar. 8, 1944: 19.

[3] "Urges Confucianism as Aid in World Peace," *New York Times*, Jul. 26, 1928: 27.

[4] Lin Yutang, "An Oriental Looks at Democrac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11, 1939: WM5.

[5] "World Notables Praise Roosevelt," *New York Times*, Jan. 21, 1941: 7.

[6] "Present Negotiations with Japan Regarded as Futile," *New York Times*, Sept. 21, 1941: E6.

视相互帮助和同情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1]1944年10月,孔祥熙在致合作百年大会(Cooperative Centennial Congress)的电报中,称赞孔子确立了“世界共同体的基本哲学”,他的思想是“我们时代的火炬,理应成为国家间永久和平与繁荣的基石”。^[2]林姓华人甚至建议,战争中的人们放弃针对日本的“‘仇视’运动”,而是本着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精神,感化日本,“缔造更加美好的和平”。^[3]

与此同时,孔子的和平思想还让中国信心满怀地憧憬和参与有助于维护国际正常秩序的组织。国际联盟是一战后成立的旨在调解国际冲突、确保国际和平的机构,中国是积极的参与者。除了中国国力微弱、急需国际保护之外,孔子是中国态度的重要成因。在1928年的日内瓦国联会议上,中国表示“将全力支持国联”,因为“孔子完全可以被看做国联工作的先驱”。^[4]联合国尚在酝酿之时,陈姓读者便给《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去信,鉴于孔子远在古代就已提出的大同思想,以及中国的人口和作为二战最早爆发地等因素,联合国总部以设在北平为宜。^[5]1946年9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设立国际儿童基金,中国代表热情支持,认为这是孔子仁爱思想的延续。^[6]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则称赞该委员会已经达到孔子黄金准则的要求。^[7]

[1] “China Renounces Leadership Plan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3, 1942: 7.

[2] “Lehman Sees Co-op Policies Aid to UNRR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16, 1944: 15.

[3] “Our Readers Sa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11, 1942: 18.

[4] “Germany to Offer Allies Concessions to Quit Rhineland,” *New York Times*, Sept. 6, 1928: 10; “French and German Relations Debated,” *Washington Post*, Sept. 6, 1928: 4; “League Hails Kellogg Pact,” *Los Angeles Times*, Sept. 6, 1928: 8.

[5] “Peiping for World Seat,” *New York Times*, Jul. 16, 1945: 10; “Peiping for UNO Seat,” *Washington Post*, Jul. 20, 1945: 8.

[6] “U.N. Group Backs Children’s Fund,” *New York Times*, Oct. 1, 1946: 10.

[7] “Human Rights Group Ends Geneva Session,”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47: 2.

二、孔子：中美交往的纽带

中国利用孔子的影响力，积极呼吁美国伸出援手。但囿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在 1941 年之前并不愿公开支持中国。然而，民间交流和偶尔出现的政府声援从来都是存在的。这种趋势与珍珠港之后美国政府的公开支持汇集一处，形成 20 世纪 40 年代中美关系的主流。无论政府的态度如何，中美之间的实际交流始终没有中断，孔子发挥着交流纽带的作用。孔子或者被用以突出美国行为的高尚和对中国的尊重，或者以各种形式现身中美交流的实际过程。

美国人的“无私”帮助是报纸论及这一时期的中美交流时费墨颇多的主题。孔子见证或者印证着美国对于中国的“友谊”。20 世纪 30 年代初，美国为满足西部产银州的要求，提高银价，导致中国白银外流，银本位的中国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署名“利他主义者”的读者希望政府，鉴于中国创造的“辉煌艺术和老子与孔子的明智哲学”，给予中国数亿美元的贷款，助其重振金融体系。这将是“体现友谊的伟大举动”。“利他主义者”完全忽略了美国政府应负的责任。^[1]为渲染美国人的“友好”从来有之，报纸不惜让早在 19 世纪中期就已战死中国的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重见天日。华尔曾率“常胜军”与太平军作战，1862 年在上海附近饮弹殒命。旧事重提之际，报纸不忘强调华尔在中国的“奉献”，以及由此受到的礼遇。“曾经拯救上海”的华尔被埋葬在孔庙之内，名字与诸神并列。中国皇帝亲笔起草讣告，“全中国为之哀悼”。^[2]华尔“首开先河，用我们的作战方式训练中国人”。此事“最终将改变世界地图，程度之深将超过世界大战”。极尽夸张的评价为中外达官贵人伴随华尔灵柩前往孔庙安葬

[1] Altruist, "Proposal to Lend Silver to China Meets the Approval of a Correspondent," *Washington Post*, Nov. 14, 1930: 6.

[2] Stuart M. Emery, "American Adventurer Once Saved Shanghai," *New York Times*, Oct. 26, 1924: XX6.

的报道作了铺垫。^[1] 中国人的“感恩”之情似乎未因华尔在淞江孔庙安身而停止。1877年，当地专门兴修庙宇，“旨在铭记华尔”。华尔的精神“激励着”常胜军“继续扬名世界”。^[2] 报纸上凡有华尔的名字出现，皆会提及安葬孔庙之事，以彰显华尔对于中国的“贡献”。

一战以后中国山东的归属是报纸颇为自豪的另一美国“友好”举动。山东乃孔子故地，一战后被日本占据，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最终促使日本将山东归还中国。美国的确曾经居中调停，报纸便将这一悬案的解决归功于美国。“为神圣的孔子故土欢呼雀跃”的中国人应该“感激美国”。^[3] 《纽约时报》进一步引申道，其实在1919年巴黎和会之时，美国参议院就与美国人民一道，反对日本占据山东。如果不能迫使日本归还“孔子省”，华盛顿会议将“遭人唾弃”。^[4]

西方所谓的“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以后，帮助中国抗日的美国人逐渐增多。孔子启发并激励着其中很多人的援华行为。史迪威之名对于中国人而言耳熟能详。美国报纸言之凿凿地认为，史迪威之所以敢于担当重任并取得斐然战绩，部分原因在于他“学会了（与中国人相比）同样娴熟地应用古老的孔子语言发誓或赞扬他人”。^[5] 日本战败之际，史迪威在冲绳接受数家媒体采访时直言，美国士兵的参战目的就是维护孔子创立的中庸之道，阻止日本走向极端。^[6] 即使在美国尚未正式参战之前，被称作“黑鹰”的黑人上校哈伯特·方特罗伊·朱利安（Hubert Fauntelroy Julian）已经准备“向莲花与孔子的国度进发，将日本人打得一败涂地”。^[7] 而在战场上，中国对空军的需求最为迫切。30年代初，中国开始在美国的暗中协助下组建空军。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虽然都提出建议，但“古老的孔子国度……却将

[1] Herman Archer, "Famous Soldiers of Fortune," *Chicago Tribune*, Aug. 14, 1927: S2.

[2] "A Yankee Fighter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Mar. 6, 1932: SM23.

[3] "Far Eastern Agreements," *Washington Post*, Dec. 22, 1921: 6.

[4] "Japanese Cross Currents," *New York Times*, Jan. 15, 1922: 89.

[5] "Japs Plan Crossdrive against Gen. Stilwell," *Los Angeles Times*, Mar. 22, 1942: 2.

[6] "Confucius Helps GI to Judge Hirohito," *New York Times*, Aug. 12, 1945: 19.

[7] "Julian Goes Chinese to Fight Japanese,"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Sept. 18, 1937: 1.

睿智的目光投向美国”。中国“敬重美国人的航空天赋”。^[1]“孔子的子孙”从美国飞行员那里学会了飞行技术和现代战争装备的使用方法，其抗击日本的决心更加坚定。中国人“觉醒了，行动起来了”。^[2]让中国人“聪明地”接受美国指导的孔子也让美国的黑民众加入到了援华的行列之中。1943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号召其成员为设在纽约的中国血库献血。动员通告特地引用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名言，宣布“所有种族的血浆完全相同”。科学已经证明孔子“是正确的”。^[3]

以孔子为纽带的中美交流超越了外交与战争舞台，两国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密切接触据称也部分得益于孔子的盛名。教育历来是增进文化了解的途径之一。孔子既是此类场合的主题，亦是跨文化教育交流的媒介。美国人创建的广州基督教学院颇具代表性。该校是“国际良好意愿的象征，是对中美传统友谊的生动纪念”。孔子订立的“恕”即对等互惠原则，体现在了学校的教学内容之中。学生需要兼收并蓄西方的现代科学和东方的古老文化，具备“世界公民身份”。^[4]美国的第一笔庚子退款催生了清华大学为众人所知。但第二笔退款的用途却很少有人知晓。据《纽约时报》，这笔款项被设定为增进中美文化与教育关系的基金，纽约的美华协进会（China Institute）^[5]因此建立。该机构的目标在于向美国人介绍中国，其最为成功的举措，是在费城独立150周年庆典上举办中国教育展。教育展的主题之一就是“孔子的影响”。当然，举办者没有忘记展示“中美一个半世纪以来互

[1] Frank Hawks, "China Takes to the Air," *Los Angeles Times*, Jul. 15, 1934: G12.

[2] Joseph D. Bibb, "Via China," *Pittsburgh Courier*, Dec. 27, 1941: 13.

[3] "To Aid Chinese Blood Bank,"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Aug. 21, 1943: 21; "NAACP Staff to Give to Blood Bank for China," *Chicago Defender*, Aug. 21, 1943: 6; "NAACP Staff Gives to Blood Bank," *Pittsburgh Courier*, Aug. 21, 1943: 24.

[4] "Two Worlds Fused in South China College," *New York Times*, Aug. 17, 1924: XX7.

[5] 美华协进会成立于1926年，创办者包括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胡适等中美教育家，是美国最为悠久的中国文化教育机构。

惠互利的友谊”。^[1]1939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授予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和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翡翠勋章，表彰他们为中国教育所作的贡献。巴特勒在致词中将孔子与美国立国之父华盛顿、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相提并论，认为是他们让两国人民紧密相连。^[2]

孔子还推动着两国之间的民众文化交流。孔子鼓励不同文化的相互宽容和相互接纳。一名美国小女孩挤在欢迎宋美龄的人群中，相信最好的迎接方式就是高呼孔子。^[3]纽约麦迪逊大街长老教会的儿童们为促进世界和平，特地邀请在当地华人教会学校就读的两名中国儿童做客。一名中国学生翻译了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语录，并朗诵了圣经中相似的段落，表明中美文化的共通性。^[4]同样本着孔子这句语录的精神，伊利诺伊州布卢明顿（Bloomington）的130对新婚夫妇，向在附近接受飞行训练的中国军官发出了参加婚宴的盛情邀请。^[5]从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风靡全美的电影，也在孔子身上找到了促进中美相互了解的灵感。有感于孔子代表的古老文明，电影制片商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计划亲临中国，拍摄一部记录中国历史全景的影片，片名暂定为《不朽的中国》或《岁月长河中的中国》。^[6]宋美龄在1943年的美国之行激起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兴趣。更何况孔子据称说过“百闻不如一见”，好莱坞因此积极准备拍摄反应中国生活的影片，“让种族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同情”。^[7]与此同时，美国的新闻纪录片正在“拓展（中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

[1] “China Institute Founded with Second Boxer Fund,” *New York Times*, Dec. 19, 1926: XX24.

[2] “Butler, Dr. Dewey Honored by China,” *New York Times*, Dec. 21, 1939: 20.

[3] Kimmis Hendrick, “To Change the Subjec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1, 1943: 11.

[4] “Boys Conduct Services,” *New York Times*, May 8, 1933: 13.

[5] Bess Hibarger, “New Bridge to Chin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 14, 1947: 11.

[6] “Fairbanks Returns for Chinese Venture,” *New York Times*, May 6, 1933: 11.

[7] Kimmis Hendrick, “The Country Speaks: Californi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15, 1943: 11. “百闻不如一见”实际上出自《汉书·赵充国传》，但美国报纸习惯于将此说归根于孔子。

和欣赏”。美国电影的触角延伸到了中国的很多角落，打破了自孔子以来历经千年的沉寂。昆明附近的北新乡（音）就是一例。这里的人们修通山路，美国电影得以顺利进入。^[1]

孔子不仅仅是中美交流的理论依据和中国的代名词，孔子其人还是交流的“亲身”参与者。首先，以孔子为原型制作而成或与其相关的纪念物，成为中美交往中的馈赠礼品，用实物的形式记录着孔子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的作用。1930年12月，孔祥熙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中国已向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新闻学院捐赠两尊石狮，作为“中美友谊的象征”。石狮来自山东曲阜的孔庙，有500年历史。^[2]翌年5月，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亲临密苏里大学，参加正式的捐赠仪式，感谢该校新闻学院支持远东新闻事业。^[3]佛罗里达州的罗林斯学院（Rollins College）有一条林荫道，乃师生上课必经之路。道路两旁各有一排颜色和形状各异的平整石碑。上刻“孔子”的石碑来自于孔子在中国传道授业的学校。^[4]

孔子形象被制成纪念品，奖给那些为中美交流作出贡献的人。银行家托马斯·亨德森·怀特黑德（Thomas Henderson Whitehead）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曾两次推辞中国政府的财政顾问一职。中国商人和香港银行家特向他赠送孔子银质小雕像一座，感谢他在金融和政治领域给予中国的帮助。^[5]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为中国募捐的茶会上，一件奖品居然是“苍髯长衫、仪态庄严的孔子娃娃”。^[6]1941年2月，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华盛顿诞辰纪念活动，美国总统特使参加。纪念大厅悬挂着巨幅壁画，孔子与华盛顿在画中捍卫着世界和平。借此绝

[1] Neal Stanford, "From a Reporter's Notebook,"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9, 1947: 20.

[2] "Confucian Statues Given to University," *Los Angeles Times*, Dec. 10, 1930: 3; "China Giving Two Stone Temple Lions to Missouri University," *Chicago Tribune*, Dec. 10, 1930: 32.

[3] "Approve Award to Lewis," *New York Times*, May 5, 1931: 3.

[4] Hamilton Holt, "Rollins's Name Path," *New York Times*, Dec. 10, 1939: 14.

[5] "T. H. Whitehead, 81, Once Banker, Dead," *New York Times*, May 17, 1933: 17.

[6] "Chinese Relief Poster Prizes Arouse Interest," *Washington Post*, Mar. 28, 1941: 18.

妙时机，特使承诺，美国会帮助中国为“民主生活方式”而战。^[1]在日内瓦召开的控制鸦片会议上，身着传统服装的中国少年向举办地赠送上书孔子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金丝屏风。与此相应，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大谈在禁烟问题上与美国的共识。^[2]中国军阀张宗昌也不落后，于1929年3月通过美国驻华公使，向国会图书馆捐赠唐朝开成年间石刻典籍的摹本。张宗昌声称，此举意在“复兴孔子代表的原则”。^[3]

其次，孔子的诞辰日和忌日被赋予促进中美交往的角色。1923年11月19日，在纪念孔子去世2400周年之际，一块石碑安放在北京中央公园，见证着中国对于美国的感激之情。美国公使到场发表演讲。^[4]1941年8月27日，孔子诞辰2492周年纪念仪式在重庆举行，美国驻华大使再次重申中美两国的友谊，承诺支持中国抗战。^[5]1944年的孔子诞辰日，曾于1940年与罗斯福角逐总统宝座的共和党人温德尔·L. 威尔基(Wendell L. Willkie)在纽约市政厅参加纪念集会，“促进美中之间持续紧密的关系”。孔祥熙同样到场，分析了孔子原则及其与罗斯福“四个自由”之间一脉相承的本质。^[6]

三、孔子：美国报纸评析欧洲事务的切入点之一

孔子及其思想不单是美国报纸上中国处境和中美交流的有机组

-
- [1] “Roosevelt Assistant Favors Aid to Chin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24, 1941: 4.
 [2] “China Opium’s Foe, Says Minister Sze,” *New York Times*, Mar. 30, 1925: 3.
 [3] “Chinese Classics Given to Nation,” *New York Times*, May 26, 1929: N1—N2.
 [4] “China Unveils Tablet to U.S. Friendship,” *Washington Post*, Nov. 19, 1923: 1; “Chinese Unveil Friendship Memorial,” *New York Times*, Nov. 19, 1923: 7.
 [5] “U.S. Envoy Cites Aid to China Pledge as Confucius Is Hailed,” *Chicago Tribune*, Aug. 28, 1941: 1.
 [6] “Willkie at Town Hall,” *New York Times*, Aug. 28, 1944: 11. 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声称人类拥有言论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除恐惧的自由。

成部分,对于解析欧洲事务也大有裨益。在本章关注的时间段内,欧美力量对比、欧洲内部以及欧洲与其他地区的关系都经历着巨大的跌宕起伏。引用孔子可收画龙点睛、让复杂事物的脉络即刻显现之效。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欧洲遭受重创,世界主导地位被美国取代。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美国必然承担重振欧洲的义务。但美国人历来相信欧洲已然堕落衰败,美国的帮助只有在欧洲国家自发努力的前提下才能取得效果。报纸不失时机地引用孔子,突出这一意识的正确性和正当性。撰文者格伦·弗兰克(Glenn Frank)指出,考察欧洲时,如能读一点古代预言家的文字,可以让思维异常活跃。从被视作预言家的孔子那里,弗兰克看到了法国政治经济的混乱,进而就欧洲的复兴提出忠告。弗兰克首先引用了《论语·子路》的一段对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即在混乱的现象中看清本质。弗兰克由此感叹道,很多政府为情绪和偏见所主导,却不知道自己“唯一的作用在于弄清社会现状的真正需求”。紧接着,弗兰克根据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说(《论语·颜渊》),告诫欧洲国家,人民最为急需者有三:“食品、安全和信念”。只有在经济健康发展、安全心理得以站稳脚跟、人民重新树立对于政府的信心的前提下,欧洲才可能实现永久和平,其文明才能步入良性发展轨道。^[1]也有人讽刺一战后美国重振欧洲的努力。比如,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大陆成功拯救另一大陆的先例,孔子教导之下的中国拒绝涉足异域事务,故能长久发展,这就是极好的说明。美国欲作欧洲的救世主,必须将欧洲兼并,并向其派遣总督。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美国会因此重蹈古罗马衰亡的覆辙。所以,美国唯一能够拯救的就是自己。^[2]即使以帮助他国主要是欧洲为宏伟目标的“妇女维护和平和自由国际联合会”,也不主张美国过深地介入欧洲。孔子据信说过,只有那些能够治理好自己的人才适合

[1] Glenn Frank, "Confucius Talks to France," *Washington Post*, Sept. 1, 1926: 6.

[2] P. W. Wilson, "An American Viceroy for Europe?," *New York Times*, Mar. 11, 1923: SM1.

去管理别人。因此，“先让自己心平气和，然后再出去宣扬和平”。^[1]

及至1940年，战争的硝烟又开始笼罩在欧洲上空。“远离纷争”的美国人又将被卷入其中。报纸建议，作为权宜之计，美国应该早作规划，因为孔子据称说过，“我们必须制订计划，以便将来抛弃计划”。由此看来，规划的目的在于能让美国从欧洲事务的泥潭中全身而退。^[2]德国纳粹表现出的极端主义更让美国人在涉足欧洲时顾虑重重。纳粹不但奉行军事侵略，对于思想的钳制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933年5月10日，纳粹学生在柏林大学前焚烧25000册“在纳粹国家不受欢迎”的书籍，“让自由在第三帝国面前化为灰烬”。这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烧孔子论著如出一辙。但同样面对经济萧条导致的困境，美国总统胡佛却宣布，“美国最为紧迫的需求是一名伟大的诗人”。这与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文化泾渭分明，体现出“自由方式”与“奴役方式”的区别。^[3]二战结束，联合国应运而生，美国不仅不可逆转地与欧洲紧密相连，而且还得置身于联合国的有关规章之下。反对之声随之而起。共和党众议员杰西·萨姆纳（Jesse Sumner）向全国妇女共和党俱乐部发表演讲，指责总统如同孔子哲学一样，“既糊涂慌乱，又让人费解”。美国总统刚与英国签订协定，承诺将美国的商品价格和配额置于世界贸易体系的监管之下。但依萨姆纳之见，美国只需给欧洲和全世界树立“美国政府的良好典范”即可。^[4]

论及欧洲的内部关系，孔子之名依然能够画龙点睛，折射出欧洲国家相互争斗、相互制约的局面。《华尔街日报》将《旧唐书·魏徵传》中的如下名句误作孔子所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所以，以人类历史为参照，欧

[1] “Novelist Says True Peace Lies in Self,” *Washington Post*, May 7, 1939: 12; “Military Welcomes Decried by Women’s League for Peac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8, 1939: 3.

[2] Carl J. Friedrich, “Preliminaries to the Next Peac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3, 1940: WM2.

[3] “America: Slave or Fre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 12, 1941: 3.

[4] “Deal to Return OPA Is Charged by Rep. Sumner,” *Chicago Tribune*, Oct. 27, 1946: 9.

洲的“基本模式”一目了然。^[1] 孔子本人就是美国人观察欧洲时众多历史参照之一。德国是欧洲格局发生巨变的主要根源，自身也历经剧烈蜕变。在一战中惨遭失败的德国，被迫割让濒临波罗的海的但泽港。但泽“自由市”的德国居民如同“伤心欲绝的寡妇一样享受着自由”。德裔居民与不断迁入的波兰人发生冲突在所难免。面对复杂局面，国际联盟派遣的高级专员“必须融合所罗门、约伯和孔子的所有广为人知的品质，外加能够区分事实、半真实和绝非事实的非凡能力”。^[2] 为纳粹侵略寻找理论支撑的卡尔·豪斯霍弗尔 (Karl Haushofer) 将国家生存空间理论引向极端，为德国发动二战制造舆论。在美国报纸看来，这无异于孔子“大同”思想的现代翻版。^[3] 此处对于孔子思想和平色彩的忽略在另外一处得到了弥补。纳粹既违背基督教义，也拒绝了 2500 年来的人类理想。这其中就包括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经典论述。^[4] 从孔子的角度，德国制造的混乱局面及其扩张本质暴露无遗。

同时，孔子还被用来形象地刻画欧洲国家的文化特性。英法之间的国民性格差异是经久不衰的话题。英国人注重公共精神，法国人则在私人生活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根据孔子的道德标准，一个人为了照顾年迈父亲，甚至可以欺骗国家，“赞同此说的法国人可能不止一个”。^[5] 在音乐成就方面，英国远不如德国，其歌剧尤其难望其他国家项背。但英国人恰恰对音乐极为热衷。1928 年，德国歌剧在伦敦巡演三周，掀起阵阵热潮。伦敦人本着“孔子的心态”，蜂拥而至。孔子“期望甚少，因此从不失望”。^[6] 而在荷兰，来自欧美各国的人们

[1] Thomas F. Woodlock, "Thinking It Over,"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5, 1941: 4.

[2] William C. White, "The Most Unhappy City in Europe," *New York Times*, Jul. 24, 1932: SM6. 所罗门是古代以色列国王，以智慧著称，约伯是圣经人物，意志坚韧。

[3] Paul Winkler, "Haushofer's Influence," *Washington Post*, Mar. 24, 1944: 10.

[4] "Nazism vs. Humanity," *New York Times*, Dec. 2, 1941: 22.

[5] Andre Siegfried, "England and France: A Vivid Contrast," *New York Times*, Jul. 24, 1932: SM3.

[6] "Wagner in London," *New York Times*, Jun. 10, 1928: 18.

成立了国际基金会，旨在推广荷兰 17 世纪哲学家斯宾诺莎 (Spinoza) 的思想。斯宾诺莎的姓名有多种拼写方式，如同东方哲学家孔子一样。^[1] 30 年代的西班牙身处多事之秋，左翼和右翼争权夺利，苏联和纳粹德国伺机渗透。为保存西班牙文化的独立特性，马德里大学教授、后来担任西班牙共和国总理的胡安·内格林 (Juan Negrin) 作出了不懈努力。他把马德里大学城打造成捍卫西班牙文化的堡垒。孔子笔下的君子品性在其身上得到完美体现。^[2]

欧洲与美国以外地区的接触也在报纸引用孔子加以评论之列。孔子的出现通常能使字里行间充满诙谐气氛而又不失洞察力。20 世纪 20 年代，世界主要列强为削减军舰吨位煞费苦心。1921—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虽然制定了各大国之间的吨位比例，却并未让野心勃勃的日本满意。于是，1927 年，英国联合美国，邀请日本在日内瓦举行三方会谈，无奈分歧依旧。孔子据称说过：“没有角的三角船的确是一条奇怪的船。”会谈陷入困境的症结在于，与会三方完全没有找准船角的位置，即尚未看清问题的实质。^[3] 苏联自然资源丰富，但缺乏购买外国商品必须的外汇，被迫使用易货贸易的方式。此举遭到视其为异类的西欧和北美抵制。加拿大铝业有限公司与苏联签订的以铝线换原油的合同终于打破这一格局，“毕竟，正如孔子所说，如果一个字概括人类的生活规则的话，那就是‘恕’，即相互依存和互为对等。”^[4]

欧洲对于其他地区的殖民和歧视是报纸借用孔子之名予以点评的又一类事例。国家和种族自豪感普遍存在。这就要求造访他国的白人，不要藐视包括孔子在内的文化圣人。^[5] 欧美的新教与天主教徒，

[1] “Shrine Will Be Made of Old Spinoza Home,” *New York Times*, Dec. 5, 1926: XX6.

[2] H. B. Elliston, “This Changing Worl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5, 1939: 1.

[3] Wythe Williams, “Japan Near Accord with Our Navy Plan,” *New York Times*, Jun. 23, 1927: 1.

[4] “Trade without Mone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20, 1932: 14.

[5] John Carter, “Little Brown Men Carry Britain’s Flag,” *New York Times*, Aug. 30, 1925: SM22.

应该和犹太人、佛教及儒教信徒携手，阻止战争的爆发。^[1]大英帝国的臣民尤其应该注意，因为非欧洲种族占据帝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孔子的追随者”位列其中。^[2]林语堂也曾撰文，讽刺英国人在殖民地故作姿态，不可一世。正因为英国人故意卖弄绅士风度，林语堂揶揄道，“我敢肯定，孔子本人都会发现，英国是一个理想的国度”。^[3]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列强争夺殖民地利益而起。笃信孔子和平教诲的中国不属挑起事端者之类，因而与俄国一道，被某位读者称为“地球上拥有最高文明程度的两个国家”。^[4]

在美国的报纸上，孔子见证了欧洲世界地位的没落和内部关系的混乱不堪。美国一跃成为欧洲的拯救者。正因为相对于欧洲的“高尚”和“优越”，美国的扩张行为便是和平举动，具有了不言而喻的正当性。比如，美国一直视拉丁美洲为后院，向拉美进行文化渗透似乎名正言顺。1940年夏，美国青年管弦乐队开始在拉美巡回演出。根据孔子关于音乐可以让人陶冶情操、谙悉礼仪、减少冲突的论断，报纸宣布，乐队是“文化和善意的使者”，也是“和平的朝拜者”。^[5]

四、孔子：世界走出困局的引导者

面对两次大战造就的纷繁杂乱的世界局势，美国报纸上的有识之士不断反思，探寻能让人类走出困境的途径。孔子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他提出的和谐平等、相互体恤为特点的人际交往准则，以其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引起美国报纸的关注。撰文者为这种准则注入新的元素，使其成为国家与民族之间理想的交往之道。有鉴于此，孔子与摩

[1] “92% in Student Poll Vote for Arms Cut,” *New York Times*, Dec. 31, 1931: 4.

[2] “Britain’s Pageant of a Mighty Empire,” *New York Times*, May 9, 1937: SM1.

[3] “Among the Magazines,” *Washington Post*, Jul. 25, 1937: B9.

[4] “Will Rogers Hands Praise to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Times*, Aug. 12, 1929: 15.

[5] Clarissa Lorenz, “Youthful Audiences Proving Discriminating and Eager Their Taste Level Raising,”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 23, 1940: 5.

西、耶稣以及美国的立国之父、林肯和威尔逊等人相提并论，共称为“历史上的和平缔造者”。他们“引导我们不断地追寻和平、睿智和共同的福祉”。^[1]英国戏剧家萧伯纳以艺术的形式，为人类虚拟了一个没有利益冲突、唯有和谐共存的理想国度。孔子担任国务秘书一职，可见孔子思想对于世界和平的意义。^[2]也有人将《老子》的名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误为孔子所说，呼吁人们学习孔子，从自身和现在入手，开创世界和平局面。^[3]

孔子及其制定的人类交往之道，首先映衬出现代世界的杂乱无章和尔虞我诈。众多撰文者为此感到忧心忡忡。人类社会的“大多数选择了自私、自利、自顾和自毁之路”，唯有孔子和耶稣等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4]据说，孔子在弥留之际，曾让人把自己抬到屋门前，最后看一眼他“为之哭泣”的世界。二十多个世纪已然过去，人们仍在为无数个理由相互为战。目睹此景，孔子“能够擦干自己的泪水吗？”世界必须警醒，否则会如孔子所言，“人无近忧，必有远虑”（《论语·卫灵公》）。^[5]国家之间战乱不断，与孔子等“和平缔造者”的理想背道而驰。^[6]人类已经来到一个令包括孔子在内的“自古以来所有杰出导师和预言家齐声谴责”的时代。在他们眼里，“我们贪婪成性的文明，绝对让人反感而又污浊不堪”。^[7]简言之，人类之间的杀戮与孔子和耶稣的教导完全相悖，理应彻底抛弃。^[8]

人类不仅为战乱困扰，也因为固执己见而让偏见泛滥，这在欧美

[1] “Another ‘Ex-Marine’ Joins the Fray,” *Washington Post*, Jul. 8, 1938: X6.

[2] “Shaw Wants Man to Live 1 000 Years,” *New York Times*, Jun. 23, 1921: 8.

[3] Anne Holliday Webb, “Memo on Tomorrow,”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29, 1943: 11.

[4] “A Blast from ‘Bophocles,’” *Washington Post*, Oct. 11, 1935: 8.

[5] Robert McElroy, “The International Mind Speaks,” *New York Times*, Jun. 28, 1925: SM1, 22.

[6] Leonid J. Strakhovsky, “Sir John Simon’s Visit to Berlin Significant,” *Washington Post*, Mar. 31, 1935: B4.

[7] Raymond B. Fosdick, “The New Year: A Tremendous Challenge,” *New York Times*, Dec. 27, 1931: 4.

[8] P. L. Prattis, “The Horizon,” *Pittsburgh Courier*, Nov. 6, 1943: 13.

中心论里面尤为明显。孔子是偏见的受害者，亲身经历着杂乱无章的世界秩序。各个国家坚守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拒绝变通，衍生很多误解。“按照孔子的说法”，这是“以古老的方式走路”。^[1]国家之间的分裂和种族歧视俯拾即是。一名美国传教士以其亲眼所见，描述了在长江的轮船上，英国船长如何鄙视中国人。传教士希望，基督教的拓展不能建立在唾弃孔子信仰的基础之上，“一个种族的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另一种族为代价”。^[2]美国人自己也被“狭隘与偏执精神”所笼罩。他们“把自己的道德规范奉若神明”，却在不知道菩萨和孔子是谁或者有何思想的前提下对其加以抨击”。^[3]在1938年的世界博览会上，“美国的精神领袖”提议兴建宗教神殿，但只想涵盖基督教和犹太教。他们完全忽视15亿持其他信仰者的存在，这其中就包括孔子的所谓信徒。^[4]有作者以一则孔子轶事，形象地描绘了导致歧视的偏执思维方式。据称，看着花匠来回取水浇花，孔子建议使用水泵，以节省时间。花匠却不为所动，声称某智者曾经告诉自己，如果使用机械，自己的心也会变成机器。作者引申道，这一事例反映出人类“文明面临的问题”：缺乏灵活性和宽容之心。^[5]

既然世界局势如此不尽如人意，是否存在解决之道呢？美国报纸的答案是肯定的。途径之一就是遵循孔子教诲，因为人类在精神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换言之，尽管外在形式纷繁各异，孔子思想与所有宗教的本质是相通的。^[6]人类的融合能够而且只能通过精神而非政治的方式得以实现。^[7]具体而言，美国报纸着力强调了孔子思想在如下

[1] “Knowledge of ‘Ro’ Would Unite World,” *Washington Post*, Jun. 29, 1923: 4.

[2] “Woman Preacher Assails Race Bias,” *New York Times*, Oct. 19, 1942: 26.

[3] “Roerich Museum Lays Cornerstone,” *New York Times*, Mar. 25, 1929: 31.

[4] “Religion at the Fair,” *New York Times*, Jun. 3, 1938: 20.

[5] C. R. Ashbee,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Reveals the Soul of Asia,” *Washington Post*, Jun. 14, 1936: AA5.

[6] Manlio Barilli, “D’Annunzio Welcomes a War Comrade,” *New York Times*, Jun. 20, 1926: 20.

[7] “Less Talk, More Cooperation Needed in Indian Problem,” *New York Times*, Mar. 8, 1942: E8.

几个方面对于人类和谐共存的重大意义。

首当其冲者当属孔子关于人类应该相互体恤、互为兄弟的思想。一战刚刚结束，身为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主席的威廉·巴克利·帕森斯 (William Barclay Parsons) 将军敏锐地意识到，另外一场战争的爆发并不遥远。战争的根源就在于世界上“大多数人自私并以阶级区分异己”。为根除隐患，人们必须切实遵循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1] 有此思想为指导，“真正的和平蓝图极为简单”。^[2] 孔子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更是让报纸奉为金科玉律。正因为人类之间本该具有的兄弟情谊，不论是西方青年或是东方青年，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目标：和平。^[3] 如果人们都能遵照孔子的教诲，辅之以信念和勇气，“整个人类就会迎来更加富足的生活”，否则就会面临灭顶之灾。^[4] 国家之间的过度防范应该摒弃。例如在经济领域，关税壁垒便与孔子的要求相去甚远。^[5] 但新近兴起的航空热潮却被视为实现孔子天下大同理想的有益尝试，“取得了近年来通常意义上的和平会议无法取得的效果”。^[6]

孔子的其他思想在处理国家间误解频生的问题上同样大有用武之地。瑞士的日内瓦是国际谈判最为频繁的地点之一。但劳神费时的谈判似乎很难让国家之间停止相互猜忌。如此困境的根源在于，谈判者没有学会理解对方的思维模式。在没有进行“思想翻译”的前提下，谈判桌上的语言翻译纯属徒劳。孔子曾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传递智慧和美德的翻译才是国际谈判所急需的。^[7] 人类社会的和谐不仅需要思想的交流，也需要品德高尚之人。孔子关于君子的论述就高尚之人作了明确界定。比如，“君

[1] "March of Nations on Columbia Green," *New York Times*, Jun. 7, 1923: 14.

[2] S. W. Garlington, "Newsettes,"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May 12, 1945: A11.

[3] Charlotte Kellogg, "Youth's Crusade for Peace," *Atlanta Constitution*, Jun. 2, 1929: G3.

[4] "Te Deum," *Washington Post*, Aug. 15, 1945: 8.

[5] "Light upon the Path,"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10, 1943: 20.

[6] "Says Fliers' Feats Weld the Nations," *New York Times*, Sept. 8, 1930: 19.

[7] Fred Hogue, "A Modern Tower of Babel," *Los Angeles Times*, Jan. 28, 1928: A4.

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君子更有“九思”之说:“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世界恰恰就需要”处事公正、厉行自省的“君子”。^[1]孔子“修身齐家”、“齐家治国”、“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让一名黑人作者深受启发。该作者认为,忙碌穿梭的外交官、好高骛远的国际法典、频繁举行的和平会议都未能给人类带来和平。孔子提出从个人修养入手推动世界和平,不失为“值得一试的解决办法”。^[2]

某些人甚至从孔子的音乐思想中找到了确保世界和平的灵感,宣称世界政要不妨提高音乐修养,各国也应在民众中普及音乐,以让人们的心灵趋于平和。孔子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所以,目睹愈来愈多有音乐爱好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步入世界和各国政坛,《华盛顿邮报》的一位作者大喜过望。他信心满怀地宣称,喜爱音乐的政治家将“很快带领全世界摆脱经济和政治纷争引发的混乱,步入和平繁荣、优美和谐的时代”。^[3]孔子还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同上)。于是,有人对伊利诺伊州音乐营被勒令停止广播一事深感不满。至少来自40个州的高中生在音乐营受训。抗议者表示,停止广播的要求不仅打击美国的文化与思想发展,而且根据孔子之言,还将危害世界和平。^[4]孔子的真知灼见让佐治亚州的H. F. 费希尔(H. F. Fisher)热情高涨。他计划组建一支国际交响乐队,到各国巡演,“促进世界和平与友谊”。^[5]

[1] “Confucius Defines a Gentlema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1, 1944: 10.

[2] Ruby Weaver Arnold, “As a Woman Sees It,” *Atlanta Daily World*, Jul. 27, 1947: 4.

[3] Charles W. Duke, “Baton Mighty as the Gavel,” *Washington Post*, Apr. 16, 1933: SM3.

[4] “Czar Petrillo,” *Chicago Tribune*, Jul. 23, 1942: 12.

[5] “White Southerner Hails Robeson as Fighter for Justice,” *Pittsburgh Courier*, Nov. 5, 1949: 16.

第十四章

孔子在美国社会的积极作用

孔子善于说教，为后世留下恒久适用的道德箴言。其语录蕴含的道德思想是中国数千年来人格教育的核心内容。随着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儒家经典传入欧洲。孔子学说又随欧洲殖民者传到北美，后成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虽然华人劳工的涌入以及随之而起的排华浪潮导致孔子形象急剧下降，孔子的伦理道德观得到的评价一贯以正面居多，这在 20 世纪前半期继续如此。

一、孔子学说在美国的实用价值

美国社会以西方文化圣人的言行为人格典范，诸如耶稣、苏格拉底、培根等人的伦理道德言论时常被人们所引用和遵循。孔子同样长于循循善诱，塑造完美人格。孔子注重从日常生活中提炼精辟的为人原则，耶稣等人则更乐于从宗教角度规范人格塑造过程。所以，孔子学说在美国文化中可以发挥补充和借鉴作用。伦理道德的引导性舆论显然注意到了孔子学说的这层意义，褒扬之处多矣。

孔子主要以道德家的身份出现在美国人面前，他确保社会道德水准的能力得到美国报纸一定程度的认可。孔子思想“致力于改善人类

的生存状况”。孔子制定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广受中国人尊崇,“无疑促进了他们的道德发展”。^[1] 惊叹于中国上层社会拥有“极高……道德水准”的美国人甚至认为,因为“极其严格地遵循崇高的孔子伦理道德标准”,中国社会上层的“贪污受贿和一夫多妻现象非常罕见”。^[2] 20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依然遵循和尊重孔子的道德思想。^[3] 孔子制定的生活法则“今天仍然与两千年以前同样正确和适用”。^[4] 哪里的人们热爱和实践孔子和耶稣从不同角度阐述的“黄金准则”,哪里的“自私荒漠便会逐渐结出和平的果实”。^[5] 世界要取得进步,唯有遵从孔子和耶稣的教诲。^[6] 至于那些因为听不懂中文而诋毁中国的美国人,孔子的道德原则将让他们改弦更张。^[7] 事实上,的确有人尽管不识汉字,却由于折服于孔子的道德学说而钟爱中国文字的书写风格。^[8]

与诸如此类的总体评价相应,报纸列举了具体事例,证明孔子道德原则可圈可点。例如,孔子极为强调的和谐思想不仅避免了中国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分崩离析,中国人也因此“在人际交往思想方面作出了尤其宝贵的社会贡献”。^[9] 孔子视家庭为社会的核心,中国人因而非常看重家族声誉。为解释华人少年极低的犯罪率,纽约的儿童法庭审判权与少年犯罪联合立法委员会(Joint Legislative Committee on Children's Court Jurisdiction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特地引用中国人源自孔子的家庭荣誉感。据称,在1930年之后的八年之内,

[1] Judge Jesse Holdom, "What Religion Has Done for the World," *Chicago Tribune*, May 22, 1927: 10.

[2] "Calls Rise of China Greatest in World," *New York Times*, Oct. 18, 1925: W22.

[3] "Chicago Chinese Remember Homeland," *Chicago Defender*, Oct. 20, 1928: 4.

[4] "Backward Lookers," *Pittsburgh Courier*, Oct. 29, 1949: 14.

[5] Harriet Chalmers Morgan, "The Golden Rule," *Los Angeles Times*, Mar. 11, 1934: 12.

[6] "German Apostle of Hope," *New York Times*, Dec. 14, 1923: 10.

[7] John Kendrick Bangs, "Munchausen and John Stuart Mill Agree," *Boston Globe*, Oct. 10, 1920: SM13.

[8] "An Adventure in Chirography—Chinese Styl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9, 1934: 14.

[9] "The Harmony of Superior Me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11, 1930: 9.

纽约地区的3000名华人仅有一起少年犯罪。^[1]另一篇文章将《三字经》名句“子不教，父之过”作为孔子语录，说明家庭教育是避免华人青少年犯罪的屏障。作者预言，报告的出炉必将改变纽约中国城“阴暗邪恶”的旅游形象。^[2]中国人还是“世界上最为节制的种族之一”，因为孔子编撰的《书经》告诫人们切勿酗酒误事。纽约的法庭记录显示，当地华人未有因为酗酒而获罪者。直到1939年，一名洗衣工酗酒入监，记录方被打破。^[3]由此而来，中国人为美国遏制犯罪和促进社会和谐树立了某种典范。有美国报纸呼吁，应对年轻人开展“恰当的”思想训练，尤其要强调伦理道德和他人的权利。让中国人成为“世界最诚实、最守法民族”的孔子古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4]

即便在西方引以为豪的制度和技术领域，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的先见之明有时也跃然纸上。民主是美欧自认为奉献给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之一。然而，数篇文章相信，孔子是倡导民主理念的先驱。造福于民的执政原则“当然属于美国，但同样属于中国”。证据就是“孔子最具天赋的弟子孟子”在公元前4世纪的如下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5]孔子本人不仅影响了中国和东方哲学，并且通过影响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和美国立国之父杰斐逊等人，催生了欧美近代的思想革命，“与现代民主的所有优点融为一体”。孔子捍卫人民不受暴君之害，他因此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6]孔子“从未容忍或者提倡独裁统治”。^[7]诚然，由于所处时代的限制，孔子没有提出投票选举的办法。但他要求，官员应该是选自

[1] “Ethics of Chinese Aid Children Here,” *New York Times*, Jul. 7, 1938: 21.

[2] “Chinatown’s ‘Face,’” *New York Times*, Jul. 10, 1938: 52.

[3] “Distinctly the Exception,” *New York Times*, Sept. 11, 1939: 16.

[4] J. A. Rogers, “Rogers Says,” *Pittsburgh Courier*, Jul. 13, 1946: 6.

[5] “America and Chin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 3, 1931: 7.

[6] “Confucius Called Great Democrat,” *Los Angeles Times*, Jun. 26, 1949: D7; H. G. Creel, “The Master Who Lighted the Way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Aug. 28, 1949: SM18.

[7] Lee Grove, “Notes on the Margin,” *Washington Post*, Feb. 27, 1949: B7.

全体民众的德才兼备者。受其影响，“一个农民——通常在理论上，有时在现实中——能够成为首相”。^[1]在中国历史上被误认为思想保守的孔子，“实则民主思想的倡导者”。^[2]更为激进的观点声称，美国人“没有政治意识”，应该效仿孔子影响之下的古代中国。^[3]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依然可以得益于孔子制定的道德体系。维护社会秩序、提高民众修养时，孔子的道德原则乃弥足珍贵的参照体系和促进手段。与基督教相比，即使没有优越之处，相提并论未尝不可。而在民主思想方面，孔子是当之无愧的倡导先驱。

孔子的人格魅力及其处世思想的精当是舆论不厌提及的关键内容之一。孔子思想非但没有过时之虞，反而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特别的紧迫性”。孔子的一生充满“人性而又仁爱的故事”，如果现代社会的人们具备孔子的所有特征和美德，世界将变成“和平与幸福劳作之所”。孔子是一个“没有怨恨也无绝望之感的虔诚的宗教徒”。但孔子学说与其说是神学，还不如说是“一套个人行为规范，一种揭示生活本原的哲学”。^[4]孔子写下了“明智哲学和朴实智慧兼而有之的格言”。生于公元前551年的孔子，其思想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之需，“令人惊讶”。^[5]世间万事几乎都能找到适用的孔子语录。^[6]有两种类型的人互成对立之势：一是安静勤劳、诚实节约、志存高远者；另一类则是夸夸其谈、漂浮不定、目光短浅之人。孰优孰劣，孔子的古训早已一语道破：“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中庸》第三十三章）^[7]孔子的仁爱思想也让很多美国人惊叹不已。在此面前，基督教徒唯一能做的就是加上对上帝的爱，因为其他领域都已

[1] “Confucian Lore,” *New York Times*, Sept. 11, 1949: SM8.

[2] “Confucius Revealed as a True Democrat,” *Washington Post*, Jul. 10, 1949: B6.

[3] “America’s Future,” *Los Angeles Times*, Apr. 16, 1928: A4.

[4] James O’Donnell Bennett, “Best Sellers of the Ages,” *Chicago Tribune*, Nov. 19, 1922: E24.

[5] Elisabeth E. Poe, “Inheritance, the Censors and Comment,” *Washington Post*, May 19, 1929: SM12.

[6] “Confucius, Anew,”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 19, 1938: 18.

[7] “After Forty—What?,” *Pittsburgh Courier*, Nov. 13, 1937: 10.

被孔子的仁爱学说所涵盖。^[1] 孔子勉励人们潜心道德修养的名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出现在《芝加哥论坛报》的知识问答中，报纸要求读者在以下四个答案中进行选择：“岁月带来智慧；逆境见真情；我们在冬天需要温暖；白雪比绿色更好”。^[2] 坚强的意志也是孔子不断提及而美国人无时不需的品德，世界“崇拜”那些虽然身处逆境但有能力和意志重新站立起来的人。^[3] 《亚特兰大宪法报》在问答栏目里将孔子思想概括为“人性、正直、得体、智慧、真理”，这些美德正是人格塑造的普遍目标。^[4]

由于孔子的巨大影响，某些蕴含深意的人生格言尽管不是孔子所言，人们还是习惯于认为出自孔子之口。比如，“言，心声也”本是汉代扬雄所著《法言·问神》中的名句，但仍然被《芝加哥论坛报》引为孔子语录，鼓励人们注重内心培养，言行一致。^[5] 为说明人生道理，甚至存在杜撰孔子言论的现象。试图说服人们做事脚踏实地的读者，在给《纽约时报》的信中宣称，孔子某日与弟子散步时说道：“世界上最为困难的事情是，在黑夜里寻找一只并不存在的黑猫。”^[6]

孔子之所以能受到人格塑造舆论的重视，另外一大原因是，他与耶稣等西方文化圣人同属人类文明进程的引导者。舆论话语中孔子与西方圣人相提并论的现象屡见不鲜。孔子与耶稣，侧重点不同，但思想的本质相通。《华盛顿邮报》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声称，如果阅读诸如孔子等“宗教领袖的基本原则”，人们“必须承认”，孔子思想“与基督教原则极其相似”。^[7] 只有具备极大勇气的人才会认为，西方文明产生过比孔子更加高明的人。^[8] 即将获得北卡罗来纳大学哲学博

[1] “The Universal Love,” *Atlanta Constitution*, Feb. 5, 1928: D6.

[2] George W. Crane, “Test Your Horse Sense,” *Chicago Tribune*, Nov. 3, 1943: 18.

[3] “Sermonette,” *Pittsburgh Courier*, Jan. 12, 1935: A10.

[4] “Questions and Answers,” *Atlanta Constitution*, May 15, 1924: 10.

[5] Fanny Butcher, “The Literary Spotlight,” *Chicago Tribune*, Feb. 25, 1945: E12.

[6] Gideon A. Lyon, “Maybe It Was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May 16, 1943: E13.

[7] “Here’s Where We Let Our Readers Talk,” *Washington Post*, Sept. 15, 1923: 6.

[8] Benjamin Harrow, “Simian Skeleton in the Modern Gentleman’s Closet,” *New York Times*, Feb. 18, 1923: BR9.

士学位的中国陈姓留学生同样表示,“孔子和圣经在很多问题上见解一致”。^[1]甚至有人认为,尽管孔子和基督都论及人的义务、责任和正义,但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更接近真理”。^[2]另一文章也相信,就真理和正义原则而言,白人种族与孔子相比并无任何优势。^[3]孔子是人类道德的典范,耶稣则是精神理想的化身。^[4]耶稣在圣经中以寥寥数语道出人类需要知道的一切宗教、伦理和道德原则,孔子的“睿智建议”毫不逊色。^[5]报纸的知识问答也时常以孔子与耶稣的比较为题。例如,“孔子生活在耶稣之前还是之后,或者是同时代?”^[6]再如,“是孔子率先提出的黄金准则吗?”答案是:孔子的确在耶稣之前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原则,差别只在于形式。^[7]著名美国华裔果树专家吕金功以自己的行动印证着孔子思想与基督教的相互通融性。他既崇尚孔子箴言,亦对基督教倾注极大热情。他以特有的方式展现了“东方人的融合”:在其农场的柑橘树下,祭坛和“祈祷花园”兼而有之。^[8]

与人格思想领域的其他名人,孔子更能同日而语。如果要强调某条道理无可辩驳,有人会辩白道,这就“如同是孔子或爱默生亲口所言”。爱默生写下过无数涉及个人修养的文字,孔子与其同时出现,相互印证着人格塑造过程引导者的身份。^[9]夏威夷大学的学生投票选出20名最伟大的世界名人,结果苏格拉底荣登榜首,孔子以一票之

[1] “Chinese Cites Religious Link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2, 1940: 3.

[2] William T. Ellis, “Sunday-School Lesson,” *Los Angeles Times*, May 1, 1932: B9.

[3] “Can Humanity Be Humanized?,”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Apr. 18, 1928: 11.

[4] “Saving Grace of Faith Is Sermon’s Subject,” *Los Angeles Times*, Oct. 23, 1922: II3.

[5] Harry Carr, “The Lancer,” *Los Angeles Times*, Jul. 17, 1925: A1.

[6] “Test Your Facts,” *Chicago Tribune*, Mar. 14, 1942: 22.

[7] “Questions and Answers,” *Atlanta Constitution*, Jun. 8, 1923: 8.

[8] “Lue Gim Gong Honored by Savants,” *New York Times*, Jun. 21, 1925: XX18. 吕金功, 祖籍广东台山, 于1868年到美国, 年仅十岁, 毕生致力于园艺事业, 培植出了抗霜冻并可长久保鲜的橙子。

[9] Stanley Walker, “Ever Scared?,” *Los Angeles Times*, Jul. 24, 1938: 12.

差位列第二。^[1]甚至有理论宣称,包括孔子在内的文明圣人出生时其父亲的年龄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将同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佼佼者。高龄父亲让他们的后代出类拔萃。伏尔泰出生时其父为 65 岁,富兰克林诞生时父亲 57 岁,孔子呱呱落地时,其父亲年已 45 岁。^[2]另一类似的说法则更加细致:31 岁以下的父亲所生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士兵,31 ~ 40 岁的父亲生育的后代成为艺术家的比例很高,出生时父亲年龄在 41 ~ 50 岁之间者可能成为政治家,51 岁以上的父亲所生的孩子有望成为如孔子、培根和富兰克林等人一样、在人格修养和道德体系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哲学家。^[3]显然,关于孔子出生时其父亲的年龄,美国人并无定论,他们只是根据需要而将孔子置于不同的划分范围。纵然如此,孔子与西方文化名人相互比肩,却是上述舆论从不同角度得出的共同结论。这样,孔子的道德学说既是西方体系的补充,孔子其人又与西方社会伦理的塑造者不分伯仲,美国社会舆论的引领者便可呼吁将孔子思想纳入人格教育的范畴之中。

二、引入孔子的呼声

作为社会性存在,人需要具备美德,才能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这是美国人格教育引导舆论着力强调的问题。舆论引导者积极呼吁重视孔子,就是要强化美德的重要性,促使人们加大行动的力度。

理想人格所必需的品质均能在孔子那里找到积极倡导之声。孔子有关美德的言论比比皆是。提倡美德者借机发挥道,“正如孔子所说:‘美德是坚固的堤坝,能够保护秧苗不被愚蠢之举冲毁’”,鼓励年轻人注重美德培养。^[4]如果美德配以得体的行为举止,人格便可光

[1] “Pepper and Salt,” *Wall Street Journal*, Jan. 11, 1932: 8.

[2] “Interesting Genetic Study,” *Los Angeles Times*, Nov. 4, 1932: A4.

[3] “Your Chances of Becoming Great,” *Washington Post*, Feb. 22, 1925: SM2.

[4] Henry C. Rowland, “Cast into Eden,” *Atlanta Daily World*, Oct. 18, 1935: 6.

彩照人。不论男女，只要谦恭有礼，即使没有迷人的外表，照样能让人眼前一亮。孔子就无法容忍美德与谦逊的分离。他认为，唯有两者的结合才能促成道德的升华。^[1] 遵循孔子教诲、历经如此升华的道德“见证着温馨的无私精神”，是“无人应该鄙视的高尚梦想”。^[2] 很多人矫揉造作，不注重个人修养，未能遵守孔子关于君子应该“崇德”之说。^[3]

所谓美德，包括很多具体品质。例如，人不能受名利驱使，而应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我们的老朋友孔子”说过，我们要因为真理本身而坚持真理，不可贪图“某种上天回报”。^[4] 敢于进取是个人必须具备的另外一大品质。孔子据信曾说，“人不是在山巅行走，但会被小障碍绊倒”。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帆风顺的，不畏艰险、立即行动方为“你在世上取得进步的唯一途径”。^[5] 假设如此，个人前景会迥然有异。依孔子之见，“那些提前规划者可能（因结果不同而）大吃一惊”。^[6] 决断能力标志着个人心智的成熟，世界因此少了一个盲目跟从者。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遵照孔子清晰判断的劝导。^[7] 相互理解与宽容同样是令人钦佩的个人品质。然而，匹兹堡市黑人俱乐部的所作所为却偏离这一轨道，引起具有正义感的黑人不满。被白人俱乐部拒之门外的黑人却拒绝了一名与黑人女性结婚的华人男子的加入申请。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子对此事“感到震惊”。欲让白人消除种族隔离，黑人自己必须身体力行。^[8] 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之一，诚信得到了孔子和爱默生等人的极力推崇。孔子有“主

[1] Antoinette Donnelly, "Beauty Plus," *Washington Post*, Apr. 8, 1923: 7.

[2] "Edith Johnson's Happiness Chat," *Boston Globe*, Dec. 24, 1922: 44.

[3] "Sophisticated Age Called Contributor to Sinful Life," *Los Angeles Times*, May 2, 1949: A8.

[4] Harry Carr, "The Lancer," *Los Angeles Times*, Jan. 3, 1927: A1.

[5] "How Women Can Make Money," *Washington Post*, Apr. 6, 1930: 14.

[6] Ruth Mac Kay, "White Collar Girl," *Chicago Tribune*, Apr. 6, 1945: 19.

[7] Robert Quillen, "When You Pledge Yourself to a Leader, You Must Surrender the Right to Think," *Washington Post*, Sept. 20, 1932: 6.

[8] P. L. Prattis, "The Horizon," *Pittsburgh Courier*, Jul. 20, 1946: 7.

忠信”(《论语·学而》)之说,爱默生则告诉人们:“极尽真诚是才能和性格的唯一基础”。在写信时,信件的末尾写上“你的真诚的……”胜过任何华丽辞藻。^[1]同为美德的自我审视对于男性尤其适用。当生活出现问题时,他们不应责怪女性,而是从自身寻找原因。孔子有言在先:“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中庸》第十四章),意思是君子射箭未中靶心,会从自身寻找原因。男女相处道理相通。^[2]谨言慎行也不失为一种美德。很多人唯恐自己面露愚钝之相,通常会言语仓促,结论草率。此类人等显然不具备孔子反复强调的“延缓判断的智慧”,比如“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和“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等。^[3]

上述美德人所共知,但要内化为个体人格的一部分,必须付出努力方能奏效。引导舆论提出多种策略,供希望提高修养者参考采纳。很多策略或者源于孔子,或者从孔子言行引申而来。效仿他人即是策略之一。孔子告诫人们:“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4]不仅如此,孔子还鼓励人们向能力在己之下者求教,此为效仿他人的另一途径。在孔子那里,修养的一大定义就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5]时刻给自己施加压力保持一定程度的紧张状态不失为又一策略。孔子就曾满怀焦虑,结果成为做人典范。这不禁让人思忖:“难道在世界历史的早些时候,忧虑倾向曾被作为区分伟人的标准?”^[6]报纸转述孔子的话说,人生不足百年,但忧虑之多,似乎要活千年。^[7]甚至节制饮食也作为修身养性的策略之一被郑重提出。孔子和耶稣等人都制定了生活规则,并且不约而同地指出,

[1] “Sincerely Your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21, 1948: 12.

[2] “Blaming Women Has Gone Too Far!,” *Los Angeles Times*, Aug. 1, 1949: A4.

[3] Glenn Frank, “The Poison of Cocksurenness,” *Washington Post*, Sept. 7, 1926: 6.

[4] “Queries and Answers,” *New York Times*, Jun. 12, 1932: BR19.

[5] “Laud Old Family Doctor,” *New York Times*, Mar. 11, 1925: 10.

[6] Joseph Wood Krutch, “Worrying, Raised to a Fine Art,” *New York Times*, Sept. 5, 1948: BR12.

[7] “On the Side with E. V. Durling,” *Los Angeles Times*, Apr. 12, 1938: A1.

“严格控制饮食”对于净化心灵是必须的。这是基于“正确的智慧和基本的悟性”得出的结论。^[1]

凡此种种,都是人们在提升人格时不妨一试的手段。但相比之下,教育才是更加持久、更有效果的人格培养途径。以阅读为基础的自我教育为多人所推崇。包括孔子著作在内的经典书籍可以让人“近距离观察中国、印度、非洲、欧洲和美国的受过良好教养者”。这些“伟大的朋友”会在轻松愉快中给人以启迪。^[2]孔子的《论语》位居“少数几本伟大著作”之列,值得反复阅读领会,对于那些肤浅的书籍则应避而远之。^[3]读者邀请某位著名的报纸专栏作家推荐几本人格修养著作。作家毫不犹豫地提到了林肯和孔子,认为他们有着高山仰止的“能力和人品”。^[4]有人经济拮据,连旧书都无法购买,但仍然钟情于各种有益身心的书籍。他于是借报纸一隅公开宣布,如有人愿意赠送或借阅孔子等人的著作,自己将倾力回报。^[5]此人心态之急切,由此可见。

在塑造人格方面,学校教育的作用不可替代。在很多人格修养的倡导者看来,孔子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学校人格培养成败的衡量标准和继续努力的方向。学校在此方面的总体目标是塑造“新人”,即“已经获得新生、不再需要处于教师监督之下的人”。这种人的内心业已按照理想目标被彻底改变。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6]孔子本为教师,正是他倾注一生精力塑造青年人格的精神让他成为了“真正伟大的人物”。^[7]他提出的人格培养思路对于20世纪的美国有着明显的借鉴意义。《匹兹堡

[1] Philip M. Lovell, "Care of the Body," *Los Angeles Times*, Jul. 23, 1939: 121.

[2] "The Constant Friend," *Pittsburgh Courier*, Nov. 20, 1943: 6.

[3] "Many or Few," *Pittsburgh Courier*, May 14, 1949: 14.

[4] "Confessions," *Chicago Tribune*, Sept. 6, 1924: 12.

[5] Sally Joy Brown, "A Friend in Need," *Chicago Tribune*, Aug. 9, 1920: 19.

[6] Walter Lippmann, "Today and Tomorrow," *Washington Post*, Feb. 3, 1948: 9.

[7] Alice Dunbar Nelson, "The Passing of Dr. Scarborough," *Pittsburgh Courier*, Sept. 25, 1926: 16.

信使报》特地完整引用《大学》“经文章”有关教育本末秩序的长篇评论：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修身”为教育的核心内容，以此为基础，学生才可承担齐家治国的重任。孔子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形成自己的教育体系哲学”，启发美国教育者思考美国文明的未来。^[1]一篇评论直言不讳地写道，美国教育的通病就是没有意识到，维护国家利益是公民“建立于永恒道德基础之上的社会责任”。学校必须强化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将他们塑造成“伟大的孔子”（实为弟子曾子）所谓的“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2]这是因为，自孔子以后，“士”一直为“完美理想”的化身。^[3]芝加哥大学校长的见解与此类似。他认为，美国“现代教育的缺陷和限制”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它“没有努力让学生在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社会可能因此产生离心倾向。孔子“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之语显示出独有的先见之明。^[4]未能因人而异地开展人格和其他方面的教育，是美国学校教育另一需要改进之处。波士顿大学的教务长深有感触。她在一次演讲中宣称，很多美国学生受到的教育超越了他们的认知水平，导致他们无法吸收和思考所学内容。孔子曾说，

[1] “Millions March Again!,” *Pittsburgh Courier*, Sept. 11, 1937: 10.

[2] “Education Never Ended,” *Los Angeles Times*, Jan. 1, 1922: II4.

[3] Ted Coleman, “Educate Selves and Obtain Rightful Place in World,” *Pittsburgh Courier*, Mar. 2, 1946: 23.

[4] “Dean Wesley’s Speech,” *Chicago Tribune*, Jun. 25, 1938: 16.

“学而不思则罔”(《论语·为政》),就是此理。美国心理学家开始设计认知水平的测试方法,但同样是在步孔子后尘。孔子的办法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1]

舆论呼吁的目的在于促使人们重视个人修养,将自我学习与学校教育相互结合,让美德成为日常行为的价值导向。引入擅长道德教海的孔子,人格修养的呼声更具文化底蕴和理论依据。引导舆论着眼于“唤醒和展现真实人格的全面、丰富、美丽和力量”。孔子据称也说,“我们无需说教,只需提醒”。^[2]无论效仿君子还是自我摸索,人格修养均须提早进行。孔子曰:“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所以,40岁以前是培养人格、奠定声誉的最佳时期。^[3]

三、以孔子为主题的人格培养实践

孔子的道德伦理思想大有可取之处不是舆论凭空想象,试图将孔子思想纳入人格培养过程的呼声也绝非曲高和寡。引导舆论还包含数量不菲的实例,见证着孔子融入美国人品质塑造的可行性,在客观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说服逻辑。这些具体的例子分布于个人价值取向、社会行为和学校教育等领域。

将孔子原则作为自己言行导向甚至言谈举止都模仿孔子的人时有所见,体现出孔子对于某些美国人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报纸上不乏潜心研习并真心崇拜孔子者。马萨诸塞州15岁的王姓华裔少年就是如此一人。对于孔子的《论语》,他已经烂熟于心。^[4]首都华盛顿

[1] “Excess Education Called Dangerous,” *Washington Post*, Feb. 11, 1935: 11.

[2] Sharon Merrill, “Saccharine Sweetness of ‘Charm’ Irritating,” *Los Angeles Times*, Aug. 31, 1936: A6.

[3] Marion Drew, “Your Stars Today,” *Chicago Tribune*, Jan. 26, 1947: G8.

[4] “Chinese Boy, Scholar and Linguist, Haled to School,” *Los Angeles Times*, Apr. 20, 1927: 4.

的“漂亮小伙”比利·温 (Billy Wynn) 也是“孔子的研究者”。^[1]甚至 17 岁的加拿大温哥华学生也作为研习孔子的代表现身报端。对于这位名叫保罗·哈利 (Paul Halley) 的年轻人而言,“孔子就如同自己的父亲一样真实”。孔氏后裔在与哈利相处一个小时之后宣称,即使在整个中国,能在研读经典方面与哈利相提并论者也不多见。哈利极其投入,为自己取了“夏李苞”和“王玉镜”两个中文名字。谈及中国人,他下意识地使用“我们”,指代英裔居民则用“他们”。^[2]更有一人在别人戏谑地称呼孔子为“迷糊”(Confusion, 书写与孔子英文名 Confucius 相近,所以成为嘲讽的对象)时勃然大怒。她随即严肃地指出,“你不能这样无礼。他是伟大的精神导师。创立了五大准则。他的名字是孔子”。^[3]

更多的人则把孔子的谆谆教诲融入了个人生活的点滴之中。正如一首诗歌写道的,我们芸芸众生无法拥有孔子等人的智慧,但在常人的只言片语中,深受孔子等人启发的“智慧珍珠不时闪光”。^[4]年届 70 的美国农业部植物病理学专家欧文·F. 史密斯 (Erwin F. Smith) 博士谈话神采飞扬,工作精力充沛。问及原因,他时常以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语录作答,表明自己对待工作和人生的态度。^[5]受到孔子的启发,有人学会了在处境尴尬时保持淡定,坐观世间万变而无动于衷。^[6]孔子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的名言,英语翻译中“学”和“思”分别作 labor 和 meditation。学习和思考演变成了工作和沉思:“沉思是工作的前奏,工作是成就和成功的必备条件。”两者相辅相成、

[1] Eve Lynn, “Seaboard Society Swishes by...!” *Pittsburgh Courier*, Jan. 27, 1940: 4.

[2] P. W. Luce, “Where East Meets Wes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28, 1934: 8.

[3] R. H. Markham, “Among the Cedars of Leban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27, 1936: 4.

[4] “Rhymes and Remnants,” *Chicago Tribune*, Apr. 11, 1949: 18.

[5] Lee Lamar Robinson, “Expert Workers for Uncle Sam,” *Washington Post*, Mar. 28, 1924: 6.

[6] “A Line o’ Type or Two,” *Chicago Tribune*, Feb. 26, 1920: 6.

均不懈怠的模式为很多人所采纳。^[1]喜爱交友者频频将孔子挂在嘴上，着重强调相互理解是“通往真正友谊之路”。^[2]在近海游轮上工作的柯特·扎斯特罗 (Curt Zastrow) 船长也是孔子人格思想的崇拜者，视孔子学说为“最伟大的信仰”。他表示，人的价值不在于从事何种工作，而是他的人格品质和精神世界。^[3]信奉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教诲的作家在其创作的小说中，以详尽的笔触描述了个人与命运抗争的过程，显示与人们休戚相关但通常藏而不露的心理活动。^[4]名叫 D. F. 贝利夫 (D. F. Bailiff) 的八旬老翁在自家农场面向千名来访者，别出心裁地预演了自己百年之后的葬礼。在总结人生经历时，贝利夫告诉众人，他“忠实实践了孔子制定的黄金准则”。^[5]与其他遵从孔子教诲的人相比，贝利夫可谓是并不多见的一以贯之者。

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和改变着个人经历，还通过个人，在社会交往领域留下明显印记。谈情说爱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但单身女孩是否应该跟已婚男性交往却须格外慎重。孔子有言在先：“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女孩一定要弄清楚对方的品行和自己需要哪种友谊，否则会“因为交友失误而全盘皆输”。已婚男士则应保持尊严，切勿在寂寞时拈花惹草，“心灵宁静”方为可取。^[6]随着婚姻的开始，岳父母进入男士的生活视野。自孔子和摩西以来，尊重母亲蔚然成风。但岳母似乎始终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有感于孔子等人的古训和前述现实，得克萨斯州终于在 1936 年设立岳母节。州

[1] Lucius C. Harper, "Dusting off the News," *Chicago Defender*, Nov. 6, 1943: 1.

[2] "Pastor Colors Sermon with Tricks of Magic," *Los Angeles Times*, Dec. 2, 1940: 1.

[3] George Horne, "Capt. Zastrow, a Tough Fellow, Is in Love with His Santa Rosa," *New York Times*, Nov. 18, 1934: S12.

[4] Herman Jacobsohn, "Arthur Schnitzler—An Appreciation," *Los Angeles Times*, Feb. 4, 1923: XI30.

[5] "Thousand Hear Octogenarian Preach Own Funeral Sermon," *Washington Post*, Jun. 15, 1936: 3.

[6] "Girl Quotes Confucius in Love-Marriage Issue," *Pittsburgh Courier*, Mar. 30, 1935: 7

长在节日宣告中称，将母亲和岳母区别对待“荒唐而无益”。^[1]

婚嫁之外的人际交往中，孔子伦理道德原则得以付诸实践更是屡见不鲜。丁龙（音）是早期华人移民中的一员，他曾是金矿主 H. W. 卡彭特（H. W. Carpenter）的仆人。当一夜暴富的美梦不能实现时，卡彭特的白人合伙者和雇员纷纷抱怨，唯有丁龙一如既往、尽职尽责地工作。问及原因，丁龙说，“我是孔子的崇拜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已经深入骨髓。无限感慨的卡彭特决定以特殊的方式铭记丁龙及其实践的孔子学说：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赠资金，建立中文系和中文图书馆。^[2] 华人汤米·阿默（Tommy Amer）曾经跟随史迪威将军征战缅甸，因战功而获紫心勋章。但当他回到美国，邻居却因为他的肤色要求他离开所在社区。阿默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誓不搬离。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给了他拒不退让的勇气。他坚信自己正是在伸张道义。^[3] 《芝加哥论坛报》请一位在孔子研究领域造诣颇深的华人哲学家，挑选一名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孔子之道的白人，获取 50 美元奖金。结果，路易丝·诺曼丁（Louise Normandin）夫人获此殊荣。诺曼丁被视作实践孔子谦逊有礼教诲的榜样，她的所作所为“不是因为责任感，而是出于品性”。^[4] 感恩节通常是人们大快朵颐之时。但在 1929 年的感恩节，纽约市的健康专员却从孔子那里找到适可而止的证据，提醒人们何事均不可“过”。^[5] 即使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舆论也会把某些白人的善意举动与孔子影响搭上关系，在客观上突出了孔子与人为善的思想。波士顿法院的迈克尔·J. 默里（Michael J. Murray）法官便是如此一人。21 名围观番摊赌博的华人正在接受审判。出人意料的是，默里没有依照惯例，对每人罚款 5 美元，而是以口头警告结束审理。报道者写道，默里“在

[1] “Sidelines of the Week,” *New York Times*, Mar. 8, 1936: E2.

[2] John C. B. Kwei, “The Chinese Collect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17, 1927: 7.

[3] “Neighbors Try to Oust Purple Heart Veteran,” *Los Angeles Times*, May 18, 1946: A1.

[4] “Oriental Sage Picks Woman for \$50 Prize,” *Chicago Tribune*, Jan. 19, 1921: 17.

[5] “Thanksgiving Cheer Reaches All in City,” *New York Times*, Nov. 28, 1929: 18.

波士顿中国城神情恍惚的居民看来,无疑拥有了类似于孔子的显赫地位”。^[1]在报纸的调侃之下,无暇学习孔子思想的华盛顿屠夫不得不自食其果。二战到来,美国市场供应顿时紧张。屠夫与家庭主妇们原本关系融洽,现今频生龃龉。屠夫们直到现在才开始领悟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的名言)。^[2]

教育是孔子极为强调的人格塑造环节。多个世纪以前,孔子就看到了未受教育者的“悲剧”。兴建学校是改变青少年无知状态的最佳途径之一。^[3]提高个人修养并非青春年少者独有的问题,这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一项持久的任务。洛杉矶一家演讲艺术学校招收的学生就来自各行各业,并且年龄各异。按照相关报道的说法,学员之所以愿意抽取业余时间参加学习,根本原因在于受到了孔子“学无止境”思想的启发。^[4]与此同时,孔子思想是诸多学校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马萨诸塞州议会曾受理的一项议案建议,全州的所有公立学校必须开设为期六周的道德教育课程。议案推荐了来自孔子和苏格拉底、富兰克林等人的30条道德准则作为教学内容,其中包括正义、勇气、诚实、谦虚等为人美德。^[5]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Carlton)学院宣称,它的教育目标是向学生传授“永恒的价值观”,从而在大学林立美国社会脱颖而出。孔子的人文精神是学生必须学习的价值观念之一。^[6]哥伦比亚大学林肯实验学校(Lincoln Experimental School)的本杰明·斯托尔珀(Benjamin Stolper)博士在12年级引入世界文学批评史课程。他要求学生阅读孔子和其他文化圣人的著作,并就书中的伦理道德思想撰写评论和展开讨论,以图影响“儿童的个

[1] “Judge Surprises Chinese Gamblers,” *Boston Globe*, Aug. 2, 1922: 4.

[2] Malvina Lindsay, “The Gentler Sex,” *Washington Post*, Sept. 24, 1943: B3.

[3] Cora Panton Stewart, “Opportunity School’s Work Vividly Explained by Writer,” *Atlanta Constitution*, Apr. 26, 1925: A8.

[4] Syl MacDowell, “Classes Make Oratory Easy,” *Los Angeles Times*, Jun. 8, 1924: B21.

[5] “Bill Provides Moral Manual for School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10, 1929: 2.

[6] Philip Kinsley, “College Sets Time for Trains, Goals for Men,” *Chicago Tribune*, Jul. 13, 1938: 10.

人兴趣和倾向”。^[1]

孔子深邃但适用的思想让其著作成为“世界上最丰富、最温馨、最成熟的文学作品”。南加州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总是从孔子开始讲授世界文学，原因就在于此。^[2]孔子的为人思想如此经典，以至于艾奥瓦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尔·E. 西肖尔 (Carl E. Seashore) 在辨析和梳理健康人格规律时，“不得不”模仿孔子格言的形式，逐条列表说明。^[3]纽约的文化科学暑期学校要求学生早餐之前必须阅读一段孔子语录。^[4]学习孔子思想最为投入的，当属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的一所暑期学校。学校大胆尝试，搭建中国式茶馆，让学生食用米饭，吟诗作画，养蚕织布，营造适合于感受为人哲学的氛围。通过此举，学生对于中国的兴趣不但更加浓厚，他们的言行举止也深受影响。每个人都更加尊重长辈，彼此之间更加有礼。勤俭节约、处事谨慎等美德也在他们身上清晰可见。^[5]即使电台主持的广播学校，其课程也点缀着“孔子与老子的哲学珠宝”。迷人的东方思想“通过神奇的短波……在我们的家里和脑海焕发新生”。^[6]

人格培养是任何社会必须长久面对的问题。社会舆论的引导者总是试图以广泛认可的伦理美德影响个人——尤其是青少年和儿童——的价值取向。这是一个广义上的教育过程。美国乃至西方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以及美国当代社会的道德典范，都是美国人格教育期望人们达到的目标。非欧美思想家和伦理道德典范也经常出现在美国人格培养舆论之中。中国的孔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美国的人格引导者向人们证实，孔子思想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是美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有益补充。希望美国人重视孔子为人原则的呼声因此

[1] “School Notes on Famous Men Made into Book,”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 15, 1929: 6.

[2] “Enthusiasm Grows for Chinese Lore,” *Los Angeles Times*, Jan. 20, 1939: A7.

[3] Glenn Frank, “The Laws of Mental Health,” *Washington Post*, Aug. 5, 1926: 6.

[4] “Friendly Old Cambridge,” *New York Times*, Jul. 3, 1932: E1.

[5] “Opening the Door to Chin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5, 1934: 8.

[6] “The Week’s Program Tren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16, 1930: 4.

在大众媒介上时有所见。更有人不断在日常生活和学校教育中，引入孔子的思想言论和行为规范，影响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举止。孔子的此种际遇对于我们的启示有如下两点。第一，孔子的跨文化影响力不容置疑。孔子及其思想经历欧洲人之手传入美国，直至二战以前都是美国人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名之一。孔子与中国在美国人的各类话语中相应随行。可见长久以来孔子在美国社会文化中留下的深刻印象。我们今天以孔子之名推广中国文化正是利用了孔子在跨国语境下长期形成的文化地位。第二，美国人对于孔子的看法存在二元性。一方面，他们武断地将中国近代的落后归因于孔子经久不衰的束缚作用。另一方面，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又为美国人所极力推崇。褒扬孔子在道德伦理领域的造诣、贬低其在社会与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是美国一直秉承的孔子认知模式。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东亚的兴起才让美国意识到孔子思想同样包含着促进历史变革的成分。

第四部分

对华冷战时期的孔子形象，

1950—1972

随着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中美两国在二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正式终结，代之而起的是剑拔弩张的冷战局面。直到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方才出现缓和。两国相互为敌的冷战格局持续二十余年。在冷战的大环境下，美国的孔子形象经历新的变化。

首先，美国以新中国为敌，自然不遗余力地开展反华反共宣传攻势，以便控制国内对华冷战的话语权。而在众多的宣传策略中，利用共产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区别大做文章，尤其引人注目。美国舆论建构出孔子已被共产主义排挤的情形，攻击中国新政府乃至东亚共产主义的存在合理性，声援和扶持言必称孔子的台湾国民党政府。孔子从中国传统的象征和代言人，转变为新中国的对立面，被美国用作对华冷战的舆论工具，服务于美国的冷战利益，最为形象地体现出美国孔子观的现实性。

其次，为向世界证明美国的高尚，并减少美国华人对于新中国的支持，冷战期间的美国极大地改善了华人群体的处境。社会歧视降低，

工作机会增多，促使大量华人迁离唐人街，散步全美各地，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同化趋势加剧。如何维系华人群体的整体性，开始引起华人自己和美国舆论的严重关切。舆论从华人的言行中发现，华人正在通过古老的方式——尊崇孔子，延续和强化着全美华人的整体认同。孔子成为力阻华人群体丧失群体身份的重要力量。我们将在下一部分，把战后美国华人的群体身份作为整体加以论述。

与此同时，孔子继续作为美国社会生活的参与者、见证者和督导者而出现。风起云涌的少数群体权利运动和多元文化运动，给评论者创造很多引用孔子大加评判的机会。而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也会因为与孔子思想的对比，而显出可取与失误之处。此外，孔子总能为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个人修养提供导向或增色添彩。

第十五章

美国反共宣传中的孔子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将已经在欧洲开始几年的东西方冷战延伸到了东亚。因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抗法抗美战争的爆发，东亚的冷战竹幕又将朝越两国与美国分隔成敌对双方。围绕如何在东亚夺回冷战失地的难题，美国人各抒己见，争论四起。很多建言献策的美国人发现，深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东亚地区在传统上皆属儒家文化圈，源于西方的共产主义应该与其水火不容，至少是迥然有异。利用孔子诋毁和分解东亚共产主义成为反共舆论积极鼓吹的策略之一，曾经被美国人讥笑为中国和东亚保守落后总根源的孔子转而被视作“文明进步”的希望，暴露出美国外交思想极其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

一、孔子：打开东亚之门的钥匙

对于美国而言，1949年之后的整个冷战时期，没有任何东亚政策的重要性能够超越从共产主义手中夺回“失地”。战争、遏制、恐吓等手段纷纷亮相。比这些显而易见的策略更加微妙、更加棘手的是如何赢取东亚共产主义国家的“民心”。积极为此出谋划策的美国冷战舆论认为，孔子对于东亚共产主义国家仍然具有巨大影响力，孔子及其思想在帮助美国认识 and 解决东亚冷战问题过程中的意义非同寻常。

东西方冷战在实质上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而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报纸相信，东方共产主义出师不利，因为“要以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取代孔子、老子、菩萨和伊斯兰教在东方人心灵中的位置极其困难”。^[1]对于孔子信仰一直希望除之而后快的美国传教士在冷战环境中也改弦更张，转而借报纸一角，宣扬孔子在东方思维中的核心地位。富尔顿·J. 希恩 (Fulton J. Sheen) 主教告诫说，传教士应该“更多地利用东方思想”，以便打开局面，“进入东方人的内心”。希恩尤其强调，“作为传播基督教的起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具有同等美妙的效果”。^[2]甚至有舆论宣布，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孔子等人开创的“自由亚洲”传统，它并未根本改变亚洲人的思维模式。^[3]舆论如此造势的目的在于告诉美国人，他们不应为共产主义横扫东亚的“表面”现象耿耿于怀，而是应该利用孔子传统的牢固地位，采取对应之策。论及具体国家，中国和越南是美国“以孔子贬低共产主义”舆论关注的焦点。

令舆论略感欣慰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并未伤及孔子思想的筋骨，这给美国假借拯救孔子之名对抗共产主义亮出了一线曙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告诉人们，中国人尽管信奉共产主义，但他们首先是中国人，“承载着四千年文明”，就连《人民日报》都必须用“孔子使用的文字”加以印刷。^[4]有鉴于此，舆论建议，美国应该承认并利用孔子的文化威望，达到改变中国共产主义特性的目的。此举在历史上不乏先例。明朝时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就是成功的实践者。利玛窦意识到，基督教欲在中国立足，必须根据“东方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孔子原则加以变通。冷战时期的美国不妨加以模

[1] Polyzoides, "Nehru Decisions Vital to All Asia," *Los Angeles Times*, Jun. 28, 1955: 7.

[2] "Sheen Tells Missionaries 'Go East,'"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 Herald*, Sept. 28, 1955: 37.

[3] "Sees Lack of Leaders Our Biggest Problem,"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Jan. 13, 1951: 6.

[4] James Cameron, "Peiping—Communist But Chinese, Too," *New York Times*, Jan. 9, 1955: 70.

仿。^[1]在一幅漫画中，急于向深受“亚洲流感”之苦的美国人寄送康复卡片的贺卡公司老板训令手下，立即采撷“某些妙趣横生的孔子笑话”，以收卡到病除之效。^[2]“亚洲流感”显然喻指令美国政府焦头烂额的共产主义，作为康复妙计的孔子笑话体现着美国人期望借孔子之名破解东亚冷战困局的心理。

舆论希望，通过支持和利用孔子学说，美国不仅能够分解共产主义在中国国内的凝聚作用，还能阻止中国新政府获得海外华人的支持。《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主张，为“解救遭受（共产主义）奴役的中国”，美国“必须利用孔子的政治教诲这一同盟者”，凝聚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组成“政治统一战线”，对抗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3]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称呼海外华人为“中国共产党人潜在的第五纵队”，可见这一群体对于美国反共策略的重要性。为防止东南亚华人“聚集在毛的红旗周围”，刊登腊斯克讲话的报纸呼吁，美国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促使东南亚各国政府废除歧视华人的政策，另一方面利用孔子“必先有志于所有事，然后敢用谷也”（《礼记·射义》）的教诲，要求华人迅速融入当地社会。^[4]此类建议是否为美国政府所采纳，我们尚无确凿证据。但孔子对于中国问题的潜在破解作用显然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重视。比如，在1965年召开的第25届帕格沃什会议（Pugwash conference）上，美国大学联合会主席指责美国人以西方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东西方隔阂和美国在亚洲的失利，敦促美国“尽量了解东方和中国思想”。在其提议下，会议以研究孔子开始，并建议美国高校强化中国研究。^[5]帕格沃什会议的参与者皆为学者和公共人物，旨在减少世界冲突，增

[1] Walter Karig, "They Redrew the World's Maps,"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 Herald*, Aug. 28, 1955: E6.

[2] Lichty, "Grin and Bear It," *Los Angeles Times*, Aug. 26, 1957: B5.

[3] "Freeing Captive Chin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 24, 1953: 18.

[4] Peggy Durdin, "New Chinese Enigma: Chinese Outside China," *New York Times*, Apr. 13, 1952: 10, 32.

[5] "Study China, Pugwash Man Asks Colleges," *Chicago Tribune*, Aug. 10, 1965: 17.

进国际安全。会议在美国和加拿大有着广泛的影响。高校联合会主席在此场合发出呼吁，所起作用不容小视。

另外一个引发美国多米诺骨牌效应恐惧症的国家是越南。虽然国土狭小且南北分裂，越南却因为存在着强大的共产主义力量而让美国深感忧虑。从战后初期支持法国重建在越的殖民统治到亲自派兵参战，美国在东南亚逐渐陷入自拔不能的反共泥潭。出谋划策的美国舆论不甘沉寂，纷纷建议美国政府以孔子为突破口，了解并化解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披露孔子与越南民族思维关系紧密的文章频频见诸报端。报纸称呼革命领袖胡志明为莫斯科训练的职业革命家和“孔子的追随者”。^[1]到1969年胡志明去世之时，美国报纸的描述依然是：“一位诗人、学者、书法家和孔子的追随者”。^[2]据报道，生存于更加残酷环境之下的南越共游击队更是把孔子思想应用得极其娴熟，以便立足于民。孔子曾有“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训，越共因此狠抓村民组织和鼓动，已将百姓塑造成“一种组织武器”。^[3]

处于美国庇护之下的南越非共产主义者同样被刻画为孔子的敬畏者。此举意在进一步证明孔子是外界认识越南的必由之路。报纸视南越为“当今世界上孔子信仰最为明显的社会”。在那里，宣称信奉孔子的政治人物总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与孔子仁政思想背道而驰的共产主义则前景黯淡。^[4]孔子诞辰日是南越的法定假日。尽管庆祝的热烈程度不及其他节日，但南越制宪会议会休会一天，政府机关也有半天假期。^[5]即使南越副总统阮高祺(Nguyen Cao Ky)在接受采访时也声称，自己认可孔子均贫富的思想(《论语·季氏》)。^[6]阮高祺

[1] “Truce Crowns Ho Chi Minh’s Lifelong Fight,” *Chicago Tribune*, Jul. 22, 1954: 2.

[2] “Hanoi Proclaims Week of Mourning for Ho Chi Minh,” *Los Angeles Times*, Sept. 4, 1969: 24.

[3] Douglas Pike, “A Man Muses about Vietnam,” *Washington Post*, Jun. 1, 1969: 33.

[4] Robert S. Elegant, “No Taste of Knowledge of Democracy in S. Vietnam,” *Los Angeles Times*, Jun. 30, 1968: F1.

[5] “Viet Woman Asks Legal Prostitution,” *Washington Post*, Sept. 29, 1966: A16.

[6] Oriana Fallaci, “Gen. Ky Catalogues All His Hates,” *Washington Post*, Apr. 7, 1968: B1.

在另一场合呼吁，为阻止连年战争导致的道德堕落，越南应重建以孔子教诲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体制。^[1]而在南越驻美大使馆放映的越南宣传片中，西贡市中心湖心岛上的孔庙是最为显眼的特写镜头。^[2]南越一鸽派领袖念念不忘父亲传授的孔子思想，他对美国记者表示，自己致力于以孔子智慧唤醒民众的和平愿望。^[3]

在美国报纸的字里行间，南越民众的孔子情结非常浓厚。有美国记者曾与一家普通南越居民朝夕相处达半年之久。12口之家尽管清贫，但却尊老爱幼，其乐融融。问及原因，男主人自豪地回答道，“我们信奉孔子”。^[4]即便是报纸上的南越女性也对孔子尊崇有加。在西方人看来，浸染在传统之中的越南女性必然处处被动顺从，以取悦男性为己任。然而，记者见证的越南女性并非如此。正因为信奉孔子，男女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泾渭分明，互不干扰。男性专注于思想与哲学，女性则考虑着钱财、家庭和工作。南越妇女通常会对美国人的成见付之一笑。^[5]而据《华盛顿邮报》，就在美军追逐越共游击队之时，南越民众照样会“带着必定是孔子才有的耐心”，打理着田间地头的庄稼。^[6]

美国的冷战舆论者乐于相信，即使在共产主义背景下，中国和越南仍然表现出了明显的孔子信仰，这正是美国能够用以化解共产主义强劲势头的文化武器；经久不衰的孔子信仰也说明，一种有别于共产主义的力量已经植根于东亚国家。

[1] Chesly Manly, "Sin, Cynicism, and Corruption—Viet Nam's Legacy in a 20-Year War," *Chicago Tribune*, Jun. 5, 1966: K35.

[2] "Embassy Row," *Washington Post*, Apr. 21, 1954: 42.

[3] Bernard Weinraub, "South Vietnam's No. 1 Dove," *New York Times*, Oct. 8, 1967: SM22, 110.

[4] William Knight, "Dac Shuns Vietnamese Politic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2, 1968: 10.

[5] Kelly Smith, "Vietnamese Women Not All Coolies," *Washington Post*, Dec. 26, 1967: B4; Kelly Smith, "Viet Women Circumvent Traditional Passive Role," *Los Angeles Times*, Jan. 21, 1968: D6.

[6] Ward Just, "Combined Forces Ferret out Vietcong," *Washington Post*, Jan. 28, 1966: A12.

二、孔子映衬之下的中国外交“怪象”

利用孔子之名，美国报纸不仅意在塑造共产主义与东亚本土传统格格不入的形象，而且极力渲染东亚共产主义国家在外交方面违背常理的特点。由于越南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在为国家的统一而战，朝鲜则与外界接触稀少，中国外交成为美国冷战舆论假借孔子刻意丑化的焦点。如此策略意在借中国传统之力，攻击共产主义在中国和东亚存在的合法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关系紧密。舆论着力抨击中国为追随苏联而置孔子及其思想于不顾，孔子被塑造为中国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媒体危言耸听，宣称由于“‘倒向’苏联体制”，中国开始荒废孔子建立的道德体系。^[1] 中国人被等同于东欧的苏联卫星国民众，所以“孔子的信奉者必须屈从于苏联主人”。^[2] 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自然不会错失在思想领域反攻大陆的机会。据报道，就在有关各国准备围绕朝鲜战争展开谈判前夕，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向联合国提交报告，谴责中国“共匪……通过俄国干涉获取政权”，并在苏联的支持下，“焚烧孔子、老子和孟子著作以及其他中国经典，企图抹杀 4000 年的中国文化与文明”。虽然由于英国和苏联的反对，提案胎死腹中，但国民党与美国制造的共产主义牺牲孔子等中国传统圣人的舆论却已被国际社会所知晓。^[3]

新中国代表伍修权于 1950 年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抨击美国试图征服亚洲的野心。美国舆论立即作出激烈反应，指责中国违背孔子古训，一味紧跟苏联。《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写道，本应代表中国声

[1] Mary Hornaday, "Christianity Gains Noted in China despite Purg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 1953: 11.

[2] "'Voice' Warns Workers to Study Berlin Less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20, 1953: 11.

[3] William R. Frye, "U.S. Backs Tsiang Bid for China Probe But Britain Advises UN to Walk Softl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22, 1950: 1.

音的演讲“仅仅是俄国之声的回音而已”，这“令人悲哀”。伍的讲话“根本不可能来自一个生而拥有菩萨和孔子伟大传统的民族”。^[1]《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评论称，伍修权的讲话违背孔子“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的告诫。他对美国的批判言辞激烈，却无意“回应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调解努力”。评论在结尾处希望中国遵照孔子要求，“里仁为美”（《论语·里仁》）。^[2]朝鲜战争后期的战俘问题是中美对抗的又一缩影。涉及这一话题的舆论照样视中国为苏联的“傀儡”，认为中国没有按照孔子“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的要求行事。不信孔子的印度反而刚正不阿，在联合国提交了令美国满意的战俘解决方案。中国却根据苏联的反应予以拒绝，“向全亚洲展现出对于克里姆林宫指令的屈从”。^[3]

随着中苏分歧日渐明显，美国舆论又利用孔子之名，散布中国一意孤行、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形象。报纸相信，中国即使在共产主义阵营也将离群索居，因为苏联的东正教“与孔子的世俗、现世哲学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依该篇评论之见，尽管中国共产主义排斥孔子思想，但后者毕竟是中国的文化根基，中苏必然分道扬镳。^[4]甚至孔子去世时的年龄都能在美国的冷战舆论中被赋予意识形态之意。孔子卒于72岁，但年届70的毛泽东却精力充沛，“在广阔的范围内搬弄是非，在共产主义的等级体系中谋取与马克思和列宁比肩的高位”。报纸建议美苏“达成工作谅解”，应对中国因为孤立而导致的不可预测的威胁。^[5]本已“抛弃”孔子信仰的中国共产主义现又孤立于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舆论断定，中国将更具危险性，“不会是‘纸老

[1] “The Voice That Is Russia’s,” *New York Times*, Dec. 28, 1950: 22.

[2] “Books vs. Bomb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13, 1950: 22.

[3] “India Scores,” *Washington Post*, Dec. 3, 1952: 8.

[4] Harry Schwartz, “The Testing of the Moscow-Peiping Axis,” *New York Times*, Jul. 11, 1954: SM10.

[5] Richard Hughes, “Mao, at 70, Tries a ‘Big Leap’ in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Feb. 2, 1964: 10, 43.

虎”^[1]即使昔日盟友苏联也会利用孔子大做文章。美国报纸如获至宝，视其为中国共产主义遭受孤立的又一明证。1966年，苏联出人意料地将一座月球环形山命名为“孔子”，而依据惯例，环形山应以科学家命名。但苏联官方通讯社并未解释身为思想家的孔子如何摇身一变成了“伟大的科学家”。美国舆论宁愿相信，这是苏联针对中国摧毁古老文化的反击。^[2]

在美国舆论的刻画之下，中国不仅离群索居，而且极好制造外交麻烦。例如，朝鲜战争中，美国为了人类的“自由”与中国作战，是孔子等人理想的实践者，孕育了孔子的中国因为与美国为敌而被刻画为离经叛道者。^[3]及至中国卷入美国与中南半岛的冲突，美国舆论的憎恨心态更是明显。在《纽约时报》的一幅漫画中，帽子上写着“毛”的中国大厨用大铁勺子在锅里不停搅动，铁锅外面写着“印度—朝鲜—老挝—越南”。画中人物捏造孔子语录道：“子曰：‘只有不停地搅，才能炖好。’”^[4]漫画寓意明显：中国不仅未能遵照孔子古训维护和平，反而假借孔子之口在亚洲各地制造事端。美国舆论欲将东亚冷战责任推给中国的意图非常清楚。

即便涉及不以输出革命为目的的举动，只要对美国的世界垄断地位形成挑战，中国也会被视为不可理喻的麻烦制造者。中国通过各种手段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所引发的舆论反应就是一例。在中国自主研发核武器时，舆论就指责中国违背孔子思想。1961年，“红色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漫不经心地”告诉西方，“当中国拥有核武器，战争的机会就会减少”。美国报纸却不以为然，指责陈毅忘记孔子语录：“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言下之意是，中国缺乏“自我克制”。^[5]《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都刊登的一幅漫画更是极尽丑化之能事，将中共刻画为不顾孔子训诫、一心制造核武的“邪

[1] “China’s Isolation from World Socialism,” *New York Times*, Apr. 10, 1966: 153.

[2] “Lunar Labe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30, 1966: 14.

[3] Louis Binstock, “The Sabing Pomer of Faith,” *Chicago Tribune*, Mar. 23, 1952: H5.

[4] Editorial Cartoon, *New York Times*, Aug. 25, 1963: E4.

[5] “Ho-Happy Chen,” *Chicago Tribune*, Oct. 24, 1961: 24.

恶”力量。核爆产生的蘑菇云上写着“大气核污染”字样，蘑菇云下站着一位佩戴镰刀斧头袖章的人，而在此人脚下是无数头戴斗笠、仰天观望蘑菇云的中国民众。漫画的文字说明是：“忘掉猪猡孔子(swine Confucius)——正如现在毛所说……”^[1]

1971年，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这对于美国而言是另一外交麻烦。美国舆论在其政府无法扭转局面的情形下，依然假借孔子之名大肆谴责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不合情理”之处。题目就叫“子曰”的评论宣称，中国席位将增加联合国的财政开支。单单中文印刷费一项，联合国每年就得增加500万美元的开销。被贬称为“北京人”的大陆代表将比国民党代表“更加口若悬河”，中国也会要求所有文件增加中文版，以体现地位平等。^[2]中国代表在恢复席位之后的大会发言咄咄逼人，要求美国撤出越南、台湾地区和朝鲜，更让很多美国人难以释怀。有舆论指出，中国代表忽略了孔子的“伟大教导”。孔子以人为本，“美国是孔子的好学生”，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是为防止“无助的人们”落入被称作“猛兽”的共产主义之手。舆论作者甚至信誓旦旦地宣称，“相信我，越南、台湾地区和朝鲜人民对于美利坚合众国心存感激”。需要自我反省的是“共产主义中国”。^[3]

美国报纸绝非真有帮助中国保护孔子传统的意愿，而是期望利用孔子的“遭遇”，反证中国的共产主义没有历史根基。在理论上，此项策略可收一箭双雕之效。一方面，中共形象可能因为所谓的抛弃传统之举而大受损失，尤其在海外华人中间。华人群体正是大陆极力争取的对象。另一方面，孔子思想是整个东亚的文化根基。如果美国舆论能够证明，在作为孔子故土的中国，共产主义与孔子传统严重割裂，世界就不会看好共产主义在东亚其他国家的发展前景。美国的东亚冷战便可从中获利。

[1] “Won’t Build A-Weapons, Japan Says,” *Washington Post*, Nov. 4, 1966: A25; Editorial Cartoon, *Los Angeles Times*, Nov. 7, 1966: A6.

[2] “Confucius Say...,” *Chicago Tribune*, Nov. 8, 1971: 20.

[3] “Peking Ignoring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Nov. 25, 1971: 36.

三、国民党的中国“正统”形象

而在面对中国国内政治局势时，美国舆论选择支持国民党，配合美国政府的对华冷战。以国民党尊孔为由，树立国民党的正统形象是其中的一大策略。1949年之后，国民党政府虽然败退台湾，却始终希望有朝一日“光复”大陆。在其自身存在岌岌可危的背景下，美国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而要赢得美国的慷慨相助，证明自己代表着中国的正统是国民党必须采取的步骤。热衷于以台湾制衡大陆的美国冷战舆论对此心领神会，大肆塑造国民党无处不在尊崇中国文化象征孔子的正面形象。

首先，国民党及其治下的台湾人在言谈举止中有着明显的尊孔痕迹。上至蒋介石，下至平民百姓，其承载的信息都在美国舆论中得到了体现。例如，尽管身为基督徒，蒋介石仍被《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刻画为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孔子著作之人。^[1]他在抨击联合国试图以“两个中国”解决国共席位之争时也不忘引用孔子。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蒋以此为出发点，提醒“两个中国”的鼓吹者，如果苏维埃俄国侵入他们自己的国家并建立“傀儡”政权，他们是否准备接受“国家一分为二的现实”。^[2]1970年造访美国的台北市长向华盛顿市长炫耀道，台北的犯罪率低下，因为当地政府和民众遵循着孔子的伦理要求。遵照孔子教诲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没有交通问题”，台北市政府就没有先例可循，导致交通成为台北的一大难题。当然，市长照样会攻击中国共产党企图“腐蚀”以孔子思想为纲的台北“城市文化”。^[3]台湾驻洛杉矶总领事则是处

[1] “Another Corner in Kelen’s Hall of Fam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3, 1963: 13.

[2] Henry R. Lieberman, “Chiang Cautions against Sell-Out,” *New York Times*, Feb. 11, 1955: 3.

[3] Robert F. Levey, “Mayors of Taipei, D.C. Trade Niceties,” *Washington Post*, Feb. 12, 1970: F3.

演讲,谈论“自由中国和孔子理想”。^[1]出生于中国北方、“流亡于福摩萨”的书法家卓君庸在玻璃上雕刻如下文字:“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这件作品随其他亚洲地区的玻璃艺术品一道,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连续数年在全美各地巡展。^[2]甚至在叙述令美国人深感不悦的台湾人举止时,孔子也经常被放在较为突出的位置。例如,驻台湾的美国军士长罗伯特·R. 雷诺兹(Robert R. Reynolds)击毙偷窥妻子洗澡的当地人,但被美军军事法庭宣布无罪。此事引发台湾民众的抗议和骚乱。相关报道开门见山地讽刺说,“在骚乱之中的福摩萨,兴高采烈的流氓们唱道,‘子曰,愚蠢的白人军士应该明白,中国不乏偷窥的男人’”。^[3]

旅居美国的台湾人因为孔子信仰而受到报纸赞扬者并不罕见。徐文英(音)就是一例。她随家人于1948年逃至台湾,后前往美国学习音乐。徐有着强烈的孔子情结。她将孔子通过《诗经》保存下来的中国远古音乐用西方乐器呈现给听众。所以,她代表着“优雅而有涵养的古代中国”。^[4]曾出任国民党驻韩国大使的张经营着芝加哥的一家玉器行。张自比为孔子“君子比德于玉”(《孔子家语·问玉》)名言中的君子。“了解中国如同了解玉”的张言之凿凿地告诉采访者,大陆存在着“活跃的(反共)地下运动”。^[5]杨明竹(音)的事例有着同样的政治寓意。早在1946年就已进入国民政府驻丹麦使团工作的杨因为共产党的胜利而“无事可做,无家可归”。但他没有因此沉沦,而是铭记孔子教诲:“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论语·卫灵公》)杨相信自己是可言可教的人才。在举家迁往美国之后,杨历经挫折,

[1] “Dr. Bach to Inaugurate Congress of Faiths,” *Los Angeles Times*, Mar. 3, 1962: 19.

[2] “Crystal Art Set for Hub Show,”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 17, 1958: 4; “Confucius on Glass,” *Washington Post*, May 29, 1962: B7.

[3] Louis Martin, “Dope and Data,” *Chicago Defender*, Jun. 15, 1957: 10.

[4] Birsra Shepard, “Old Chinese Music Interpreted Anew,”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19, 1959: 8.

[5] Joette Getse, “Chinese Dealer in Jade Tells Virtue of Stone,” *Chicago Tribune*, Apr. 6, 1969: SC4.

终于在 1967 年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微生物学博士学位。^[1]

其次，美国报纸充斥着国民党在台湾高调纪念孔子的报道，与大陆的“对比”时常夹杂其间。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几乎每年都能占据美国报纸一角。较为常见的报道格式是：“国民党中国今日纪念孔子诞辰第……周年。”^[2]甚至还有以问答题目的方式提醒读者关注台湾孔子诞辰纪念的情况。例如，《纽约时报》的题目是，“国民党中国上周庆祝了孔子诞辰”，孔子与耶稣都曾提出的原则是什么？答案是黄金准则。^[3]《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则题目是：“孔子第 2508 个诞辰日是在何处庆祝的？”答案是：“福摩萨”。^[4]在更多时候，蒋介石的出席和场面的盛大是报道极力突出的重点。蒋介石亲自参加纪念活动并向孔子肖像三鞠躬已成惯例。国民党高官亦会悉数出席。而在整个台湾，孔子诞辰日被确定为教师节。当天彩旗飘扬，鞭炮喧闹，演讲和祈福之声不绝于耳。^[5]蒋介石亲临孔子诞辰庆典现场已为跟踪台湾

[1] “Chinese Man Follows Teaching of Confucius, Earns Doctorate,” *Washington Post*, Jul. 30, 1967: A27.

[2] 例如：“Confucius Honored,” *Los Angeles Times*, Sept. 29, 1953: 21; “Taiwan Honors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Sept. 29, 1956: 2. “Tribute to Confucius,” *Los Angeles Times*, Sept. 29, 1956: 11.

[3] “Fifteen News Questions,” *New York Times*, Sept. 2, 1951: 82.

[4] “Test Your Memory,” *Chicago Tribune*, Oct. 5, 1958: A14.

[5] “Nationalist China Honors Confucius,” *Los Angeles Times*, Aug. 28, 1950: 6; “Formosa Honors Sage,” *New York Times*, Aug. 28, 1950: 3; “Formosans Celebrate Confucius’ Anniversary,” *Washington Post*, Aug. 28, 1950: 3; “Chiang to Lead Formosa Rites for Confucius,” *Chicago Tribune*, Aug. 27, 1951: 7; “Chiang Marks Confucius Birth,” *New York Times*, Aug. 28, 1951: 5; “Chiang Bows Solemnly to Confucius Portrait,” *Los Angeles Times*, Aug. 28, 1951: 12; “Chiang Presides at Confucius Rites,” *Washington Post*, Sept. 29, 1952: 4; “Confucius Honored,” *Washington Post*, Sept. 29, 1953: 15; “Tribute to Confucius,” *Los Angeles Times*, Sept. 29, 1954: 16; “Confucius’ 2508th Birthday Remembered,” *Chicago Tribune*, Sept. 29, 1958: 26; “Confucius’ Birthday,” *Los Angeles Times*, Sept. 29, 1958: 4; “Taipei Celebrates Birth of Confucius,” *Washington Post*, Sept. 29, 1959: A2; “Mark Confucius 2509th Birthday,” *Chicago Defender*, Oct. 10, 1959: 3; “Confucius Has Birthday and Nobody Quotes Him,” *Chicago Tribune*, Sept. 29, 1959: A9.

事务的美国媒体所熟知，以至于蒋如有缺席，必然引起各种猜测。蒋极其罕见地没有出席 1971 年的孔子诞辰纪念活动。《纽约时报》由此判断，蒋介石可能在 1972 年第 6 个任期届满时不再寻求连任。^[1]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孔子出生日期和年代问题上力求精准的精神也在美国报纸上有相应体现。1952 年，蒋介石第一次于 9 月 28 日在台湾国民党总部主持仪式，纪念孔子诞生 2503 年。这是因为国民党刚刚订正了孔子的诞辰日，发现民国自成立以来一直认可的 8 月 27 日是阴阳历换算失误所致。^[2]有关孔子诞生年代的争论也因为国民党教育部的介入而在 1960 年尘埃落定。国民党政府最终宣布，孔子诞生于公元前 551 年。^[3]国民党如此重视孔子，其根本目的在于向世人证明，中国的正统已经移至台湾。“孔子后代在福摩萨”之类的新闻标题更有为国民党争取正统造势之嫌。^[4]攻击共产党对待孔子的“态度”是美国舆论帮助国民党假借孔子确立正统地位的又一环节。1951 年，《华盛顿邮报》在报道蒋介石主持的孔子诞辰庆祝仪式之后评论曰，“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正在诋毁孔子及其教诲，在此情形之下，国民党的纪念引人注目”。^[5]国民党官员自然乐于通过美国报纸，让美国人知晓国共在孔子问题上的所谓区别。1958 年的孔子诞辰日，国民党教育部长指责说，“中国共产主义者试图抹杀儒家教诲，他们此举是在挑战数千年的中国文明”。^[6]

第三，孔子是台湾对外形象宣传时刻意突出的成分。旅游业是塑造对外形象的重要手段。在美国推介台湾旅游的字里行间，孔子已成游客目光的聚焦点。评论声称，“这里的人们不仅信奉而且实践着孔

[1] Fox Butterfield, "Chiang Said to Play a Less Active Role," *New York Times*, Oct. 9, 1971: 11.

[2] "New Confucius Birthday," *New York Times*, Sept. 29, 1952: 4.

[3] "Confucius Given One-Year Setback," *Washington Post*, Apr. 11, 1960: A24; "Say Confucius Birth Record Was in Error," *Chicago Tribune*, Apr. 11, 1960: 15.

[4] "Confucius Descendant on Formos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10, 1960: 14.

[5] "Nationalists Emphasize Confucius Anniversary," *Washington Post*, Aug. 27, 1951: 2.

[6] "Formosa Celebrates Confucius' Birthday," *Washington Post*, Sept. 29, 1958: B15.

子的语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尽管“共产主义中国”在不远处虎视眈眈,“代表着自由中华民国”的台湾人仍然笑迎四方宾客。“来自其他自由国度”的游客可以“切身体会古老中国文化与新颖文化之间的奇妙融合”。^[1]推介者向美国游客信誓旦旦地保证,在台湾不会碰见一个红卫兵或者一本“毛(泽东)思想小红书”。扑面而来的是“古老的中国”和不时引用孔子语录的热情导游。^[2]虽然与共产主义大陆仍处于交战状态,“台湾一派祥和,就如一只飞行的蝴蝶一样”。台湾人把孔子要求热情待客的教诲发挥到了极致,西方游客享受着王室贵宾般的服务。^[3]通过显示台湾人的孔子信仰,评论者既为台湾旅游业做了广告,又攻击了共产主义,可谓一箭双雕。

论及具体的景点,以孔子为看点者亦不在少数。台北是一个“既不漂亮也无法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城市,但却有着众多景点,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龙山佛教寺庙和“纪念2500年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孔庙。^[4]台南的主要旅游景点春秋亭则“取名于孔子的一本著作”。^[5]1970年的世界博览会在日本举行。借此契机,美国一家轮船公司特地推出“东方游轮假期”项目。“梦幻般”的线路串起夏威夷、日本、台北、香港、菲律宾和关岛的最具特色的景点。广告突出了台北的三大特色:“自由中国生机盎然的首都、孔庙和丰富的夜生活”。^[6]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于1971年推出的“东方快捷游轮”

[1] Levitt F. Morris, “Taste of Old China Blended with New,”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16, 1968: 14.

[2] Margaret McEachern, “Savor Sharkfin Soup, Chinese Art in Taiwan,” *Chicago Tribune*, May 12, 1968: 14.

[3] Jerry Hulse, “Taiwan—Cold War Is War—Friendships Are Warmer,” *Los Angeles Times*, Apr. 22, 1962: H9.

[4] Maxine Livingston Elbaum, “Taiwan: Affluence and Aborigines,” *New York Times*, Dec. 1, 1968: XX45.

[5] “Scenic State Cites Rural Appreciation,” *Washington Post*, Jun. 15, 1958: K12; George K. C. Yeh, “‘Formosa’ Was Well-Named,” *Washington Post*, May 28, 1961: B6; “Guideposts for Travelers,” *Washington Post*, May 6, 1962: B17.

[6] “The Hotel SS Lurline Is Going to the Orient and Expo’70,” *Chicago Tribune*, Jan. 4, 1970: SCL2; Feb. 15, 1970: SCL9.

计划在介绍途经的主要景点时,台湾唯有孔庙上榜。^[1]诸如此类的旅游广告给美国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台湾继承和尊重孔子,体验儒家文化必须前往台湾。

报纸还对台湾有意而主动地假借孔子塑造自身正统形象的举动表现出浓厚兴趣。台湾民航通运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于1961年投入使用的一架康维尔880型客机,因其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内部装饰,给予美国媒体极深的印象。机舱内壁雕龙刻凤,不同客舱以传统的中国月形门加以分隔,每个窗户的遮阳板上写着祝福旅途平安的汉字。尤为醒目的是,窗户上方绘有表现孔子周游列国情景的图画。飞机因此获得“中国客机”的美名。^[2]发行以孔子为主题的邮票同样意在展示正统。例如,1965年9月,台湾国民党政府对外宣布,将在孔子诞辰日发行面值为1元的孔子肖像邮票和面值为3.6元的孟子肖像邮票。报道分别就孔孟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做了介绍,并告诉集邮者,邮票一旦发行,就会在美国各百货商店出售。^[3]邮票面世之后,报纸立即予以报道,“中华民国”和“中国伟大哲学家”字样醒目地出现在报道之中。^[4]受惠于国民党文化正统攻势,在儒教复兴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朱熹也出现在了台湾发行的邮票之上。美国集邮协会计划在1970年3月举办邮展,台湾以中国三教代表人物的肖像邮票参展:代表佛教的玄奘、代表道教的华佗和“让儒教获得新生”的朱熹。^[5]中国传统文化极为看重的孝道,是1971年台湾邮政管理局发行的民间故事系列邮票的主题。八枚邮票中有三枚涉及孔子弟子:“躬

[1] “Get aboard the New Orient Expres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 23, 1971: 11.

[2] “New Taiwan Jetliner Uses Motif of Old China,” *New York Times*, Sept. 3, 1961: S9; Robert J. Serling, “Jet Plane Is a Flying Palace of the Orient,” *Chicago Defender*, Feb. 27, 1962: 10.

[3] “Local Post Offices to Sell 11/4-Cent Stamp,”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9, 1965: 17.

[4] Richard McP. Cabeen, “Orders Away—Postoffice,” *Chicago Tribune*, Oct. 17, 1965: G4.

[5] Franklin R. Bruns, Jr., “Stamp Collectors Plan a Convention,” *Washington Post*, Feb. 1, 1970: 140.

尽子职”(曾参采薪养母,克尽子职)、“负米养亲”(子路为亲负米百里之外)、“单衣顺母”(闵子骞衣以芦花而不责怪后母)。邮票设计图案可以向台湾邮政总局免费索取。^[1]

孔子本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台湾祭祀和尊崇孔子当属自然。但冷战的特定背景赋予了孔子之名以意识形态的寓意。国民党需要在大势已去的情形下继续维系中国正统的地位,受冷战影响的美国舆论需要支撑台湾作为亚洲反共的桥头堡。两种需要合为一处,孔子便成为了美国对华冷战的政治话语武器。

四、共产党的“反正统”形象

在大肆报道台湾国民党唯孔独尊的“正统”形象之时,美国报纸毫不吝啬纸墨,攻击中国大陆偏废孔子、自毁“正统”的举动。对于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不遗余力地抨击孔子思想保守落后的美国媒体而言,指责共产党的根本动机绝非为了重建孔子昔日的辉煌。割裂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的联系从而否定共产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才是真正目的。此举与假借孔子塑造国民党的正统地位互为呼应,为美国对华冷战呐喊助威。

孔子思想与共产主义“水火不容”的本质得到极力渲染。报纸声称,中国共产主义者是“一群完全新颖的中国人”。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者”,“孔老夫子肯定会感到惊诧和愤怒”。^[2]孔子震怒的原因之一,是他所奠定的传统家庭模式将被共产党彻底改变。“是革命者而非改革者”的共产党人,将枪口对准了陈旧家庭关系的每一个组成部分,让它与共产主义的要求保持一致。尽管新政府消除男权、改善妇女地位等举措与美国的所谓文明进步不谋而合,报纸依然从意

[1] David Lidman, “Filial Piety Is Honored in Taiwan,” *New York Times*, Sept. 12, 1971: D36.

[2] Tillman Durdin, “Much More Communist Than Chinese,” *New York Times*, Jul. 29, 1951: 136.

识形态斗争的角度，称赞传统家庭符合中国人的需求，有着深厚的根基。而“北平未必就能按照自己的模式创造一个全新的（家庭结构）”，依恋传统的“人民”可能会抵制。^[1]为贬损共产主义，报纸不惜为中国封建社会唱赞歌，宣称由于遵从“孔子的伦理教诲”，传统社会“高度尊重”人类尊严、个人权利和人的生命价值。共产主义的“唯一目标”就是夺取和维系政权。报纸由此得出结论，孔子思想与共产主义“完全对立”。^[2]如下报道形象地体现出“对立”状态。1954年9月，大陆广播“警告”台湾人，拟从9月28日开始炮击国民党占据的岛屿，而“孔子的传统生日正是9月28日”。^[3]

沿着这一逻辑，中国大陆思想领域的任何变革都被打上了违背正统的烙印。美国舆论声称，“毛的追随者”正在摧毁中国传统的思想原则，“甚至孔子都遭到清算”。^[4]更加危言耸听的是，“消灭孔子”是共产主义“压制中国人民”的步骤之一。^[5]报纸哀叹，虽然国民党中国仍然尊崇孔子，共产主义中国却让卡尔·马克思取而代之。如果孔子现身北京，谋求官职，共产党一定会让他“忏悔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接受彻底洗脑”。^[6]报纸断定，因为“毛和孔子从来不是政治盟友”，中国新政府肯定会在青年人获悉古代道德原则之前，给他们灌输共产主义。^[7]其他报道为此进行了“佐证”。比如，孔子著作已被禁止作为学校教材。^[8]孔子的《论语》不再是学校的入门读物，代之而起的

[1] Peggy Durdin, "Deep Challenge to China's Communists," *New York Times*, Jun. 15, 1958: 9, 10, 55.

[2] "Confucius Say...", *Chicago Tribune*, Sept. 28, 1971: N16.

[3] "Nationalists Report Hitting 34 Red Boats," *Washington Post*, Sept. 25, 1954: 4.

[4] Bill Murphy, "Book Depicts Grim Life in Red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Aug. 13, 1961: B7.

[5] "Tough Job to Break Reds' Grip on China, Says Author," *Los Angeles Times*, Sept. 10, 1961: L5.

[6] "Topics of the Times," *New York Times*, Mar. 13, 1955: E10.

[7] "New 'Heroes,'" *New York Times*, Aug. 24, 1952: SM4.

[8] "Chinese Communists Ban Confucius and Classical Teaching," *Chicago Tribune*, Aug. 12, 1951: 11; "Confucian Books Banned," *New York Times*, Aug. 12, 1951: 17.

是马克思主义口号。^[1] 作为“‘封建社会’的象征”，孔子极少被公开提及。^[2] “历史上伟大的学者孔子已在其故土声誉扫地”，他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教育家”遭到批判。^[3] 中国文化部据称召集了数十名教授和作家，专门改写孔子论著等中国经典，以便“符合‘人民民主’原则”。^[4] 类似举措被美国舆论贬称为“焚书”行动，与纳粹德国的新闻审查制度相提并论。^[5] 北京的辅仁大学曾是1949年以前中国著名高校之一，被人民政府接收亦在情理之中。但涉及此事的新闻报道故意淡化学校的宗教背景等原因，而是突出新政府与中国传统的“对立”。报道开始就指出，“辅仁”之名源于孔子名句“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尔后便是“中国共产主义者搜缴充公”云云，用意甚为明显。^[6]

即便是为了降低中国文盲率而施行的汉字简化改革，也被美国舆论视为大逆不道之举。自孔子以来，中国文字的结构没有变化，但共产党却决意进行“根本改革”。如此一来，“中国没有几块石头未被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者翻动过”。^[7] 从中国的文字改革中，美国报纸看到了“一条红色政治线索”。至于改革的后果，舆论更是危言耸听：“摧毁表意字可能是共产主义者未来计划的一部分”。^[8] 报纸预测，中国的下一代将对孔子所言毫无记忆，一切言行都将围绕共产主义展开。^[9]

[1] James Cameron, "The Rising Din of Peiping's Propaganda," *New York Times*, Feb. 13, 1955: 50.

[2] "Red China Builds College at Confucius' Birthplace," *New York Times*, Apr. 14, 1956: 38.

[3] Henry S. Hayward, "Who Heed Confucius Shouldn'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27, 1971: 12.

[4] "Confucius Say," *Los Angeles Times*, Sept. 5, 1950: A4.

[5] "Topics of the Times," *New York Times*, Nov. 19, 1950: E14.

[6] "Briefly Noted," *Chicago Tribune*, Oct. 5, 1967: B2.

[7] Henry Lieberman, "China's Linguistic Revolution," *New York Times*, Jan. 8, 1956: SM40.

[8] Gail Strong Ogilvie, "Reforming China's Languag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3, 1958: 22.

[9] "Mao's Ruthless Grip on Youth," *Chicago Tribune*, Jun. 14, 1953: B7.

中国官员似乎更早地印证了这种说法。善于现场编造中国谚语的一名西方记者,在中国官方招待会上屡试不爽。他凡是随口说出仿古“名言警句”,在场官员都会视作孔子或者老子格言。^[1]

以毛泽东代替孔子是美国报纸构建的中国“反正统”链条的核心环节。报纸宣称,传统中国以孔子思想为言行准绳,共产主义中国则试图让人们“按照伟大的毛泽东业已编撰成册的语录生活”。推崇毛及其哲学,中国即拥有了“一套明确意识形态和一位杰出的英雄”。^[2]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让他(孔子)的著作黯然失色”,代之以“毛的思想”。^[3]孔子崇拜“已经落伍”,“毛主义”正在改变着中国的社会与家庭结构。报纸假借“中国某些主要知识分子”之口宣称,中国抛弃悠久传统,无异于自杀。^[4]很多评论将矛头对准毛本人。例如,毛把自己看作“马克思主义孔子”,为中国社会确定道德、社会和经济规则。^[5]毛批孔的“真正目的”是让自己成为“孔子的继任者”,并像孔子一样,长久影响中国思想。^[6]报纸指责毛“侵占孔子的地位”,期望成为“中国最受尊重的预言家”。^[7]他“已经取代孔子”,一场“悄无声息而又明确无误的毛主义运动”正在中国展开。^[8]“孔子遭到清洗”、“毛已成

[1] John Hughes, "From the Book Reviewer's Shelf,"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20, 1968: 9.

[2] Robert S. Elegant, "There Is a Method in Red China's 'Madness,'" *Los Angeles Times*, Jun. 22, 1966: 5.

[3] Robert S. Elegant, "China Has Only One 'Thought,'" *Los Angeles Times*, Oct. 23, 1966: 3.

[4] "Communist China Evolves Regimented Culture of Mao,"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17, 1951: 12.

[5]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Mao Mystery,"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30, 1958: 8.

[6] Harry Schwartz, "Mao, Confucius, and the Red Guards," *New York Times*, Sept. 12, 1966: 44.

[7] Jack Anderson, "Keeping an Eye on Mao," *Washington Post*, Feb. 25, 1968: D9.

[8] Jack Anderson, "Mao Worship Flagging in Red China," *Washington Post*, Oct. 14, 1969: B13.

半神半人”等字样是美国报纸上比较常见的用词。^[1]甚至有报纸称呼毛为“孔子同志”。^[2]

红卫兵的极端举动自然是美国舆论不愿错失的攻击借口。报纸抓住机会告诉美国人,“贪婪”的红卫兵正在“极力摧毁”中国的一切传统,让毛成为“中国思想的唯一上帝”。他们“言辞激烈地抨击孔子的人格”。^[3]报纸突出红卫兵“散布激进主义的福音,辱骂孔子……强行剪掉西方发型”等,试图激起美国人对于“义和团暴乱和纳粹党徒”的恐怖记忆。^[4]走街串巷的红卫兵在孔子画像上写道,“我是牛鬼蛇神”,诅咒并焚烧孔子著作。类似事件甚至让香港的孔子信奉者都深感“恼怒”。^[5]红卫兵不仅在言辞上羞辱孔子,而且还对孔子故居进行破坏。他们大肆“洗劫”、“毁坏”,全因这位“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教诲有别于毛泽东思想”。曲阜孔庙遭到部分破坏,内中物件或被损毁,或被掠走。^[6]

在美国冷战舆论的笔触之下,反孔运动的后果就是中国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出现有悖于“常理”的政治与社会现象。离政权更迭仅仅两年,中国发生的变革就令曾经在华长期生活的西方人毫无思想准备。家庭体系和孔子伦理都“经受着共产主义的严厉攻击”,传统中国的人本主义、中庸天赋和幽默感已经荡然无存。^[7]遵循孔子思

[1] “Mao Seen as Demigod; Confucius ‘Purged,’” *Washington Post*, Jan. 9, 1960: A4; John Roderick, “Red China: ‘World of Innocence’ Guided by Mao’s ‘Pure Religion,’” *Los Angeles Times*, Apr. 20, 1971: 1.

[2] “Grin and Bear It,” *Washington Post*, May 23, 1962: A17.

[3] “Bar Care of Graves,” *Chicago Tribune*, Oct. 18, 1966: B6.

[4] Elizabeth Pond, “What’s Afoot in Red Chin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26, 1966: 13.

[5] Eric Pace, “Confucius Is Reviled by the Red Guards after 25 Centuries,” *New York Times*, Oct. 16, 1966: 7.

[6] Samuel Jameson, “Mao’s Backers Order Cutoff of Foes’ Funds,” *Chicago Tribune*, Jan. 17, 1967: 14; “Confucius Shrine Vandalized,” *Washington Post*, Jan. 18, 1967: A13; “China Rebels Said to Be Confined,” *Chicago Defender*, Jan. 18, 1967: 2.

[7] Henry R. Lieberman, “What We Do, and Don’t, Know about China,” *New York Times*, May 20, 1951: SM7.

想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友好而又合群的民族”，但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却在朝鲜表现出“不可理喻和不近人情”的一面，既不遵守国际行为准则，又冷酷僵化。^[1]而在国内，中国的家庭历来以大为荣，但“共产主义政府倾尽全力”，在“孔子国度”实行计划生育。这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在所有领域重塑中国传统思想”努力的一部分。^[2]自由恋爱本应符合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舆论的口味，却因为是共产党所提倡而受到抨击。“自圣人孔子时代以来一直延续”的父母包办婚姻，居然被比作欧洲王室的婚姻制度，而自主婚姻却被描述为麻烦制造者：新婚姻法颁布仅仅 18 个月，华中华南就有一万名女性自杀或被杀。因此，“可以肯定”，包办婚姻的优点多于缺陷。^[3]寓居美国的李宗仁也不甘落寞，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声称，孔子的道德体系确立了包括夫妻在内的“正确关系”，是中国人作为民族和国家存在的“唯一原因”。共产主义与中国文化“如此格格不入”，它“绝对不会繁荣昌盛”。^[4]那些延续孔子传统的人不是远走他方，就是遭到打击。在中国解放初期逃亡香港的 75 万“难民”中，美国记者发现一位耄耋老者。看似学者的老人“极似孔子雕像”，“古老中国恬淡的智慧和耐性似乎都写在他的脸上”。即使衣衫褴褛，也难掩“固有的尊严”。^[5]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则因为在孔子诞辰日向孔子表达敬意而横遭批判。标题中“毛的敌人”字样带有明显的引导目的。^[6]

美国舆论无心关注中国变革的真正动因或者这些变革是否确有其事，他们看重的是孔子遭遇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斗争价值。报纸不顾自身一直诋毁孔子的历史，把尊孔与否当作衡量中国新政府存在合理

[1] “China’s View of the Boxer Catastrophe,” *Washington Post*, Jan. 22, 1956: E6.

[2] “Reds Urge Birth-Control Campaign in Land of Confucius,” *Washington Post*, Aug. 16, 1957: A6.

[3] “Romance in the Land of the Dragon,” *Los Angeles Times*, Oct. 31, 1951: A4.

[4] “China Will Toss out Reds and Chiang, Says Li,” *New York Times*, Mar. 12, 1950: 14.

[5] Norman Vincent Peale, “Faces of Orient Mirror Wisdom,” *Washington Post*, Sept. 21, 1957: D7; “Mark of the Far East: Its Appealing Faces,” *Chicago Tribune*, Sept. 21, 1957: 17.

[6] “Foe of Mao Accused of Confucian Views,” *New York Times*, Jan. 24, 1967: 11.

性的标准。针对所谓焚烧孔子著作等举动，评论者断言，这是“虚弱的表现”，说明当政者“藐视公民的智力和尊严”，只能通过“暴力和情绪”而不是“理性和逻辑”来统治。^[1]孔子的深远影响力成为报纸指责中国共产主义根基薄弱的工具。他们预测，孔子思想持续数个世纪，“共产党的道学”有可能延续一代人之久。^[2]他们或者挑战道，中国人至今还在虔诚地引用孔子语录，毛是否成功，必须看其言论是否从今往后被引用一千年。^[3]面对势头强劲的共产主义，舆论甚至希望中国回到皇帝春秋两季祭祀孔子的封建社会：“如果共产主义者仍然遵循这一惯例，我们就不必丧失对于中国的所有信心。”^[4]但事实却是，就解释中国变革的能力而言，专研孔子的东方学学者已经不如了解列宁和斯大林的专家了。^[5]

五、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两难”处境

然而，中国的共产主义又无法摆脱孔子思想的强大影响力，造成共产党人在孔子传统面前欲罢不能、欲破不立的两难境地。这是美国冷战舆论假借孔子正统地位、攻击共产党政府话语策略的第三要素。面临孔子思想的客观引力和实践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愿望，中国共产主义被描述为与两大正统都相去甚远的思想。如此而来，共产主义在中国既缺乏历史根基，又与国际共产主义迥然有异。舆论的贬损目的一目了然。

报纸花费大量精力挖掘中共领袖“言不由衷”的性格特点：他们

[1] “Mao Burns the Books,” *New York Times*, Aug. 24, 1950: 25.

[2] “The Mind of Youth Is Tilted in China,” *Washington Post*, Jul. 31, 1966: E2.

[3] Stanley Karnow,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Washington Post*, Jul. 23, 1967: G8.

[4] Frederic E. Faverty, “Facing the Future with Confucius,” *Chicago Tribune*, Aug. 11, 1957: B2.

[5] “The Bookshelf: Concise Volum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sm,”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13, 1951: 12.

虽然信奉共产主义，其潜意识却有着挥之不去的孔子情结。毛泽东是关注的焦点。按照美国报纸的解释，中国共产主义有三大推动力量：儒家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古代中国的帝国主义。尽管共产主义“公开声称的目标之一就是根除儒家思想的残余影响”，但并未成功，因为“毛泽东不断重复孔子格言，赋予它们彻头彻尾的现代含义”。^[1]另有评论指责道，毛接受共产主义就意味着抛弃所有孔子原则，但其文学风格却“暴露了所受的儒家教育”，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总能找到孔子思想的某些痕迹，尽管“没有指名道姓或有歪曲之嫌”。^[2]美国著名汉学家顾立雅 (H. G. Creel) 也认为，毛泽东“深受孔子影响”。^[3]媒体猜测，在成为共产党领袖之前，毛跟其他知识青年一样，“一定花费时间研读过孔子”。证据之一就是，毛和孔子的名字中都有“tse”字。^[4]事实上，这是姓名翻译导致的误解。在汉语拼音被西方人接受之前，中国人名地名的英译皆采用威妥玛-翟理斯 (Wade-Giles) 罗马拼音体系，“泽”和“子”都是“tse”，故有引文中的理解偏差。虽然给出的原因令人啼笑皆非，评论者的意图却很明显。毛的某些宣传策略也被引为佐证。作为“孔子和马克思的继承人”，毛和他的同志“视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为最高真理，必将胜利”。^[5]毛效仿孔子，提出中国人应该遵循的美德，并且要求共产党员不能满足于形式上的信仰，而是必须从内心表现出来。^[6]

中共其他领导人潜藏的孔子情结也时常被展现出来。周恩来就

-
- [1] Robert Payne, "The Drive behind China's Communism," *New York Times*, Dec. 17, 1950: 45.
- [2] Richard Hughes, "The Long March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Times*, Sept. 21, 1958: 83.
- [3] Wing-tsit Chan, "From Confucius to Communis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 16, 1953: 11.
- [4] "Topics of the Times," *New York Times*, Jul. 7, 1957: 118.
- [5] Stanley Karnow, "Unhappy New Year for China's Mao," *Washington Post*, Jan. 23, 1966: A2.
- [6] Dennis Bloodworth, "China's Heroes Cite Mao's thoughts," *Washington Post*, Dec. 12, 1966: A23.

是提及次数较多的例子。有报道认为，周姓源于周朝，而周朝产生了孔子。周恩来因此自幼习读四书五经，虽然后来如同所有共产主义者一样，斥责这些经典“封建”、“反动”。^[1] 曾任蒋介石秘书的吴国桢在《芝加哥论坛报》撰文，以自己与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同学经历，证明周的确受到孔子潜移默化的影响。据称，当时的南开学生流行竞猜谜语的游戏，周恩来的谜面当中就有孔子语录。^[2] 周恩来甚至有“儒家共产主义者”之称。创造这一称呼的文章相信，“考虑到所有证据”，周恩来“极其自然地”从孔子思想过渡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就是孔子老同志新的革命原型”。^[3]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引用了孔子、孟子和中国其他哲学家的话。^[4] 陈毅则公开宣布，他的思想既有共产主义信仰，也有孔子、孟子甚至资产阶级成分。尽管投身革命 40 年，非共产主义因素仍然未能从头脑中清除。^[5]

美国报纸上的中共不仅经受着自身的孔子情结的拉力，同时需要面临民众经久不息的孔子崇拜。冷战时期的美国报纸不断刊登文章，显示中国民众的孔子信仰，证明共产主义没有成功占据中国人的思想。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书评，“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民众已经皈依马克思主义”。他们接受共产主义既是出于历史惯性，因为他们有着久远的社会与经济公有体制，也是因为孔子教导的宽容原则。^[6] 东方人的生活基于传统认可的行为模式，中国人就“把孔子确立的礼

-
- [1] James Cameron, "The Man Who Speaks for Red China," *New York Times*, Mar. 6, 1955: 68.
 - [2] K. C. Wu, "Wu's Inside Story of Life of Chou En-lai," *Chicago Tribune*, May 1, 1955: 2.
 - [3] Richard Hughes, "Peking's 'Indispensable' Front Man," *New York Times*, Oct. 4, 1964: 16, 113.
 - [4] Wing-tsit Chan, "From Confucius to Communis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 16, 1953: 11.
 - [5] Takashi Oka, "Chinese Youth: How Much Rednes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16, 1961: 14.
 - [6] Walter Karig, "A Reporter at Large in China," *Washington Post*, Oct. 2, 1955: E6.

仪概念当作不可争辩的事实”。^[1] 孔子和众多手工艺人、艺术家、诗人以及其他杰出人物，揭示出“中国特性无尽的活力和创造力”。^[2] 即使在朗读毛主席语录时，中国人据称也是以“吟诵孔子语录的声调”进行的。^[3] 山东曲阜的人们更是因为孔子而倍感荣幸。他们会“自豪地”带领游客参观孔子降临人世的地方。^[4] 在孔子曾经登临的泰山，一块古老的石头上刻着：“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5]

《洛杉矶时报》的几幅漫画用孔子的口吻讥笑中国出现的经济困难，在贬损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同时，凸显了孔子对于中国民众的感召力。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在农村实行高度集约化。漫画上一群衣着破烂的农民，在身背步枪的“英雄”押解下走向集体住房。文字说明写着：“不要抱怨，农民同志们！……子曰：‘苦难就喜欢成群结队的人！’……”所以，孔子既是漫画中政府用以说服民众的工具，也是“苦难”的见证者。^[6] 饥肠辘辘、排队等候领取食物的人群是另外一幅漫画的主题。仍然信奉孔子的民众说道，“政委同志，子曰，没有饭吃就投奔共产主义！但他是否说过，共产主义者没有饭吃又投奔谁？”^[7] 第三幅漫画讽刺中国的工农业冒进。共产党人摔倒在地，摔成几半的镰刀斧头上写着“农业欠产”和“工业失败”字样。旁观者说，“子曰，冒进之前先看清楚”。^[8]

因为有了前述铺垫，中国政府对于传统的任何重视，都会被归结为共产主义在孔子思想背景下进退维谷的“境地”。与所有新生政权一样，新中国必须促进社会发展，以解决民生问题。但美国冷战舆论并不认为共产主义能够提供解决方案。大凡中国将注意力转向经济

[1] “Oriental Life, Designed Like a Garde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17, 1950: 12.

[2] Randall Gould, “From the Bookshelf,”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23, 1953: 9.

[3] Clarence Petersen, “Mao’s ‘Mein Kampf,’” *Chicago Tribune*, Mar. 26, 1967: J9.

[4] Francois Sully, “A Baedeker on Red China,” *Washington Post*, Jun. 12, 1966: E2.

[5] “T’ai Shan in Summe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3, 1954: 8.

[6] Lichty, “Grin and Bear It,” *Los Angeles Times*, Feb. 19, 1959: B5.

[7] Lichty, “Grin and Bear It,” *Los Angeles Times*, Dec. 11, 1961: B5.

[8] Untitled, *Los Angeles Times*, Nov. 3, 1963: L3.

建设，报纸总会解读称，这是共产党迫于现实压力而向孔子正统思想作出的妥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中国新政府在1956年为发展科技和繁荣文化事业而作出的重大决策。然而，这在美国报纸看来，不过是中共出于现实需求，向中国正统思想让步的权宜之计。“百家争鸣”之说源于孔子生活时期的思想辩论，毛泽东也要求总结从孔子到孙中山时代的中国历史，并加以利用。^[1]陈毅在1961年发表讲话，以自己“仍未根除孔子思想”为例，要求学生不要拘泥于政治思想的限制，应该开阔眼界。陈毅的表态据信起因于“中国需要专家和技术人员”的现实。^[2]到了1960年，中国开始遭受连年饥馑，解决民众温饱成为政府考虑的焦点问题。美国报纸及时引用了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的名句，认为中国的政策调整表明，实施2400年前的（孔子）语录“在1962年的中国依然有着极端的紧迫性”。^[3]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导致中国内外生存环境堪忧。国内团结迫在眉睫。经过美国舆论的解读，以此为主旨的全国人大决议成为中共被迫向正统妥协的又一范例。“为帮助人们忘记（过去的矛盾）”，北京宣布愿意作出让步，“甚至到了抛弃社会主义原则的程度”。“决定向孔子表达敬意”就是众多让步之一。^[4]普通的考古发掘进一步“印证”着美国报纸的判断。1971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最古老的孔子《论语》手写卷轴。在简要报道这一消息之时，报纸发表评论称，这标志着“官方对中国传统重新产生了兴趣”。^[5]

[1] “Peiping Relaxes Curb on Debate,” *New York Times*, May 27, 1956: 21.

[2] Clare McDermott, “Need Not Be ‘All Red,’ Chinese Youth Is Told,” *Washington Post*, Sept. 12, 1961: A11.

[3] “Red China Applies Brake as Potholes Shake Economic Juggernau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20, 1962: 3.

[4] Sidney Liu and Robert Karr McCabe, “Peking Seeking Unity in ‘Go-It-Alone’ Drive,” *Washington Post*, Apr. 22, 1962: A1, A17.

[5] “Chinese Dig Up Old Sayings,” *Chicago Tribune*, Jul. 26, 1971: 4; “For the Record,” *Washington Post*, Jul. 26, 1971: A7; “Peking Reviving Interest in Past,” *New York Times*, Aug. 1, 1971: 6.

美国的冷战舆论挖掘出中国共产主义与孔子之间或明或暗的各种联系,既有领导人个人教育背景和思维潜意识,亦有政策层面的变通。但披露的语气显然与赞扬相去甚远。共产主义者牵涉孔子,或者是在利用孔子巨大的民众感召力,或者迫于窘迫的现实处境。总之,美国舆论无意塑造共产主义在中国传统语境下的正统形象,而是极力突出中共在正统中国传统和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进退维谷”的境地。用报纸的话来说,孔子对于中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1]中国政府偶尔重提孔子之举表明,孔子“拒绝入土为安,至少在中国民众的头脑里是如此”。^[2]

六、以孔子为据的东亚政策建议

既然孔子是东亚各国民族特性的根本,而且共产主义似乎又在孔子面前进退维谷,美国的东亚冷战政策就应以孔子为突破口,通过尊重和实践孔子思想赢得东亚民心,促进美国的冷战利益。然而,舆论发现,如此顺理成章而又切实可行的政策逻辑却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足够重视,美国因此在与东亚共产主义的较量中频频受挫。在此背景下,颇有旁观者清之感的美国舆论着眼于孔子的地区影响力,为美国的东亚反共政策提出一系列建议。

建议之一,美国不应夸大共产主义对东亚社会的渗透程度,避免制造过于紧张的冷战心理,导致政策失误。作为著名的“欧洲第一主义者”,20世纪50年代初掌控美国外交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是因为不知道东亚思想特性而作出错误政策导向的代表。艾奇逊“既不了解也不关心太平洋问题”,他在欧洲取得成功的同时,在亚洲失误连连。舆论愤怒地指出,如果没有如此众多的错误需要更改,美国应对东亚冷战就会更加得心应手。舆论特地模仿孔子语气,

[1] “Confucius Poses Problem,” *Washington Post*, Jan. 7, 1962: E7.

[2] “Confucius Debated in Red Chin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15, 1962: 3.

告诫美国政府，“假设手握铅笔的人书写娴熟，就不用经常使用橡皮擦”。^[1]另一评论赞同此说，断定艾奇逊的思维“无法与孔子保持一致，而是与欧洲哲学家步调默契”。他所依赖的智囊群体与其趣味相投：“他们错了，他也错了。”^[2]

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是因在东亚政策中漠视孔子原则而遭报纸批评的另一官员。腊斯克在一次讲话中故意忽略新中国的存在，被认为未能领会《论语·子张》中“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的要求。这不仅显示腊斯克本人无意真正了解中国，也将让美国在亚洲四处碰壁，危及美国的全球冷战利益。^[3]报纸还披露，美国国务院甚至对民间学术交流都严加阻挠。撰文者指出，此类举措切断了美国人深入了解中国及其传统的渠道，而且违背人类社会自孔子以来确立的思想交流不受国家冲突干扰的惯例。^[4]

以艾奇逊等人为代表的外交决策者相信，自新政府成立以后，中国的思想阵地已完全被苏联共产主义所占据。报纸批评这种论调“忽略了实际情形”，因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他们信奉孔孟，“不是……长着杏眼和黑色直发的特别的欧洲人或美国人”。^[5]曾两度出任以色列总理的本古里安（Ben Gurion）在接受美国报纸采访时发表了相同见解。本古里安确信，因为孔子的深远影响，“中国人首先是中国人，而不是共产主义者”，“美国决不可仇恨中国人”。^[6]《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表示，美国如果不再将中国人集体视为共产主义者，而是看作带有孔子式睿智和鲜明个性的民众，并将民众与共产党政府区别开来，就能制定出“更具现实意义的（对华）政策”。^[7]该报的另一评论呼吁，

[1] “By the Way with Bill Henry,” *Los Angeles Times*, Sept. 17, 1950: B1.

[2] “By the Way with Bill Henry,” *Los Angeles Times*, May 26, 1951: A1.

[3] Arthur Krock, “The Oratorical Wing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Times*, May 24, 1951: 34.

[4] “Bann on China Visit Queried,” *New York Times*, Sept. 11, 1955: E8.

[5] “China’s Fall Bares ‘Superman’ Tricker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7, 1950: 9.

[6] W. Granger Blair, “Visit with Ben Gurion in the Desert,” *New York Times*, Jan. 12, 1964: 61.

[7] “Visualizing the Chines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15, 1954: 20.

制定政策者最好能够拥有孔子的性格特点：“温和、冷静、文雅——对了，还有超然。”这样，对华冷战策略便可更见成效。^[1]

建议之二，因为孔子在东亚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需要在东亚政策中尊重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当地传统。加拿大外交部长莱斯特·B. 皮尔逊 (Lester B. Pearson) 于 1955 年 4 月在普林斯顿大学所作的演讲以此观点为主旨。美国各大报纸竞相报道，可见对于皮尔逊见解的认同程度。皮尔逊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必须证明，自己无意‘以可口可乐交换孔子’”。东亚的孔子信仰应该在汹涌而入的欧美技术浪潮中得到尊重和保护。^[2]《华盛顿邮报》点评道，宗教在亚洲人的生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忘记这一点的美国人……应该记住皮尔逊的忠告”。^[3]皮尔逊所言并非贬低经济援助在反共战略中的重要性，而是提醒人们，“美国不可能通过倾注金钱和经济惠买来盟友的合作”，思想与精神的投入同等重要。^[4]同年召开的万隆会议聚集了众多亚洲国家，强调“亚洲人共有的政治与哲学思想”。在美国舆论看来，此次会议佐证了皮尔逊观点的正确性。如果总统和国会能够在援助亚洲的过程中尊重包括孔子在内的文化传统，这将是针对万隆会议指责美国缺乏和平意愿的“重要回应”。^[5]《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感叹道，随着美国在远东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如果美国官员能够阅读孔子和毛泽东的原著，“他们将对我们的平民百姓作出何等巨大的贡献啊！”^[6]

根据舆论分析，美国在远东地区冷战政策失误的症结之一就是一厢情愿地认为，“钱永远可以解决一切”。但事实上，即使饥肠辘辘，

[1] Richard L. Strout, "Politely Bol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14, 1966: 18.

[2] "West Is Told Asia Cannot Be Bought," *New York Times*, Apr. 15, 1955: 5.

[3] Donald Wilhelm, Jr., "The U.S. Could Regain Friends in Asia," *Washington Post*, May 29, 1955: E3.

[4] Max Freedman, "Canadian Talks Wisely about Allies and Arms," *Washington Post*, Nov. 27, 1955: E7.

[5] "Asian Aid Shaping Up,"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18, 1955: 16.

[6] "Letters to the Times," *New York Times*, Dec. 25, 1950: 18.

亚洲人仍然“非常敏感，非常自豪”，因为孔子教导他们，名声比生命更重要。^[1] 一个形象的例子是，如果美国提议“用抽水马桶交换整套孔子思想”，那“只能”让中国人和其他亚洲民众感到震惊。^[2] 报纸宣称，普通亚洲人与普通美国人的生活需求别无二致，都希望在分享世界财富的同时捍卫各自的信仰权利。^[3] 东亚的信仰当然以孔子为核心，美国的东亚政策应该因此作出调整。

建议之三，从作为东亚本土传统的孔子学说中寻求灵感，有效遏制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渗透。台湾是美国东亚反共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而孔子总能让关注台湾的美国舆论找到灵感。例如，20 世纪 50 年代，报纸奉劝大势已去、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放弃反攻大陆的梦想，转而拿出“孔子的智慧和关羽的勇气”，采取更切实际的步骤，与共产主义者展开“和平竞争”，如团结海外华人和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等。^[4] 报纸还未雨绸缪，呼吁美国政府支持台湾独立，以保证在共产党政府获得国际承认之时，台湾仍能名正言顺地获得联合国认可和美国的庇护。摇唇鼓舌者的根据就是孔子“必也正名乎”之说（《论语·子路》）。^[5]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时美国人的傲慢姿态一经图片报道，也让美国反共舆论欢欣鼓舞。报纸反问道，“难道孔子没有说过‘百闻不如一见’吗？”如果说，人们就会明白谈判进程不为“共产主义宣传”所主导。^[6] 着眼于压缩中国共产主义的国际生存空间并以孔子原则为参照，舆论还提醒美国政府注意印度偏袒中国大陆的倾向，认为印度的举动不符合孔子“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的要求。就算印度此举出于改变国内贫穷之需，

[1] Walter Trohan, "Report from Washington," *Chicago Tribune*, Aug. 10, 1960: 2.

[2] "Standard of Living,"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15, 1951: 20.

[3] Chester Bowles,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Asia," *New York Times*, Jan. 4, 1953: 43.

[4] Takashi Oka, "Choices for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29, 1957: 16.

[5] "Two-China Plan Opposed," *New York Times*, Dec. 17, 1961: E8.

[6] "Ridgway Stops It," *Los Angeles Times*, Jul. 13, 1951: A4. “百闻不如一见”实际并非孔子所言，而是《汉书·赵充国传》中的名句。

支持共产主义还是有悖孔子的另外一则语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1]

至于另外一个因为共产主义而威胁到美国冷战利益的儒教国家越南，报纸同样从孔子那里找到了强硬立场的灵感。“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本是中国习语，其出处无从考证，但《洛杉矶时报》却视其为孔子箴言，认为约翰逊总统和美国在越的军政要员应该从中吸取深刻教训：“赢得战争、剿灭越共、开通道路、提供永久安全”方为上策。如果“信奉孔子的人们”确信“‘天命’站在西贡一方”，战争进程就会大大短于预期。^[2] 战术核武器甚至都被舆论作为美国可以选择的战争手段提了出来。舆论诡辩道，孔子都说，美国应避免陷入亚洲地面站，有限使用核武器能够提升战争效率，在道德上是可以立足的。^[3] 面对美国国内汹涌澎湃的反越战浪潮，仍有舆论支持政府既定的越战政策。报纸断言，就迎击越南的共产主义而言，反战者不具备政府的洞察力，他们只是孔子名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中的“民”。所以，民众只需遵循政府政策，而总统和国会不必理会民众质疑和反对越战的声音。^[4]

中越两国同为儒教国家和美国在亚洲进行冷战的主要对手。假借孔子之名点评美国在亚洲的冷战策略与地缘政治语境颇为吻合。就两国在政策建议舆论中获得的关注程度而言，中国显然多于越南，且呼吁对华缓和者所占比例明显较大。其中有孔子身为中国哲学家的因素，也与中国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密不可分。三条建议既分析了美国东亚反共政策失误的症结，又针对民众和共产主义者提出了软硬兼

[1] “An Indian View of Mao's China,” *Washington Post*, Aug. 17, 1952: B4.

[2] John Randolph, “Confucius Still a Factor on 2516th Birthday,” *Los Angeles Times*, Sept. 30, 1966: 14.

[3] William F. Buckley, Jr., “Not the Reds—This Time,” *Los Angeles Times*, Feb. 23, 1968: A5.

[4] C. L. Sulzberger, “Foreign Affairs: A Game of Dominoes Begins,” *New York Times*, Mar. 15, 1970: 186.

施的策略，其根本目的在于化解共产主义在亚洲给美国地位和利益造成的冲击。

七、美国全球冷战舆论中的孔子

冷战不仅涉及美国与中国、美国与东亚，更是美国与苏联发动和维系。两个超级大国的明争暗斗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巨大威胁，严重程度远超中美冷战。出于对自身处境的担忧，在放眼世界冷战格局时，美国舆论普遍对现状表示不满。很多发表见解者以孔子思想为参照体系，批评世界的混乱秩序和美苏两国在其中发挥的推波助澜作用。

世界各国本应和平共处，国际政治的现实局面却与理想状态相去甚远。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就在尝试相互学习、互通有无。体育运动的交流和相互启发便是一例。孔子曾经要求中国人学习箭术，提升礼仪和道德水准。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板球教练带着同样目的训练学校男童。中国的风筝比赛也漂洋过海，成为西方体育竞技和日常娱乐的一部分。^[1]到了二战以后，联合国承载着人们对于国际和平的希望。但形势的发展出乎联合国设计者的初衷，世界仍然显得凌乱无序。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名言概括了联合国的宏伟蓝图。然而，距离联合国方案的提出仅仅数年之后，世界各国就已陷入冷战之中。^[2]报纸指出，孔子视诚信为君子美德之首，联合国的无所作为就是因为成员国缺乏诚信所致，是“当前尔虞我诈的国际范例”。联合国没有民主，充斥着“所谓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国家”的秘密操控。^[3]模棱两可的外交词汇被认为是国家间缺乏诚意的恰当注解。外交官使用的谈判语言晦涩难懂，个中奥妙常人很难把握。回答如果为政、“子

[1] Dennis Bloodworth, "The Sporting Life of the New Orient," *Washington Post*, Jan. 3, 1966: 14.

[2] "Mr. Acheson Reports," *Washington Post*, Jun. 1, 1950: 12.

[3] "Adding Up Achievements of U.N.," *Los Angeles Times*, May 28, 1951: A4.

将奚先”的问题时，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口若悬河的冷战外交官，正是因为忘记了孔子要求言辞必须达意的古训，才令世界局势纷繁复杂。^[1]迫于各国民众巨大的和平呼声，国际条约不可谓不多，但都以用词模糊而难以切实执行而告终。舆论指责条约制定者遵循“不要过于相信对手”的外交游戏规则，故意在起草条文时闪烁其词，违背孔子的如下语录：“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2]

造成如此和平困局，美苏两国难辞其责。舆论对于美苏的负面作用皆有批判。根据报纸舆论，美国的责任不在于其制度和观念本身的缺陷，而是起因于美国走向了过于理想化的极端。美国人认为，世界就应该按照“理想”模式运转。如若不能，美国人便会全盘否定他国和平进步。以此为出发点，他们或者冷眼旁观，或者介入过深。而两种策略都对世界和平有害无益。纽约布鲁克林一位犹太教领袖宣称，美国存在一种“谴责整个国家或国家里的整个民族”的趋势。美国人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因为耶稣和孔子等圣人的存在，“整个世界都值得拯救”。^[3]

另一方面，美国推卸责任的做法同样令舆论感到不满。很多人将不够坚决的美国和平意愿归咎于美国母亲对于孩子的过分宠爱，此举让美国青年失去斗志。随着美苏冷战对抗的升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与日俱增。“母亲应该受到指责”的论调卷土重来。然而，有人指出，这种观点有失公允。孔子认为，君子自责，小人责怪别人。因为美国的对外困境而指责美国母亲者不能算作君子。^[4]而在国际上，美苏两国相互推诿。这显示，美国并不知晓“和平的本质”。孔子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1] C. L. Sulzberger, "Calling Things by Their Right Names," *New York Times*, May 13, 1959: 36.

[2] Marilyn Berger, "Negotiation and Statecraft in Fact and Fable," *Washington Post*, Dec. 7, 1970: 20.

[3] "Right to Be Told Asked for World," *New York Times*, Nov. 10, 1957: 44.

[4] "'Momism' Refuted," *Washington Post*, Jan. 31, 1951: 12.

先修其身”(《大学》“经文”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缔造和平的必然步骤。美国政府裹足不前令人不安:“我们在等待俄国人迈出第一步吗?”如果真是如此,等待将无济于事:“要给世界带来和平,你自己必须心平气和。这是第一步。”^[1]而在另外某些时候,美国则会犯下过多承担世界义务的错误。就因为拉美之行中发出“世界财富属于所有人”的豪言壮语,约翰·肯尼迪总统受到美国舆论的批评。抗议者认为,肯尼迪“完全忽略”唯有劳动才有收获的美国原则。“在帮助人类的幌子之下”,从孔子到大宪章的所有文明进步都将前功尽弃。^[2]甚至有人置美国冷战思维于不顾,提出让俄国人成为美国盟友的设想:美俄携手,共同抗击疾病,让科学服务于和平。这是因为,孔子和耶稣等圣人所宣扬的人类和平理想无疑是正确的。^[3]

相比之下,苏联阻碍世界和平的举动据信不仅是态度和策略问题,而是制度本质使然。美国舆论显然难以逾越冷战背景的限制,苏联被刻画为不容许任何异己存在的专制体制,因此无益于世界和平。《华盛顿邮报》摘登的杜鲁门日记直言,“我不信任极权主义国家”。苏联被视为此类国家的代表。极权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另类,不能引领人们走向“期盼已久的太平盛世”。唯有遵从孔子和耶稣以不同方式表达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世界和平方可得到保障。^[4]国务卿艾奇逊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抨击苏联只顾夸夸其谈,不愿将孔子、耶稣和菩萨等人的教诲付诸实践,导致联合国宪章承载的崇高理想流于空谈。^[5]即使声称坚决不谈政治的国际笔会(P. E. N.)也禁不住批判苏联对和平的威胁。笔会的波兰代表称呼苏联共产主义者为“斯大林主义妖魔”,并且问道,“如果妖魔再来,我们该怎么办?”面

[1] “The Nature of Peace,” *Chicago Tribune*, Dec. 25, 1959: 22.

[2] “Everything for Nothing,” *Chicago Tribune*, Jan. 2, 1962: 16.

[3]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New York Times*, Jan. 12, 1958: E10.

[4] William Hillman, “‘Mr. President’: Truman’s Views on Russian Attitude Revealed in Letters to Mrs. Roosevelt,” *Washington Post*, Apr. 28, 1952: 7.

[5] “The Text of Secretary Acheson’s Statement at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Times*, Oct. 17, 1952: 8.

对聚精会神的听众，他以孔子语录作答：“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即孤立苏联。^[1] 苏联抵制“文明进步”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据称，苏联不允许笑声。如果有谁敢于取笑自己的同志，他将被打入冷宫。但玩笑作为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从来有之。孔子在公元前 500 年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诗经·大雅·瞻印》）报纸解释曰，诗歌的原作者可能在嘲笑皇帝和他的宠妾。既然如此，苏联人居然不能嘲笑同志便显得不可理喻。^[2] 在某些美国人看来，如此单调沉闷的苏联连与美国共处的资格都不具备。历史上的中国通常多国并存。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孔子等伟大哲学家。但在战后世界，美国认可共处原则就等于接受苏联的“极权制度”及其缺陷。这超越了美国的冷战底线。^[3]

冷战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分化对方阵营便是其中的策略之一。根据不同冷战对象，分化策略各有侧重。美国在东亚面临的冷战对手具有两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因此，有关孔子的作用引起美国冷战舆论的高度重视。孔子从一个备受美国媒体冷嘲热讽的历史人物，一跃成为能够化解东亚共产主义凌厉攻势的冷战利器。这是国际政治在文化传统上的投影。涉及东亚的美国反共舆论赋予孔子三大功能。第一，证明共产主义未能从根本上主导东方人的思维模式，东亚民众甚至共产主义者仍然生活在孔子的文化遗产之中。中国新政府潜藏的孔子情结和台湾国民党的处处尊孔，尤具说服力。第二，映衬东亚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所谓怪异和不合常理之处，支撑包括台湾在内的美国盟友。第三，为美国政府指明东亚冷战困局的文化症结，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论及东亚之外的冷战局势，苏联体制的“本质”缺陷和美国的策略失误，均因孔子的映照而显露无遗。

[1] Elizabeth Janeway, "The P.E.N. in Tokyo," *New York Times*, Oct. 6, 1957: 294.

[2] Walt Kelly, "A Crying Need for the Cleansing Lash of Laughter," *New York Times*, Aug. 10, 1952: BR5.

[3] George Sokolsky, "These Days...", *Washington Post*, Oct. 13, 1954: 15.

然而，在建构几大功能的过程中，撰文者无意深究孔子人格及其思想的精深与玄妙，其认识仅仅停留于孔子与传统中国不言自明的联系以及孔子的只言片语。从这层意义而言，冷战时期美国反共舆论对于孔子的理解缺乏深度。与此同时，孔子承载的时代内涵表明，美国冷战舆论的孔子观具有明确的实用主义倾向。出于促进美国反共利益的现实目的，报纸故意夸大孔子思想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人为割裂东亚国家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在一定程度误导了美国民众对于东亚思想传承的认识，让他们在中国重新重视以孔子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时缺乏心理准备。但舆论呼吁美国在东亚政策中尊重东亚传统、引用孔子批判美苏两国的冷战外交，这些举动却是值得肯定的。反共舆论固然不能等同于美国的反共政策，却是美国冷战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国内有着浓厚的冷战氛围，以及以孔子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在异域和异质语境下发生意义转变的普遍现象。

第十六章

孔子：美国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监督者

孔子勤于思考，洞察敏锐，留下众多治世与处世哲理。孔子思想不仅左右着中国的政治进程，也通过著作译介，进入西方社会的政治话语体系。美国报纸上的政治评论就是孔子与欧美政治相互结合的实例。引用孔子对政治制度、政治人物、政府决策和社会问题评头品足，在美国的新闻传统中历来存在，每一时期都会为这种评论打上新的烙印。20 世纪 50—70 年代，美国社会经历从繁荣和谐到群体权利斗争的转变，报纸评论因应时代变化，在及时反映世事变迁之余，总能给以发人深省的点评。孔子的出现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成为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参照对象。

一、抗议运动中的孔子

二战结束至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弱势群体权利意识的广泛觉醒。一旦从休眠状态唤醒，这种意识立刻转化为行动，成为影响深远的政治与社会运动。围绕弱势群体的权利话题，以及由此引申开来的各种抗议主题，人们以报纸为媒介，或褒或贬，直抒胸臆，形成一道独特的舆论风景。引用孔子作为旁证的情形时有所见。以观察犀利著称的孔子，直指美国群体权利政治的弊端和反对变革者的固执，用自己的跨文化影响力推动着美国的社会公正。

不论抗议出于何种目的，其指责的根本对象是美国的制度和法律。抗议者相信，美国的制度和法律应该严格效仿孔子思想的公平与公正，从体制上确保非主流群体的平等地位。作为美国第十四任联邦大法官，厄尔·沃伦 (Earl Warren) 主张维护非主流群体的权利，作出了包括“布朗诉教育局案”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1954) 等经典判例。1960年5月3日，沃伦在纽约福特汉姆大学 (Fordham University) 法学院发表演讲，敦促学生勿忘捍卫“人类尊严与自由”的使命。他特别提及，这一使命继承了包括孔子在内的人类伟大立法者确定的传统，必将确保所有群体的平等权利。^[1] 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古今立法者雕像群里，孔子赫然在列。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这标志着“美国法律源于”孔子等人，以“公正理论”为圭臬。^[2] 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期望，美国法官能够学习“中国古代法官通常引用孔子”的做法，在审理和判决案件时表明受到了基督教公平正义原则的影响。^[3] 美国人不否认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当今最好的政府形式”，但相信多数群体的权力没有受到制约，从而导致社会不公。政府需要遵从孔子、苏格拉底和富兰克林等人的忠告，约束多数群体拥有的权限，方能维护少数群体的利益。^[4] 经受不公正待遇的弱势群体向往孔子两千多年前制定的“伟大、公正、睿智的法令”，因为孔子的智慧平息了社会混乱。^[5] 与此同时，身陷逆境的人们自我安慰道，即便孔子也因为规劝统治者公平施政而备受“嘲弄和讥讽”。所以，弱势群体应该以“充满自信的微笑”面对生活的磨难。^[6]

[1] “Chief Justice Warren’s Address at Fordham Law School Rites in Lincoln Square,” *New York Times*, May 4, 1960: 40. 1954年5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局案中裁定，公立教育中的黑白分校体制违法，应予废除。该案因此成为美国消除种族隔离进程的里程碑。

[2] James E. Clayton,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to Begin Its 83rd Annual Convention Monday,” *Washington Post*, Aug. 28, 1960: A24.

[3] John Wu, “Christ Is in Our Law,” *Atlanta Daily World*, Aug. 9, 1956: 6.

[4] Thomas Nixon Carver, “For All Its Faults,” *Los Angeles Times*, Jan. 24, 1956: A5.

[5] “A Line o’ Type or Two,” *Chicago Tribune*, Jan. 11, 1951: 18.

[6] Harold Blake Walker, “Living Faith,” *Chicago Tribune*, Oct. 21, 1966: D7.

种族歧视是美国平等公正理想与社会现实脱节最为严重之处。在战后美国的权利政治中，这自然成为人们激烈争论的焦点。力图根除歧视痼疾的人引经据典，呈现种族歧视违背人类常理的一面。孔子通常是有力的旁证。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最为引人关注。1954年，洛杉矶消防委员会主管拒绝让黑人与白人消防队员共同工作，声称这等于歧视消防队的白人。批评者抨击道，加州民众不需要种族隔离，消防主管此言是自取其辱。评论假借孔子的口吻写道，“最好在人们认为你是笨蛋时保持沉默，然后再开口，消除所有质疑”。“孔子”这话据称就是针对消防主管之流。^[1] 电视广告不愿长期雇用黑人，当局给出的解释是，白人占据了美国总人口的88%。批驳者对此嗤之以鼻，因为“正如孔子可能会说，‘不好意思，但我认为最为尊敬的官员最好再次核实所掌握的数据’”。^[2] 芝加哥的“杰出美国黑人”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熟知孔子思想，为“种族平等和人权”进行不懈斗争，赢得崇高的赞誉。^[3] 相应地，没有种族偏见的白人自然得到黑人的赞许。洛杉矶县监督委员会（board of supervisors）的沃伦·M. 多恩（Warren M. Dorn）就是一例。他处处为黑人着想，赢得了黑人社区的广泛支持。多恩与黑人打成一片的大量照片见诸报端。声援多恩的评论文章用以讹传讹的所谓孔子名言“百闻不如一见”，形象地描述了多恩受到的尊敬。^[4] 长限制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数量，是美国族裔政治的另一顽疾。有鉴于此，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要求国会在五年之内废除配额制度，增加南欧和亚洲的移民数量。对配额制度深恶痛绝的人为此欢欣鼓舞。他们深信，现行的移民政策区别对待来自孔子故地和莎士比亚国度的人们，是“极其愚蠢的逻辑”。^[5]

当然，白人至上主义者并不甘心就此落败。他们同样利用孔子，

[1] “Alderson's Had It,” *Los Angeles Sentinel*, Oct. 7, 1954: A9.

[2] Al Monroe, “So They Say,” *Chicago Defender*, Oct. 25, 1961: 16.

[3] “Chicagoans Honor Black Baritone,” *Chicago Tribune*, Apr. 8, 1969: 11.

[4] “Dorn Is Vitrally Active throughout Community,” *Los Angeles Sentinel*, Apr. 23, 1964: E24.

[5] “A New Immigration Law,” *New York Times*, Jul. 25, 1963: 17.

但目的却是攻击和讥笑少数群体的权利诉求。孔子曾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白人以此指责非主流群体怨天尤人而缺乏自省。黑人报纸《芝加哥捍卫者报》反驳曰,有此言论的人应该明白,绝大多数的文盲是有色人种,“国会种族蒙蔽双眼的偏执狂”还在继续阻挠各地学校结束种族隔离的措施。^[1]1958年,弗吉尼亚州为制止种族隔离,关闭了9所学校。支持种族隔离的白人拒不妥协,组织私立学校,接纳无学可上的白人学生。但白人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有感于黑人学校差强人意的条件,一位白人同情者说道,“子曰:在地下室接受教育的孩子可能显得阴郁”。^[2]针对某些白人以黑人学生无法跟上进度为由的继续阻挠,黑人平等权利的捍卫者引用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名言,说明黑人学生成绩不尽如人意的症结不在于先天智商,而在于后天的低劣教育环境,黑白同校能够改变局面。^[3]

很多人尽管支持黑人平等,但对于黑人表现出的自负心态感到担忧。比如,针对黑人行使权力将优于白人的论调,有评论者以所谓的“孔子格言”反唇相讥:“声称‘富人是笨蛋,但如果我是富人就不会是笨蛋’的人已经是笨蛋了。”^[4]坚决抵制黑白平等者绝非罕见。约翰·卡斯珀(John Kasper)自封为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拯救者。此人曾经一度因为受孔子思想影响成为“黑人的朋友”,但在日渐对立的种族关系面前,孔子思想只能退居次要位置。^[5]其他少数群体遭受的歧视也因为孔子而凸显在人们面前,对此憎恶者同样大有人在。但他们得到的告诫是,歧视有色人种就是歧视包括孔子和菩萨在内的

[1] “Words Men Live By,” *Chicago Defender*, Aug. 25, 1951: 6.

[2] Robert E. Baker, “Virginia School Decision Near,” *Washington Post*, Oct. 5, 1958: A14.

[3] Benjamin Fine, “Education in Review,” *New York Times*, Oct. 7, 1956: 199.

[4] Julius Lester, “For America on the Eve of the Second Civil War,” *New York Times*, Mar. 29, 1970: 225.

[5] Robert S. Bird, “Kasper: High-Brow to Rabble Rouser,” *Pittsburgh Courier*, Sept. 14, 1957: B6; Robert S. Bird, “John Kasper’s New York Career,” *Pittsburgh Courier*, Sept. 21, 1957: A15.

“所有宗教的创建者和所有时代的某些最伟大的人”。^[1]匹兹堡市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组织者要求人们齐唱英国诗人吉普林（Kipling）的“退场赞美诗”。但赞美诗包含的“主宰棕榈树和松树”词句据信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成分，因为“棕榈树和松树”就是指孔子、菩萨和穆罕默德的故地。组委会的安排遭到抨击。^[2]美国教育领域被指实施着“排斥亚洲政策”（Asian exclusion policy），这是“我国最大的缺陷之一”。亚洲的普通大学生了解美国历史和当代国际事务的程度可能超过一般的美国成年人，但大多数美国人却不知晓孔子之外的任何亚洲哲学家。鉴于亚洲和亚裔的重要性，美国学生理应要求开设“更好的亚洲课程”。^[3]面对此起彼伏的族裔权利要求，白人保守主义者不甘示弱，而是“如大黄蜂一样愤怒”。他们发誓，要“反戈一击”，挫败针对主流白人的“族裔诽谤”。他们深信，波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黑人和天主教徒都禁止他们取笑自己。如果华人再禁止以孔子为主题的笑话，主流白人就是唯一的嘲弄对象了。^[4]理由尽管啼笑皆非，却更清晰地揭示出保守白人在族裔关系变革面前的心态。与此同时，很多美国人也在为自己的宗教信仰争取平等地位。他们建议，学校应该讲授孔子等人所代表的非主流信仰，让年轻人“真正热爱邻居，如同爱护自己一样”。^[5]

更有甚者，白人还被视为少数民族，但却是“在艺术、文学、科学和历史领域拥有巨大成就”的少数民族。据称，伟大人物在白人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黄种人和黑人。尽管后面两个种族涌现了孔子、菩萨和穆罕默德等，“每一个领域都为白人少数民族所主导”。在鼓吹者看来，“作为少数民族，白人有正当理由感到骄傲”，向作为多数民族的有色人种让步“没有道理”。^[6]面对日常生活中持续增多的亚洲

[1] A. J. Siggins, "Along the Colonial Front," *Atlanta Daily World*, Sept. 23, 1953: 4.

[2] Leland Hazard, "Why Racial Tolerance?" *Pittsburgh Courier*, Oct. 27, 1956: A2.

[3] Erwin D. Canham, "Dialogue with Youth,"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7, 1966: 17.

[4] Russell Baker, "Observer: Here Come the Wasps," *New York Times*, Jun. 20, 1968: 44.

[5] "The Reader Writ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15, 1954: 18.

[6] Walter Trohan, "Record of Minority Whites Cited," *Chicago Tribune*, Dec. 3, 1969: 20.

面孔，保守白人称其为流感病毒。他们让孔子现身说法，力证亚洲移民正如流感一样迅速蔓延。化名“阿朱”（Ah Choo）的白人写道，“孔子说，胃流感病毒一定数量巨大。他们是怎样利用芝加哥的公共交通遍布全城的？”^[1]另有人声称，“亚洲流感”最明显的标志是苦力草帽，因为“古老的孔子格言说，‘当流感发作，就戴上它’”。苦力草帽增多就说明“亚洲流感”的盛行。^[2]

反种族歧视运动激起的抗议浪潮席卷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引用孔子是利益攸关者维护自身立场、攻击对方举动的重要环节。大学校园里的反传统反主流运动便是反歧视运动的延伸。1969年5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骚乱愈演愈烈，时任州长的罗纳德·里根派遣国民警卫队入校平息事态。伯克利市长萨姆·约蒂（Sam Yorty）称赞里根的强硬措施。为让自己的说法令人信服，约蒂特地利用孔子的盛名。他信誓旦旦地宣称，“正如孔子所说，没有任何事情比让对手炫耀力量更加令人沮丧了”。里根的举措可以制服对手，并“防止事态蔓延和恶化”。^[3]加州大学校务委员会的马克斯·拉弗蒂（Max Rafferty）因为主张取消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利而成讥讽对象。讽刺文章写道，拉弗蒂居然拥有校务管理之外的能力，但美国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在“扼杀另一个柏拉图或者孔子的思想天赋”。^[4]但同样针对学生骚乱，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巡回法院的立场截然相反。尽管法院已经宣布禁止马里兰大学学生游行，为期十天，但法官詹姆斯·H. 泰勒（James H. Taylor）随后取消了这项禁令。泰勒引用从孔子到林肯的众多论据，证明州政府希望实施禁令的要求证据不足，并且学校秩序已经恢复正常，禁令因此解除。^[5]权利意识甚至波及尚未

[1] “Letter to the Editor,” *Chicago Tribune*, Jan. 21, 1956: 8.

[2] “How Do Germs Look?” *Chicago Tribune*, Mar. 12, 1969: B1.

[3] Kenneth Reich, “Yorty Says Reagan Was Right in Calling Guard to Berkeley,” *Los Angeles Times*, May 20, 1969: 3.

[4] “Rafferty and His Expertise,” *Los Angeles Times*, Aug. 6, 1966: B4.

[5] Stephen Neary, “Restraining Order Lifted at U. of Md.,” *Washington Post*, Apr. 14, 1970: C1.

出生的胎儿，反堕胎运动因此而来。反对堕胎者引经据典，认为孔子和耶稣等文明圣人都提倡人丁兴旺。支持堕胎者反驳道，孔子等“最伟大的预言家”只是根据他们所了解的世界制定的道德规则，对于20世纪全然不知。当今世界已经不需要通过增加人口确保国家生存了，反堕胎立场缺乏依据。^[1]

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少数民族权利斗争为主线的弱势群体抗议运动风起云涌。这些事件原本与孔子无关，但孔子却是争论双方话语策略的一部分。其中有两大主要原因。第一，孔子是华人传统的象征，而华人又是非主流群体之一，所以，孔子就被延伸为所有少数群体的代表之一。因为如此，少数群体的代言人时常以孔子证明权利斗争的正当性，而反对者则通过贬损孔子试图暴露少数群体的逻辑错误。第二，不论争辩双方如何相互攻讦，他们都认可孔子敏锐观察社会的能力。洞察世事的孔子出现在任何一方的言辞中，都被赋予了强化立场的功能。有此两大原因，抗议运动引用孔子便在情理之中了。

二、孔子与人格修养

日渐叛逆的青少年是社会问题的主要起因和代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股反文化之风席卷全美。始作俑者和积极推动者就是不满于传统观念束缚的美国青少年。孔子的作用在于映衬叛逆文化的是非曲直。多数评论借用孔子，直指青少年文化不足可取之处。嬉皮士乃叛逆青年的代表。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读者戴维·H. H. (David H. H.) 看来，嬉皮士的英文Hippie就是“伪君子”(hypocrite)的缩写。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高谈阔论，吸食大麻，自恃清高，抨击社会，却不愿走出来，将言论付诸实践，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H责问道，如果孔子、耶稣等人没有是处传播思想，“你们嬉皮士”认为世界会是何种状况？所以，嬉皮士应该抛弃空谈，到现实中推动人类相

[1] Flora Lewis, "Change in Morality's Base," *Los Angeles Times*, Jan. 6, 1970: A7.

互的仁爱。编者按对于嬉皮士的不屑更是溢于言表：“这是催人觉醒的行动呼声。有嬉皮士愿意作答吗？”^[1]另有人假借孔子的口吻写道，“总有人哀叹时代已经迷失方向”，他们头发凌乱，不愿洗澡，游说他人接受自己的思想，但他们是病态的，并且试图将病态强加于所有忽略或者批判他们的人身上。作者引申曰，“我们怀疑，孔子（对病态社会的批判）是在谈论今天的嬉皮士”。^[2]以嬉皮士为代表的叛逆青年收到的另外一则警告是，“贬低整个社会就是粉碎多个世纪的人类精神”。叛逆者与他人一样，源自孔子、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等人类祖先。因此，“不要否认人类的优秀之处，也不要否认你与他们的联系”。^[3]21岁的罗伯特·帕迪（Robert Paddy）奇装异服外加文身，俨然一副嬉皮士派头。他未能领会孔子教诲的真谛，而是在下巴蓄着“薄膜似的孔子胡须”，更显反主流特征。^[4]

即便与叛逆无关，青少年的其他问题仍然需要有效疏导和矫正。早恋是众多此类问题之一。有女孩年仅15，因为与男孩约会而遭母亲批评。心生厌烦的女孩去信《华盛顿邮报》，为早恋寻求支持。该报的咨询专栏赞同母亲的意见，认为早恋有害无益。同时，听从父母劝告也是秉承孔子和基督的教诲，他们都强调“孝”的重要性。^[5]也有女生与男性教师生出情愫。针对这种现象，报纸杜撰道，“子曰：每天放学以后造访单身教师公寓的女孩很快就有大问题需要解决”。^[6]年轻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沟同样值得关注。父母盯梢过紧，会引起子女的反感甚至叛逆情绪。此类家长需注意，“即使孔子没有说，他也

[1] Erwin D. Canham, "Dialogue with Youth,"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12, 1967: 17.

[2] Walter C. Alvarez, "The Doctor Says," *Los Angeles Times*, Nov. 3, 1968: 83.

[3] Art Seidenbaum, "Keep the Faith, Everybody, for a Human New Year," *Los Angeles Times*, Dec. 25, 1968: E7.

[4] Jeannette Smyth, "... And the Price? Only \$2 a Dream," *Washington Post*, Aug. 8, 1971: G13.

[5] "Is 15 Too Young to Date?" *Washington Post*, Jun. 17, 1964: D9.

[6] Al Monroe, "So They Say," *Chicago Defender*, Nov. 1, 1961: 16.

应该说：‘亲不敬，熟生蔑’”。^[1]时常有青少年打砸汽车或者损坏教堂，这被视为精神空虚的表现，父母难辞其咎。报纸建议身为父母者实践孔子的仁爱思想，让孩子重回正轨。^[2]署名 XYZ 的读者去信《芝加哥论坛报》，言及自己在父母结婚之后半年即降临人世，怀疑奉女成婚的父母没有真正的爱情。报纸没有苟同，而是要求 XYZ 学习孔子的宽容心态，祝福父母，“真正长大！”^[3]

年轻人自己的婚姻问题也在孔子“语录”的映衬下纤毫毕见。例如，有编造的语录是，“子曰：‘床上撒沙子，婚姻就会搁浅’”。名叫艾伯特·约瑟夫 (Albert Joseph) 的男子称，其妻不仅往自己床上扔沙子，还以各种方式干扰睡眠，他因此愤而提出离婚诉讼。^[4]而在另一年轻家庭，肆意挥霍钱财的丈夫让妻子伤心不已。报纸声援妻子，要求丈夫切莫入不敷出，并须承担家庭责任，因为“孔子”说：“男人通过承担责任证明自己的价值。”^[5]及至年轻夫妇增添新丁，照管和教育孩子的任务接踵而至。有些母亲一边忙家务，一边将婴儿放在洗涤槽中洗澡，经常导致婴儿在母亲转身时翻出槽外的事实。报纸告诫粗心母亲，“我在想孔子是否说过，‘在洗涤槽洗澡的婴儿会摔下去’”。^[6]有些孩子看似愚笨，父母不愿尽心教育。纽约特别法庭法官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既然孔子都说“性本善”，家长没有理由推卸教育责任。^[7]

社会问题自然包括违法犯罪行为或涉及法律的纠纷。比如，随着

[1] Erna Bombeck, "Familiarity Breeds Punch in Mouth," *Los Angeles Times*, Aug. 16, 1968: F6.

[2] Marianne Moore, "Topics: In Fashion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New York Times*, Nov. 4, 1967: 32.

[3] Mabel Kingston Green, "The Mistake Isn't a Crime," *Chicago Tribune*, Nov. 30, 1968: S-A6.

[4] "Prince Tells It Like It Is—All in Welsh," *Los Angeles Times*, Jun. 1, 1969: 26A.

[5] Lynn Hurley, "He Does His Banking at the Local Tavern," *Chicago Tribune*, Nov. 5, 1961: S2.

[6] Abigail Van Buren, "Just Tune out His Next Story," *Los Angeles Times*, May 26, 1969: D7.

[7] Henry H. Curran, "Final Verdict," *Los Angeles Times*, Mar. 16, 1952: H2.

有车一族的扩大，超速驾车的现象与日俱增，警察疲于应付。“孔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多一个开车上路者，警察就多一个追逐的对象。”^[1]据报道，匹兹堡市的艾伯特·查特洛斯（Albert Chatlos）贪图美色，结果被一棕色皮肤女子猝不及防地抢走钱包，逃之夭夭。虽然涉案金额仅 18 美元，却也印证了“古老的孔子格言”：“撩起衣服的女人比褪下裤子的男人跑得快。”^[2]评论者编撰的孔子语录“有瑕疵的钻石好过完美的卵石”，恰当地描述了差点演化为法律纠纷的财物丢失事件。听闻价值 3000 美元的钻戒白金底板有瑕，亚历山大（Alexander）小姐将钻戒交给熟人拿去修理。但熟人却在当天晚上告知，钻戒丢失。怀疑有诈的亚历山大立即报警。经过仔细搜查，警察在一个垃圾箱旁找到钻戒。亚历山大再也不敢让人修理钻戒了。^[3]

此外，二战以后，美国经济繁荣，物质享受之风盛行，浮躁、唯利和自私思想更加明显。个人理想品质缺失严重。正如《芝加哥论坛报》所指出的，“20 世纪的人们不会再去孔子那里搜寻智慧语言”，他们的口号变成了“新思想很少在旧土壤里茁壮成长”。^[4]

个人修养的核心是重提理想品质特征的重要意义。作为理想品质的蓝本，光有圣经远远不够，因为“一本书或者一个人不可能包含所有真理”，并且“基督、孔子和柏拉图都对真理作出了贡献”。^[5]本着类似的认识，很多人将孔子语录作为培养人格品质的灵感源泉。针对个人普遍缺乏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品质，孔子教诲“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不失为一剂良药。^[6]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和举止粗鲁似已成为潮流，偶然一见的绅士风度会令众人惊诧和不安。重申孔子“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1] Gerry Ruder, "That Man's Here Again," *Chicago Tribune*, Jan. 20, 1961: 12.

[2] "'Confucius' Proven Right," *Pittsburgh Courier*, Aug. 24, 1963: 1.

[3] "Lost \$3000 Ring Found in Foot-by-Foot Search," *Washington Post*, Mar. 5, 1955: 3.

[4] "Sign of the Times," *Chicago Tribune*, Sept. 4, 1969: W1.

[5] "Improved Behavior Held Biggest Need," *Washington Post*, Mar. 23, 1964: B2.

[6] "Worth Saving!" *Pittsburgh Courier*, Sept. 6, 1952: 8.

等语录确有必要。^[1]谦逊是社会稀缺但却必需的另一品质。即便是《洛杉矶时报》的专栏作家吉姆·默里（Jim Murray）也难逃指责。默里解释自己并不了解的客机飞行问题，不但遭人讥笑，而且得到如下警告：“正如孔子所说，‘不懂就别写’。”^[2]

人人都在追求社会地位，却不知道地位取决于思想品质，而思想品质必须通过长期亲身实践方可形成。人们应该铭记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之言。^[3]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保持沉默的重要性，从而导致麻烦不断。此类人等必须了解孔子笔下“可与言”和“不可与言”（《论语·卫灵公》）之间的区别。^[4]生活挫折在所难免，正确的态度是如孔子教导的一样，每次跌倒都应站立起来。^[5]如果希望成功，骄傲品质不足可取。编造的孔子语录会告诉你，“过于自恃的人很可能栽大跟头”。^[6]爱时惜力是保证成功的又一品质。如果因为大雪而被堵在乘车路上，人们不妨利用这一间隙效仿孔子，观察生活，思考问题，不让光阴虚度。^[7]因为孔子的“完人”形象，有些父母在塑造子女的思想品质时通常会模仿孔子语录，制定行为规则。^[8]理想的个人品质必须贯穿于日常行为，方能持久牢固。《纽约时报》的两封读者来信看似针锋相对，却在前述认识上取得了一致。两人都认为，伦理道德不应只是理论家的研究任务，而应被视为“每一个人的职责所在”，就如同孔子和耶稣等人的亲力亲为一样。^[9]总之，人们应该以孔子和基督等“成熟的人”为榜样塑造自己。^[10]

[1] “Gone Forever,” *Pittsburgh Courier*, Oct. 13, 1962: 12.

[2] “It’s Your Dime!” *Los Angeles Times*, May 8, 1964: B1.

[3] “In a Swamp,” *Pittsburgh Courier*, Jun. 27, 1953: 8.

[4] “Famous for Silence,” *Pittsburgh Courier*, Dec. 17, 1955: A12.

[5] “Poking around with Alma A. Polk,” *Pittsburgh Courier*, Feb. 4, 1956: 9.

[6] “Walter Winchell... in New York,” *Washington Post*, Jan. 24, 1951: B13.

[7] “No Waste for Wisdo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21, 1958: 22.

[8] Mary Margaret M’Bride, “Nurseries Again Welcome Granny,” *Los Angeles Times*, Oct. 8, 1953: B8.

[9] “Letters to the Editor,” *New York Times*, Jan. 24, 1965: BR16.

[10] “250—Year Trip Eyed on Roads to Peace,” *Los Angeles Times*, Apr. 2, 1952: A24.

报纸就个人行为给出三大建议。第一,乐观豁达,充满希望。《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告诉读者,“希望”和“期望”是两个充满活力之词,能够改变生活。问及如果成为国君首先有何作为时,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文章感叹曰,孔子“意识到,某些字词能够成就或毁掉一个人”。“希望”和“期望”便具有助人挖掘潜力的力量。^[1]一则杜撰的孔子语录称,“你笑,全世界就会跟着你笑;你哭,全世界就会拿你取笑”。^[2]其中寓意大致相同。某金融公司经理 V. W. 克雷格 (V. W. Craig) 长期实践着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孔子”曾说,“百闻不如一见”。克雷格因此十八年如一日,搜集报纸漫画,让生活充满笑声。^[3]

第二,不求好高骛远,只求知足常乐。模仿孔子口吻的所谓中国古老谚语一语道破这种修养境界:“如果你想快乐一小时,就喝醉吧;如果你想快乐三天,就结婚吧;如果你想快乐八天,就杀猪吃肉;如果你想快乐一辈子,就学会钓鱼。”^[4]而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孔子”又在循循善诱道:“停止不切实际的企求,留出足够时间品味怒放鲜花的芬芳。”^[5]

第三,生活俭朴自然。全国诗歌类图书奖获得者玛丽安娜·穆尔 (Marianne Moore) 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和日常生活中实践着这一原则。穆尔“对于自然天成几乎着魔了”。究其根源,是因为她相信孔子说过,派头样式达意即可,不必花哨。这对于那些由于眼花缭乱的时装而丧失判断能力的女士们是极好的参照。^[6]密苏里州的“农民、作家和哲学家”萨德·斯诺 (Thad Snow) 亲自开垦出 1000 英亩沼泽地,过上

[1] Norman Vincent Peale, “Inner Power of Expectation Beats Odds,” *Chicago Tribune*, Nov. 9, 1968: S-A9.

[2] “Walter Winchell... of New York,” *Washington Post*, Jun. 11, 1953: 43.

[3] “Bruce Russell’s Admirer Keeps Cartoon File,” *Los Angeles Times*, Mar. 16, 1952: 44.

[4] Robert G. Spivack, “Watch on the Potomac,” *Chicago Defender*, Jan. 7, 1960: A10.

[5] Kay Loring, “Front Views & Profiles,” *Chicago Tribune*, Sept. 21, 1961: C11.

[6] Kathleen Cannell, “Poet Scans Lin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24, 1957: 6; Kathleen Cannell, “Honors to Marianne Moore for ‘... Durable Poetry in Our Tim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11, 1958: 9.

真正简朴自然的生活。斯诺拿起笔,在书中记录乡村生活的迷人之处,人称“棉田里的孔子”。^[1]住在纽约郊区的H. 艾伦·史密斯(H. Allen Smith)是另一位在书中大赞乡村自然生活的人。在这幅乡村画卷中,一名生活怡然自得的邻居经常妙语连珠,获得“郊区孔子”的雅号。^[2]

与人和谐相处也是个人修养的必要组成部分。平等待人的黄金准则乃人际关系的根基。作为“人类行为的最终和普遍标准”,黄金准则能够促成睦邻社会。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说体现了这一原则。^[3]孔子此说还有助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避免迷失方向。^[4]正是本着孔子等人所表达的黄金准则的精神,美国和加拿大的上万个社区联合举行了“兄弟关系周”,承认并尊重不同宗教和种族背景的人们。1954年,第21届活动如期举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担任荣誉主席。^[5]芝加哥的一所教堂却只计划实践一个月,令人费解。评论者写道,孔子和耶稣先后阐述的黄金准则需要人们毕生遵循,“而非时作时辍”。^[6]黄金准则对于家庭生活同样适用,孔子鼓励“家庭和睦,亲戚和谐”。^[7]“孔子”敏锐地指出,当女方发现丈夫不是特别聪明时,她就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恪尽职守的妻子了,问题随之出现。因此,唯有夫妻相互容忍,并为对方展现才能提供平台,关系才能持久和谐。^[8]上文提到的诗人穆尔就极力主张宽容美德。她仿照孔子的口吻说,“如果心中有一把愤怒之刀,思维就不会准确”。^[9]即便是成天面对悲剧和暴力的警察,也会因为阅读孔子、柏拉图和弗

[1] “Charm of Farm Harvested,” *Los Angeles Times*, Jan. 9, 1955: D6; “Thad Snow, 73, Dead; Swamp Philosopher,” *New York Times*, Jan. 17, 1955: 23.

[2] Richard Armour, “Humorist a Suburban Confucius,” *Los Angeles Times*, May 29, 1960: H7.

[3] “Early Glimpse at Lippmann on Eve of 80,” *Washington Post*, Sept. 21, 1969: 49.

[4] “Losing One’s Head,” *Pittsburgh Courier*, Jan. 26, 1952: 8.

[5] “Brotherhood Week,” *Los Angeles Times*, Feb. 23, 1954: A4.

[6] Harold Blake Walker, “Living Faith,” *Chicago Tribune*, Oct. 16, 1961: A4.

[7] “It’s Later than You Think!” *Los Angeles Times*, Mar. 8, 1956: A4.

[8] Theodore R. Van Dellen, “How to Keep Well,” *Washington Post*, Jan. 18, 1961: D8.

[9] “A Felicitous Respons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7, 1952: 11.

洛伊德的著作而怀有宽容之心，对社会充满希望。^[1]相互支持是“孔子”强调的另一品质。“孔子”说，“没有他人帮助，你到不了顶峰。但你肯定能够独自降至最低点”。^[2]孔子据称还是慈善事业的倡导者。他相信，“人可以完全本着慈善精神而乐善好施，不计回报”。^[3]

三、孔子与素质教育

社会道德和个人修养出现纰漏，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的教育环节出了问题。各级教育机构如能让学生真正明白人类普遍价值观念的意义，构建宽容、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社会就不会遥遥无期。作为前述观念的重要阐述者和倡导者之一，孔子既是公共素质教育的灵感源泉，又是教育的重要内容。

首先，孔子思想能给素质教育带来启发，为教育思路提供借鉴。学校教育对于个人和公共素质至关重要。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之说恰如其分地阐释了后天培养的关键作用。素质教育唯有从幼年抓起，“儿童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干净、整洁、遵守秩序、顺从、有礼、具有好奇心理、尊重他人、理解他人的青年和成年人”。^[4]《华盛顿邮报》的一封读者来信充满激情地写道，数千年来，中国人就从幼年开始，熟读“孔子的伟大思想”。与这一“很有价值”的传统做法相比，“我们未能让子女在大学之前接触丰富的哲学和伦理思想是不幸的”。该读者建议，美国人需要从幼儿园开始，系统培养伦理道德素质，这比拥有工作等通常意义上的成功更有意义。^[5]伊利诺伊州妇女俱乐部联盟致力于捐资助学，其动力就来自于“孔子智慧”：“一年之计，莫如

[1] Nan Robertson, "Policeman Gains Note as Scholar," *New York Times*, Mar. 28, 1962: 20.

[2] "Walter Winchell... of New York," *Washington Post*, Oct. 22, 1952: 37.

[3] Bill Gold, "The District Line," *Washington Post*, Sept. 30, 1957: B16.

[4] "Home Work," *Pittsburgh Courier*, May 22, 1954: 22.

[5] "Letters to the Editor," *Washington Post*, Jun. 6, 1965: E6.

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1] 年轻人的大脑犹如幼苗，需要有意识的培养。幼苗的生长依赖于水和各种养分，年轻人的教育因而离不开“思想、经验和知识”的正确引导。继承孔子衣钵的孟子所谓“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就是此理。^[2]

教育态度——尤其是针对有特殊需求的人群，必须周到细致而又包容。孔子对待盲人乐师的关怀备至为此作出了表率：“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论语·卫灵公》）^[3] 孔子的正名之说要求，教育者必须做到言辞达意。如果模棱两可，不但学生的学业无法完成，社会道德、艺术和正义都将衰退。^[4] 人们发现，虽然战后美国科技迅猛发展，但“政治管理、教育或者伦理道德滞后”。教育者未能按照孔子的正名教诲，将晦涩难懂的科技精神，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转化为大众素质，这是其中的主要原因。^[5] 为扭转如此局面，报纸建议，美国社会必须树立人文与科技素质同等重要的信念。美国青年在上完大学以后，仅仅知晓一个微小的知识领域，能够找到一份年薪 5000 美元的工作，除此之外别无它才。但“伟大的文明需要美好的思想来浇灌”，创造这些思想的孔子和摩西等人既非工程师，也非物理学家。因此“人文和艺术领域”理应受到重视。^[6] 纽约市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大学教育必须敞开胸怀，欢迎孔子、菩萨、穆罕默德等人

[1] Irene Powers, "Club Convention Notes: Red Faces to Wisdom," *Chicago Tribune*, May 9, 1966: B8.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并非孔子所言，而是出自《管子·权修》。

[2] Douglas Wickstrom, "On Adolescence," *Chicago Tribune*, Mar. 27, 1966: IND-A2.

[3] Lucy Freeman, "The Dark Is Still the Dark," *New York Times*, Apr. 15, 1951: 20.

[4] Lewis Galantiere, "Write It Right," *New York Times*, Sept. 18, 1965: BR16.

[5] C. L. Sulzberger, "The Kind of Expert Our New Decade Needs," *New York Times*, Jan. 2, 1960: 12.

[6] George Sokolsky, "These Days," *Washington Post*, Sept. 20, 1956: 17.

的思想，因为信奉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只是一个少数群体。^[1]

其次，孔子的道德思想还是认同上述原则的教育机构用以培养青少年人文素质的重要内容。很多学校开设了与孔子有关的课程。密歇根州大急流城 (Grand Rapids) 的一名教师选取圣经故事和孔子、穆罕默德的言论为素材，作为“学生优良行为的标准”。虽然遭到持反对意见的家长起诉，但却得到报纸的赞许。^[2]设在芝加哥的美国中部青年基督教联合会开设的春季课程包括孔子哲学。^[3]同在芝加哥的奥斯丁 (Austin) 夜校在 1957 年秋季增加了经典著作讨论课程，孔子的《论语》是阅读讨论的书目之一。^[4]讲授孔子的大学课程也有不时出现于报端者。例如，1951 年秋季，埃默里大学 (Emory University) 新增数门课程，“涵盖从邦联到孔子的诸多内容”。^[5]耶鲁大学不仅开有涉及孔子的课程，而且力图以小班教学，因为“基督、孔子、穆罕默德和苏格拉底都是教授小班学生”。^[6]乔治·华盛顿大学计划在 1964 年开始汉语普通话教学，“满足所有希望阅读孔子原文者的需要”。^[7]

除学校课程之外，人们可以通过其他渠道熟悉孔子思想，阅读就是其一。四卷本的“世界伟大思想家”系列有专章讲述孔子。图书广告声称，孔子在 2500 年前说过的话“仍有裨益，启迪着应付日常生活简单而又永恒问题的人们”。^[8]美国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 (Ezra Pound) 编辑的《从孔子到卡明斯》文选被称作“极有意义的书”。“不论课堂内外”，此书都是“教育的基础”，有助于人们领悟孔子等人的

[1] “World ‘View’ Held Task of Education,” *New York Times*, Nov. 10, 1950: 29.

[2] “How Silly Can We Get?” *Chicago Tribune*, Jan. 6, 1968: 8.

[3] “Central Y.M.C.A. Spring Courses to Begin Monday,” *Chicago Tribune*, Mar. 28, 1961: A4.

[4] “Austin Evening School Adds 2 New Courses,” *Chicago Tribune*, Oct. 3, 1957: W7.

[5] “Education Notes,” *New York Times*, Aug. 26, 1951: B9.

[6] William Fulton, “Yale’s New Head Hopes to Limit Student Ranks,” *Chicago Tribune*, Oct. 30, 1950: C7.

[7] “Chinese Language Course Is Planned,” *Washington Post*, Jul. 6, 1963: C1.

[8] “These Wise Men of the Past Were Worried Too,” *Chicago Tribune*, Jul. 6, 1952: H8.

思想学说。^[1]另有大学英语教授在为学生撰写的年鉴中加入很多有关孔子及其思想的信息。^[2]甚至一名热衷于中国文化的军士长也在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一位教授合作，解读中国墓碑上的孔子语录，并希望出版自己的发现，让更多的人熟悉孔子的为人与处世之道。^[3]即便不是通过书本，佛罗里达州罗林斯 (Rollins) 学院的学生仍有了解孔子等伟大思想家的去处。该校建有名人林荫道，道路两旁陈列的 600 多块石头源于名人家乡，如孔子就读的私塾地板。学生可在此缅怀那些丰富他人生活的人们。^[4]与此同时，广播电视在传播孔子等人的思想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我就相信” (This I Believe) 节目，据称是“当今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广播节目之一”，由全美 200 多家电台播出。节目的宗旨是，“有思想的人讲述他们的信仰和塑造生活的真理”。赛珍珠利用这一契机，大谈孔子的人性思想。^[5]全国广播公司的教育节目“探索”专为青少年设计，以激发青少年学习语言、科学和道德思想等知识的热情为己任。孔子的生平 and 学说是节目的重要内容。^[6]

在支持公共素质教育的舆论中，孔子是灵感来源之一，更是教育的重要参照体系。人们期望借助孔子，通过教育让美国社会更加宽容，让承担美国未来的青少年具备更多历经时间洗涤沉淀的为人处世价值观念，改善美国的社会道德现状。至于实际效果，我们并无确凿资料加以说明。但以下事例无疑反映出，此类教育在学生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某种印象。小学教师要求每个学生选择一个词，然后搜集相关的

[1] “Reading for Pleasur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8, 1964: 16. 爱德华·卡明斯 (Edward Cummings, 1894—1962), 美国诗人和画家, 诗作形式奇特, 用词别出心裁。

[2] Matt Weinstock, “Wit Shields the Irony of Mr. Armour,” *Los Angeles Times*, Oct. 9, 1962: A6.

[3] “Ex-Marine Sergeant Makes Classroom Hit,” *Los Angeles Times*, Nov. 28, 1971: L8.

[4] Laura N. Gradick, “Walk of Fame Stones Honor Noted Figures,” *Chicago Tribune*, Nov. 26, 1950: I7.

[5] Anton Remenih, “This I Believe Is Held Worthy of Better Spot,” *Chicago Tribune*, Dec. 6, 1952: C1.

[6] Aleene MacMinn, “Dr. Hibbs, I Presume,” *Los Angeles Times*, Mar. 1, 1964: E2.

名人语录。有名学生选择的单词是“行为”，孔子言论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他的作业本上。即使在砍柴时，学生也会随着斧头起落的节奏吟唱出孔子语录。^[1]

四、孔子与政治生活

美国联邦政府及其政策一直处于媒体的高度关注之下，各种评论应运而生。以孔子及其思想为参照体系的评价属于其中一类。作为理想政治的阐述者，孔子的作用是衬托美国国家政治不尽如人意之处。所以，国家政治评论中的孔子实则美国政府与政策的评判者，他透过评论者的字里行间置身于美国战后联邦政治的发展过程之中，揭示出中美政治文化鲜为人知的相互交融之路。

四年一度的大选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之一。虽然按照惯例，候选人会利用美国历史文化中的人物或典故为自己助选，但利用外国文化象征的情形亦不鲜见。孔子在总统竞选策略中的出现就是明证。例如，1952年的大选中，候选人的演讲就充斥着孔子、孟子和其他人的语录。^[2]1963年，选战硝烟又起。民主党故意大谈推举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为候选人，以图左右共和党的竞选思路。洛克菲勒和现任妻子都曾离异。由于崇尚孔子和基督等人制定的家庭道德观念，共和党必然大肆抨击洛克菲勒的离婚记录，从而忽略更为重要的竞选话题。^[3]共和党是否就范，我们不得而知。但意欲代表共和党参选的宾夕法尼亚州长威廉·斯克兰顿（William Scranton）也借助孔子为自己壮胆。雄心勃勃的斯克兰顿主动出击，并杜撰孔子言论解释道：“子曰，（被动）等待选派的人

[1] “Maine Deed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 23, 1964: 8.

[2] “The Reader Writ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6, 1956: 20.

[3] Walter Trohan, “Report from Washington,” *Chicago Tribune*, Aug. 3, 1963: 4.

会被晾在一边。”^[1]其助手则利用涉及孔子的俏皮话为斯克兰顿造势。比如，“子曰，只要在敞开的大门里站立时间足够长，此人就会当选”，说明斯克兰顿大造舆论必将成功当选党内候选人。^[2]

然而，候选人的高谈阔论并不能赢得所有选民的好感。在不满之声中，孔子衬托出候选人及其竞选纲领乏善可陈、缺乏新意的弊病。某些候选人夸夸其谈，辞藻华丽，善于政治运作，却无法给民众带来切实利益。批评者断言，孔子肯定会指责这种人“几乎一无是处，是永远不会开花的嫩枝”。^[3]碰到没有前瞻思想的候选人，不满者的评价是：“子曰：向后跑的候选人看不到前面的任何美好事物。”^[4]在1960年与总统宝座失之交臂之后，理查德·尼克松于1966年再次踏上竞选之路。他是处演讲，竭力为最终选举时的民意支持打下基础。但挑剔者却发现，尼克松的竞选思路没有任何进步：与1960年相比，“同样的声音，同样的用词，同样的手势”，甚至引用孔子等人同样的语录。但民众需要候选人关注的是“今天和明天，而不是昨天”。^[5]正是不满于现有的政党候选人，某些民众才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崇尚过去某位政治人物的想法。例如，192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W. 戴维斯（John W. Davis）虽然败给了共和党人柯立芝，却因为符合孔子对于君子的要求并且具有“政治家的风范”，在20世纪50年代仍然引起人们的追忆。^[6]按照政治惯例，总统任期最多两届。但针对那些只知杜撰孔子语录却言之无物的候选人，有评论者表示，“宁要第三个任期，也不要第三流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因为深得民众信任而拥有第三个任期的。^[7]

[1] Walter Trohan, "Washington Scrapbook," *Chicago Tribune*, Nov. 10, 1963: B1.

[2] "Washington Wir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7, 1964: 1.

[3] John Spenser, "Clean Sweep Wanted," *Los Angeles Times*, Sept. 5, 1950: A4.

[4] "A Line o' Type or Two," *Chicago Tribune*, Feb. 22, 1968: N12.

[5] Tom Wicker, "In the Nation: After Nineteen-Sixty, What?" *New York Times*, Nov. 1, 1966: 40.

[6] "John W. Davis," *Washington Post*, Mar. 26, 1955: 20.

[7] Julia Spiegelman, "Buttons Aren't Ballots—But They Highlight Politic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7, 1960: 25.

候选人利用孔子为竞选造势，也因为孔子而备受指责。即使成功入主白宫，其言行和政策同样无时无刻地处在政治评论的关注之下。因为制定了堪称典范的处世原则，孔子为很多总统评论者提供了明辨真伪的参照体系。杜鲁门是1945年以后的美国第一任总统。尽管结束二战有功，他的国内政策却屡遭诟病。名叫弗兰克·C. 比肯(Frank C. Beacon)的《洛杉矶时报》读者指责杜鲁门能力平庸，缺乏智慧。比肯写道，“现代孔子肯定会说：‘乔治·华盛顿从不说谎话，富兰克林·D. 罗斯福从不说真话，而哈里·S. 杜鲁门不知两者区别。’”^[1]一幅漫画批评杜鲁门政府没有厉行节约。漫画配有如下文字：“请允许鄙人引用孔夫子的伟大著作《论语》中的话：统治者行善不应浪费公共税收。”^[2]一名牧师为吸引教友，特地利用人们厌恶税负过重的心理，在教堂大门旁张贴以下告示：“救赎免费……免税。告诉每一个人，但别告诉哈里(·杜鲁门)”，落款是孔子。^[3]孔子告诫统治者不得滥用权力，但在某些人看来，杜鲁门就有滥用权力之举。^[4]新教主教制教会第57届大会批评杜鲁门政府容忍日本在美国的商品倾销，要求政府减少日本商品的销售量。但某些代表对于教会是否应该参与政治持保留态度，声称“自己不是孔子，只是很迷惑，很想知道决议的用意何在”。^[5]

相比之下，反共与反腐并重的艾森豪威尔获得的媒体评价显然要好得多。这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的经济繁荣不无关系。评论者称颂道，孔子“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大学》释“齐家治国”章)之言“概括了艾森豪威尔的(施政)理念”。正如中国历史上的天子一样，艾森豪威尔仅需“释放善意”，便可让民众秩序井然。被善意感化的民众有助于巩固艾森豪威尔相对于国会和共和党内反对

[1] Frank C. Beacon, "1950 Confucianism," *Los Angeles Times*, Feb. 22, 1950: A4.

[2] "Ching Chow," *Chicago Tribune*, Jan. 30, 1951: 19.

[3] "Everything Else Is Taxed," *Chicago Tribune*, Jun. 18, 1952: 18.

[4] George A. Sewell, "Dots and Dashes," *Atlanta Daily World*, Apr. 29, 1951: 4.

[5] Laura Haddock, "Episcopal Deputies Resist Fixed Political Viewpoint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18, 1952: 2.

派的优势，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因此克服“最为糟糕的弱点”。^[1] 艾森豪威尔具有如此显著的亲和力，其新闻秘书詹姆斯·C. 哈格蒂 (James C. Hagerty) 功不可没。哈格蒂手段多样，总能在电视和纸质媒体上成功塑造艾森豪威尔的良好形象。在政治评论者看来，足智多谋的哈格蒂完全就是“政治领域的孔子”。^[2]

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约翰·肯尼迪由于在任时间很短，尚未见到引用孔子的相关评价。紧接着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就没有艾森豪威尔那么幸运了。民权运动、弱势群体权利运动和反越战运动汇集一处，疲于应对的约翰逊政府自然形象不佳。假借孔子之名的批评之声见诸报端的次数明显较多。政治评论者认为，约翰逊自当选以后，“运气不妙”：想要结束越战但无法驾驭谈判；想要伸张民权却遭到南部白人拼命反对，黑人也不领情；想要抑制通货膨胀，膨胀率却节节攀高；想要维护劳工权利却遭遇更大规模的罢工。评论指出，约翰逊失败的症结在于，一方面僵化遵循孔子“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的教诲，过于谨慎；另一方面，他忽略了孔子“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论语·为政》）的劝告。所以，约翰逊尽管竭尽全力，仍然无法赢得民心。^[3] 约翰逊的业绩平平，缺乏引人注目的变革措施。抨击者宣称，人咬狗能吸引眼球，但约翰逊政府的表现就像狗咬人一样了无新意。杜撰的孔子语录说：“一旦狗咬选民次数过多，选民通常会咬总统”。言下之意是，如果约翰逊继续平庸下去，他就可能失去选民支持。^[4] 强调政府调节作用的约翰逊政府被指机构臃肿。但政府的支持者认为，约翰逊如此强调政府的作用，与孔子在“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1] Joseph and Stewart Alsop, "Evolution of Eisenhower," *Washington Post*, May 20, 1953: 17.

[2] John Herling, "World's No. 1 Quiz Program," *New York Times*, Jun. 9, 1957: 194.

[3] C. L. Sulzberger, "Foreign Affairs: Confucius B. Johnson," *New York Times*, Aug. 26, 1966: 32.

[4] Russell Baker, "Observer: LBJ, the Polls and the News Slump," *New York Times*, Sept. 20, 1966: 46.

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以及“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释“治国平天下”章）等言论中所表达的为政原则不谋而合。^[1] 约翰逊的反对者却不以为然，批评支持者误解孔子本意：“孔子倡导仁政，而非普遍的政府控制”。支持者因此有断章取义之嫌。^[2] 人们还批评约翰逊政府不知节约用度。虽然“孔子在多个世纪以前就曾告诫，当繁荣降临，不可钱财用尽”，约翰逊政府却延续着前任的赤字开销路线，国债创下新高，百姓日常负担更加沉重。^[3] 甚至约翰逊的座驾速度过快都足以让人愤愤不平。评论写道，“国会山的孔子说：带头超速的人不可能被开罚单”。^[4]

国会引用孔子的政治评论者关注的又一焦点。针对政治人物的从业道德问题，《华盛顿邮报》读者戴维·L. 科恩 (David L. Cohn) 深感不安。科恩希望，参议院专门委员会应该为政府官员制定一套行为规范，而此举并非难事，因为孔子和基督等人早已留下先例。^[5] 巧合的是，在科恩的来信发表不久，参议院专门委员会便拟出了改善联邦官员道德标准的报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甚感欣慰，特地刊登报告节选。报告认可孔子对于官员的道德典范要求具有根本的启发意义。^[6] 1964 年，参议院民主党多数派前秘书罗伯特·G. 贝克 (Robert G. Baker)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再次引发人们对参议员行为道德的关注。从孔子视道德为最高法律的立场出发，《纽约时报》的评论要求“参议院采取步骤，规范其成员和雇员的行为”，而规则委员会就此事提交的报告无法令参议院的批评者满意。^[7] 参议院另一份出版物也引起报纸注意。这本小册子给政治人物的言行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孔子语

[1] “The ‘Stop Lao-tze’ Movement,” *Chicago Tribune*, Jul. 8, 1964: 14.

[2] “On Confucius,” *Chicago Tribune*, Jul. 18, 1964: 12.

[3] “Paying the Piper,” *Chicago Tribune*, Dec. 28, 1968: 12.

[4] Bill Gold, “The District Line,” *Washington Post*, Apr. 11, 1964: B14.

[5] “Charity Begins in the Home Office,” *Washington Post*, Jul. 11, 1951: 14.

[6]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19, 1951: 20.

[7] “Ethics in the Senate,” *New York Times*, Jul. 12, 1964: E2.

录：“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1]

参议院州际与外贸委员会主席查尔斯·W. 托比 (Charles W. Tobey) 用实际行动，支持规范政治行为。他宣布，将电视直播新泽西州一桩港口腐败案的听证会，因为“如孔子所说，百闻不如一见”。^[2]而分别来自俄克拉荷马州和印第安纳州的两名参议员居然在参议院发生争吵，让人不齿。孔子认为，身居高位者应该为地位低下者树立道德榜样，而不是展露性格缺陷。^[3]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罗伯特·C. 伯德 (Robert C. Byrd) 由于关注细节而忽略大体，同样难逃他人指责。在华盛顿每年接待的旅游者人数上，伯德与华盛顿市长出具的数据相差 900 万之多。但批评者对于伯德的细致调查精神并不领情，认为他应该花费这些时间去弄清有多少人正在挨饿。“如果孔子生活在当今世界，他可能会说：烧掉自己房子的人无法长期取暖”，而民生正是参议员自己的“房子”。^[4]

选举、总统和国会是美国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组成要素。孔子进入针对联邦政治的报纸评论，起因于孔子犀利洞察世事又能精练表达为政原则的盛名和形象。孔子充当着置身事外的政治评判者角色。候选人竞选纲领的优劣、总统施政能力的高低、国会及其议员的职业道德，均可在孔子之名的映衬下，即刻显示出与理想原则存在的差距。从这层意义而言，孔子是美国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

与此同时，地方政治评论也在无时不刻地展现着孔子的强大影响力。地方政府和地方政治人物被人评头品足，孔子不仅让评论者底气充足，还能时而让看似枯燥的政治评论平添些许诙谐氛围。

在挑剔的舆论刻画之下，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一样，其政策与行为引起关注之处颇多。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

[1] Marilyn Berger, "Words from the Past—With a Point," *Los Angeles Times*, Dec. 13, 1970: I3.

[2] Charles Grutzner, "Senators Explore Pier Rackets Here," *New York Times*, Mar. 4, 1953: 21.

[3] "Letters to the Editor," *Washington Post*, Jul. 25, 1957: A14.

[4] Bill Gold, "The District Line," *Washington Post*, May 30, 1968: C10.

公》)。这句话用来形容华盛顿特区政府关于城市总体规划的争论最为恰当。到底由哪家机构付诸实施，政府内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再好的规划也只能束之高阁。^[1] 华盛顿市政府还在为如何处置多余的城市雕像发愁。有人撰文提议，完全可以“按照孔子所说”，将雕像安放在市中心杜邦圆形广场的地下通道，行人交费参观，市政预算也能留有盈余。^[2] 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 (Santa Barbara) 是一个具有浓郁西班牙风情的小镇。当地政府要求，所有建筑均要保留西班牙风格，就连中国文化中心都盖上了西班牙样式的红瓦屋顶。报道调侃道，“正如孔子说，你无法跟市政厅作对”。^[3] 缅因州北部五县开放秋冬季节猎鹿禁令，据信一是因为鹿群已达一定数量，二是射箭爱好者施加的压力使然。爱好者强烈要求保存他们“自孔子时代以来就已存在的生活方式”。^[4] 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 (Montgomery County) 市政委员会主席威廉·格林哈尔希 (William Greenhalgh) 上任伊始，就推出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如开通行动热线电话，倾听公民投诉；提高警员工资；迅速充实县政府的空缺职位。雄心勃勃的格林哈尔希引用孔子的为政思想，誓将蒙哥马利建设成为全美最好的县之一。^[5]

在孔子的映衬下，地方政治人物也本色尽显。某人被排挤出地方部门，就是因为他拒不接受任何建议。甚至其助手都说，“即便孔子也无法建议”。^[6] 一位地方职位的候选人风趣幽默的个性因为孔子而展现出来。当竞选大会主席介绍他拥有堪比艾默生、梭罗和孔子的无穷智慧时，此人站起来说道，“我在想，孔子那家伙怎么知道我

-
- [1] Willard Clopton, "2 Agencies Vie for Helm of 'Year 2000' Planning," *Washington Post*, Jan. 24, 1963: B1.
 - [2] "Letters to the Editor," *Washington Post*, Dec. 10, 1961: E4.
 - [3] Horace Sutton, "Courthouse Carries Spanish Grandee Air," *Washington Post*, Mar. 16, 1958: F24.
 - [4] John W. Randolph, "Maine Reports Huge Deer Herd—Season Opens Monday in Five Counties," *New York Times*, Oct. 20, 1956: 37.
 - [5] Paul Hodge, "New County Office Set to Act on Complaints," *Washington Post*, Nov. 21, 1967: B5.
 - [6] Drew Pearson, "Return of Bastille Key Urged," *Washington Post*, Apr. 7, 1951: B15.

在1964年竞选职位？”^[1] 纽约州众议员摩西·M. 温斯坦 (Moses M. Weinstein) 人称“樱桃爆竹”，因为他在政治辩论中善于引用圣经和孔子向对手发起攻击，聪明机智，频频得分。^[2] 警官奥古斯特·沃尔默 (August Vollmer) 有美国“现代犯罪侦破学之父”的雅称。他毕其一生精力，预防和侦破犯罪，坚信理想的警员应该具备“孔子的宽容”等美德。^[3] 伊利诺伊州库克县 (Cook County) 检察官埃德·汉拉恩 (Ed Hanrahan) 吹嘘自己的吸毒干预计划为美国首创。不以为然者讥讽道，“他的确应该吹嘘；这是自孔子发现鸦片以来的首次（干预）尝试”。此言既贬损了汉拉恩，又延续了美国社会关于吸食鸦片源于中国的成见。^[4]

在本章的分析论述中，孔子继续充当着美国政治的评判者和监督者，帮助人们辨别政治是非，争取各种权利。因为孔子仁爱思想的映衬，少数群体缺乏权利的状况尤为明显地表现出来。战后报纸对于美国社会的潜在问题也有敏锐分析。报纸建议，为减少青少年叛逆、美德缺失和其他问题的发生，美国人应该加强个人修养，教育也应该增加包括孔子思想在内的道德伦理的比重。

在此过程中，孔子被赋予几大功能。第一，孔子是美国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揭示者。孔子善于观察和捕捉细节，报纸的很多撰文者显然是在利用孔子这一广为人知的人格特点，独辟蹊径而又让人深刻地展现时隐时现的各种问题。第二，孔子是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剖析者。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问题的症结何在则是人们需要深入思考的对象。一旦以孔子思想所代表的理想原则为参照加以剖析，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思想境界便显露出来。政治痼疾、个人行为模式的缺陷、种族歧视、青少年叛逆问题以及家庭问题均可从中找到根源。第三，孔子是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解决者。针对令人担忧的各种弊

[1] Matt Weinstock, "Realization of Some Things Comes Hard," *Los Angeles Times*, May 8, 1964: A6.

[2] "Convention Leader: Moses M. Weinstein," *New York Times*, Apr. 6, 1967: 35.

[3] "August Vollmer Suicide on Coast," *New York Times*, Nov. 5, 1955: 40.

[4] "Charlie Cherokee Says," *Chicago Defender*, Apr. 15, 1971: 5.

端，报纸上的有识之士又从孔子那里找到灵感，建议从行为规范和教育入手，改变美国人的精神面貌。

三大功能，相互呼应，孔子得以融入美国报纸关于社会与政治问题的讨论，成为美国战后社会“和谐”氛围中反思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与媒体上引用孔子的所有情形相似，此处的评论无意关心所谓的孔子言行精确与否，有时甚至杜撰孔子语录，以满足特定需要。撰文者致力于迎合大众对于孔子的肤浅印象，着眼于利用这种印象，达到突出问题的目的。

第十七章

美国战后日常生活中的孔子

从二战结束至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社会持续繁荣，消费与消遣热情居高不下。报纸一方面及时反映消费和消遣领域的新产品和新趋势，另一方面又激励更多的人投身于消费与消遣热潮之中，从而让消费与消遣之风愈发强劲。消费不仅涉及商品服务与买卖过程，也体现着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美国人的日常消费蕴含着丰富的多元文化信息，研究此类信息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美国多元文化。孔子就是一个经常出现在美国战后消费与消遣文化中的异域象征。在消费与消遣语境之下，孔子从博大精深的思想家转变为美国消费与消遣潮流的引导者，诠释着中国文化符号在美国环境中的异质化现象，体现出中美文化不拘一格的交融形式。

一、家居消费中的孔子

由于二战后的经济繁荣，美国人较以往更加重视生活质量，家居消费异军突起。房产、汽车、穿着等成为家庭消费的主要内容。引导消费的报纸文章和广告借用孔子善于说教的盛名，鼓励人们加入家居消费大军。

购买房屋是家居消费的重头戏。某些房产开发商看重孔子的影

响力，并试图让严肃的广告看似轻松诙谐，便假借孔子之口，敦促消费者作出有利于卖方的选择。纽约的赫德里克-斯坦利 (Hedrick & Stanley) 建筑工程公司以购房建议的形式，推销自己开发的住房。建议共 10 条，其中之一是良好的周边环境。广告声称，“子曰，‘你的财产价值取决于你的邻居！’”所以，购房者必须步出汽车，了解附近其他房屋的维护状态，以及交通、购物、娱乐和教堂设施等。^[1] 自称“工人朋友”的加利福尼亚鲍勃·克雷格公司 (Bob Craig) 的广告标题就是“子曰”。杜撰的孔子语录是，“在新的壁炉里烧掉旧的租房收据！”鼓励人们购买“品质新房”。新房无须付现，每月仅付 80 美元，就可以“打开通向新颖生活方式之门”。^[2] 佛罗里达州贝弗利山 (Beverly Hills) 的住宅开发商秉承以讹传讹的“孔子”言论“百闻不如一见”，特地修建和装修了“样板房”，供潜在的购房者参观房屋的建造过程。^[3]

房屋装饰是家居消费的另外一大部分。孔子在室内装饰场合的出现往往能起到突出装饰风格新颖别致的效果，因而常被人们用来引领装饰潮流。家具是每栋房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和品位象征。纽约的汤丁商业中心 (Tontine Emporium) 备有各类进口和本土家具，“经济适用”。中心在广告中声称，将按照孔子“出门如见大宾”（《论语·颜渊》）的要求，对前来选购家具的顾客以礼相待。^[4] 地毯是很多家庭不可或缺的装饰物品。华盛顿的卡德维尔 (Cardwell) 商店向顾客表示，“子曰……在卡德维尔购买上等中国手工钩织的地毯最为合算！”所以，任何期望物有所值的地毯购买者，应该造访卡德维尔。^[5] 在冷战背景下，来自中国的商品数量有限。但面对居高不下的需求，

[1] "Potential Buyers Advised to Sketch Floor Plan, Too,"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22, 1957: 15.

[2] Classified Ad, *Los Angeles Sentinel*, Aug. 10, 1961: D5.

[3] "See for Yourself,"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27, 1968: 10.

[4] Virginia Lee Warren, "'An Oasis of Charm' Thrives on Wall St.," *New York Times*, Mar. 7, 1966: 30; Display Ad,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16, 1965: 4; Dec. 20, 1966: 6.

[5] "Virginia's Girl Friday," *Washington Post*, Apr. 21, 1950: C2.

美国生产商“借鉴孔子国度的一些设计样式”，极力填补空白，用新材料生产的小雕像、古玩、烟灰缸和挂架等中式商品正源源不断地涌向市场。^[1] 女装设计师鲁道夫·塞诺 (Rudolph Seno) 的两居室之家充满艺术情调，布置有雕塑、绘画和复制版画，其中包括孔子等人的水墨画像。这套房屋因此被称作“现代简约单元”。^[2] 芝加哥大学校长夫人布置的家居环境虽然没有与孔子有关的物件，但却表现出了“孔子式的智慧”，从而格调优雅，别具一格。^[3] 对于讲究生活舒适的美国人，空调乃居家必备。专业的空调维护必不可少。RMC 公司抓住契机，向人们大力推销自己的维护技术。公司振振有词：“子曰，‘寒冬过去即是酷暑’”，拥有空调的家庭应该早作打算，聘请 RMC 的专业人员检查和维护空调设备。^[4] 该公司的另一广告宣称，“子曰，‘经验造就知识’”。拥有 35 年从业经验的 RMC 技术精湛，值得信赖。^[5]

身处繁荣之中的美国人不仅追求生活的舒适，还极力让居家氛围丰富多彩。比如，有人别出心裁地在厨房墙壁挂上一块黑板，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孔子语录时常出现在黑板上，平添不少有趣氛围。^[6] 芝加哥的一家首饰商店则借孔子之口，推销玩具娃娃形象的饰针，让家庭童趣更加浓厚。广告词中的孔子说，“伯杰公司 (Bergere) 生产的迷人中国双胞胎蔡查理和蔡明 (Charlie and Ming Toy) 既时尚新潮，又赏心悦目”。饰针金黄色泽，仿石材质，“品位无可挑剔”。^[7] 视力下降会影响生活质量，眼镜因此对于快乐生活非常重要。据称，

[1] Elizabeth Fairbairn, "Accessories in Any Motif Now Can Be Bought," *Chicago Tribune*, Sept. 16, 1951: NW-C15.

[2] Louise Hutchinson, "Change Home into Artists' Wonderland," *Chicago Tribune*, Jun. 13, 1954: W-A7.

[3] Lois Baur, "Kimpton Home Reflects Tastes of Wives of U. of C. Heads since 1895," *Chicago Tribune*, Jul. 10, 1955: K3.

[4] Display Ad, *Chicago Tribune*, May 6, 1965: E8.

[5] Display Ad, *Chicago Tribune*, Jun. 29, 1965: B8.

[6] Jack Smith, "'Love's a Kind of Warfare' (Ovid) and Squeaky Chalk's a Weapon," *Los Angeles Times*, Feb. 19, 1959: B5.

[7] Display Ad, *Chicago Tribune*, Feb. 15, 1965: 3.

孔子和柏拉图等人深受没有眼镜之苦，45岁时就无法阅读，为此“可能伤心地哭泣过”。^[1]

丰富多彩的生活自然离不开代步工具——汽车。不管是购买或者租赁，汽车发挥着拓展生活空间的功能。刺激汽车消费的文章充斥报端。首都华盛顿的别克轿车经销商拉尔夫·布朗（Ralph Brown）承诺，对于任何造访公司的人都将以礼相待，因为“孔子说过，‘没有笑脸的人不宜开店’”。来者不管是需要一张地图、一瓶可乐或者一本别克画册，他都会感觉愉快。^[2]同样经营别克轿车的芝加哥鲍尔（Bauer）公司宣称，将在广告发布十日以内，针对前350名购买者以“最少、最微薄的利润”促销。所以，“子曰：‘觅购特价汽车的人完全可能如愿以偿’”。^[3]福特汽车自恃技术力量雄厚，轻视对手，但对手却在奋起直追。评论文章告诫福特公司，唯有彻底领先对手，才能稳住市场，正如“孔子”所说，“如果向国王开枪，必须保证一枪毙命，并且深埋”。^[4]加州坦普尔城（Temple City）的埃德·马尔登（Ed Muldoon）酷爱1955年产的沃尔基（Volkie）汽车，想换装马力更大的发动机。但报纸建议不要更换，“子曰：‘太小的汽车安装太强劲的发动机，就会在太多的时候出现太多的麻烦。’”发动机应与汽车相互匹配。^[5]鉴于人们对汽车的巨大需求，汽车租赁应运而生。恩卡伊（Emkay）公司号称全美最悠久、最有经验的汽车租赁机构之一。特意设计的“孔子”与名曰“迷惑”的客户之间的对话，形象地反映出恩卡伊用以说服他人的逻辑：

迷惑说：孔子大哥，你代步用的黄包车真漂亮。是你自己的吗？

孔子说：不，是我租的，迷惑老弟。

迷惑说：你为什么不买呢？

[1] Theodore R. Van Dellen, "How to Keep Well," *Washington Post*, May 14, 1961: G4.

[2] "Thank You," *Washington Post*, Jan. 23, 1963: A3.

[3] "Bauer Buick Company," *Chicago Tribune*, Aug. 7, 1964: A2.

[4] Jim Murray, "Offices or Awfuls," *Los Angeles Times*, Jun. 18, 1963: C1.

[5] Bill Dredge, "Bearing Knock Test Described," *Los Angeles Times*, Dec. 14, 1957: B6.

孔子说：我就需要一交通工具而已。

迷惑说：然后呢？

孔子说：然后——我喝牛奶。不等于我就要饲养奶牛。

恩卡伊说：孔子说得对。^[1]

宣扬买车不如租车理念的，还有首都华盛顿的黑色塔希提 (Black Tahiti) 公司。连续刊登多日的广告词写道，“子曰：幸福就是发现黑色塔希提”。^[2]

时髦而又实用的衣着是家居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1951年11月，芝加哥的莱恩·布莱恩特 (Lane Bryant) 时装店一款中国基调的棉袍，布面平整，色泽欢快，价格便宜。“孔子”在广告中鼓动道，“一旦发现特价商品就立即买下的女人聪明智慧”。^[3]穿着棉质衣服蔚然成风。报纸鼓励人们相信“时装孔子”所说的话：“每一位衣着考究的女人，今年夏天都应该拥有一套棉质衣服。”^[4]流行款式千变万化，既有遛狗时穿的裙子，也有骑自行车时穿的运动衫，更有“孔子都不敢预测”能够成为潮流的苦力外套。^[5]1966年，白色“即将席卷整个时装界”，所有顶级设计师都在展示成堆成堆的雪白服装，甚至连袜子、鞋子和手袋都是白色的。因此，“正如孔子所说，找一个好的洗衣工或者洗衣店，接触白色衣物时带上白色的小山羊皮手套”。^[6]甚至有商家鼓吹，对于女性而言，收藏金银首饰都已不再时髦。更加稀有珍贵的墨角藻应该成为她们新的投资热点，“孔子也许说过：‘收集墨角藻的女孩永无经济之虞’”。^[7]容光焕发、衣着光鲜的人们如需留住生活记忆，照

[1] “Car Leasing through History: One of a Series,” *Wall Street Journal*, Nov. 17, 1960: 6.

[2] Display Ad, *Washington Post*, Oct. 23, 1969: L14; Oct. 24, 1969: D11; Oct. 25, 1969: E2; Oct. 26, 1969: 123.

[3] Display Ad, *Chicago Tribune*, Nov. 23, 1951: 8.

[4] Inez, “Fashionwise and Otherwise,” *Los Angeles Sentinel*, May 3, 1962: B6.

[5] “For One with Everything: A Skirt for Walking the Dog,” *Los Angeles Times*, May 25, 1962: C9.

[6] Bill Cunningham, Untitled Article, *Chicago Tribune*, Apr. 11, 1966: C3.

[7] “Suzy Says,” *Chicago Tribune*, Jun. 3, 1969: B1.

片可以助其一臂之力。纽约布鲁克林的邦尼 (Bonnie) 照相馆提供收费低廉的照相服务。至于口碑, 邦尼广告自信地写道, “孔子曾说——‘百闻不如一见’; 人人都说——‘百万言不如邦尼一张相’”。^[1]

在住房、交通和衣着之外, 饮食是日常消费必然而重要的环节。美国社会素以节奏迅速著称, 普通民众考虑厨艺的时间相对较少。这为报纸引导人们的饮食消费留下很大的空间。菜谱、水果饮料、餐馆信息等都在报纸上俯拾即是, 丰富着人们的餐桌内容。孔子是历史上著名的美食家, 因此在美国报纸上引领着餐饮时尚, 又为健康饮食提出精囊妙计, 俨然已是美国餐饮体系中的一员。

让人耳目一新的烹饪方法不时出现在报纸读者面前, 增加着日常食物的种类和花样。孔子适时地显示出菜谱的权威性和可行性。孔子据称曾经劝告人们, “享受生活!” 别出心裁的烹饪方法就是享受生活的重要途径。在 1960 年的感恩节来临之际, 加州好莱坞的“美食家冒险”讨论会将教会人们, 利用几种基本原料食品, 制作“真正神奇的”菜肴。^[2]一家著名的植物胶生产商为推销产品, 从被视作孔子语录的“百闻不如一见”中获得灵感, 印制了 50 页的彩图菜谱, 展现植物胶菜品的制作步骤。^[3]有美食文章称, 孔子绝不吃反季节蔬菜。美国人应该效仿, 在春夏两季采摘新鲜草本植物, 制作“喜欢的菜品或尝试烹制未知菜肴”。常见的食用草本植物包括罗勒、迷迭香、鼠尾草和龙蒿。^[4]孔子有“现代意义上第一个膳食学家”之称, 他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诫人们, 蔬菜不宜烹饪过度。根据这一原则设计的肉馅黄瓜、炒荷兰芹、炖生菜等菜谱刊登在数家报纸上。^[5]取名《鲜花烹饪》(*Cooking with Flowers*) 的小册子搜集了 55 种菜谱, 以 11 种

[1] Display Ad,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Dec. 29, 1951: 16.

[2] Marjorie Glass, “Gourmet’s Choice,” *Los Angeles Sentinel*, Nov. 17, 1960: B6.

[3] Marjorie Glass, “Gourmet’s Choice,” *Los Angeles Sentinel*, May 3, 1962: B6.

[4] Jean Hewitt, “Fresh Herbs Put Taste of Summer in Many Dishes,” *New York Times*, May 24, 1965: 35.

[5] Joe Anderson, “Vice Versa: A Virtue of Vegetables,” *Washington Post*, Jul. 8, 1971: H1; Joe Anderson, “There’s Virtue in Vegetables,” *Los Angeles Times*, Aug. 12, 1971: 122.

鲜花为原料,包括“孔子最喜欢的”菊花。^[1]“孔子屡见不鲜的”香肠被美国肉类研究所推荐为方便经济的食品,很多家庭菜都可以香肠为主要食材。^[2]“孔子鸡”则是一道别出心裁的菜品。烹饪者需要在烘烤时每十分钟给鸡身加一层用滤干的杏子和绿茶叶制成的混合调料。^[3]然而,也有人对美国菜谱的原创程度不甚满意。虽然美国烹饪并非完全陈腐过时,但美国人最喜爱的牛排制作方法如同停留在“孔子时代”一样,缺乏新意。^[4]

水果与饮料是必要的佐餐之物。经销商借孔子盛名进行推销的情形屡见不鲜。美国柑橘闻名世界,推销者称其为“老少皆宜的上等小吃”。如果喜爱美食的孔子在世,他“一定会惊诧于”美国柑橘的多汁、个大和金黄色泽。^[5]著名的沃尔格林(Walgreen)连锁店灵活运用所谓的孔子语录“百闻不如一见”,在包装盒上苦下工夫,力争大幅增加冰激凌的销售量。新包装上印着冰激凌和新鲜草莓的彩色照片,巧克力冰激凌的包装照片则是冰激凌周围摆放着几块诱人的巧克力。照片覆盖整个包装盒,给人以立体感。效果似乎立竿见影:尽管配方未变,数名消费者却反映口味更佳。^[6]华盛顿的一家咖啡店用孔子名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为广告词,称赞顾客为君子,以刺激消费。^[7]

外出就餐是美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环节。餐馆使出浑身解数,吸引食客。一大策略就是大打孔子牌,以孔子增添餐馆的吸引力。孔子曾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第四章)。波士顿的沙拉

[1] Carolyn McGuire, Untitled Article, *Chicago Tribune*, Feb. 8, 1971: B4.

[2] “Food News: Suggestions for Using Ever-Popular Sausages,” *New York Times*, Feb. 22, 1952: 17.

[3] Nancy Stahl, “Jelly Side Down,” *Chicago Tribune*, Jul. 26, 1971: B5.

[4] Joan Winchell, “Beverly Hills Cafes Full of Cuisine—and Customers,” *Los Angeles Times*, Mar. 6, 1958: A1.

[5] “Citrus Claims National Popularity with Cooks,” *Chicago Defender*, Feb. 12, 1970: 30.

[6] James M. Gavin, “Walgreen’s Ice Cream Sales Campaign Uses New Cartons,” *Chicago Tribune*, Jan. 21, 1966: C11.

[7] Display Ad, *Washington Post*, Apr. 9, 1954: 29.

夫 (Sharaf) 连锁餐厅表示, 自己的经营目的就是要改变“鲜能知味”的现状, 让众多的食客品尝和明辨各种菜肴之味。^[1] 芝加哥的托珀 (Topper) 餐厅模仿孔子的语气写道, “做饭炒菜的妻子有三个美好愿望应该得到满足: 心存感激的丈夫, 被不断亲吻的脸颊, 每周到托珀用餐一次”, 用家庭温情唤起人们的就餐欲望。^[2] 至于华人餐饮与孔子的关系, 我们将在第二十四章详细分析。

二、休闲消费中的孔子

经济繁荣之中的美国人注重生活质量, 自然离不开休闲娱乐。从媒体娱乐到舞台艺术, 从参观展览到赏景远游, 美国人丰富着自己的业余生活。报纸推波助澜, 热情地介绍着高雅时尚的休闲方式。孔子也摇身一变, 成为美国人休闲潮流的重要风向标。

在二战之后美国的媒体娱乐中, 电视、电影和广播无疑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三大形式。三者之中, 又以战后迅速普及的电视最受欢迎。报纸时常提醒着读者应该关注的电视节目, 孔子则让预告中的节目更具吸引力。例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芝加哥电视九台数次重播拍摄于 1935 年的电影《神秘的黄先生》(*Mysterious Mr. Wong*), 每次的节目预告都会强调, 这是一部“孔子遗留的 12 枚硬币”引发的悬疑侦破片。^[3] 以虚构的华人侦探陈查理 (Charlie Chan) 为主角的系列电影同样经久不衰。但为了激发观众兴趣, 别出心裁的节目预告依然必不可少。本为系列片的“陈查理”每部主演不同,《纽约时报》说, 纽约电视四台每周五放映的“陈查理”非一人主演, 这种安排“可能

[1] “Boston, Mas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24, 1962: 2.

[2] Hal Hart, “‘Rekindle the Flame’: Take Her out to Dinner Tonight at Topper’s,” *Chicago Tribune*, Jul. 21, 1960: A11.

[3] “Today’s TV Movies,” *Chicago Tribune*, Mar. 19, 1969: C14; May 31, 1970: SCL2; Jul. 14, 1971: B16.

令孔子感到迷惑”。^[1]在全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局外人》(*The Outsider*)中,一位私人侦探穷15年之力,追查据称装有孔子骨灰的东方容器。^[2]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成功推出系列电视喜剧《比弗利乡巴佬》(*Beverly Hillbillies*)之后,正在趁热打铁地把其中的主人公移植到另外一部系列喜剧中。此举的理由是,“如果电视领域也有某种类似于孔子的古老睿智的圣人,他可能会说:‘如果你的某类幽默获得成功,就应让更多的同类题材流行起来’”。^[3]在广播和电视上同时播出的一档节目涉及老生常谈的男女情感,但却因为如下的所谓“孔子名言”而吸引力倍增:“男人只有在娶了女人之后才会了解她,但令人遗憾的是,已经为时太晚。”^[4]

以孔子为噱头推出电影新片和其他媒体娱乐的文章也时有所见。1963年,美国环球电影公司拍摄了马龙·白兰度主演的《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推介文章避开已成巨星的白兰度,转而从名不见经传的女演员桑德拉·丘奇(Sandra Church)入手。文章迎合观众的好奇心理,在挖掘丘奇坎坷的个人经历之外,还将丘奇塑造为勤奋好学的典范。根据描述,丘奇的生活信念源自孔子,其小包里随时放着一张小纸条,上面用英文写着孔子语录“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5]1967年出品的《猎龙记》(*Kill a Dragon*)以有人向香港偷运高爆炸药为故事线索,悬念迭出。为刺激观众胃口,影评欲擒故纵,声称故事纯属虚构:“子曰,神秘莫测的东方炸药横飞,有钱看这种电影的人活该被欺骗。”^[6]《洛杉矶时报》以两封针锋相对但都引用孔子的读者来信为其幽默栏目“女孩”营造声势。第一封信的作者极其愤怒,认为栏目引发众人跟风,以讽刺女性为乐。这就如

[1] Val Adams, "C.B.S. Continuing 'The Lucy Show,'" *New York Times*, Mar. 4, 1964: 75.

[2] "Guest Stars Signed for NBC's 'Outsiders,'" *Chicago Tribune*, Jul. 31, 1968: B19.

[3] "Next Stop 'Petticoat Junction,'" *Los Angeles Times*, Nov. 17, 1963: D4.

[4] Larry Wolters, "Radio TV Gag Bag," *Chicago Tribune*, Aug. 11, 1957: F44.

[5] Don Alpert, "Making Her Own Decisions, Says Sandra Church, Is Hardest Part," *Los Angeles Times*, Mar. 24, 1963: D4.

[6] Clifford Terry, "Schenck Does It Again...," *Chicago Tribune*, Feb. 19, 1968: B20.

同“孔子”所说，“一条狗对着什么叫起来，一百条狗就会对着叫声狂吠”。栏目与讽刺女性者的关系恰似一条狗与一百条狗。^[1]另一读者不以为然，要求报纸“不要生出中断系列的想法”。理由仍然是编造的孔子语录：“如果鞋子合脚，就继续穿。”^[2]

欣赏舞台艺术是休闲娱乐的另一去处。引用孔子能够让读者立即抓住舞台节目的看点所在。戏剧的魅力经久不衰，不断刊载的介绍和评论就是体现。《戏剧新闻》(*Opera News*)杂志每年举办一次戏剧节。在开幕当晚，演员身着各具特色的服装登台亮相，聚集人气。女演员鲁思·福特(Ruth Ford)的装扮俨然“现代中国女皇”，三个手指足有5英寸长，涂有银色的颜料，“如同孔子一样”。^[3]甚至教会都有戏剧上演。洛杉矶市中心的一位论教堂开演的剧目叫《时间里的圣诞节》(*Christmas in Times*)，剧中的重要情节是“刚刚走出孤独、沉默不语而又满脸沮丧的孔子及其兄弟乔乔(Joe-Joe)前来参加圣诞节(活动)”。^[4]对于不断推出的各类戏剧及其演员，观众自有评判。不满于演员媚俗之风的读者写道，“子曰：当今在舞台上脱衣服而不演戏的演员是稀奇古怪之徒”。^[5]身处美国戏剧中心百老汇的演员也难逃观众慧眼。评论者调侃曰，“百老汇的孔子说：在百老汇，感激之情比表演天赋更加少见”。^[6]另一则评论直斥百老汇的铜臭气息：“百老汇的孔子说：你在他们之上时，积攒钱财。他们在你之上时，你用得着。”^[7]剧本来源日渐枯竭，也令人担忧。旁观者不禁问道，“为什么盯住当代作家不放？”包括孔子、苏格拉底等人的经典著作都可加以改

[1] Zelig Leigh, "The Girls," *Los Angeles Times*, Jul. 10, 1955: B4.

[2] "Letters to the Times," *Los Angeles Times*, Jul. 16, 1955: A4.

[3] Bill Cunningham, Untitled Article, *Chicago Tribune*, Jan. 30, 1967: B4.

[4] Ernest B. Furgurson, "Living Theater Gets a New Meaning in Christmas Play," *Los Angeles Times*, Dec. 21, 1970: C9.

[5] "Line o' Type," *Chicago Tribune*, Jan. 7, 1970: 16.

[6] "Walter Winchell... of New York," *Washington Post*, Apr. 30, 1955: 35.

[7] "Walter Winchell... Chatter from Broadway," *Washington Post*, Jan. 15, 1956: H7.

编，戏剧舞台的现状有望得到改善。^[1]

休闲娱乐，音乐舞蹈不可缺少。孔子依然不失为调动欣赏积极性的话语手段。1951年8月20日，参加芝加哥地区音乐节的“快乐旅行”乐队告诉观众，当天是孔子诞辰日，嘲弄孔子的廉价笑话无法带给人们真正的快乐，唯有音乐有此功效。^[2]然而，加州帕萨迪纳的第六届年度音乐滑稽剧串演仍然把“子曰”笑话作为主要卖点。“孔子告诉我”是一张流行音乐专辑的主打曲目。^[3]作为纽约市音乐剧会演的第三部，“诗琴声”（Lute Song）以其孔子元素最为引人注目。剧中主人公会不时蹦出几句至理名言，“融合了孔子和暴君的性格”。^[4]爵士音乐迷们会对纽约的“孔子”音乐俱乐部欣喜若狂，俱乐部女主人可同时演奏多种乐器。^[5]即使经营乐器的商行也能因为孔子而增色不少。华盛顿的一家吉他行就是一例。老板在办公室墙壁上挂满各种珍藏乐器。他特地指着一把中国琴告诉记者，这“与孔子使用的琴属同一类。你知道，他的琴弹的很好”。^[6]欣赏舞蹈是另外一种让人身心愉悦的休闲方式。为促使更多民众观看芭蕾，《纽约时报》的评论极力推崇联票制。面对反对之声，推崇者搬出孔子，声称他曾表示，美好事物“应该被欣赏”，以各种方式增加观众无可厚非。^[7]女演员德博拉·海（Deborah Hay）在纽约安德森剧场表演的三个舞蹈十分前卫，融合了电影、大众音乐和非舞蹈元素。正因为不合常规，海的表演“让人想起孔子曾警告，有些艺术家为显示水很深而把水搅浑”。^[8]

[1] Howard Taubman, "Find Words in Print Not Always Adaptable to Theatrical Use," *New York Times*, Sept. 25, 1960: X1.

[2] Will Leonard, "Tower Ticker," *Chicago Tribune*, Aug. 20, 1951: B9.

[3] Jesse H. Walker, "Theatricals,"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Jun. 3, 1961: 17.

[4] "Oriental Pageant," *Wall Street Journal*, Mar. 16, 1959: 10.

[5] Dorothy Kilgallen, "Star Deal for Judy," *Washington Post*, Nov. 14, 1954: T11.

[6] Willard Clopton, "D.C. Guitarist Is in Tune with String Music of Old," *Washington Post*, Aug. 15, 1964: C2.

[7] Clive Barnes, "Our Hero May Love Ballet," *New York Times*, Oct. 9, 1966: X5.

[8] Anna Kisselgoff, "Deborah Hay Group Gives Three Dances," *New York Times*, Apr. 5, 1968: 52.

与此同时,“孔子”还鼓励人们参观展览,陶冶情操。1964年,世界博览会在纽约举行。为显示组织者的良苦用心和博览会的参观价值,《洛杉矶时报》专门描绘了执委会主席穿梭世界各地、寻求各国支持的忙碌场景。执委会主席也不失时机地引用所谓的孔子语录“骑虎难下”,形容自己不辞辛劳、致力于搭建世界交流平台的举动。^[1]玉与中国文化渊源极深,玉展介绍自然不会忘记提及孔子。孔子被称作“世界上最为雄辩的玉代言人之一”。^[2]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Field Museum)收藏有大量中国玉。在展厅即将开放之时,报纸营造舆论说,孔子有“君子比德于玉”(《礼记·聘义》)之说,玉展因此值得一看。^[3]1952年3月,第四届加利福尼亚业余爱好展如期举行,展品均与宗教有关,比如“坐在佛塔下的孔子”等。^[4]1955年新年来临之际,加州帕萨迪纳市举行了第66届玫瑰游行,各种花车依次亮相。游行结束,花车便成为供人参观的一道亮丽风景。霍桑市的花车取名“子曰”,上有东方背景、中国佛塔、孔子雕像和坐黄包车的美丽女孩。^[5]1956年3月,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行的玻璃艺术展上,一件刻有孔子语录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设计”引人注目。^[6]纽约雕塑中心举办的当代美国雕塑展正在喜迎八方来客,其中的一件展品是“用石墨雕刻而成的高大威严的孔子像”。^[7]1969年,伊利诺伊州温内特卡(Winnetka)举办的雕刻与绘画展上,每件艺术品都会附上至理名

[1] Jerry Hulse, "Travel," *Los Angeles Times*, Nov. 19, 1961: D9. “骑虎难下”实为中国成语,出自《明史·袁化中传》:“惧死之念深,将铤而走险,骑虎难下。”

[2] Dorothy Adlow, "Composition and Source of Jad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17, 1963: 8.

[3] "Field Museum Plans Jade Ball," *Chicago Defender*, Oct. 30, 1971: 13.

[4] "Novel Religious Shrines to Be Seen at Hobby Show," *Los Angeles Times*, Mar. 3, 1952: 19.

[5] "'City of the Angels' Float Prepared for Part in New Year's Rose Parade," *Los Angeles Times*, Dec. 30, 1954: 3; "Description of Floats Participating in Parade," *Los Angeles Times*, Jan. 3, 1955: A2.

[6] Betty Pepis, "Crystal Art," *New York Times*, Mar. 11, 1956: 242.

[7] "Sculpture Center Has a Lively Annual Show," *New York Times*, Apr. 21, 1956: 20.

言，例如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论语·雍也》）。^[1]

植物花卉展是众多展览中的一种，如果能证明与孔子的渊源，必将增加不少吸引力。芝加哥的菊展久负盛名。每当展览即将拉开帷幕，报纸总会花费大量篇幅，细数菊花的悠久历史和从东方传入西方的历程，必然引用孔子在《礼记·月令》中的名句“鞠有黄华”。^[2] 加州圣巴巴拉市有一处极为隐蔽的花园，藏在很高的橄榄绿葡萄架后面，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适合安静沉思。花园内的石碑前，放置着一尊孔子石像，氛围因此更加庄重。^[3] 在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城，坐落着远近闻名的国际友好花园，花木来自世界各国，是和平的象征。中国园悬挂着孔子第77代直系后裔孔德成手书的条幅。^[4] 伊利诺伊州园林俱乐部协会在布置园林展时，自称受到孔子智慧的影响。^[5] 为聚敛人气，加州洛斯阿拉米托斯（Los Alamitos）高尔夫俱乐部在1970年举办了一次樱花节，俱乐部执委会委员身着和服，每个发球区都有“子曰”装饰牌，并种有一颗小樱花树。^[6]

外出旅游是另一广受青睐的休闲方式。孔子据信说过，“百闻不如一见”。北卡罗来纳州旅游局以此为灵感，用两百多张各地风景照片，编成一本度假指南，民众可以免费索取。^[7] 科罗拉多大峡谷闻名遐迩，游客可以在岩石上分辨出孔庙和金字塔等建筑形状，“游客不

[1] “Animated Quotes Tap Man’s Reason,” *Chicago Tribune*, Apr. 13, 1969: N12.

[2] Frank A. Balthis, “Mum’s History Goes Back to Ancient China,” *Chicago Tribune*, Apr. 2, 1950: SW-A4; Louise Hutchinson, “Confucius Say: Let’s Not Be Mum on Mums,” *Chicago Tribune*, Nov. 16, 1952: NW-A4; “Park District Picks Mum as Month’s Plant,” *Chicago Tribune*, Nov. 8, 1963: 4.

[3] Anne Lang, “Garden of Meditation,” *Los Angeles Times*, Mar. 11, 1951: 45, 53.

[4] Barnard K. Leiter, “Floral Tributes Serve as Symbols of Peac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11, 1953: 11.

[5] “Two Garden Clubs Ready for Show,” *Chicago Tribune*, Aug. 6, 1964: N2.

[6] “Tournament to Follow Cherry Blossom Theme,” *Los Angeles Times*, Aug. 13, 1970: H18.

[7] “Hotel—Resorts North Carolin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6, 1952: 9; “North Carolina,” *Chicago Tribune*, Jun. 8, 1952: F4.

同，形象各异”。^[1]造访书香气息浓厚的大学校园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秋高气爽之时，如果光临密歇根大学安阿伯（Ann Arbor）分校，你不但可以体验色彩斑斓的美国文化，而且还可参观奇特的斜线广场。广场中心镶嵌着一个巨大的铜质“M”，“子曰，踩到M的新生无法通过第一次考试”。^[2]二战以后，很多美国人开始掀起国外度假之风，即使风餐露宿也在所不辞。怀着类似孔子“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的信念，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背着简单行囊，远赴欧洲，体验异域文化。^[3]

三、孔子与美国的体育竞技

体育竞技首先涉及体育态度。既要全力以赴又要平心静气，乃比赛态度的理想境界，擅长说教的孔子让抽象的道理顿时清晰明朗。肯塔基马赛场面喧闹，所有选手激烈角逐。这种相互胶着状态甚至会“令孔老夫子精神崩溃”。^[4]但与此同时，“孔子”又劝导人们要心平气和地接受比赛规则和比赛结果，培养重在参与的精神。“孔子”说，“希望是一个巨大的误导因素”，任何球队在赛前都不应有不切实际的幻想。^[5]新的棒球赛季即将来临，体育评论家引用所谓的孔子语录“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勉励球员在迎接挑战的同时，将棒球运动视作“极

[1] Lynn Rogers, "Scenic Treasures Await Vacationist at Grand Canyon," *Los Angeles Times*, Jul. 25, 1954: 31.

[2] Horace Sutton, "Rah, Rah for the Old College Spirit," *Los Angeles Times*, Oct. 30, 1966: I20.

[3] Barbara Belford, "A Student's Guide to Europe Hangouts," *Chicago Tribune*, Apr. 16, 1967: F22.

[4] Walter Haight, "Field Horse Romps by 4 Lengths to Pay \$31.30," *Washington Post*, May 6, 1951: 4.

[5] Braven Dyer, "False Hope Sets SC up for Fall," *Los Angeles Times*, Oct. 14, 1958: C1.

好的沉思自省方式”。^[1]名叫布基·哈里斯 (Bucky Harris) 的棒球队员因为被以前的球队解聘, 而怀着报复心理参与比赛, 结果不理想。报纸点评曰, “最早是孔子或者与其类似的中国人说过: 计划报复的人掘开了两人的坟墓”。^[2]“孔子”也说, 新赛季伊始, 所有球队和球员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因此不应为过去的成绩沾沾自喜或者为此前的失败耿耿于怀。^[3]即使球队经理也要有能上能下的心理准备, 因为纵然孔子没有说, “棒球队经理受聘的结果只能是解聘”依然是真理。^[4]因比赛引发的骚乱令人头痛, 参与各方往往都会受到惩罚。评论者建议比赛者“记住孔子的话, ‘评判比赛 (骚乱) 的会议会各打五十大板’”。^[5]

在体育精神之外, 战术与策略是另一获胜法宝。1958年, 美国棒球比赛规则进行了46年以来的首次改革。面对此起彼伏的非议之声, 评论者建议球队切勿慌张, 应该苦练技能技术, 应对挑战, “子曰, ‘如果持球触地得分够多, 就不必担心新规则’”。^[6]了解对手同样重要。一则体育评论中的“孔子”说, “当鳄鱼朝你笑, 数一数你还有几条腿”。^[7]而在另一评论, “孔子”的见解是: “当鳄鱼朝你笑, 数一数你有几根肋骨”。^[8]赛场策略运用得当无疑大有裨益。针对橄榄球比赛, 建言者声称, “孔子可能会说: ‘在橄榄球比赛前57分钟只获得三分

[1] “This Morning... with Shirley Povich,” *Washington Post*, Apr. 11, 1955: 21.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并非孔子所言, 而是源于《老子》第六十四章: “合抱之木, 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2] “This Morning with Shirley Povich,” *Washington Post*, Apr. 24, 1950: 14.

[3] Ted Damata, “Hawks Begin ‘Big’ Season Play Tonight,” *Chicago Tribune*, Apr. 7, 1971: C1.

[4] Bob Addie, “Who Will Be Next?” *Washington Post*, Sept. 24, 1969: D2.

[5] Jim Murray, “Illinois Spark Could Set Big 10 Athletics Ablaze,” *Los Angeles Times*, Mar. 9, 1967: C1.

[6] “Confucius Say,” *Chicago Defender*, May 17, 1958: 2; “This Fall’s Most Exciting Play,” *Los Angeles Times*, Sept. 7, 1958: TW7; Martie Zed, “New Extra Point Rule Sets up Second Guess,” *Washington Post*, Sept. 14, 1958: L1.

[7] Jim Murray, “Ahead of Headlines,” *Los Angeles Times*, Apr. 27, 1962: B1.

[8] Jim Murray, “Veni, Vidi Vincie,” *Los Angeles Times*, Dec. 2, 1963: B1,

的球员不会赢得整场比赛。’”^[1] 在一场棒球比赛中，密歇根州队以绝对优势战胜对手。报纸总结的战术经验是，“子曰：没有防守，就没有得分”。^[2] 美国海军橄榄球队在 1962 年的一场比赛中击败西点军校，制胜法宝就是拥有一名“天才的传球手”。正如“孔子”所说，“不能传球的人将被剁成炒杂碎”。^[3] 耐心捕捉得分机会是值得重视的取胜策略。网球就是一项不能操之过急的运动。报纸总结道，“也许孔子说过……等待适宜机会的人能够战胜很多更为优秀的选手”。^[4]

球员个人素质事关比赛成败，因此也引起体育评论者的重视。教练的坚韧毅力尤为重要。洛杉矶公羊队 (Rams) 在输掉一场橄榄球比赛之后，教练毫不气馁，而是着手准备下一场。失败如同一片难以下咽的苦药，“但正如孔子所说，一片苦药不能说明整个赛季”。^[5] 洛杉矶另一支橄榄球队的教练哈里·埃德尔森 (Harry Edelson) 深得球员喜爱，“子曰：‘如有疑惑，请听从埃德尔森’”。^[6] 某拳击教练作风强悍，勇气逼人，自称从孔子那里获得不少灵感。^[7] 球员自身也应加强素质培养。顽强的毅力就是素质之一。夏威夷的家庭主妇杰奎琳·庞 (Jacqueline Pung) 曾经因为肥胖而极度自卑，但“孔子哲学”给了她生活的信心。庞投身体育，刻苦训练，在获得全国女子业余高尔夫球冠军之后成为专业运动员。^[8] 另一运动员也表示，孔子著作是其业余时间的主要读物。^[9] 敬业精神是另一必备素质。拳王阿里在成名之后兼任过多非体育头衔，引发批评之声。杜撰的孔子语录告诫道，“戴

[1] “This Morning... With Shirley Povich,” *Washington Post*, Oct. 10, 1955: 13.

[2] Edward Preli, “Michigan State Passes Jolt Purdue, 15 to 0,” *Chicago Tribune*, Nov. 8, 1959: A1.

[3] Arthur Daley, “Sports of the Times,” *New York Times*, Dec. 2, 1962: 52.

[4] Nick Seitz, “Over the Net: Be Patien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10, 1971: 11.

[5] Frank Finch, “We’ll Be All Right,” *Los Angeles Times*, Aug. 19, 1950: B1.

[6] Ken Jones, “Romans Rate Edge over Huskies,” *Los Angeles Sentinel*, Oct. 17, 1957: B4.

[7] James F. Lynch, “For D’Amato, the Bell Doesn’t Toll,” *New York Times*, Jun. 12, 1960: 216.

[8] “Golfer Says She’s Hefty But Happy,” *Los Angeles Times*, Feb. 8, 1953: C13.

[9] Robert Markus, “Along the Sports Trail,” *Chicago Tribune*, Jun. 22, 1971: B3.

太多帽子的人头部经常受凉”。^[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进入了 20 世纪持续最久的经济繁荣时期。民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消费文化异常活跃。置房、购车、衣着、饮食、娱乐，无不呈现出生龙活虎的局面。报纸因势利导，让日常消费之风更加强烈。鉴于美国社会的多元化特征，日常消费中自然存在非欧美文化因素。频繁引用孔子就是体现。而孔子符号的异质化现象也非常明显。首先，孔子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背景。一般而言，谈论孔子必然论及中国。但本章的论述几与中国无关，孔子就是美国特定社会现象的代名词而已。其次，孔子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本是闻名古今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孔子却在美国报纸撰文者的笔触之下，变成了生活潮流的引导者和鼓吹者。第三，孔子的存在价值产生异化。两千多年以来，孔子一直发挥着升华人类思想、规范处世行为的作用。而在美国日常文化之中，传统的存在意义急剧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孔子之名所具有的商业价值。

总而言之，美国日常文化中的孔子已经演变为脱离中国文化和传统角色定位的商业符号和促销手段。商业推销关键在于用词简洁而又寓意丰富，孔子就是一个简单易记但又能引发翩翩联想的符号。这表明，美国社会对于孔子的了解是模糊而肤浅的，与学术界的研究不可混为一谈。唯有民众含混的了解才会令日常文化的鼓吹者相信，他们可以左右人们对于孔子的认识。正是孔子在消费者脑海中的模糊印象和商业促销者的有意利用，加上美国持续的经济繁荣，促成了 20 世纪 50—70 年代以孔子为纽带的日常消费文化。

[1] “Marion Jackson Views Sports of the World,” *Atlanta Daily World*, Nov. 14, 1971: 10.

第五部分

当代美国的孔子形象

1972年之后,中美关系和美国社会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尼克松访华之后,又经过数年的曲折与磨合,两国终于在1979年实现关系正常化,告别敌对的交往状态,进入新的外交阶段。中国也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兴起,步入全新的历史时期。而在美国国内,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主义被新保守主义所取代,政治、社会和个人言行的评判标准发生相应变化。华人群体则在地位上升的同时,积极营造整体身份意识。这些不同以往的时代特点,都在当代美国的孔子形象上留下了明显印记。

首先,美国人不再将孔子用作敌视中国的话语工具,而是以孔子为增进对华了解的窗口,或者从孔子入手,解读中美关系格局的新变化。中美关系解冻之初,双方不相往来已有三十载,美国人的中国知识极为贫乏和滞后。充分利用孔子承载的文化信息,成为中国展示自身和美国熟悉中国的重要手段。中美力量格局和中国对美外交行为的变化,也能从孔子那里找到合理解释。孔子启发着美国人对当代中

美关系的认识。

其次，孔子在中国重新焕发的生命力引起美国人的浓厚兴趣。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抛弃以往的批孔态度，转而复兴孔子，积极以孔子思想为基础，构建新型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增加民族凝聚力。但从这一举动中，美国舆论看到的却是中国政府的政治动机和中国社会的漠然。因此，孔子又成了美国人看待中国变革时的有色眼镜。

第三，在美国国内，强调高尚道德的新保守主义和主张群体文化权利的多元文化主义渐成主流。用孔子的美德和权利意识评论美国政府的政策行为，是当代美国舆论构建孔子形象时的一个新亮点。政治家的含混言辞、道德瑕疵和有失公允的政策，都因为孔子思想的映衬而格外引人注目。孔子作为政治监督者的角色有长久延续之势。孔子的为人处世原则继续规范着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舆论一如既往地积极引导。

第四，美国的华人群体融入族外社会的进程加快，但华人的整体特性却无明显减弱的迹象。在美国舆论看来，孔子发挥了强大的凝聚效应。尽管年轻人纷纷以融入主流社会为荣，华人机构和精英依然积极推进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孔子是核心教育内容。华人还在日常言行中有意或无意地表露出尊崇孔子的心理。最具族裔特色的是，享誉全美的华人餐饮，不论身在何处，多有突出孔子崇拜之举。这对于信奉“民以食为天”的华人而言，凝聚作用不容小视。可见，孔子还是当代美国华人的群体黏合剂。

第十八章

中美对话中的孔子

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打破冻结中美关系的坚冰。但隔阂已近三十年，相互缺乏了解，成为两国改善关系的一道障碍。加强信息沟通实乃当务之急。在关系解冻之初，美国报纸上的某些有识之士对此已有深刻认识。有文章指出，中国尽管身为世界“三脚架的第三条腿”，很多美国人却对其知之甚少。美国了解中国，不仅需要减少自我中心主义，“还必须尽量从中国自身立场出发”。^[1]由于长期敌视共产主义，美国严重缺乏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试图了解孔子的人只能依据“批林批孔运动”。一封读者来信警告道，“我们会遭受不利影响”。^[2]1976年，毛泽东去世，美国电视报道翻来覆去都在播放少得可怜的毛泽东影像资料片段，遭人诟病，足显“毛资料的贫乏”，堪比美国人只能从陈查理（Charlie Chan）口中认识孔子。^[3]着眼于类似的信息障碍，两国政府和民间开展了众多文化交流活动。以孔子为主题或者涉及孔子的文化互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几乎未

[1] W. A. C. H. Dobson, "China's 20th-Century Ascendancy," *New York Times*, Jun. 30, 1973: 33.

[2] "Letters to the Editor," *New York Times*, Nov. 9, 1975: E14.

[3] Nicholas von Hoffman, "How Could We Know So Little?" *Chicago Tribune*, Sept. 21, 1976: B3. 陈查理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笔下的一名华人探长，后因比格斯系列小说（1925—1932年间创作）被拍成电影、电视剧和卡通片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孔子说”是其口头禅。

能引起学界关注。通过本章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孔子的现代意义不仅体现于齐家治国,也在于推动中美对话,为构建当代国际秩序作出贡献。

一、涉及孔子的物质交流

中国有句古话,叫“百闻不如一见”(《汉书·赵充国传》),一语道破实物在各种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自从中美恢复交往以来,各类中国物品进入美国,展现在美国人面前,有效弥补了美国在中国信息方面的空缺,加深了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了解。一旦与孔子相联系,对美物质交流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就更加明显,更易捕捉。从美国报纸反应的情况来看,此类交流大量存在,主要渠道包括:中国组织或支持的实物展览、聚焦中国的艺术作品、自发的商品流动等。而支撑所有这些物质交流活动的,是中国欲让美国民众了解的强烈愿望和中美关系逐步改善的总体背景。

通过实物展览,美国人身临其境,直观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自两国恢复交往以来,中国在美举办的展览数量众多,涉及孔子者不在少数。综合观之,这些展览发挥着至少两大功能。第一,展览浓缩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美国民众建立初步的中国印象。1975年,近400件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艺术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堪萨斯城和旧金山巡回展出。春秋时代的编钟音色圆润,余音绕梁,让人顿时领悟“孔子如此钟情音乐”的原因。^[1]1980年10月末,芝加哥举办的中国展是另外一例。展品既有琳琅满目的中国现代产品,也有精雕细琢、展示中国古老文明的艺术品。有些物品做工极为精细,制作时间虽然仅有数百天,却给人以艺术家自孔子时代以来就在不断打磨

[1] William Wilson, "Chinese Exhibit Blends Parts into Wholeness," *Los Angeles Times*, Jul. 6, 1975: P1.

之感。^[1]1980年4月,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始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铜器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被称作中国在西方举办的同类展览中“最完备、最壮观”的一次。商周时期的铜器华贵高雅,孔子劝诫人们远离奢华之语可谓事出有因。^[2]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中国兵马俑在亚特兰大展出。来自中国的主办者称,此次展览的最大亮点,是反映了孔子的集体观念。^[3]

第二,因为展览的举办,美国人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象征——孔子,以及其言其事。孔子重视音乐,以音乐为标准,判断社会礼仪的变迁与兴衰。以此为出发点的中国乐器展既可展示中国悠久的音乐史,又能深化美国人心中的孔子形象。“孔子时代的音乐”于2000年4—8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有关报道在发布消息之时,花费很大篇幅,介绍孔子的音乐爱好。《华盛顿时报》认为,孔子一边弹琴吟唱,一边告诫人们,音乐体现美德,保证社会秩序。自此以后,中国人世代崇尚音乐。^[4]《华盛顿邮报》表示,展览借用孔子之名,希望增加厚重的历史感。与此同时,孔子与音乐的渊源也得以体现:就在古希腊哲学家阐释西方音乐的精髓之际,孔子在为中国远古音乐的前景担忧。文章指出,孔子与展览的联系,激励着人们思考传统抽象音乐与更具感官刺激的现代音乐之间存在的异同和传承。^[5]据称,“欣赏孔子音乐”是参观者纷至沓来的根本原因,足见孔子的巨大感召力。^[6]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更是亲临现场,并在复制的铜器时代乐器上弹奏《白毛女》助兴。大使极为赞赏孔子的音乐思想,直言此次展览的目的,就是“增进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年轻人’,对

[1] “Chinese Artwork Blooms in Exhibit,” *Chicago Tribune*, Oct. 24, 1980: B1.

[2] Sherman E. Lee, “The Glories of Bronze Age China,” *New York Times*, Apr. 6, 1980: D1, 31.

[3] Craig Simons, “The Guardians of a Storied Past,” *Atlanta Journal Constitution*, Aug. 17, 2008: K4.

[4] Joanna Shaw-Eagle, “Bell Exhibit Has the Ring of Confucian Times,” *Washington Times*, Apr. 29, 2000: D2.

[5] Philip Kennicott, “Once upon a Chime,” *Washington Post*, Apr. 30, 2000: G1.

[6] Roxanne Roberts, “Out & About,” *Washington Post*, May 1, 2000: C3.

于中国文化的了解”。^[1]随着美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和孔子的兴趣大增，2010年3月，纽约美华协进会（China Institute）特地举办“孔子：生平与艺术遗产”展。展览虽然由美国华人团体组织，但得到中国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据《纽约时报》，展览既要浓缩让孔子成为“一座丰碑”的思想，也要展示孔子的长相，孔子将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2]

涉及孔子的当代艺术作品是美国人获取和深化中国信息的第二大物质渠道。影像作品以其直观而生动的特点，成为美国人重新认识中国的重要途径。尼克松刚刚结束访华的1972年3月，华盛顿的弗里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就宣布，将放映展现中国近期考古成就的25分钟短片。影片由北京电视台摄制，后人手书的孔子《论语》为主要内容之一。《华盛顿邮报》评论说，这是“中美新关系的文化影响”，有助于美国民众了解“中国人的文化秉性”，改变美国人的中国观停留于“筷子、蟋蟀笼子和廉价苦力帽子”的现状。^[3]1985年5月6日，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开始在第28频道播放12集纪录片《龙心》（*The Heart of the Dragon*）。该片以“人性化和拟人化”的手法，讲述中国5000年文明史，帮助人们正确理解以孔子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改变陈查理电影制造的成见。^[4]1987年拍摄的好莱坞电影《末代皇帝》在时隔十年之后，仍被有些美国人当作认识中国的媒介。评论认为，影片呈现出中华帝国的宿命：“龙变成了人，皇帝变成了公民”，印证着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之说。^[5]

[1] Ann Geracimos, "Ageless Music Echoes in the Halls of Sackler," *Washington Times*, May 3, 2000: C8.

[2] Holland Cotter, "Envisioning an Abstraction Who Was Also a Man," *New York Times*, Mar. 26, 2010: 25.

[3] George Eagle, "Freer Gallery's China Film," *Washington Post*, Mar. 7, 1972: B7.

[4] Howard Rosenberg, "'Dragon' Takes Look at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May 6, 1985: G1.

[5] Oliver Stone, "An Epic That Gets Better as It Gets Longer," *New York Times*, Nov. 29, 1998: AR17.

与孔子有关的文艺演出在让人身心愉悦的同时,也是展示中国文化的窗口。在美国影响较大的当数“中国编钟”(Imperial Bells of China)演出。1989年4月,“中国编钟”音乐会在纽约圣约翰教堂举行。所用乐器均为出土的孔子时代乐器的复制品。美国观众因而能够“听闻孔子可能听过的音乐”。主办者表示,此次演出“蔚为壮观地再现了中国古代的音乐、歌曲和舞蹈文化”。^[1]这是美国“中国编钟旋风”的开始。1991年,“中国编钟”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北美春季特别巡演,足迹遍及美国众多大小城镇。每次演出,无不突出编钟与孔子的紧密联系。所到之处,无不欢声雷动,好评如潮。^[2]

此外,展现中国风貌的主题公园在美国应运而生。广东深圳的“锦绣中华”主题公园闻名遐迩。1994年1月,占地76英亩的佛罗里达“锦绣中华”园在该州基西米镇(Kissimmee)开门迎客,园区距离当地迪斯尼世界两英里。公园由具有中国政府背景在香港中国旅行社和一家美国公司合资兴建。微缩景观展示着中国社会的多元与包容,文字说明则不忘提及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两者结合,意在促使美国参观者全面了解中国。^[3]纽约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上的寄兴园(Chinese Scholar's Garden)是另外一处中国主题园。寄兴园耗资800万美元,由州市政府和其他资助承担,但材料和工人来自中国园艺建筑公司。所以,这也是中国主动展示文化风貌的一大举动。园内怪石松竹,白墙疏影浮动,复制出中国江南书斋之韵,不失为“可供孔子沉思冥想的城市绿洲”。^[4]

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人对于中国生活用品的兴趣大增,刺激着

[1] Raphael Mostel, "Music from the Time of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Apr. 9, 1989: H26.

[2] Harry Bowman, "'Imperial Bells of China' to Ring out in Dallas," *Dallas Morning News*, Apr. 5, 1991: 2C.

[3] Larry Rohter, "China Becomes Theme Park, But Cultural Debate Remains Real," *New York Times*, Jan. 9, 1994: 12.

[4] Anne Raver, "An Urban Oasis for Confucius to Ponder," *New York Times*, Jun. 10, 1999: F8.

两国间的商品流动。这是促进美国人深化中国认识的第三大物质渠道。很多时候，生活用品与孔子没有直接关系，但为增加读者的关注程度，报道经常牵涉孔子，从而将孔子建构成中美商品流动的见证者。《达拉斯晨报》发现，随着尼克松的北京之行，中国厨房用具风靡一时，相关制造商“占据着赚钱的有利态势，令人眼红”。报纸幽默地写道，虽然就美国人的熟悉程度而言，毛泽东思想不会超过与孔子有关的笑话，中国厨具的需求却一路飙升。^[1]而在穿着方面，美国人开始青睐中式盘花纽扣、练功服、棉衣和旗袍。《洛杉矶时报》感叹曰，目睹此情此景，“即使孔子可能都无法解释”。但该报承认，“显然，尼克松总统 1971 年（原文如此）的中国之行不止是一次政治旅行。它立即引发了远东服装热”。^[2]主动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推销中国商品的广州交易会，没有因为如火如荼的批孔运动而终止，这让美国人略感意外。《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分析，这表明，中国急于增加对美贸易额，消除贸易逆差。销往美国的商品中，纺织品和手工艺品等蕴含着明显的中国信息。^[3]

从美国流向中国的生活用品也不乏其例，这同样是美国人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美国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人参产量居世界之冠。虽然美国人并不食用，中国的巨大需求却让他们知晓，人参在中国文化里占据着神圣位置，孔子都对这种植物根茎有过高度评价。因为巨额利润的诱惑，甚至八旬美国老人也会带着工具，上山挖掘人参。^[4]随着人口激增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急需进口美国粮食。这让美国人了解到，自孔子时代以来，中国一直奉行粮食自足的政策，但这种政

-
- [1] Sandal and Pritch English, "More Chinese Dishes to Try," *Dallas Morning News*, Jun. 1, 1972: 9.
- [2] Bettijane Levine, "Chinatown on Orient Bandwagon," *Los Angeles Times*, Jul. 13, 1975: E1.
- [3] Frederic A. Moritz, "'Made in China' for U. S. Marke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2, 1974: 1.
- [4] Tom Eblen, "For Mountain Folk, Wild Ginseng Is as Good as Gold," *Atlanta Journal Constitution*, Dec. 17, 1985: H1.

策即将遭到废弃。^[1]

牵涉孔子的中美物质交流仅仅占据中美物品流动的极小部分，具体比例无从考证。但由于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此类交往又以直观的形式，丰富着美国的中国信息，更改着以往的偏见。特别在两国恢复交往之初，中国信息尤其匮乏之时，物质交流能够起到立竿见影之效，作用不容小视。即便是在交往频繁之后，物品所携带的文化信息仍然影响着美国人的中国观。各种各样的中国展览就是最好的说明。

二、孔子“见证”下的人员流动

人员交流可以将中国信息及时反馈给美国民众，是中国自我展示和美国人认识中国的再一渠道。鉴于一贯做法，美国报纸时常引用家喻户晓的孔子之名，简明扼要地塑造着需要向民众传递的中国形象。孔子“见证”下的人员交流所造就的中国观，既涉及中国固守传统的执著，也反映中国接纳西方影响的举动。中国因此是一个处在历史变革之中的国家。

来华的美国人发现，纵然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反孔运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仍然呈现出根深蒂固的孔子情结，中国人通过延续孔子影响，延续着传统。美国人对中国菜肴赞不绝口，称其花色多样，搭配合理，大江南北，概莫能外。这些菜品历史悠久，“与孔子同龄”。^[2]美国游客现身说法，用亲身经历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人的日常举止。游客发表的文章认为，尽管中国信奉共产主义已有三十年，中国人还是遵循着“圣人孔子在 2000 多年前阐述的传统行为规范”。“礼”的

[1] Graham Hutchings, "A Giant Becomes Unable to Feed Itself," *Washington Times*, Apr. 7, 1995: A16.

[2] Eileen Yin-Fei Lo, "China's Genius with Vegetables," *New York Times*, Feb. 7, 1982: XX31.

影响无处不在。^[1]《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约翰·F. 伯恩斯(John F. Burns)因为不遵循孔子“毋自辱焉”(《论语·颜渊》)的劝告,从事与记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动,被中国政府驱逐。^[2]而在上海至无锡的火车餐车,面对菜谱上琳琅满目的菜名,美国游客感觉如同阅读孔子的《论语》,有眼花缭乱之感。^[3]山东曲阜更是大打孔子牌,吸引美国人前来领略中国传统的精髓。美国旅游公司的推介材料极力强调,在曲阜的五天行程均围绕孔子和中国的传统展开,将曲阜之行定位为中国传统之旅。^[4]

与此同时,美国报纸从孔子“见证”下美国人的中国之行中,看到了中国国民性格“偏执”与“孤傲”的一面。自从中美关系解冻,资源保护主义者南希·纳什(Nancy Nash)就在致力于保护中国的野生动物。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因为撰文捍卫孔子,纳什被中国拒之门外。直到“四人帮”倒台,事情才出现转机,纳什得以再次访问中国。^[5]借两国关系改善的机会,成千上万的美国华人返乡寻祖,但却遭遇中国“偏执”性格的又一后遗症:祖墓难寻。中国自古就有保护祖坟、续写家谱的传统,孔子家族就是一例。然而,红卫兵大肆捣毁坟墓,唯有地处偏僻的少数古坟才能幸免。^[6]2001年8月,唐·金(Don King)在北京争夺重量级拳击冠军。离赛事尚有三个月,金就在烧香拜佛,祈求成功。其在言谈之中不时引用孔子和毛泽东等人语录。在报纸看来,孔子注视之下的金和毛有着最大的共同点——“崇

[1] Fox Butterfield, "It's Not All Chinese Banquets," *New York Times*, Feb. 6, 1983: XX15.

[2] "One Foreigner's Costly Illusion about China," *New York Times*, Aug. 14, 1986: A22.

[3] Stan Delaplane, "Slow Boat and Train through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Mar. 27, 1983: I19.

[4] "22-Day Tour through China Offered 18- to 30-Year Olds," *Chicago Tribune*, Jan. 22, 1989: 19.

[5] Beverly Beyette, "Conservationist Enlists Help of Asia's Buddhists," *Los Angeles Times*, Feb. 13, 1986: G1.

[6] Frank Ching, "'Oriental Roots,'"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2, 1983: 1.

尚”权力。金是因为对冠军的渴望，毛则是因为代表着中国共产主义。^[1]就这样，拳击运动员漫不经心的言语，居然引申出了不合美国标准的中国“怪异”国家性格。而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中国抓住一切机会，想让美国相形见绌”，显示出“孤傲”的一面。但美国泳坛名将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高举美国旗帜”，带领美国游泳队，“以孔子无法企及”的速度夺得数枚金牌。^[2]

另一方面，在孔子的“注视”之下，中国也在逐渐敞开国门，感受着欧美文化的冲击，显示出中国社会变革的一面。随着中美关系回暖，两国直飞航线开通，跨国旅行的人们经历和见证着中美文化的碰撞。按照《波士顿环球报》的说法，“孔子的中国”和“罗纳德·里根的美国”开始交汇。^[3]中国决定参加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成为中国愿意与外界交流的又一旁证。《洛杉矶时报》点评道，“正如孔子所说”，培养一些优秀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并非坏事”。^[4]1988年，作为“别具一格的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两名顶级中国厨师来到波士顿，向美国人展示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的中国餐饮文化。^[5]篮球明星姚明在中美两国家喻户晓。他在NBA赛场上纵横驰骋，处事果断。报纸一面声称从姚明现象中发现了中国政府对外交流的愿望，一面以杜撰的孔子语录形容姚明的雷厉风行：“子曰，优柔寡断的人就会在NBA赛场上落败。”^[6]

鉴于对外交流的频繁和深入，中国国内社会亦显示出明显的变革迹象，上海便是缩影。论及逐渐蔓延全国的圣诞庆祝之风，报纸诙谐

[1] Mark Kriegel, "Has 'Em between Rock & Hard Place," *Daily News*, May 15, 2001: 69; George Kimball, "Boxing," *Boston Herald*, May 15, 2001: 79.

[2] Thomas Boswell, "Baltimore's Best Answers the Call," *Washington Post*, Aug. 12, 2008: E1.

[3] "Travel," *Boston Globe*, May 3, 1981: n. p.

[4] Bill Shirley, "China Preparing Its Biggest and Best Olympic Team in History," *Los Angeles Times*, Apr. 15, 1984: SD-B1.

[5] Gail Perrin, "Shandong Chefs Visit Boston," *Boston Globe*, Mar. 16, 1988: 47.

[6] Tom Knott, "This Draft Requires Bevy of Interpreters," *Washington Times*, Jun. 28, 2002: C1.

地写道,“圣诞老人已经不在北极,他目前住在上海”。在不经意间,中国元素与圣诞节相互融合,圣诞老人“看起来更像孔子”。^[1] 在上海的南京路,雅诗兰黛的广告随处可见,标志着“美国主要化妆品公司与孔子一毛的国家之间实现相互交融”。^[2] 上海的精英阶层让孩子学打高尔夫,讲美国英语,上少年 MBA 课程,以这些经历“装扮阶级身份”。《纽约时报》的一位读者相信,精英阶层的所作所为仅仅关注自我,已经背离孔子关于礼仪须与仁爱相辅相成的要求,呈现出与中国传统迥然有异的“新理想”。^[3]

日渐频繁的人员往来佐证着物质交流带给美国人的中国信息。刚从封闭状态下走出的中国,传统色彩较为浓厚,孔子余威尚存。而在美国人看来,正是孔子仍未衰退的影响,折射出中国在现实世界中的“困境”:既偏执孤傲,又在全球化进程中步步退却。所以,孔子“注视”之下的人员往来,建构了中国既想固守传统和自身特性,又需应对外来文化冲击的忙乱形象。

三、彰显中国自信的孔子学院

面对中国“死守”传统,美国人会作哀其不争之状;如果中国主动顺应变革,美国又会滋生防范之心。这种矛盾心理困扰着很多美国人,他们针对孔子学院作出的反应较具代表性。自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教育交流就是促进美国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通过与中国有关方面合作,众多美国学校利用假期,组织学生访问中国,学习“中国历史、建筑和孔子著作”。^[4] 但诸如此类的短期访问相对零散,在改变美国人的中国观方面作用有限。中国于 2004 年开始在海外建立的

[1] Art Buchwald, “The Far East Pole,” *Washington Post*, Dec. 9, 2004: C4.

[2] Mary Tannen, “Exporting Estee,” *New York Times*, May 1, 2005: E58.

[3] “China’s New Ideals,” *New York Times*, Sept. 29, 2006: A22.

[4] Deborah Stead, “Blackboard,” *New York Times*, Aug. 6, 1995: EL7.

孔子学院，成为推广中国文化最强劲政府行为，引起世人关注。美国报纸的报道极其频繁，在涉及教学和交流内容的同时，时刻强调中国与日俱增的自信和对美国利益形成的挑战。以加深中美相互了解为初衷的孔子学院一经美国报纸的刻画，转变为中国文化扩张形象的支撑点。孔子被建构成扩张的借口和手段。

孔子学院极其活跃，这从报纸的持续关注中可见一斑。但凡有新的孔子学院在美国成立，均有报道提及。例如，2005年12月，旧金山州立大学建立孔子学院。当地报纸强调，此乃继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之后的第四所此类机构。^[1]2006年5月，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的孔子学院正式建立，并开通网站。^[2]2007年11月，孔子学院在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成立。而在两个月之前，该校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就兴奋地告诉记者，得克萨斯大学可望借助这一契机，跻身教授中国语言文化的“全球伙伴体系的一部分”。^[3]2009年，该校孔子学院获准举行汉语水平测试，是“得克萨斯北部第一个（测试中心），整个得克萨斯仅有两个”。^[4]孔子学院甚至进入了美国幼儿入园前教育。从2009年开始，佐治亚州与当地孔子学院合作，在全国率先向四岁幼儿教授汉语。^[5]

孔子学院在美国落地之后，便积极开展各种交流活动。如亚特兰大的孔子学院曾经组织中国京剧国际中心的两名演员，到该市的三所中小学演出。^[6]设在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孔子学院计划

[1] Tanya Schevitz, "New Classes in Chinese Languag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Dec. 11, 2005: B2.

[2] Alex L. Goldfayn, "China Seeks an End to Language Barrier," *Chicago Tribune*, May 22, 2006: 7.

[3] Robert Miller, "Confucius Institute to Offer Cultural Insights," *Dallas Morning News*, Sept. 30, 2007: 4D.

[4] "Asian Culture and Community," *Dallas Morning News*, Jan. 15, 2009: 9B.

[5] Nancy Badertscher, "A Million Students, A Pre-K Mileston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Jan. 2, 2010: B1.

[6] Laura Diamond, "Chinese Partnership Brings Taste of Opera,"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Nov. 25, 2008: B3.

在2010年农历新年，邀请一家中国大学艺术团，为该校师生表演民族舞蹈、武术、杂技和京剧等节目。^[1] 鉴于玉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2010年4月，该校孔子学院举办了为期两天的以玉为主题的研讨会。^[2] 与此同时，全美各地的孔子学院也在积极组织学生前往中国交流，感受中国文化。2008年，受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孔子学院资助，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 (Lexington) 的三名中学生，在第一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汉语竞赛中获得亚军。三人因此得到在中国学习的机会。^[3] 2010年3—4月，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 (College Park) 的19名六年级学生和15名教职员，赴天津南开大学附属小学参观学习。大部分费用出自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4] 得克萨斯的16岁中学生罗兰·萨拉迪诺 (Roland Salatino)，在2010年4月的休斯敦汉语桥地区比赛中获胜。他将代表美国南部的十所孔子学院前往北京参赛。^[5]

孔子学院频繁密集的交流活动让很多美国舆论深感不安。他们从中看到了中国政府拓展文化影响力的勃勃雄心。为建立孔子学院，中国出手慷慨。据称，中国计划到2010年，共在全球设立100所孔子学院。作为其中的重要一步，中国于2006年给予马萨诸塞大学100万美元资助，帮助启动该校的孔子学院项目。^[6] 2007年，中国又向芝加哥公立学校的孔子学院提供价值50万美元的教材和教学用具。^[7] 这些只是中国资助在美孔子学院的两大个案，实际投入必然巨大。很多美国人支持孔子学院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该项目“为在资金上举步维艰的美国教育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8]

正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巨大投入和孔子学院的活跃举动，美国的中

[1] “Asian Culture and Community,” *Dallas Morning News*, Jan. 28, 2010: B11.

[2] “Asian Culture and Community,” *Dallas Morning News*, Apr. 8, 2010: B13.

[3] Cindy Cantrell, “Studying Chinese,” *Boston Globe*, Aug. 31, 2008: 6.

[4] David Hill, “School Forges a Connection across the Great Wall,” *Washington Post*, Apr. 22, 2010: T18.

[5] “Asian Culture and Community,” *Dallas Morning News*, Apr. 22, 2010: B10.

[6] James Vaznis, “China to Sponsor Institute at UMass,” *Boston Globe*, Nov. 20, 2006: 1B.

[7] Esther J. Cepeda, “Little Village’s Trilingual Kids,” *Chicago Sun Times*, Feb. 19, 2007: 5.

[8] “Why Chinese Matters,” *Chicago Tribune*, Dec. 17, 2006: 6.

国威胁论沉渣泛起。孔子学院强劲挑战着美国的世界影响。中国领导人强调,通过软实力,扩大国际影响。这被视作中国创办孔子学院的初衷。^[1]《纽约时报》刊文指出,孔子学院“充分说明这个国家(中国)的软实力野心”,中国此举旨在“征服世界”。文章声称,孔子学院的出现让人顿生重回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感。当时,美苏为争夺国际威望和影响力,竞争激烈。相比苏联的强硬策略,孔子学院显得较为温和,既能提升国家声誉,又能缓解外界的忧虑。孔子学院标志着,“中国重新加入争夺全球影响的竞赛”。^[2]《芝加哥论坛报》深有同感,认为孔子学院“支撑着中国在全球扩张其文化、政治和经济足迹的历史性攻势”。^[3]

孔子学院的主动出击与美国的“固守”态势对照鲜明。2009年9月,美国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协会的年度会议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召开,会议的主题就是“中国人来了”。会议尤其提及,中国已经在美国设立61所孔子学院。^[4]会议突出中国文化“入侵”美国的用意不言而喻。《华盛顿邮报》则明确声称,美国正在遭受以孔子学院代表的中国软实力挑战。正当美国全力以赴地打击恐怖主义,中国已经悄然调整外交政策导向,“一跃成为新的‘软实力’支持者”。这是“能够威胁美国海外利益的国际魅力攻势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用以“恐吓”他国在中美之间偏向北京的重要手段。^[5]《波士顿环球报》评论道,美国在海外“修建了犹如碉堡的大使馆,躲避公共外交”,中国却在利用孔子学院,扩张着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孔子学院如同美国曾

[1] Edward Wong, "Indonesians Seek Words to Attract China's Favor," *New York Times*, May 2, 2010: 6.

[2] Howard W. French, "Another Chinese Export Is All the Rage: China's Language," *New York Times*, Jan. 11, 2006: A3.

[3] Evan Osnos, "China Tries to Grab the World by the Tongue," *Chicago Tribune*, Nov. 12, 2006: 17.

[4] John Pomfret, "The Chinese Are 'Changing Us,'" *Washington Post*, Nov. 14, 2009: A1.

[5]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 Buys the Soft Sell," *Washington Post*, Oct. 15, 2006: B3.

经热衷的“和平队”计划。^[1]同时，孔子学院还被描绘为中国排挤美国保护对象台湾及其国际影响的一大策略。在美国，“北京和台北正在为各自语言体系的主导地位而战”。^[2]

可以看出，孔子学院尽管受到很多美国人欢迎，也的确引发了美国舆论的紧张神经。他们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解读这一文化举措，将孔子学院政治化，视其为中国政府“入侵”美国文化、挤压美国国际影响空间的外交手段。本着如此思维方式，美国国会呼吁政府采取对应措施，在中国设立类似于孔子学院、完全由美国政府出资的美国中心。奥巴马政府表示，知晓国会担忧，孔子学院的确有可能导致中美“文化与政治影响的失衡和差异”。然而，即使中国取消有关限制，美国国务院也没有建立美国中心的巨额开支。国务卿克林顿宣称，中国政府给予每所孔子学院的启动资金为100万美元，外加超过20万美元的年运转经费，美国则没有这笔预算。^[3]不论克林顿所言是否可信，这则报道与其他报纸文章一起，建构了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形象。通过孔子学院激起的反应，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防备心理可见一斑。孔子演变为中国挑战美国影响、图谋文化扩张的借口和工具。

物质交流、人员流动和孔子学院乃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人获取和更新中国信息的主要渠道。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象征，孔子是大量中国信息无法绕开的话题。孔子兼具数个角色：他既是中国对外展示的内容，也是中国行为模式的根源，更是中国拓展国际影响的武器。综合观之，文化交流中的孔子造就了特色鲜明的中国观。要素有二：第一，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各种展览和物品可资为证；第

[1] Joshua Kurlantzick, "Into Africa," *Boston Globe*, Jun. 3, 2007: 10C. “和平队”(Peace Corps)成立于1961年，是获得美国政府批准和资助的自愿服务组织。和平队主要向第三世界国家派遣教师、医生、护士和各类技术人员，展现美国“善意”、传播美国文化、改善美国形象。因为遭到文化渗透和间谍活动等指责，和平队在中国未采用本名，而是以“美中友好自愿者办公室”的名义开展活动。

[2] Vanessa Hua, "For Students of Chinese, Politics Fill the Character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8, 2006: A1.

[3] Nicholas Kravlev, "China 60, U.S. 0: Culture Centers in Other's Country," *Washington Times*, Apr. 8, 2010: A8.

二，在中国传统面临全球化冲击的背景下，中国又是一个以传统为武器、在国内固守传统、国外宣扬传统的国家。可见，涉孔文化交流实际上强化了中国国家性格的传统属性：中国以传统为武器，既展示自我，又积极参与当今世界权力格局的重塑过程。随着中美交往的频繁和深入，两种文化的碰撞势必更加剧烈。孔子的民族凝聚功能和国家象征意义必然在中美关系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本章的研究不仅揭示出中美交往的文化内涵，而且触及中国对美外交中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展现出孔子作为外交因素的潜在研究空间。

第十九章

当代中美力量格局中的孔子

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关系以日渐频繁的交流，替代了剑拔弩张的对抗。但在同时，各种政治力量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都在竭力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从而不断引发跌宕起伏的局面。在相互交织的力量格局中，贯穿着无数角逐线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粗放线索已有众多研究成果面世。极少有人注意的是，中国的文化圣人——孔子，也因各方的竞相利用而成为中美关系力量汇聚与碰撞的焦点。各种力量在建构中美关系的过程中纳入孔子，反映出两国关系的决策者和参与者以传统占据有利态势的努力，围绕孔子展开的相互较量构成了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的重要脉络。

一、孔子：中美高层接触的桥梁

中美关系的解冻得益于两国政治交往的重启。交往一旦展开，涉及是非曲直、利弊得失的争论随之而来。参与者或为决策者，或为旁观者。因为孔子，他们或者积极支持中美关系的改善，或者表达担忧，有些甚至大加反对。总之，在一定程度上，孔子引导着中美政治关系的唇枪舌剑，是两国政治交往的晴雨表。

政治交往必然以两国政治家的有力推动为保证。在报纸的解读

之下，孔子引领着双边关系向前迈进。作为破冰之旅，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正是在孔子的身影之下进行的。首先，尼克松及其智囊团在踏上中国土地之前，必然已经了解孔子对于中国人思维模式的深刻影响，以便有的放矢地开展对华交往。^[1]其次，尼克松在华期间，享受着中国人根据孔子教诲精心准备的美味佳肴。报纸特地引用孔子“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论语·乡党》）的饮食原则，说明中国准备工作的细致程度。据称，早在一个月之前，北京各大饭店的名厨就已放下日常工作，为尼克松的到来不停忙碌。^[2]第三，作为尼克松访华关键成果的中美《上海公报》同样证明孔子无处不在的影响。《洛杉矶时报》甚至认为，孔子学说影响中美公报的程度超过了毛泽东思想。依照孔子的正名学说，问题如果未能明确界定，就不能被视作已经解决。因此，尼克松和周恩来花费大量时间，“痛苦地界定——或者重新界定——两国之间的分歧冲突与共同利益”。求同存异的原则映衬出孔子的中庸之道；反对大国在亚洲的霸权主义体现孔子的和平思想；而避免提及苏联又是孔子讲求实际的写照。^[3]

时至正式建交之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美关系由于苏联因素的存在而进入非常紧密的时期，政治接触频繁高调。孔子是其中的催化剂。就涉及孔子的报纸关注度而言，首当其冲者当数里根政府时期的国务卿乔治·P·舒尔茨（George P. Shultz）1987 年春的中国之行。此次访问，中美双方都在充分利用孔子，展现日渐升温的两国关系。舒尔茨行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拜谒孔子故里。据报道，在中国发出邀请之时，舒尔茨曾经“暗示”，因为已经两次访华，他已“厌倦”参观北京市中心。“中国人乐意送个人情”，安排一条包括曲阜在内的观

[1] Steve Harvey,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Los Angeles Times*, Feb. 20, 1972: H4.

[2] Nancy L. Ross, "China's Cuisine," *Washington Post*, Feb. 17, 1972: E1, E4.

[3] Robert S. Elegant, "The Communique—More than an Agreement to Disagree," *Los Angeles Times*, Feb. 29, 1972: C7.

光旅程。^[1] 中国官员利用此次机会，向外界展示勇于反思的精神风貌。报纸在介绍舒尔茨的曲阜之行时，突出孔子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以及再次深受重视的情形。在欢迎宴会上，山东省长“特意感谢孔子”，传递中国正在回归传统的信息。^[2] 舒尔茨投桃报李，对于孔子尽显崇敬之情。^[3]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中国领导人借拜谒孔子之机表明，中国欢迎西方技术，但不会采纳西方思想，舒尔茨仍然坚信，“中国能够凭借传统价值观念和当代科学知识，建设现代社会和经济”，“孔子的教诲继续而且将永远是智慧源泉”。^[4] 舒尔茨引用曲阜之行告诫西方，不要期望中国“完全采纳他人方式”进行发展，其传统文化不允许全盘西化。^[5] 在拜谒孔子之墓、河上泛舟、参观工厂、观看表演的过程中，舒尔茨享受到有如国家元首般的待遇。因为如此，《纽约时报》称赞两国关系“已进入极度和谐时期”。^[6] 中国在美的外交攻势同样声势浩大。中国外交官本着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的教导，广交朋友，宣传中国。美国报纸称其为“仍然有效的外交策略”。不论华裔与否，美国人“通常乐意听从中国的‘文德’”。^[7]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美高层交往更趋频繁和深入，引用孔子似已成为这一场合的惯例。在克林顿 1998 年访华第一站，西安市长引用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论语·学而》）的名言，

[1] William Sexton, "Some Diplomats Angry over Shultz's Lavish China Trip,"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 5, 1987: 16.

[2] Joseph A. Reaves, "Shultz Gets a Boost from Confucius," *Chicago Tribune*, Mar. 5, 1987: 3.

[3] "World Digest," *Atlanta Journal and Constitution*, Mar. 5, 1987: A4.

[4] Bryan Brumley, "Shultz Visits 3 Chinese Pilgrimage Sites," *Boston Globe*, Mar. 5, 1987: 26; "Around the World," *Dallas Morning News*, Mar. 5, 1987: 19A.

[5] David K. Shieler, "Shultz Dismisses Tower Criticism of His Iran Role," *New York Times*, Mar. 6, 1987: A19.

[6] David K. Shieler, "U.S. and China United by Antipathy to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Times*, Mar. 8, 1987: 200.

[7] Joanna Biggar, "A Red Star Rises in the West," *Washington Post*, Oct. 28, 1984: SM8.

表达衷心欢迎之意。^[1] 中国领导人的访美行程也总是点缀着孔子的睿智语录。例如,报纸注意到,1993年11月,江泽民在旧金山会见当地华人时,“引用了孔子和古诗”,但没有毛主席语录。^[2] 1997年10月,江泽民又一次访美。他在与克林顿的联合记者会上,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感谢美方的盛情接待。^[3] 针对美国津津乐道的人权问题,江在访美期间的一次午餐会上表示,尊重个人尊严和价值是“中国人民的悠久传统”,孔子“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的思想就是明证。^[4] 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江要求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从而达到熟悉中国的目的。《华盛顿时报》调侃道,难怪江在访问过程中不断引用孔子语录,但“不幸的是,怀有种族优越感的大多数美国听众未能捕捉到……这一微妙信息”。^[5] 2002年10月,到访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江泽民引用孔子“知之为之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说明自己在熊猫保护问题上并非专家,引起报纸关注。^[6] 在奥巴马于2009年11月访华前数周,其智囊团一直与中国官员保持密切接触,讨论如何定义当前的中美关系。双方的最终界定是“积极、合作、全面”。如此劳神费力的出发点是孔子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7] 而在同时,美国国会也利用孔子,表达加深关系的意图。2009年10月,众议院通过

-
- [1] John M. Broder, "Clinton Starts China Visit by Answering U.S. Critics," *New York Times*, Jun. 26, 1998: A8.
- [2] Daniel Williams, "Chinese Leader Plays to Audience at Home," *Washington Post*, Nov. 21, 1993: A34.
- [3] "Transcript of Clinton-Jiang News Conference," *Washington Post*, Oct. 30, 1997: A16.
- [4] Gus Constantine, "Jiang Finds Haven of Peace and Quiet as Friends Gather," *Washington Times*, Oct. 31, 1997: A14.
- [5] Harry Summers, "A Deeper Perspective through China's Lens," *Washington Times*, Nov. 6, 1997: A18.
- [6] Lee Hancock, "China's Leader Fields Questions from Aggies," *Dallas Morning News*, Oct. 25, 2002: 37A.
- [7] Andrew Higgins and Anne E. Kornblut, "Ties That Bind, and Labels to Keep in Mind," *Washington Post*, Nov. 12, 2009: A10.

纪念孔子诞辰 2560 年的决议案。但在十年以前，“美国所有阵营的政治家”通常以抨击中国为己任。^[1]

二、孔子与中美关系的杂音

但不容否认的是，反对中美改善关系者大有人在。他们利用孔子，讥讽中国和促进双边关系的政治家，为阻碍关系进展的企图喝彩。此为阻挠手段之一。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具有划时代意义，自然引起非议连连。因为顾及国内外反应，尼克松访华的筹备工作以秘密方式进行。这让很多美国人感觉不快。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晨报》的一篇评论杜撰孔子的所谓名言，“消灭敌人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他变成朋友”，形容最终曝光的尼克松行程。作者质问道，中国是否也相应改变了对美国的看法？尼克松政府对此讳莫如深。评论者希望，尼克松能够及时将谈判内容和成果告知民众。^[2]1976 年，已经因水门事件辞职的尼克松再次访华，记者阿特·布赫瓦尔德（Art Buchwald）特地为尼克松赋诗一首，指责尼克松此行只为逃避在美国国内麻烦缠身的政治窘境。诗的开篇就是：“我再次站在长城之上……子曰，‘那些阻挠调查的人将获无数次赦免’”，意指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的表现和随后逃脱惩罚之事。^[3]国务卿基辛格计划听取尼克松的情况汇报。布赫瓦尔德又编撰两人对话，讽刺尼克松一味听信中国宣传，同时渲染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尖锐对立。比如，基辛格问：“你听到有人提及毛的反对者吗？”尼克松答曰：“孔子就是一个（反对者）。我听说，孔子

[1] John Pomfret, “As China Rises, So Does Its Influence on the Hill,” *Washington Post*, Jan. 9, 2010: A1.

[2] Rosalie McGinnis, “I Wonder Where’s Kissinger Now?” *Dallas Morning News*, Feb. 29, 1972: 2.

[3] Art Buchwald, “Pearls of Wisdom for the China Trip of Mr. Nixon,” *Washington Post*, Feb. 17, 1976: C1; Art Buchwald, “Poems for a China Traveler,” *Los Angeles Times*, Feb. 17, 1976: E3.

的著作是帝国主义者用以实现大国沙文主义目标的一种反动思想武器。”尼克松随后表示,毛“亲口”告诉他,“孔子是堕落的资本主义观念的头号兜售者”。^[1]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共和党参议员巴里·M. 戈德华特(Barry M. Goldwater)公开质疑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宪法基础。此事在《洛杉矶时报》看来,印证了杜撰的孔子语录“疑难事件导致法律偏颇”。^[2]

政治人物对于中国的怠慢或者强硬,是阻挠中美关系发展的又一因素。罗纳德·里根以坚决反共著称。他上台初期曾导致中美关系极度紧张。在就职很长一段时间内,里根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摇摆不定,未能出台明确的对华政策。针对里根的怠慢态度,《华盛顿邮报》评论曰,集中了孔子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智慧的中国居然连续数月,在“看来不可理喻的美国人”面前不知所措。报纸建议,中国人不应将此情形归咎于文化、政治和情报搜集障碍,而应意识到里根政府根本就未及时研究制定中国政策。^[3]2001年海南撞机事件之后,乔治·W. 布什政府态度强硬,拒绝道歉。《华盛顿时报》表示支持,并且告诫中国见好就收:“孔子可能说,智慧就是知道应该何时抛弃诱饵,特别是在有其他紧急事情之时。”^[4]

甚至他国政治人物的言行都可让坚持对华强硬者如获至宝。1990年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曾说,“意识先于存在”(consciousness precedes being)。某些议员却附会为“孔子先于北京”(Confucius precedes Beijing),声称此言的意思是,“中国精神将超越暂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他

[1] Art Buchwald, “Debriefing Nixon: Words of Wisdom from China’s Wall Posters,” *Washington Post*, Mar. 2, 1976: C1; Art Buchwald, “Debriefing of Comrade Nixon,” *Los Angeles Times*, Mar. 2, 1976: E3.

[2] Linda Mathews, “Goldwater’s Challenge on Taiwan Treaty Amounts to Political Mischief,” *Los Angeles Times*, Nov. 18, 1979: F3.

[3] Murrey Marder, “China Policy, Reagan-Style, Still Evolving,” *Washington Post*, Jun. 5, 1981: A1.

[4] Suzanne Fields, “Game of Diplomacy,” *Washington Times*, Apr. 16, 2001: A17.

们深信，哈维尔是在借机支持老布什 1989 年之后实行的对华强硬政策。^[1] 英国首相约翰·梅杰 1991 年访华时冷对中国的热情，也让某些舆论大喜过望。据称，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引用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欢迎梅杰，“然而，首相却表示，他此行的首要兴趣在于确保香港在 1997 年回归中国统治之前的稳定和信心”。^[2]

渲染中国“危害”美国利益是阻挠改善对华关系者的另一策略。早在建交之初，报纸就出现了中国会随时利用可乘之机、从美国谋取好处的论调。《华尔街日报》的一首讽刺诗写道，“子曰 / 当山姆大叔的问题成堆 / 我们就应稍微更加团结 / 想想中国的‘危机’二字 / 就是‘危险’加‘机会’”。^[3] 1983 年，中国获准购买美国的高科技设备。持反对意见的美国人却大肆炒作中国缺乏专利保护法律，认为此类法律细节甚多，“即使孔子也会抓耳挠腮”，“只有时间才能证明”，美国产品到底能够获得多少保护。^[4] 另有文章声称，由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攻击，中国唯有通过对美强硬才能疏导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增加了美国利益面临的危险。^[5] 1997 年，所谓中国向克林顿第二次竞选捐款事件，在美国政界喧嚣一时。在国会听证会上，争论双方唇枪舌剑，捍卫各自立场。被引用的名人包括孔子、莎士比亚和亚里士多德等。^[6] 1999 年出台的考克斯报告指责中国偷窃美国核技术。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肇星严词反驳，强调中国坚持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不会盗取美国技术。然而，《华盛顿时报》却断言，大使以孔子为幌子，“掩盖了中国 150 年以来对于西方技术

[1] Untitled Article, *Washington Post*, Mar. 3, 1990: A23.

[2] Lena H. Sun, "Prime Minister Major, in Beijing, Takes up Rights Issues," *Washington Post*, Sept. 4, 1991: A22.

[3] "Pepper... and Salt," *Wall Street Journal*, Nov. 18, 1980: 34.

[4] Vincent J. Schodolski, "China Patent Law Nears Reality," *Chicago Tribune*, Dec. 1, 1983: C1.

[5] Lucian W. Pye, "China's Quest for Respect," *New York Times*, Feb. 19, 1996: A15.

[6] James Warren, "Charges Fly at Hearings on Donations," *Chicago Tribune*, Jul. 9, 1997: 1.

的渴求”。^[1]

抨击中国缺乏“民主”、“人权”是某些舆论干扰中美关系的第四大策略。一方面,这些舆论指责中国违背孔子教诲,从而“无视”民众权利。宣传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论调是比较常见的手法。居住在纽约的“持不同政见者”刘青(音)宣称,他对中国的民主前景感到悲观,但人民会逐渐意识到民主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报纸赞扬道,此言颇有孔子后继者孟子名言“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孟子·离娄上》)的神韵。^[2]报纸上的另一“流亡”中国学生声称从孔子那里找到了为他人工作的道德原则,他因此不断在中国领事馆门前组织游行,“拼命使用电话和传真机”,试图迫使中国实现“民主”。^[3]王姓“民主”人士“数十年来都在挑战中国封闭的政治制度”,1999年企图借清明扫墓之机回国制造事端,结果被中国有关机构挡在了韩国汉城机场。报纸认为,中国此举剥夺了民众在“圣人孔子以前”就已享有的基本权利。^[4]鼓吹西藏“权利”的另一中国留学生宣布,自己正是按照孔子等人的教诲行事,中国政府恰恰相反。^[5]在《波士顿环球报》上,香港大学哲学教授陈汉生(Chad Hansen)指责中国政府利用孔子传统忽略个人权利和法治。^[6]

另一方面,有些舆论又会把孔子刻画为中国缺乏“民主”与“人权”的根源。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华的黑人学生曾与中国学生发生一系列冲突。明知此类事件纯属个案,在美的高姓中国留学生仍然撰文,大谈中国歧视黑色之事自古有之。他相信,孔子后继者孟子所谓“劳

[1] Gus Constantine, "China's Ambassador Raps Cox Report 'Fabrications,'" *Washington Times*, May 29, 1999: A14.

[2] Pamela Burdman, "Abuses Continue in China despite New Freedom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17, 1994: A1.

[3] Pamela Burdman, "5th Anniversary of Crackdown: Chinese in U.S. Reflect on Lessons of Tiananme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n. 3, 1994: A1.

[4] Gus Constantine, "China Bars Rights Dissident from Returning to Visit Grave," *Washington Times*, Apr. 6, 1999: A13.

[5] Grace Wang, "Caught in the Middle, Called a Traitor," *Washington Post*, Apr. 20, 2008: B1.

[6] Matt Steinglass, "Whose Asian Values?" *Boston Globe*, Nov. 20, 2005: E1.

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就是明证，因为“劳力者”肤色自然较黑。^[1]江泽民告诫美国人应从中国的角度看待人权，《华盛顿时报》评论道，“他会说，中国人民的文化是极其古老的文化。他绝对会提到孔子，但绝对不会提及的是，2500年前，在向当权者阐述自己的改革蓝图时，孔子遭到极大的冷遇”。作者的言下之意是，中国政府会如古代统治者一样，对于孔子的人权思想置若罔闻。^[2]1991年6月，十名民主党参议员提出议案，要求给中国的贸易地位附加限制条件。改善所谓的人权状况就是条件之一。议案发起者声称，“我们已告诉他们（中国人），对于一个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不尊重人民权利的政府，我们没有孔子的耐心。”^[3]一篇丑化文章里，中国领导人面对汹涌而至的“民主”呼声束手无策，只得无助地询问：“万能的孔子和卡尔·马克思，那些小孩到底想要什么？”^[4]

以中国国内形势不稳定为由，描绘中美关系的黯淡前景，是舆论干扰双边关系的第五大策略。1974年初至同年6月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值尼克松已经访华但正式关系尚未建立的微妙时期，引起美国报纸对中美关系前景的集中而极大的悲观情绪。运动于当年1月正式开始以后，美国报纸就在捕捉一切信息，判断中美关系可能遭受的影响。美国的中国观察者普遍认为，批林批孔运动意味着，坚持与美国和解的温和派受到打击，短期内的负面影响在所难免。有人称该运动为“尼克松—基辛格与北京和解计划的不祥之兆”。^[5]运动据称“至少部分针对中国与西方迅速的交流步伐”，中美关系的“兴奋期”已经过去。^[6]中美关系可能会经受住运动的冲击，但“没人会像仅仅

[1] Gao Yuan, “In China, Black Isn’t Beautiful,” *New York Times*, Jan. 25, 1989: A23;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an. 31, 1989: A21.

[2] William Buckley, Jr., “Did Jiang’s Visit Teach Us Anything?” *Washington Times*, Nov. 4, 1997: A19.

[3] Anne Veigle, “Limits Proposed on MFN for China,” *Washington Times*, Jun. 26, 1991: C1.

[4] Abe Mellinkoff, “Deng vs. 100 000 Student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an. 9, 1987: 70.

[5] “China: Return to Madness?” *Chicago Tribune*, Feb. 10, 1974: A4.

[6] Edward Neilan, “U.S.-China Euphoria Gone, But Trade Links Continue,” *Dallas Morning News*, Jun. 20, 1974: 4.

数个月以前那样乐观看待中国的国内稳定或者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进程了”。^[1] 美国的文化官员承认,虽然官方交流暂未停止,但如果批林批孔运动持续下去,交流计划肯定遭受影响。^[2] 人们担心,随着运动的深入,两国和解趋势的反对者可能得势,相互承认的代价极有可能提高到美国不愿或无法承受的地步。^[3] 两国倾力改善的关系因为批林批孔而“异常紧张”。在重庆的美蒋罪行陈列馆,人们激情演讲,抨击孔子和林彪“企图让美国反动派回到中国”。^[4] 中国在运动开始以后限制外国人的活动区域,这让美国舆论惊叹运动影响之甚。^[5] 甚至有人调侃道,孔子、贝多芬和舒伯特等都已沦为中国的批判对象,“显然,基辛格溜掉了”。^[6]

也有部分观察者乐意强调,中美关系的长远趋势不会受到根本影响。但这种认识仍然建立在认可短期负面影响的基础之上。开创中美关系新篇章的周恩来继续主持中国外交,被视作两国关系能够平稳发展的保证之一。据报纸分析,他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之后“关于美国和国际形势的讲话表明,中国仍然坚持自中美关系缓和以来的世界观”。^[7] 少数舆论对于中美长远关系的信心也来自于双边贸易未受严重影响。在批孔运动露出苗头的1973年,中美贸易额是上年的七倍多。^[8] 中苏冲突同样减缓了某些舆论的焦虑心态。有文章认为,不

[1] H. D. S. Greenway, “New Peking Campaign Puzzles China ‘Hands,’” *Washington Post*, Feb. 9, 1974: A13.

[2] Charlotte Saikowski, “Chinese-U.S. Exchanges Inhibite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26, 1974: 5.

[3] Daniel Tretiak, “Chinese Troubled on U.S. Ties,” *New York Times*, Apr. 19, 1974: 37.

[4] Mark Gayn, “U.S. and China: A Growing Chill,” *Los Angeles Times*, Jun. 16, 1974: E3.

[5] “China Cuts Travel for Foreigners as Turmoil Spreads,” *Chicago Tribune*, Feb. 16, 1974: S2; John Sharkey, “Internal Chinese Debate Seen Affecting U.S. Ties,” *Washington Post*, Feb. 18, 1974: A22.

[6] James Reston, “The News of the Absurd,” *New York Times*, Feb. 10, 1974: 197.

[7] H. D. S. Greenway, “Chou Maintains Line on U.S.-China Détente,” *Washington Post*, Feb. 23, 1974: A11.

[8] “Chinese Deny Campaign Threatens World Trade,” *Washington Post*, Mar. 8, 1974: A21.

论中国如何批判孔子和贝多芬，“促成中美关系缓和的基本地缘政治因素——两国与莫斯科的对抗——仍在产生效力”。^[1]另一文章赞同此说，相信批林批孔运动的主题是消除苏联的修正主义影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不至于被抛弃。^[2]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在离开将近五个月之后重返美国，促使评论者相信，中国最终没有因为批林批孔运动而改变对美态度。^[3]美国的某些中国事务专家满怀信心地宣布，不论批孔运动如何发展，都不会对中美关系造成负面影响。^[4]

然而，批孔运动的后遗症并非轻易能够消除。运动平息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很多美国舆论依然在突出批孔运动的负面影响。1974年8月，《洛杉矶时报》担心，反孔运动和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已让中国致力于中美谅解的努力出现松懈”，中国甚至可能在周恩来和毛泽东过世以后重新倒向苏联。^[5]1974年9月，访华的美国国会代表团向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表达了类似疑虑。代表团认为，批林批孔运动强烈抨击向帝国主义者低头的行为，是在影射中美之间的和解。^[6]国务卿基辛格计划于1974年晚些时候再次访华。《华盛顿邮报》预计，因为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和美国水门事件，他会发现，与一年以前访华时相比，两国关系“更加紧张、更难预料”。^[7]报纸告诫道，尽管周恩来等人从批林批孔运动中成功复出，但“孔子赢了”之说过于片面。实

[1] “... And with Peking,” *Washington Post*, Feb. 12, 1974: A16.

[2] Peter S. H. Tang, “Chinese Door Still Ope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16, 1974: 18.

[3] John Burns, “China Returns to Norma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8, 1974: 1, 4.

[4] Frank Starr, “Turmoil Hasn’t Closed China’s Window to West,” *Chicago Tribune*, Mar. 24, 1974: A1.

[5] “Now That the Storm Has Finally Passed...,” *Los Angeles Times*, Aug. 11, 1974: 4.

[6] John Burns, “Fulbright: Chinese Détente Intac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9, 1974: 2.

[7] H. D. S. Greenway, “China Ties Grow More Tenuous,” *Washington Post*, Nov. 4, 1974: A16.

际上，对立双方只是达成妥协而已，中美关系依然存在不确定因素。^[1]及至1976年，参加联合国地震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仍将中国地震预报的准确性不尽如人意归咎于“孔孟理论的严重干扰”。对此，《纽约时报》不无嘲讽地建议，中国应该考虑建立政治地震预报机制，以便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控制潜在损失”。^[2]

以孔子为线索考察美国报纸对于中美关系前景的忧虑，这自然会让批林批孔运动成为关注的焦点。这一语境之下的孔子代表着中国激进年代的温和力量，是美国出于冷战之需愿意与之交流的中国政治符号。正因为孔子之名具有的政治寓意，跟踪批孔运动的美国人才会忧心忡忡，对于中美关系滋生悲观情绪，从而为关系的深入发展形成阻力。正式建交姗姗来迟，与批林批孔运动的负面影响联系紧密。建交之后的双边关系同样因为中国内局势而几经波折，但将局势与孔子联系在一起的情形比以前少见。以下例子当属与孔子间接相关的个案：1989年动乱之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决定暂缓迈出孔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实为《老子》第六十四章）所谓的第一步，推迟访问中国。^[3]

三、亲台舆论中的孔子

中美关系平稳发展，台湾当然最为不安。自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之时起，台湾就在利用一切手段，力促美国政府改弦更张或者减少对台湾既得利益的冲击。舆论攻势乃重要策略。从孔子入手将台湾刻画为中国正统的捍卫者和承载者，是台湾及其美国支持者营造的舆论声势的重要线索。美国报纸花费大量篇幅，塑造台湾通过维护孔子从而

[1] Joseph C. Harsch, "China's Chou in Control as New Order Emerg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24, 1975: 2.

[2] C. L. Sulzberger, "When Tigers Act Strangely in the Zoo," *New York Times*, Apr. 24, 1976: 24.

[3] "Nixon: China Is Off," *Chicago Tribune*, Sept. 5, 1989: 18.

维护中国正统的形象，在美国社会形成一股声援台湾的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掣肘着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

首先，台湾国民党政府高调宣示强化孔子地位的决心，吸引美国报纸的持续关注，制造台湾等于中国正统的印象。台湾的孔子诞辰日纪念活动可谓声势浩大，不仅民众参与，党政要员也会亲临孔庙，蒋经国等高级官员通常会出席。^[1]自从在大陆统治时期开始，孔子诞辰日就是国民党政府设定的教师节。^[2]中国大陆的批林批孔运动赋予此类活动尤其明显的政治寓意。报纸描述道，“每一个台湾人都会在孔子诞辰日9月28日向其鞠躬”，而中国大陆却在1974年初发动了一场“喧闹嘈杂的批林批孔运动”。^[3]各大报纸都敏锐地注意到，随着大陆批孔运动的升级，台湾维护孔子的言辞日趋激烈。此举的政治用意不言自明，美国报纸及时将台湾自我塑造的形象传递给了美国政府和民众。比如，针对大陆如火如荼的批孔运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台湾官员慷慨激昂，“极力反驳（大陆对于孔子的）指责”。报道声称，中国国民党人“因为身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而自豪”，孔子诞辰日纪念庄严而华丽，孔子思想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4]《纽约时报》称赞国民党“历来尊敬孔子及其教诲”。在大陆批孔运动开始之后，“尊孔言论更多，也更引人注目”。^[5]据《华盛顿邮报》，1974年，台湾更是向全岛电视直播了台北孔庙的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在活动现场，美国“大使”和美军顾问团团长在前排贵宾席就座。报道随后指出，自从大陆开始批孔，台湾的尊孔活动“更具针对性，更加广泛”，访台外国官员会收到孔子小雕像作为礼物，孔子的大型雕塑则被送往美国和日本等国。讲述孔子生平的戏剧和电影也呼之欲出。蒋经国则在演讲中指责大陆反孔运动“挑战中国的整个历史和文化”。《中

[1] “Taiwan Honors Confucius,” *Washington Post*, Sept. 29, 1978: B4.

[2] Janet Murray, “Almanac,” *Chicago Tribune*, Sept. 23, 1979: W-A4.

[3] “Confucius Is Alive and Well in Free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Oct. 6, 1974: Q26.

[4] Donald Harmon, “Taiwanese Defend Confucius from Communist Attack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15, 1973: 3.

[5] “Confucius’s Fame Grows on Taiwan,” *New York Times*, Aug. 11, 1974: 15.

《国邮报》视尊孔为“击败共产主义最为有效的武器之一”。^[1]

报纸还频频提及台湾当局通过发行邮票以突出正统地位的举动。《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华民国”计划在1979年2月发行四枚邮票，图案之一是台南市中心的孔庙。^[2]到邮票最终面世，孔庙及其他图案能让美国人“足不出户，通过邮票漫游世界”。^[3]1985年，“国民党中国”为“提升文化意识”，再次发行四枚台湾古迹邮票，彰化孔庙位列其中。^[4]即使没有明确与孔子相关，台湾邮票也能让美国报纸产生联想。比如，“三羊开泰”邮票描绘两只小羊跪在母羊前吃奶的场景。邮票评论者认为，这“与孔子提出的忠孝基本美德紧密相连”。^[5]

深受政府情绪感染的14个民间团体于1974年2月倡议，“在台北修建更加雄伟的孔庙，对抗北京正在进行的批判中国古代圣人影响的运动”。庙高三层，大厅可容纳3000人。^[6]新建孔庙计划是否得以实施，我们尚无资料显示。但时隔十年之后，另有两大团体提出制造重220吨、高157英尺的孔子铜像，使其成为“文化和精神堡垒”。这既是针对台湾日渐恶化的社会道德现状，也再次显现台湾欲为中国正统的意识。雕像因为造价昂贵并有可能影响空中交通，而招致众多非议。^[7]

以孔子为主题或重要内容的对美交往是报纸上台湾在美塑造中国正统形象的第二大策略。一方面，台湾及其驻美机构积极参与美国的文化活动，展现自己继承和延续孔子传统的角色定位。比如，从1979年美台断交开始，实质为台湾方面驻美官方机构的北美事务协调处不间断地参与了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公立学校年度教师奖的评

[1] Don Oberdorfer, “Taiwan Pays Homage to Confucius,” *Washington Post*, Sept. 29, 1974: A4.

[2] B. R. Bruns, Jr., “Stamps and Coins,” *Washington Post*, Jan. 28, 1979: F4.

[3] Samuel A. Tower, “Stamps,” *New York Times*, Aug. 26, 1979: 94.

[4] John F. Dunn, “Stamps,” *New York Times*, Oct. 6, 1985: H35.

[5] Samuel A. Tower, “Stamps,” *New York Times*, Dec. 31, 1978: D33.

[6] “Confucius to Get His Day in Taiwan,” *Washington Post*, Feb. 19, 1974: A11.

[7] “Plan for Giant Statu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23, 1985: 24; Kathy Chang, “Wisdom of a Confucius Statue Debated,” *Los Angeles Times*, Jun. 2, 1985: 23.

选活动。颁奖典礼特意定在每年的孔子诞辰日。^[1]1974年,世界博览会在华盛顿州斯波坎(Spokane)举行。台湾再次借机宣扬正统地位。除了用大屏幕“生动展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台湾计划在孔子诞辰日举行盛大表演。^[2]另一报道直接告诉读者,“中华民国”馆放映的电影“强调存在多个世纪的孔子教诲,展现推崇宁静、智慧和尊敬老人的生活方式”。^[3]

另一方面,台湾不忘利用对美人员交流,强化正统形象。1977年10月,美国黑人新闻界16名代表应邀访台。宾主双方不失时机地在报纸上大谈台湾与孔子的紧密关系,力促美国支持台湾。台湾新闻官员用孔子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表达欢迎之意。美方代表在答辞中宣称,此言表明,“台湾是中华民国的真正所在”,并且希望美国不要抛弃台湾。^[4]代表团另一成员撰文,称赞台湾遵循孔子教诲,“将小岛变成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台湾因此成为“蒋介石总司令的新中国”。^[5]国民党政府特意安排代表团参加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在这些访问者看来,甚至金门、马祖“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都得益

-
- [1] 部分报道如下:“Schools Select Mrs. Shoate '87-88 Teacher of the Year,” *Atlanta Daily World*, Oct. 8, 1987: 1; “Area Teachers Cited,” *Atlanta Daily World*, Sept. 11, 1988: 2; “Educators Celebrate Confucius’ Birthday,” *Atlanta Journal and Constitution*, Sept. 22, 1988: E9; “Carver’s Deborah Battle Is APS Teacher of the Year,” *Atlanta Journal and Constitution*, Oct. 6, 1988: E1; “Deborah Battle of Carver Named ‘Teacher of Year,’” *Atlanta Daily World*, Nov. 13, 1988: 4; “APS Briefs,” *Atlanta Daily World*, Sept. 24, 1991: 3; “Announcements,” *Atlanta Daily World*, Sept. 20, 1994: 3; Holly Crenshaw, “Around Town,” *Atlanta Journal and Constitution*, Oct. 3, 1996: N1; Herbert J. Bridgewater, “Social Swirl,” *Atlanta Daily World*, Sept. 28, 1997: 3.
- [2] Leavitt F. Morris, “Expo ’74 Headlines Natural Resourc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21, 1974: 13.
- [3] Bob Wiedrich, “Expo ’74 Proving Civility Still Alive,” *Chicago Tribune*, Jul. 5, 1974: 18.
- [4] Brad Pye, Jr., “Pye’s Personal Look at the New China,” *Los Angeles Sentinel*, Oct. 6, 1977: B1.
- [5] Sherman Briscoe, “The Black Press Sees China,” *Los Angeles Sentinel*, Oct. 20, 1977: A14.

于“孔子勤劳、秩序教诲的激励”。^[1]

国民党派往美国的人员同样肩负着宣传正统形象的使命，报纸给予了积极报道。1977年1月，吉米·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当天，曾经组团访问美国的数十名台湾商界精英，联名在《华盛顿邮报》刊登公开信，祝贺卡特。写信者自称代表“自由的中国人民”，并以祝贺之名显示台湾坚定的孔子信仰。信中写道，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而卡特任期四年。因此，“我们相信，您与孔子拥有同样的信心”。孔子还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公开信毫不掩饰地吹捧道，此言“可能正是为您而写……这就是您的执政精神”。极尽奉承的目的，就是希望卡特领导包括台湾在内的“自由世界”，即把台湾作为中国正统予以支持。^[2]1986年8月，第40届少年棒球世界联赛在宾夕法尼亚举行，台湾队夺冠。领队在蜂拥而至的媒体面前，大谈孔子对棒球队的影响：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队员训练投入，技术娴熟。^[3]即便到了2000年，尚未公然鼓吹“台独”的民进党政府仍在利用孔子大做文章。访问美国的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声称海峡两岸均为“孔子门徒”，应该按照朝鲜半岛的模式展开谈判，意在将责任推给大陆，但遭到中国驻美公使的驳斥。^[4]

台湾主动加深正统印象的第三大举措是，向美国各地赠送承载孔子信息的艺术品。1976年，休斯敦建市200周年之际，台湾赠送孔子铜像一座，即为一例。据台湾驻美“领事”官员，另外九座城市也收到了相同礼物。^[5]铜像一度引发争议，但争议之声经多家报纸报

[1] Sherman Briscoe, "Blacks See Taiwan's Might," *Los Angeles Sentinel*, Oct. 27, 1977: A10.

[2] "Congratulations to President Carter from the Business Commun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Post*, Jan. 20, 1977: 25.

[3] David Falkner, "Another Little League Title for Taiwan," *New York Times*, Aug. 24, 1986: S4.

[4] Didi Tang, "Korea Summit Inspires Call for Beijing Talks," *Washington Times*, Jun. 16, 2000: A17.

[5] Edward Wright, "Newsmakers," *Los Angeles Times*, Dec. 21, 1976: B28A.

道，却让台湾与孔子的联系更加紧密。争论源于雕像基座上的孔子语录“男有分，女有归”（《礼记·礼运》）。女权主义者认为，此话涉嫌性别歧视，雕像不宜公开展出。但休斯敦市政府最终仍然决定，将孔子雕像安放在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1]“中华民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对媒体表示，台湾计划向洛杉矶赠送孔子铜像，纪念该市建立 200 周年。^[2]即使是正常的贸易往来，台湾也总会强调商业行为所承载的孔子信息。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初，号称台湾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同公司开始进入美国市场。董事会主席声称，公司有意利用贸易机会，“传播一点孔子哲学”。^[3]

同情台湾的美国人形成了支撑亲台舆论的第四大力量。如同台湾当局及其直接参与和支持的行为一样，同情者频繁以孔子为参照，佐证台湾的正统形象，揭示美国与中国大陆交好的“不明智”。在旅游推介者的描绘之下，孔子俨然已是吸引游客的魅力来源之一。鼓励人们“考虑旅游，就考虑台湾”的广告以问答的形式告诉读者，孔子在台湾受到尊崇的程度有如 2400 年以前。^[4]美国黑人旅游协会（Black American Travel Association）联合日本航空公司推出东方旅游线路，为期半个月，孔庙是台北的三大参观景点之一。^[5]《洛杉矶时报》称赞道，台湾旅游独具魅力，不仅因为价格低廉，更在于“台湾是真正的中国……遵循孔子教诲的中国”，而以孔子学说为纲的生活方式“正在大陆面临灭绝的危险”。^[6]孔子诞辰纪念活动也为报纸所极力推

[1] “‘Sexist’ Statue of Confucius to Be Displayed in Houston,” *Washington Post*, Dec. 24, 1976: A4; “Confucius Statue Gets Houston OK,” *Dallas Morning News*, Dec. 26, 1976: 44; John M. Crewdson, “Women’s Advocate Now Fights Houston Council to Keep Her Job,” *New York Times*, Mar. 12, 1977: 27.

[2] “Chinese Lion,” *Los Angeles Times*, Oct. 28, 1976: OC12.

[3] Clayton Jones, “Confucius Line in Taiwan Firm: ‘Helping Friend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4, 1981: 10.

[4] “Some Questions & Answers,” *New York Times*, Feb. 23, 1975: IR30; “Some Questions & Answers,” *Washington Post*, Oct. 26, 1975: 78.

[5] “JAL Has Far East Tour Set,” *Chicago Daily Defender*, Sept. 30, 1972: 18.

[6] “A Good Place to Live, A Good Place to Visit,” *Los Angeles Times*, Oct. 6, 1974: Q13.

销。^[1] 亲临台湾的旅游者会因为当地人某句稍显精辟的言论而想到孔子。如某位普通的老者劝告身旁的美国登山者，“步子迈得最长的人并非走得最快”。此话看似平淡，却让美国人有听闻孔子智慧之感。^[2]

崇尚台湾制度的美国人常将台湾的“进步”归因于孔子，并希望美国因此重视台湾，疏远大陆。美国曾经认为，蒋介石政府腐败盛行，“不值得美国支持”。但《达拉斯晨报》不愿苟同，而是声称，蒋“代表着中国精神——孔子和老子的中国”，“让中国文明之旗高高飘扬”。台湾因而有幸成为繁荣、“民主”、“自由”之地。^[3] 该报的另一篇文章认为，当大陆对走资派攻击正酣之时，台湾正在借助孔子和商业精神，迅速实现经济腾飞。如果美国能够制止“共产党中国”的入侵，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奇迹必将出现在台湾。^[4] 时至80年代中期，台湾业已成为美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依《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之见，这显然是台湾切实遵循孔子学说带来的结果。^[5] 到了20世纪末，台湾开始“民主”选举，美国报纸的欣喜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候选人娴熟引用孔子和其他中外名人之言，让《华盛顿邮报》惊叹：“大陆的政治改革陷入困境，台湾方面却在准备可能是迄今最为公开的总统选举，这是完全民主化进程的一大突破。”^[6]

同样因为孔子，很多美国人对于政府听任联合国驱逐台湾方面大为不满，纷纷撰文抗议。按照美国报纸的说法，中国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不久，就着手清除台湾留下的一切痕迹，而联合国则步步配合。据报道，从1968年开始，国民党政府赠送的绿色大理石碑一

[1] Bobbie Justice, "Taiwan's Place in Vacation Sun," *Los Angeles Times*, Jun. 12, 1977: L13.

[2] Arpad Kadarkay, "At Dawn, on a Climb to the Mountain Shrines, a Lesson from Butterflies," *Los Angeles Times*, May 8, 1974: D7.

[3] "Chiang Kai-Shek," *Dallas Morning News*, Apr. 8, 1975: 2.

[4] Jim Wright, "On That Capitalist Road," *Dallas Morning News*, Mar. 5, 1976: 2.

[5] Daniel Reid, "Taiwan: El Dorado of the Eas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17, 1984: 13.

[6] John Pomfret, "Democratic Reformer Jolts Taiwanese Politics," *Washington Post*, Jul. 3, 1999: A15.

直安放于联合国大厅，上有孙中山手书的孔子语录。石碑旁刻有“中华民国赠”字样的铜牌是首先被“清除”的对象之一。^[1]移除铜牌和驱逐台湾“中央通讯社”的两名记者一道，成为各类报道中联合国向中国大陆妥协“磕头”的证据。事件虽然“在美国和其他地区引发强烈抗议”，美国政府却似有袖手旁观之嫌。^[2]

1974年9月18日，应中国代表团的要求，刻有孔子语录的石碑本身从联合国大厅消失，引起美国亲台舆论的新一轮抗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认为，通过此举，“联合国加入了北京的反孔运动”。^[3]《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赞同此说，故意淡化围绕此事的主权之争，突出中国大陆反对正统的形象。来信写道，孔子语录从联合国总部的墙壁上消失了，孔子成为“联合国屈服于极权国家命令的牺牲品”。这是侵犯“权利”的范例。^[4]中国在联合国的举动据信意在“挫败美国的反对，驱逐台湾”，迫使联合国移走石碑已让中国共产党人演变成“微笑而圆滑的龙”。^[5]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不但猛烈抨击联合国，更是指责“中共惧怕圣人教诲无处不在的影响”。^[6]亲台舆论耿耿于怀，甚至在数年之后，仍然把孔子石碑视作中国反正统运动的牺牲品，台

[1] “U.N. Removes Taiwan Plaque,” *Los Angeles Times*, Aug. 3, 1972: A18.

[2] David Winder, “Taiwan Loses Standing in All UN Publication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7, 1972: 12; “A High Price to Pa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11, 1972: 14; David Winder, “China’s UN ‘New Boys’ Win Friend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21, 1972: 9; Don Shannon, “Chinese Make Impact on U.N. Diplomatically,” *Los Angeles Times*, Oct. 29, 1972: E1.

[3] “U.N. Joins Drive against Confucius,” *Washington Post*, Sept. 18, 1974: A13.

[4] “Letters to the Editor,” *New York Times*, Oct. 6, 1974: 392; “Letters to the Editor,” *New York Times*, Oct. 27, 1974: 420.

[5] David Anable, “China at the UN: A Smiling, Silken Drag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16, 1974: 4.

[6] Bertram B. Johansson, “Inside the News—Briefl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30, 1974: 6.

湾却是正统的维护者。^[1]

到中美正式建交前夕，亲台舆论表现的更加怒不可遏。一封读者来信抨击道，卡特承认“共产党中国”并与台湾断交“进一步让人确信，他在宣扬人权理念时是何等的混乱”，其举动违背孔子关于朋友应该相互忠信的要求。^[2]美国如果因为台湾而对华强硬，亲台者即使不是拍手称快，也会感觉轻松。比如，2001年初，在“台独”势力即将公开上台之际，大陆举行了带有警告性质的导弹演习。克林顿政府针尖对麦芒，派遣两支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峡。有评论称，因为孔子强调道德说教，所以中国最多不过使用爆竹恐吓敌人。中国的导弹是爆竹，航空母舰则是克林顿的爆竹。^[3]剑拔弩张的局面变成了焰火游戏，评论者全然没有美国“抛弃”台湾时声嘶力竭的怒态。个中缘由就在美国的强硬立场。随着民进党上台和台湾去中国化趋势的加剧，利用孔子支持台湾的舆论逐步减少。

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未如预期的那样立即取得突破。后来虽然建交，两国关系也总是跌宕起伏。其中原因多种多样，始终存在的反华舆论无疑是重要因素。本章所探讨的反华舆论以孔子为核心，就是中美关系发展面临的众多阻力之一。孔子倡导各国自由交往，天下大同，却在美国报纸建构的舆论体系中成为中美交往的障碍。在此转变过程中，孔子已被塑造成与其故土有着深刻隔阂的政治符号，被赋予了与其本来人格毫不相干的意识形态意义。经过报纸建构，孔子首先拥有了为美国区分敌友的能力。美国人信誓旦旦，以支持正统中国为己任，孔子是公认的正统象征。冷战时期，中国大陆对孔子的荒废和台湾的推崇对比鲜明。在美国人眼里，孰敌孰友就一清二楚了。谙习此道的台湾通过多种尊孔方式，展现自己的正统形象，以图获取

[1] Don Shannon, "Art at U.N.—Smorgasbord of Works," *Los Angeles Times*, Feb. 6, 1977: R82; O. C. Doelling, "U.N. Calls on Members to Cease Donations of Art Judged 'Appalling' by Some Critics," *Washington Post*, Feb. 16, 1981: A34.

[2] "Letters to the Times," *Los Angeles Times*, Dec. 25, 1978: B6.

[3] H. D. S. Greenway, "Playing Bluff with Selling Arms to Taiwan," *Boston Globe*, Apr. 23, 2001: A11.

美国的不断支持。其次，孔子是反华舆论鼓吹的美国制衡中国的话语武器。在美国报纸上，支持台湾、抨击大陆、谴责联合国的“软弱”均与孔子有着密切关系。这类举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压缩中国大陆的国际生存空间。美国的媒体声音与政府决策有着不可否认的紧密互动关系。引用孔子的反华舆论必然形成美国政府无法忽视的社会压力。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与此不无关系。以孔子为由鼓吹反华的人其真实目的就在于此。

四、余 论

美国舆论以孔子为界，在台海两岸区分敌友，可见孔子之于美国的对华关系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中国之外的东亚地区，历史上也深受孔子影响。美国对此了然于心。在认识东亚时，不管是政界还是商界，都试图从孔子入手，有的放矢地处理对该地区的关系。即便在没有明确涉及孔子的场合，作为旁观者的舆论也会以孔子为视角加以解读。这与上文反映的情况互为呼应，共同将孔子建构为美国认识整个东亚的窗口。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给美国留下深刻印象的当数东亚日本、韩国诸地的经济腾飞。惊讶之余，美国将探寻根源的目光投向孔子。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华盛顿邮报》就已刊文指出，孔子伦理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如新教伦理在西方的意义。^[1] 甚至有人提出，所谓的新教工作伦理，应该更多地归因于孔子，而不是加尔文。^[2] 孔子伦理被定义为“亚洲的优势特性”之一。^[3] 美国人发现，东亚新

-
- [1] William Chapman, "You Can't Argue with Asian Success, Only with Confucius' Role," *Washington Post*, Aug. 12, 1981: A17.
- [2] Barbara Crossette, "New Asia Looks Western But the Mystery Remains," *Chicago Tribune*, Dec. 15, 1985: G6; Barbara Crossette, "Beyond the Gloss of the New Asia," *New York Times*, Sept. 22, 1985: XX9.
- [3] Ian Buruma, "What Happened to the Asian Century?" *New York Times*, Dec. 29, 1999: A25.

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植根于“孔子在公元前6世纪率先确立的中国道德与政治秩序传统”，这一传统引导着该地的工业发展。^[1]为此，诸多商业和学术机构频繁举行会议，研讨孔子学说对东亚奇迹的影响。^[2]他们发现，孔子确定的价值观念与犹太—基督教观念本质相同，差别仅仅在于孔子更强调集体，而基督教则更关注个人。^[3]正因为如此，美国在与东亚发展商业关系时，必须信守面对欧洲伙伴时相同的准则，诚信为先。^[4]比尔·克林顿缺席1995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华盛顿邮报》深表遗憾，因为这可能导致美国商业方式在以孔子为核心的“亚洲（商业）方式”面前进一步式微。^[5]

美国政府及其官员与东亚的接触从另一方面证明，孔子是美国打开东亚之门的钥匙。1994年，在威胁朝鲜未果的情形下，克林顿政府改弦更张，“像孔子一样”，循循善诱地开展攻势。朝鲜终于同意国际机构核查其核设施。^[6]孔子的效力由此可见。2009年，受奥巴马之托，克林顿前往朝鲜，带回被朝鲜扣留的两名记者。此次行动则被舆论解读为落入朝鲜儒家圈套之举。熟知儒家朝贡体制的朝鲜领导人，成功让美国人前来“寻求恩赐”。^[7]2006年，乔治·布什访问越南。布什夫人特意前往“纪念孔子遗产”的文殊院参观，以示尊重越南传

-
- [1] Patrick L. Smith, "In Asia's 'Economic Miracles,' Leaders Face Demands for Refor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8, 1986: 14.
- [2] Maria Saporta, "Teachings of Confucius May Help Unlock Mystery of Far Eastern Thought,"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Sept. 22, 1985: M2; Maria Saporta, "Conference Set on How Asians Regard Authority,"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Nov. 4, 1986: B7; Don Lattin, "Confucianism and Capitalism: A Potent Blend,"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pr. 19, 1989: 2.
- [3] Ronnie C. Chan, "We Need to Reconcile Asian and Western Value," *Boston Globe*, Mar. 6, 1998: A19.
- [4] Randal Ashley, "Capital Letters Spell Trade—an Bucks,"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Nov. 21, 1993: E3.
- [5] T. R. Reid, "Confucius Says: Go East, Young Man," *Washington Post*, Nov. 19, 1995: C2.
- [6] Randal Ashley, "It's Time to Deal with North Korea,"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Feb. 27, 1994: A5.
- [7] Richard Halloran, "Clinton-Kim Encounter," *Washington Times*, Aug. 11, 2009: A19.

统。^[1]1987年,弗吉尼亚州长访问韩国,推销该州农副产品。为赢得韩国人的好感,州长在讲话中不时引用孔子语录。^[2]1988年,美国驻日本大使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离任。在告别演说中,曼斯菲尔德在称赞日本是美国坚定而可靠的盟友之余,不忘引用圣经和孔子言论,彰显对于美日传统的同等重视。^[3]

事关国际事务的舆论,也时常以孔子为切入点,谈论东亚或处理与东亚的关系。1984年,罗马教皇访问韩国。下机之后,教皇不仅字斟句酌地用朝鲜语发表演讲,而且引用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之言,“赢得众多韩国人的心”。^[4]东亚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据称也表现出孔子的深刻影响,他们“倾向于寻找解决争端的中庸之道”。^[5]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日本人明石康,在讲话中“随时准备引用孔子”。^[6]正是着眼于东亚的孔子情结,报纸称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是在“菩萨和孔子的古老影响之下”进行的。^[7]联合国在推进女性权利问题上,也从孔子那里找到了灵感。“孔子只有一子”,属于当代标准家庭模式。而这种模式有利于女性摆脱家庭琐事的桎梏,更为充分地享受和利用各种权利。^[8]

-
- [1] David E. Sanger and Helene Cooper, "Unlike Clinton, Bush Sees Hanoi in Bit of a Hurry," *New York Times*, Nov. 19, 2006: 1.
 - [2] Fred Hiatt, "Baliles Sells Va. with Song and Poetry," *Washington Post*, Oct. 15, 1987: D5.
 - [3] Margaret Shapiro, "Mansfield Retiring after 11 Years as Envoy to Japan," *Washington Post*, Nov. 15, 1988: A21.
 - [4] Don S. Schanche, "Pope Joins in Call for Korean Reunification," *Los Angeles Times*, May 4, 1984: OC1.
 - [5] Tom Siegfried, "In Logical Terms, Culture Shapes Views of Reality," *Dallas Morning News*, Sept. 8, 2003: 3E.
 - [6] Roger Cohen, "Man in the Middle Calls on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Apr. 26, 1994: A6.
 - [7] Mark McDonald, "A Host of Memories," *Dallas Morning News*, Oct. 3, 1988: 1B.
 - [8] Frances Kissling, "Is the U.N. Women's Agenda Riding Roughshod over Religion?" *Washington Times*, Sept. 6, 1999: 41.

第二十章

美国舆论与孔子在当代中国的复兴

“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重回重视文化传统的轨道。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孔子是重振传统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政府积极引导，社会热烈反应，政策文件闪现着孔子的影响，儒家经典持续畅销，国学课堂人满为患。在全球化趋势日渐强劲的今天，中国重新尊孔导致的文化转向必然引起世界关注。各国从自己的利益立场出发，解读结论千差万别。在美国舆论看来，孔子在当代中国的复兴只是中国政府用以建构和维系自身地位的理论武器，未有根本改变社会发展趋势之效。中美两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都有不可回避的冲突。美国舆论的孔子复兴观从而烙印深刻，误解与曲解甚多。然而，国家形象之于对外交往至关重要，客观认识当代美国的中国形象势在必行。重振以孔子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乃中国现今的基本政策走向，研究美国舆论的反应可以管中窥豹，揭示美国社会看待中国的角度和倾向，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化政策在美国的接受状况，推动中美交流。

一、绝处逢生的孔子

毋须讳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近三十年间，孔子命途多舛。文革激进主义一旦结束，在政府行为的推动下，孔子逐步回归中国文化的核心地位。孔子命运的峰回路转引起美国舆论的极大注意，报道分析不一而足。但在孔子重获生机的细枝末节中，贯穿着孔子处境轮回循环的主线。在美国舆论的刻画之中，孔子命运的逆转不过是政治更迭的必然结果，与历史情形别无二致，政府仅仅在顺势而为，凸显自己与前任政府的根本区别。因此，两个时代孔子遭遇的巨大反差是舆论触及孔子新生时不愿绕开的话题。

从“文革”结束到 21 世纪，孔子的地位日渐巩固，美国报纸上的孔子遭遇轮回说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勾勒出舆论对于孔子复兴的总体立场。“文革”结束不久，美国舆论就捕捉到了孔子即将复兴的蛛丝马迹，并将这一事件放置在中国历史循环往复的宏大背景之下。比如，1978 年，在中国的孔子批判稍显松动之时，《芝加哥论坛报》即刊文指出，借用历史人物评价当今形势乃“中国古老技巧”，标志着中国即将迎来新的政策转向。^[1]《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将孔子与中国革命比作父子关系，声称每次革命都是儿子推翻父亲的举动。代表儿子的红卫兵已经离去，孔子就会再次登台。^[2]1980 年，孔子命运刚刚出现转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解说词仍停留于批林批孔时代，目睹此景的美国人不禁感叹，孔子的遭遇轨迹“极似‘之’字形”。^[3]中国人据称“最喜绘声绘色地辩论某些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文革结束，毛泽东成为重新评价的对象，《波士顿环球报》因此揣测，孔子的大好时光又将来临。^[4]“圣人再次风行”、中国领导人“再次发

[1] Fox Butterfield, "For Mao, Fewer Rave Reviews," *Chicago Tribune*, Jun. 11, 1978: B1.

[2] Melvin Maddocks, "Do Fathers Prefer to Play the Role of S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22, 1979: 22.

[3] Flora Lewis, "China's Turning Wheel," *New York Times*, Nov. 7, 1980: 27.

[4] Graham Earnshaw, "The Mao Debate: Round One Ends," *Boston Globe*, Jul. 5, 1981: n. p.

现”孔子的可取之处等用词引导着另一评论的写作思路。^[1]时至2006年,关注孔子命运的美国人依然不忘圣人曾经遭受的冷遇,称当前的孔子热潮为“另一次转向”。^[2]中国针对孔子的任何新的批评都会加深孔子遭遇存在循环轮回的印象。如在1988年,尽管中国报纸批评孔子的言辞显得“温和”,美国舆论仍然言之凿凿地写道,“他被打倒了,他起来了,他又被打倒了”。^[3]

作为孔子遭遇循环论的关键一环,报纸刻意突出孔子在毛泽东时代几被湮没的境况,嘲笑毛泽东思想引发的狂热不再,喻指中国已开始新旧思想的交替程序。诸多文章将孔子历经冷遇的矛头直指毛本人。美国人极力强调,毛“绝对鄙视孔子”,批判儒家思想不切实际,假装仁爱慈悲。^[4]更有人用秦始皇焚书坑儒作比喻,攻击毛“焚毁孔子著作,摧毁中国文化”。^[5]报纸还从历史的角度宣称,孔子“幸免于……主席和他的智慧‘小红书’”并重获尊敬具有必然性。^[6]在美国舆论看来,孔子的崛起必然以毛的衰落为前提。因此,《洛杉矶时报》使用为孔子“完全恢复名誉”的说法,解释两者此消彼长的个人影响,显示孔子凤凰涅槃的命运。^[7]对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冷嘲热讽频繁见诸报端。例如,有作者写道,中国正在抛开毛泽东改写的马克思主义,转而复兴“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孔子代表的传统思想。^[8]《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则是,随着毛的去世和“其激进追随者蹲进监狱或者颜面

[1] Tom Ashbrook, "Confucius Back in Style in China," *Boston Globe*, Nov. 17, 1985: 18.

[2] Tom Haines, "A New Place for Confucius," *Boston Globe*, Sept. 17, 2006: M1.

[3] "Confucius under Attack Again," *Chicago Tribune*, Jul. 24, 1988: 26.

[4] Steven W. Mosher, "Life and Legacy of Chinese Despot More Brutal Than Ruthless Ancestors," *Washington Times*, Apr. 9, 2000: B8.

[5] Stanley Karnow, "Mao Now," *Washington Post*, Dec. 26, 1993: C7; Maureen Fan, "His Works, My History," *Washington Post*, May 27, 2009: C1.

[6] Frances Cawthon, "Ayatollah Khomeini No Contest for Confucius,"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Aug. 21, 1985: B4.

[7] "Chinese Restore Confucius as a National Glory," *Los Angeles Times*, Nov. 17, 1980: A2.

[8] Michael Parks, "Chinese Communists Falter in a 'Crisis of Faith,'" *Los Angeles Times*, Jan. 4, 1981: F3.

扫地”，孔子“重回中国伟大历史人物的万神殿”。^[1]孔子兴起，而“毛主义……落伍过时”，这被称作“最大的讽刺”。^[2]

正是以孔、毛影响交替为背景，美国报纸将中国重塑孔子权威之举刻画为中国历史阶段的相互否定。报纸相信，文革时期遭受诋毁的孔子再次赢得尊重，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又一次重新评价、重新解释、在某些情况下重新撰写历史”。^[3]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历代统治者对此深信不疑，不敢须臾偏离儒家轨道。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花费巨资，修缮曾遭红卫兵破坏的孔庙和孔子故居，就被解释为返归历史正道。^[4]美国报纸还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社会道德的运动中看到了中国摒弃毛泽东思想、重返儒家传统的证据。^[5]与此同时，报纸不时提醒，中国领导人在多种场合的讲话点缀着孔子名言。^[6]

政府的孔子复兴政策渗入社会生活的众多层面。如在文化教育领域，美国报纸发现了完全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情形。首先，学校风气迥然有别。曾被贬为“臭老九”的教师不仅有了自己的节日，政府也要求学生，遵照孔子的教诲，“恢复向老师致敬鞠躬的古老传统”。^[7]

[1] Barry Kramer, "In Aboutface, China Decides to Accept Foreign Help for National Calamities,"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25, 1981: 32.

[2] Ross Terrill, "Why the Chinese No Longer Worship Chairman Mao," *Chicago Tribune*, Jul. 5, 1981: A1; Ross Terrill, "The Dissection of Chairman Mao," *Los Angeles Times*, Jul. 17, 1981: D7.

[3] Michael Parks, "China Revises its History to Fit Present," *Los Angeles Times*, Nov. 15, 1980: B1.

[4] Phil Brown, "China's Latest 'Reform' Restores Confucius' Honor," *Chicago Tribune*, Sept. 15, 1983: E7B.

[5] Jim Mann, "China Gives New Priority to Economy," *Los Angeles Times*, Sept. 29, 1986: 1.

[6] William E. Ahearn, "President Jiang Zemin Says Flooding Will Not Hurt China's Economy," *Chicago Tribune*, Aug. 25, 1998: 2; Katrin Bennhold, "Chinese Leader Offers a Glimpse of the Future," *New York Times*, Jan. 29, 2010: n. p.

[7] Joseph A. Reaves, "China Restores Teachers' Honorable Status," *Chicago Tribune*, Sept. 29, 1985: 22.

政府于1985年在北京成立第一所专事孔子研究的机构,被视作纠正孔子此前所受批判之举。^[1]在尊孔背景之下,数个城市复现私塾现象。学生向孔子雕像鞠躬,并在身穿汉服的教师指导下,背诵蕴含仁爱顺从美德的古文。^[2]其次,孔子思想本身经历着重评价,此乃中国学术界自1949年以后未曾尝试之举。其中的细微迹象在“文革”结束不久就已出现。^[3]1987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和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联合举办首届国际孔子研讨会,是孔子在学界复兴的又一标志,引起美国舆论关注。每篇报道必然提及孔子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以便衬托孔子地位的根本转变。例如,离举办日尚有一年,《亚特兰大宪法报》就已有会讯报道,并且强调,孔子“在‘文革’中遭到谩骂”。^[4]《旧金山纪事报》写道,会议的召开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抛弃抨击孔子思想封建的“文革”做法,转而视其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新加坡参与主办此次会议,证明中国正将儒家传统用作新加坡资本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络纽带,“文革”时期的激进主义开始淡出文化和政治视野。^[6]进入21世纪,“国学热”方兴未艾。按照美国报纸的说法,学界一片欢腾,因为孔子最终“经受住了毛时代的摧残”。但同时,他们又怀疑孔子热是“政治事件”,难以持久。^[7]《华盛顿邮报》的评论也认为,虽然孔子热看似红火,但由于受政府主导,民众获悉的孔子思想并不完整,而且与政治利用价

[1] “World Digest,”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Jun. 11, 1985: A4.

[2] Sheila Melvin, “Modern Gloss on China’s Golden Age,” *New York Times*, Sept. 3, 2007: 3.

[3] Takashi Oka, “Chinese Magazine Signals Definite Thaw toward Soviet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3, 1980: 9.

[4] “Confucius Seminar Planned,”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Apr. 28, 1986: A10.

[5] “Scholars Are Pondering What Confucius Said,”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 2, 1987: 52.

[6] Julian Baum, “Some Chinese Find Relevancy for Today in Ancient Confucianis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16, 1987: 9.

[7] Annping Chin, “The Newest Mandarins,” *New York Times*, Dec. 16, 2007: 34.

值密切相关。一旦政治转向，孔子的地位又将出现变数。^[1]

与孔子思想荣归正统相应，孔子故居再获礼遇，见证中国两个时代相互区别的決心。报纸无不强调“文革”激进主义的肆意破坏。1979年4月1日，“在经历已故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判之后”，孔子出生地再度向外国人开放。^[2]孔林是孔家墓地，历代政府均视其为神圣之所。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某天，孔林遭到红卫兵破坏，这是“不折不扣的文化抢劫”。“文革”之后，“情形变了”，曲阜也从政治变革中受益。^[3]据称，当地居民以孔子为豪，在“文化革命的鄙视和破坏”中保护孔子遗迹，迎来了政府的再度重视。^[4]政府也在花费巨资，全面修缮在“文革”中衰颓败落的孔庙。^[5]孔子的诞辰纪念重现辉煌，曾是“毛主义者的历史替罪羊”的孔子，因为政治风向的转变，一跃成为万人朝拜的对象。^[6]有报纸文章甚至将日据时期与1949年之后进行对比，证明后一时代的破坏作用。作者声称，尽管日军在中国其他地区烧杀抢掠，对于曲阜却未加骚扰，“因为他们极其尊重圣人”。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孔氏家族麻烦不断。随着“文革”结束，孔子及其后裔得以“平反”。^[7]斗转星移，据信源自孔子的中国美食也因为孔子地位的变化而焕发勃勃生机。政府不仅鼓励民间大兴烹饪之风，而且亲自参与其中，整理编撰传统食谱。^[8]

[1] Maureen Fan, "Confucius Making a Comeback in Money-Driven Modern China," *Washington Post*, Jul. 24, 2007: A1.

[2] "Confucius' Birthplace Opened to Tourists," *Washington Post*, Apr. 2, 1979: C3.

[3] Lincoln Millstein, "The Renaissance of Qufu," *Boston Globe*, Mar. 17, 1985: 26.

[4] Tom Ashbrook, "Staying in the Home of Confucius," *Boston Globe*, Jun. 15, 1986: B33.

[5] Everett Potter, "Simply Shandong: A Look at Everyday Life in China," *Washington Post*, Jul. 21, 1985: E10.

[6] Christopher S. Wren, "A Return to the Though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Times*, Oct. 14, 1984: E7.

[7] John Ngai, "Confucius' Descendant Trades Philosophy for Business," *Dallas Morning News*, May 21, 1987: 46A; John Ngai, "Confucius Heir Is an Entrepreneur,"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n. 7, 1987: 5.

[8] Nina Simonds, "Back to China," *New York Times*, Mar. 3, 1985: SM63.

可见，随着“文革”的结束，孔子命运再次出现转机。孔子一改昔日备受冷落和嘲讽的角色，为政府和民众所敬仰。美国报纸的解读强调两点。第一，孔子此次命运转变只是中国历史规律的延续，是孔子影响蛰伏之后的再次兴起，具有某种必然性。第二，孔子的复兴是政治事件，时代之间需要区分，孔子就是当代中国赖以确立思想特性的人物。总而言之，在美国舆论看来，孔子的复兴不过是中国循环往复的思想对峙的又一结果。

二、富含政治价值的孔子

依照将中国事件政治化的惯常做法，美国报纸极力突出，中国政府之所以顺应历史规律，支持并推动孔子复兴，根本原因在于孔子是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本。就在孔子重振影响之初，《华盛顿邮报》便话外有音地写道，“如果孔子今天能够返回故里，他可能会作为英雄受人欢呼拥戴，尔后会被警告远离曾经传播政治思想的杏园”。言下之意在文章末尾变得清晰：“当今的政治容忍有其界限”。^[1]换言之，报纸指责中国政府无意恢复正统的孔子思想，而是注重孔子的政治利用价值。总体而言，这一观点深得其他舆论呼应。孔子的所谓政治价值盖有三大要素：维系政府地位、填补国民信仰空缺、迎接外来挑战。

鉴于美国舆论观察中国问题时的泛政治化趋势，孔子复兴留给他们的深刻印象首推政党用途，即中国共产党旨在借复兴孔子，巩固自身地位。一方面，报纸强调，孔子思想的忠孝成分乃孔子再受尊崇的根源。《芝加哥论坛报》声称，“孔子得以平反，就是因为其遵从等级制度和家长式领导的思想”。^[2]舆论力促人们相信，中共正在“方便

[1] Michael Weisskopf, "Confucius Is Making a Comeback," *Washington Post*, Aug. 15, 1982: A19—A20.

[2] Uli Schmetzer, "The Land of Confucius," *Chicago Tribune*, Oct. 21, 1990: 1.

地利用”孔子的等级思想,巩固权力。^[1]“文革”之后,中国百废待兴,稳定之需压倒一切。报纸从中国的求稳政策中,看到了中国政府前述思路的具体举措。例如,“儒家传统禁止扰乱和平”,所以,中国政府专注经济发展,而通过宣扬孔子维护既有的政治秩序。西方鼓吹的政治改革从而不见踪影。^[2]主张重归孔子制定的家庭观念,确立父子、老幼、君臣之间的“正确关系”,这被视为中国政府地位巩固策略的又一体现。^[3]

按照美国报纸的说法,甚至高墙之内的犯人也不能游离于政府的家庭与社会关系的教育之外,这一策略“在大约 2500 年前得到孔子首肯”。^[4]更为偏狭的评论认为,当代中国的发展“与经济思想关联甚微”,政府只关心“持续的政治控制和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如此政策导向的依据“与其说是马克思,还不如说是孔子”。^[5]在美国舆论看来,1989 年的事件坚定了中共利用孔子维护权威的决心。《华盛顿邮报》蛊惑道,“孔子伦理教导人们尊重长者。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们正在为自己争取孔子式的尊重”。^[6]同年,中国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孔子国际研讨会,并在曲阜隆重纪念孔子诞辰。这些事件都被赋予浓厚的政治寓意。《亚特兰大宪法报》写道,两次事情的发生,正值中国领导人“艰难处理”动乱后遗症之时,孔子“宣扬严格遵从僵化的社

[1] Takashi Oka, “In Birthplace of Confucius, Descendants Puzzle over the Sage’s Legac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29, 1982: 4.

[2] Arthur Schlesinger, Jr., “At Last: Capitalist Communism,” *Wall Street Journal*, Aug. 4, 1987: 34.

[3] James L. Tyson, “Farmer Yan Reaps Bounty as Crops and Family Thriv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30, 1988: 1, 16.

[4] Leo Orleans, “Prodding Beijing, Understanding China,” *Washington Times*, Jul. 21, 1992: F4.

[5] Nicholas D. Kristof, “China Sees Singapore as a Model for Progress,” *New York Times*, Aug. 9, 1992: E4.

[6] John W. Hounsell, “Marxism Is Alien to China,” *Washington Post*, Jun. 19, 1989: A8.

会等级秩序”，因此深得中国政府青睐。^[1]还有说法是，至少从孔子以降，“追求秩序”就是中国基因库的一部分，动乱坚定了政府重塑孔子的决心。^[2]

另一方面，报纸指责中国政府有选择地重振孔子影响，突出和应用忠孝思想，忽略和屏蔽“民主”意识。有评论声称，如果不是植根中国传统，1989年的“民主呼声”就不会那样“强烈”，而中国的所谓民主传统可以追溯至孔子。孔子讲求德治仁政，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之语“只能被称作民主语言”。^[3]以此逻辑，中国平息动乱就是与孔子开创的民主传统背道而驰。孔子还要求当政者善于疏导民怨，这是孔子支持“民主”的再一证明。但中国政府不愿听从，以“军事镇压”应对所谓的民主浪潮。^[4]马萨诸塞大学汉学家白牧之（E. Bruce Brooks）通过报纸发表的言论与前述观点遥相呼应。白牧之表示，孔子的等级顺从思想“设计于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之中”，并非孔子的真实所想。^[5]舆论进一步宣称，假若白牧之所言属实，“中国的政治改革者”就应该从包括孔子在内的中国传统中，寻找“曾在1989年凝眸注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6]美国报纸从而自信地宣布，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不能在中国并立”，因为孔子潜藏的“民主”精神“可能让他的马克思主义新门徒颜面扫地”。^[7]

[1] Louise Branson, "Confucianism Reviving in China,"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Oct. 29, 1989: A17.

[2] Pat Widder, "The China We Thought We'd Never Know," *Chicago Tribune*, Jul. 1, 2001: 15.

[3] Robert Akerman, "Democracy Has Roots in China's Ancient Tradition,"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May 24, 1989: A12.

[4] Timothy Cheek, "China Needs a 'Great Yu,'"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26, 1989: 18.

[5] Anthony Flint, "Confusion about Confucius," *Boston Globe*, May 25, 1994: 1.

[6] Patricia Leuchtman, "Rethinking Confucius," *Boston Globe*, Jul. 18, 1999: K6.

[7] James L. Tyson, "Scholars Invoke Confucius to Attack Beijing Leadership,"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12, 1989: 6.

孔子的政治价值之二，在于填补中国民众的“信仰空缺”。历经“文革”激进主义，中国人开始厌倦空洞的政治说教，精神世界似有涣散之虞。凝聚信仰成为美国报纸上中国政府的紧迫任务之一，孔子思想以其深厚的传统根基成为所谓的替代信仰的首选。报纸认为，即便在1949年之后最为激进的时期，决策者也会不由自主地采纳孔子的某些原则。比如，中国在大跃进以后提出的“伟大真理”——“人类的首要任务是吃饭问题”——实则源于孔子。^[1]《毛主席语录》据称“引用孔子论著与斯大林著作的频率相当”。“文革”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明确强调孔子的现实意义。此类现象说明，“尽管处于变革之中，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社会”。^[2]

所以，一旦民众出现混乱，孔子思想迅即成为替补。《洛杉矶时报》宣称，激进主义之后的中国“受困于日趋深刻的‘信心危机’”，政府因此激励民众，发展精神文明，而精神文明又以“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价值观”为基础。^[3]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各种新旧名称混杂，被视作信仰混乱的具体表现。孔子思想再受青睐便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其“正名”学说有望“让中国社会表现突出的混乱状态烟消云散”。^[4]按照美国报纸的描述，尔后的中国，“共产主义在衰败，资本主义贪婪在蔓延”，中国人带着“文化忧虑”寻找新的价值观念。政府视孔子思想为填补“道德真空”的关键。^[5]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念追随者已经所剩无几”，孔子进一步发挥着“填补真空”的作用。^[6]这种论调延续至今。报纸宣布，共产主义只存在

[1] Thomas Chen, "China's Arrogant Leadership," *Chicago Tribune*, Dec. 5, 1984: 15.

[2] Melvin Maddocks, "Communist China's Confucius Connecti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7, 1987: 19.

[3] Michael Parks, "China Urged to Seek Old Values," *Los Angeles Times*, Mar. 11, 1981: C2.

[4] Frank Ching, "Switches in Names of Places, Factions Indicate Confusion in Chinese Values," *Wall Street Journal*, Jan. 2, 1981: 12.

[5] Sheila Tefft, "Cultural Confusion Sends China Back to Confuciu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24, 1993: 10.

[6] Uli Schmetszer, "China Marks 45 Years of Communism," *Chicago Tribune*, Oct. 2, 1994: 3.

于“正统派的大脑里”，孔子“正在结束退隐状态”，而中国政府则“在掸去其著作上的灰尘，让他帮助应对 21 世纪的困惑局面”。^[1]

孔子的政治价值之三，在于帮助中国迎接世界挑战。当代中国既要在经济上不输于人，又要在文化上保持独立，抵御外来影响。在此二者，孔子都大有作为，因此赢得中国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应用。经济方面，同尊孔子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发展神速，促使中国高度关注孔子思想刺激经济发展的成分。^[2] 据称，邓小平优先发展经济，就是“遵循了孔子格言”。苏联没有孔子引导，因而陷入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3] 江泽民要求党员清廉，为经济发展提供政治保障，也给美国人“重回孔子时代”之感。^[4] 胡锦涛不时引用孔子，倡导“和谐社会”与“和平崛起”，“明显源于建立持续、平稳运转的经济机器之需”。^[5] 受中央影响，地方官员同样秉承孔子的和谐诚信思想，邀请和保护外国投资者。^[6]

在文化上，孔子有帮助中国抵御外来影响、巩固自身特性之用。报纸断言，中国再次宣扬孔子，目的在于利用儒家的顺从和等级思想，保持稳定，为清除西方影响助一臂之力。^[7] 另一文章判断，中国重塑孔子，“显然在试图将民众热情引向国内偶像，而非外国神灵”。^[8] 从

[1] Evan Osnos, "Sage for the Ages Makes a Comeback," *Chicago Tribune*, May 31, 2007: 1.

[2] Fox Butterfield, "China Change: Not Cosmetic," *New York Times*, Sept. 5, 1980: A1.

[3] Dan Michaels, "Russia and China Go Their Own Ways," *Chicago Tribune*, Dec. 12, 1992: 23.

[4] John Pomfret, "Many Chinese Distrust Party's Idea of Reform," *Washington Post*, Jul. 1, 2000: A18.

[5] Georgie Anne Geyer, "Tiny Steps toward Big Changes," *Chicago Tribune*, Jan. 4, 2008: 19.

[6] Uli Schmetzer, "China Has Secret Plans to Quell Worker Unrest," *Chicago Tribune*, Oct. 15, 1992: 1.

[7] Louise Branson, "Confucianism Reviving in China,"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Oct. 29, 1989: A17; Uli Schmetzer, "Religions Are Experiencing Renewal in China," *Dallas Morning News*, Nov. 5, 1989: 20A.

[8] Uli Schmetzer, "Chinese Try Religion to Fill Ideological Void," *Chicago Tribune*, Nov. 2, 1989: 27.

孔子的古老教诲里，中国正在寻找新的智慧，“加强中国特性，应对全球化影响”。^[1] 孔子的复兴被称作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着西方方式”。^[2] 与此同时，美国报纸暗示，中国也在利用孔子，在世界文化日渐碎化的背景之下，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例如，孔德懋和孔德成均为孔子直系后裔，却因政治原因，分居台海两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呼他们为“中国与台湾相互对抗的工具”，因为双方都在利用两人的特殊身份，获取影响孔子家族传承的主动权。按该报说法，孔德懋曾经担心，大陆不会承认孔德成之子为孔子的下一直系后代，而是代之以其他人选，强化大陆在中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3] 再比如，新疆面临境外分裂势力的挑战。美国报纸从而得出结论，中国积极参与上合组织，意在让孔子战胜伊斯兰教，改变“民族宗教失衡”的局面。^[4]

借助孔子影响，展现自身形象，是孔子文化价值的另一方面。1995年，江苏苏州老城申请进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据美国报纸，苏州的最大理由就是当时藏于城中孔庙的中国最早碑刻地图“平江图”。^[5] 然而，当今中国展示自身形象的大手笔非北京奥运会莫属。美国报纸的报道分析在孔子与奥运会之间建立联系。场馆尚在建设之时，记者就从组委会官员答问方式中捕捉到了孔子的影子，向他提问“如同跟孔子说话一样”，简洁而深奥。^[6] 大赛之前的北京集中整顿市容，竭力给各国选手留下良好印象。此举据信也与孔子相关，因

[1] Tom Haines, "A New Place for Confucius," *Boston Globe*, Sept. 17, 2006: M1.

[2] Andrew Higgins, "In Today's China, It's Confucius 2.0," *Washington Post*, May 15, 2010: A1.

[3] "Modern Rivalry Separates Heirs of Ancient Sag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24, 1993: 11.

[4] Norman Levine, "Keeping Peace Will Foster Prosperity in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Times*, Dec. 4, 2008: A4.

[5] Charles A. Radin, "China City Working to Save Famed Canals," *Boston Globe*, Sept. 25, 1995: 1.

[6] Rick Telander, "Chinese Women Win Fair But Not Square," *Chicago Sun-Times*, Aug. 15, 2004: 111.

为孔子教导说，个人与国家荣辱休戚与共。^[1] 中国跳水队教练为提高队员的国家荣誉感，甚至邀请“顶级教授”，来队讲授孔子的《论语》，美国记者对此印象深刻。^[2] 报纸确信，源自孔子的面子观念支撑着中国与奥运有关的一举一动。开幕式恢弘华丽，孔子闪亮登场，向世人诠释中华文明。但某些美国舆论却不以为然，认为成千上万名“孔子‘门徒’”和其他演员聚集“鸟巢”，仅仅证明中国“能够上演一场演出”而已。^[3] 报纸或者指责中国贪图形象，忽略环境污染。“孔子‘门徒’”、其他演员和华丽的焰火“与其说是在庆祝，还不如说是在发出求救信号：‘嗨，我们有 91 000 人陷在这里！我们不能呼吸，我们看不见，我们大汗淋漓！快送水和除臭剂！还有手纸！’”“鸟巢”被形容为“矗立在雾霾中”的一座城堡。^[4] 即便是报道笑迎四方宾客的志愿者，报纸仍然不忘提及中国的面子观念和“好大喜功”。受过英语培训的 50 万志愿者虽然体现着孔子名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却说明中国不愿“蒙受丧失颜面之辱”。中国的奥运开支因此四倍于通常情形。^[5]

政治需要贯穿着孔子的三大价值。维护政党地位的政治性质自不待言，政府利用孔子填补民众的精神空缺和迎接世界挑战也与政治需求紧密相连。报纸宣称，中国政府之所以在国民思想出现混乱之时采用孔子学说作为替代，实因看重孔子思想中的等级与秩序原则，期望此举有助于加强国民对于政党的忠诚。而以孔子迎击世界挑战，一是因为孔子思想确有利于发展和提升民族形象的成分，二是前面两点已经确立的政党与孔子之间牢不可分的联系使然。总之，孔子在美国报纸上的当代价值就是中国围绕政治需要建构而成。

[1] Maureen Fan, "China Pushes Public to Mind Its Manners," *Washington Post*, Jun. 13, 2007: A1.

[2] Juliet Macur, "Host's Advantage? Tell That to the Athletes," *New York Times*, Aug. 4, 2008: 9.

[3] Kate Hairopoulos, "Beijing 2008," *Dallas Morning News*, Aug. 9, 2008: 1A.

[4] Tracee Hamilton, "Ceremonies Are Breathtaking," *Washington Post*, Aug. 9, 2008: E5.

[5] Andrew L. Wang, "Pride Replaces Despair for China," *Chicago Tribune*, Aug. 7, 2008: 1.

三、尊孔政治“差强人意”的社会反响

然而，孔子的回归虽为历史循环规律，并有政治需求的强力支撑和推动，民众似乎反应平淡。此乃美国报纸就孔子复兴发表的第三大评价。在不经意间，舆论的分析报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将孔子重受尊重之事刻画为完全的政治事件，凸显其缺乏民意基础的“缺陷”。在美国报纸上，真正听从政府号召、言行以孔子思想为纲之人极为稀少，而在这些并不多见的“信徒”中，与现代社会理念格格不入者甚多。多数中国人紧随时代步伐，却无暇顾及孔子的行为规范。

因遵循孔子教诲而获报纸首肯的中国人寥若晨星。某高姓女士因为反对中国政府“隐瞒”艾滋病疫情，而受到《纽约时报》称赞。她引用孔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语，解释自己的行为，获得赞誉。^[1]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深深拨动（中国人的）心弦，”由此焕发出深受孔子影响的人性光辉，让《纽约时报》惊叹。^[2]然而，更多时候，信奉孔子的中国百姓被描绘成与时代要求脱节之人。例如，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国人依然迷信数字的神奇力量。这就是遵从“孔子制定的戒律”，因为中国的数字迷信可以追溯到孔子为妇女量身定做的“三从五德”。^[3]21世纪，汽车进入中国的千家万户，车牌号码的选择延续着“可以溯至孔子和道家思想”的数字迷信。^[4]但在同时，在美国人看来与迷信泾渭分明的宗教，却在中国举步维艰，很

[1] Jim Yardley, "Fighting Parallel Crises in China: AIDS and Apathy," *New York Times*, Dec. 20, 2003: A4.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实为中国成语，并非孔子所言，取意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得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2] Jim Yardley and David Barboza, "Many Hands, Not Held by China, Aid in Quake," *New York Times*, May 20, 2008: 1.

[3] John F. Burns, "'Must Dos' for Chinese," *New York Times*, Dec. 20, 1985: A12; John F. Burns, "The Land of the 10 Don'ts and the 8 Big Thing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an. 12, 1986: 7.

[4] Jim Yardley, "First Comes the Car, Then the \$10 000 License Plate," *New York Times*, Jul. 5, 2006: A4.

难引起人们的兴趣，报纸的矛头直指孔子世俗思想的强大影响。^[1]广泛存在于民间的重男轻女思想则从另一方面，说明迂腐信奉孔子的人没有与“迅速的经济的发展”同步，甚至中国政府都被迫修改某些地区的独生子女政策。^[2]

有人假借遵循孔子，实为自己牟利。天津的肖氏兄弟相信孔子曾说，“饱暖思淫欲”，他们从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看到了商机：富裕之后的中国人必然更“思淫欲”，二人的“康乐”性玩具工厂因而建立。产品专供“欣欣向荣的中国国内市场”。^[3]作奸犯科者更是让美国舆论如获至宝。1979年，名叫张龙泉（音）的男子假冒开国上将李达之子，招摇撞骗达数月之久，后落入法网。此事虽与孔子毫无瓜葛，报纸仍然发现了孔子的身影：“如果孔子在世，他可能会因为能从青年农民张龙泉的困境中提炼出道德寓言而高兴”。^[4]

大多数中国人的确紧跟时代步伐，却把孔子教诲置于脑后。经济大潮冲击着中国大地的所有角落，淡化了中国民众的孔子情结。迅速发财的心理让孔子思想陷入困境，孔子思想从而面临着“更加凶残的敌人”。^[5]本应清高的作家也按捺不住，声称致富比写作强。美国记者讽刺道，“我绝对清楚，孔子在通过这位女士之口讲话”。^[6]中国的烹饪教授也不顾孔子的美食准则，“不解烹饪史的重要性”，不愿进行相关研究，而是集中精力于流行的烹饪手法，迎合大众口味。^[7]因为

[1] “Confounding a Tenet of Marxis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2, 1988: 1.

[2] “Old Attitudes Remai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Oct. 3, 1986: 33.

[3] Keith B. Richburg, “China’s Pleasure Principals,” *Washington Post*, Jun. 24, 1996: D1. “饱暖思淫欲”是中国谚语。

[4] Frank Ching, “As Confucius Say, People’s Impostor Unfortunate Cooki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18, 1979: 1; “News,” *Boston Globe*, Dec. 21, 1979: n. p.

[5] Seth Faison, “Not Equal to Confucius, But Friends to His Memory,” *New York Times*, Oct. 10, 1997: A4.

[6] Martha Weinman Lear, “Shanghai’s Fields of Green,” *New York Times*, Apr. 23, 1995: XX37.

[7] Nina Simonds, “In China, A Scholar of Culinary History,” *New York Times*, Jan. 25, 1989: C1, C6.

知道网球明星一场球所挣的钱超过自己15年辛勤劳动所得，即便是“留着胡须、长相类似孔子的老者”同样会心有所动。^[1]

在此背景之下，利益——而非孔子教诲，驱使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报纸注意到，在整个国家层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纳入了孔子的“和为贵”原则，但专注经济发展的社会却充斥着不和谐因素。成倍增加的刑事犯罪、工伤数量以及食品掺假事件便是明证。^[2]有违孔子教诲的具体事例则俯拾即是。从台湾返乡的熊先生惊诧地发现，与他分别几十年的儿子竟然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对祖母履行孝道，但“在孔子看来，孝道乃所有美德之源”。熊于是勃然大怒，将儿子踢翻在地。^[3]有美国记者刚出北京机场，就被一名出租车司机拽上车，最终支付的车费是正常收费的两倍。有感于中国人如此迅速彻底地沾染唯利之风，记者特地引用孔子语录“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以作评论和自嘲。^[4]甚至孔子后裔的商业活动也被用作孔子不敌现实利益之据。据称，孔子的一名后裔每日坐在孔墓的大门边，“只需咕哝几句祖先的智慧”，就可获得游客的钱财。如遇人质疑此举有违孔子教诲时，他会以孔子语录“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加以开脱。这种现象据称在当地司空见惯。^[5]20世纪90年代，已逾八旬的孔德懋女士出任孔府家酒、孔府家集团和孔府宴酒的董事会主席。美国媒体颇感诧异，以“后人利用孔子特权捞钱”和“拥有孔子姓氏将中国女士变成商品”为题加以报道分析。报纸认为，鉴于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将孔子名号用于酿酒企业“几近亵渎”，“但孔氏家族似乎毫不介意”。评论者引申道，此事表明“中国

[1] Barry Lorge, "What's Fun in China Is Passion in Prague," *Washington Post*, Dec. 25, 1980: D4.

[2] Craig Simons, "Worried China Reconnects to Past,"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Apr. 22, 2007: B1.

[3] Julia Leung, "The Homecoming,"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17, 1988: 1.

[4] Mike Tierney, "China's Olympic Bid,"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Sept. 2, 2001: F1.

[5] Uli Schmetzer, "Confucius' Descendants Capitalize on His Fame," *Chicago Tribune*, Aug. 12, 1990: 17.

将金钱和庸俗凌驾于文化之上已到了何种程度”。^[1]

面临国外潮流，中国民众也趋之若鹜，孔子似乎无足轻重。孔子和贝多芬曾一度同时成为禁忌，但在开放潮流中，贝多芬及其《欢乐颂》备受音乐爱好者青睐，孔子却有些默默无闻。^[2] 随着圣诞之风的进入，“带着铃铛和红鼻子驯鹿的圣诞老人已成共产党中国的销售工具”。商家极为随意地将孔子纳入圣诞销售环节，他们为圣诞老人贴上“稀疏的胡须，更能让人想起孔子”。^[3] 即使在孔子故地曲阜，外来文化也所向披靡。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每天晚上，都有数百人聚集到没有暖气的大礼堂，观看日本武士电影，放置在商业主干道的高音喇叭将电影里的各种声音传向西面八方。^[4] 十年之后，美国记者发现，曲阜的夜空“飘荡着卡拉OK的旋律”，声音之源就在“庄严的孔庙和孔府转角处，距离静谧的孔子长眠之地孔林不足两英里”。记者感叹曰，“如果孔子听闻家乡今日的卡拉OK，可能会死亦难安”，更何况卡拉OK源自曾经侵略中国的日本。另外，孔子故居附近的一家餐馆卫生状况极差，丝毫不顾及孔子的美食要求。^[5] 到了21世纪，尽管人们了解孔子更为深入，“他们也需要古姿化妆品和 iPod 电子产品”。^[6]

外国思想的侵入同样甚为明显。比如，“对成功秘诀如饥似渴的中国人”不是从毛泽东和孔子那里寻求灵感，反而“疯抢卡耐基和美

[1] John Pomfret, "Descendant Cashes in on Confucius Franchise," *Washington Post*, Aug. 24, 1998: A16; John Pomfret, "Claim to Confucian Name Makes Woman a Commodity in China," *Dallas Morning News*, Sept. 20, 1998: 26A.

[2] Marcia Bliss Marks, "Beethoven Loud and Clear in Peking,"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 14, 1987: 38.

[3] Uli Schmetzer, "China Employs Santa Claus to Make a Profit," *Chicago Tribune*, Dec. 21, 1992: 3.

[4] Julian Baum, "Western Culture 'Whams' into China with Rock-and-Roll, Films, and Disco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9, 1986: 1.

[5] Dolores Kong, "Karaoke Bars Blare in Land of Confucius," *Boston Globe*, Jan. 8, 1996: 2.

[6] Bob Ryan, "The Long Athletic March," *Boston Globe*, Aug. 8, 2008: A1.

国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商业领袖的著作”。美国和香港工商业巨头的回忆录和传记占据着书店的“最佳位置”。^[1]对于“中国成百上千万年轻职业女性”而言，源自国外的女权思想显然比孔子的男尊女卑思想更具吸引力。^[2]1989年的学生举止尤受重视，被引为孔子不敌西方思想的证据。报纸意味深长地写道，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一名学生抨击中国的教育制度，引用的论据来自林肯，而非孔子。^[3]将近十年之后，曾任里根政府国内政策顾问的加里·L. 鲍尔 (Gary L. Bauer) 回忆当时情形仍然回味无穷。鲍尔强调，天安门的学生手中所拿不是孔子的智慧，而是“我们的独立宣言”，另外建有一座“我国自由女神的混凝纸浆模型”。鲍尔宣称，“那些生活在极权主义阴影之下的人们天生就明白，只有美国价值观才能拯救他们”。^[4]

并非所有冲击孔子地位的外国思想都得到报纸赞扬，但报纸却乐于将不足可取的价值导向归咎于中国政府的误导。西方社会以人情平淡著称，友谊则是孔子笔下最受看重的人际关系。然而，中国“共产党却不愿认可友情”，它号召人们与犯有错误者划清界限。如此而来，“尽管自由市场和褶皱裙已经重新登场，值得信赖的友谊却难觅踪影”。^[5]随国门打开而涌入的西方性自由观念是另外一例。北京出现公开要求性解放的大字报，突破了源自孔子的保守传统。美国报纸在报道之时，多次转述大字报指责中国警察与女性犯人的不端行为、中国的晚婚政策以及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此举显然意在将矛头引向中国政府。^[6]孔子本人也受性自由困扰。1987年，名为《孔子狂想

[1] Elaine Kurtenbach, "U.S. Business Icons Guide Chinese," *Chicago Tribune*, May 19, 2002: 8.

[2] Steven Knipp, "Willkommen to Qingdao," *Washington Post*, Oct. 3, 1999: E1.

[3] Howard Rosenberg, "Amazing Scenes from China,"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18, 1989: E1.

[4] George Archibald, "Left-Right Coalitions Could Floor Leadership," *Washington Times*, Apr. 11, 1997: A1.

[5] Jay Mathews, "In China, Trusted Friends Could Turn Out to Be Enemies," *Washington Post*, Aug. 8, 1980: A15.

[6] "Free Speech Brings Call for Free Sex," *Los Angeles Times*, Jan. 3, 1979: A2.

曲》的音乐剧在曲阜上演。剧中情爱场面甚多，致使孔子后人大大不满。美国报纸同时指出，中国新闻社称，“某些批评家称赞此剧”。^[1]

因此，中国社会的尊孔情形与政府的公开倡导相去甚远，有时甚至背道而驰。美国报纸选择报道中国民众忽视孔子教诲的行为，固然有经济发展和国门洞开导致道德涣散方面的现实原因，但其主要目的仍具明显的政治性。首先，民众抛开孔子，追随经济大潮和国外影响，发生于政府积极重塑孔子地位的总体背景之下。突出百姓的消极举动无异于告诉读者，尊孔实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缺乏民意基础。其次，在某些场合，政府行为本身就被刻画为违背孔子要求，示范作用也就大打折扣。总之，在美国报纸上，中国政府重尊孔子的政策没有得到民众的积极配合和响应，与此相反的社会状况难见报端，表现出美国舆论对于中国政治的成见。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经历激进主义之后的中国重归平静，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并重，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孔子的地位发生逆转，再度荣誉加身。远隔重洋的美国报纸对此兴趣浓厚。然而，其报道分析却难以摆脱政治性解读的窠臼。依报界逻辑，孔子在当代中国的复兴得益于历史轮回规律，而中国当代政府出于时代区分的历史惯例，欣然予以推动。与此同时，孔子的当代政治价值被政府挖掘和利用，成为报界眼中中国高调尊孔的又一动机。民众的冷淡反应或自行其是则完全把孔子复兴界定在了纯政治范畴之内。所以，美国报纸舆论视野之下的中国尊孔行为只是政治的延伸和映衬，民众则缺乏激情。

此论自有失之偏颇之疾，不必赘言。但透过报纸带有偏见的解读，美国舆论认知孔子的当代模式跃然纸上。其一，孔子已成中美意识形态纷争的一部分。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曾经历短暂的蜜月期，但多数时候以相互争执为主线。孔子因为重获中国政府青睐，而被视作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成为美国舆论上中美政治

[1] "Confucius Descendant Pans Love Scenes in Musical about Sage," *Chicago Tribune*, Sept. 4, 1987: 4; "Steamy Scenes in Musical Bother Confucius Descendan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 8, 1987: 7.

思想对峙的参与者。其二，孔子的处境乃中国政治现状的重要标志。按照美国人的惯性思维，孔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不可调和。所以，孔子处境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构成此消彼长的关系。当代中国重振孔子，就被解读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控制能力下降、需要与孔子妥协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第三，孔子思想难以抵御全球化趋势的步步进逼。唯利主义、享乐风气等带有明显西方烙印的价值观念蚕食着孔子影响的固有阵地。即便有政府的推动为后盾，美国舆论中的中国民众照样自顾不暇，无心理会孔子的道德伦理要求。总之，将孔子复兴政治化是美国舆论的基本态度。虽然存在谬误，这也不失为我们了解中国在美形象和当代美国孔子观的重要途径。

第二十一章

以孔子监督美国政治： 当代美国政治评论的话语策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里根政府上台，美国进入新保守主义时期。即便是克林顿和奥巴马执掌的民主党政府，也不得不采纳作为共和党执政原则的新保守主义元素。除了鼓吹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新保守主义强调道德的力量和传统价值观念的重要性，主张节制政府，反对政府过度干涉社会。受思想界和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美国社会形成了一股新保守主义潮流，惯于从道德、传统和节制等角度审视政治。经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权利运动之后，当代美国还是族裔意识大增、多元文化盛行之地。新保守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促使美国人在评判政治时，既看重政府与官员的道德素养和节制程度，又关注多元文化传统的生存状况。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报纸上的政治评论就贯穿着前述线索。不仅如此，报纸更是引用孔子，利用其追求理想政治的盛名和代表非主流文化的身份，针砭政治时弊，成为当代美国政治文化的建构者和促进者。

一、孔子与总统

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与当代美国总统看似毫无关系，却在美国报纸的政治评论中频繁相提并论。个中缘由就在于，仕途不利的孔子确定了德治仁政的为官原则，影响绵延至今，中外皆知。美国总统贵为一国之首，自须以理想政治为目标。报纸以孔子为参照，点评总统及其内阁言行，既是有感于孔子施政理想的完备，也是对总统政治的监督和鞭策。

四年一度的大选是总统政治的序幕，候选人的为人为政之德乃报纸目光聚焦的焦点，这在当代美国价值导向的总体背景之下更显突出。孔子以德为重的治国理念被奉为候选人应该参照的行为准则。《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评论呼吁，立志角逐总统职位者须如孔子所要求的一样，“体现总体道德秩序”。为显示言之有据，作者特地引用《中庸》第二十章，突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的现实意义，要求参选总统者践行治国“九经”之说：“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1]

以孔子的施政理想为背景，各位竞争者悉数登场，暴露出或多或少的政治缺陷。报纸或者直言抨击候选政客，或者借赞扬对手达到揭示弊病的目的。大选战场上的唇枪舌剑由此可以管中窥豹。1988年，共和党候选人乔治·布什对阵民主党人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在被称作“战场州”的得克萨斯，杜卡基斯忙于反击布什的指责，忽略黑人和讲西班牙语的选民，从而远远落后于布什。而据报纸观察，布什在遥遥领先的情况下，仍然遵照孔子“不可懈怠”的劝告，巩固优势。^[2]1992年，布什再次披挂上阵，迎战比尔·克林顿。

[1] “Confucius on What Makes a Good Leade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 5, 1985: 38.

[2] Carolyn Barta, “Does Dukakis Have a Chance?” *Dallas Morning News*, Nov. 7, 1988: A13.

针对参选双方迟迟未能把握民意走向，报纸对症下药，为他们量身订制竞选口号。共和党应该强调普通人的工作机会，民主党则应以官员廉洁自律为突破口，孔子“政者，正也”（《论语·颜渊》）获得推荐。^[1]另一评论深有同感，认为克林顿的最大劣势在于，未能给予自己明确定位，忘记了孔子必先修身然后治国的古训。^[2]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亲自出马，前往旧金山中国城，为布什拉票。报道显示，芭芭拉为凝聚人气，临时改弦更张，放弃反同性恋立场，并用巨大的中国签饼壮大声势。签饼内的字条写着，“子曰：1992是布什和奎尔之年”。^[3]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以独树一帜的竞选纲领吸引众多眼球，但也因此遭到冷嘲热讽。有文章斥责佩罗不得要领，并且讽刺道，“佩罗总统”就职之后会首先敦促国会通过议案，净化海军士兵的语言。这既是因为孔子的“正名”之说，更因为佩罗年少时与海军比邻而居的经历。^[4]2000年的布什—戈尔之战，因选票统计争议而令人难以忘却。在竞选过程中，戈尔发誓要改革竞选财务体制。这在某些媒体看来有失自知之明，因为民主党的筹款手段频遭诟病，而且“孔子”也早就劝告，“如果住玻璃房子，就去地下室更衣”。^[5]2008年，奥巴马风头强劲。批判者声称，他缺乏历练以及由此产生的治国智慧。其对手约翰·麦凯恩截然相反。如同孔子等伟大思想家，在越南战俘营关押数年的麦凯恩“习惯沉思”，从而变得睿智：“我们有理由相信，经历如此考验的总统能够做出智慧的决策。”^[6]

[1] John Tierney, "Sound Bites Become Smaller Mouthfuls," *New York Times*, Jan. 23, 1992: A1.

[2] Lee Cullum, "Should Pols Fear Perot?" *Dallas Morning News*, Apr. 24, 1992: A25.

[3] David Tuller, "Barbara Bush Visits S. F.'s Chinatow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ug. 26, 1992: A5.

[4] Edwin M. Yoder, "President Perot: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the Futur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Jun. 2, 1992: A11.

[5] David Limbaugh, "Gore's Woes... amid Negativity Noises," *Washington Times*, Mar. 17, 2000: A18.

[6] Leo Thorsness, "Are We Experienced a Prisoner's Mind?" *New York Times*, Sept. 14, 2008: 12.

一旦当选，总统及其内阁成员的所有公开言行更是时刻处于以媒体为代表的公众监督之下。美国总统与副总统素以能言善辩著称。但口误或词不达意之事时有发生，并在报纸的声讨之中演变成为总统等人偏离德治仁政轨迹的证据。敏锐的政治观察家发现，以总统为首的美国政界正将言辞用来“掩盖，而不是解释行动”，愈发远离孔子提出的“正名”理想。^[1]1973年，代理国防部长威廉·P. 克莱门茨（William P. Clements）在明知日本无权向海外派兵的情形下，鼓动日本加强自卫力量，保护石油运输线，而且言之凿凿：“子曰，规则就是用来被打破的”，引来朝野抗议。^[2]1975年，美国副总统反对禁枪，声称80%的民众持相同立场。有舆论愤而以杜撰的孔子语录加以抨击：“谎言、该死的谎言和民意调查”。^[3]

两位布什总统都曾因为言辞问题引发争议连连。老布什爱好狩猎，尤喜射杀鹌鹑。当被问及这一嗜好时，面对镜头的布什辩称，他没有猎杀动物，因为“它们是鹌鹑”。此言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评论者抨击道，布什显然忘记了孔子对于政治家用词精准的要求：“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评论结尾揶揄道，用孔子名言为1988年画上句号是再好不过的了。^[4]成功问鼎白宫的老布什极力打造“教育总统”的形象，其努力却因为一次含糊其辞的记者招待会而差点功亏一篑。记者请布什评论苏联改革运动的前景，总统的回答吱吱呜呜，了无实质内容。批评者相信，以孔子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

-
- [1] Jonathan Yardley, "The Indian Summer of Gore Vidal," *Washington Post*, Nov. 20, 1988: B03.
- [2] Michael Getler, "Clements Sees Some Spending Increase," *Washington Post*, Jun. 14, 1973: A14.
- [3] Thomas H. Henning, "Gun Poll," *Chicago Tribune*, Nov. 16, 1975: A4.
- [4] Edwin M. Yoder, Jr., "Master's Words..." *Washington Post*, Jan. 1, 1989: B7; Edwin M. Yoder, Jr., "As the Year Waned, So Apparently Did the State of the Languag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Jan. 4, 1989: A15.

措手足”（《论语·子路》）观之，布什的讲话方式表明其思路不清，可能给学生和民众树立不良榜样。^[1] 布什的支持者不以为然，认为前述评论用孔子理想要求总统实属吹毛求疵，口才与执政能力并无直接关系。^[2] 然而，老布什因为言辞引来非议绝非仅此一次。1992年，有一场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之后的布什来到休息室，对记者会偏离预定程序勃然大怒。没有关上的麦克风却将布什的粗言秽语传到了坐满记者的会议室。布什因而再次成为违背孔子礼仪的典范。^[3]

而从小布什竞选开始，媒体便注意到其语言弊病。语病如此之多，以至于报纸希望，在入主白宫以后，小布什能够“促使国会大幅增加用于美国总统教育的拨款”。此外，小布什还可以聘请一名深得孔子“正名”思想精髓的人，用做家教。^[4] 成为总统之后的小布什，似乎在语言方面没有好转的迹象，屡遭报纸诟病。如在“9·11”恐怖袭击以后，布什在提及“恐怖分子”一词时界定模糊，应对恐怖威胁有武断简单之嫌。评论声称，这是孔子言论“名不正……刑罚不中”的具体写照。^[5] 克林顿虽然在自身言辞方面没有多少非议，但他要求美国社会摒弃政治战争言论的讲话却被视为缺乏彻底变革决心之举。依孔子之见，如欲变革社会，必先正名。美国的战争言辞遍布社会每个角落，克林顿只关注政治领域，未能把握全局，因此仍与孔子要求存在差距。^[6]

与此同时，总统及其阁僚理应道德高尚，率先垂范。孔子在此方面的论述非常丰富，总统阁僚的高谈阔论也不少见。比如，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阿尔·戈尔就曾在国际论坛上，大谈反腐的必要性，并且

[1] Ken Adelman, "A President Astray with Words," *Washington Times*, May 9, 1990: F3.

[2] David L. Wilkinson, "In Defense of Bush's Spontaneous Syntax," *Washington Times*, Jun. 8, 1990: F4.

[3] Mark Muro, "Anybody Listening?" *Boston Globe*, Feb. 6, 1992: 61.

[4] Scott Ostler, "Bush Wrestles with English, Lose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Feb. 15, 2000: A2.

[5] Jonathan Yardley, "Fighting Words," *Washington Post*, May 23, 2006: C8.

[6] "Stop War Metaphor from Further Spread," *New York Times*, May 3, 1995: A22.

引用孔子等人为据。^[1]但接二连三的总统丑闻频繁曝光，将总统卷入了道德是非的漩涡之中。1973年，水门事件致使尼克松丧失民心。针对尼克松竭力挽回颜面之举，《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以孔子名句“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作答。^[2]1986年，伊朗门事件浮出水面，美国政府被指与恐怖分子暗做交易，举世哗然。时任总统的里根默许相关部门阻挠调查，欲盖弥彰，致使里根的信誉急剧下降。《波士顿环球报》建议，里根和内阁部长应该铭记孔子语录：“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论语·颜渊》）^[3]国务卿乔治·P. 舒尔茨则在利用孔子，回避尴尬处境。据报道，在伊朗门调查报告出炉之时，舒尔茨正在中国，从孔子故居出发，进行着“缓慢轻松的火车旅行”。他因此可以拒绝记者的所有提问。^[4]克林顿第一届任期内，众多高官因为行为不当而接受调查。舆论认为，克林顿难逃失察之责，但却极力为自己开脱，忽视孔子“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论语·子张》）的忠告。深受孔子影响的孟子则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孙丑上》）。评论者劝告克林顿，“切勿将中国古代圣人的智慧视作长发哲学家天真幼稚的夸夸其谈”。克林顿如想连任，必须正视孔子等人的真知灼见。^[5]

但性丑闻无疑是克林顿最受关注的道德污点。丑闻之中的克林顿矢口否认所有指责，缺乏开诚布公的勇气。《华盛顿时报》的一名作者对此难以容忍，敦促克林顿学习与孔子一脉相承的孟子笔下的齐宣王。《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因此，假如克林

[1] John Elvin, "Washington in Brief," *Washington Times*, Apr. 5, 1999: 34.

[2] Charles W. Yost, "People without Faith,"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0, 1973: 18.

[3] David Nyhan, "Reagan's Self-Inflicted Wounds," *Boston Globe*, Dec. 7, 1986: A25.

[4] David K. Shipler, "Shultz, His Tiger and His Tail," *New York Times*, Mar. 11, 1987: B6.

[5] Richard Littell, "Confucius Could Have Told Him," *Washington Times*, May 29, 1995: A21.

顿真诚忏悔，美国民众必将与孟子一样，原谅其道德瑕疵。^[1]《芝加哥论坛报》刊文宣称，在亟需“坚强道德领导”之时，美国人却成天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性丑闻报道。根据孔子的设想，身处权力塔尖者必须最具美德。克林顿的性丑闻必然“影响其形象，干扰其判断”，危及国家利益。^[2]伊利诺伊州莱克县学院（College of Lake County）的数名哲学教授举行化妆辩论，借用古代圣人之口评判克林顿的性丑闻。扮演孔子角色的教授说，“在我的国家，皇帝可以嫔妃成群，但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幸的是，对于克林顿先生而言，华盛顿的实习生不是妃子”。^[3]《华盛顿邮报》相信，虽然孔子生活于2500多年前，他要求统治者道德诚信的思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更多的美国政府官员阅读孔子，并且熟记于心，我们可能就不会经历莫妮卡·莱温斯基和比尔·克林顿之年”。孔子所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精确预见了20世纪末的克林顿事件。^[4]第一夫人希拉里对待此事的态度也令媒体大为不满。希拉里为丈夫辩解道，克林顿年幼时，母亲和祖母为其培养方式争吵不休，克林顿因而养成迎合他人的习惯，与各种女性有染就是习惯使然。媒体不禁质疑，假设情形如此简单，孔子等圣人的说教还有何用处？^[5]

总统施政方略的得失也会因为孔子的映衬而纤毫毕现。约翰·肯尼迪以所谓孔子语录“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精神，奠定美国太空事业的基础，为后世所称道。^[6]越南战争是数届政府的败笔。反战与

[1] “Some Advice for President Clinton from a Chinese Sage,” *Washington Times*, Feb. 6, 1998: A20.

[2] Richard S. H. Mah, “Morality and the White House,” *Chicago Tribune*, Mar. 5, 1998: 20.

[3] Denise Thornton, “Impeach Clinton? What Would Jefferson or Plato Say?” *Chicago Tribune*, Nov. 5, 1998: 3.

[4] T. R. Reid, “Confucius for President,” *Washington Post*, May 30, 1999: W18.

[5] Georgie Anne Geyer, “The Evolution of Hillary Clinton’s Feminism,” *Chicago Tribune*, Aug. 6, 1999: 27; Georgie Anne Geyer, “Blended Brand of Feminism,” *Washington Times*, Aug. 9, 1999: A15.

[6] Bill Prochnau, “Trumpets of a Double Sonic Boom Proclaim the Columbia’s Arr,” *Washington Post*, Apr. 15, 1981: A2.

论否认政府的道义之说，坚称孔子曾说，“如果有人前来为你行善，你必须立即逃离，以便自救”。越南就是必须逃离美国“善举”的国家。^[1]为保护本国石油公司，美国政府从1959年开始，对进口原油实施配额制，导致美国油价持续走高。20世纪70年代，配额制已经严重影响美国经济，要求废止的呼声十分高涨。但反对增加进口的本国石油公司却辩解道，“如果孔子生活在当代美国，他一定会说出如下至理名言：‘只要你不依赖外国石油，外国石油就会便宜’”。^[2]福特政府出于应对通货膨胀之需，特征收5%的附加税。舆论认为，福特在铤而走险，挑战民意。“孔子”的警告是，“咬子弹的人会打掉嘴唇”。^[3]

罗纳德·里根赢得大选之初，政策走向尚不明朗。报纸甚为担忧，特地引述孔子语录，为即将步入白宫的里根指点迷津。作为“里根总统政策顾问”，孔子建议：“足食，足兵，民信”应为新政府的政策重点；“恶乎佞者”（《论语·先进》）作为用人原则；至于死刑争议，则可参照“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教育必须受到重视，因为“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絮静精微，《易》教也”（《礼记·经解》），等等。^[4]上任之后，面对纷杂政事的里根似乎手足无措。报纸鼓励里根吸取孔子等人的智慧，声称这“比成堆的备忘录和报告更为有效”。^[5]里根任命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为国务卿，受到报纸批评。黑格咄咄逼人，好以自我为中心。这有悖于孔子树立的理想为政风格：“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

[1] Ruby Edwards, “Flee That Man,” *Los Angeles Times*, Feb. 17, 1972: D6.

[2] Robert A. Rosenblatt, “Oil Import Foes Change Tune But Keep Words—U. S. Security,” *Los Angeles Times*, Apr. 9, 1972: F1.

[3] “Letter to the Editor,” *Los Angeles Times*, Oct. 13, 1974: G2.

[4] Melvin Maddocks, “Confucius Goes to Washingt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4, 1980: 22.

[5] Ross K. Baker, “Confucius Say: Politics Can Put Square Peg in Oval Office,” *New York Times*, Jan. 20, 1981: 31.

我。”(《论语·子罕》)^[1]克林顿上台之后,并未带来美国人所期望的变革,特别是在医改方面。究其原因,则是克林顿只求平稳、不愿革新图治所致,成为报纸文章中僵化信奉孔子中庸之道的典范。^[2]美国政府长期游离于国际刑事法庭之外,虽然避免了美国公民受到审判,却让美国在通过法律渠道阻止武器扩散方面力不从心。有人因此建议,美国加入国际刑事法庭,为时不晚,因为“孔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3]

在多元文化盛行的背景之下,孔子本人及其代表的弱势群体是否受到重视,时常是报纸评判总统政策得失的重要依据。里根政府的首任内政部长詹姆斯·G. 瓦特(James G. Watt)发现,每年的独立日庆典,摇滚乐队都会出现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但这既显嘈杂,又缺少爱国氛围。因此,瓦特计划让军乐队取而代之。该项提议遭到抨击,被视作歧视青年文化之举。里根总统和夫人也认为,瓦特的倡议确有不妥。批评舆论建议瓦特听从孔子箴言“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让正统音乐的爱好者自我消遣,让摇滚乐队进入国家广场。^[4]1997年,克林顿提名李亮畴(Bill Lann Lee)为助理司法部长,却横遭阻挠。声援者指责李亮畴的对手动机不纯,相信李是真正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实践着孔子的“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5]上台之初,奥巴马就在讲话中盛赞包括孔子在内的不同文化的精神导师,赢得媒体好评。^[6]而在2001年,副总统切尼的夫人反对在学校教育中增加孔子等非主流文化成分。报纸使用“火冒三丈”(saw red)加以形容,可见对于切尼夫人的态度。^[7]

[1] Harlan Cleveland, "The Analects of Alexander Haig,"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7, 1981: 23.

[2] "Letters to the Chronicl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n. 27, 1993: 2.

[3] "The Iran Question," *Washington Times*, Mar. 2, 2007: A18.

[4] Henry Mitchell, "Any Day," *Washington Post*, Apr. 8, 1983: B1, B3.

[5] "Foothold for Others," *New York Times*, Nov. 10, 1997: A30.

[6] Todd J. Gillman, "Obama Inclusive in Faith Message," *Dallas Morning News*, Feb. 6, 2009: 8A.

[7] "Cultures Clashing?" *Washington Times*, Nov. 7, 2001: A2.

在孔子思想里，统治者必须具备高尚品德和完美人格。以孔子笔下的理想境界要求美国总统，是报纸监督总统及其阁僚的特殊形式。而在孔子思想的对照之下，总统及其下属官员在品行、能力和施政策略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一目了然。孔子不失为报纸督促总统实施德治仁政的有效话语工具。

二、孔子与最高法院

从理论上讲，最高法院是美国政治的评判者，应该置身政治漩涡之外。但实际上，正因为时常涉及政治纷争，最高法院又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政治的组成部分。由于被美国各级法院奉为古今重要立法者之一，孔子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涉及最高法院的政治争论。在新保守主义思潮笼罩的当今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势头强劲。宗教信仰权利之争此起彼伏。最高法院摆放的立法者雕像多有宗教色彩，从而处于信仰争论的风口浪尖。比较而言，孔子比其他立法者——如穆罕默德和摩西等，具有更强的世俗色彩，因此成为用以支持最高法院政教分离原则的有力武器。所以，最高法院的孔子雕像事关美国政体的宗教走向，重要性不言而喻。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旨在确立国教或损害信仰自由的法律。政教分离原则从此固定。然而，人们总能在政治生活中发现与此精神相悖的情形。比如，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 (John Ashcroft) 每日 8 点必然阅读圣经，引起争议。虽然阿什克罗夫特政绩斐然，他还是被视作“危险的原教旨主义者”。如果他每天学习孔子，民众反应可能大不一样。^[1] 总统在就职仪式和其他重要场合也在祈祷上帝保佑美国。^[2] 更令宗教支持者难以

[1] Mona Charen, "Prayer Patrol Circles Justice," *Washington Times*, May 17, 2001: A16.

[2] Benjamin Tyree, "Ceremonial Symptom of Schizophrenia," *Washington Times*, Jan. 18, 1997: D1.

理解的是，作为“华盛顿最威严的机构之一”，美国最高法院审判庭的壁缘上树立着穆罕默德、摩西、所罗门国王和孔子等“宗教形象”。当法官步入法庭，人们的问候语也是“上帝拯救美国和令人尊敬的法庭”。^[1]除了塑有孔子等人的雕像之外，最高法院还会因为宗教节日而变更庭审日期。^[2]基督十诫赫然刻于主审判庭的各个大门之上，但最高法院的所有法官对此绝对三缄其口。^[3]

以最高法院的所谓自相矛盾为借口，基督教的狂热信奉者频频发起攻势，挑战政教分离原则。最高法院给予有力反击。多数舆论积极行动，力促最高法院立场鲜明。1979年，最高法院拒绝就美国货币印有“我们笃信上帝”之语是否合法作出判决。舆论大为不满，质问最高法院，既然允许有明显基督教意义的上帝存在，为何不让孔子、菩萨和穆罕默德等人成为美国的上帝。^[4]受民意氛围的影响，80年代以后的最高法院在维护政教分离原则时的态度更加坚决。反击和声援的支撑点之一就是孔子，因为孔子雕像出现在最高法院，并非其宗教内涵所致，而是其在立法领域的贡献。就报纸反映的情况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高法院主要经受了三次针对政教分离原则的挑战。

亚拉巴马州法官罗伊·穆尔(Roy Moore)的“基督十诫”事件乃其中之一。1995年，时任该州埃托瓦县(Etowah County)法院法官的穆尔，在其审判庭摆上手工雕刻的“十诫”木匾。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5]随后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责穆尔违背政教分离原则，要求拆除木匾。此事一经曝光，立刻激起如潮争议。虽然穆尔不乏支持者，但反对舆论显然占据上风。针对穆

[1] Julia Duin, "Religious Symbols Grace High Court," *Washington Times*, Nov. 13, 1997: A2.

[2] Julia Duin, "Court Celebrates Christmas," *Washington Times*, Dec. 18, 1997: A4.

[3] John McCaslin, "A Nation inside the Beltway," *Washington Times*, Jun. 23, 1999: A9.

[4] Troy Soos, "One Nation, Not under God," *Chicago Tribune*, Jun. 25, 1979: C2.

[5]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总部设在纽约，前身是成立于一战期间的全国公民自由局(National Civil Liberties Bureau)。联盟的宗旨是通过发起诉讼、推动立法和开展社区教育，捍卫美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到2010年，联盟共有超过50万成员。

尔以最高法院的所谓先例为幌子，反对者一致认为，进入最高法院雕像之列的均为立法者，并且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穆尔以法官身份，唯尊基督，与政教分离背道而驰。

1997年，一家联邦法院命令穆尔移走“十诫”木匾，遭到穆尔拒绝。亚拉巴马州州长公开支持穆尔，声称他在“捍卫全体美国人的自由”。《达拉斯晨报》刊文反驳道，州长和穆尔“并非真正需要宗教自由”。文章深信，如果有谁如同最高法院一样，在穆尔的坐椅上方挂上孔子语录牌匾，满嘴宗教自由的人定会“大发雷霆”。^[1]秉持保守主义的美国国会议员也在众议院为穆尔摇旗呐喊，提交声援决议案。但刊载此事的报道却认为，摩西的确现身美国最高法院，但其身份是立法者，并与孔子等人相互并列，与穆尔事件没有可比性。^[2]另一评论指责说，穆尔及其声援者违反设在亚特兰大的美国地方法院在1993年确立的司法惯例，即唯有与其他法典一道，十诫才能公开展示。最高法院包括孔子在内的立法者雕像就属此类，而穆尔的举动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3]

穆尔事件不仅久拖不决，穆尔甚至在2000年当选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经历升迁之喜的穆尔将其基督情结发挥到了极致。2001年，穆尔在州司法大楼的大厅里，树起了巨大的十诫花岗岩纪念碑。联邦上诉法院随后裁定，纪念碑必须搬离公众视线。捍卫政教分离的呼声再次蜂拥而至。虽然穆尔最终决定执行判决，其支持者却愤懑难平，指责最高法院已有先例。反驳者依然坚持，在最高法院的内外壁缘，“摩西不是独自一人”，与他并肩站立的是其他17位伟大的立法者，“包括在学说中强调和谐、学识和美德的中国哲学家孔子”。^[4]

[1] Myrle Roe, "No Religion Fits All Believers," *Dallas Morning News*, Apr. 20, 1997: 7J.

[2] Katharine Q. Seelye, "House Republicans Back Judge on Display of 10 Commandments," *New York Times*, Mar. 5, 1997: A16.

[3] Tom Teepen, "The Latest Christian Soldier,"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Apr. 20, 1997: R3.

[4] Courtland Milloy, "Standing Alone, Commandments Fail Secular Test," *Washington Post*, Aug. 24, 2003: C1.

抨击舆论披露，穆尔的真实目的在于将犹太基督教上升为“美国法律的‘道德基础’”。如果“在夜深人静时并在其他法官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安置的“罗伊石”能够逃脱宪法制裁，“禁止确立国教的规定就真的毫无意义”。^[1]另一评论将十诫纪念碑事件定义为民主与神权政治之争，称呼穆尔为“亚拉巴马的摩西”，并且坚信，他与最高法院墙壁上有孔子陪伴的摩西本质迥异。^[2]在众多美国民众看来，与孔子并列于最高法院墙壁上的摩西只具有历史和世俗意义，没有宗教色彩。穆尔仅仅展示十诫之举实则绑架政府，支持基督教。这为宪法所禁止，因而是非法的。^[3]穆尔打着反世俗化旗号，混淆最高法院和自己所作所为的区别，甚至否认第一修正案适用于联邦各州。对于支持宗教多元化的美国人而言，他不止是在挑战政教分离，更是在亵渎制定宪法的立国之父，因此令人难以容忍。^[4]

在穆尔案件之后，得克萨斯和肯塔基也出现了挑战政教分离原则的事件。得克萨斯州议会广场树立着六英尺高的十诫石碑，而在肯塔基州的两家县法院，墙壁上悬挂着十诫字幅。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再次发难，并于2005年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此事成为最高法院自2003年穆尔败诉以后首次受理的涉及政教分离的案件。同样，最高法院的摩西和孔子雕像被控辩双方和主审法官频繁提及，引为证据。^[5]事件影响范围之广，以至于新保守主义色彩浓厚的小布什政府都不能置身事外。在发给审判法官的公函中，布什政府引用最高法院的先例，敦促

[1] Cathy Young, "A Monument to Religious Extremism," *Boston Globe*, Sept. 1, 2003: A15.

[2] Ellen Goodman, "The Chief Justice Doth Protest Too Much," *Boston Globe*, Aug. 28, 2003: A23; David Rensberger, "Commandments Force-Fed,"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Oct. 3, 2003: A19.

[3] "Letters to the Editor," *Dallas Morning News*, Aug. 26, 2003: 16A; "Letters,"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Sept. 7, 2003: F7.

[4] "Justice Moore Goes Too Far," *Washington Times*, Sept. 7, 2003: B5; Cathy Young, "Secularism Gone Awry in Battle over La's Seal," *Boston Globe*, Jun. 5, 2004: A11.

[5] Charles Lane, "Division of Church, State at High Court," *Washington Post*, Mar. 3, 2005: A3.

法官允许当事机构展示十诫。^[1]

但反对者大有人在。他们认为，最高法院的雕像中，摩西与孔子等人一道，让人立刻能够确认其立法者身份。^[2]赞同此说者进一步指出，当事机构及其支持者用最高法院作类比，“纯属愚昧”。其真实动机是在“哀叹如下事实，基督教信仰已经无法主宰我国文化中的主要制度和其他力量”。^[3]一名报纸读者直呼拥护公开展示十诫的人为“宗教极端主义者”，指责他们表面尊重历史，实则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于人，与最高法院处理摩西和孔子等人的方式不可同日而语。^[4]最高法院的判决认可前述说法，重申政教分离原则。法官判定，肯塔基州两家县法院展示十诫的行为违宪，因为其“根本目的”是宗教。而得克萨斯州议会的十诫石碑则因为有其他 17 座雕塑作为陪衬，从而不会让人产生政府支持某种宗教的错觉，得以保留。有关报道赞赏说，“最高法院正确辨别出意在尊重法治的中立展示和在公共场合推销宗教信息的展示之间存在的区别”。^[5]

受多元文化和社会上大为增强的宗教意识的双重刺激，美国的穆斯林也加入到挑战最高法院立法者雕像的行列。虽然表面上意在主张特定群体的利益，抗议的真实目的却是促使最高法院更改雕像，作出有利于伊斯兰教徒的决定。所以，实质上，政教分离原则仍然是问题的核心。自 1935 年以来，穆罕默德就一直位列最高法院古今立法者之中。但在 1997 年 3 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提出抗议，宣称左手拿古兰经、右手握剑的穆罕默德雕像具有冒犯性，因为它将穆

[1] Linda Greenhouse, "The Ten Commandments Reach the Supreme Court," *New York Times*, Feb. 28, 2005: A12.

[2] Guy Taylor, "Religious Displays Debated in Court," *Washington Times*, Mar. 3, 2005: A1.

[3] Walter C. Bouzard, "Commandments on Display? It's Not Written in Stone," *Chicago Tribune*, Feb. 20, 2005: 3.

[4] "Readers Writ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Mar. 7, 2005: A8.

[5] "Our Opinions,"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Jun. 28, 2005: A10.

斯林刻画为“褊狭的征服者”。委员会遂要求最高法院予以更正。^[1] 尽管加入抗议行列的穆斯林组织增加到16个之多，最高法院拒绝了此项要求。拒绝的理由与孔子有关：穆罕默德只是18位“伟大的立法者之一”，与他并肩而立的还有孔子等人；而且，雕刻是艺术，不代表宗教信仰，因此不能按照宗教规范进行修改。^[2] 一篇评论很快捕捉到了这一决定的政治寓意。作者写道，从法院的回复来看，“政府礼待宗教的最好办法，就是平等尊重所有宗教，避免顾此失彼”。^[3] 一年之后，此次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是“短暂的争论”，“引起的公众抱怨极少”。^[4] 其言下之意，就在强调最高法院不应卷入宗教纷争，而应顺应民意，维护政教分离。

在上述争论中，孔子坚定了最高法院捍卫政教分离的决心，也是民众反对宗教偏袒的重要依据。孔子的两大角色得以充分发挥影响。其一，他是一个立法者，肩负监督社会秩序的责任。不论是以穆尔为首的基督教激进主义者，还是穆斯林群体，他们的要求一旦获准，就会打破美国数百年来形成的宗教平衡状态。用孔子说明事理，就能让主张特定宗教利益的人知道，因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与孔子在最高法院的墙壁上并肩而立，所以同样应该维护社会平衡，而非相反。其二，在多数情况下，孔子是世俗哲学的代名词。他与摩西和穆罕默德等宗教人物共同装点最高法院的墙壁，无形中冲淡了最高法院雕像的宗教色彩。最高法院及其支持者正是抓住了孔子的世俗身份，才有理有据地维护了美国的政教分离原则。总之，在报纸围绕最高法院的争论中，孔子的作用在于证明政教分离的正当性。

[1] "Muslims Raise Objections to High Court Sculpture," *Chicago Tribune*, Mar. 13, 1997: 5; Ernie Feda, "Sculpted Mohammed to Stay,"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Mar. 13, 1997: A16.

[2] Tamara Jones, "Supreme Court Won't Alter Frieze Depicting Muhammad," *Washington Post*, Mar. 13, 1997: B1; "India Cops Halt Crowd Decrying U.S. Statue," *Chicago Tribune*, Mar. 16, 1997: 16.

[3] Clarence Page, "Religious Offense Follows Political Clout," *Chicago Tribune*, Apr. 23, 1997: 17.

[4] Joan Biskupic, "Lawgivers," *Washington Post*, Mar. 11, 1998: H1.

三、孔子与国内政策

孔子的德治仁政理想不仅给总统及其内阁成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坚定了舆论支持最高法院政教分离判决的决心，对于日常的政治与政策同样具有典范意义。着眼于此，政治评论者假借孔子，针砭政治弊病，为政治行为确立更高的参照标准。具体言之，孔子监督之下的日常政治需要在用词清晰达意、风格以德为重而又贴近民意、涵盖人群多元而又包容等方面作出努力。这是报纸舆论以孔子为参照，对于美国日常政治的期望。

言辞精准既是孔子笔下的为人之道，亦为他对政治政策的基本要求。但报纸却发现，美国的日常政治生活充斥着遣词造句模糊随意的现象，无益于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舆论提醒，孔子（实为子贡）有言，“言不可不慎也”（《论语·子张》），政治人物“遣词造句应该极为小心”。^[1]用词不准首先导致交流不畅，频生龃龉。例如，在阐述“党派和原则立场”时，政治家习惯冠之以“最新研究表明”之语，显示言之有据，然而，如果去掉“这层权威光环”，就只剩下不言自明或者不知所云之物，与孔子和苏格拉底等人言简意赅的风格相去甚远。^[2]目睹很多联邦职员因为揭露政治痼疾而招致惩罚，曾是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加里·奥尔德里奇（Gary Aldrich）专门成立基金会，提供帮助。然而，大多数当事人语焉不详或模棱两可，徒增调查难度。奥尔德里奇呼吁，那些受到政府迫害的人应该勇敢站出来，陈清事实，铭记孔子的教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3]旧金山的查尔斯·黄（Charles Wong）新近获任所在小镇的计划委员

[1] Burton J. Hollister, "Mischief of Words," *Chicago Tribune*, Feb. 17, 1975: A2.

[2] Melvin Maddocks, "Studying Up on All the Latest Studi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12, 1984: 25.

[3] Stephen Goode, "Aldrich Says Everyone Needs to Speak Up," *Washington Times*, Sept. 13, 1999: 36.

会委员一职，但遭到邻居反对。邻居认为，黄在证照尚不齐全的情况下，擅自改建房屋和庭院，违背规章制度，因此不能胜任。她希望，黄能够学习孔子，言行一致。^[1]即使在国会的辩论中，议员们也总是东拉西扯，不着边际，讲究用词达意的孔子经常被断章取义，让人如坠云山雾海。^[2]而1985年退休的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局长乔治·贾西（George Jaszi）堪称清晰用词的典范。贾西将言辞精准作为全局上下的指导思想，并在书房墙壁上悬挂书写孔子“正名”语录的字幅，深得媒体赞赏。^[3]

语义含混不仅影响日常政治的话语交流，更会导致具有严重缺陷的政策条文。在地方政治层面，1991年，得克萨斯中北部各县计划将18条高速路变成收费公路，激起民愤。当地政府联席会议的交通局长辩解称，收费还停留在概念阶段。但评论者并不满意，敦促政府以孔子为榜样，理清概念，言行一致。^[4]2001年，波士顿“心怀好意的公仆”倡议，向公司出售该市公共场所的冠名权。《波士顿环球报》的读者来信批评道，“孔子很久以前就说过，名正才能言顺”，政府却不明白这一道理。以公司冠名的做法虽然具有短期经济效益，但割裂了“我们与城市的思想联系，因此是名不正之举，应予摒弃”。^[5]而在联邦层面，禁毒是美国政治的一大艰巨任务，但“毒品战争”之说有混淆视听之嫌，禁毒政策的实效性大打折扣。“战争”制造出措施已很严厉的错觉，而“毒品”所用的“drug”又有指代不明的弊端，该词既可表示“毒品”，也有“药品”之意。所以，禁毒如欲真显效果，孔子“正名”思想必须得到贯彻。这能让决策者知晓形势的严峻和打击

[1] Michael McCabe, "Planning Commission Uproar,"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Oct. 21, 1999: A19.

[2] Tony Snow, "Inquiry as Farce," *Dallas Morning News*, Jul. 11, 1997: 29A.

[3] Keith B. Richburg, "Retiring Economist Painted Big Picture," *Washington Post*, Jan. 21, 1985: A13.

[4] Larry Powell, "Planners Dream Up a New Way to Drive Us to Poorhouse," *Dallas Morning News*, Sept. 4, 1991: 22A.

[5] "Don't Litter with Company Names," *Boston Globe*, Feb. 2, 2001: A20.

的具体对象。^[1]2004年,联邦参议院就婚姻修正案展开辩论,同性婚姻的合法与否是争执的焦点。同性婚姻的反对方借用报纸撰文指出,孔子有“辞达”(《论语·卫灵公》)之言,而婚姻本为男女构成,同性结婚违背婚姻的正统定义,辞不达意,不可鼓励。^[2]另一文章赞同此说,认为既然孔子视婚姻为文明的基础,婚姻内涵就不应随意更改。^[3]美国人推崇有机食品,农业部对生产商的严格监管提供了有效的质量保证。然而,个人有机护理品领域却未被纳入监管范围,导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局面。信奉孔子“正名”学说的一家“自然香皂”生产商愤而将农业部告上法庭。农业部作出让步,决定在个人护理品领域“实施严格的有机食品标准”。^[4]

以德为重、贴近民意,此乃以孔子为依据的报纸舆论就日常政治提出的第二大要求。1973年的孔子诞辰日,《华尔街日报》刊文提醒,孔子所言“民无信不立”对于美国的当政者“具有特别意义”。^[5]报纸的字里行间会不时出现注重德治仁政的政治人物。1991年,作为“(联邦)政府最显赫的会计职位之一”,证券交易委员会总会计师出现空缺。委员会主席为此确定了遴选标准:兼具孔子、超人和匈奴王的品质。^[6]美德、精力和果敢集于一身者的确难以寻觅。直到一年以后,总会计师人选才浮出水面,成为满足三大条件的人。^[7]加州圣何塞警察局长约瑟夫·麦克纳马拉(Joseph McNamara)严于律己,公正执法。记者探究其行为根源时发现,在麦克纳马拉办公室,摆放着一尊孔子

[1] Jim Guirard, Jr., “Tough Talk for the Narco-Wars,” *Washington Post*, May 13, 1990: C5.

[2] “Vox Pop,” *Dallas Morning News*, Jul. 12, 2004: 11A.

[3] Robert Knight, “We’re Smarter Than God,” *Washington Times*, Jun. 4, 2010: B1.

[4] Jessica Merrill, “Is It Organic? Well, Maybe,” *New York Times*, Oct. 20, 2005: G1.

[5] Herlee Creel, “A Birthday Toast to Confucius,”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 28, 1973: 8.

[6] Alison Leigh Cowan, “S.E.C. Expected to Appoint an Interim Chief Accountant,” *New York Times*, Jan. 23, 1991: 68.

[7] Kevin G. Salwen, “SEC Renews Call for Pressure on Banks and S&Ls to Update Accounting Rules,” *Wall Street Journal*, Jan. 8, 1992: A3.

雕像。麦克纳马拉深受鞭策，时刻以孔子为典范。^[1]2007年，旧金山市长因为工作失职，面临下台危险。民众给报纸去信，为其求情，声称市长善施德政，政绩颇佳，一次错误不足以否定所有品德。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历来注重美德修养的市长因此应有改过自新的机会。^[2]

政策措施关注民意、显示仁政者也时有所闻，获得舆论首肯。例如，1975年末，酗酒终于不再是纽约市的一项罪名。民众欢欣鼓舞，认为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而且孔子等人也赞同适量饮酒。^[3]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署（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力促司机使用安全带。宣传手法新颖别致，电视广告等传媒自不待言，甚至华人餐馆的幸运签饼都已派上用场。签饼里的字条写着，“子曰，系安全带的人有面子”。即使某些人在其他方面颇有微词，却也认可如此贴近日常生活的宣传方式。^[4]1993年，正值美国经济下滑，就业形势严峻。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市（York）利用政府拨款，创造96个就业机会。这在很多人看来，虽然杯水车薪，但体现出孔子语录“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精神，值得肯定。^[5]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某位众议员提议削减军费，减少联邦赤字，据称受到孔子启发。^[6]

有违德政轨迹的政策行为则因为孔子而暴露无遗。华盛顿地铁董事会本在酝酿票价上涨，却因临近选举日而人人噤若寒蝉，有违孔子

[1] David A. Sylvester, "Ex-Cop at Hoover Not the Retiring Typ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Nov. 27, 1992: A23.

[2] "Letters to the Editor,"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Feb. 7, 2007: B8.

[3] John L. Hess, "Hangover Will Be the Only Penalty," *New York Times*, Dec. 31, 1975: 25.

[4] Caroline E. Mayer, "You're in Really Good Hands with NHTSA," *Washington Post*, Jan. 29, 1982: A19; "Washington Wir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5, 1982: 1.

[5] William Claiborne, "Slumping Cities Welcome 'Even a Handful of Jobs,'" *Washington Post*, Apr. 16, 1993: A6.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出自《老子》第六十四章，但常被美国人误作孔子语录。

[6] Ernie Freda, "Washington in Brief,"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Apr. 2, 1992: A10.

的诚信为政美德。^[1]用于地铁建设的华盛顿土地分区政策涉嫌受利益集团控制，毫无公正可言。舆论模仿孔子的口吻警告，“一次让步可引来一千次妥协”。^[2]政治人物相互攻讦现象极为普遍，如马里兰州州长助手攻击该州议员为“猴子”。对手反击说，“我认为孔子是对的，因为他说，‘称呼议会为猴子的人将自己变成了蠢驴’”。^[3]1985年，首都华盛顿的公共卫生局长以权谋私，聘请大学同学担任专职顾问。此人不但并非专职，其提交的报告也粗制滥造，充斥着与公众健康毫不相干的孔子语录。报告耗时七月，报酬不菲。来自佐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麦克·马丁利（Mack Mattingly）愤而动议，将给华盛顿的拨款数额削减350万美元，取得成功。马丁利讽刺道，“我们可以为哥伦比亚特区政府购买孔子著作……所需费用大大低于38000美元（局长同学所领报酬）”。^[4]此事余波难平。时隔一年之后，华盛顿人力服务局局长仍然耿耿于怀，称前述文件为“我所见过的最令人尴尬的报告”。^[5]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陷入经济萧条，各种应对措施纷纷出台。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注资，拯救受困企业。但反对意见指出，问题的症结不在资金，而在极为混乱的企业管理。照当时情形，即使孔子和苏格拉底等圣人亲自监督，资金投入也不可能立即有效。^[6]1996年，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宣布，州议会大厦不再悬挂内战中代表南部分裂各州的邦联旗帜。虽然拥护者甚众，决定仍然招徕批评之声。责难者表示，既然孔子都认为，青少年需要教化，邦联旗帜的消失将让该州失去极好的教育素材。群体健忘将随之而来，却“无法根治南部的历史痛苦”。^[7]来自康涅狄格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

[1] “What’s the Fairest Fare of All?” *Washington Post*, Feb. 18, 1978: A16.

[2] Benjamin Ronis and William Rucker, “Interpretations Touch Church and Metro Line,” *Washington Post*, Oct. 21, 1972: D1.

[3] “Delegate Says He’s No Monkey,” *Washington Post*, Jan. 28, 1976: B5.

[4] Sandra Evans, “Tighter Reins Urged on City Consultants,” *Washington Post*, Sept. 11, 1985: C7.

[5] “Questions about Conduct,” *Washington Post*, Aug. 3, 1986: A14.

[6] “Business ‘Leadership,’”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13, 1974: 12.

[7] Allan Gurganus, “At Last, The South Loses Well,” *New York Times*, Dec. 8, 1996: E15.

Dodd) 出言不逊, 指责居家母亲不愿外出工作, 是在享受清闲。抨击者反驳曰, 母亲在家照看儿童, 事关社区和国家的强大。多德不顾这一“与孔子同样古老的经验”, 而是紧随“淫荡的老成功女神”, 实属不智。^[1] 纽约市长迈克尔·R. 布隆伯格 (Michael R. Bloomberg) 也时常非议缠身。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罗伯特·M. 摩根索 (Robert M. Morgenthau) 就是批评者之一。2009 年 12 月, 摩根索与瑞士信贷集团达成谅解, 后者因为被控帮助伊朗进入美国金融市场, 同意支付 5.36 亿美元, 其中 1.3 亿归纽约市。但布隆伯格指责摩根索办公室在秘密账户私存数千万美元, 逃避金融审查。摩根索反戈一击, 劝告布隆伯格学习孔子的待人美德, 不要吹毛求疵。^[2]

在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背景之下, 讲求以人为本的孔子为美国政治提出了关注亚文化的为政准则。此乃日常政治需要满足的第三大要求。假借重视多元文化之名而行沽名钓誉之实的政治行为总是人们抨击的目标, 从一个侧面表明当代美国社会的文化多元意识。纽约市政委员苏珊·D. 奥尔特 (Susan D. Alter) 就是如此一人。奥尔特把所谓的孔子名言“百闻不如一见”应用到了极致。据称, 她每到一处非白人社区, 都会抢占镜头中心位置, 以便民众知晓她在关注弱势群体。但很多时候, 奥尔特只能“笨拙地挤入摄影师的取景框”。^[3] 1993 年任纽约市长的戴维·N. 丁金斯 (David N. Dinkins) 也有作秀嫌疑。竞选团队“有时必须挤出丁点时间, 针对特定选民, 制造机会, 让市长躬身前往”。如某日下午, 按照安排, 丁金斯来到中国城, “为落成已经 10 年的孔子雕像再次举行落成仪式”。评论者揶揄道, “丁金斯

[1] Paul Greenberg, “Badmouthing Full-Time Moms,” *Washington Times*, Mar. 5, 1998: A16.

[2] John Eligon and Ray Rivera, “A Settlement, But No End to Mayor-Morgenthau Rift,” *New York Times*, Dec. 17, 2009: 43; John Eligon, “As Rein Dwindles, Morgenthau Ponders What Comes Next,” *New York Times*, Dec. 28, 2009: 20.

[3] Sam Roberts, “Maybe a Picture Can Be Worth 1 000 Votes Too,” *New York Times*, Jul. 2, 1990: B1.

先生头脑敏捷，知道可以依靠哪些社区”。^[1]加利福尼亚州长皮特·威尔逊 (Pete Wilson) 是另外一位口是心非的多元文化主义者。每逢选举前夕，威尔逊必定前往旧金山中国城的孔子庙，既为企求神灵相助，更为拉取华人选票。报纸讽刺道，“神没有让他失望”。^[2]然而，一旦大权在握，威尔逊却对加州的多元文化教育和考试严加阻挠，不惜取笑曾经多次膜拜的孔子。^[3]2009年10月，旨在纪念孔子诞辰的联邦众议院784号提案曾让多元文化主义者精神振奋。但据报纸披露，这不过是又一次政治操控。时值众议院辩论空隙，需要某种无足轻重的提案打发时间，故而784号出笼。就连发起提案的民主党人也承认此说。共和党众议员更是不屑一顾，指责提案占据讨论医保法案的时间。^[4]尽管纪念法案最终获得众议院通过，其提出背景却与多元文化联系薄弱。

言及轻视文化多元的政治行为，舆论自然不会吝嗇批评之词。1982年，总统提议，学生在每天早上都需祈祷，意在巩固基督教的文化垄断地位。意见相左者指出，此举忽略少数族裔利益。如果真正需要祈祷仪式，祷文应该使用孔子和耶稣等人均有提及的黄金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你要人家怎样待你，你也怎样待人”。^[5]美国众议院解决枪支泛滥问题的举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按照众议院的思路，如果在全国所有教室贴上基督十诫，枪支痼疾随之而去。但这一策略据信有歧视少数族裔文化之嫌，因为“其言下之意是，印度

-
- [1] Alan Finder, "Group by Group, Dinkins Seeks to Unite Support," *New York Times*, Oct. 6, 1993: B4.
- [2] Susan Yoachum, "Wilson Visits Chinatown for Luck,"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 4, 1993: A11.
- [3] Robert B. Gunnison, "'Pork-Barrel Problem,'"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 21, 1997: 5, Z1.
- [4] S. A. Miller, "Work Flow Slows to Crawl on House Floor as Lawmakers Await Health Bill," *Washington Times*, Oct. 29, 2009: A3; Jennifer Harper, "Nation inside the Beltway," *Washington Times*, Nov. 3, 2009: A8.
- [5] H. J. Oettinger, "Golden Rule for Public School Pupils," *Chicago Tribune*, Jun. 16, 1982: A18.

教徒、佛教徒、巫术崇拜者和孔子的追随者更有可能购买半自动步枪”。此策一出，必然引发混乱，“没有道德教训可言”。^[1]2004年，时任联邦参议员的希拉里·克林顿出言不敬，在密苏里州参加民主党筹款会时，称呼印度精神领袖甘地为“在圣路易斯开加油站的家伙”，引发民怨。在随后的道歉中，克林顿认为民众存在理解错误，对于民众愤怒有如火上浇油。舆论直呼克林顿为“滑稽演员”，并且揣测，她下一步会拿孔子和教皇开涮。^[2]

即便是披着神秘面纱的中央情报局，也为其忽视多元文化而承受着舆论压力。观察家宣称，该局过分强调秘密手段，无心顾及从多元文化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是导致情报频繁失误的重要原因。所以，中央情报局应该研究圣经、古兰经和孔子著作等，“为总统提供视野开阔的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建议”。^[3]与此不同的是，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唐纳德·H. 拉姆斯菲尔德尚未上任，就已经知晓孔子等人对于情报搜集的重要性。他希望，情报人员听从孔子劝告：“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4]

文化多元不仅事关少数民族，也与各种亚文化息息相关。借用孔子的影响力主张亚文化生存权利的事例总有所闻。比如，曾经参选总统的鲍勃·多尔（Bob Dole）参议员宣称，青少年喜爱的音乐危及社会固有秩序。反对者则认为，孔子和柏拉图都确信，如果应用得当，音乐可以促进心灵虔诚和平和，青少年的音乐文化有其存在理由。^[5]同性恋群体是美国多元文化的另一组成部分。冷战时期，联邦政府拒绝雇用同性恋，原因在于同性恋据信属于东方性取向，源于孔子时代以前，容易受到“强烈信奉同性恋”的苏联人恐吓和拉拢。21世纪初，

[1] Jon Carroll, "10 Little Rules for Living,"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n. 21, 1999: E10.

[2] John Kass, "Gas Station Owner Offers Clinton On-Job Education," *Chicago Tribune*, Jan. 8, 2004: 2.

[3] Bruce Fein, "Analysts Wanted," *Washington Times*, Jun. 15, 2004: A16.

[4] Vernon Loeb, "'Rumsfeld's Rules': Aphorisms on Analysis," *Washington Post*, Jan. 9, 2001: A21.

[5] Anne T. Murphy, "Music and the Established Order," *Washington Post*, Jun. 8, 1995: A20.

源于孔子时代以前的古老历史却让同性恋的处境峰回路转。至少美国国务院已在公开雇用同性恋职员，并提供“家庭”福利。支持舆论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1]

孔子强调德治仁政，运用于美国的政治背景之下，便被具体为用词精准、贴近民意和文化多元三大要求。三者互为支撑，共同建构出美国日常政治应该达到的理想目标，衬托出监督舆论所发现的美国政治弊端。孔子就是舆论剖析日常政治的理论工具。

美国政治，历来处于舆论的监督之下。舆论的评判标准既包括美国的政治理想和人类社会的普遍原则，也会因应时代特征而变更内容。至于前者，孔子的为政学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统治者的人格、品行和施政方式都有很高要求。言及后者，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新保守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又给美国政治及其评论增加新的内容。道德束缚力量和各种文化的生存权利相互交织，构成当代美国政治的独特风景。孔子与美国政治现实结合，产生了舆论对于政治的几大期望。第一，为政者必须品德高尚，竞选过程以及总统和官员的个人行为将品德优劣暴露无遗。第二，政治与政策必须言辞达意，用词模糊、强词夺理而不顾实际情形的为政行为和条款总是舆论批判的焦点。第三，政治必须体恤民情，以人为本，考虑美国社会的多元性，不能偏袒任何文化。不论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穆斯林群体期望最高法院特别关照的诉求，或者是政治人物在维护多元文化问题上的阳奉阴违，都招致舆论的冷嘲热讽乃至严词批驳。

这些政治要求与孔子“德治仁政”理想可谓一脉相承，是美国以民主、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政治理想的另类解读。舆论引入孔子的为政理想，既说明美国社会熟悉孔子的程度，也表现出人们对于美国政治言行脱节的失望和批判。舆论呼声又会推动各级政府检讨行为，变革政策。因此，政治舆论乃美国政治文化的关键要素，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美国的政府与政治。

[1] Robin Wright, "At State, A Friendlier Workplace," *Washington Post*, Apr. 16, 2007: A15.

第二十二章

当代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孔子

历代中国人奉孔子思想为行为规范，在言谈举止间频繁引用孔子的名言警句，佐证自己的处事方式，或者点评旁人的成败得失。而在当代美国，情形大抵相似。所不同者，盖有如下几点：其一，孔子只是美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并非核心要素，因此信奉程度不如中国；其二，提及孔子者多有误用或杜撰孔子语录的情形，表明很多美国人对于孔子的印象停留在思想道德家的笼统层面；其三，美国人引用孔子的诸多场合具有明显的调侃意味，缺乏中国类似场景的严肃氛围。总而言之，当代美国人言谈举止中的孔子象征美国文化的多元性，见证美国人在谈论非主流文化时知而不深的整体特点，也是美国社会文化等级现象的另类体现。本章拟从美国的价值导向、日常实践、休闲娱乐、竞技体育等方面，就前述观点试作论述。

一、孔子与当代美国的价值导向

美国社会物质生活极为丰富，但在精神领域，无异于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存在问题纯属自然。孔子身为人类精神导师之一，其名字和思想就是人们衡量社会观念堕落与否的重要标准。当代美国的有识之士，利用孔子，镜空衡平，发现美国社会在总体风气、成员之间

的相互关爱、尊重多元性等方面,有着明显弊端。将孔子纳入矫正措施,乃此类人士的社会改良建议。孔子映衬之下的价值导向问题及改进途径构成当代美国社会文化不可忽略的组成要素。

论及当代美国社会的总体风气,人们以孔子为鉴,谈论颇多的是基本信念的缺失。《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在孔子生活之时,中国文化“陷入颓废和社会动荡时期,可以说与我们(现在)的情形类似”。所以,孔子思想“仍然是当今世界极好的生活准则”。^[1]著名专栏作家保罗·格林伯格(Paul Greenberg)多处撰文,力促更多美国人关注信仰缺失的现象。格林伯格警告说,“美国社会政治分崩离析”,紧跟巨额财富而至的是“道德堕落”。美国唯有如孔子一样,重塑家庭观念,社会文化方可扭转颓势。^[2]数年之后,当美国经济在20世纪末期再度衰退之时,格林伯格认为,贫穷将引发伦理道德问题,孔子极度重视的家庭信念又被用作矫治良方。^[3]

在家庭信念之外,存在其他佐证生活信仰缺失的例子。例如,在光彩陆离的现实生活面前,人们容易忘记美国文化的历史根源。1975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发布报告称,美国公立学校的美国历史教学“处于危机之中”。孔子有“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之说,忘记历史因而是“可悲的”。^[4]伊利诺伊州杜佩奇县(Du Page County)的乡村展销会也以重塑美国文化的根源为宗旨。展销董事会主席说,商品展览意在“教育我们的人民,他们真的与土地相连,如同他们仍然生活在农场一样”。虚拟的“农业孔子”警告道,“在谷仓旁边自以为是的城市男女矫揉造作,可能灰头土脸”。^[5]丧失信心是信念缺失的

[1] Angela E. Coulombis, “Words of Wisdom,” *Washington Post*, Dec. 13, 1995: H1.

[2] Paul Greenberg, “Getting, Spending and Collapsing,” *Washington Times*, Apr. 19, 1993: E3; Paul Greenberg, “The Trouble with Us,” *Chicago Tribune*, Apr. 23, 1993: 23.

[3] Paul Greenberg, “Missing the Obvious on Poverty,” *Washington Times*, May 24, 1996: A16.

[4] William Murchison, “Sweet Are the Uses of History,” *Dallas Morning News*, Aug. 19, 1975: 2.

[5] Bill Stokes, “Barnyard Ball,” *Chicago Tribune*, Jul. 23, 1989: 1.

又一表现。本杰明·富兰克林说,“任何擅长寻找借口的人几乎别无他能”。但报纸误将此言作为孔子语录,并据此鼓励人们,抖擞精神,勇敢向前。^[1]在圣诞节来临之际,另一文章劝告道,尽管信心不能造就完人,以孔子等圣人为榜样却能“把时钟拨快五分钟”,催人奋进。^[2]此外,商业气息浓厚的美国往往只重能力,忽略人格特征,加剧了信仰缺失。孔子曾经要求统治者,选拔人才应该勇气、智慧和“仁”并重。美国社会不妨效仿。^[3]很多人工作缺乏激情,据称也与践行孔子道德不够有关。^[4]有感于美国社会的信念迷失,好事者特辑孔子语录,表明整个社会应该遵循的原则。比如,新闻业必须铭记“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适用于以自我为中心、追名逐利者;“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是网络的真实写照;“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劝导人们尊重生命;整个国家的治理,则须牢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5]“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大学》)适用于管理者。工人则应记住孔子古训“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6]

显然,众多民众对道德说教置若罔闻,滋生各种事端。侵犯他人权利、甚至违法犯罪就是一例。美国社会的诉讼现象极为普遍。1984年,后来成为阿尔·戈尔竞选搭档的约瑟夫·I. 利伯曼(Joseph I. Lieberman)有感而发,撰文呼吁美国人听从孔子建议,“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也”(《孔子家语·五刑解》)。道德垂范、庭外和解方

[1] Jerry Bartos, "It's Time to Step Forward Again," *Dallas Morning News*, Jun.6, 1989: 41A.

[2] Rena Pederson, "A Letter for Christmas," *Dallas Morning News*, Dec. 22, 1996: 2J.

[3] Robert L. Broadwater, "Sporting Future Business Leaders," *Wall Street Journal*, Mar. 16, 1981: 23.

[4] Dana Hedgpeth, "Keeping Watch on Nasdaq," *Washington Post*, Oct. 23, 2003: T16.

[5] Tim Sullivan, "11 Things: Confuciu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Feb. 21, 2008: G3.

[6] "Work Smart,"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Oct. 31, 1999: R1; Dec. 2, 2001: R1.

为解决争端之上策。美国应“给孔子一次机会”。^[1]虽然此说遭到他人反对，批驳者同样认为，自私自利是美国社会冲突的根源，需要认真对待。^[2]枪支泛滥、暴力成灾与男性缺乏道德约束密切相关，美国男性因此亟需以孔子和耶稣等人为楷模，塑造人格。^[3]一名妇女与丈夫争夺女儿的抚养权，从而雇凶杀夫，被法院判处终身监禁。面对不服判决的罪犯，主审法官引用“孔子”格言，“图谋报复者应该先挖两座坟墓”，阐明判案逻辑：既然丈夫已经置身地下坟墓，杀夫之妻就应在地上坟墓度过余生。^[4]因为劫持汽车、刺死司机，加里·李·桑普森（Gary Lee Sampson）被联邦陪审团判处死刑。但桑普森的辩护律师却认为，陪审团依据现场照片得出“手段残忍”的结论，有失公允。上述法院的法官反驳道，“难道孔子没有说过，百闻不如一见吗？”^[5]民众的漠然态度是犯罪频发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舆论建议，社会需要铭记“孔子”教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迎难而上，遏制犯罪。^[6]

伦理道德淡漠还导致个人修养问题。言辞轻率模糊是表现之一。孔子要求人们言之有物，有感而发，但美国社会恰恰此风甚弱。^[7]很多人自以为是，大言不惭，违背孔子“其言之不忤，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的教诲。^[8]受商业和政治语言影响，美国人的日常言辞日渐模糊晦涩，缺乏诚信。孔子的“正名”学说大有重提的必要。^[9]随

[1] Joseph I. Lieberman, "Confucius's Lesson to Litigants," *New York Times*, Jul. 9, 1984: A19.

[2] Jerry Goldman, "Confucius Can't Help a Litigious America," *New York Times*, Jul. 19, 1984: A22.

[3] Jon Carroll, "The Special Men's Issu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24, 1999: D8.

[4] Anne Barnard, "2 Get Life without Parole for Paid Killing in Queens," *New York Times*, Apr. 22, 2009: 19.

[5] Shelley Murphy, "Sampson Appeals His Death Sentence," *Boston Globe*, Oct. 5, 2006: B3.

[6] Ralph Bailey, Jr., "LARD Looks to Citizens in War against Gangs," *Los Angeles Sentinel*, Apr. 30, 1987: A15.

[7] "To the Editor," *Los Angeles Sentinel*, Sept. 20, 1979: A6; John Blake, "Taming the Tongu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Dec. 2, 2006: F3.

[8] John Gould, "Seldom Was Heard a Modest Wor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17, 1987: 30.

[9] John Powers, "Bitespeak," *Boston Globe*, Jul. 15, 1990: 16.

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不知所云的“懒惰英语”极为流行,重申孔子“正名”要求更显紧迫。^[1] 电脑病毒名称尤其违背孔子提出的言简意赅要求,花里胡哨之极,让人如坠云山雾海。^[2] 孔子映衬出的举止轻浮者也时有所闻。如在1973年最高法院审理的一桩案件中,数名男女将聚众淫乱的场面拍成电影,以散布淫秽物品罪受到起诉。电影旁白居然引用孔子和林肯等人之名,反叛心理显露无遗。^[3] 因为代理费用争执,印第安纳州的一名律师与其女性当事人对簿公堂,两人的不正当关系随之曝光。律师自嘲道,“正如孔子所说——你们都知道了”。^[4]

缺乏人际关怀和同情是社会道德衰落的又一写照。评论者认为,以自我为中心、不顾他人感受乃社会弊病的主要根源,但孔子等人倡导的仁爱思想可以有效根除这一顽疾。^[5] 长期以来,美国唯尊基督教,忽视孔子等非西方文化圣人的存在,从思想源头上阻碍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爱,理应摒弃。^[6] 到了21世纪,《华盛顿邮报》疾呼“回归同情精神”,可见情形之严重。文章强调,“同情迫使我们抛弃自负、自大和自私思想”,促使我们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自从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情便成为世界的“主要宗教义务”。回归同情精神因此言之有据,切实可行。^[7]

然而,缺乏相互同情与理解的事情频频发生。初中学生因为不愿提交作业而殴打老师,出差返回的校长只能以孔子语录“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安抚教师,尽显无奈。^[8] 害怕

[1] Paul Powers, "A Loss for Words," *Boston Globe*, Feb. 8, 2004: 8.

[2] Michael E. Kanell, "Business Report on Technology,"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Dec. 6, 1995: F2.

[3] Eugene L. Meyer, "Jury Reviews Film in Obscenity Trial," *Washington Post*, Sept. 26, 1973: A30.

[4] "Melvin Belli Admits He Had Sex with Client," *Los Angeles Times*, Apr. 17, 1986: A2.

[5] Harold Blake Walker, "Living Faith," *Chicago Tribune*, Mar. 6, 1975: C15.

[6] (Rev.) Duane W. Smith, "Religions That Matter," *New York Times*, May 29, 1998: A20.

[7] Karen Armstrong, "Time to Return to Spirit of Compassion," *Washington Post*, Nov. 15, 2008: B7.

[8] Marc Fisher, "SE Junior High Tense after Assaults," *Washington Post*, Feb. 26, 1987: C1.

噪声的居民反对在住处旁边修建机场,阻碍他人出行。有人假借孔子口吻规劝道:“如果坐在火堆旁,就会发热;如果住在机场旁,就会很吵;如果喜欢凉爽,那就离开火堆。”^[1]演讲者只顾夸夸其谈,浑然不管听众反应。这就是孔子所谓“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大学》)的具体表现。^[2]男人与女性争抢电梯而不谦让,让人倍感社会礼仪消失之迅速。孔子的犀利观察“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3]有人脾气暴躁,对于任何挡其道路者都会报以重拳,身陷囹圄之后,方才幡然醒悟。他阅读孔子《论语》,“知晓忍耐的价值”。^[4]

美国广播公司的气象预报员特克斯·安托万(Tex Antoine)不但违背孔子的仁爱怜悯思想,而且盗用孔子之名,调侃强奸未遂案的受害者,激起轩然大波。纽约一名八岁女童遭遇强奸未遂,1976年11月24日,在播报该条新闻之后,安托万突发奇想,自行点评:“孔子曾说,‘如果强奸不可避免,那就放松心情享受’。”此言一出,立即招徕抗议无数。电视台被迫中止安托万的播音生涯。^[5]然而,在安托万没有真心忏悔的情形下,电视台仅仅中止,而非取消安托万的播音资格。舆论极为愤怒,指责电视台为了利用争议人物增加收视率,居然“留用有精神疾病的主持人”。^[6]迫于压力,电视台在安托万聘用期结束之后没有续聘。因为“不得体的强奸言论”,安托万是处寻找工作,声称有失败之感。^[7]舆论揶揄道,安托万“终于明白,自己应该专心

[1] “Letters to the Editor,”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17, 1989: A22.

[2] “Getting Ahead,”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Aug. 8, 1994: E7.

[3] Cory Franklin and Barry Rosenbloom, “In Search of Good Manners, Please,” *Chicago Tribune*, May 5, 2009: 23.

[4] Larry Bratt, “A Liberating State of Mind,” *Washington Post*, Oct. 6, 1997: D5.

[5] “Personalities,” *Washington Post*, Nov. 26, 1976: D3; “Rape Comment Gets TV Weather Forecaster Fired,” *Dallas Morning News*, Nov. 26, 1976: 5; “Personalities,” *Washington Post*, Dec. 21, 1976: B3.

[6] Gary Deeb, “... But How Much of the Film’s ‘Truth’ Is Fictional?” *Chicago Tribune*, Dec. 19, 1976: E3.

[7] “Rape Quip Wipes Him off Map,” *Los Angeles Times*, Jul. 18, 1977: A2.

播报天气”，涉足孔子笑话得不偿失。^[1]此事余波难平。直至数年之后，舆论还在以安托万事件为例，证明品位和判断力“通常是‘趣谈式’天气预报的首要牺牲品”。^[2]1983年，安托万在郁闷中去世。但凡是提及此人，强奸言论必是重点，其引发的如潮抗议总能不断重现。^[3]其实，在毁掉安托万播音生涯之前，强奸言论已让一名教师陷入舆论漩涡之中，可见民众反应的激烈程度和安托万不解民意的性格。1976年9月，洛杉矶教育委员会计划整合师资力量，很多教师将被派往他处。接受采访的格伦·A. 莱德伯（Glenn A. Ledebur）自以为幽默地说，既然调动已是既成事实，还不如遵循“孔子”所说，“如果强奸不可避免，那就放松心情享受”。在舆论高压之下，莱德伯被迫公开道歉。^[4]

社会风气弊病丛生，急需矫正。很多有识之士呼吁，引入孔子思想，塑造优良世风。舆论相信，如果要问生活细节，科学家可以作答；如果涉及人与自我、他人和宇宙的关系，唯有求助孔子和柏拉图等人的“古老书稿”了。^[5]人们应该向孔子等“伟大人物”寻求灵感，回答看似难以捉摸的各类问题。^[6]即便在轻饮小酌之间，思考孔子等圣人的建议也会让人大有收获。^[7]将孔子思想纳入社会价值取向范畴，途径多种多样。例如，祷告是净化心灵的一种方式，但内容却需考虑各种信仰的共通性。孔子开创的黄金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

[1] Jennings Parrott, “Weatherman Happy-Talks Self off TV,” *Los Angeles Times*, Jul. 19, 1977: B2.

[2] David Shaw, “Weather: Everyone’s No. 1 Story,” *Los Angeles Times*, Mar. 1, 1981: 23.

[3] “TV Weatherman Tex Antoine, 59,” *Boston Globe*, Jan. 13, 1983: N; Howard Rosenberg, “‘Foot in Mouth’ Is a Live-TV Disease,” *Los Angeles Times*, Dec. 16, 1983: M32; Mike Thomas, “Foot-in-Mouth Disease,” *Chicago Sun-Times*, Dec. 23, 2002: 32.

[4] Glenn A. Ledebur, “Relax and Enjoy It,” *Los Angeles Times*, Oct. 8, 1976: B6.

[5] Melvin Maddocks, “What Do You Know when you know what you know?”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 12, 1986: 24.

[6] “A Year of Enlitenment,” *Washington Post*, Nov. 16, 2008: N1.

[7] Lin Hilburn, “Labor Day and the Workers of Our Society,” *Los Angeles Sentinel*, Aug. 28, 1975: A7.

人”——应为最佳选择。^[1]民间机构的推动是另一渠道。俄亥俄州的生物伦理学教授斯蒂芬·G·波斯特(Stephen G. Post)组建的“无限制的爱研究所”就是一例。该所秉承孔子的仁爱思想,通过举行会议等方式,陶冶社会情操,增进相互关爱。^[2]甚至自我催眠在精神升华方面的作用都受到重视。据称,催眠术的妙用源自孔子,鲜有变化。催眠状态下的沉思有助于人们完善自我。^[3]

教育无疑是改善社会风气的最主要途径。因此,倡导在教育领域引入孔子内容的呼声尤其明显。大学引导青年人深入思考生活哲理,增加孔子学说既能让处于人生理念塑造阶段的学生获得全新启发,又能奠定其多元文化宽容意识。20世纪70年代以后,众多大学纷纷推出包含孔子内容的教学计划。力推教育改革的人士指出,高校必须“重新重视‘人文教育’”,传播正确观念,培养正确人格,帮助学生“辨别真理与谬误、正确与过失、高尚与低下”。比如,如果希望了解完美社会需要具备的品质,就必须阅读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和《联邦党人文集》等。^[4]斯坦福大学是率先开展教改争论的学校之一。1980年,该校本科生主办的报纸《斯坦福日报》质疑原有人文教学大纲:“我们为什么就能断定,亚里士多德、摩西或者卡尔·马克思的文明就比孔子、菩萨或者老子的文明重要。如果需要任何规定,为什么规定必学西方文化,而不是人类文化?”^[5]为顾及多元文化的正反双方,斯坦福大学不断提出新的改革方案。该校副校长兼教务长特地给

[1] H. J. Oettinger, “Start with a Rule,” *Chicago Tribune*, Jul. 1, 1993: 22; H. J. Oettinger, “Do unto Others,” *Chicago Tribune*, Jun. 24, 1999: 28.

[2] Diane Evans, “Seeking Answers as to Why We Love,” *Chicago Tribune*, Oct. 19, 2003: 14.

[3] Julie Amparano, “Dow Got You Down? This Idea Could Be an Entrancing On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 30, 1988: 1.

[4] Haven Bradford Gow, “Humanities,” *New York Times*, Nov. 9, 1980: F24.《联邦党人文集》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在美国联邦宪法批准过程中,阐述宪法和政府运作原理的评论合集。评论文章最早连载于纽约地区的报纸,1788年首次合集出版。文集是研究美国宪法和政府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

[5] Fred M. Hechinger, “Stanford Joins in Core Reform,” *New York Times*, Feb. 26, 1980: C4.

报纸去信,阐明人文教改的原则是,既不抛弃西方文化,又能让学生学习孔子和古兰经等。^[1]1997年开设的“人文学科导论”课程兼顾各种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其中就包括孔子论著。^[2]斯坦福大学的创建者曾经希望,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孔子弟子”和持其他信仰者都能在该校完成学业。20世纪后半期的人文教改就是这一愿望的体现。^[3]

其他大学同样在紧锣密鼓地将孔子纳入人文教育。马里兰州的乔治王子社区学院(Prince George's Community College)在广告中声称,卡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孔子等人“都是我校毕业班成员”,他们构成了“塑造现实世界的思想和行为基础”,因而是教学的关键内容。^[4]亚特兰大的奥格尔索普大学(Oglethorpe University)实施的核心教学大纲注重回答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因此,该校学生的阅读书目涵盖孔子、亚里士多德和弗洛伊德等人,切实体现美国社会一直以来存在的多元性。^[5]即便是某些以保守著称的教会学院亦在多元文化的浪潮中改弦更张,鼓励学生阅读孔子《论语》等非西方经典著作。^[6]加州帕萨迪纳学院(Pasadena College)的“夏季大学”为学员提供“精神和宇宙指导”,前三个月课程侧重学习和思考耶稣和孔子等人的教诲。^[7]首都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专为成人开设继续教育课程。广告以孔子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作为教育

[1] James N. Rosse, "Stanford 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24, 1989: A17.

[2] Bill Workman, "Stanford Reforms Humanities to Attract Tech-Savvy Student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16, 1997: A14.

[3] Carolyn Zinko, "Fiercely Faithful Flock,"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Dec. 12, 1997: A25.

[4] Display Ad, *Washington Post*, Aug. 5, 1990: N7.

[5] "Letters to the Editor,"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Sept. 29, 1991: C6.

[6] Larry Bleiberg, "At St. John's College, Classes Always Are Classic," *Dallas Morning News*, Nov. 30, 1993: 22A; "Where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Washington Post*, Jan. 20, 2005: T15.

[7] Osgood Caruthers, "Nazarene College Now Home for New Religious Sect," *Los Angeles Times*, Sept. 12, 1976: SG1.

理念,鼓励有志深造者迎接“思想挑战”,“追寻个人价值”。^[1]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州立学院(Albany State College)的“旅行/学习”课程利用幻灯和演讲等形式,让学生足不出户就能领略孔子故乡、夏威夷和金字塔等地的历史与风貌。^[2]

孔子受到重视,并不局限于钻研抽象理论的高等学府,中小学同样如此,孔子参与塑造美国理想人格的程度可见一斑。受当代美国文化多元化和严峻社会风气的影响,学生家长尤其是有移民背景者积极呼吁,要求在教学内容中加入孔子思想等非主流元素。在此之前的美国中小学虽然也在教授道德原则,但“缺乏系统和连贯性”。因此,一名家长建议,学校应让学生接触耶稣和孔子等“道德领袖”的教导。^[3]多数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家长通常将孩子送到课外补习班或周末学校,弥补正规学校在道德和族裔教育方面的不足,敦促孩子了解孔子等非西方圣人。^[4]2009年,马萨诸塞州的昆西市(Quincy)计划建立名为“翰林”的特许学校。创建人宣布,学校将融会贯通“西方和远东经典教育的最优良传统”,孔子和柏拉图、杰斐逊等人将同放异彩。^[5]“与孔子一样古老”的“基于努力的智慧”观逐渐在美国教育体系中流行开来,指导各个年级的教学。^[6]得克萨斯州科林县(Collin County)教育委员会成员竞选中,一名候选人也盛赞孔子哲学,建议以孔子思想协助教学。^[7]中小学课程内容有相应调整。例如,1991年

[1] Display Ad, *Washington Post*, Mar. 13, 1974: A18; Jun. 19, 1974: A5; Oct. 22, 1974: A7.

[2] “Discover Hawaii, China, Egypt through Travel/Study Programs,” *Atlanta Daily World*, Apr. 23, 1992: 9.

[3] “Public Schools Can Teach Moral Values, But Careful Instruction Will Be Required,”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Jun. 29, 1990: A17.

[4] Melita Marie Garza, “Keeping Culture,” *Chicago Tribune*, Oct. 13, 1993: 1.

[5] Robert Knox, “Clash of Views Expected at Charter School Hearing,” *Boston Globe*, Dec. 10, 2009: 4.

[6] Brigid Schulte, “Calling for Intelligence with an E for Effort,” *Washington Post*, Dec. 3, 2002: A14.

[7] Karen Ayres and Staci Hupp, “Growth Priority in School Races,” *Dallas Morning News*, May 4, 2007: 1B.

9月,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六年级学生不但要学习“标准的”世界史内容,还须习读耶稣寓言和孔子教诲等。^[1]1997年,马萨诸塞州公立学校实施新教学大纲,《论语》名列推荐阅读书目之中。^[2]

学生的表现显示,将孔子等非主流思想家纳入教学已有成效。为了培养思路清晰、口才雄辩和具有协作精神的学生,佐治亚州洛克代尔县(Rockdale County)的塞勒姆(Salem)中学设计出一套全新教学方案,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深入思考。到学年结束,学生已能详细分析孔子思想和权利法案等。^[3]加利福尼亚某夏季学校布置的作文题目是“你希望出名吗?你希望因何而出名?”一名学生写道,他希望成为时空旅行者,以便能看到孔子和达芬奇等。^[4]而当旧金山市长前来视察时,一所学校的九年级学生思维流畅,大谈综合数学和孔子。^[5]孔子也激励着某些教师提议,重振中小学语法教育。语法可以培养言语简洁、思维清晰的优点,孔子语录是最好的榜样,其名言“举一反三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乃语法教学的终极目标。^[6]

孔子甚至渗入了学生的艺术与体育活动。1998年2月,伊利诺伊州费尔维尤(Fairview)小学的体育馆内,聚集着数百名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儿童。数名学生正在表演舞台剧,帮助华盛顿确定领袖品质。学生引用众多名人名言,作为佐证,其中就有孔子语录。^[7]该州

[1] Laura Van Tuyl, "Schools Tackle Lessons on Religi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23, 1991: 12.

[2] Diego Ribadeneira, "Plan to Teach the Bible Makes Some Teachers Nervous," *Boston Globe*, Jan. 24, 1997: B1.

[3] Betsy White, "Teaching Methods Divide Rockdale School,"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May 5, 1992: A1.

[4] Janice Greene, "Dreams of Fame from Baseball to Time Machine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ug. 17, 2001: 7.

[5] Heather Knight, "Mayor's Visit Energizes Ingleside Charter School's Inaugural Clas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Dec. 24, 2004: F4.

[6] "On Tighter English; 'Gifted' Student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14, 1979: 22.

[7] Margaret Van Duch, "Presidents' Day Play Teaches Kids Lessons about Leadership," *Chicago Tribune*, Feb. 16, 1998: 3.

另一小学以华盛顿为主题的音乐剧中，孔子以毫不张扬的风格，给华盛顿提出最强劲有力的领导哲学。在本剧末尾，孔子送给华盛顿一英尺长的签饼，其中的幸运信息是：“你的命运是充当领袖；你越是欣然接受，困难就越少”。^[1] 某中学的年度“中世纪宴会”上，孔子是学生化妆扮演的角色之一。^[2] 佐治亚州一所中学的十项全能代表队获得州冠军，他们将胜利部分归因于孔子：队员不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三英尺高的孔子雕塑，祈求好运。^[3]

教会的作用不容小视。面对日渐松懈的社会道德，教会也在考虑吸纳孔子等非西方圣人的原则，引导世人。例如，洛杉矶的“引领教会”（Guidance Church）以“子曰”为广告题目，号召人们前来学习“更幸福、更健康、更兴旺的生活”之道。^[4] 1986年以来，发端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合一教会（Unity）将每年的最后一天定为“世界疗伤日”。教会引用孔子等人的名言，鼓励全世界为和平祈祷。^[5]

然而，尽管涉及孔子等人的多元文化教育效果显著，依然引起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抗议和反对。责难的主要理由是，引入孔子等非西方内容，势必会淡化美国的主流文化，危及美国文化的统一和特性。针对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多元化教改，有舆论指出，“所有美国公民”都是西方传统的继承者。所以，相比孔子，西方论著更值得他们研读。^[6] 另有人遥相呼应道，“强调西方文化经典的核心要求”必须保留，年轻人应该熟悉自己文明的基本文献。否则，这将令人尴尬，如同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无论怎样知晓马克·吐温却对孔子一无所知一

[1] Sandra Swanson, “1st President Learns to Lead,” *Chicago Tribune*, Feb. 28, 1997: 3.

[2] Jennie Fitzhugh, “Mill Valley Middle School Meets Henry VIII, Genghis Kha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Feb. 18, 2000: 6; Kelly St. John, “Pupils Remake History,”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Feb. 16, 2001: 4.

[3] Linda Stewart Ball, “Winning Philosophy,” *Dallas Morning News*, Mar. 2, 1999: 13A.

[4] “Become Prosperous Today,” *Los Angeles Sentinel*, Jul. 25, 1985: C9.

[5] Cathleen Falsani, “Early Risers Pray for Peace on Earth,” *Chicago Sun-Times*, Jan. 1, 2003: 9.

[6] “For a Broader Reading Lis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23, 1988: 13.

样。^[1] 根据指责, 斯坦福等大学“已经堕落到不加鉴别地贬低西方经典”的地步, 却大为吹捧少数族裔和第三世界文化, 视其为新颖时髦之物。^[2] 关注中小学多元文化教育者当中, 反对声音也时有所闻。例如, 1996年, 伊利诺伊州朗格罗夫(Long Grove)的某些居民成立“多元化家长联合会”, 敦促当地学校增加多元文化教学内容。两年之后, 名叫“保护素质教育公民联合会”的组织应运而生, 要求学校以共同的政治与社会理念替代多元化, 因为当地学生了解《联邦党人文集》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比谈论孔子哲学更加重要。^[3] 威斯康星州一所中学的世界史课本, 因为讲述孔子和菩萨的篇幅超过耶稣, 从而招致抨击。^[4] 据称, 突出包容性的课程大纲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孔子等人仅是幌子而已。此类改革将引发学生思维混乱, 势难避免“文化无政府主义和种族冲突”。^[5]

二、孔子与美国人的生活细节

日常生活, 围绕衣食住行、家长里短而展开。但要显示品位和智慧, 圣人的指导仍然不可或缺。孔子的印记是处可见, 渗入美国人的生活细节, 成为美国日常生活的组成要素, 印证着美国文化的多元化特色。

首先, 孔子应该作为个人言谈举止的塑造力量而存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美国人为此做出了表率。孔子思想强调中庸与平衡, 精神追

[1] Dinesh D'Souza, "To Free the Universities...",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0, 1991: A10.

[2] Dinesh D'Souza, "A Multicultural Reading List,"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 24, 1991: A18.

[3] Casey Banas, "Group Challenges Schools' Diversity Push," *Chicago Tribune*, Sept. 18, 1998: 5.

[4] Anne Davis, "Jesus Gets Short Shrift in History Text, Critic Says," *Washington Times*, Jul. 20, 1998: A2.

[5] "A Curriculum of Confusion," *Washington Times*, Feb. 15, 1990: F2.

求与现实世界并重，值得人们铭记和实践。^[1]日常生活中不乏谨记孔子之例。比如，一名抛光木匠去世，女儿追忆道，其父酷爱钓鱼和阅读，她自己则因为能背诵孔子语录而获得父亲奖励。^[2]孔子在众多场合提及学以致用思想。正是受此启发，迪特尔·格伦 (Dieter Gruen) 才会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寄身实验室，相信自己的发明终究会引起世人重视。^[3]伊利诺伊工学院的一名副教授将“选择喜欢的工作，你就会毕生轻松”附会为孔子语录，以此为信念，醉心实验室研究。^[4]2002年，罗伯特·伯林 (Robert Berring) 就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院长。伯林作风朴实，信奉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赢得全校师生的广泛支持和赞誉。^[5]

其他生活领域中，铭记孔子教诲依然大有人在。例如，1987年，《纽约客》杂志主编被解除职务。为此感到愤怒的读者在报纸的读者来信中声称，主编熟悉中国，并以儒家思想规范言行，“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主编深受爱戴的情形。^[6]著名政治专栏评论家小约瑟夫·W. 艾尔索普 (Joseph W. Alsop, Jr.) 1989年去世。悼念文章称赞他兴趣广泛，行文引经据典，是西方新闻界唯一阅读过《论语》古汉语版本之人。^[7]有“政治神枪手”之称的评论家戈尔·维达尔 (Gore Vidal) 自称，内心有着深刻的孔子情结。他铭记

[1] “Anchor Yourself by Exploring, Understanding Other Faiths,” *Dallas Morning News*, Aug. 14, 2004: 3E.

[2] “Andrew Balis,” *Chicago Tribune*, Oct. 29, 1997: 9.

[3] Jon Van, “No Lone Geniuses, Today’s Inventors Explore in Teams,” *Chicago Tribune*, Aug. 15, 1993: 1.

[4] Patrice M. Jones, “IIT Scientist’s Quest for a Clean Energy Future,” *Chicago Tribune*, Jun. 28, 2005: 1.

[5] Charles Burress, “Interim Boalt Law Dean Is ‘Uncle Zeb,’”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Dec. 12, 2002: A27.

[6] Leah Garchik, “Local Writer Says Shawn Was ‘Fired,’”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an. 16, 1987: 75.

[7] Bart Barnes, “Columnist Joseph Alsop Dies at 78,” *Washington Post*, Aug. 29, 1989: B5.

孔子关注现实问题的教诲，不断针砭时弊。^[1]被誉为美国电视网之父的伦纳德·H. 戈登森 (Leonard H. Goldenson) 充满睿智，为人谦和，其笑容据信与孔子如出一辙。^[2]某喜剧演员，台上表演可以让人笑翻在地，台下则生活严谨，阅读孔子等人的经典论著是一大爱好。^[3]另外一名演员也是出口即可引用孔子语录。^[4]名叫马特·德萨尔沃 (Matt DeSalvo) 的棒球运动员为理解自我和他人，遍读各类哲学思想，其中就包括孔子论著。^[5]

报纸力荐个人从孔子那里学习永不为晚、永不放弃的精神。对于那些哀叹自己一事无成的人，报纸建议从现在开始，立即行动，毕竟“孔子是从 54 岁开始写‘子曰’的”。^[6]有人年届四十而默默无闻，从而心灰意冷。孔子 54 岁才开始周游列国、宣扬治国处世之策同样应该令此类人等获得启发。^[7]“孔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励志文章从中看到了跨出第一步的重要性：停止抱怨和彷徨，只要完成起步，余下的路途就会更加轻松。^[8]孔子登临泰山，感叹世间万物的渺小。这在有心者看来，从另一角度证明，必须付出登山的艰辛，才能幡然醒悟。^[9]信奉孔子的韩裔美国人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不言放弃的

-
- [1] Joseph McLella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Gore," *Washington Post*, May 4, 1981: B1, B13.
- [2] Tom Shales, "Writing the ABCs of Broadcasting," *Washington Post*, Apr. 24, 1991: C1, C2.
- [3] Mary Knoblauch, "The Face Is Familiar, But Recognition Still Eludes John McGiver," *Chicago Tribune*, Mar. 2, 1975: E4.
- [4] Robert Goldberg,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O'Tool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 21, 1987: 36.
- [5] Tyler Kepner, "Studying the Majors, With 200 Books to Go," *New York Times*, May 12, 2007: 5.
- [6] David Steinberg, "For Writers, Life Just Begins at 50,"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an. 14, 2001: 6.
- [7] Nancy Randle and Joen Hilfer, "Transitions: 40?" *Washington Post*, May 20, 1982: C5.
- [8] Nick Yapp, "The Hit-and-Run Express," *New York Times*, Nov. 27, 1983: XX3; Howard Schneider, "Warm-Up Advice from an Ancient Master," *Washington Post*, Jan. 29, 2008: F3.
- [9] Paul McHugh, "Scaling Mystical Peak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an. 21, 1991: F

精神。他们吃苦耐劳，是成功的小店业主，引发黑人的抗议和抵制。然而，即便黑人报纸也认为，抵制毫无意义，学习“勤劳、群体团结和尊重权威的孔子价值观”，积极参与竞争方为上策。文章结尾写道，如果孔子再世，他必然会说：“自由的唯一颜色是绿色”。^[1]在英语中，Green既有“绿色”之意，也意味着“成熟、有生气”。所以，文章实则建议黑人，尽快成熟起来，实践孔子精神，实现自我发展。

遇事冷静，处事果断，这是报纸假借孔子对个人言行提出的另一要求。《洛杉矶时报》一幅漫画中的文字形象地描绘出行为慌张导致的窘态：“子曰，‘将钱包放在其他裤子里的人会把芙蓉蛋敷在脸上’。”^[2]如遇棘手事情，《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则忠告是，“找一条小溪，卷起裤腿，径直走进去。如果感觉凉爽，你的头脑也冷静了。”忠告者特别提醒，虽然这不是“古老的孔子格言”，却是事实。^[3]言及冷静判断，特殊行业的从业者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比如记者，就不能轻信政府辞令，而应挖掘真实意图，予以报道。孔子之言“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当为警示。^[4]俄勒冈州某地建有核工厂，具有巨大的潜在危险，周围居民积极行动，试图迫使政府关闭工厂。他们的精神动力来自于孔子教诲“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5]

第二，孔子对于家居生活具有参照意义。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质量事关社会发展和个人幸福。民以食为天，美国农业部于1992年出台“食物金字塔”计划，指导美国家庭健康饮食。计划鼓励人们少吃肉类，多吃蔬菜、水果和谷类。要求“肉虽多，不使胜食气”（《论语·乡党》）的孔子被视作这一计划的同盟者。^[6]人们经常以孔

[1] “Confucius Say: ‘Do for Self,’” *Los Angeles Sentinel*, Oct. 11, 1990: A7.

[2] “The Better Half,” *Los Angeles Times*, May 7, 1978: F120.

[3] “Play It Cool,” *Chicago Tribune*, Jul. 2, 1978: W_A1.

[4] “Personalities,” *Washington Post*, Apr. 29, 1982: B2.

[5] Matthew L. Wald, “Flexing Sculpted Muscles against Nuclear Power,” *New York Times*, Sept. 27, 1992: F12.

[6] Edythe Preet, “Rice Nourishes Many a Body and Soul,” *Washington Times*, Aug. 21, 1996: E4.

子之名,提出中肯建议或和睦家庭的范例。面对新人,犹他州一个小镇的治安法官通常会引用包括孔子在内的“世界圣人”之言,强调善待他人的处事原则。^[1]而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座教堂,结婚仪式在“两首孔庙礼拜乐曲”和婚礼进行曲中展开。^[2]有人陶醉于美满的婚姻生活,达到忘却世界万物的程度,特地以“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自比。^[3]领养是当今美国人组成家庭的另一方式,众多外国孤儿或弃婴由此成为美国家庭成员。尽管非议众多,领养者依然坚定不移,相信孔子说过“枪打出头鸟”,他们乐意当出头鸟。^[4]家庭成员之间如何相处,则是另一颇费思量的问题。如在圣诞节来临之际,夫妻双方父母都极力邀请,何去何从便分外棘手。根据以讹传讹的孔子名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评论者模仿道,“千里之行,始于母亲要求前往她的住处享用圣诞晚餐的电话”。如何满足母亲与岳母的盛情邀请,需要当事者谨慎对待。^[5]父母的正确引导可以让子女在事业上受益匪浅。例如,22岁的戴维斯(Davis)已是波士顿民歌创作圈里一颗熠熠生辉的新星。在很大程度上,这应归功于父母。由于父母是民歌演唱者,戴维斯很早就接触到了她称为“孔子”的民歌界权威。^[6]同样是在波士顿,一名女孩在网球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天赋。母亲不仅积极支持,而且专门从书店买回一本讲解网球技巧的书。母亲相信,“如果孔子打网球,他肯定会写这样一本书”。^[7]

[1] Lidia Leszczynski, "Utah Is One of Six States Where Girl Can Marry at 14," *Los Angeles Sentinel*, Jun. 13, 1974: A8.

[2] "Wedding Bells,"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Sept. 4, 1976: B5.

[3] Norma Farber, "Remembering a Marriag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 13, 1982: 21.

[4] Michael Hirsley, "The Great Baby-Lift—For Love, or Money?" *Chicago Tribune*, Aug. 29, 1982: 4.

[5] Art Buchwald, "Family Planning at Christmas," *Washington Post*, Dec. 15, 1988: C1; Art Buchwald, "Dealing with the Christmas-Dinner Power Struggl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Dec. 15, 1988: A26.

[6] Scott Alarik, "Embracing Transition, Preserving Tradition at Boston Folk Festival," *Boston Globe*, Sept. 15, 2002: N14.

[7] Julian Benbow, "She's on the Upswing," *Boston Globe*, Jun. 4, 2009: 6.

室内陈设乃居家生活所必备，孔子的出现会让某种陈设的必要性陡然增加。例如，某家具公司发布广告，推销成套壁挂式家具。广告词以醒目字体写道，“子曰，把全套（家具）挂在墙上”。^[1]衣橱是常见的家居摆设。然而，评论声称，“子曰，（衣橱）很贵”。所以，按照报纸介绍的方法自做衣橱确有必要。^[2]经营中式地毯的公司则在广告中吆喝道，“子曰，没有必要到处乱窜，就选定我们吧！”^[3]很多美国人都有独立庭院，锄头、铲子等园艺工具必不可少，但工具收藏却令人头疼。于是，有心者杜撰孔子语录说，“锄头如果挂在墙上，你踩上时，它就不会飞起来砸到你的脸”。将工具固定在墙壁上因此是解决之道。^[4]木地板吱嘎作响，实乃烦心之事。报纸建议，地板之间敷上胶水，胶水作为填充物，可以减缓挤压和振动。“正如孔子可能会说，没有摩擦，就没有声响”。^[5]

居家生活，个人心态应该调整到最佳，不可因琐事而心烦意乱。失眠让人烦恼，但人们又无计可施。所以，有人建议，“正如孔子可能说过的”，那就躺在床上，“尽力享受失眠”。^[6]生活俭朴，随遇而安，既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境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的孔子就是榜样。^[7]某人因为自尊心极强，不愿求助别人，花费数天时间也无法将地下室的电路修好。他忽然想到孔子“忿思难”（《论语·季氏》）之言，从而放下自尊，向人求助。^[8]

第三，美国人的日常开支也离不开孔子。服装是家庭主要购买的

[1] Ad, *Dallas Morning News*, Sept. 30, 1972: 2; Dec. 9, 1972: 13; May 19, 1973: 24.

[2] Lee Todd, "Plan Economic Wardrobe," *Dallas Morning News*, Jul. 16, 1972: 4.

[3] "Oriental Rugs," *Los Angeles Times*, Mar. 14, 1981: A27.

[4] Al Carrell, "Here's an Easy Way to Stow a Hoe," *Dallas Morning News*, Dec. 9, 1994: 3G.

[5] Forrest M. Holly, "Why Not Use Some Glue to Prevent Those Squeaking Floor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2, 1973: 13.

[6] Bill Gold, "The District Line," *Washington Post*, Feb. 19, 1975: C14.

[7] Abigail Trafford, "Living Long Is the Best Revenge," *Washington Post*, Oct. 27, 1992: Z7; Thomas V. Dibacco, "The Case of the Evolving Pillow," *Washington Post*, Jun. 3, 1993: T17.

[8] Marcela Valdes, "Tales of Power," *Washington Post*, Sept. 23, 2007: W26.

物品之一。而为了增加异域风格或商品吸引力,很多设计师或经销商会吸纳孔子元素。里兹克(Rizik)设计公司专为女性推出奶油色和巧克力色的缎面棉衣,谓之曰“苦力上衣”。广告蛊惑道,“子曰,身穿苦力上衣的女士外表时尚新潮”。^[1]名为“孔子”的黑红色细平布披风,绣有中国海豹图案,衣领则是中国刺绣黑缎,曾在纽约时装市场红极一时。^[2]孔子还能让人获得服装搭配的灵感。例如,孔子的“正名”之说要求人们穿着符合身份,但美国的服装潮流引导者却鼓励反其道而行之,声称人们应该根据各自喜好,自由搭配穿着。^[3]喜欢苗条身段的女士应该选择黑色衣着,因为“时装界的孔子”说,“牛仔裤越黑,人就看起来越瘦”。^[4]

首饰是另一类家居消费品。特里法里(Trifari)珠宝商推出数款东方风格的首饰,“孔子会同意,特里法里的东方格调首饰极其适合春天佩戴”。^[5]新泽西州的丹·纽曼(Dan Newman)公司为女士准备了双面针织涤纶布,上面可按要求绣上自己姓名甚至“孔子”二字,作为饰物。^[6]推销钻石的文章杜撰孔子语录道,“有瑕疵的钻石总比光洁的鹅卵石好”。^[7]旧金山的冈普(Gump)公司力荐消费者购买翡翠制作的情绪戒指,因为在“孔子时代以来的东方”,翡翠总能替人消除忧虑。^[8]一家远东珠宝公司为经营的珊瑚饰物取名“子曰”,以图增加吸引力。^[9]日用百货商店亦有借用孔子之口大打广告的现象。如华盛顿的一家商店计划清仓,其广告如下:“子曰:‘购买清仓货的

[1] Ad, *Washington Post*, Oct. 22, 1975: B9.

[2] Phyllis Feldkamp, “Yesterday’s Fashion Fits Today,” *New York Times*, Jun. 13, 1976: 207.

[3] Henry Allen, “I Dress, Therefore I Am,” *Washington Post*, Oct. 2, 1977: 42.

[4] Libby Copeland, “Tres Cheek,” *Washington Post*, Aug. 16, 2005: C1.

[5] “New Chinese Proverb,” *Washington Post*, Feb. 13, 1972: E20.

[6] Jane Geniessc, “Home Beat,” *New York Times*, Apr. 27, 1978: C3.

[7] “Diamond Solitaires Suitable for Both Men and Women,” *Los Angeles Times*, Dec. 6, 1982: I7.

[8] Joanne Ostrow, “Shopping the Easy Way,” *Washington Post*, Nov. 26, 1982: W47.

[9] Jean Shifrin, “Day Spas: The Inside Story,”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Apr. 20, 2000: K1.

人真的赚了。’”^[1]

与此同时，孔子能为人们的大件消费如购房租房、购置汽车、商业投资等提供咨询。孔子首先是美国铺天盖地的大件消费广告用以引起注意的重要手段。20世纪60年代以后，信用卡在美国全面流行，成为日常消费的主要支付渠道。一幅漫画以幽默诙谐的方式，鼓励人们使用信用卡：食客在中餐馆取出签饼里的幸运字条，说道，“上面写着，‘钱不能买来一切——所以孔子发明了信用卡’”。^[2]在电脑开始普及时，孔子出现在电脑推销者的行列之中。人们尝试用电脑实施工程管理，却发现入门辅导材料过于简洁，有语焉不详之感，“如同孔子心情不佳”时写下的句子。辅导材料因此需要增加信息含量。^[3]巨大的数据存储容量是电脑的一大卖点。广告文章宣称，即使不能将祖先追溯到孔子时代，人们也可以坐在电脑前，查询到曾经参加淘金潮但消失在太平洋海岸的先辈的情况。^[4]写字楼出租方大力提高门童素质，以便聚集人气。门童的指定读物是孔子《论语》，有人甚至购买了中文版。^[5]保险公司推出责任险种，鼓励拥有胆识的人勇往直前，开阔视野，因为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6]雪佛兰汽车经销商称呼潜在的购买者为孔子笔下的君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7]沃尔沃汽车的广告文章借用所谓的孔子名言“百闻不如一见”，声称即使照片也无法完全诠释沃尔沃为21世纪所作的革命性变革，人们应该亲身前往，一睹真容。^[8]

[1] Ad, *Washington Post*, Jul. 10, 1979: B4.

[2] “The Better Half,” *Los Angeles Times*, Apr. 3, 1977: Q5.

[3] Erik Sandberg-Diment, “Project Management on a Shoestring,” *New York Times*, Jun. 15, 1986: F16.

[4] Hank Burchard, “Floppy Disks, Family Trees and Fun Data,” *Washington Post*, Apr. 22, 1988: WE8.

[5] Allison Silver, “Where Concierges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New York Times*, Apr. 22, 1979: R1.

[6] Ad,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 16, 1981: 20.

[7] A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 21, 1984: 11; May 16, 1985: 24.

[8] Tom Keane, “Volvo’s S70 Looks Even Better in the Flesh Than in Press Photos,” *Washington Times*, Jul. 25, 1997: E1.

人们在实行大笔消费时,需要谨慎和理智。对于议价商品和服务,消费者不要落入销售者的价格陷阱。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因此,报纸建议,旅客购买机票确需谨慎。^[1]而当汽车经销人员摆出一副“孔子面孔”,声称自己极想为购买者降低价格,但难以做到,消费者切勿轻易让步。^[2]房屋装修莫不如此。业内人士建议,不要局限于一间公司的报价,而“孔子则建议货比三家”。^[3]

投资理财,需要审时度势,果断出手。五年以前,一对夫妇本想购买纽约曼哈顿的一套合作公寓,却最终放弃。五年之间,房屋价值业已达原价四倍,令夫妇懊悔不已。他们决心听从孔子劝告“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重新搜寻适当房屋,投资购买。^[4]63岁的洛杉矶市民约翰·W. 希夫勒(John W. Schiffeler)计划出售闲置的家族墓地,获取盈利。希夫勒的商业逻辑源自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的反诘。^[5]

金融投资充满风险,谨慎与果断同样不可或缺。20世纪80年代初,芝加哥各家银行坏账极多,整个行业呈现凋敝之状。理财专家提醒,此时切勿投资,“子曰,资金借出容易(收回难)”。^[6]部分或彻底套期保值是投资者在利润风险中面临的另一难题。投资顾问的回答是,彻底套期保值,“难道不是孔子说过,‘一鸟在手等于二鸟在林?’”^[7]炒股需要关注几大指数的走势,但不可全信,仍需冷静判断,

[1] Jane Morse, “Timely Tips to Keep You Serene and Free of Trouble as You Travel in 1985,” *Chicago Tribune*, Feb. 10, 1985: J27.

[2] Dave Barry, “When Buying a New Car Means Twenty Questions,” *Dallas Morning News*, Feb. 7, 1988: 4F; Dave Barry, “Unraveling the No. 1 Mystery of the Universe—Auto Prices,” *Chicago Tribune*, Feb. 21, 1988: 30.

[3] “Confucius Say Three Estimates,” *Chicago Tribune*, Mar. 13, 1976: W_A18.

[4] Judith S. Gerber, “We Thought We’d Move to the City, But Then...,” *New York Times*, Dec. 19, 1982: L130.

[5] Patricia Leigh Brown, “For Sale in Oakland: I Room, Great View, Quiet Neighborhood, \$250, 000,” *New York Times*, Oct. 30, 2003: A16.

[6] Paul A. Gigot, “Banks Hurt by Penn Square Collapse Were Victims of Oil Slump, Greed,” *Wall Street Journal*, Jul. 19, 1982: 17.

[7] David L. Rogers, “An Error in Example,” *Los Angeles Times*, Jun. 5, 1983: F5.

因为“孔子”说,“他们有时对,有时错”。^[1]20世纪80年代中期,亚特兰大的房地产行业陷入通货膨胀引发的泡沫之中,金融管理专家因此警告投资者,“我认为,孔子说过,把钱给房地产开发商如同送威士忌给印第安人”。^[2]印第安人酗酒之后,更难控制,此处用这一典故,形容房地产业的发展现状。

三、娱乐生活中的孔子元素

日常生活离不开消遣调剂,娱乐活动因此必不可少。孔子或者作为娱乐主题,或者号召人们放松心情。角色虽有变化,孔子俨然已成美国人娱乐生活的重要因素,推动着中美社会的交融。

电影电视乃美国家居生活中的主要消遣方式。以“语录”点缀人物对话是孔子参与影视娱乐的第一种方式。较为著名的当数陈查理的“子曰”,1989年以84岁高龄去世的罗兰·温特斯(Roland Winters)曾六次出演满嘴“子曰”的陈查理。^[3]由此派生出的杰基·陈(Jackie Chan)动画片,同样以“孔子式格言”为对白特点。^[4]一部电视剧聚焦旧金山唐人街的一个华人家庭。家庭成员经营着自助洗衣店,时常开着“子曰”之类的玩笑,其乐融融。^[5]第37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上的台湾电影《人间喜剧》充斥着孔子的忠孝原则。^[6]而在电影《贝壳里的幽灵》(*Ghost in the Shell*)中,各类人物也会不时抛出

[1] Bill Hendrick, “Your Broker Probably Didn’t Tell You, But...,”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Oct. 6, 1986: C4.

[2] Nick Poulos, “Commercial Real Estate May Face Five-Year Slump,”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Sept. 18, 1986: D1.

[3] “Deaths Elsewher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Oct. 26, 1989: D8.

[4] “Getting Animated,” *Washington Post*, Sept. 22, 2000: C11.

[5] John Anders, “TV Shows You Might Just Fall For,” *Dallas Morning News*, Jul. 1, 1987: 1C.

[6] “Chicag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eviews,” *Chicago Sun-Times*, Oct. 17, 2001: 54.

几句孔子语录。^[1]女演员安杰拉·多尔曼(Angela Dohrmann)虽非华裔,却也时常在电影里讲出几句“孔子”格言。^[2]作为影视主题是孔子参与美国影视娱乐的第二种方式。电视专题片“国际传记——孔子:智慧格言”关注孔子思想,解释他在中国的神化过程。^[3]在一部儿童动画片中,孔子、富兰克林和两个虚拟人物展开一场圆桌讨论。^[4]电影《半边天》的创作动机据称来自毛泽东的“孔子式格言”：“妇女能撑半边天。”^[5]

第三,孔子肩负着影视评论者的角色,以独特方式点明作品特征,吸引民众观看。电影《谁也不是笨蛋》的女主人公因为怀孕而被男友抛弃,愤而用筷子刺中男友颈部。影评里的“孔子”说,“千万不要在中餐馆抛弃怀孕女友”。^[6]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但好莱坞电影中的成功者却违背此道,凡事志在必得,与孔子理想相去甚远。^[7]动画情景喜剧《辛普森一家》备受热捧,主人公被称作“聪明的笨蛋”,孔子“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实乃恰如其分的描述。^[8]全国广播公司播放的《马可·波罗》连续剧,虽然背景优美,却让观众感觉无聊。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剧中对白过多。评论者只好以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说明对于人物的絮絮叨叨无可奈何。^[9]第四,孔子是某

[1] Gary Dowell, “‘Shell’ Game,” *Dallas Morning News*, Sept. 17, 2004: 3H.

[2] Glenn Esterly, “Casting Around to Find Jerry’s Girls,” *Dallas Morning News*, Mar. 9, 1996: 4C.

[3] Bob Longino, “Weekend at Hom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Aug. 6, 1998: D5.

[4] Lyle V. Harris, “Living News for Kids,”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Sept. 21, 1998: C3; Jeanne Spreier, “‘Histeria!’ Makes Hash of History,” *Dallas Morning News*, Oct. 18, 1998: 48.

[5] Eleanor Ringel, “Film Review,”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Apr. 29, 1988: P11.

[6] Eleanor Ringel, “‘Nobody’s Fool’ Is a Fool’s Errand for Writer Beth Henley,”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Nov. 7, 1986: P1.

[7] Janet Maslin, “Movies Reflect Ethics of Business,” *Chicago Tribune*, Apr. 16, 1987: 14.

[8] Phil Kloer, “Just Say D’oh!”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Apr. 5, 2002: E1.

[9] Howard Rosenberg, “‘Marco Polo’: Beautiful But Boring,” *Los Angeles Times*, May 12, 1982: H8.

些影视从业者的前进动力。例如，鉴于孔子在思想界的崇高地位，有人志在成为“音乐电视一代人中的孔子”。^[1] 科普电视专题片的一位编剧常年奔波世界各地。当被问及此种生活方式是否影响婚姻时，编剧以杜撰的孔子语录作答：“孔子应该说过，伟大婚姻关系的基本要素就是经常分别，开始装聋作哑。正好，我们很少见面，即使见面，她也不听我的”。^[2]

舞台艺术是美国娱乐的另一大类。音乐节目又是舞台艺术的重要支撑，其间充斥着众多的孔子元素。高雅音乐的推介文章不忘利用孔子的盛名，吸引听众。20世纪70年代中期，交响乐团陷于低迷状态。为此忧心忡忡者大声疾呼，既然远在古代的孔子都已意识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观其深矣”（《礼记·乐记》），当今的美国人更应明白，“音乐是文化发展的体温计”。民众因此需要行动起来，拯救高雅音乐。^[3] 在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熟悉真正的孔子语录，因而常以编撰的孔子格言，拓展高雅音乐市场。例如，洛杉矶爱乐乐团有百人之众。面对湮没个性的指责，支持者声辩道，“孔子应该说过，数量大就安全”。^[4] 莫斯科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于1981年造访洛杉矶爱乐乐团，虽然为时较晚，广告文章依然写道，“正如孔子所说，迟到总比不到好”。一位本土指挥家得到相同的评论。^[5] 该乐团的另一场音乐会“躁动浮华”之嫌，然而，“孔子和爱因斯坦肯定说过，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6] 乐团秉承高雅宗旨，拒绝庸俗，还是有“孔子”语录为据：“正如孔子所说，风格就是一切。”^[7] “孔子”曾说，“千里之行，始于足

[1] Kent Garneau, "Schmaltzy 'Flyer' Hits Turbulence," *Chicago Tribune*, Feb. 28, 1992: N.

[2] Laura Evenson, "Have Ideas, Will Travel,"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 27, 1996: E1.

[3] "Readers Writ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8, 1974: 18.

[4] Martin Bernheimer, "Philharmonic Quintets," *Los Angeles Times*, Dec. 14, 1977: H18.

[5] Martin Bernheimer, "Kiril Kondrashin Makes Pavilion Debut," *Los Angeles Times*, Feb. 21, 1981: B6; Martin Bernheimer, "Tilson Thomas Leads Stevens' Sinfonia Breve," *Los Angeles Times*, Sept. 2, 1982: J1.

[6] Martin Bernheimer, "Youthful Focus at Philharmonic," *Los Angeles Times*, Mar. 21, 1981: C4.

[7] Martin Bernheimer, "Pervin Surveys Modern Romantics," *Los Angeles Times*, May 6, 1986: H3.

下”。圣路易斯交响乐作曲家约瑟夫·施万特纳 (Joseph Schwantner) 受此启发,认为创作过程“始于题目”。^[1]为鼓励观众参与和鞭策乐团指挥,再一则杜撰的孔子格言是,“没有麻木不仁的观众,只有缺乏激情的乐队指挥”。^[2]

点评通俗音乐的文章照样不乏孔子典故。例如,一位 71 岁的吉他乐手擅长演奏爵士灵歌风格的音乐,“孔子”是其代表作。^[3]24 岁的爵士乐钢琴演奏者斯蒂芬·斯科特 (Stephen Scott) 多才多艺,其散文“青年孔子”“言辞尖刻、风格清新而又无拘无束”。^[4]虽然爵士乐极为流行,能够给予明确定义的听众却很稀少。评论者希望喜欢爵士乐但又不知爵士乐为何物的人,记住孔子的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论语·子路》)^[5]一名高科技音乐乐手则直接称呼自己为“孔子”。^[6]

牵涉孔子的戏剧是我们必须论及的又一舞台艺术门类。提起圣路易斯的戏剧,人们自然会想到圣路易斯城市剧院,但“正如孔子或其他类似的圣人所指出的,真实情况极少如表面所见”,圣路易斯欣赏戏剧的去处很多。^[7]美国芭蕾舞剧院推出的芭蕾舞剧《睡美人》显得“马虎粗糙”,但支持舆论却写道,“孔子应该说过,凡事都有相对性”。^[8]与此同时,孔子还以各种方式成为戏剧内容的一部分。在某些时候,剧中对白会采用“孔子”格言。如《疯狂夜晚》中的主人公就是满嘴“子曰”。^[9]喜剧《早晨的生姜》有句对白是,“女人如铜锣,

[1] Marc Shulgold, “Schwantner: He’s Entitled,” *Los Angeles Times*, May 27, 1984: S48.

[2] Martin Bernheimer, “Sanderling at Segerstrom Hall,” *Los Angeles Times*, Oct. 3, 1986: 11.

[3] “Performing Arts,” *Washington Post*, May 10, 2004: C5.

[4] Mike Joyce, “Jazz Pianist Scott: Heart and Hands,” *Washington Post*, Jun. 18, 1993: N9.

[5] Geoff Edgers, “Over and Out,” *Boston Globe*, Dec. 28, 2007: D1.

[6] “Performing Arts,” *Washington Post*, Aug. 20, 2007: C5.

[7] Martin Bernheimer, “‘La Boheme’ in St. Louis,” *Los Angeles Times*, Jun. 9, 1978: OC_A1.

[8] Martin Bernheimer, “Yoko Ichino in ‘Beauty,’” *Los Angeles Times*, Jan. 22, 1979: E7.

[9] Sondra Lowell, “‘One Mad Night’ Like a ‘40s Movie,” *Los Angeles Times*, May 26, 1980: E6.

应该经常敲打”。这被称作该剧“最佳台词”，据信为孔子所说。^[1]孔子还在某些戏剧中充当角色。^[2]

在欣赏音乐和舞台艺术之余，美国人还可参观内容各异的展览，其中与孔子有关者颇多。孔子首先是很多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位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中心的克罗亚洲艺术博物馆（Crow Collection of Asian Art）开门迎客。展览环境静谧，利于沉思，门口安放着重达2000磅的孔子雕像，参观氛围更显肃穆。^[3]1977年，洛杉矶艺术博物馆举办“南加州收藏的中国玉”展览，宣传材料特别提及孔子“君子比德于玉”之说（《礼记·聘义》）。其他玉石展也会借用孔子此言，大做广告。^[4]耶鲁大学艺术馆在1980年举行“以小见大”展，汇聚一批中国古代丝扇。其中一面扇子上绘有孔子树下听笛的情形。^[5]华盛顿弗里尔艺术馆的“战国时期的中国艺术”展尽管与孔子没有直接关系，依然把孔子作为亮点之一，因为展览涵盖“孔子之后，长城（修建）之前的两个半世纪”。^[6]1981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力克竞争，赢得60件中国早期绘画与书法作品的收藏权，成为西方第一家中国书法与绘画作品并重的博物馆。评论者极为看重这一举措，称其具有一锤定音之效：“孔子虽然没说，但万里之行确需止于一步。”^[7]1999年，纽约曼哈顿一家博物馆别开生面地举办了“亚

[1] David Richards, “Ginger in the Morning,” *Washington Post*, Dec. 8, 1981: D14.

[2] Rick Kogan, “It’s a Tough Job—Judging a Jeans Contest,” *Chicago Tribune*, Mar. 7, 1986: NW2; Jonathan Williams, “Vizarts Electronica,”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Jun. 8, 2000: 33.

[3] “Heavy Lifting,” *Dallas Morning News*, Oct. 3, 1998: 40A; Janet Kutner, “Crow’s Feat,” *Arlington Morning News*, Nov. 29, 1998: 6C; Mike Daniel, “Surround Her with Beauty,” *Dallas Morning News*, May 7, 2004: 31.

[4] Joan M. Hartman, “Stone Age to ’77: The Ineffable Mystique of Jade,” *Los Angeles Times*, Jan. 16, 1977: T70; Wendy Moonan, “It’s Jade Time at the Galleries and the Fair,” *New York Times*, Mar. 26, 1999: E43.

[5] Vivien Raynor, “Paintings of China in 8 Centuries,” *New York Times*, Dec. 7, 1980: CN32.

[6] Joanne Ostrow, “Riches of the Orient, All over Town,” *Washington Post*, Oct. 1, 1982: W27.

[7] “The Met’s Chinese Coup,” *New York Times*, Dec. 13, 1981: E13.

洲古代娱乐”展,陈列多种陶塑形象,显现娱乐情形。参观者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即便参加射箭比赛,人们也是穿戴整齐,恰如孔子所说,“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1]2005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行“中国艺术中的学者、神灵和圣人”展,形象诠释出孔子制定的行为规范和中国其他生活准则。^[2]

某些展览虽与孔子毫无关联,也常有牵涉孔子以做广告的情形。1989年,一颗14磅重、如橄榄球大小的珍珠即将在洛杉矶展出并拍卖。为增加人气,组办方除了强调不同寻常的体积之外,更是信誓旦旦地声称,人们能够在珍珠表面看见孔子等圣人的影子。^[3]但拍卖似乎并不顺利。一年之后,巨型珍珠再度公开展示和拍卖。组办者继续宣称珍珠能映出孔子形象,而且言之凿凿地告诉参观者,2500年前,中国的老子把附身符放入蛤蜊,这枚珍珠由此慢慢长成。^[4]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旅游部门在一块冰川前立有告示,上面写着“该冰川比……孔子……还要古老”。^[5]芝加哥魔术与电影名人馆(Magic & Movie Hall of Fame)设有口技史展览,孔子据称曾提及口技,这给展览增加不少历史底蕴。^[6]

四、孔子与体育运动

热衷体育是美国生活的一大特色。门类繁多的赛事,是处可见可闻的体坛评论,无不提示着人们,美国人具有巨大的体育热情。在参

[1] Paula Deitz, "The Arts of the Game, Martial and Delicate," *New York Times*, Mar. 28, 1999: AR47.

[2] Holland Cotter, "A Culture of Braiding Many Lives into One," *New York Times*, Dec. 31, 2005: B9.

[3] "For Sale: Football-Sized Pearl for \$10 Million,"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Nov. 18, 1989: A15.

[4] "Largest Pearl Placed on Sale," *Washington Times*, May 7, 1990: B10.

[5] Robert Cross, "Out of Anchorage," *Chicago Tribune*, Apr. 13, 1997: 1.

[6] Gary Dretzka, "In the Belly of the Beast," *Chicago Tribune*, Jun. 30, 2000: 5.

与和点评体育运动之时，美国人喜欢引经据典，显示言之有据。就是在此背景之下，孔子进入了美国的体育运动，或真或假的孔子语录帮助人们言简意赅地评论体育活动。

第一，各种球队的战术策略可圈可点，孔子的出现既能让点评一语中的，又不失轻松幽默。球队的组织 and 用人之术尤为重要。很多球队引用孔子之名，佐证措施的正确性。例如，1977年10月，新泽西州的“巨人”橄榄球队为引进一名球员，向球员原先效力的迈阿密“海豚”队支付巨额补偿金。面对众人的不解，球队官员解释道，“子曰，‘我们要最终选择有名气的人’，因此补偿物有所值。”^[1]“幼兽”棒球队赛场战术新颖别致，遭到非议。球队负责人不为所动，而是“如孔子一样敏锐”地说，“要等一两年之后尘埃落定之时”再来评判。^[2]该队教练的办公室墙壁上还贴着孔子语录，以图激发战术灵感。^[3]

策略失误亦能通过孔子映衬出来。1975年，芝加哥一支冰球队认为比赛胜券在握，疏忽大意，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评论写道，“子曰，被消灭的捷克人还有可能跳起来”。^[4]某教练对球队的防守策略颇有微词，发誓要找出问题所在，正如“孔子”所说，“在救生艇上，你需要首先查看哪里有漏洞”。^[5]对于不愿及时总结教训的球队，评论者以“孔子”语录加以解释：“坏习惯很难改正，更难抛弃”。但球队必须时刻处于变革之中，方能获胜。^[6]接连在比赛中失利之后，“达拉斯牛仔”橄榄球队教练表示，得分乃当务之急，“我们清楚这一点，

[1] Michael Katz, “Giants’ Beau Geste: Give 2 Draft Picks for Csonka,” *New York Times*, Oct. 18, 1977: 51.

[2] Mike Downey, “Hendry’s Heists May Help Cubs Hoist Title Flag,” *Chicago Tribune*, Jul. 24, 2003: 1.

[3] Paul Sullivan, “Letter from the Cubs Beat,” *Chicago Tribune*, May 19, 2006: 1.

[4] Bob Verdi, “Hawks Scrap to 2—2 Deadlock with Sabres,” *Chicago Tribune*, Dec. 29, 1975: C1.

[5] Blackie Sherrod, “Cowboys Get Healthy Dose of Defense,” *Dallas Morning News*, Nov. 6, 1987: 1B.

[6] “Letters to the Gree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23, 1992: D6; Joan Ryan, “Dana Hall Witnesses Rebirth in Jacksonvill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an. 8, 1997: E1.

不用孔子点拨，我们也知道”。^[1]某桥牌选手本来胜算极大，却因为进攻过于主动而败北，印证了孔子“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之说。^[2]轻视对手往往令自己前功尽弃，“子曰，‘除非确信你没有对着镜子，千万别嘲笑有趣的小球队联合会’”。否则，这只能是嘲笑自己。^[3]在一次棒球比赛中，球队教练采取指定击球员的战术，导致失败。评论模仿孔子的口吻说，“君子不强迫他人为自己击球”。^[4]

第二，球队心态是比赛获胜的重要保证。首先，队员必须充满斗志。“孔子”格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表明，失利之后“重振信心”是关键一步。^[5]孔子有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失利的球队就应该成为“求诸己”的“君子”。^[6]1973年，旧金山“巨人”棒球队立志击败对手，球队经理给队员鼓劲说，“子曰，1973年可能是巨人横扫棒球赛场之年”。^[7]1974年，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篮球队小胜对手。尽管没有骄人战绩，球队教练仍然鼓动队员，“1:0要比0:1好。我想这是孔子说的”。^[8]一篮球队的球员选拔晚会别出心裁，利用“与孔子一样古老的想法”，向观众派发幸运签饼，聚集人气。^[9]“爱国者”队的教练甚至不会放过在更衣室引用

[1] Bob Ryan, "Cowboys Have Been on This Trail Before," *Boston Globe*, Dec. 16, 1996: D8; Cameron Maun, "Red Zone Continues to Be Danger Zone for Dallas Offense," *Arlington Morning News*, Dec. 16, 1996: 4B; Frank Luksa, "Time Is Running Out for Cowboys to Show Offense," *Dallas Morning News*, Dec. 16, 1996: 8B.

[2] Bobby Wolff, "The Aces on Bridge," *Dallas Morning News*, Feb. 16, 2001: 4C.

[3] Jim Murray, "Funny Little League Has Last Laugh," *Los Angeles Times*, Oct. 28, 1980: D1.

[4] "Letter to the Editor," *Los Angeles Times*, Nov. 8, 1986: A2.

[5] Francis Rosa, "Bruins Were Simply Better Getting Back to Basics Translated into a Return to Winning Ways," *Boston Globe*, Oct. 27, 1990: 34.

[6] Howie Evans, "The Knicks: Color Them Black,"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Oct. 20, 1979: 69.

[7] James Tuite, "Confucius Says 1973 Could Be Year of the Giants in Baseball," *New York Times*, Feb. 4, 1973: 228.

[8] Dave Distel, "Las Vegas Defeats Titans, 75—56, in Error-Filled Game," *Los Angeles Times*, Nov. 30, 1974: D1.

[9] David Casstevents, "NBA Draft Crunch Times at Reunion," *Dallas Morning News*, Jun. 27, 1989: 1B.

孔子等人的名言鼓舞士气的机会。^[1] 德保罗 (DePaul) 棒球队教练则是在比赛结束返回驻地的路途上, 不时抛出孔子语录, 活跃气氛, 振奋人心。^[2]

其次, 面对成败, 球队必须宠辱不惊, 敢于为失利负责。例如, 如果比赛不顺起因于经验缺乏, 球队就应该记住“孔子”所说, “经验是最好的老师”。^[3] 梦想一次囊括所有荣誉的球队同样需要以“孔子”格言为戒: “子曰, 聪明的人一次只吃一头大象。”^[4] 假设内部存在争执, 球队则应正视现实, 加以整顿, 因为“子曰, 嘎吱作响的轮子应该上油了”。^[5] 如有队员离心离德, 球队就必须有应对麻烦的思想准备: “子曰: ‘将响尾蛇带上床的人不应抱怨睡眠不好。’”^[6] 内部团结极为重要: “孔子可能宣称过, 相互团结的人能够有朝一日成为一支勇夺胜利的球队”。^[7] 即便失利, 也无需谴责对手, 还是有“孔子”格言为证: “怀有积怨者为双方掘开了坟墓。”^[8] 失败一方不要太在意战果统计, “用孔子的话说…… ‘统计数据就是为失败者而设’”。^[9] “孔子”还说, “如果有人认为, 昨天的胜利能够赢得明天的比赛, 那他必须学会生活在现在时”。因此, 球队不能因为已有成绩而滋生懈怠情绪。^[10]

第三, 某些驰骋赛场者, 因其智慧或不凡表现, 被冠以孔子之

-
- [1] Dan Steinberg, "How to Win Games and Influence People," *Washington Post*, Apr. 1, 2006: E1.
- [2] Shannon Ryan, "Going Nowhere," *Chicago Tribune*, Jan. 28, 2009: 2.
- [3] Jeffrey L. Marsh, "Guide for the Beginner," *Los Angeles Times*, Jun. 30, 1974: OC_B12.
- [4] Blackie Sherrod, "Advice That Would Have Been Given," *Dallas Morning News*, Aug. 29, 1986: 1B.
- [5] Blackie Sherrod, "Answering Mail on Brits, NFL, DOAK, Drugs, NBA....," *Dallas Morning News*, Aug. 4, 1986: 3B.
- [6] "Raiders, Davis and Outrag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pr. 15, 2001: C2.
- [7] Harless Wade, "Simonini, Walker in Spot," *Dallas Morning News*, Oct. 23, 1973: 2.
- [8] Shirley Pocivh, "In Triple Crown Finale, Winner Let His Bloodlines Do the Talking," *Washington Post*, Jun. 12, 1988: 58.
- [9] Blackie Sherrod, "Racehorse Captures Fans, If Not Trophy," *Dallas Morning News*, Jul. 24, 1997: 27A.
- [10] Francis Rosa, "Bruins Sag, 3—2," *Boston Globe*, Mar. 4, 1983: N.

名。孔子成为不俗表现的代名词。篮球教练乔治·拉维林 (George Raveling) 言辞风格独特, 反应敏锐, 据信颇有孔子风范。^[1] 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循环赛的评论员总能激发人们观看比赛的激情, 因而有协会“驻会孔子”之称。^[2] 钓鱼常被视作休闲娱乐方式, 但里克·克朗 (Rick Clunn) 是处宣传, 力图让钓鱼运动跻身体育竞技之列, 成为钓鱼运动的孔子。^[3] “美国”冰球队教练蒂姆·泰勒 (Tim Taylor) 谦逊温和, 执教有方, 据称堪比孔子笔下的君子。^[4] 多名高尔夫球教练也因为成绩显著, 而获“孔子”美誉。^[5] 被称作“孔子”的其他教练也时有所见。^[6]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上, 美国男子篮球队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 美国控球后卫贾森·基德 (Jason Kidd) 因为曾经获得奥运金牌, 被视作美国队的“孔子”。其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其他队员。评论者声称, 甚至孔子本人会因有这样一位同名的篮球运动员而感到骄傲。^[7]

除却以上三个方面, 孔子还以其他方式渗入美国的体育评论。比如, 1974 年, 芝加哥新建一座体育馆, 批评者斥其“不够雄伟”。此言一出, 立即遭致反驳。反击者称, 体育馆必须充分利用, 不能以空出很多位置为荣。批其“不够雄伟”者实属不智。孔子弟子曾说, “君子一言以为知, 一言以为不知, 言不可不慎也” (《论语·子张》)。^[8] 拳击运动受两个组织管辖: 世界拳击协会和世界拳击会议。“孔子”说, “一个统治者导致独裁, 两个统治者则引发无政府状态”。所以, 拳击运动

[1] John Weyler, “Raveling Unravelling Reveals Wit,” *Los Angeles Times*, Feb. 9, 1979: F7.

[2] Thomas Stinson, “Changing TV Picture Puts More Scrutiny on Players,”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May 12, 1991: E15.

[3] Ray Sasser, “The Bassmaster,” *Dallas Morning News*, Aug. 18, 1988: 1B.

[4] Kevin Paul Dupont, “Eighth Isn’t Enough,” *Boston Globe*, Feb. 27, 1994: 52.

[5] Scott Ostler, “Crenshaw a Master Agai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pr. 10, 1995: B1; Paul Harber, “Master of the Mind Game,” *Boston Globe*, May 18, 1995: 75.

[6] Skip Bayless, “Jackson Goes West,” *Chicago Tribune*, Jun. 17, 1999: 1; Dan Daly, “Minus Fun, Spurrier Is under Gun,” *Washington Times*, Sept. 24, 2002: C1.

[7] Marc J. Spears, “Kidd Points the Way for US,” *Boston Globe*, Aug. 23, 2008: 11C.

[8] “U. of C. Kicks,” *Chicago Tribune*, Nov. 24, 1974: G13.

必将陷入混乱之中。^[1] 棒球比赛不能整个赛季都精彩纷呈，从而丧失大量球迷。评论者建议，如想赢回观众，比赛必须自始至终悬念迭出，“记住孔子的话：‘两次都踩到同一块石头的人，就应该撞脑袋’”。^[2]

五、余 论

家居琐事、日常娱乐、体育运动构成美国人社会生活的几大部分。而在每一生活领域，孔子都如影随形，既是活动的主题，也是行为的推动者和评判者。但多数人仅有笼统印象，不知孔子的思想细节。关于社会生活的众多评论充斥着杜撰的孔子语录，就是明证。尽管如此，通过人们的口笔相传，孔子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多元文化的构成要素。

孔子介入社会生活，并不局限于上述三大领域，其他环节也经常引证孔子，以明事理，或作为吸引。比如，一位退役的橄榄球运动员特地创办钓鱼训练营，专收男性少年，传授淡水钓鱼技巧。其创办初衷来自“孔子”（实为老子）名言：“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及，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3] 人们也可外出旅游。强调文化传统的旅游不失为一大选择，孔子重视传统的思想为此增添不少文化底蕴。^[4] 各种文化节异彩纷呈，“孔子一定说过，每个人的爱好都可得到满足”。^[5] 乘坐游轮前往欧洲则是另外一种消遣。广告写道，虽然“孔子没有说过”，但事实却是，“没有乘坐豪华‘女王’号的人，他的航游生活就不完整”。^[6]

[1] Jim Murray, "Boxing's Paper Champ," *Los Angeles Times*, Mar. 21, 1978: OC_B1.

[2] "Letters to the Gree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13, 1995: D2.

[3] Blackie Sherrod, "Some Hither, Others Yon...", *Dallas Morning News*, Jun. 15, 1986: 4B.

[4] Martha Stevenson Olson, "Seeking Roots, Finding Them," *New York Times*, Oct. 5, 2003: TR4.

[5] Martin Bernheimer, "Transplanted Festival," *Los Angeles Times*, Jun. 3, 1977: G1.

[6] "Ultimate Joy of Cruise Found Sailing with QE2," *Dallas Morning News*, Jun. 22, 1975: 5.

赏花亦可怡悦身心。每逢金秋时节,菊花必然不能错过。各地竞相推出菊展,吸引观赏者。而在几乎所有推介文章中,孔子“鞠有黄华”(《礼记·月令》)是必须提及的典故。^[1]玫瑰是另外一种广受推荐的花卉。一篇文章写道,“六月属于玫瑰”,孔子曾经提及,中国皇帝的藏书中,关于玫瑰的有600册之多。玫瑰值得种植和观赏。^[2]另有报道称,孔子提到,中国皇帝御花园种植着大量玫瑰,“玫瑰的神秘氛围从此扩散开来”。美国的玫瑰协会是全美最大的专门植物协会,全国的玫瑰品种在一千以上。^[3]正是鉴于玫瑰的历史渊源,《旧金山纪事报》鼓动美国人:“告诉你的家庭园艺专家,孔子也对玫瑰感兴趣”。^[4]孔子盛赞兰花:“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穷而改节。”(《孔子家语·在厄》)因为这一典故,兰花成为美国报纸推荐观赏的另一品种。孔子等历史人物赞扬兰花,为兰花增添了“独特的神秘气氛”。兰花展不仅在美广泛种植,兰花展也是处皆有。^[5]

-
- [1] Dan MacMasters, "Mums for the Mounding," *Los Angeles Times*, Oct. 21, 1973: N83; Charles Fenyvesi, "Marketing Time," *Washington Post*, Nov. 28, 1985: WH30; Steve Dale, "Mums the Word at the Botanical Garden," *Chicago Tribune*, Nov. 14, 1986: F47; Bill Cunniff, "Color Your World," *Chicago Sun-Times*, Oct. 11, 2002: 14; "Free Flower Festival Returns to Lincoln Park," *Chicago Tribune*, Oct. 17, 2003: 22.
- [2] Joan Lee Faust, "Roses Are Busting Out All Over," *New York Times*, Jun. 5, 1977: WC17.
- [3] Darryl E. Owens, "Roses, Those Noble Blooms, Enjoy a Passionate Following and an Illustrious History," *Chicago Tribune*, Feb. 13, 1994: 3; Kathy Trocheck, "The Rosy Blooms of Kings, Queens and Atlantans,"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Oct. 6, 1985: L1.
- [4] L. M. Boyd, "The Grab Bag,"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 20, 1994: 5.
- [5] Joan Lee Faust, "Is Orchid-Growing Difficult? Not Necessarily," *New York Times*, Feb. 4, 1996: CN12; Carol Stocker, "Blooming Image Great Winter Companions, Orchids Are More Popular and More Affordable," *Boston Globe*, Jan. 22, 1998: F1; Melena Ryzik, "Orchid Show," *New York Times*, Mar. 23, 2007: 25.

第二十三章

孔子与战后美国华人的文化想象社区

美国在 1943 年废除排华法案, 1965 年终止有利于西欧的移民配额制度, 两大举动刺激了华人群体的壮大。据统计, 到 2006 年, 在美华人已经超过 300 万。^[1] 然而, 问题也随之而来。得益于就业形势的改善和经济状况的改观, 很多人逐渐搬离唐人街, 散居全美各地, 在地理分布上不再紧凑。在排华浪潮中异常团结的群体内部也开始出现分歧。冷战时期的反共与否、来源地各异、教育程度不同等是导致纷争的常见因素。与此同时, 华人逐渐抛弃“暂居者心理”, 开始积极主动地融入美国的政治与文化体制。跨种族联合成为极为常见的斗争策略之一。有着如此背景, 美国战后的华人群体显示出明显松散之状, 与中国传统有渐行渐远之势。^[2]

[1] Joseph Gustaitis, *Chinese Americans* (Tarrytown, NY: Marshal Cavendish Benchmark, 2010), 7.

[2] Madeline Y. Hsu, "Introduction: Him Mark Lai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America," in Him Mark Lai, *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Politic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1), 4—5; Him Mark Lai, *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 A History of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 (Walnut Creek, CA: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310—11; Chiou-ling Yeh, *Making an American Festival: Chinese New Year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29—55; Xiaojian Zhao, *Remaking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Family, and Community, 1940—1965* (Piscataway,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2), 152—84; Tritia Toyota, *Envisioning America: New 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但不可否认的是,华人仍然是一个整体,并在应用各种手段维系整体特性。论及这些手段,权利斗争引起较多关注,而更加隐性、更难觉察的文化心理策略有遭受忽略之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经提出“想象的共同体”概念,用以说明族群的形成过程。根据这一理论,群体成员通过认同特定的价值观念和象征符号,形成跨越地域的群体身份。^[1]华裔学者令狐萍提倡将华人群体作为“文化社区”加以研究,与安德森的理论本质相同。^[2]随着战后华人分居各地,共同的文化想象日渐明显地成为维系华人整体性的纽带。华人群体实现了从地域聚集社区到文化想象社区的转变。鉴于不言自明的巨大影响力,孔子是华人文化想象社区的关键支撑点。华人崇尚孔子,宣扬孔子,批驳美国社会对于孔子的歪曲。种种举措显示出华人跨越时空距离的相互认同,塑造着紧凑的华人群体形象。

一、孔子与华人的传统延续

文化想象社区的核心基础,就是群体成员超越时空距离、对共同传统的认同。战后美国华人虽然散居各地,却都在以各种方式延续着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这就是华人文化想象社区得以构建的根本保证。孔子在华人事关传统的言行中频繁出现,乃促成和维系文化想象社区的关键步骤。教育、群体仪式和日常言辞构成华人借助孔子延续传统、借助传统维护想象社区的重要领域。

教育历来肩负着延续群体传统的重任。对于战后美国华人,尽管同化已成首要任务,以孔子及其思想为主导的教育内容依旧为各地华人所看重。传统教育有助于显示华人的群体存在,有利于平等权利,

[1]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1991), 19—22.

[2] 令狐萍:“美国华人研究的新视角:文化社区理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25—31页。

而且符合美国战后的多元文化趋势，其地位因此并未经受根本动摇。在此方面，中华会馆作出了不懈努力。由会馆主办、学习中国传统的学校遍及全美主要华人社区。纽约中文学校的宗旨就是，“防止中国城的儿童在眼花缭乱的新世界忘掉古老而庄重的中国传统”。孩子们在教室里“以奇怪的音乐节奏，齐声背诵”四书五经，领会着“孔子教诲”。^[1]会馆在洛杉矶主办的中文学校设于当地孔庙之内。学生必须每天向墙壁上的孔子画像三鞠躬。谈及办学初衷，为学校募集资金的李夫人解释道，年青一代华人加速美国化，传统信仰逐渐松懈，“但我们不想忘记我们的传统”，以孔子思想为核心教育内容的学校“见证着保护（传统的）努力”。^[2]学校内部到处张贴着孔子的画像，儒家道德是核心教学内容。^[3]作为亚洲以外最大的华人聚居区，旧金山中国城经历着同样的变革，道德涣散，秩序混乱。中华会馆愈发觉得，传统道德观念是华人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会馆声称，“中国城的任何问题都能用儒家古老的节制和忠孝美德加以解决”。^[4]就是在加州小镇弗雷斯诺（Fresno），孔子学校也在一如既往地传授着中国的传统。^[5]

即便是在普通华人之中，倡导儒家教育也绝非个别现象。在中国批孔运动最盛之时的 20 世纪 70 年代，《芝加哥论坛报》表示，美国华人“学习孔子（依然）充满生机和热情”。总体兴趣的确有所减弱，但华人子女对于孔子的学习却未中断。^[6]有些美国华人家庭甚至把子

[1] “Culture of Old Cathay Lives Anew in Hearts of Chinatown’s Children,” *New York Times*, Jan. 29, 1951: 21.

[2] Marlene Cimon, “Chinese Keep Heritage Alive through Schooling,” *Los Angeles Times*, Jul. 18, 1969: 1, 6.

[3] David Holley, “Chinese in Tug of War for Loyalty,” *Los Angeles Times*, Jul. 21, 1985: V1.

[4] Kenneth Lamott, “The Awakening of Chinatown,” *Los Angeles Times*, Jan. 4, 1970: N6.

[5] Tia Gindick, “Fresno Receives High Marks from Its Natives, Despite Survey Scores,” *Los Angeles Times*, Oct. 6, 1985: G1.

[6] “Action Express,” *Chicago Tribune*, Feb. 28, 1974: A1.

女送到香港和台北,陶冶孔子思想。^[1]很多华人家长还从孔子强调学业的立场出发,对子女学习严加管束,力促学业有成。^[2]就是当前,华人学生仍需按照孔子的要求,勤奋学习,周末则在中文学校承继中国传统。^[3]2007届华人中学生斯蒂芬·刘(Stephen Lau)在毕业致辞中,引用孔子“从心所欲”(《论语·为政》)的教导,鼓励同学做一个真实的自我。^[4]这与华人社会的传统教育不无关系。

学校之外的教育手段亦在无时无刻地重现以孔子为核心的中华传统,鼓励华人民众参与文化想象社区的建构过程。芝加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就是强化孔子信仰的绝佳去处。室内南北墙壁上的立体景讲述着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孔子的事迹占据了其中几幅。立体景“大受孔子研究者和崇拜者的欢迎”。^[5]纽约唐人街的中国博物馆也是如此。真人大小的孔子雕像,辅之以孔子生平、中国乐器和筷子等实物,直观展现中国文化。除圣诞节之外,博物馆常年开放。^[6]博物馆“追溯多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成就”,“急于向儿童介绍中国习俗”。^[7]家庭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保险公司的西海岸总代理哈里·刘(Harry Lew)表示,随着中国城逐渐空心化,他会在家里让孩子接受包括孔子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教育。^[8]无论如何,中国传统的捍卫者绝不会允许青少年“忘记祖宗或者中国最伟大哲学家孔子的智慧”。^[9]

[1] “Homeland Changes: Chinese Abroad Search for Identit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5, 1973: 4.

[2] Joan E. Rigdon, “Exploring Myth,” *Wall Street Journal*, Jul. 10, 1991: A1.

[3] Holly Yan and Stella M. Chavez, “Chinese Schools Attract More Than Just Asian Kids Fighting Stereotype,” *Dallas Morning News*, Sept. 21, 2008: 1A.

[4] “Guinnett Opinions,”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May 27, 2007: J10.

[5] Sylvia Shepherd, “Quaint Beauty of Chinatown Impresses Throngs of Midwesterners for 50 Years,” *Chicago Tribune*, Feb. 2, 1964: SW2.

[6] “Going Out Guide,” *New York Times*, Sept. 15, 1975: 13.

[7] “Amusements for Children,” *New York Times*, May 8, 1974: 50.

[8] Jerry Hulse, “Chinatown Changing as Suburbs Call Residents,” *Los Angeles Times*, Oct. 26, 1959: 22.

[9] Vincent Butler, “Report from New York,” *Chicago Tribune*, Nov. 12, 1961: 50.

民俗仪式是各地华人显示孔子信仰、以传统为工具构建想象社区的又一途径。农历新年拥有其他节日无法比拟的象征意义，孔子绝对是春节庆祝活动的主要角色。华人社团和精英经常通过报纸向全美华人表达新年问候，他们不忘在提及新年生肖之时，告诉人们依据孔子诞辰推算的年代。^[1]由于华人新年庆祝活动散发着浓厚的孔子气息，有报道别出心裁地使用了以下标题：“孔子一直是怎么说的？”^[2]1998年春节，华盛顿的唐人街锣鼓喧天，舞龙队伍逶迤而行，戴着白色假胡子、穿着长袍的“孔子人物”穿梭其间，驻足街道两旁的人们欢呼雀跃。^[3]2010年，又一个春节来临之际，华盛顿的唐人街计划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庆祝活动，孔子展是其中的重要内容。^[4]孔子诞辰纪念也发挥着刺激华人群体认同的作用。1974年的孔子诞辰日，洛杉矶“保护中国文化委员会”举行庆祝活动，欢迎公众参加。^[5]1984年，洛杉矶的孔子诞辰纪念规模更为宏大，不但传统仪式一应俱全，孔子直系后裔孔德成也亲临现场。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强调，“仪式对于年轻人尤其重要”。54个中文学校因此均有代表出席。^[6]甚至有华人提议，将每年的9月28日设定为旧金山的“孔子日”。^[7]有些华人保持着家

-
- [1] 例如：“Chinatown Greet New Year with ‘Crackers’ and Dragon,” *Washington Post*, Feb. 20, 1950: 1; Meyer Berger, “About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Feb. 1, 1954: 25; “Fete Marks a New Year for Chinese,” *Washington Post*, Mar. 15, 1954: 2; Warren Unna, “Street Dance and Fireworks Mark Chinese New Year,” *Washington Post*, Feb. 8, 1954: 11; Harry Gabbett, “Chinese Greet New Year with Dragons and Drums,” *Washington Post*, Feb. 13, 1956: 25; Wendell Bradley, “Dragons Visit Chinatown to Welcome New Year,” *Washington Post*, Feb. 24, 1958: B1.
- [2] Pat Colander, “How Would Confucius Say Auld Lang Syne?” *Chicago Tribune*, Feb. 7, 1975: B1.
- [3] Francesca C. Simon, “Year of the Tiger Ushered In,” *Washington Times*, Feb. 2, 1998: C5.
- [4] “Happy Chinese New Year (and Valentine’s Day),” *Washington Post*, Feb. 12, 2010: T4.
- [5] “Chinese Culture,” *Los Angeles Times*, Sept. 27, 1974: H15.
- [6] Mathis Chazanov, “Chinese Throw a Birthday Party for Confucius,” *Los Angeles Times*, Oct. 28, 1984: OC_A6.
- [7] Rob Morse, “Guzzling for Conservatio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l. 23, 2001: A2.

族聚会的传统，这也是群体凝聚的重要手段。波士顿唐人街的李氏家族就在1998年7月举行了一次家族盛会，数百名族人从全美各地赶来。新英格兰李氏家族协会的秘书表示，活动得以举办的根本原因是，“我们遵循孔子哲学”，即姓氏相同者必然源于同一祖先。^[1]

而在日常生活中，华人不时表现出尊崇孔子的心理，进一步说明孔子是华人文化想象社区的维系纽带。对于众多华人而言，孔子思想已成其价值取向的关键要素。比如，因为孔子强调尊敬老人，得克萨斯州华人顾先生历经五年努力，终于建成一栋廉租老年公寓，引来社会各界的赞扬。^[2]在佐治亚州一所大学任教的吴先生，以孔子“诲人不倦”（《论语·述而》）之语自勉，深得学生好评。^[3]居住在纽约的两位王姓华人酷爱书法，风格飘逸，不拘一格，诠释出孔子名言“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深刻内涵。^[4]T.Y. 林荣获1995年加州大学杰出校友奖。其致辞表示，孔子和牛顿制定的法则“共存于他的统一世界观”。^[5]来自台湾的吴永志（音）治病救人，自称深受孔子影响，因而敢于创新，绝不迂腐。^[6]即使已经皈依基督的爱德华·何（Edward Ho）也没有忘记孔子的古训，经由其口的上帝福音总是点缀着孔子的真知灼见。^[7]

有些人虽然没有表现出以孔子思想指导行为之意，却乐意用孔子

[1] Stephanie Ebbert, "Legions of Lees Land in Bay State," *Boston Globe*, Jul. 2, 1998: B1.

[2] Joe Simnacher, "Senior Citizen Apartments Dedicated," *Dallas Morning News*, Feb. 25, 1996: A30.

[3] Ben Smith III, "Meet the Wus, With All American Dreams,"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Jul. 4, 1996: E5.

[4] Pamela Burdman, "Ancient Art, Ancient Artist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Feb. 26, 1997: B1.

[5] Allan Temko, "Lin's Designs Unify Eastern, Western View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 10, 1997: A4.

[6] Bob Condor, "Physician and Sculptor Yeongchi Wu Finds Healing Arts and Fine Art Occupy Common Ground," *Chicago Tribune*, Sept. 11, 1997: 1.

[7] Christine MacDonald, "On a Mission to Malden Retired Cleric Reaching Out to Chinese Immigrants," *Boston Globe*, Mar. 22, 1998: 1.

解释自己的举动。这是在以另一方式加深着中国传统与华人群体身份之间的联系。蜚声全球的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 (Ieoh Ming Pei) 在解释自己的建筑理念时, 特别提及孔子和美国立国之父托马斯·杰斐逊的深刻影响。^[1] 陈姓女士本居香港, 后因邂逅美国海员而结婚并定居美国。她认为, 当初的偶遇实属天意, “肯定是孔子安排的”。^[2] 嫁入豪门的玛丽·刘 (Mary Lau) 拥有众多住宅, 但却调侃说, “我不愿说我有 7.5 栋住宅, 因为孔子说, 你在每一周的每一天所拥有的房子不能超过一栋”。^[3] 当然, 孔子并无此言。刘的杜撰恰恰表明, 孔子之名影响仍然牢固。旧金山的马克斯·刘 (Max Lau) 是一名同性恋者。当他惴惴不安地告知父亲时, 其父深表理解, 因为“中国哲学家孔子都说, 性是自然的”。^[4]

华人利用孔子为载体维护传统的行为不局限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 而是遍布全美的华裔在不同场合采取的举措。其中既有群体组织的作用, 也有自发而动的情形。无论何种状况, 华人都在不约而同地强化孔子、中国传统和华人群体之间的联系, 巩固华人跨越地域的整体性。淡化华人传统色彩的言论如有出现, 必然招来反对之声。例如, 1984 年, 有人提议用刀叉代替筷子, 并实行分餐。纽约华埠反响极为强烈, 宣称此言“违背孔子思想, 违背中国哲学”, 意在“摧毁家庭生活的传统”。^[5] 言论固然过激, 却也映衬出华人捍卫传统的决心。

-
- [1] William Marlin, “Pei Ranks High among Great Architect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 12, 1979: 17.
- [2] Jean Bennett, “East Meets West at Harris Table,” *Los Angeles Times*, May 23, 1974: H4.
- [3] Lois Romano, “Whirling Derby,” *Washington Post*, May 7, 1984: C1.
- [4] Vanessa Hua, “Noodle Magazine Caters to Gay Asian American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n. 30, 2002: G1.
- [5] John F. Burns, “Peking Has Seen the Future—And It Lacks Chopsticks,” *New York Times*, Dec. 24, 1984: 1.

二、彰显孔子认同的群体对外行为

华人相互认同,不仅体现在不约而同延续孔子传统的群体内部行为,而且融入了华人展示给整个美国社会的尊孔行为。尊孔不分地域和时间,在华人与其他族群的众多交流场合均有表现。言及载体形式,盖有与外部社会的物质交流和话语交流等。此类对外性质的尊孔举措见证着华人构建整体形象的努力。华人内部延续传统之举有助于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彰显孔子的对外行为则将这种认同转化为其他群体认知华人的切入点。

公开而形象地展示孔子影响是华人与外部社会涉孔物质交流的核心功能。外部社会一旦接触此类物品,必然更加紧密地将孔子与华人联系在一起。华人构建的文化想象社区也就更加牢固。各地华人制作以供出售或展示的装饰品乃物质交流形式之一。1950年,纽约举行庆祝联合国成立五周年大游行。华人崇正会(Tsung Tsin Association)制作了“孔子”游行彩车,结果拔得头筹,荣获爱心奖杯。^[1]华盛顿华人玛丽·米德(Marie Mead)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均有亲戚,本人则以制作和销售贺卡为职业。贺卡上的漫画人物取名“Computious”,融合了孔子之名的英文书写,意即“电脑时代的孔子”。人物妙语连珠,颇有孔子风范。^[2]在展现中国文化的书法展上,华人艺术家挥毫泼墨,为极具美国韵味的风景画配上中国名言警句,如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3]不同地区的唐人街为了维护外界眼中的正宗中国特色,不遗余力的营造传统氛

[1] “Chinese Group Wins U.N. Day Float Prize,” *New York Times*, Dec. 15, 1950: 21. 崇正会是遍布全球的客家华人侨团,宗旨是联络客家华人感情、为会员谋求福利和提供服务、争取合法权利、支持华人参政等。

[2] Linda Keslar, “Artist’s Yen for Cartoons Gets ‘Computious’ Cards on Market,” *Washington Post*, Oct. 17, 1983: WB17.

[3] Sara Gebhardt, “East Meets West on Divergent Paths,” *Washington Post*, Oct. 7, 2004: T32.

围,“类似孔子格言的中文词句”随处可见。^[1]旧金山的杰克·凯鲁亚克巷(Jack Kerouac)因曾经聚集“垮掉的一代”而成著名景点,当地唐人街与之相连。毗邻唐人街的一段在很多牌匾上刻有孔子语录和李白诗作,显示华人传统。^[2]

音像作品是积极宣传孔子的另一物质交流载体。孔子重视音乐,芝加哥华人便从1984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孔子音乐节,吸引众多非华裔听众。^[3]1992年的孔子音乐节,有130多名5到18岁的演奏者参加,观众免费入场。^[4]孔子音乐节的参赛作品还经常现身伊利诺伊州的年度“亚裔美国传统月”庆祝活动,非亚裔群体是主要的目标观众。^[5]而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很多小饭馆里,食客会听到李姓华人现场演唱自编歌曲“子曰”,宣扬良好的道德风尚。^[6]华人还为美国市场拍摄了诸多突出孔子传统的电影。1978年,洛杉矶的一名华人计划拍摄一部基于孔子哲学的电影,劝告人们和平相处,并为电影遴选女主角。^[7]

与主流社会的话语交锋是华人显示群体认同的另一场合。贬损或者取笑孔子乃美国种族偏见的组成部分。华人社会极力反驳。战后华人群体的分散并未减弱反击力度,反而形成驳斥之声此起彼伏之状,成为华人文化想象社区的重要黏合剂。根据美国作家厄尔·德

[1] Deborah K. Dietsch, “Welcome to Chinatown,” *Washington Times*, Aug. 13, 2005: B1.

[2] Carl Nolte, “Kerouac Alley Has Face-Lif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 30, 2007: B1. 克鲁阿克(1922—1969),美国小说家和诗人,“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旧金山的一条街道以其命名,作为纪念。

[3] Jeff Economy, “A Wise Guy, Huh?” *Chicago Tribune*, Nov. 19, 1992: 3; Trevor Jensen, “Barbara Tiao,” *Chicago Tribune*, Mar. 18, 2008: 5.

[4] Heather Lynn Reid, “Program Will Honor Confucius in Music,” *Chicago Tribune*, Oct. 30, 1992: 30.

[5] Itasca O. Wiggins, “Asian American Month,” *Chicago Tribune*, May 8, 1992: 3.

[6] Tamra Fitzpatrick, “Homes Away from Home,” *Dallas Morning News*, Sept. 10, 1997: 1C.

[7] Gertrude Gipson, “Leading Lady Sought for New Movie,” *Los Angeles Sentinel*, Nov. 16, 1978: B3A.

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小说改编的陈查理(Charlie Chan)系列电影,曾经在20世纪20—40年代风靡全美。满嘴“子曰”的陈查理一度被视作美国银幕上最为正面的华人形象,因而在电影最初上映之时,并未引来多少不满之声。^[1]时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影视界意欲再次掀起陈查理热潮,满足民众的怀旧心理。然而,时过境迁,华人社会沉默不再,而是愤而抗议,纷纷抨击系列电影通过歪曲孔子言论而散布的种族偏见。抵制陈查理电影因此成为战后华人跨越地域的群体行为。就在重映信息发布之时,《华盛顿邮报》就已发现,“陈查理归来,社会各界并非一片欢腾,喜悦之至”。对于华裔甚至所有来自东方的族群而言,电影激起的反应“更多的是反感,而非笑声”。纽约大学的华人学生乔治·凌(George Ling)告诉记者,向白人卑躬屈膝而且张嘴便是蹩脚“子曰”的陈查理“不适合我这一代”。^[2]1980年,耗资800万美元的又一部陈查理电影即将拍摄,引来旧金山华人领袖的声讨。他们指责电影具有种族偏见,意在塑造“讲‘炒杂碎英语’、胡乱引用孔子”的亚裔形象。^[3]有评论者甚至把华人的抗议比作“嚎叫”,声称尽管华人反对“子曰”陈查理的举动不会让他的电影销声匿迹,但“可以肯定的是,另一部陈查理电影的诞生必将遥遥无期”。^[4]评论固然有夸张之嫌,但华人批判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而在1982年8月于华盛顿举行的第一届美国亚裔电影节上,华裔电影人和观众也异口同声地谴责陈查理造成的恶劣影响,认为这是一个扭曲孔子而又肤浅的人物,无法展示华人的真实面貌。^[5]

银幕之下,以孔子为素材的笑话是处可闻。华人中义愤填膺者甚众。1973年,因为与两位黄姓(Wong)华人意见相左,《洛杉矶时报》

[1] Ken Hanke, *Charlie Chan at the Movies: History, Filmography, and Criticism*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89), xv.

[2] Gerald C. Lubenow and Lisa Whitman, "Charlie Chan: His Comeback Is No. 1," *Washington Post*, May 25, 1972: C13.

[3] Liz Nakahara, "Personalities," *Washington Post*, Apr. 17, 1980: D2.

[4] Russell Baker, "Lend Me Your Romans," *New York Times*, Apr. 11, 1981: 23.

[5] Liz Nakahara, "Unreeling a New Image," *Washington Post*, Aug. 21, 1982: C2.

的一名白人读者调侃道，“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孔子最先说过，‘二黄一起，同样犯错’”。^[1] 英语里的 Wong 和 wrong (错误的) 发音相近，因而用来增添笑料。但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华人读者的抨击。迪莉娅·梁 (Delia Leong) 愤然写道，生造双关语本来无可厚非，牵涉孔子却属冒犯华人之举。美国人不会取笑耶稣基督或者马丁·路德·金，影响全球华人的孔子频遭揶揄，足见其中的种族偏见。梁呼吁，“‘子曰’笑话到此为止”。^[2] 华人作家也加入到抵制孔子笑话的行列之中。他们以时髦语言创作文学作品，反对“刻板而又油滑的子曰语言”。^[3] 一位华人作者撰文指出，虽然“子曰”等笑话并未让父辈们极为反感，但对于当代美国华人而言，已经是一种成见了。^[4] 面对“恶意中伤的孔子笑话”，芝加哥的华人少年雷·章 (Ray Cheang) 不仅毫无笑意，而且讥讽道：“谁想出的这些玩意儿？”^[5]

与美国社会的其他成员交往，华人的一举一动，不论是有意或者无意，都能显示出特有的相互认同。他们在商品以及其他物品上打上孔子印记，让人过目便知华人群体的存在。如有讥讽或者贬损孔子的情形出现，华人又会不约而同地严加驳斥。孔子的作用不仅在于确立华人共同的文化根源，也在于为各地华人向美国社会彰显群体特性提供了便利。不同地域的华人围绕同一事件作出相同反应，实乃华人想象社区得以延续的有力保证。

[1] “Confucius Say...,” *Los Angeles Times*, Sept. 8, 1973: B3.

[2] Delia Leong, “Wong and Wight,” *Los Angeles Times*, Oct. 6, 1973: B3.

[3] Maxine Hong Kingston, “Middle Kingdom to Middle America,” *Washington Post*, May 1, 1977: 113.

[4] David Henry Hwang, “A New Musical by Rodgers and Hwang,” *New York Times*, Oct. 13, 2002: 16.

[5] Mike Houlihan, “Good Fortune Smiles on Chinese Immigrant,” *Chicago Sun Times*, Nov. 3, 2002: 29.

三、铭记孔子的实物载体

为缅怀孔子,各地华人修有很多以孔子命名的建筑或雕塑。这些地方已成当地华人聚集议事的场所,也是外地华人停留时必然光临之处,更是族裔背景各异旅游者不可或缺的景点。公共建筑和雕塑不仅时刻显示出孔子影响的持续存在,而且通过华人的造访行为,激发他们对于共同文化渊源的思考,因而是华人想象社区的重要纽带。相比前述构建手段,铭记孔子的实物载体能够让人步出各自的心理世界,身临其境地感受和触摸群体的凝聚力之源,为华人的想象社区增加了感官内涵。

在全美铭记孔子的所有公共建筑中,当数纽约唐人街的孔子大厦(Confucius Plaza)最具知名度,人气极旺。孔子大厦于1973年9月破土动工,“有望成为唐人街新的聚焦点”。^[1]大厦由数栋两层到44层不等的建筑物构成,计有762套住房、一所小学、一个医疗中心和一个托儿所。整个工程于1976年竣工。^[2]虽然孔子大厦的修建得益于联邦政府的补贴,项目的发起者却是纽约的中国商会和唐人街住房协会,建筑设计师也是华人。^[3]所以,孔子大厦无论就所处位置还是修建初衷而言,都是当地华人铭记孔子的载体。

自修建计划出炉,孔子大厦便成为当地华人聚集议事之所,名副其实地承担起凝聚华人的重任。工程承包商为白人公司,雇用华裔工

[1] “Ground Is Broken for Huge Project Serving Chinatown,” *New York Times*, Sept. 12, 1973: 49.

[2] John L. Goldman, “Renaissance under Way in Birthplace of New York,” *Los Angeles Times*, Jul. 22, 1973: 14; Robert Hanley, “Chinatown to Get 27—Story Towers,” *New York Times*, May 28, 1974: 78; Joseph Deltch, “A ‘Planner’s Fantasy’ Works in New York,”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13, 1974: 26; “28 Firefighters Injured in Blaze in Chinatown Housing Project,” *New York Times*, Sept. 10, 2004: B3.

[3] David M. Grant, “Computer Rent Program under Siege,” *New York Times*, Oct. 7, 1973: 437; Charles Lockwood, “Bank Helps Remodel New York Cit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11, 1975: 28.

人较少，遭到华人抗议。建设中的孔子大厦已然是华人表达族裔认同的地方。动工伊始，实为华人团体的亚洲人平等会（Asian Americans for Equality）就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华人游行，要求增加华人雇工数量，导致数十人被捕。^[1]另一抗议集会，参与者既有手拿课本的小学生，也有颤颤巍巍的老年人。他们共同声讨施工方歧视华人的行为。^[2]抗议结果未见报道，但华人坚决维护族裔利益的巨大力度却不容置疑。即便在广场竣工之后，纽约副市长对华人的抗议活动仍然不能释怀。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副市长指责在孔子大厦抗议的华人干扰了正常的用工制度。^[3]

孔子大厦一旦建成，便成为华人聚集或者议事之地。中国城的华人学校设在此处。^[4]三三两两的华人喜欢在此谈天说地，或者享受午后的暖阳。^[5]唐人街的餐饮和服装行业，工资历来低于联邦最低标准，当地工会组织便在孔子大厦举行会议，商讨斗争事宜。^[6]而为了搞好人口普查，唐人街社区人口普查委员会在孔子大厦召开动员大会。^[7]唐人街某影像设备公司试图通过闭路向华人住户提供中文节目。在

[1] “Metropolitan Briefs,” *New York Times*, May 18, 1974: 35; Andrew Jacobs, “What a Difference Two Decades Make,” *New York Times*, Jan. 12, 1997: CY4; David Gonzalez, “Asians Heed Maestro’s Cry: ‘Louder!’” *New York Times*, Feb. 7, 1998: B1.

[2] Paul L. Montgomery, “Asians Picket Building Site, Charging Bias,” *New York Times*, Jun. 1, 1974: 33.

[3] Simon Anekwe, “Paul Gibson’s Valedictory Advice to Blacks—Higher Voter Registration,”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Mar. 5, 1977: A2.

[4] Michael T. Kaufman, “Orderly, Respectful and, Yes, a Day-Care Center,” *New York Times*, Nov. 4, 1992: B18.

[5] Michael T. Kaufman, “On Great Benches, Finding Sweet Pleasures of Doing Nothing,” *New York Times*, Mar. 18, 1995: 27.

[6] Donald G. McNeil, Jr., “Teamsters Plan an Organizing Drive in Chinatown,” *New York Times*, May 13, 1979: 38.

[7] Jill Smolowe, “East Bronx Leads City in Rate of Return of Census Forms,” *New York Times*, Apr. 27, 1980: 62.

获得联邦通讯委员会批准之前,公司选择的试点场所也是孔子大厦。^[1]唐人街为无家可归者举行的募捐活动,孔子大厦照样是焦点。^[2]善于抓住商机的华人则在孔子大厦摆摊设点,形成自由市场。虽然环境污染导致周围住户怨声载道,市场并无自行解散之意。^[3]与此同时,孔子大厦见证着日渐频繁的各类华人演出,成为当地华人消遣娱乐的核心区域。^[4]他们表达对于中国政府的态度也多在孔子大厦。1989年的中国政治风波期间,“人权”、“自由”的所谓支持者就是聚集在孔子大厦,呼喊口号,并且举行募捐。^[5]香港回归中国之时,数千名纽约华人在孔子大厦举行盛大集会,欢呼庆祝。^[6]孔子雕像前,人们通过高音喇叭呼喊着“中国人民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7]

孔子大厦凝聚着纽约唐人街的华人,而且是各地华人出入纽约华埠的必经之地,形象提示着华人的群体归属。分散在纽约附近中餐馆的华人从业人员,每天就是在孔子大厦乘坐数百辆面包车和旅行车,往返于纽约和新泽西州北部、康涅狄格州南部、长岛和韦斯特切斯特县(Westchester County)之间。^[8]即使前往大西洋城参与赌博的华人

-
- [1] Margaret Garrard Warner, "FCC Swamped with Applications for New Low-Power TV Stations,"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30, 1981: 33.
 - [2] Marvin Howe, "Second Graders Jump Rope to Raise Money for Neediest," *New York Times*, Jan. 8, 1988: B4.
 - [3] "At a Street Market, Bruised Fruit, Summonses and Rats," *New York Times*, Mar. 10, 2002: CY6; Manny Fernandez, "Post-Holiday Trash Piles, Roasting in Ovenlike Weather," *New York Times*, Jul. 7, 2010: 19.
 - [4] "Chinese Opera—A Lavish Spectacle," *New York Times*, Jun. 10, 1977: 81; "Dance Programs Bring a Touch of Asia," *New York Times*, Aug. 14, 1994: CY9.
 - [5] Robert D. McFadden, "Thousands of Chinese Rally in the U.S.," *New York Times*, May 21, 1989: 20.
 - [6] David W. Chen, "Chinese-Americans Rejoice, Dropping Politics for a Party," *New York Times*, Jul. 1, 1997: A10.
 - [7] William Mullen, "For Chicago's Chinese, Pride Tempered with Concern," *Chicago Tribune*, Jul. 1, 1997: 1.
 - [8] William R. Greer, "City Chinese Waiters Commute to Restaurants in the Suburbs," *New York Times*, Oct. 19, 1984: B1.

也是在孔子大厦集结乘车。每到周末，“穿着破旧衣服和运动鞋”的华人从面包店和快餐店蜂拥而出，登上大巴，去往赌城一试身手。^[1]如果人们需要乘坐出租车，孔子大厦是主要站点。^[2]那些来自美国其他地方，甚至来自中国的华人，由于受到孔子大厦的盛名影响，多会选择孔子大厦附近落脚，作为最初的栖身之所。^[3]

正因为凝聚人气的显著能力，孔子大厦当仁不让地成为外人了解华人社会的窗口。工程尚未完工之时，大厦就已经是纽约观光巴士的固定参观点了。^[4]对于旅行社推出的徒步旅游和饮食旅游，孔子大厦是集结地和线路起点。^[5]需要搜集华人社情民意信息的记者和调查者，往往也在孔子大厦实地考察或采访。^[6]1978年4月，警察对唐人街的黑社会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引发混乱。数月之后，当记者看到孔子铜像前，人们又在悠闲地打麻将时，他相信，唐人街正在实践着铜像基座所刻的孔子语录：“大道之行也……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7]在外人看来，孔子大厦为纽约华埠平添不少异域气息。一则评论写道，因为有了孔子大厦等特色鲜明的建筑，唐人街“让人有置身异国之感，令人兴奋不已”。^[8]《波士顿环球报》也认为，论及纽约古老的族裔聚居地，孔子大厦及其附近地区无疑“最具活力”。^[9]

[1] “Searching for America’s ‘Big Money,’” *New York Times*, Jun. 19, 1992: B2.

[2] Ashley Dunn, “Behind a Deadly Shootout, A Troubled Life of Desperation,” *New York Times*, Dec. 21, 1994: B1.

[3] Philip Seib,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New York’s Lower East Side,” *Dallas Morning News*, Apr. 23, 1995: 5G.

[4] Joseph P. Fried, “Bus Tour Promotes City Bonds,” *New York Times*, Jan. 18, 1975: 28.

[5] “Spare Times,” *New York Times*, Feb. 7, 2003: E42.

[6] David W. Chen, “Welcome, A Bit Blasé, For Fellow Traveler,” *New York Times*, Nov. 1, 1997: A8.

[7] Clayton Jones, “Tranquility Returns to Chinatow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19, 1978: B14.

[8] Untitled Article, *New York Times*, Oct. 24, 1980: C1.

[9] William A. Davis, “A Delight to Explore on Foot,” *Boston Globe*, May 22, 1988: B1.

孔子大厦是纽约及其附近地区华人的重要聚集场所，在华人逐渐向郊区分散的情况下，肩负着凸显华人族裔整体性的重任。华人每一次出入孔子大厦的行为，不论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行为所具有的象征意义，都在潜移默化地巩固着群体认同。因此，孔子大厦是华人以实物载体的形式构建文化想象社区的典型个案。在其他地区，存在类似情形。如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 (Sacramento)， “孔子社区中心” 成为散居华人的联系纽带。^[1] 波士顿的华人进出唐人街，也会途经孔子雕像。^[2]

随着战后华人社会地位的根本改变和郊区化进程的加快，华人搬离唐人街、散居全美各地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维护华人的族裔整体性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在健全制度体系和加强相互联系的显性策略之外，不约而同的孔子认同等隐性策略也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黏合作用。各地华人通过教育和习俗等方式，在年青一代迅速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背景下，顽强地延续着以孔子为核心的中国传统。而在与族外社会的交往过程中，华人也表现出强烈的孔子认同感和自豪感。各地以孔子命名的建筑物则直观地提醒过往华人，尤其是华人青少年，孔子是其族裔身份的一部分。纽约的孔子大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诸如此类个人自发或群体组织的努力，散居各地的华人以孔子为纽带，建起一个不受地域局限的文化想象社区，成为美国多元文化社会的一道亮丽风景。

从美国报纸时常引用孔子点评华人的普遍情形来看，华人捍卫孔子信仰的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农历新年到来之际，《芝加哥论坛报》鼓励人们前往唐人街，看看有无新鲜物品可以购买。但报纸提醒，切记货比三家，因为“孔子如果想到的话，肯定会说，‘将所有蛋卷放进一个篮子并不明智’”。^[3] 一位华人医生应用针灸为人戒烟，

[1] “Walter S. Fong,”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 15, 1990: B7.

[2] “Rather than Grouse about Traffic, Some Bostonians Walk the Walk,” *Boston Globe*, Feb. 4, 2002: A22.

[3] Vicky Chen Haider, “Up and Down Chinatown,” *Chicago Tribune*, Feb. 5, 1978: H24.

被尊称为“医生中的孔子”。^[1]“造诣明显更为深厚”的华裔钢琴演奏者最终输给白人选手，报纸假借孔子的口吻安慰道，“音乐世界没有公正”。^[2]某华人编剧积极反对美国戏剧丑化亚裔的行为，报纸称赞他体现了孔子“君子……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的精神。但当此位编剧未能及时听取观众反应而对作品加以修改时，同一报纸作者又以孔子“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之言进行批评。^[3]前引各例均出现在年轻华人的孔子信仰有减弱趋势的背景之下。报纸一如既往地以孔子解释华人行为，说明华人围绕孔子而建的文化想象社区已给美国主流社会留下深刻印象。有鉴于华人年轻一代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和华人群体分散趋势的加剧，华人构建文化想象社区的策略和效果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1] Stanton Delaplane, “Getting Needled for Smoking,”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 28, 1986: 61.

[2] John von Rhein, “Sinfonietta Helps Give Young Pianist a Chance to Sparkle,” *Chicago Tribune*, Mar. 20, 1991: 18.

[3] Kevin Kelly, “M. Butterfly, Miss Saigon and Mr. Hwang,” *Boston Globe*, Sept. 9, 1990: B89; Kevin Kelly, “Producers Struggle to Save ‘Face,’” *Boston Globe*, Mar. 5, 1993: 63.

第二十四章

孔子：战后美国华人餐饮的文化标记

自从华人移居美国，中国餐饮便在美国落地生根。伴随着华人群体的扩大和迁徙，中式餐饮已经成为美国华裔社会的身份象征之一。二战结束以来，其发展尤其引人瞩目。排华法案的最终废除为华人创造了更为宽松的生存环境，华人餐饮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数量上，中餐馆已从战后初期的 4500 家增至现在的四万，超过美加地区麦当劳、温迪快餐 (Wendy's) 和汉堡王 (Burger King) 的总和。^[1] 菜系方面，粤菜独占鳌头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中国各大菜系纷纷进入，迎合着因 1965 年美国放宽移民限制而涌入的非广东地区华人移民的口味，满足着尼克松 1972 年中国之行在美国社会激起的中餐好奇心理。^[2] 经营地点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虽然唐人街仍是华人餐饮的聚集地，城市其他街区和郊区的中餐馆却有如雨后春笋般地

-
- [1] 刘海铭：“炒杂碎：美国餐饮史中的华裔文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2 页；Haiming Liu and Lianlian Lin, “Food, Culinary Identity,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e,” *Journal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12 (June 2009): 158.
- [2] J. A. G. Roberts, *China to Chinatown: Chinese Food in the West* (London: Reaktion, 2002), 166; Haiming Liu and Lianlian Lin, “Food, Culinary Identity,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e,” 140—45; Melvin G. Holli and Peter d’A. Jones, eds., *Ethnic Chicago: A Multicultural Portrait*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1995), 398; Daniel Ostrow, *Manhattan’s Chinatown* (San Francisco: Arcadia, 2008), 43.

不断出现。^[1]在经营理念上,连锁模式从无到有,现在已成规模;竞争手段则从单纯的相互杀价到注重就餐环境的东方格调。^[2]当然,诸如卫生状况、菜品脂肪含量高和味精综合症等问题也逐渐暴露。^[3]

变化尽管显著,但对于非华裔美国社会而言,中餐馆依然是一个整体,依然代表着整个华人社会。这不仅因为餐馆外在的中文名称,也因为餐馆宣传攻势中共同的文化内核。为显示纯正的中国风味,各个餐馆竭尽所能地展现自己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正如前文所述,餐馆的发展和问题,甚至装修风格,都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但中餐维护共性的文化宣传策略,其研究者却不多见。而分享共同的文化概念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笔下“想象的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4]所以,不约而同地利用同一文化要素对外宣传,是华人餐饮构建整体形象和华人社会维护总体身份的关键步骤。研究其宣传策略中的中国文化成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特殊华裔社会形式的运转机制,而且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观察美国社会中华裔与其他族群的相互接纳模式。孔子就是华人餐馆宣传攻势不可

-
- [1] Min Zhou,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6; Sandy Changfeng Chen and John T. Bowe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Determined Factors for the Success of Chinese Quick Service Restaurant Chains,” in H. G. Parsa and Francis A. Kwansa, eds., *Quick Service Restaurants, Franchising, and Multi-Unit Chain Management* (Birmingham, NY: Haworth Hospitality, 2001), 242; Huping Ling, *Chinese St. Louis: From Enclave to Cultural Commun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55.
- [2] John Jung, *Chinese Laundries: Tickets to Survival on Gold Mountain* (no city, no press, 2007), 216—17; Sandy Changfeng Chen and John T. Bowe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Determined Factors for the Success of Chinese Quick Service Restaurant Chains,” 242—61; Michael A. Hitt et al., *Strategic Manage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Globalization* (Mason, OH: South-Western Cengage Learning, 2009), 116.
- [3] Judy E. Perkin, *Food Allergies and Adverse Reactions* (Gaithersburg, MD: Aspen, 1990), 220; Ronald S. Goor and Nancy Goor, *Choose to Lose: A Food Lover's Guide to Permanent Weight Los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9), 81.
- [4]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n, 1991), 19—22.

或缺的文化要素之一。他具有极大的跨文化知名度，为不同族群所知晓，是华人餐饮独有的文化标记。

一、中餐品牌上的孔子

中餐馆是美国社会一道特色鲜明的风景，见证着华人群体的存在及其遍布美国的足迹。中餐馆名称繁杂，菜系各异。他们尽管在不断变通口味，以求满足美国食客，但维系中国餐饮文化的特色是所有中餐馆的共同举动。中英相伴的餐馆名称和菜单、以炒菜和米饭为主的餐饮品种、中国面孔的厨师和服务员、中国风格的室内装饰，都是餐馆展示文化根源的手段。在此背景之下，很多中餐馆十分注重建立与中国文化圣人孔子的联系，将孔子融入餐馆品牌之中。他们或者让孔子成为餐馆名称的一部分，或者以孔子为参照，阐释经营理念、就餐环境和菜品特色。以其独有的跨文化魅力，孔子不仅吸引着络绎不绝的美国食客，更是日渐分散的中餐馆维护华人文化身份的重要渠道。

数量众多的中餐馆不约而同地将孔子之名纳入餐馆名称，开门见山地凸现华人特色。我们在此略举几例。洛杉矶的吉米·兴 (Jimmy Hing) 和纳尔逊·梅 (Nelson Moy) 将自己的中国熟食店命名为“孔子美味” (Confucius Delicacies)，经营广东炸鸡、排骨和炒饭等。^[1] 洛杉矶的另外一家“孔子”餐馆为 1966 年的感恩节准备了中式烤火鸡。^[2] 纽约的“孔子餐厅”主营“源自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福建的独特而具有异域风味的菜品”。^[3] 加利福尼亚的中式快餐连锁店“孔子”声称，其家庭外卖送达神速。^[4] 加州纽波特比奇 (Newport Beach) 的

[1] Lois Dwan, "Roundabout," *Los Angeles Times*, Oct. 23, 1966: N42; Nov. 6, 1966: B50.

[2] "Chinese Feast," *Los Angeles Times*, Nov. 20, 1966: M46.

[3] Michael Coakley, "New York: The Hidden Treasures," *Chicago Tribune*, Apr. 14, 1985: K1.

[4] "Nuts and Bolts,"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Apr. 5, 1991: S6.

一家中餐外卖店也叫“孔子”。^[1] 华盛顿的“孔子”餐馆经营姜汁龙虾、北京烤鸭、煎炒鲈鱼和其他名菜,“独占(附近地区的)中餐市场”。^[2] 取名“孔子咖啡”的中餐馆也位于华盛顿,据信“有望跻身一流餐馆,成为该市中餐市场的及时补充”。“孔子咖啡”的四名厨师分别精通沪菜、粤菜、湘菜和川菜,能满足不同食客的口味。^[3] 洛杉矶的“子曰”餐馆则打算以低廉价格吸引顾客。^[4]

很多中餐馆虽然名称中并无“孔子”二字,他们自有其他办法将孔子纳入品牌塑造进程。策略之一,餐厅利用孔子善于说教的特点,假借孔子之口,鼓动食客前来就餐。经营者希望,通过让“孔子”揽客,本来就对中国文化和华人家族渊源印象模糊的美国人,能够在圣人孔子与餐馆之间建立某种亲缘关系,增加餐馆招牌的吸引力。即便并不相信这种联系的美国人,也有望领悟其中的诙谐幽默,从而乐意消费。无论何种情形,餐馆的本意都在给食客留下深刻印象,增加魅力。比如,纽约的陈氏餐馆老板自称孔子后裔,“著名祖先的智慧”让餐馆蒸蒸日上。^[5] 广告中的“孔子”为陈氏餐馆吆喝道:“走!用美国运通信用卡消费去。”^[6] 首都华盛顿的“中秋月”茶座声称,“聪明的孔子说,团团(圆圆)就应该品尝点心”。^[7] 另一广告中,孔子号召人们“下馆子”,地点是芝加哥的“远东”餐馆。^[8] 佐治亚州钱布利(Chamblee)

-
- [1] Suin L. Hwang, “Domino Effect Hits Chinese Fast Food,” *Wall Street Journal*, Jun. 14, 1991: B1.
- [2] Eve Zibart, “Hungry? New Restaurants Making a Splash,” *Washington Post*, May 21, 2004: T14.
- [3] Corinna Lothar, “Confucius Café Makes Wise Choices on Menu,” *Washington Times*, Oct. 29, 1998: M6.
- [4] Rose Dosti, “Let’s Eat Out,” *Los Angeles Times*, Sept. 4, 1986: K2.
- [5] “Magazine of Books,” *Chicago Tribune*, Jun. 15, 1952: B10.
- [6] “American Express Restaurant of the Week: House of Chan,”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 7, 1962: 22.
- [7] “Just Opened!,” *Washington Post*, Apr. 11, 1969: B9; Apr. 13, 1969: 26.
- [8] “Eating Out Confucius Say...,” *Chicago Tribune*, May 22, 1970: B18.

的香港海鲜馆杜撰孔子语录，声称自己“拥有无与伦比的美味”。^[1]芝加哥的“好世界”(Hoe Sai Gai)更是数年如一日，假借孔子之口招揽生意。广告称，“子曰：聪明的购物者会在‘好世界’停留”，鼓励那些因为逛街而饥肠辘辘的人们前来就餐。^[2]另一广告专为电影迷设计：“子曰：在你电影约会之前或之后，到‘好世界’餐馆享用一杯热带饮料和广味大餐。”^[3]再一则广告中，孔子变身餐馆老板的恩师，并向食客保证，“我的好学生哈里·杨(Harry Eng)将在他的‘好世界’餐馆为你奉上珍奇的热带饮料和美味的广东菜”。^[4]1961年11月8日，离圣诞节尚有将近两月之久，“好世界”广告中的“孔子”及时提醒道，“聪明的购物者会及早采购圣诞用品！然后在著名的哈里·杨广东风味餐厅休息用餐”。^[5]又有广告写道，“子曰：祖传广东菜食府闻名芝加哥，请在‘好世界’餐馆用餐”。^[6]

策略之二，让就餐环境充满着孔子气息。一方面，孔子其名其语融入了餐厅的内部设施之中，意在造成食客在孔子注视之下就餐的庄重感觉，或者让食客认为，自己正在与新奇的中国传统融为一体。例如，“新亚”餐厅专设“孔子间”，可举行私人宴会和聚会。餐厅号称华盛顿“最新最具创意的泛亚餐馆”，主营中国、泰国、巴基斯坦和印尼等地的美味佳肴，由相关国家大使馆的前大厨掌勺。^[7]华盛顿的“成吉思汗”饭店也设有孔子包间。^[8]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蒙科克(Monkok)中餐馆在酒杯上刻着“看似孔子的人像”，顾客对此印象

[1] Elliott Mackle, "Dining—This Lone Ranger Loves Honto,"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May 12, 1990: L27.

[2] Display Ad, *Chicago Tribune*, Aug. 27, 1956: 15; Sept. 10, 1956: 14.

[3] Display Ad, *Chicago Tribune*, Sept. 8, 1956: 21; Dec. 8, 1956: 17.

[4] Display Ad, *Chicago Tribune*, Sept. 6, 1961: 2.

[5] Display Ad, *Chicago Tribune*, Nov. 8, 1961: 11.

[6] Display Ad, *Chicago Tribune*, Jul. 27, 1957: 17.

[7] "Eminently Worthy of Your Early Visit," *Washington Post*, Feb. 16, 1958: A9.

[8] Winzola McLendon, "Cocktail Flag Is Flying High Capital," *Washington Post*, Sept. 5, 1958: C12.

深刻。^[1]

另一方面，孔子气息还来自于装潢设计。很多餐馆将孔子元素纳入装饰风格，期待前来就餐的美国人能够立刻被充盈的孔子氛围所吸引，既展现华人特色，又能满足食客领略中国文化的欲望。芝加哥的杨氏餐厅将孔子语录刻在墙壁上。^[2] 波士顿的迈尔斯-张 (Myers & Chang) 餐馆在墙上写着，“孔子曾经光临”。^[3] 纽约长岛的“天成楼” (Tim Sing) 装潢颇具中国特色：除了神龛、金龙、屏风和红色屋梁之外，还有数尊孔子雕像。^[4] 纽约的另一家中餐馆“喜临门饭店”更是在就餐环境上下足功夫。饭店烧柴使用松木，装饰则使用高度抛光的柏木。顾客一踏入饭店，便会“想起坐落在古老松柏林中的孔庙”和周游列国的孔子，并且意识到，“并非所有中餐馆都能代表纽约市的唐人街”。^[5] 纽约布鲁克林的某家中餐馆为增加中国气息，特地委托一家艺术设计公司装饰墙面。谁知设计者的中文差强人意，在墙上贴上了中国杂志里的批林批孔标语。尽管啼笑皆非，孔子还是成为了就餐环境的一部分。^[6]

策略之三，将经营理念打上孔子印记。孔子是美国社会最具知名度的中国名字，中国人被视作遵从孔子思想的群体。经营餐馆的华人顺应这一思维定式，特意在广告中表明遵从孔子教诲的意图，在经营行为中展现和丰富中餐的文化内涵。华盛顿的萨姆·G·黄 (Sam G. Wong) 在此方面手法极为娴熟。黄的“月宫”餐馆于1957年开业。在尔后的数年内，黄刊登系列广告，每次必然以孔子为切入点，阐述独到的经营理念。黄多次表示，“月宫”把“孔子”名言“创业易，守

[1] Lesley Tellez, "A Winning and Dining Experience That Takes You Back a Few Years," *Dallas Morning News*, Dec. 6, 2001: 14R.

[2] "Have You Heard?" *Chicago Tribune*, Sept. 9, 1956: K12.

[3] "Recent Dining Out Reviews," *Boston Globe*, Jan. 9, 2008: 6E.

[4] Joanne Starkey, "Chinese with No Detours," *New York Times*, Jan. 8, 2006: L110.

[5] "Oriental Charm Abounds," *Washington Post*, Sept. 6, 1972: AS19.

[6] "Chinese in Ad Causes Red Faces," *Los Angeles Times*, Oct. 17, 1974: A27; "Communication Failure," *Washington Post*, Oct. 19, 1974: B3.

业难”奉为圭臬，故而能保持长久活力。^[1]开业第四周年来临之际，黄撰文重申，自己一直铭记“孔子的智慧及其守业艰难的话语”，以在美国首都提供正宗中国菜为唯一目标。^[2]1960年3月25日的广告以孔子语录“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为开端，鼓励人们在生活细节中体现孔子思想。^[3]母亲节将至，广告一开始就将清朝王永彬所著《围炉夜话》中的名句“百善孝为先”用作孔子语录，意在让孝顺的子女“带母亲下馆子”。^[4]《大学》第一章“物格而后知至”之言则用来证明，“月宫”经营者博古通今。^[5]1961年2月10日的广告开篇是“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礼记·乐记》），以给餐馆增加些许艺术气息。^[6]而在另一天的广告中，黄大谈孔子的生活艺术及其对坐立姿势的要求。^[7]“月宫”餐馆并不直接推销自己，而是连载孔子关于为人处世的经典论述，并引为经营思路，有意无意之间让顾客自感拥有了高雅的东方品味。正如黄所写，孔子的“精神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8]

“月宫”广告代表着华人餐馆假借孔子，宣示深厚中国文化积淀的努力。人们如果前往就餐，不仅可以享受美味佳肴，更能体会到经营者诠释和传承中国传统的用心，亦可获得修身养性的灵感。与此同时，孔子的仁爱思想闻名于世。有些餐馆将此融入经营理念，突出为顾客着想的原则。芝加哥的菲尔·沈（Phil Shen）遵从孔子教导，决定改革中国传统菜谱，适合美国口味。^[9]同在芝加哥的吉米·黄（Jimmy

[1] “Serve Good Food Give Good Parties,” *Washington Post*, Apr. 16, 1960: D3. 明朝戚继光的《止止堂集·愚愚稿上》有“创业易，守业难”之说，但人们一般将这句话视为中国谚语。

[2] Sam G. Wong, “Dew in the Moonlight,” *Washington Post*, Apr. 14, 1961: B15.

[3] Sam G. Wong, “Dew in the Moonlight,” *Washington Post*, Mar. 25, 1960: C9.

[4] Sam G. Wong, “Dew in the Moonlight,” *Washington Post*, May 6, 1960: C8.

[5] Sam G. Wong, “Dew in the Moonlight,” *Washington Post*, Jun. 17, 1960: D10.

[6] Sam G. Wong, “Dew in the Moonlight,” *Washington Post*, Feb. 10, 1961: B11.

[7] Sam G. Wong, “Dew in the Moonlight,” *Washington Post*, Nov. 24, 1961: D9.

[8] Sam G. Wong, “Dew in the Moonlight,” *Washington Post*, Sept. 30, 1960: B11.

[9] Fran Zell, “East Gives Way to West at Dr. Shen’s,” *Chicago Tribune*, May 28, 1978: E18.

Wong) 也深受孔子启发, 自编孔子语录“如果你记着向上次帮过你的人道谢, 下次再请人帮忙就更加容易”, 表达感恩顾客之意。^[1] 洛杉矶西部的“东方快车”中餐馆声称, 虽然孔子要求喝茶, 但其仁爱思想并不反对客人饮用咖啡。^[2] 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重庆”餐厅借用孔子之口, 保证食客“在‘重庆’吃饭就跟在家一样舒适”。^[3] 该地的“中华帝国超级自助餐厅”(Imperial China Super Buffet Restaurant) 立志价廉物美, 为顾客节约。广告中, 讲求以人为本的“孔子”说: “如果在自助餐厅用餐, 在往盘子夹菜之前, 先看看两排陈列的菜品”, 并且“不要以装修判断自助餐厅”。^[4]

策略之四, 让孔子见证中式菜品的纯正。孔子留有诸多关于饮食原则的思想, 因此成为很多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美食之父。华人餐馆抓住这一心理, 在介绍菜品及其风味时, 将孔子纳入推销策略。一方面, 他们竭力向顾客展示, 自己已经把孔子的美食思想融入菜肴之中, 甚至在某些方面业已超越孔子的水平。比如, 洛杉矶的关氏(Quon)餐馆据称风味独特, 配料讲究, 体现着“孔子、老子、阴阳与和谐思想”的奥妙。^[5] 新泽西州欧文顿(Irvington)的黄先生声明, 他只做中国菜, 因为“可能是孔子”说过, “如果吹别人的喇叭, 自己的喇叭就顾不上”。^[6] 保罗·马(Paul Ma)在纽约的克罗斯里弗(Cross River)经营中餐馆。广告称, 马来自山东, “与在他之前的孔子一样”, 熟知鲁菜的制作。^[7] “香格里拉”中餐馆自称, 杏仁鸡丁为其一绝, “孔子都未吃过如此美味的鸡丁”。^[8] 芝加哥的“好景楼”(Hoe King Lo)在广

[1] Herb Lyon, “Tower Ticker,” *Chicago Tribune*, Nov. 22, 1962: 24.

[2] Stanton Delaphane, “Mysteries of the Southland,”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l. 25, 1986: 71.

[3] Waltrina Stovall, “Chung King,” *Dallas Morning News*, Jan. 23, 1987: 7.

[4] Waltrina Stovall, “The Distance between 2 Lines Isn’t Always the Shortest Way,” *Dallas Morning News*, May 26, 1996: 14S.

[5] Lois Dwan, “Roundabout,” *Los Angeles Times*, Jan. 19, 1969: Q50.

[6] Frank J. Prial, “Dining Out in New Jersey,” *New York Times*, Nov. 30, 1975: 123.

[7] M. H. Reed, “Paul Ma Comes to Cross River,” *New York Times*, Dec. 13, 1987: WC53.

[8] “Tower Ticker,” *Chicago Tribune*, Jan. 26, 1951: 19.

告中写道，“当我们为你献上北风杏仁鸭，孔子……（惊得）一时语塞，但你可告诉你的朋友”。^[1] 在纽约的“四海”中餐馆，“渤海”兼烈鸡尾酒（gimlet cocktail）散发出“孔子都无法抵御”的诱惑。^[2]

另一方面，某些餐馆甚至将“孔子”用作菜品名字。对中国美食及其渊源略知一二的顾客，能够在翻阅菜谱的瞬间，想到菜肴及其经营者与中国传统的紧密联系，从而对餐厅的纯正中国风味信心大增。“孔子拼盘”（Confucius Concoction）就是一例，数家餐馆都以此为卖点。芝加哥“西湖”的孔子拼盘精选各种开胃菜——如蛋卷、褐虾烤面包、炸鸡腿、煎鱼饼和炸馄饨，放在大木盘里，木盘中央有微型日式火钵，供烧烤牛肉之用。^[3] 同在芝加哥的“吉林花园”（Kirin Garden）中餐馆也有孔子拼盘。^[4] 伊利诺伊州肖姆堡（Schaumburg）余氏餐馆提供的孔子拼盘能够转动，上有炸蟹肉、烤牛里脊、炸三明治和李子酱肋排等，是“一道可口而又丰盛的开胃菜”。^[5] 1966年元旦，加州帕诺拉马市（Panorama City）菲尔·安（Phil Ahn）经营的“月门”（Moongate）餐馆准备有“孔子晚餐”，供“聪明的”人选用。^[6] “孔子鸡”（Confucius Chicken）是佐治亚州“万福”餐馆的招牌菜，由油炸鸡肉、蘑菇、荸荠、糖荚豌豆和蔬菜组成。^[7] 在芝加哥的“中国烤菜”（China Grill）餐馆，开胃菜包括“孔子鸡肉色拉”（Confucius chicken salad）。^[8] 纽约的“湖南风味”（Hunan Taste）餐厅推出“孔子对虾”

[1] Display Ad, *Chicago Tribune*, Mar. 14, 1968: N2.

[2] John Canaday, “For a Change of Pace, Six Places That Have Stood the Test of Time,” *New York Times*, Oct. 3, 1975: 29.

[3] Paul A. Camp, “Dining Out,” *Chicago Tribune*, Feb. 22, 1985: F24.

[4] Mark Knoblauch, “Kirin Garden’s Fare Not in the Running for Oriental Honors,” *Chicago Tribune*, Dec. 22, 1985: H33.

[5] Elizabeth Owens-Schiele, “Hungry for Variety? Pick a Platter at Yu’s Mandarin,” *Chicago Tribune*, Dec. 17, 1999: 54.

[6] Lois Dwan, “Roundabout,” *Los Angeles Times*, Dec. 18, 1966: B49.

[7] Connie Cunningham, “Wan Fu Offers Casual Chinese and a Taste of Thai,”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Jun. 22, 1989: G6.

[8] Denise I. O’Neal, “China Grill Expands Options with New Menu,” *Chicago Sun-Times*, Mar. 9, 2005: 4.

(Confucius prawns), 吸引顾客。^[1]

美国民众愿意光顾华人餐馆,就是看重华人餐饮所具有的异域文化特色。从中悟出灵感的中餐馆有的放矢,利用各种策略,将孔子作为品牌吸引力的关键元素,附会出孔子与华人餐饮千丝万缕的关系,强化了华人餐饮的中国内涵。需求与回应互为动力,激励着华人餐馆加深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孔子就是这一文化身份建构举措的重要节点。

二、幸运签饼里的孔子

在所有华人餐馆,幸运签饼(fortune cookie)是随账单一起送来的免费甜点。作为华人餐饮业的独特食品,签饼已成中餐馆不可取代的标志。签饼与其他饼干的根本区别在于,内含写有预测运气的格言或幽默短句的纸条。小纸条即为签饼的核心,而上面的文字多为孔子名言或者假托孔子的字句。食用签饼的顾客自然会因为孔子而联想到华人和中国文化。所以,签饼是华人餐饮利用孔子展示族裔身份的又一话语工具,庞大的签饼制作产业则在延续和强化着孔子、签饼和华人群体特性之间的联系。

关于签饼的起源,研究者众说纷纭。有人说签饼最早出现于1909年的旧金山,也有人认为是洛杉矶一家中餐馆于1918年最先发明,还有人相信是一位日裔美国人在1914年创造。甚至有学者表示,签饼源于中国人在14世纪抵抗蒙古人入侵时在月饼中藏匿情报的习惯。^[2]无论起源何处,到20世纪30年代,旧金山唐人街的所有餐馆都在向游客提供签饼了。^[3]到冷战时期华人餐饮业获得发展契机之时,

[1] Florence Fabricant, "From the Orient, Lacking Spice," *New York Times*, May 12, 1985: L118.

[2] Jing Yin and Yoshitaka Miike, "A Textual Analysis of Fortune Cookie Sayings: How Chinese Are They?"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19 (2008): 19.

[3] Paige Wiser, "Crystal Ball Better Predictor of Fortune than Cookies," *Chicago Sun-Times*, Sept. 4, 2003: 46.

签饼已与华人群体紧密相连。阅读签饼里的孔子“语录”乃食用中餐的必有程序。^[1]据《洛杉矶时报》报道，仅在1958年，中餐馆的食客就打开了2亿5千万个内含孔子警句字条的签饼，还有不计其数的美国人将签饼囫圇吞下。^[2]一幅漫画甚至讽刺中国政府制定了“控制世界签饼产业的新五年计划”。^[3]可见签饼的特殊文化意义。

华人社区有专门制作签饼的作坊，后发展成大型工厂，生意极为火爆。签饼发往全美各地，顾客一打开签饼，扑面而来的就是孔子和中国信息。无数的美国人接触和食用签饼，成为不断强化孔子、签饼和中国传统三者关系的社会仪式。所以，签饼生产和消费既维系着中餐馆的族裔特色，又巩固着孔子对于华裔身份的象征意义。孔子著作往往是签饼名言警句的主要来源。^[4]报纸写道，“2500年前，当孔子在长江岸边（原文如此）妙笔生花，写出如此众多的警句隽语时，他可能不会怀疑，自己的精练智慧能够最终成为20世纪繁荣的华人签饼产业的填料”。^[5]发明签饼的“天才成功利用了‘东方的神秘性’和孔子的智慧，将他们变成一件好事”。^[6]西海岸叶先生的作坊可以月产签饼一百万。他和家人就是从“破旧的孔子著作”选择字句，藏入签饼之中。叶自豪地告诉记者，“他们称我为中国签饼行业的博士”。^[7]纽约唐人街的香港移民彼得·杨（Peter Young）拥有六家签饼作坊，每天有“成千上万条孔子信息等着被塞入成千上万个华人签饼”。^[8]

[1] Alex Kotzky, "Apartment 3—G," *Washington Post*, May 22, 1975: F7.

[2] Leslie Lieber, "The Inside Story of Chinese Fortune Cookies," *Los Angeles Times*, Jun. 7, 1959: 25, 26, 28.

[3] Lichty, "Grin and Bear It," *Los Angeles Times*, Apr. 28, 1959: B5.

[4] Lee Tyler, "Fortune Made in San Francisco Cookies," *Chicago Tribune*, Mar. 17, 1963: SW10.

[5] Leslie Lieber, "The Inside Story of Chinese Fortune Cookies," *Los Angeles Times*, Jun. 7, 1959: 25, 26, 28.

[6] Armand Schwab, Jr., "Rising Fortunes," *New York Times*, Nov. 27, 1960: 84—86.

[7] Charles Hillinger, "Million a Month: L.A. Baker Finds Own Fortune in Chinese Cookies," *Los Angeles Times*, Oct. 8, 1967: 11.

[8] Carol Oppenheim, "Tracing Fate to Its Very Source: N.Y.'s Chinatown," *Chicago Tribune*, Nov. 13, 1978: 1, 3.

由于需求之巨，专门生产签饼“孔子”箴言的印刷商应运而生。有一家此类印刷作坊直接取名为“子曰”。^[1]也有很多餐馆自己制作签饼。如洛杉矶的本森·冯（Benson Fong）餐馆，在每年的孔子诞辰日，都会将孔子语录塞入签饼之中。^[2]

随着中餐馆增多，签饼市场急剧膨胀，真正的孔子格言不敷使用，假托孔子的字句日渐频繁地出现在食客面前。一般的消费者并不关心饼内信息是否真的出于孔子之口，孔子因此仍然是签饼独有的文化印记。观察者发现，即便是签饼作坊自创的格言，也必须要有“些许过去常用的‘子曰’韵味”。^[3]20世纪80年代，首都华盛顿最大的签饼供应商超级食品公司（Super Foods, Inc.）无论针对哪种情形，都以“子曰”开头。^[4]加州赫莫萨比奇（Hermosa Beach）的一名妇女仿照孔子语录的格式，专为“垮掉的一代”和儿童撰写签饼警句，据信推动了一场签饼行业革命。^[5]另一妇女雷恩夫人（Mrs. Raine）因为丈夫与华人食品公司的生意往来，与签饼格言撰写结下不解之缘，孜孜不倦地杜撰孔子语录，“孔子都会乐意在签饼中发现”雷恩夫人的不凡见地。^[6]20世纪末，纽约新注册的一家签饼公司承诺，根据客户需求，假托孔子，创作签饼格言，以便让食客在取出纸条之时，“自己成为孔子”。^[7]孔子格言的模仿者意在利用民众希望消费正宗中式签

-
- [1] Melvin Maddocks, "Stamp out Fortune Cooki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16, 1974: 7.
- [2] Lois Dwan, "Roundabout," *Los Angeles Times*, Sept. 12, 1976: V76; "Restaurant News," *Los Angeles Times*, Sept. 20, 1981: 92.
- [3] Charles Leroux, "Ah-h-h! The Sweet Smells of Good Fortune," *Chicago Tribune*, Jul. 5, 1976: A3.
- [4] Nina Killham, "Fortune Cookies: The Medium & Messages," *Washington Post*, Nov. 12, 1986: E15.
- [5] "Confucius Say Wise Words in Cookies Bring Fortune to Writer," *Los Angeles Times*, May 9, 1965: CS5. "垮掉的一代"指二战后美国出现的一批年轻人，他们不满现实，蔑视传统，追求个性，混迹社会底层。
- [6] David Larsen, "Confucius Say: Use Noodle—It Pays," *Los Angeles Times*, Nov. 12, 1970: 1, 10.
- [7] Penny Singer, "Business Built on Flavored Fortune Cookies," *New York Times*, Sept. 5, 1999: WE8.

饼的心理,拓展产品市场。而这一商业行为,却在客观上深化了孔子、签饼和华人身份之间的关联性,与内藏真正孔子格言的签饼一样,强化着华人独特的文化身份。

诚然,签饼中的很多格言正在偏离孔子的哲理风格,“子曰”之类的托词出现的频率也在减少。纵然如此,人们提到签饼,照样会想到孔子,有时还带着对孔子警句的眷念之情,可见签饼已被打上无法抹去的孔子印记。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洛杉矶时报》的一名记者透露,尽管已有五年没有碰到“子曰”签饼了,其女儿却坚持认为,签饼里面必然有孔子语录。^[1]很多美国人怀念内有孔子箴言的签饼,声称唯有孔子语录才不会让签饼“了无生气”。^[2]另有人认为,签饼里的孔子语录可能终将会枯竭,但生硬翻译法语或德语格言已经致使“中国签饼语录丧失质量水准和完整性”。^[3]同一作者在另一评论中写道,陈词滥调代替孔子语录的情形已经有所出现,这是“令人反感而又沮丧之事”。^[4]

20世纪90年代,人们似乎已经习惯没有孔子语录或“子曰”托词的签饼。但只要提及签饼,孔子肯定是无法绕开的话题。孔子与签饼的联系无法割裂,签饼通过孔子建构华人身份的功能依然强大。1990年5月,人称“旧金山签饼王”的爱德华·雷(Edward Louie)去世。其子继承家业,并且坦诚,由于享用中餐的食客希望饭后轻松一笑,诙谐语言已经大量涌入雷氏签饼。但他不忘提醒,孔子言论曾是签饼纸条的主要内容。^[5]芝加哥的黄姓签饼生产商深有同感,认为顾客不

[1] C. Y. Lee, “Strange Monsters Take to the Freeway: Dragons, Snakes and Copycats,” *Los Angeles Times*, Mar. 11, 1977: B7.

[2] “Crumbling Cookies,” *New York Times*, Oct. 23, 1983: E18.

[3] Jack Smith, “Fortune Cookie on Wong Track,” *Los Angeles Times*, Jul. 22, 1976: OC-B18A.

[4] Jack Smith, “His Phrase Is His Fortune,” *Los Angeles Times*, Jul. 14, 1976: OC-A18A.

[5] Rick DelVecchio, “Edward Louie—King of the Fortune Cooki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29, 1990: B6; Gerald Nachman, “A Salute to Two Tough Cookie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n. 1, 1990: B3.

愿进行哲学思考，但签饼与孔子联系紧密，无法分开。^[1]直呼“孔子落伍了，哲学落伍了”的签饼评论者对于签饼与孔子融为一体的状况耿耿于怀，指责“签饼……沉浸在虚幻的古代传统之中”。^[2]诸如此类的事例显示，尽管签饼中的孔子格言日渐稀少，华人仍在利用适当时机，强调签饼与孔子的联系。此举让顾客意识到，食用签饼，无论其中是否含有孔子名言，都是在直面中国文化和华人的特有身份。

虽然签饼的内容并不总是真正的孔子语录，但签饼意味着孔子和中国文化，这种思维定式已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消费签饼就等于体验异域风情。正因为孔子赋予的特有魅力，签饼步出中餐馆，进入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它在不同场合的美国消费行为中显示着华人群体的存在。原本是“中餐馆几乎独有的特殊艺术形式”，签饼突然之间进入了千家万户的厨房和餐桌，摆上了超市的货架，甚至融入了艺术家的绘画和雕塑作品。^[3]一方面，签饼是很多社交场合增添情趣的重要手段。1967年10月，纽约举行第一国民城市银行（First National City Bank）午餐会，大量供应内含仿孔子箴言的签饼。^[4]多萝西·布朗宁（Dorothy Browning）则在家庭聚会上，“将孔子式的好运格言塞入了米饼之中”。^[5]1975年6月，好莱坞露天剧场举行规模盛大的青少年聚会，现场散发幸运签饼，仿“子曰”格言出现最为频繁。^[6]在中餐馆邂逅心仪男士的某小姐，也特地让服务员拿来签饼，塞入自写“子曰”字条，向男士示好。但遗憾的是，男士食用这一签饼并阅读

-
- [1] John Blades, "Cracking the Case of the Stale Cookie Fortunes," *Chicago Tribune*, Sept. 9, 1990: 1.
- [2] Tara Mack, "Sound Bites: The '90s Fortune Cookie Message," *Washington Post*, Jun. 26, 1996: C1.
- [3] Joyce Haber, "Confucius Say: Future Is Bright for Fortune Cooky," *Los Angeles Times*, Sept. 22, 1966: C2.
- [4] Enid Nemy, "A Bankers' Trip through New York with First National City," *New York Times*, Oct. 1, 1967: 88.
- [5] Christy Fox, "Monet Show Set to Open," *Los Angeles Times*, Jun. 13, 1960: A3.
- [6] Sharon Fay Koch, "Bowl Juniors' Party Runneth Over," *Los Angeles Times*, Jun. 5, 1975: G15.

其中的句子之后，毫无反应并起身离开了。^[1]

另一方面，签饼还融入美国发达的广告文化，让更多的人在不经意间感受到华人餐饮文化的存在，进而把华人与孔子传统紧密相连。1976年8月，洛杉矶一家新成立的心血管诊断中心宣布，将在10月举行募捐舞会。广告信息就被巧妙地藏在签饼之中，随中式面条一起邮寄。签饼内的纸条写着：“子曰，10月30日，你将在联合舞会（United Hostess Ball）上迎来好运。”^[2]1980年的农历新年，洛杉矶的百老汇广场，红灯高挂，彩旗飘扬，洛杉矶州立艺术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ry Museum of Art）借庆祝中国春节之机，在此为即将举办的展览募捐。在觥筹交错、歌舞娱乐和绿茶冰激凌之后，签饼正式登场。所有签饼都包含同一条信息：“子曰：感谢你支持洛杉矶州立艺术博物馆”，以提升博物馆的知名度，并鼓励更多的人慷慨解囊。^[3]酒类经销商哈里·斯克莱尔（Harry Sklare）不但将产于加州的红酒取名为中国韵味浓厚的“万福红酒”，而且在营销手段上独辟蹊径。他从当地唐人街购回签饼，免费赠送来店顾客。签饼内容是：“今天是你的幸运日。子曰，每购买一瓶万福红酒，就将得到一美元返现。”万福红酒很快售罄。^[4]

美国人对于签饼的需求极旺，以至于报纸专门刊登了签饼的家庭制作方法。《洛杉矶时报》介绍道，签饼是东方餐饮的“完美结尾”，所需原料皆为厨房日常所备——面粉、糖、盐、发粉、起酥油、鸡蛋等。除了提醒火候和折叠技巧外，介绍特别强调，唯有内藏孔子箴言的签饼方为正宗。^[5]《华盛顿邮报》刊登的制作方法将原料换成了软黄油

[1] Cheryl Lavin and Laura Kavesh, "When She Sees a Neat Guy, How," *Chicago Tribune*, Dec. 21, 1988: 2.

[2] Jody Jacobs, "Good Fortune for a Benefit Ball," *Los Angeles Times*, Aug. 15, 1976: D2.

[3] Jody Jacobs, "Chinese New Year's Party," *Los Angeles Times*, Feb. 18, 1980: 4, 8.

[4] Larry Finley, "Marketing Innovator Helped Store's Rise," *Chicago Sun Times*, Mar. 6, 2007: 52.

[5] Marian Manners, "Almond or Fortune Cookies Excellent Ending to Meal," *Los Angeles Times*, Feb. 3, 1963: WS_A18.

或人造黄油、糖、香草精、营养面粉和鸡蛋等，但照样提醒人们应该采用孔子语录。^[1]

由此可见，纵然内藏的运气格言有着各种变体，人们仍然以孔子及其名言警句为正宗签饼的标志。签饼周而复始的消费仪式就是华人社会通过餐饮展示文化身份、美国其他族裔熟悉和认可这一身份的过程。在承载华人身份信息方面，签饼是成功的，以至于引发很多美国人的奇妙构想。他们希望借助类似于签饼的食品形式，体现自己的社会存在。比如，名叫贾尼丝·哈达里（Janice Hadary）的妇女因为一次在中餐馆拆开签饼的经历，联想到与她同处失业境地的人们及其心理困惑。她因此与丈夫和朋友一道，发明“不幸签饼”（misfortune cookies）。饼中字句模仿孔子口吻，为窘迫者提供建议和慰藉。^[2]受到启发的墨西哥餐馆计划在1983年春推出“幸运卷饼”（fortune taco）。饼中不仅有“子曰”风格的运气格言，更有免费食品券。食客还可参与抽奖，赢得前往墨西哥旅游的机会。^[3]针对酷爱浪漫氛围的年轻人，糕点商推出幸运果仁巧克力方块蛋糕（Fortune Brownie），可以自选信息填充入内。^[4]甚至为生计而挣扎的艺术家，也从签饼中看到了展现自我的途径。纽约的哈利·斯皮勒（Harley Spiller）酷爱签饼和中餐，决定展出收藏的5000份中餐馆外卖菜单，实现自己的“签饼梦想”：“子曰，搜集中餐外卖菜单的人将受到尊敬的艺术批评家高度赞赏”。^[5]

[1] “How to Get the Fortune inside Chinese Cookies,” *Washington Post*, Oct. 17, 1963: E10.

[2] David Larsen, “Half-Baked: The Fortune Cookies Ajar,” *Washington Post*, Feb. 11, 1979: H14.

[3] “Wise Sayings from the Far South,” *Chicago Tribune*, Sept. 6, 1982: B2.

[4] Barbara Sullivan, “Confucius Say, These Brownies Speak Volumes,” *Chicago Tribune*, Jan. 24, 1991: 2.

[5] Suein L. Hwang, “You Can Feast Your Eyes All Day and Not Feel You’ve Seen Much,” *Wall Street Journal*, Mar. 4, 1991: B1.

三、试图影响非华裔饮食习惯的孔子

煎饼引发效仿，并进入寻常百姓家，是华人餐饮影响美国社会的缩影。随着中餐馆的迅速增多和普及，华人餐饮不仅为更多美国人所熟悉，而且正在改变着众多美国人的饮食习惯，深化着中美饮食文化的交融。在此过程中，孔子既是华人餐饮的代名词，更赋予华人餐饮以厚重的历史感和特有的魅力。

以孔子为切入点，美国报纸刊登了众多阐述中餐总体理念的文章，方便民众熟悉中式餐饮的基本原则。正如上文所述，孔子讲究饮食，又有深邃思想流传于世，而且是美国人所熟知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历史人物。因此，从孔子入手，既可一语道破遍布全美的中餐散发出的独特文化气息，也能言简意赅地展现中餐的文化底蕴和强大魅力。有文章写道，孔子期望饮食能促进社会和谐，中餐的每一道程序都非常精细，是“一种艺术”。^[1]中餐被比作中国书法——“简单的一笔一画生成了成千上万个复杂的表意符号”，反映出“伟大的圣人和美食家孔子在数千年前建立的社会平衡与精神和谐体系”。^[2]孔子讲究饮食，不厌其精，甚至有不满日常三餐而休妻之说。中国餐饮“追求完美”的精神由此而来。^[3]《达拉斯晨报》写道，秉承孔子教导的中国人，以哲学眼光看待厨艺，视美食为生活艺术的一部分，讲究多种原料的完美融合。^[4]华人名厨劳燕飞（Eileen Yin-Fei Lo）多次为报纸撰文，详解深受孔子影响的中餐奥妙。她认为，华人餐饮的精雕细琢及其众多礼仪，均得益于孔子订立的原则。“经历孔子的精准之手”，中餐的精

[1] Edith Vanocur, “Cooking for Confucius,” *Washington Post*, May 4, 1972: D1; Edith Vanocur, “Chinese Cookery Can Satisfy the Creative Urge,” *Los Angeles Times*, Sept. 28, 1972: OC_D28.

[2] Roslyn B. Alfin-Slater and Derrick B. Jelliffe, “The High Art of Chinese Cuisine,” *Los Angeles Times*, Nov. 11, 1973: M28.

[3] “Mastering Mandarin—An Orientation,” *Chicago Tribune*, Jun. 4, 1976: B1.

[4] “Gingered Shrimp—For a Taste of the Far East,” *Dallas Morning News*, Jan. 9, 1975: 2.

妙细腻延续至今。^[1]此外,食用时令果蔬也是孔子制定的饮食原则之一,引来美国人效仿。^[2]

遍及全美的中餐馆直观诠释出上述中餐原则,让中式菜谱大受欢迎。把握需求脉搏的中餐馆和美食家及时行动,推出各类点缀着孔子之名的菜谱,激励人们一试身手,在觥筹交错之时感受中国文化。比如,取名《鲜花烹饪》(*Cooking with Flowers*)的小册子搜集了55种菜谱,以11种鲜花为原料,包括“孔子最喜欢的”菊花。^[3]美国肉类研究所推荐“孔子屡见不鲜的”香肠为方便经济的食品,建议家庭采用。^[4]名叫坂本信子(Nobuko Sakamoto)的美国人虽为日裔,却酷爱中国文化和中餐。她搜集将近200份中式菜谱,编辑成册,取名《中华人民共和国菜谱》。菜谱重点推荐实为鱼丸的“红烧西施胸”,不仅因为美味,更因为西施乃“孔子时代的美女”。^[5]一位有着犹太血统的华人调侃道,孔子曾在公元3世纪面授机宜:“笑者长寿。”她秉承教诲,编辑出版了《快乐厨子——烹饪美式中餐》(*The Happy Cooker—Cooking Chinese American Style*),推广华人餐饮。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很快就邀请作者现场演示。^[6]为促使女性烹饪中餐,《中餐大全》(*The Complete Chinese Cook*)的广告甚至引用《诗经·唐风·有杕之杜》中“孔子的话”:“中心好之,曷饮食之?”说明高超的厨艺实乃赢得

-
- [1] Eileen Yin-Fei Lo, “Meeting the Master Chefs of China,” *New York Times*, Feb. 10, 1980: SM16; Eileen Yin-Fei Lo, “Symbolic Foods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New York Times*, Feb. 2, 1983: C3. 劳燕飞生于中国广州,自幼学习烹饪,于1959年经由香港赴美,举办各类中餐厨艺培训班,著有约10部厨艺著作,并为《纽约时报》和《美食家杂志》(*Gourmet Magazine*)等报刊撰写美食文章,获得多项烹饪终身成就奖。
- [2] Barbara Damrosch, “Handling a Glut of Tomatoes,” *Washington Post*, Sept. 2, 2004: H9.
- [3] Carolyn McGuire, Untitled Article, *Chicago Tribune*, Feb. 8, 1971: B4.
- [4] “Food News: Suggestions for Using Ever-Popular Sausages,” *New York Times*, Feb. 22, 1952: 17.
- [5] Mary Knoblauch, “Chinese Create Recipe to Preserve Imperial Cuisine,” *Chicago Tribune*, Sept. 14, 1977: 4.
- [6] Margaree Klein, “All in a Day’s Work,” *Los Angeles Times*, Dec. 16, 1977: O26.

幸福的必备条件。^[1]巴巴拉·特罗普 (Barbara Tropp) 编辑的《现代中国厨艺》(*The Modern Art of Chinese Cooking*) 有“迄今最全面的中餐食谱”之称。其中收录“孔子每周连喝六天晚上”的汤。^[2]诸如此类的菜谱虽然讲解详细,能够烹饪出正宗风味中餐绝非易事,这从中餐馆的持续火爆可见一斑。所以,菜谱的推出实则华人餐饮的营销策略,而这种策略又让孔子与中餐在美国民众脑海里的联系更加紧密。亲自尝试之后的美国人对于华人餐饮的神秘魅力体会更深,华人的独特群体身份也就更加明显。

中餐常用原料也在推介之列。孔子照样是推介策略的核心。不论他是否与推荐对象有关,孔子作为中国美食之父的既有形象和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足以让他成为所有中餐原料的身份标记。娴熟运用这些原料的华人餐饮与孔子如影随形的印象愈发深入人心。大米为正宗中餐所必备。推介者写道,“孔子应该说过:大米是第一大万能烹饪原料”。以大米为主要原料的牛肉杂烩得到重点推荐。^[3]当彩色大米上市,报纸不忘再次假借孔子的饮食要求,鼓励人们踊跃购买。^[4]萝卜是另一引起孔子重视的中餐原料。但美式餐饮却视而不见,报纸因此希望,人们能够借鉴中餐,改变现状。^[5]2000多年前,孔子还提及生姜。生姜不仅调味效果极佳,更是“中国的盘西西林”,值得在美推广。报纸介绍了挑选、储存甚至种植生姜的要领,并罗列数种生姜食谱。^[6]“孔子描述过”的生姜可以煎炒,或者放进南瓜饼和

[1] Margaret Sheridan, “The Complete Chinese Cook: A Beginner’s Guide to the Basics,” *Chicago Tribune*, Jul. 23, 1981: N_A1.

[2] Phylis Magida, “For Novice or Skilled Cook, China Scholar Brings Best of the East to the West,” *Chicago Tribune*, Nov. 18, 1982: S_B10.

[3] Fran Zell, “Compatible Rice Is Best in Stretch,” *Chicago Tribune*, May 15, 1977: W8.

[4] Florence Fabricant, “Rice Rainbow,” *Chicago Tribune*, Feb. 4, 1998: A9.

[5] Jack Bishop, “Reconsidering the Radish: New Ways to Tame Its Bite,” *New York Times*, Sept. 22, 1999: F3; Jack Bishop, “Overlooked Ally,” *Chicago Tribune*, Apr. 5, 2000: B7.

[6] Marian Cromley, “It’s Baby Ginger: From Contraband to Garden Triumph,” *Washington Post*, Apr. 6, 1988: E1.

其他菜肴之中。^[1] 在《波士顿邮报》看来,虽然美国人知晓“孔子在基督时代之前就已谈论的”生姜已有时日,其真正风靡美国主流餐饮却是得益于中餐和其他亚洲餐饮的盛行。^[2]

即便是那些已为美国社会所熟知的中式餐饮原料,也会贴上孔子标签,大做广告。中国柑橘深受欢迎,因为“子曰:中国柑橘的味道与众不同”。巴斯金-罗宾斯公司(Baskin-Robins)将中国柑橘与巧克力相互融合,制成“口味极好”的巧克力果汁牛奶冻。^[3] 名叫“中国柑橘香料”的植物饮料不仅以东方庭院美景为包装图案,包装上还印着孔子语录:“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4] 鲜美多汁的桃子既是中餐馆经常提供的饭后水果,美国社会也不陌生。但桃源于中国并曾出现在孔子论著之中,这成为广告中桃子具有异域文化成分的极好佐证。^[5] 密歇根州科洛马(Coloma)的桃子节则以“在孔子的著作中名垂千古”为广告语,邀请人们前往品尝。^[6]

而要烹制中餐,食材的购买环节必不可少。本着孔子与中餐密切相连的思维模式,并在中餐经营者的轮番宣传之下,食品经销商没有坐失利用孔子拓展生意的良机。一则广告开篇就是,“子曰,‘准备一顿中式晚餐,给你今晚的家营造东方氛围’”,鼓励顾客前往指定的超市选购材料,烹饪素什锦鸡汤、虾仁炒杂碎和炒面等菜品。^[7] 农历新

[1] “A Seasoning for the Ages,” *Chicago Tribune*, Aug. 9, 2000: B7.

[2] Tinky “Dakota” Weisblat, “Root Strength Used Ingeniously, Ginger Powers a Five-Course Meal,” *Boston Globe*, Nov. 29, 2000: D1.

[3] “Mandarin Chocolate Sherbet,” *Washington Post*, Sept. 4, 1964: B8; Sept. 25, 1964: C10.

[4] Margaret Thoren, “It Wasn’t the Banker’s Cup of Tea, But Celestial Seasonings Went to Tow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21, 1981: 11.

[5] Lee Thompson, “Peaches: 3 000 Years of Sweet Sensation,” *Chicago Tribune*, Aug. 13, 1981: S_A8; Marlene Parrish, “Pleasures of the Flesh,” *Washington Times*, Sept. 6, 1995: E1.

[6] Marla Hart, “Tutti Fruity,” *Chicago Tribune*, Jun. 20, 1997: 65.

[7] Marian Manners, “Confucius Say Tasty Chow Can Be Made Occidentally,” *Los Angeles Times*, Oct. 22, 1951: B6.

年来临之际，朱厄尔（Jewel）食品连锁店刊登整版广告，罗列数种中式菜品的烹饪方法，信誓旦旦地宣称：“子曰，‘用购自朱厄尔的方便肉类准备晚餐的女士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结尾处是另一自编孔子语录：“从朱厄尔采购的女士是甜姐儿。”^[1]“万福”牌葡萄酒专为佐餐中式佳肴所酿制，其经销商鼓动道，“子曰：进餐不饮万福，如同吃饭只用一根筷子”。^[2]“拉卓伊”（La Choy）系列中式罐装食品的广告写道，“子曰，‘为晚餐准备拉卓伊中式食品的主妇身材曼妙！’”^[3]在美国，中餐往往就地取材，一方面降低成本，另一方面迎合美国人的口味。所以，很多食品超市并非华人所开，但却利用孔子为中餐做广告。这表明，中餐正被更多的美国人所青睐；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主流社会的食品经销者已经认同孔子作为中餐标志的角色。这让孔子、中餐和华人群体特性之间的相互关联更加牢固。

与推陈出新的中餐菜谱和原料互为呼应，推广中餐的各种社会行为频繁见诸报端，以孔子为吸引力者甚多。一方面，孔子兼具美食家和思想家形象，是中式餐饮推广者的信心之源，美国社会也因为孔子在华人餐饮中的地位，而对中餐刮目相看。例如，孔子关于饮食的论述就是李姓华裔制片人拍摄《品味中国》（*A Taste of China*）纪录片的根本动力。影片涵盖中国各大菜系，包括源于孔子故地的北方菜，于1984年在多家电视台播出。该片“信息量极大，介绍某些令人神往的（烹饪）技艺”。^[4]而因为“比孔子还古老”，并在洛杉矶华人的游说下，北京烤鸭制作工艺的合法性终于在加州州长于1982年7月签

[1]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 With Helpful Hints from Jewel,” *Chicago Tribune*, Jan. 27, 1971: B2; “Jewel Can Help You Do Your Job Better,” *Chicago Tribune*, Feb. 10, 1972: W16.

[2] “Famous Liquor Stores,” *Chicago Tribune*, Sept. 21, 1967: H6.

[3] “Arthur Godfrey Tells Women How to Eat and Get Slim,” *Washington Post*, Apr. 8, 1965: D13; Jul. 22, 1965: E10.

[4] “Scrumptious Viewing on PB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 20, 1984: 21; Nancy Jenkins, “Food Adventures: A Documentary Producer’s China Travels,” *New York Times*, May 16, 1984: C6.

署的法令中得到确认。^[1]旧金山华人餐饮界则为了面条的归属，引证孔子，与意大利移民对簿公堂。^[2]

另一方面，孔子的盛名是众多中餐推广活动不可多得广告工具。受广告吸引而欣然前往的美国人，有意或无意地接受了孔子相对华人餐饮的标志作用。孔子与中餐、孔子与华人身份的联系继续得到强化。华人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本是展示中国传统之时，突出深受孔子影响的中国餐饮更让游客纷至沓来。^[3]而在1985年8月，美国葡萄酒美食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Wine and Food）的中餐推广活动特意杜撰孔子语录，用做广告。四个小时的亚洲厨艺展示以中餐为重点，“当晚筷子横飞”。^[4]1987年的第四届年度英式松饼全美食谱大赛，虽然不以中餐为主题，却让“孔子”代言：“参与者将行好运。”好运就是，冠军将获得资助，前往香港一周，接受中餐名厨的亲手指点。^[5]所以，以孔子为广告手段的餐饮推广活动，在根本上都认可孔子在华人餐饮中的文化标记角色。

通过推动华人餐饮渗入美国主流社会和其他族裔的日常生活，各类广告和报道强化了孔子作为中餐文化标记的角色定位。民众受到媒体激励，烹制中餐或者购买中式食品，既是一种消费行为，也表明他们认同孔子与中餐相互关系的心理。随着中餐消费势头的更趋强劲，孔子代言中餐的话语和认知模式必然更加牢固。面对铺天盖地的中餐宣传，究竟有多少非华裔美国人开始喜爱或烹饪中餐，我们自然难以知晓。但毋庸置疑的是，华人不断利用孔子作为思想家和美食家的盛名，积极拓展中餐的生存空间，为群体及其餐饮文化打上了深深的中国传统烙印。这种努力取得很大成功，中式餐饮已经成为美国多

-
- [1] Stephen Fox, "California Legalizes Old-Style Peking Duck," *Washington Post*, Jul. 7, 1982: B2.
- [2] Alan W. Goldman, "The Great Chinese-Italian Pasta Tempest," *New York Times*, Sept. 2, 1987: C3.
- [3] William Rice, "Beyond Just 'Eating Chinese,'" *Chicago Tribune*, Feb. 7, 1993: 25.
- [4] Martha Woodham, "Trends & Topics,"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Aug. 5, 1985: B2.
- [5] "Win Cooking Lessons in Hong Kong," *Atlanta Daily World*, Aug. 27, 1987: 11.

元文化的一部分，正在改变着美国社会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

战后美国，华人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大为改观。华人餐饮迎来了巨大发展。日渐分散和菜系林立等问题随之而来。但在美国社会，中餐依然是一个整体品牌，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消费者。这不仅因为华人餐饮皆以中国为源的表面现象，更是因为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共识。美国的中餐经营者和整个华人群体一样，存在政治认同和地缘矛盾等内部分歧。但在推销中餐问题上，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并利用孔子的盛名。华人餐饮以孔子为品牌魅力，让孔子藏身顾客极为喜爱的签饼之中，并抓住美国民众熟悉孔子的现象，积极渗入美国非华裔社会的饮食文化。孔子因此是华人餐饮业者的文化纽带，展现出华人餐饮的传统沉淀。

这一过程赋予孔子的意义超越了他作为中国思想家的本来身份。其一，孔子其人与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剥离开来，成为华人群体为中餐贴上的身份标记。而随着中餐和中式食品影响的扩大，华人餐饮又进一步巩固着孔子作为华人群体象征符号的地位。因此，华人餐饮对于孔子的利用实则华人群体认同建构的一部分。其二，因为华人餐饮的宣扬，孔子以一种新颖的方式融入美国的多元文化框架。孔子身为思想家，象征华人的思维模式极其自然，但作为餐饮符号，通过消费文化的环节建构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却是在战后美国出现的新鲜事物。其三，正因为前述两点，作为华人餐饮文化标记的孔子还承载着华人处境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信息。二战结束之前，华人深受歧视，中餐不仅鲜有白人食客光顾，也几乎未有以报纸为媒介、利用孔子大力宣扬的机会和勇气。战后处境的根本改观才导致华人餐饮高调宣传的自信。所以，研究餐饮文化中的孔子是我们考察华人群体心理变化、现实处境和美国族裔关系变迁的独特视角，值得学术界利用跨学科方法进一步探讨。

结束语

孔子形象研究，学术界尝试者虽然众多，将目光投向海外者却不多见。而在漫长的对外交往过程中，孔子已经成为外国认知中国及其文化与制度的关键渠道之一。中国政府亦在积极利用孔子的跨国影响力，主动向外传播中华文明。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乃中国文化传播行动的重点对象，这种努力已取得显著成效。然而，美国人到底如何看待我们如今视为神圣的孔子，美国的孔子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其演化机制及与政治、社会和外交背景的互动关系如何，这些深层问题似乎还未引起两国学界和民众的重视。本书选择以美国的报刊文献为基础，剖析近代以来美国的孔子形象，期望能够弥补当前孔子形象研究现状的不足，有助于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本书的研究和写作，主要秉承如下思路。其一，两种文化的交往必然伴随着各自的象征符号渗入对方的过程。比如，中国人了解美国文化，最为熟知美国的基本信念原则和华盛顿等著名人物。相应地，远在中美开始直接接触之前，孔子就已经频繁出现在北美殖民地的大刊小报上，左右着殖民者对于遥远东方国度的认识。及至华人移美，孔子始与中国人的日常言行紧密相连，进而被用以解释中国的国家行为。纵观美国中国观的历史演进，孔子是不可争议的核心线索。研究美国对于孔子的接受状况，有利于人们推知中国在美的总体形象。

其二，美国是一个极为依赖大众传媒的国家。从政府的决策到普通民众的价值取向，媒体无不发挥着钳制和引导作用。美国人构建孔

子乃至中国形象，须臾不能离开媒体的载体和纽带功能。而在所有大众传媒形式中，网络、广播、电视虽然影响力剧增，却均出现于20世纪，存在时间较短，难以反映近代以来美国孔子形象的历史全貌。唯有报刊杂志不仅自殖民时期以来，就在传递信息，塑造民意，而且即便在今天，仍然影响甚大。自19世纪中期，美国现代报刊业从未中断，其影响遍及全美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报刊既是民意的传播者，又是民意的塑造者。本书引用代表不同区域和利益群体的报刊杂志，就是为了全面客观地展现，美国人在政治与社会言行以及日常起居中，赋予孔子的多重意义。

第三，利用孔子的影响力传播中国文化，就必须系统了解孔子在对象国的形象。虽然中国目前推广传统文化的决心很大，但如果只是根据惯性思维，认为孔子必然受到美国等国民众的喜爱和尊敬，就不能探究真实的美国孔子观。正因为真实的孔子形象并不以正面为主，从事文化传播者便难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宣传策略，改变美国人赋予孔子的负面形象，强化孔子值得称道的一面。唯有全面深入地了解美国孔子形象的组成要素和发展变迁，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孔子的文化象征作用。

而在自近代以来的美国孔子形象中，我们可以发现几条连贯的线索。一是中美关系起伏变化给孔子形象带来极大影响。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欲成为中国发展领路人的心理十分明显。使命意识投影在孔子形象上，就是美国舆论因为孔子的完美思想以及孔子在日欧列强蹂躏之下的命运，而极力声援中国。这与同一时期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美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孔子继续被舆论视作美国理应支持中国的依据，孔子本身甚至是中美交流的重要内容。冷战时期，中美交恶，孔子在美国媒体的建构之下，摇身一变，成为美国攻击中国新政府存在合理性的话语武器，台湾国民党政府则因为尊孔而增加作为美国盟友的筹码。两国关系解冻之后，双方亟需相互了解，孔子又充当着美国认识中国的窗口。及至中国创办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孔子演变成中国挑战美国文化及其全球影响的“急先锋”。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

走向事关孔子形象的具体内涵。

第二条线索是孔子在中国国内的地位。美国媒体习惯于通过孔子处境的变革，观察和评判中国的变化。孔子因此是中国国情变幻的晴雨表。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步伐的窘态日渐明显地展示在世人面前。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建立于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美国舆论断言，孔子是中国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的总根源。到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相互割据，针对传统的政策大有区别。中国百姓仍然深陷传统之中。美国舆论以孔子为窗口，观察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孔子又成为中国混乱形势和停滞不前的见证人。冷战时期，孔子在中国的地位急剧下降。美国舆论以此为由，大肆抨击中国新政府背离中国传统，称其缺乏民意根基。偏安台湾的国民党则处处尊孔，从而被美国等同于正统中国。在此背景之下，孔子充当着美国对华冷战的话语工具。20世纪末、21世纪初，孔子在中国焕发新生。政府不仅在国内大力提倡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传统文化，而且利用孔子的盛名，在国外大建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从这一系列的举动中，美国人看到了中国政府的政治动机：在国内填补因民众“不满”共产主义而导致的精神空缺，在国外则是扩展国家软实力，挑战美国的文化影响。孔子不再是美国针对中国的话语工具，变成了中国挑战美国和统一国内思想的文化武器。

第三条线索，是美国华人处境的变迁。从华人开始大规模移居美国到排华法案的出台，美国的反华情绪狂飙突进，华人形象一落千丈。相应地，被华人奉为神圣的孔子也遭受池鱼之灾，受尽冷嘲热讽。孔子成为华人“怪异”、“荒诞”言行的代名词。华人在美国社会的歧视和敌视下生存，逐步奋起抵抗，伸张群体权利，强化群体认同。孔子是最好的群体黏合剂。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排华高峰期，华人利用孔子思想、主张权利和增强内部凝聚成为一幅独特的美国社会图景。关注此种现象的美国舆论将孔子建构为华人社会的斗争武器。及至冷战爆发和新中国成立，为避免世界舆论的抨击，美国的种族政策有很大松动，少数群体的生存空间和环境均有明显改善。具体到华人，除了享有1943年排华法案废除带来的好处之外，他们跟其

他族裔一样，加快了融入美国社会的步伐，散居到全美各地。如何在不可逆转的同化过程中保持群体特性和认同，引起华人自己和美国主流社会的极大关注。美国媒体发现，孔子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凝聚作用。华人不仅通过教育，强化以孔子为核心的文化传承，而且在华人非常看重的一日三餐中，凸显孔子的存在。从二战结束至今，孔子是华人所剩不多的文化共性之一。

第四条线索，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发展。在不涉及中国与中国人前提下，美国的孔子形象显得更为客观。孔子的为人处世、治国兴邦原则受到尊重，被媒体引为美国民众和美国政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行为准绳。美国各类选举中的相互攻讦、自吹自擂，政治家粉饰太平、无意革除痼疾，总统和其他政治人物的道德瑕疵和言语失当，追求社会公正的改革运动，以完美人格为目标的个人修养和学校教育，所有诸如此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都能在孔子的映衬之下，显露出可取或不当乃至谬误之处。从这层意义而言，孔子是美国政治与社会进程的评判者和监督者。

纵观全书，孔子在美国文化里的形象不同于中国文化给他的定位。在中国，人们给予何种定位是着眼于孔子本人所发挥的作用。而在美国，因为孔子并不影响美国历史的走向，人们看待孔子则是根据中美关系的现状和美国国内形势加以界定的。所以，孔子在中国，可以是圣人、偶像，也可以是恶魔和封建社会的代表。由于美国人没有机会切身体验孔子学说给国家和民族命运带来的影响，孔子形象不至于表现出如此极端倾向。在被赋予诸多实用意义之后，美国的孔子是观察中国发展变迁的窗口，是中美两国竞相利用的舆论武器，是华人群体身份的象征，也是美国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参照坐标。简言之，在美国文化语境下，孔子既非圣人，也非恶魔，而是具有丰富含义的象征符号。

当今中国，国力上升，正在大力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孔子及其思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从本书的研究，我们不妨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孔子和其他中国文化象征在目标国的形象，包括历史的和现在的。利用孔子的盛名推广中国文化，

这本身并无不妥。然而，在多数情形下，我们是在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与地区必然对孔子深怀好感甚至崇敬之情，没有深入考察各国政府和民众真实的孔子形象。正如本书所揭示的，在美国文化里，孔子受到尊敬的情形确实存在，但在更多时候，他是美国人从超然的角度看待中国、中美关系和华人群体的切入点，有时甚至贬损、敌视和警惕心理十分严重。所以，孔子及其他中国象征在异域文化环境中的形象绝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具有错综复杂性，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第二，在研究孔子和其他象征的异国形象时，我们有必要改变专注于思想层面的痼疾。从迄今的情形来看，学界多在争论孔子在各种典籍和思想著作中的形象问题。事实上，散存于学界高墙之外的资料更能反映各国文化的孔子观。本书依赖的美国报刊文献就是一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加接近真实的孔子形象，正视他国的中国观。第三，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国文化及其象征在他国的形象问题，还须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措施。比如，我们目前在美国建立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数量居全球之首，但美国从政府到民间，都对孔子的单纯文化属性持怀疑态度。他们相信，中国在国内复兴孔子是出于政治生存之需，而在国外推广孔子则是为了与美国争夺世界影响力。中国如果知晓这种疑虑，可以在相关宣传中言之有据地展现重振孔子的真实意图，以便让美国人更易接受中国的文化传播行为。

总而言之，通过本书的研究，我们期望能让关注海外中国观和孔子形象的读者系统深入地认识孔子在美国文化语境下的角色变换和其下的动因。我们也相信，通过此举，能吸引更多的学者加入到研究域外孔子形象的行列中来，因为近代以来孔子的海外形象仍然是一大学术空白。与此同时，我们希望本书能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贡献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一、主要原始文献

- Arthur's Home Magazine*, 1861—1870, 1880—1897.
Atlanta Constitution, 1868—2011.
Boston Globe, 1872—2011.
Chicago Defender, 1905—1966.
Chicago Sun-Times, 1980—2011.
Chicago Tribune, 1860—2011.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08—2011.
Dallas Morning News, 1980—2011.
Every Saturday: A Journal of Choice Writing, 1866—1874.
Godey's Lady's Book and Magazine, 1854—1882.
Harper's Bazaar, 1867—1912.
Herald of Health, 1864—1892.
Los Angeles Sentinel, 1934—2011.
Los Angeles Times, 1881—2011.
Massachusetts Ploughman and New England Journal of Agriculture, 1842—1906.
Nassau Literary Magazine, 1848—1908.
National Police Gazette, 1845—1906.
New York Amsterdam News, 1922—1938.
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 1833—1912.
New York Times, 1851—2011.
Ohio Farmer, 1856—1906.
Overland Monthly and Out West Magazine, 1868—1935.
Philadelphia Medical Times, 1871—1889.
Pittsburgh Courier, 1911—1950.
Puck, 1877—1918.

-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980—2011.
Saturday Evening Post, 1839—1885.
Scientific American, 1845—1908.
Scribner's Monthly, 1870—1881.
The Radical, 1865—1872.
United Service: A Quarterly Review of Military and Naval Affairs, 1879—1905.
Wall Street Journal, 1889—2011.
Washington Post, 1877—2011.
Youth's Companion, 1827—1929.
Zion's Herald, 1868—1910.

二、主要研究性论著

- Alberson, Hazel Stewart. "The Significance of World Literature Today." *College English* 7 (March 1946).
- Alden, David L. and Wayne D. Hoyer. "An Examination of Cognitive Factors Related to Humorousness in Television Advertising."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2 (June 1993).
- Ames, Roger T., and Henry Rosemont, J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1998.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1991.
- Berg-Pan, Renata. "Mixing Old and New Wisdom: The 'Chinese' Sources of Brecht's *Kaukasischer Kreidekreis* and Other Works." *German Quarterly* 48 (March 1975).
- Berthrong, John. "Confucian Piety and the Religious Dimensions of Japanese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8 (January 1998).
- Bluestein, Gene. "'The Arkansas Traveler' and the Strategy of American Humor." *Western Folklore* 21 (June 1962).
- Bonner, Arthur. *Alas! What Brought Thee Hither? The Chinese in New York, 1800—1950*. Madison,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Boskin, Joseph. "American Political Humor: Touchables and Taboo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 (October 1990).
- Cady, Lyman V. "Thoreau's Quotations from the Confucian Books in Walden." *American Literature* 33 (March 1961).
- Cai, Zong-qi. "In Quest of Harmony: Plato and Confucius on Poetry." *Philosophy*

- East and West* 49 (July 1999).
- Callahan, William A. "Resisting the Norm: Ironic Images of Marx and Confuciu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4 (April 1994).
- Cameron, Meribeth E. "Far Easter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ar Eastern Quarterly* 7 (February 1948).
- Chan, Sin Yee. "Can *Shu* Be the One Word That Serves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aring Action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0 (October 2000).
- Chan, Sucheng. "Asia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5 (August 1996).
- , ed. *Entry Denied: Exclus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America, 1882–1943*.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Chang, Chi-Yun. "The Centenary Celebration of Sino-American Intellectual Friendship." *Far Eastern Quarterly* 3 (May 1944).
- Chang, Iris.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2004.
- Chen, Sandy Changfeng, and John T. Bowe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Determined Factors for the Success of Chinese Quick Service Restaurant Chains." In H. G. Parsa and Francis A. Kwansa, eds. *Quick Service Restaurants, Franchising, and Multi-Unit Chain Management*. Birmingham, NY: Haworth Hospitality, 2001.
- Commager, Henry Steele, and Milton Cantor, eds.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2 vols., 10th ed.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88.
- Connery, Christopher L. "Pacific Rim Discourse: The U.S. Global Imaginary in the Late Cold War Years." *boundary 2* 21 (Spring 1994).
- Cressey, Paul Frederick. "Chinese Traits in European Civilization: A Study in Diffus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 (October 1945).
- Cua, Antonio S. "Reflections on the Structure of Confucian Ethic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1 (April 1971).
- Daniels, Roger. *Coming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 2nd ed. New York: Perennial, 2002.
- Danton, George H. "Schiller and Confucius." *German Quarterly* 16 (November 1943).
- Davis, Walter W. "China, the Confucian Ideal, and the European Age of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4 (October-December 1983).
- Dirlik, Arif. "Confucius in the Borderlands: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 Reinvention of Confucianism." *boundary 2* 22 (Autumn 1995).
- Dubs, Homer H. "The Development of Altruism in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 (April 1951).
- Dubs, Homer H. "The Political Career of Confuci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6 (October–December 1946).
- . "Theism and Naturalism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9 (October 1959–January 1960).
- Dudden, Arthur Power. "American Humor." *American Quarterly* 37 (Spring 1985).
- Duignan, Peter. "Early Jesuit Missionaries: A Suggestion for Further Stud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0 (August 1958).
- Feng, Han-yi, and J. K. Shryock. "Chinese Mythology and Dr. Fergus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3 (March 1933).
- Fingarette, Herbert. *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 New York: Harper, 1972.
- . "Human Community as Holy Rite: An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us' Analects."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59 (January 1966).
- . "The Problem of the Self in the Analect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9 (April 1979).
- Friedman, Lawrence M.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3rd e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7.
- Fueloep-Miller, Rene. "Tolstoy the Apostolic Crusader." *Russian Review* 19 (April 1960).
- Goutor, David. "Constructing the 'Great Menace': Canadian Labor's Opposition to Asian Immigration, 1880–1914."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88 (December 2007).
- Grange, Joseph.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Public Good: Confucius, Dewey, Rort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6 (July 1996).
- Gustaitis, Joseph. *Chinese Americans*. Tarrytown, NY: Marshal Cavendish Benchmark, 2010.
- Haddad, John Rogers. *The American Marco Polo: Excursions to a Virtual China in U.S. Popular Culture, 1784–1912*.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Ph.D. Diss., 2002.
- Hahn, Chan K., and Warren C. Waterhouse. "Confucian Theories of Man and Organ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5 (September 1972).
- Hall, David L., and Roger T. Ames. "Getting It Right: On Saving Confucius from the Confucian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4 (January 1984).

- .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UNY, 1987.
- Hamburger, Max. "Aristotle and Confucius: A Comparis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0 (April 1959).
- Hanke, Ken. *Charlie Chan at the Movies: History, Filmography, and Criticism*.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89.
- Hansen, Chad. "Freedom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in Confucian Ethic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2 (April 1972).
- Hattori, Unokichi. "Confucius' Conviction of His Heavenly Miss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 (April 1936).
- Holaday, Woon-Ping Chin. "From Ezra Pound to Maxine Hong Kingston: Expressions of Chinese Thought in American Literature." *MELUS* 5 (Summer 1978).
- Holli, Melvin G., and Peter d'A. Jones, eds. *Ethnic Chicago: A Multicultural Portrait*.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1995.
- Huang, Siu-Chi. "Musical Art in Early Confucian Philosoph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3 (April 1963).
- Hummel, Arthur W.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 in China."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0 (April-July 1960).
- Hung, Ho-Fung. "Orientalist Knowledge and Social Theories: China and the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East-West Differences from 1600 to 1900." *Sociological Theory* 21 (September 2003).
- Hunt, Margaret. "Racism, Imperialism, and the Traveler's Gaz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32 (October 1993).
- Hwang, Philip Ho.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u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0 (January 1980).
- Isaacs, Harold Robert.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M. E. Sharpe, 1980.
- Ivanhoe, Philip J. "Reweaving the 'One Thread' of the Analect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0 (January 1990).
- Jackson, Carl T. "The Orient in Post-Bellum American Thought: Three Pioneer Popularizers." *American Quarterly* 22 (Spring 1970).
- Jung, Hwa Yol. "Jen: An Existential and Phenomenological Problem of Intersubjectivit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6 (July—October 1966).
- Jung, John. *Chinese Laundries: Tickets to Survival on Gold Mountain*. No city, no press, 2007.
- Katz, Naomi, and Eli Katz. "Tradition and Adaptation in American Jewish

- Humor."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84 (April-June 1971).
- Keller, Mark. "'The Big Bear of—Maine???'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Humor," *New England Quarterly* 51 (December 1978).
- Kidd, Thomas S. "'Let Hell and Rome Do Their Worst': World News, Anti-Catholicism, and International Protestantism in Early-Eighteenth-Century Boston." *New England Quarterly* 76 (June 2003).
- Kim, Young Kun. "Hegel's Criticism of Chinese Philosoph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8 (April 1978).
- Kupperman, Joel J. "Confucius and the Nature of Religious Ethic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1 (April 1971).
- . "Confucius and the Problem of Naturalnes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8 (July 1968).
- Kutcher, Norman. "The Fifth Relationship: Dangerous Friendships in the Confucian Contex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 (December 2000).
- Lach, Donald F. "China and the Era of the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4 (June 1942).
- Lai, H. Mark. *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 A History of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 Walnut Creek, CA: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 . *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Politic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1.
- Lai, Karyn L. "Confucian Moral Thinking."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5 (April 1995).
- Leites, Edmund. "Confucian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atural Morality and Social Refor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8 (April 1978).
- Ling, Huping. *Chinese St. Louis: From Enclave to Cultural Commun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Liu, Haiming, and Lianlian Lin. "Food, Culinary Identity,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e." *Journal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12 (June 2009).
- Liu, Shu-hsien. "The Religious Import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Its Traditional Outlook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1 (April 1971).
- Lockwood, William W. "Adam Smith and As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 (May 1964).
- Lu, Martin. "Was Mencius a True Successor of Confuciu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3 (January 1983).
- Mahood, G. H. "Socrates and Confucius: Moral Agents or Moral Philosopher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1 (January 1971).

- McKeown, Adam. "Ritualization of Regulation: The Enforcement of Chinese Exclu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8 (April 2003).
- Morton, W. Scott.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Man: The Original Formati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1 (January 1971).
- Mosher, Steven W. *China Misperceived: American Illusions and Chinese Reality*. Harper Collins, 1990.
- Mungello, David E. "Leibniz's Interpret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1 (January 1971).
- . "Sinological Torqu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Preoccupations on Seventeenth-Century Missionary Interpretations of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8 (April 1978).
- Murray, Donald M. "Emerson's 'Language as Fossil Poetry': An Analogy from Chinese." *New England Quarterly* 29 (June 1956).
- Murray, Julia K. "The Hangzhou Portraits of Confucius and Seventy-two Disciples (*Sheng xian tu*): Art in the Service of Politics." *Art Bulletin* 74 (March 1992).
- . "Illustrations of the Life of Confucius: Their Evolution, Functions, and Significance in Late Ming China." *Artibus Asiae* 57 (1997).
- .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and Pictorial Biographies of the Sag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 (May 1996).
- Ostrow, Daniel. *Manhattan's Chinatown*. San Francisco: Arcadia, 2008.
- Peterson, Willard J. "Squares and Circles: Mapp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9 (January—March 1988).
- Reid, Gilbert. "Revolution as Taught by Confucia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33 (January 1923).
- Riegel, Jeffrey K. "Poetry and the Legend of Confucius's Exi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 (January—March 1986).
- Riley, Patrick. "Louis Hartz: The Final Years, the Unknown Work." *Political Theory* 16 (August 1988).
- Roberts, J. A. G.. *China to Chinatown: Chinese Food in the West*. London: Reaktion, 2002.
- Roberts, Moss. "Li, Yi, and Jen in the Lun Yu: Three Philosophical Defini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8 (October—December 1968).
- Rose, Ernst. "China as a Symbol of Reaction in Germany, 1830—1880." *Comparative Literature* 3 (Winter 1951).

- Rowbotham, Arnold H.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 *Far Eastern Quarterly* 4 (May 1945).
- . "La Mothe le Vayer's *Vertu des Payens* and Eighteenth-Century Cosmopolitanism." *Modern Language Notes* 53 (January 1938).
- . "Voltaire, Sinophile." *PMLA* 47 (December 1932).
- Salyer, Lucy E. *Laws Harsh as Tigers: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Immigration Law*.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 Shun, Kwong-loi. "Jen and Li in the 'Analect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3 (July 1993).
- Smith, D. Howard. "The Significance of Confucius for Religion." *History of Religions* 2 (Winter 1963).
- "Some Notes on the Study of China and Japan in American Schools." *Memorandum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merican Council)* 2 (November 3, 1933).
- Spence, Jonathan D.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8.
- Stein, William Bysshe. "The Motifs of the Wise Old Man in *Walden*." *Modern Language Notes* 75 (March 1960).
- Stokes, Walter R. "On Changing Sex Ethics." *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 24 (August 1962).
- Taam, Cheuk-Woon. "On Studies of Confuciu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 (July 1953).
- Takaki, Ronald.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rev. ed.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8.
- .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New York: Back Bay, 1998.
- Taylor, Rodney L. "The Religious Character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8 (January 1998).
- Taylor, Rodney, and Gary Arbuckle. "Confucian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 (May 1995).
- Tillman, Hoyt Clevel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nsion between Virtue and Achievement in Early Confucianism: Attitudes toward Kuan Chung and Hegemon (pa) as Conceptual Symbol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1 (January 1981).
- Todd, Gary Lee.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China, 1840–1860*. University of

- Illinois Ph.D. Diss., 1987.
- Toyota, Tritia. *Envisioning America: New 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Trubner, Henry, and W. J. Rathbun. *China's Influence on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84.
- Tu, Wei-ming, ed. *Confucian Thought: Selfhood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lbany: SUNY, 1985.
- .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Exploring Mo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ulture in Japan and the Four Mini-Drag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 "The Creative Tension between Jen and Li."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8 (January-April 1968).
- . "Jen as a Living Metaphor in the Confucian Analect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1 (January 1981).
- . "Li as Process of Humanizati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2 (April 1972).
- Walker, Brian. "Thoreau's Alternative Economics: Work, Liberty, and Democratic Cultiv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December 1998).
- Wang, Qingjie James. "The Golden Rule and Interpersonal Care: From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9 (October 1999).
- Wawrytko, Sandra A. "Confucius and Kant: The Ethics of Respect."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2 (July 1982).
- Williams, John N. "Confucius, Mencius, and the Notion of True Successi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8 (April 1988).
- Yeh, Chiou-ling. *Making an American Festival: Chinese New Year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 Young, William H. *The 1930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2002.
- Yu, Jiyuan. "Virtue: Confucius and Aristotl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8 (April 1998).
- Yung, Judy et al., eds. *Chinese American Voices: From the Gold Rush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 Zhao, Xiaojian. *Remaking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Family, and Community, 1940–1965*. Piscataway,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2.
- Zhou, M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潮龙起：“危险的愉悦：早期美国华侨赌博问题研究（1850—1943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

丁四新：“近年来英语世界有关孔子与《论语》的研究（上、下）”，《哲学动态》2006年第11、12期。

段庸生：“古代小说中的孔子形象”，《孔子研究》，2006年第1期。

何恬：“此山之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英美孔子研究”，《孔子研究》2009年第2期。

何英：《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

黄俊杰：“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文史哲》，2003年第1期。

霍松林、霍建波：“论《孟子》、《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姜林祥编：《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济南：齐鲁书社，2003。

赖勤芳：“论论语堂对孔子形象的消解与重建”，《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5期。

李剑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孔子形象”，《孔子研究》，2008年第1期。

李霞、李峰：“从《庄子》中的孔子形象看先秦儒道冲突”，《安徽史学》，1996年第1期。

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林存光：《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孔子和儒学》，济南：齐鲁书社，2004。

令狐萍：“美国华人研究的新视角：文化社区理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刘超：“孔子形象：历史知识与社会意识——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刘海铭：“炒杂碎：美国餐饮史中的华裔文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罗炯光：“鲁迅郭沫若的孔子观”，《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夏之卷。

邵汉明：“论《庄子》中的孔子”，《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4期。

孙有中：《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王钧林：“历代孔子形象之嬗变”，《中华文化画报》，2006年第1期。

王锬：“17、18世纪欧洲文化视野中的孔子”，《孔子研究》，2001年第4期。

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印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王忠林：“孔子造像溯源”，《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魏冬、益西群培：“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孔子形象”，《西藏研究》，2009年第1期。

邢娟妮：“林语堂笔下的孔子形象——索解孔子神圣性的理论视角”，《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9月。

颜榴：“从张广天作品看当代戏剧中的孔子形象”，《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3期。

余树苹：“救亡图存的教主——康有为论孔子形象”，《现代哲学》，2009年第5期。

周炽成：“论孔子成为圣人及其他”，《孔子研究》，2010年第4期。

朱仁夫、邱绍雄编：《儒学走向世界文献索引》，济南：齐鲁书社，2003。

朱贻庭编：《与孔子对话：新世纪全球文明中的儒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后 记

本书是重庆市 2009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孔子在美国：近百年来孔子在美国报纸上的形象变迁”(2009YY19)、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科项目“孔子的美国化：19 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孔子”(09SKJ01) 和四川外语学院 2008 年重点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在此成书付梓之际，作者特向以上各项目基金表达由衷的感谢。

从课题构思到成果脱稿，作者得到了诸多必不可少的帮助。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提供了良好的科研条件，保证了充足的研究时间。在资料打印和日常工作中，中心资料室主任李玲老师、办公室的曾晓覃老师和高珊珊老师对笔者帮助颇多。我的数届研究生——特别是杨茗、汪海源、彭小惠、郑佳佳、王洁和郝伟等，以及选修本人课程的其他学生，在课堂内外的鼓励、疑问和讨论，极大地启发了本人的思路，促使我不断改进写作逻辑。2008 年 7—8 月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国研究夏季研讨班的学习经历，不仅让我补充了研究资料，更是开阔了研究视野。

作为课题的中期研究成果，本书的部分内容曾被整理成 14 篇专题论文，在《国际论坛》、《孔子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社会科学辑刊》、《思想战线》、《贵州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史学集刊》、《宁夏社会科学》和《学术论坛》等 CSSCI 来源刊发表，其中两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和《高等

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或摘登。作者谨对有关编辑和审稿专家表示谢意。另外，书稿的某些章节还在数次国内学术会议上宣读，承蒙与会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书稿的最终出版，得益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善鹏博士细致而高效的工作，作者在此深表感谢。书中存在的不足乃至谬误，则留待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张 涛

2011年6月30日 重庆歌乐山麓